

# SCHWARZ BUCH KAPITALISMUS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资本主义 黑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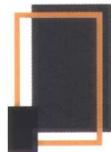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上**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德] 罗伯特·库尔茨 著

# SCHWARZ BUCH KAPITALISMUS



资本主义  
研究丛书

## 资本主义 黑皮书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德] 罗伯特·库尔茨 著

这是一部显微镜，让我们看到深嵌在资本主义五颜六色之中的霉点的黑斑。

罗伯特·库尔茨对三次工业大革命的剖析揭示了为何资本主义过去二百年里的增长活力必然消失殆尽，为何迄今由劳动、货币收入和商品消费构成的体系已不可救药。

这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固有矛盾和内在逻辑的重新思考，也有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发展。

ISBN 7-80149-856-9



9 787801 498564 >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856-9/D·147  
定价(上、下)： 59.00元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资本主义黑皮书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上册

[德]罗伯特·库尔茨 著

钱敏汝 张崇智 李文红 译

王钟欣 赵倩 姚燕 缪雨露

钱敏汝 张崇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资本虚头黑皮书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下 册

[德]罗伯特·库尔茨 著

钱敏汝 张崇智 李文红 译

王钟欣 赵倩 姚燕 缪雨露

钱敏汝 张崇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 资本主义黑皮书(上、下)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

著 者 / [德] 罗伯特·库尔茨  
译 者 / 钱敏汝 等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 任 部 门 / 国际文化事业部  
(010)65140868  
项 目 经 理 / 许春山  
责 任 编 辑 / 严 波 张 征  
责 任 校 对 / 闫晓琦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29.5  
字 数 / 700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80149-856-9/D·147  
著 作 权 合 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2002-3048 号  
定 价 / 5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术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时间跨度约为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时间跨度约为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间跨度约为50年，即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术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最为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权力的行使更具专业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



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奇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

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 译者序言

---

20 世纪末，正当资本主义的缤纷色彩跨越了世界地图上越来越多的疆域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化和危机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库尔茨以《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这一著述提供了一个高倍数显微镜，让我们看到深嵌在五颜六色之中的霉点和黑斑。在罗伯特·库尔茨的笔下，这些霉点和黑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残酷发迹的血腥阴影的残余，而且也是其不可治愈的隐患的活性病源。

在历经两年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在文学、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建筑学、（社会）生物学、遗传学等十数种学科和文体的字里行间穿越了罗伯特·库尔茨笔下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史。罗伯特·库尔茨之所以如此旁征博引，旨在诊断资本主义官方正史在人类集体记忆中普遍引起的健忘症。同时也因为西方左派的失利和东方国有社会主义的失败，学术界对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的论证导致了本来就苍白无力的批判精神的终结，致使这种健忘症成为全世界的病态现象，成为诱发各种独立思考方式解体的腐蚀剂。于是，资本主义就被定义成永恒的社会制度。在此背景之下，罗伯特·库尔茨却自认不识时务，反其道而行之，欲把资本主义连同市场经济作为以血腥方式贯彻实施的强制体系送

上历史的法庭。

罗伯特·库尔茨归纳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层特点，揭示了资本以自身为目的的原罪：

第一次工业革命用先进的机械替代了手工艺工具，这些成套设备迫使生产者放弃自己的意愿和自主的方式，而疲于奔命于实现他人资本的投放目的。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已为手工业产品而形成的市场，这时候逐渐转化为大规模的匿名市场，在工厂这个“魔鬼的磨坊”里萌生出企业经济的“理性”，随之而来的货币独立化促使资本以自身为目的并引发了过去人所不齿的竞争。自此，囿于企业经济“理性”的狭隘视野，生产者为了形成“竞争力”，便不惜一切地“降低生产成本”，因为所有匿名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始终处于这一强制力的控制之中，生产力才能保证得到持续发展。但企业经济“理性”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性的神经错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此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逻辑性自相矛盾之中。社会各机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被匿名市场上的商品与它的价格之间自相矛盾的交流取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买主与卖主发生了分离，无声的价格机制取代了人这个行为主体有意识的自我认识。此时，资本主义这部自身即目的的机器和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抽象劳动”与货币的关系成为必然的前提条件。

在企业经济“理性”的支配之下，第一次工业革命更加恶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处于边缘位置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廉价奴隶劳动的竞争与劳动分工式的国家手工业工场的竞争由于机器的竞争而加剧了。第一次由工业技术导致的结构性大众失业也是在这个新工业时代的最初阶段问世。

充满腥风血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开创了世界的新秩序，民族国家的帝国制取代了建立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农业资本主义、手工业劳动和纺织产品中转经销业基础上的王朝官僚主义。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机器成为专制主义的畸形产物，推

毁着生产者之间的自主交往，以使他们遵从一个独立运转的抽象体系的外在法则和陌生力量。在这个时期，专制政体的统治、自由主义的崛起和纪律驯化的推行使市场经济如虎添翼。但取代了这个时期其他反叛力量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由于永远将自己禁锢于自由主义的羁绊，而走进了一条历史死胡同中。自由主义通过边沁或马尔萨斯等在“国民经济学”中塑造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这种阻止或压制社会反叛性行为和思想的学说和理论影响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整部历史。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化学工业、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增速。资本主义“美妙的”战争机器树立起人类屠宰场的雄威形象。在技术装备战的壮观景象中呈现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恐怖阶段，同时也显露出首先出现在战场上的“抽象劳动”的新形态。与之貌似格格不入的民主和平等却偏偏在巨大的人类屠宰场里通过对人力资源的集体熔化和统一重铸预示出资本主义运营方式拥有的一种新质和一种“劳动”的密集化。这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最终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而已。“鲜血磨坊”里酝酿出的自由平等一方面促进了不加节制地发展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企业经济“理性”鼓励竞争的强制下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保持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这一切在若干年后以货币危机回应了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终披着“劳动科学”的外衣，堪称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起人的泰勒和福特既革新了产品，也革新了生产过程。正是“劳动科学”和流水作业构成的泰勒-福特式生产过程才使已度过几十年生涯的汽车得以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个革新不仅使“抽象劳动”达到史无前例的密集化程度并开创出资本积累一个异乎寻常的新纪元，而且同时还破天荒地将生产和消费、生产和休闲融为一体。当汽车开始席卷整个时空领域，城市建设和自然风景也遭汽车的强暴时，汽车的普及体现出一个质的

飞越：汽车社会连同它的所有内涵把社会、经济、美学环境的每个角落都塑造成资本主义的形态。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法律却对一些肆无忌惮的汽车驾驶者草菅人命的行为熟视无睹，就像市场经济的“规律性”间接地残害了儿童被视为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技术事故一样，体现为汽车形式的资本夺走儿童的生命也不构成谋杀罪。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构变革引起了至此辐射度和穿透力最强大的社会经济转轨危机。首先是国家滥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然后是股票和不动产投机使破坏性更大的通货紧缩休克接踵而至，由此造成的企业破产和信贷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此时的真相。1929年后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可称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首要特征，奇妙的市场经济遭受现代化历史上至此最大的一次厄运。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危机像地毯式轰炸一样把全社会摧毁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水平。这次世界危机暴露出狂妄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

在此期间，苏联、美国和德国的状况却使独裁与民主在结构上表现出内在的同一性。这清楚地告知人们，今天在为西方狂热的民主思想辩护的文献中不厌其烦地罗列出的种种“共产主义的罪行”无疑是早期资本主义恐怖景况的浓缩型重复。所有政党和制度无一不以崇尚“劳动”为荣，即便共产党人也不把劳动看做资本主义的专利。无论是在民众的意识里，还是在理论的探索当中，资本主义的种种基本范畴都已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资本主义批判”只能在资本主义实际范畴的范围之内形成观点和选择表达方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反犹太主义气氛在社会意识中泛滥也绝非偶然，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暂时受挫是强化这种气氛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能听到附和声。军事化的劳动专制更是在这些国家里被宣告为具有绝对的必要性。被称为“龙形

海怪”的国家行使着资本主义人员管理的职能，甚至扮演着总企业主的角色。

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推动力使受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如同从灰烬中飞出的凤凰那样居然浴火重生。曾被 20 世纪 20 年代爆发的投机热潮一度装扮起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经济繁荣此后才名副其实。吞噬童工和茹毛饮血的资本的世界突然改邪归正，的确创造出了黄金时代，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出一个长期的乐观前景。也正是在此情此景中，整个世界的记忆都尽可能彻底地抹去延续了 200~300 年充满灾难的现代化历史及其牺牲品和受难者。

而扩大成世纪性争端的西方私有资本主义和东方国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扭曲了人的感知，给时代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然而，这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却共享着世界商品生产体系这一历史的共同资源，全体公民都在此同一基准框架中听凭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摆布。资本主义以此在所谓敌对的两个阵营中转化为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极权体系，乃至这部价值利用机器如今铁面无情地将这个星球全面市场经济化了。

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自始至终就把苛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宣布为“自然规律”，所有自由自主的目标和意愿从一开始就都遭到这种虚假的经济客观规律的否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得不听任“美妙机器”的碾磨，并在资本主义媒体潜移默化的熏染下，从自己身上培育出种种资本主义的极权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功能、情感和格式化的个性，他们也熟能生巧地在预设了若干选项的多党制民主程序中行使着自己“划记号”的选举权利。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饱尝“经济繁荣”的后果：生态的失调和环境的破坏。然而，“抽象劳动”的逻辑和企业经济“理性”向大自然和未来转嫁成本的行径却只被视为“工业社会”令人惋惜的副作用。

而在这一系列潜在的灭顶之灾面前，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思想，去对商品形式和“抽象劳动”进行彻底的批判；一些国家的1968年学生运动也因上了“民主化”圈套而没有从内部去冲击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极具破坏性的逻辑。这种生性脆弱的“民主化”后来反倒将社会民主党推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执政宝座，使其终于能够亲手去实施自己曾反对过的强制手段。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革新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破还没有起步的一个时期，因此绝不仅仅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虽然这三次工业革命是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造成传统手工业者破产的煤和蒸汽动力为特点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在内燃机、流水线和企业经济的“劳动科学”基础之上，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时代分裂成两个时期，即工业化的世界战争时期和福特主义的战后繁荣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子学和“信息科学”为原动力。换言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动力来代替人类劳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特征是把操作机器设备的劳动力“合理化”或者近于变成机器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就只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使工业生产中的人类劳力完全成为多余。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合理化潜力的剧增，裁员和就业状况已不再随着经济景气状况的周期上下波动，而是独立地变成了一种结构性失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长期危机。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企业层面上出现的情况危及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受到用微电子装备起来的竞争对手的冲击而被摧毁。在新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要求大幅度降低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而为了不危及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却相反地建议继续提高大众收入。从现在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



经济学的逻辑不可能再有吻合之处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自身矛盾对于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已经达到一种毁灭性的新质。

至今的总体情况表明，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将近 20 年里引发了自从 1929 年以来最大的世界危机。认为已被最终克服了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再次返回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货币经济已同“抽象劳动”一道在许多边缘国家崩溃瓦解，由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困化在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反正已是满目疮痍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快速蔓延。虽然资本主义的官方机构费尽心机地使“虚构资本”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规模在膨胀，为的是能够模拟持续向前发展的积累过程，但博彩资本主义同样不可能开辟一个实际资本积累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已被套上枷锁，一个新的制度危机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而使资本主义走向它的历史终极。

在我们的笔尖和键盘将罗伯特·库尔茨为市场经济奏响的终曲由德语符号转换成汉语符号的过程中，我们惊愕和困惑过，然而再凝神和再思索，却不得不感叹罗伯特·库尔茨在抨击了资本主义产生出的无数似是而非的具体现象、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的同时提出了诸多似非而是的见解和惊世震俗的观点：

※已经演变为一种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资本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但它现在也只能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而同时也几乎可以断定，在它的逻辑原理中潜伏着的崩溃危险无法消除。任何一种滚雪球式体系最终都注定崩溃。因此，所谓永恒的资本主义及其不可替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的盲目飞行的终点，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崩离析。

※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当然这就非得要逆着后人构建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纹理对它进行梳理，并最终把它作为对各种商品生产体系的现代拜物教的彻底批判来领会。马克思不仅以

一种迄今为止无人能超越的方式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这部“美妙机器”的运行机制，而且还与反叛的、具有解放意识的反现代派的动机之间建立了一种神奇的联系。由此，马克思开创了一个理论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谋求解放的社会反叛所具有的反现代思想动机提供前瞻性的概念并克服其狭隘和倒退的因素。但马克思理论中含有的自由主义因素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障碍。马克思的理论诚然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形态中被僵化成教条，但“另一个”马克思，那位对“抽象劳动”和自身即目的的“价值利用”的现代拜物教进行抨击的批判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不能完全被压制下去。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工人运动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资本主义荒谬的自相矛盾和甚至构成其不可避免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都被马克思言中。

※工人阶级是资本的附庸，已成为“家养宠物”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方式已经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赢利范畴。一方面，他们的生存建立在雇佣劳动上，并同时也就是以基本接受市场规律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部分地消除了劳动力商品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他们又以自己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市场规律。由此出现了工人运动和工会一种结构上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只能固守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民主的定式。

※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

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提出责任自负和所谓自主的主体之间缔结条约（劳动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无主体地自动运行和装配了能自行调节的价格机制的社会资本机器确定为前提条件；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

※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私有资本主义与国有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关系。市场机器和国家机器相辅相成，只可能是同一部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美妙机器”上两个或多或少相互有摩擦损耗而又啮合在一起的机件，是资本主义这个同一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极的兴衰都会影响到另一极的地位和力量，因此，如果国家退位，那么市场也不会气数太长。

※资本主义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反而通过把女性抛入家务劳动之外与男性一样的“抽象劳动”体系中，造成了妇女的双重负担。异化了两性关系不仅体现出所有现代施暴者的原始想像力，而且也根本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阴险的辩证法。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剥夺了妇女在“官方”社会中的独立位置，目的是让她们承担家庭妇女的义务，从而使她们一方面降格为母亲，而另一方面降格为男性私有的家宠。即使在此之外女人还有一份挣工资的工作，她们仍然固定在这两个角色上，因此将市场经济的飞黄腾达形容为女性解放的条件是一种恶劣的误导。

※货币也即将“失业”并因此而已经“非实质化”，因为 20 世纪的战争经济和战后“经济奇迹”是通过一个不断向前推移地“提前进入未来”的资金融通方式提前使用了未来“价值创造”的产出和未来的收入。即首先是必须自身即目的地以货币形式不断积累抽象的“劳动数额”，而同时

使“劳动”逐步变为过剩；其次是随着不断增强的社会化程度，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出越来越高的非生产性的业务开支或间接费用，它们有超出剩余价值的危险而无法从日常收入中得到补充。那个摆脱了一切躯壳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灵魂把它幽灵般的、超凡脱俗的躯体扩展到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地步。这样吹起的泡沫可以膨胀到大得无法想象的地步，并且被寄希望于能永无休止地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泡沫一旦破灭的话，发出的爆裂声将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而它总有一天会破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基本范畴的民族（国家）已摇摇欲坠。如果民族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被发明的话，那么在这段历史结束时，它将从内部爆炸开裂。当代资本主义已失控的经济这部高速运转得发烫的和即将面临崩溃的“美妙机器”也就此而言破坏了自己的基准体系。不过，人们却不必为缅怀这样的民族而哭泣，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和社会性压制、打击排挤的血腥结构体。但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就这么平平静静地瓦解，因为它绝不是被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保持社会形态的世界大社会以积极的方式方法来超越，而几乎可以断定它会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出现的大动荡中崩裂。所以九十年代的关键术语，即所谓的“全球化”，虽然描写了现象层面上的一个实际过程，却是一个错误概念，因为它在一般情况下指的单单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实际上民族面临的根本危机毁坏了现代化的框架。市场经济不甘心自己禁锢于民族的范围，它像水上的油污一样迅速蔓延。它使民族工业和货币失去根基，并且不断通过新的经济表现形式来排挤它们。

※历史上“追补现代化”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国家的当局只是

披着另一套意识形态外衣，重蹈了西方资本主义早已被遗忘与摈弃的早期模式的覆辙，为的是凭空变出一个快速运行的现代化工业商品经济。由此看来，“东方”当初就不是另一种历史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废的低劣版本而已。东欧的市场开放并没有回赠西方社会一个新的经济奇迹，而只成为一个前景暗淡、毫无希望的低工资的竞争对手。历史上的迟到者用一切办法，哪怕是最差的办法，来防止自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后院和垃圾桶，却始终不得处于边缘的地位；在这些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理论已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

※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五权分立”。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分立的“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背后，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无声无息的“第四权力”：极权市场体系的结构权，亦称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机器的“第四权力”曾一直位于民主之前，由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这部机器出现了不能修复的故障，它被置于黑社会等帮派团伙的“第五权力”之后。

※资本主义是整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邪教。在宗教和神话对世界崩溃的想象中总是包含着对一个新世界出现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经济暴政制度的传道士们尽管面对着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引起的无法克服的世界危机一筹莫展，却也还没有预见到世界的末日。资本主义这个被客观化为整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没落邪教所奉行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之后不应该再有另外一个世界来临。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料到市场经济会像一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飞出的凤凰在整个地球上盘

旋，但具体代表人们需求的市场在二战战败国展示出的经济奇迹，和此后西方国家克服种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调控作用，使它被普遍公认为资本周转和商品生产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在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由于在创造物质文明方面的失利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历史文物之后，市场经济似乎成为人类社会最成功和最有效的生产和生活形式。在此市场经济节节胜利的好景中，罗伯特·库尔茨却警示资本主义不会因此而达到永恒。他在《资本主义黑皮书》中根据意识形态始终遵循的一个与大自然相仿的规律——新陈代谢，揭示出国家机器、法律和政治在西方民主的轮廓中只是商品社会的功能机制，继而从历史哲学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像以往任何社会形式一样绝对不是永久性的人类社会形式。在罗伯特·库尔茨看来，资本主义甚至是一种十分丑陋和令人憎恶的社会形态，本为手段的货币却被错置为目的，致使金钱成为当代图腾。在货币流通极为盛行的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却在衰退，同住一个楼房之内的邻里通过空中通讯卫星进行近距离远程联络倒也不足为怪。

由于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获胜，资本主义的反对派几乎在理论上陷于瘫痪。而罗伯特·库尔茨则突破这种瘫痪状态，重新挖掘马克思学说中充满挑战性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根据资本主义隐患的种种征兆，至今所有的左派言论都不是过于偏激，而是火候始终未到。对资本主义持最激烈批评态度的马克思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才真正看得出它的意义所在，也才具有重要性。而经营不善导致破产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在罗伯特·库尔茨的眼中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低劣版本，历史业已证明以往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之乡，体现马克思主义意义和重要性的地方恰恰是在这种低工资、低物价、低发展水平的“国有资本主义”的对岸——发达和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朝一日家庭会解体，工资制度将不复存在，

市场和国家可能成为多余。罗伯特·库尔茨似乎在暗示一种乌托邦的真实到来。

罗伯特·库尔茨博览群书，引述了康德、歌德、斯密、韦伯、李斯特、霍布斯、曼德维尔、萨德等甚至希特勒的原著，并指出了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所有近现代历史上的巨匠、泰斗、大师们的局限性；他同时做了大量令人瞠目而又不得不令人深思的历史考证。他的结论是，虽然发达国家和很多其他地区日趋富裕，但从全人类的状况来看，资本主义仍使少数人富裕，让绝大多数人受贫。广受赞誉的科技进步越来越成为人类的负担也并不只是过渡性的偶然现象，而是由现代制度引起的必然结果。罗伯特·库尔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列举的古今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他以此指出一种基本悖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不是为人服务，而是人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商品生产活动这种颠倒的目的性质以前从未像在这本书中那样得到如此深刻的剖析，此书对异化的根源刨得也比以往的探讨更深。罗伯特·库尔茨出色地把理论分析与辛辣的评论和幽默的描写穿插在一起，阐明了为何使用了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人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着前所未有的繁重劳动之原因所在。他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第三条道路”虽然令人感到宽慰，但也只是往被资本主义撕裂开的伤口上涂上一层“社会福利”的药膏，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治愈力。

该书对资本主义提出的批评从总体看来是得当的，但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尚欠透彻，而且没有指明什么能够代替市场。市场经济的终曲之后将会起奏何乐，罗伯特·库尔茨也未作明确交代。原因显然在于，罗伯特·库尔茨指出的悖论对他本人也有效：他的认识和感知何以见得就能够超越供他积累经验和形成思想的资本主义基准体系？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罗伯特·库尔茨也不知道什么道路能够将人类引出资本主义的恶性

循环，只是提示了一种类似历史上曾昙花一现的“委员会”这一“水平形式”，希望它在货币和市场消亡后能取代资本主义管理的“垂直形式”，以回归前资本主义充分交流和自主抉择的理想状态。

这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固有矛盾和内在逻辑的重新思考，也有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发展。关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今后发展和全球人类社会走向的人，将得益于通读此书。

当然，我们在此搁笔停键结束翻译之时也不禁发问：“中国是否也要从头到尾蹈此覆辙？”对这一问题我们粗浅地认识到，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历史局限性，但绝对应该避免再次踏进历史上明显可见的沼泽和泥潭。当务之急是应该在更深层次上实事求是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体系中种种要素和关系的历史沿革和今后走势，企盼能最终有所突破而为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做出当代中国人的贡献；而不应一面言辞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实则拘泥其框架之内无甚建树。今日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尤其应该意识到，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属于一种跨文化的移植，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和成败同在其他国家一样都带有本土色彩和原因，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息息相关，亦必然同曾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五千年华夏文化共振互动。

我们将此拙见与译著一并敬呈读者，并恳请赐教。

最后，我代表全体译者为两年来的真诚合作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尤其是薛晓源先生深表谢忱。

钱敏汝

2002年4月于北京



## 原书序言

---

人对历史的记忆是短暂的，甚至自己的生平也会在记忆中淡忘。我们对20年、30年或40年前自身的生活、思想、情感和境况究竟还记得多少呢？大多数人，当他们偶然看到有关他们过去的某个客观的文献记载时并随后不得不断定，以往的现实常常与他们存储在大脑中的景象是如何地大相径庭时，都会感到无比诧异。我们常常会成为另外一些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但这似乎与人的大脑有限的容量导致了记忆的失误关系不太大。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一般都极力美化自己的历史并且每个人都是为自我价值观念穿上恰当合法外衣的“排斥艺术大师”。每个人都试图肯定自己如此易露破绽的自我，为的是尽可能惬意而又不招致非议地生活在自己的躯壳之中，无需对自己质疑问难。

以上类似情况更加适用于人类的集体性记忆。所有追溯到自身有生历史之初视野以外的一切，都存在于一片比个人的过去更加令我们难以认清的昏暗模糊之中。倘若我们想到，看上去与我们如此熟悉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我们诞生之前就曾有过我们直至今日仍然感到无比陌生的生活经历时，我们会觉得奇怪。于是乎社会的历史便由此起源，因为在经过以纯血缘关系结成的部落时期之后，文化、政治与社会经济方面的历程便已融入一代又一代人

## 2 资本主义黑皮书

---

的个人史中；而当年那些部落在当今世界中已完完全全缩小为外加一条短腿小猎狗的小家庭，并且在后现代模式中进而浓缩成为社会最小分子的单身贵族。除了昔日古代人类的外观举止、交际方式和服装饰物让当代人觉得极为滑稽可笑以外，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有关这方面的记叙是残缺不全的，而且本身还带有排斥的色彩，以至于有选择地把某一段历史称之为“鼎盛的旧时期”，或者反之称为“衰败的时期”，或把两者合二为一。因为平庸的判断力是从不会被未得到解决的矛盾难倒的。“我曾经历”的历史因此往往是最不可靠的历史。

如同个人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一样，社会的统治结构更是如此。意识形态的自我辩白与在学生教科书中兜售的现有权力架构的正史像腐蚀剂一样侵入到每个人的记忆中，并将思想置于高压之下，使之面临解体的威胁。除了个人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审查以外还要外加社会的再度审查，这方面的世界之最便是当代的资本主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会是以如此粗暴的方式沉积为一种专制体系的。彻头彻尾的市场体系不仅美化了它自己的历史，甚至删除抹去了其中的多半部分。“广义经济学”似乎仅仅存活在于一个小孩子的时间视野之中，也就是存活在由各种市场行为构成的永恒的当代之中，所有这些市场行为看起来就像发生在没有时间概念的层面上一样。假如说保守派思想呼唤历史是为了以权威的名义篡改历史，那么经济自由主义派思想廉价兜售历史就像甩卖内裤、轰炸机、方便汤料和其他由可被感知的世界毫无区别地转化而成的市场商品一样。如果说各种口头的传说已以神话的方式被统一标准化，那么资本主义的媒体则使历史自身失去了历史的本义并令其转化为市场的经济学。

从意识形态上来讲，这种方法比所有那些纯粹东拼西凑的历史有益得多，因为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的任意性吞噬了任何一个

客观真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于是便顺理成章地不仅在整个市场，同时也在全面的相对主义中登陆，也就是处在一个自相矛盾之中。“一切都不过是一场电影。”这就使每个对“实事求是”编写成的历史从批评角度做出的反思烟消云散了。这就“是事实”，别再另作他论。对于这种思想（尤其是对于这种毫无思想的状况）来说，媒体和意识形态制造的假象中与实际存在中的事实含量是相同的。精确地讲，“表面上看起来”现实与作戏之间已没有什么区别可言。谎言与真理同样真实，因此我们长期以来连同我们的民主自由生活在一个奥威尔（Orwell）式的世界中，他描述的《1984年》对我们来讲已经成为过去，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沉溺于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的“市场人”自以为是世界上思想最开明的生物之际，他便任凭摆布，比一个东方神秘教徒更加宿命地接受那些最不可信的猜测，比一个中世纪的农民还不如地轻信更大的谎言。就因为他失去了一切衡量事物的尺度，所以已经黑白不分；自己心灵上是否会感到些许痛苦，他只有从专家的诊断或统计数字那里方能得知。只有这个被剥夺了批判的理智和行为能力的、彻头彻尾的白痴方才具备了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他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信奉可与封建社会的佃农认为真的存在地狱与炼狱的迷信相媲美。

还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衡量尺度的最后一点可怜的残留部分似乎就是战后的历史中出现的东西方社会制度冲突这个事实，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可以用作自我衡量的一个过于低劣的尺度。因为众所周知，官僚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积重难返的危机。恰恰相反，它产生自20世纪前半叶世界市场边缘国家“不发达”的危机之中。不难看出，“追补现代化”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国家的当局不仅只是披着另一套意识形态外衣，重蹈了西方资本主义早已被遗忘与摈弃的早期

#### 4 资本主义黑皮书

---

模式的覆辙，为的是凭空变出一个快速运行的现代化工业商品经济；他们还可笑地模仿资产阶级革命的情绪与神话、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甚至连西方的设计风格都仿效。由此看来，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种历史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废的低劣版本而已。兄长在通常情况下会打败弟弟，并引以为荣，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技术优势再也不是这样一位兄长所具有的那种优势了。

只有这种完美无缺的历史盲目性才可能使早已过时的国有社会主义的结束得以被宣布为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和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今天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难以想像的是，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共同交易基础自身会成为被淘汰的模式，而历史的迟到者曾从一开始就必须用这些基础审慎地度量自己。1989年以来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都已被证明不过是泡沫而已。东欧的市场开放并没有回赠西方社会一个新的经济奇迹，而只成为一个毫无希望的低工资的竞争对手。东欧的老百姓满腹疑团地揉着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不得不断定，兵营共产主义阴险的理论家虽然对于自己统治所作的欺骗性宣传曾是那样地苍白无力和蹩脚，但他们对于西方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亏空的描述却是入木三分地切中要害。

如今已是无计可施，乌托邦式的能量看起来也已消耗殆尽。这段历史终结后遗留下的只有迷惘和内心的冷酷。希望变成困惑，因为它已别无选择，甚至温和的改良主义也已崩溃。资本主义已被套上枷锁，显露出一张许多人按以前的信任再也辨认不出的狰狞嘴脸。一个劣质的炮制方案的孵化器已开始运作，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荒谬而又低劣的建议，以在“别无选择余地的”市场经济的地面上消除几乎无法制止的社会经济危机。置身资本主义中的人对自我言行的审查比任何警察当局都更为有效，然而却导致了批判精神的终结，连亚文化也不再具有反抗性。

为了能够重新发现一种新的和别样的选择，就必须首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在已到了对看上去还没有进入历史观测范围的资本主义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的时刻了。今天这已不再是一个仅局限于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思想王国里的问题了。事实上，我们已到达了市场经济历史上的痛觉阈，它的经济极权主义开始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当最后一批冷战斗士还在不停地对“自由世界”胡言乱语时，资本主义的行星体系正在露出一个“开始向疯癫发展”的社会真面目 [奥斯卡·内格特 (Oskar Negt)]。显然，这是所有罪孽的报应。只有用自身历史作为明镜明确指出这种使孤立的个人处在绝对竞争之中的荒谬以及形成公害的制度所犯的错误，以使身处资本主义之中的人的自我认识能够有助于资本主义在毫不引起惊恐的情况下寿终正寝。这样，社会的自我治愈，向社会和生态的真正基础的回归，已失去控制与限制的社会进步的平稳发展，一种可以承受的社会生活以及一个作为同情心、生育后代的责任感和思想上的反思的前提条件的基本安全感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这段历史不仅仅在表面上首先是一部经济史和一部社会史。如果说“媒体即信息”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的话，那么现代的“广义经济学”的历史事实上就只能是它的经济史，是“生产力发展”史，是经济发展景况、危机与抽象的货币财富的历史。这部历史蕴涵的暴力和巨大的潜能同它在程度上毫不逊色的平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人类的存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问题被所谓的市场规律扼杀以后，残留下的就只有陈腐的金钱形而上学了。冒险已宣告结束，因为在绝顶乏味的市场中已经不会再有新的发现，也不会再有任何新的经历。对此，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冒险体育运动以及探险旅游也都无济于事。比如本周的焦点人物叫做哈特维希·皮彭布罗克 (Hartwig Piepenbrock)，他是由 30000 名低工资的清洁工组成的“一支巨

大的清洁队伍中的主人” [Wirtschaftswoche (经济周刊), 1996年第37期], 他的生活目标就是在低工资的清洁工行业中成为巨无霸。市场经济历史上的痛觉阈也就是他们世界观的、他们“商品美学” [W. F. 豪格 (W. F. Haug)] 的和人类在追求进取中显示出的那种令人难堪并且目光短浅的痛觉阈。

一种痛觉阈是不会毫无结果地被超越的。在这个临界点的另一侧, 病人要么是死亡, 要么是成为另一个人。对资本主义进行逾时的历史考察, 当然不能再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历史中的内部冲突为出发点。它必须着眼于整体, 也就是说, 从对分析已经形成的史实入手推演出结局。历史的讽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胜利与终结危机将历史性地同时发生。这个始料未及的危机现在的局面当然与以前想像的完全不同, 它产生于迄今有效的基准体系本身的崩溃。当今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所在地”大辩论之所以显得如此滑稽可笑, 就是因为它不愿看到市场经济提供“工作岗位”的无所不在的体系目前正自行毁灭, 而且已无法挽救。工作岗位问题当然也属于历史见证。18世纪晚期启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正在步入无望的绝境之中。能够进行的仅是这样一种冒险: 用超越陈旧的国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战胜市场经济, 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另一种历史。

# 目 录

---

译者序言 .....	1
原书序言 .....	1
现代化与大众贫困 .....	1
市场经济造成贫困 .....	3
纺织工人的贫困和起义 .....	10
专制主义孕育出世界市场 .....	15
全面竞争的黑色乌托邦 .....	22
魔鬼的社会 .....	24
私人恶习成为公众优势 .....	36
女人是男人的狗 .....	45
看不见的手 .....	59
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 .....	70

## 2 资本主义黑皮书

---

恩惠号上的哗变 .....	87
<b>第一次工业革命史 .....</b>	<b>99</b>
企业经济理性 .....	105
魔鬼磨坊 .....	110
捣毁机器者 .....	124
人口法则：从地球上消失！ .....	139
社会解放运动或国民的民族革命？ .....	156
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星期日学校 .....	171
自由贸易和后起的民族主义 .....	183
平衡法则与工业的滚雪球式体系 .....	193
<b>民族帝国制 .....</b>	<b>205</b>
祖 国 .....	210
1871~1873 年经济繁荣骗局与大萧条 .....	228
日益加强的国家行动法则 .....	237
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 .....	247
装甲巡洋舰和掠夺性民族主义 .....	262
恰恰是香蕉 .....	278
<b>世界社会的生物化 .....</b>	<b>287</b>
为生存而奋斗 .....	289
人的培育和生殖卫生学 .....	296
种族斗争和世界阴谋 .....	305
德意志种源共同体 .....	316



---

较高级脊椎动物的社会主义·····	333
<b>第二次工业革命史</b> ·····	353
20 世纪的空前浩劫·····	360
亨利·福特和汽车社会的诞生·····	393
人的合理化·····	417
世界经济危机·····	450
独裁政权与《星球大战》·····	479
劳动者国家和领导者社会主义·····	490
失去的梦想和资本主义的暴戾·····	501
逆向的工厂——奥斯威辛·····	522
开洞挖穴和建造金字塔：凯恩斯主义革命·····	542
<b>极权的世界市场民主政权体系</b> ·····	562
簇新的废墟·····	563
极权的市场·····	574
全面动员·····	591
极权的业余时间资本主义·····	620
极权的民主·····	632
短暂的经济奇迹鼎盛时期·····	640
世界毁灭和意识危机·····	649
<b>第三次工业革命史</b> ·····	661
自动化的幻想·····	665
通过合理化裁员·····	677

#### 4 资本主义黑皮书

---

国家的退位·····	706
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次征伐·····	733
新的大众贫困·····	767
服务业社会的海市蜃楼·····	790
博彩资本主义：货币即将失业·····	803
民族经济的终结·····	825
众魔苏醒了·····	840
跋·····	862
参考文献·····	874

## 现代化与大众贫困

---

谈到市场经济，惟一还能触发人类对历史做出可怜的一丁点儿思考的是它自身的传奇故事：即它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依照这种说法，人类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之前似乎肯定是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但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恰恰截然相反。尽管资本主义无疑增添了各种生产力的科学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发展，但奇怪的是，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始终是间歇式的，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以及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的游戏。其残酷性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意义上乃至生理意义上的人都无法逃避这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输家多于赢家的这个结局。

对市场经济做的这一总结性论断不仅是否定性的，而且是可怕的。经济历史学家伊马努埃尔·瓦勒施泰因（Immanuel Wallerstein）与他纽约州立大学费尔南德·布罗德德尔（Fernand Braudel）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们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末得出如下结论：“从长远来看，整个世界体系以及世界上所有劳动力的富裕程度呈下降趋势——与普遍存在的猜测相反，它不会提高。”（Hopprins/Wallerstein, 1979, 第184~185

页) 尽管中西欧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早已再次滑坡, 但是在那些消费实力雄厚的“步行区逛街族”[迪德里希·迪德里克森 (Diedrich Diederichsen)] 眼中, 这一结论也许仍是令人惊讶和难以置信的。可是“总结”的含义正在于, 首先它考察的对象不能仅是最近这段历史, 即二战结束以来暂时的高消费繁荣时期, 而必须是包括每一代人生活的整个现代化发展史; 其次这种总结当然不能只考虑北半球高度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国家的居民, 而应当衡量当今全世界将近 60 亿人的真正的生活状况。

第三, 把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作为指数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各国及国际组织机构在以往及现在的调查中通常采取这种做法是心怀叵测的, 因为这一抽象的平均值完全忽视了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这一趋势。这个趋势只是在少数从中得利的国家中暂时得到了缓解。而如今, 即使是这些国家中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也无法阻挡了。一方面, 少数人不知廉耻地聚敛财富; 另一方面, 广大民众日渐贫困。在这种情况下, 以统计学中的平均值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 无异于给社会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假设贫困线为月收入 100 美元, 当 100 人中有 99 人因月收入仅达 90 美元, 年收入总共 1080 美元而艰难度日, 而只有那第 100 个人每年收入 500 万美元的时候, 全年“平均人均收入”也的确确实超过了 51000 美元。因此我们必须似乎把那 100 个人根据“平均收入”全部归入世界上幸福者的行列中。即使在各个国家以及不同的时期, 社会的总体分配情况, 特别是在统计中“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各不相同, 但是美妙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目前的现实都与这个虚构的事例相差无几。

第四点是如今众所周知的, 全球市场体系造成的生态破坏不仅没有被列在需要支出的费用中, 甚至被作为正值列入国民生产总值中, 例如交通事故及其后果造成的费用, 土地、水以及空气

污染造成的开销（此外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资助）被看成“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少人是以市场体系造成的恶果营生的。市场经济的占有欲促使它随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剥夺了人自由并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并通过“世界的私有化”将整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买卖关系的强制之下，这一点更是不言而喻的。

### 市场经济造成贫困

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使少数人致富而大部分人却一贫如洗。无论是从16世纪起始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还是自1750年以来1/4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从各种角度上看都比十四和十五世纪时下降了。今天，所有在谈论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的人（在国有社会主义衰落之后，大部分“左”倾人士也持此意见），都是那些从这个经济体制中（相对）获利的极少数并数量正在日益萎缩的人和厚颜无耻地捍卫着这个荒谬并违背人性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家。

如今，这种厚颜无耻不再被掩饰了。现实主义的女士们先生们是“认同者”。他们在过去和现实社会中成为了一类自我封闭族，除了自己认定的现实之外不接受任何其他现实。他们只是援引市场经济的公理条件来谈论贫穷问题，或者顶多从技术决定一切的意义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历史在轮回。因此我们列举这样一个仍须由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卫道士们支付的账单不是没有意义的。

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一开始就已经产生了大众贫困。在工业化之前的现代化早期阶段，整个欧洲陷入了但丁（Dante）笔下的地狱一般的贫困境地，其深度和广度均史无前例，情况类似于今天的非洲（非洲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惊世骇俗的产物）。即使

当时的统计数据不够可靠和完整，但是社会历史学今日仍能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来证明，在16、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社会结构已经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16世纪在西班牙，高收入阶层（其中包括占总人口5%~7%的贵族、主教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占总人口其余10%~20%的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约占总人口的1/5，而其余80%是穷人。17世纪末，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英国的财产分配状况。……在这儿，富人也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穷人约占50%，而这贫穷者中一半的人长期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同时期的法国……穷人占总人口的5/9。18世纪早期，在德国教会的领地里，据估计每1000居民中有50个神职人员和260个乞丐，而当时科隆5万人中据说有2万个乞丐。”（Minchinton, 1983, 第60页）

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致了物质生活水平绝对以及相对的倒退，非物质生活水平因独立自主的社会关系解体而降低就更不用提了。这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地成为社会史学以及经济史学研究的课题，但很少得到系统和深入的诠释。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这段现代化历史中，大众们无法自定的工作时间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相比都有了急剧的增长。伊玛努埃尔·瓦勒施泰因谈到，不同的社会史学家根据中世纪时遗留下来的文献得出结论：在当时的英国，一个工作日是“从日出至午时”，而且在“农业劳动时间逐渐延长”的情况中已可初步看到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Wallerstein, 1986/1974, 第75~76页）。从国王文策尔二世（Wenzel II）于1300年颁布的一项公告中可以得知，波西

米亚的矿工每天轮班工作 6 小时。在一本关于工作时间的文献集里也是这样记载的 (Otto, 1989, 第 33 页)。社会历史学家威廉·阿贝尔 (Wilhelm Abel) 对此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 在对建筑手工艺人的生活水平加以比较时可以推断出, 中世纪后期……工人一周有两天休息日, 而到 1800 年, 同样行业的工人每周不仅要多工作一天, 而且由于工资微薄, 他们甚至通常不得不通过在节假日打零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Abel, 1983, 第 63 页)。尽管工薪阶层通过竭力争取缩短了工作时间 (如今工作时间又延长了), 但时至今日, 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里, 工人的工作都要比中世纪的大多数农奴时间长且强度大。

这种倒退的趋势也同样出现在物质再生产领域中, 当今资本主义的专用术语之一“实际工资”便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为了保持标准的前后一致性, 在社会历史的撰述中, 通常以粮食作为衡量的尺度。威廉·阿贝尔在比较 14 与 19 世纪初期的情况时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以中世纪末维尔茨堡的木匠和 1800 年左右柏林的泥瓦匠为例。在多数情况下, 木匠和泥瓦匠的工资大抵相等……根据 1387 年的警署规定, 维尔茨堡的木匠的日收入约相当于 26 公斤黑麦。这个数字与警署规定相比只会偏低, 不会偏高。这意味着, 在每周休息两天的情况下, 木匠的日平均收入约为 18.6 公斤黑麦。而柏林的泥瓦匠在没有休息日的情况下, 日收入相当于 6.7 公斤黑麦。” (Abel, 出处同上, 第 63 页)

持续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真的是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如果不珍视这个将实际工资缩减到过去将近 1/3 的“进步”, 那真的是相当忘恩负义了。经济历史学家

## 6 资本主义黑皮书

和社会历史学家在考察其他国家情况的时候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根据农业历史学家斯利赫·范·巴思 (Slicher van Bath) 提供的数据, 瓦勒施泰因将 13~19 世纪英国木匠的实际日工资列成了一张能够揭露真实情况的表格:

时间	实际工资 (公斤小麦)
1301~1350	94.6
1401~1450	155.1
1601~1650	48.3
1701~1750	94.6
1751~1800	79.6
1801~1850	94.6

资料来源: Wallerstein, 1986/1974。

这是极具嘲讽意味的: 在 19 世纪光辉灿烂的工业化时代, 人们的生活水准刚刚再次达到了中世纪的鼎盛水平, 但还是远远落在了 15 世纪, 即中世纪晚期的水平之后。整部早期资本主义史是以人们生活水平的直线下降为标志的。我们分析的是一个刚刚上升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和一种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行当。而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使得按日计酬的普通工人以及落后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深远得多。时至今日,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远不能达到他们在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之前的水平。

当然贫困总是相对的。但生活水平结构的差异也不能成为为市场经济开脱责任的理由。我亲眼目睹了巴西贫民窟的情况。人们蜗居在比狗窝稍强一点的风子里, 孩子们患有慢性营养不良, 而林立的天线却显示了无数电视机的存在。工业化社会之前的那些可以满足自己所有最基本需求而又拥有比较稳定社会关系



的自耕农是否会因为他们没有被闪烁着肥皂刷的荧光屏弄得晕头转向“更加贫困”呢？下面这个例子虽然与前者处在不同层次上，但仍具有可比性：一个生活在同时代的中欧，被国家、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弃置不顾的单身母亲，她虽然拥有电话、手表和立体声音响设备，但必须节衣缩食地供孩子读书，还得忍受社会救济管理局暴躁的官员们的恶劣态度。他们对她如同对待牲畜，其恶劣程度以及侮辱性成分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对待贫苦求助者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要避免一个误会：我绝无意否认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人类的潜能比之前所有历史时期都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其中不仅包括技术能力，而且在其他很多方面增强了抽象能力以及思考能力。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其他一些问题，即生活水准、闲暇时间和大多数人的健康幸福。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将被它释放出来的人的潜能用于改善被迫遵循资本主义法则而生存的人的生活。直至今日，这一弊端也没有得到丝毫消弭。与此相反，相对全世界人民而言，它蔓延得越来越广了。由此可见，这不是由偶然的外在因素造成的，而必然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即市场经济不懂得如何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潜能。

这里的旨意绝不是要让时间倒退到任何一个无法重现的历史阶段，也无意反动地美化历史上的种种缺陷。在前现代社会里当然也存在如封建的以及家长制的压迫、瘟疫、战争、无知和近亲繁殖造成的智力低下等问题。但这恰恰是症结所在：即使与当时物质生活极不丰富、社会条件不令人满意的情况相比，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仍造成了社会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任何对历史基本属实的总结分析都会断然否认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作用。西方世界经历的少数几个相对繁荣期只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的贫穷和灾难在当时得到了缓解和些许改善。

但是在已经孕育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原理的前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仁慈或者暂时的缓和的，只有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在三个多世纪时间里。当我们听到，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普通手工业者已经属于“富人”行列时，也许我们就可以大致想象得出“贫穷”一词在当时的含义了。而这恰恰是针对人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饮食水平而言。为了对急剧的贫困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必须将饮食习惯以及饮食份额作一比较。费尔南德·布罗德尔在他的关于现代化社会史的巨著中将必要的材料来源作了一个汇编。这一比较足以让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思想家们大失颜面：

“1482年德国萨克森的公爵们颁布的一条法令中这样规定：‘劳动者的午饭和晚饭只能包括4种食物：在食肉日为一份汤、两份肉和一份蔬菜；在星期五以及其他的日子里，因为不吃肉，所以吃一种菜，一些生的或干的鱼并配有两份蔬菜；在斋戒期只允许吃5种食物，为一份汤、两份肉配两份蔬菜。另外早晚还有面包’，饭前还提供淡啤酒。手工业者这样的一顿饭几乎能与资产阶级相媲美了。1429年，在阿尔萨斯的上赫克海姆地区，假如被强制劳动的农民不愿和其他农民一起在管家的庭院里吃饭，管家就必须给他送去‘两块牛肉、两块烤肉、一升葡萄酒和面包，只收两芬尼’……我们离中世纪的‘秋天’越远，情况就越发明显地恶化——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东欧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上，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欧洲，这一日渐窘迫的趋势早在16世纪中叶就显现出来。据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 1550）所说，施瓦本地区农民的饮食急剧恶化。以前每顿饭都有肉，碰上如教堂落成典礼纪念日等节日，大家还会大吃大喝一番，而今到处在

涨价，到处物资紧缺，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该作者还说，连最富有的农民家中的饭菜也不如当年按日计酬的农民和雇农。历史学家将这些不断涌现的例证看成是人们美化过去年代的一种病态需要是没有道理的。”（Braudel, 1990/1979, 第198及以下数页）

不断膨胀的市场经济所能为人类提供的食物，其数量在不断减少，其质量也在不断下降，直至今日，这一发展趋势在世界许多地区仍没能得到扭转。我们并非主张大吃大喝，而是指出，大多数人连得到美味丰盛食物的最基本需要也没能得到充分满足。即使在欧洲的核心国家，19世纪的文学作品仍然充满了对于在贫瘠乡村以及在日益膨胀和集中的城市的边缘地带由资本主义造成的饥荒的描述。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德国工业化进程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于1844年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语言描述了当时德国许多地区的有关情况：

“我看见某些地方的家庭里，用一根从房梁上悬下的绳子将一条鲑鱼吊在饭桌的中央。一家人在吃饭时，轮流从这个公共的美味上撮取碎末给自己的土豆增加一点作料和味道。这样的情形已经被人们称为富裕了，因为在艰苦的时候人们连这样的巨大享受，甚至是对盐的享受都必须放弃。”（List, 1928/1844, 第307页）

从那以后，当人们谈及生活水平的时候常以饮食为例，这并非偶然现象，因为人的各种需求，即便是最原始的需求也并非必然能得到满足。自然灾害和粮食歉收最多是导致贫困的次要原因，因为即便在进入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之前，虽然在生产条件更为落后的情况下也存在“穷人”和因自然灾害（粮食歉

收)时而造成的危机,但是有着这等广度和深度、出现在人的基本需要层面上的“结构性”的大众贫困是史无前例的。在科学认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社会怎么会比大家众所周知的几百年的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时期出现如此明显的倒退呢?

### 纺织工人的贫困和起义

17、18世纪时,没人知道自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以及从属于它的“市场经济”概念在19世纪才出现。当时的人们只是发觉货币的意义在增加,而他们自身的意义却在减轻。自16世纪以来,市场及货币的各种关系在持续扩展,绝大多数人并未成为这种扩展中的主体,而是客体。但在持续增长的商品生产中,只有一部分是依照当今意义上的私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一部分主要存在于纺织行业之中,因为与其他手工业行会的地方市场不同,纺织品及其半成品是首先进入大宗的非农业贸易流通之中的,属于早期现代商品经济中少数的批量手工业商品之一。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842年所做的分析中所述,即便在纺织业领域,由手工劳作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任何时候,纺纱厂和纺织厂都为文明国家的对内对外贸易提供了最主要的交换商品。从繁盛时期的佛罗伦萨,到后来的弗兰登和布拉班特(均为比利时的省份),直至最后在英国,手工制作毛巾为批量贸易奠定了基础。在意大利的其余地区和法国,贸易的核心是丝绸。当时德国主要的贸易商品是亚麻布。因此,在大型机器发明出来之前,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在不脱离对纺织工业其他分支行业控制的同时,维护其在某一主要分支中的绝对统治权。因为在当时,国际

竞争触及的仅是富人的需求；而几乎世界各国的下等阶层的衣料都是在地区性手工业工场或家庭作坊中生产出来的，……因为在手工劳动占据各国生产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及其省份生产同种商品的成本几乎是相同的。”（List, 1928/1842, 第 227 页）

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直到竞争和大规模市场开始不仅满足富人需求，而且也在满足大众需求以后才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纺织业以其相对成熟的贸易结构为此提供了最佳的前提条件。贸易资本也引发了将纺织品生产资本化的积极性。首先是所谓的出版业（出版和中转经销在德语里是同一个词——译者注）开始取代了衣料与服装旧有的手工生产方式。如今看到“出版商”一词，我们首先会联想到图书出版社。而在 18 世纪及 19 世纪早期，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为了以后能依照资本主义原则在跨地区的市场上销售产品而让手工业者在自己的工场里为他们制作的商人。虽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按传统方式进行，并且由家庭成员在家中完成，但是手工业者不再是自负盈亏，而是为收购商进行生产。这种私有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出发点不是生产，而是贸易，然而贸易也开始让生产隶属于它。手工业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力量均势逐渐向有利于后者的方向倾斜。这种发展趋势使得经销商的“企业家”们只差一步就将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企业化私营资本主义在纺织行业中的萌芽迅速地发展壮大。1800 年左右，德国将近一半的手工业生产都采用了这种中转经销的生产经营方式。中转经销商越来越充分地利用雇工的依赖性以降低商品的收购价，因此雇工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其工作速度并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劳动。除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描述的贫穷状态之外，特别是西里西亚和波西米

亚地区的纺织工人遭受着一场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真正的饥荒，当时的状况让人联想起现在非洲部分贫困地区的饥荒。从一份历史分析材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情况：“他们常常感到快要饿死过去，就去病畜屠宰场的埋尸坑拖回动物的尸体来吃。没有面包，他们就吃用苔藓烘制的糕饼”（转引自：Engelmann, 1980, 第12页）。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全职工作”的情况下，而且其工作时间之长即使是在食品供应比此时丰富得多的中世纪早期都会引发起义！饥荒迫使他们抵押甚至出售自己的房屋和茅舍，而当时的人“均”收入却表明，整个社会的情况是在不断好转的。织工的贫困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的歌曲和方言歌中我们可以听出那些因自己生活经历了伟大的市场经济变革而走向毁灭的无名之辈的短促叹息：

如今时代已改变  
即使任他这样汗流浹背地工作  
竭尽全力  
一分钟都不停歇  
也没钱过上好日子  
织吧，织吧

中转经销商很快成为让人恐惧和憎恶的人。西里西亚山区村落的织工再也看不到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出路。1785~1786年、1793年及1798年，隶属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地区的人民就已因绝望而发动了起义，遭到血腥镇压：

“从主要以神秘主义和众多嫔妃著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给他年轻的大臣丹克尔曼（Danckelmann）的书面命令中我们即可看出，1793年整个西里西亚纺织行

业中爆发的革命运动遭受了何等残酷的镇压。当时国王下令无情地镇压织工的起义……藤鞭抽打遍各个村落，许多早已饥寒交迫的织工被打成重伤，成百上千的人被发往边塞做苦力。”（Engelmann，出处同上，第11页）

听起来仿佛是在叙述黑暗的远古时代里的恐怖神话故事，但这却是有案可查的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史。如果说1800年之前的血腥场面几乎已被忘却，那么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在中转经销商运营条件之下的西里西亚再次爆发的织工起义就在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痕迹。当1844年在西里西亚的莱辛巴赫县再次爆发反抗奇妙的市场经济真正的老祖宗及替罪羊——中转经销商兼商人茨万其格（Zwanziger）家族和迪里希（Dierig）家族的织工起义时，人们在已经迅速增多的报纸上不再只是听到窃窃议论的声音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次以成形的新闻媒体业形式来反对资本主义自身，因为新闻审查再也无法阻止报界登载西里西亚起义的报道了。虽然起义被普鲁士步兵的霰弹镇压了下去，但是纺织工的困苦以及起义却在工业化浪潮到来之际引起了公众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的思考，甚至引发了席卷整个德国的一场思想上的震荡。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著名的诗歌中激愤地写道：

沈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译文摘自：《海涅抒情诗选》第291页，《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844》，冯至译。译林出版社出版，1991年3月第2版。——译者注)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手工业生产者怎么会陷入了这样的一种从属地位？因为，即使手工业者可能由于对其从属地位及相应的社会后果产生绝望而爆发的起义遭到军事镇压，但是在此之前经济关系本身发生的变化却不可能单纯是别人用武力逼迫的结果。其中必定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新的社会框架条件已经形成，这种框架条件并非是由私有资本主义的行为直接建立起来的。



## 专制主义孕育出世界市场

16~18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环境大部分在专制型国家产生形成。因为现代的领土国家中正在形成的国家机器之主要作用在于加速推进货币经济的扩张，以满足急剧增长的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财政需要。在欧洲刚刚迈入现代社会时，这个万神殿里许多著名的当权者诸如几乎目不识丁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和普鲁士君主弗里德里希“大帝”实际上是蔑视人类的强盗。这是挥动着大棒推行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人们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如一的形象。

就这点而言，资本主义环境又是在现代军国主义的帮助下创建起来的，而且采取的方式不仅包括直接的强制手段，更主要的是通过盲目地推行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货币经济学的逻辑。专制主义对于获取金钱的方式不太挑剔，但与此同时，两种根本的经济机制已逐步形成并在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多次重现。首先，在正形成中的现代“国家”里建立大规模市场的一切障碍被扫除了，因此各种形式的税收和费用都可畅通无阻地流入国家腰包之中。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所有的地方特权，尤其是手工业行会及其施加限制的特许权。法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居领先地位。早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在巴黎郊区名为圣·安东尼的地方就已经有3万以上的手工业者不受行会的限制而为自由市场生产。1760~1840年，英国在农业以外的不归行会管理的手工业中从业的人数几乎由24%增至47%。与英、法不同的是，且不论普鲁士的情况如何，德国分裂为许多专制主义小国，但至少这里的行会法也日渐名存实亡了。

然而，这种新的“不受行会限制的自由”绝非意味着国家为“提高手工业生产者的富裕程度”而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空间。手工业者是出了狼窝又进虎穴，因为他们如今脱离了行会的监管

(其中总还包含一些自我管理的成分)，却陷入了专制国家官僚机构的剥削和压榨之中，同时他们必须为那些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市场而生产。

其次，与建立国内大型市场结伴而行的是国际市场的形成。瓦勒施泰因甚至认为，直至国际市场自16世纪形成起来以后，才为国内市场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原因在于，除了进行早期殖民主义的扩张之外，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金钱而推动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确切地说，每一个专制国家都试图尽可能地扩大出口而限制进口，通过“贸易顺差”（在当时是刚刚开始形成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全新概念）为本国获取尽可能多的货币财富并将它挥霍在国家的种种用途上。这是“重商主义”的信条，重商主义既是一种重视对外贸易以及“出口主义”的思想，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满足早期现代军事国家的需要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方案。

由此导致了一场出口竞赛。各国专制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其中也包括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试图一方面通过建立关税壁垒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拼命加速向国外出口。但是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如果没有各个国家的相互让步，而大家想在进口为零的条件下达到出口的最大值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的权力机构都必须根据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进口上做出让步。尽管片面的重商主义信条早已不再被视为有效，但是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为抢夺贸易顺差地位的纷争却贯穿了整部现代化发展史，并仍然存在於当今社会之中。可是无论如何，这一最早的经济政策促生了国际市场的诞生。市场和货币关系主要是通过国际市场的产生才得以扩展的，而国家“内部”市场的形成对此只发挥了次要作用，而各国“内部”的市场也是在商品生产的“世界体系”（Wallerstein）形成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这一点也很容易得到解释。尽管在当时撰写的、洋溢着关爱

和感伤的文章中总是不断地宣称要体察民情，可是统治者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获取并搜刮更多钱财，而并非其臣民的富裕程度。这种伪善行为与当今市场经济—民主式讨论的性质雷同。所以经济追求的不是提高大众购买力，不会以此促进国家内部市场的形成。生产者群体即是并且只是作为人力资源，是每个国家“抽象的整体劳动力”，是在为争夺抽象的货币财富而进行的经济大战中的砝码。劳动者不应该好好地生活和消费，而应为专制国家的目的献身。于是，只有崇尚“出口主义”，并通过拓展商品进出口结构和与之关联的货币经济使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国家的内部再生产越来越市场化的做法才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农业在社会中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让基础的农业生产转向服务于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市场成为首要的任务。农业的社会结构只是在表面上还呈现“封建式”的组织形式，主要体现在地主和或多或少处于从属地位的农民之间的权威性关系。迫于专制主义的压力，这一社会结构成为国际市场的工具并经受了资本主义的改造。瓦勒施泰因通过揭示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与东欧的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市场—伪封建主义的区别对此进行了说明：

“在前一种社会体系中，地主（地产所有者）主要为地区经济而生产，他的权力来源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地产所有者）是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生产……他的权力更多是来源于中央集权的增强而不是削弱，至少来源于中央对于农民增强控制。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将这种‘农奴制’称为强行面向销售的农业生产（coerced cash-crop labor）……‘强行以销售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是农业中的一种劳动组织体系，它通过合法的、由国家强制执行程序要求农民……为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而生产。通常情况下，领地是国家指定的个人的‘财产’，但不一定有继承权。

国家也可以成为此类领地的直接拥有者；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改变劳动组织方式的趋势。”（Wallerstein, 1986/1974, 第122及下页）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易北河以东的地区。那里直到二十世纪甚至现在，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商还保持着强行以销售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此相关的包括从德意志帝国易北河以东地区臭名昭著的“容克地主”直到当代东欧国有社会主义的独裁者，如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同伙。同时在西班牙的大庄园、伦巴底的庄园和瓦勒施泰因强调的欧洲世界经济的整个边缘国家以及半边缘国家的农业生产也在经历同样方式的转变。这种情况当然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这里的农业“殖民资本主义”是最初殖民扩张的产物，它直接大肆剥削大庄园里的奴隶劳动来为国际市场生产。另外众所周知，美国南部各州依靠奴隶劳动维持着农业资本主义，而且这个“人权国家”的国家财富在最初的时候甚至主要是以这个产业部门为基础的。直到北部的经济发展导致南部的农奴制资本主义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才爆发了南北战争。

直至今日，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种植园经济仍然强行以销售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方式从事着为国际市场的生产。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巴西的北部，仍然习以为常地普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奴役劳动。南半球面向国际市场的单一种植农业不仅是历史的一个遗产，现在还有居民由于接受国家的援助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赐福被强暴地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被剥夺了根据个人需要自己决定生产的权利，而为积累抽象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财富（赚取外汇）被强行纳入了由外界控制的国际市场结构中，自己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奴役和类似奴役的依附关系不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特产，它从一开始就随现代农业国际市场的产生而出现了，并将始终陪伴着全球性的农业资

本主义直到它不幸消亡的那一天。

在西欧以及北欧的核心地区内部，虽然专制主义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实行半国家性质的及伪封建的大型农业资本主义，但是这里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发展进程，部分也是因为佃户要谋求自己私有资本主义利益造成的。因此，自16世纪以来，英国为了发展牧羊业而将农田变为了牧场。因为，在不断膨胀的货币经济中，为纺织业生产羊毛可以带来更大的利润。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enclosures）由此而起。农民被赶出家园，最后甚至导致了多次的食品紧缺，而这样的紧缺状况又必须在国际市场和货币经济的范围内通过进口加以补偿。“羊吃人”这句话的背后是一部大部分农业人口被剥夺财产以致贫困化的历史。

即使没有圈地运动，早期的现代国家也试图至少间接地将农业生产纳入货币经济和国际市场的轨道，例如实现了以货币形式代替以前向国家和地主交纳实物的支付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强行增加了市场销售并促进了生产（但同样不是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如今的世界银行即使运用的是其他手段，但方法是类似的。它宣称的目标是，通过贷款和（通常是虚假的）承诺将包括小农在内的农民吸引到为国际市场进行的“换取现金的作物”生产中。这种生产方式使得农民面临着价格急剧动荡、负债累累乃至毁灭的危机。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逼迫，由国家或者一半由国家促成面向国际市场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对国内农业生产自上而下贯彻的市场经济化是专制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

但是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于农业的促进还远远不能满足“出口主义”对于金钱的贪欲。最早的古典国民经济理论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他1776年第一次出版的名著《国富论》中也解释了为什么农业出口力度不得不自停留在低水平上的原因：

“尽管一般情况下，最富有的国家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领域都强于它所有的邻国，但是它在农业中的优势远远小于其他的手工业领域。通常，它们土地的耕种水平高并因其面积和肥沃程度都有较好的赢利是因为投入的劳动力和资金多。但是多产很少可观地超出劳动力和资本的高投入。富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总是高于穷国很多，至少不会像一般在手工业领域里高出那么多。因此富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并不一定低于穷国的同等产品……穷国尽管耕作技术水平低，但它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粮食的价格和质量与富国竞争，而它们在手工业方面就完全不是富国的对手了……”（Smith, 1993/1789, 第 11 页）

这一点专制国家的官僚机构当然明白。货币经济在手工业生产中可以比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贯彻，也可以更多地获利。而且手工业生产为“出口主义”实现贸易顺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因此国家不仅实施了农业资本主义，还强有力地推动了面向市场和出口的新型手工业生产模式。解散手工业行会，打破受地区限制的市场和传统的生产方法只是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同时，国家自己建造了多种强制劳动的机构如监狱、贫民院、疯人院等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最早揭露了这一刚刚启动的现代“劳动管理方式”恐怖内幕的人之一，最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这一“劳动”的恐怖且疯狂的历史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人成为了（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的苦力，从事由外界决定的、不以自己的需求为目的的并且不受自己控制的劳动。只有依附“劳动力市场”他们才获得维持生计的惟一可能性，这就使他们必须用自己所有的生产活动为金钱“抽象”的自身即目的（用钱赚钱）而服务。他们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抽象”为无视内涵的纯粹的企业经济的“劳动力付

出”和忽略意义所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过程。为此，首先建立了出口型的国家手工业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如同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强行面向销售的农业生产”模式中）形成了劳动分工组织的新形式：农业资本主义的奴役、疯人院和国有手工业工场是现代工厂和“劳动岗位”体系的最初形式。

专制主义的金钱欲、“出口主义”、强制劳动、国民经济、殖民主义、国际市场以及市场关系的扩张：在这一从根本上压制性的经济发展环境中，纺织行业的中转经销和以此刚刚兴起的私有资本主义却可以如鱼得水，因为，首先各专制主义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自己来组织由他们自己推动的货币经济及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借助税收和贸易顺差来搜罗财富。因此，“企业的私人积极性”也想为此发挥自己的作用（即使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上看它受国家指挥）。

其次，原先按照严格的传统规定为地方市场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小农或者没有土地而以手工艺谋生的临时工必然遭受到跨地区、甚至是世界市场上的匿名竞争者的威胁。当他们失去了对自己销售市场的控制时，也必然失去了对自己生产的控制，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生产组织流程来为自己创造在新的条件下进入市场的通道。因此中间商的重要性迅速提高了，也为“商人”依照国有手工业工场模式向“工厂主”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迫于大庄园资本和中转经销商的压力，不得不去适应更为廉价的奴役劳动、强制劳动或面向大市场的分工式的手工业工场生产（今天在社会更高的层次上再次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他们不仅因此变得穷困潦倒，还得忍受生产以及生产方式上的监管。中间经销商制只是进入私有资本主义手工业生产的一种过渡方式。因为纺织品生产具备最好的前提条件，所以长期以来它在很多方面充当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典范。

## 全面竞争的黑色乌托邦

---

被我们认作资本主义的形成条件以及作用范围的极权主义市场的前身毫无疑问是专制主义政体的极权国家及其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和中转经销机制产生的私有资本主义企业界也是这一社会历史格局的怪胎。当然，私营“工厂主”这一新的社会角色在市场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我发展动力是不可避免的。当极权主义推动的赚钱逻辑开始将社会再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成为社会关系的媒介时，在社会这片新土壤上也必然会以同样的程度形成一个由各种职能承担者的特殊“利益”架构。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商人已经针对近代初期的诸侯家族建立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久之后，大中转经销商和手工业资本家也形成这种自我意识。在一个发展迅猛的社会里，这部分人的自身利益快速地站住了脚。呈上升趋势的市场经济企业界在为自己确立了强大社会地位的同时，又摆脱了专制的等级制度传统结构的限制。这些新型的“自由人”并非来自名门望族，而常常是从“人民”中脱颖而出的。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在《人间喜剧》中刻画揭示了这些人内心的无耻肮脏，所以很长一



段时间里，使那些保守、怀旧、固守着旧式权威的人们对他怀恨在心。自此以后，在社会经济的尔虞我诈中，“机会平等”、反动的（根子上是贵族的）狂妄、国家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这种种意识形态就哪种信条造成了更恶劣的品质以及带来了更坏的后果展开了激烈争吵。这一高尚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是金钱之如同水银般的灵活性使得社会结构也变得松动了。在许多人社会地位降低、权力丧失以及生活贫困化的同时，少数人的境况却在上升，即那些幸运者、狡猾者、横行霸道者、贪婪者以及“成功者”。

市场的这些创造物把自己看做是“新的灵活性”的主体，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在专制国家官僚机构的管制下越来越感到喘不过气来和痛苦不堪。因此他们要创造出自己的统治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不仅要将其特殊利益合法化，也应当成为一种世界观并更加全面地定义人的概念。它直至今天在现代的整个西方社会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在当前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绝对的优势。因此现在挖掘这一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源就更有意义了。

该名称本身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是在狡猾地颠倒黑白。因为纯粹以自身为目的以钱生钱、包括在此之中的依附性雇佣劳动和隐含在此之中的必须出卖自己的自我贬低在那时之前是被各国人民和各个时代最为轻视和唾弃的行为和心态，而现在它却摇身变为了人类自由的代名词。对于自我卖身的赞美说明、对于自由这一概念的玷污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玷污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却占据了惊人的地位。

## 魔鬼的社会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创始人。霍布斯同时也是专制主义的理论家，这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种巧合只能说明，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有共同之处的。而两者都在货币和“抽象劳动”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毫不令人奇怪。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正如历史常常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自由主义反对权威的国家极权主义教义只是涉及同一社会历史格局里的弑父篡权的行为，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霍布斯还没有发动这场篡权运动，他仍然为这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两个变体奠定了基础。尽管在17世纪货币逻辑还处在襁褓之中，但是他已经很有预见地指出，货币的逻辑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原子裂变。假如说前现代化社会将个人以及他们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劳动纳入一个即使经常有点粗糙和不完善的“宇宙”之中，即纳入一个集社会监控和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保护于一身的文化整体之中，那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则是彻底解散所有的集体，以纯粹的金钱关系取代由文化决定的共性和相互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性不再表现为一种人性，而是荒唐地表现为一种物性。社会监控不是因此被取消了，而更大程度上是被物化了，变得“失去了主体”，个人之间不再能够相互协商，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无情。在这个矛盾百出的体系中，尽管职能分工在加强，同时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但是每个人

作为社会生物在原则上是“分离的个体”。或者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话来说：“不存在社会，只存在个人。”在霍布斯的时代，社会合作的形式还很多样，还根本没有被货币的逻辑完全摧毁，撇开当时的这种情况不言，霍布斯已经“放眼未来”，将人视为为了个人生存而斗争的抽象个体：

“我们将学者们通常称作 *ius naturale*（拉丁语，意为自然权利——译者注）的自然权利理解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即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而根据自己的判断使用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由此也包括他依据自己的判断和考虑为最佳地实现这个目标而做任何事情的自由。”（Hobbes, 1965/1651, 第 102 页）

霍布斯也明确说明了公民享有的这一“自由”的性质：“您有……买卖东西和相互开展贸易的自由”（出处同上，第 167 页）。人们不应该再拥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通过协商进行合作的自由，而只能听从货币经济的指挥；自由主义至今为止还保持的一个特点是，它以怀疑的眼光关注着任何合作和有可能消除“分离的个体”在货币法则面前表现出无能状态的社会性联合，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试图用行政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加以阻止。他用奥威尔（Orwell）式的语言将自由恰恰命名为这一绝望的个体化的不自由。

由于只有通过建立匿名的大型市场才有可能推广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关系的推广必须与彻底个体化的趋势一起促成全面竞争趋势的形成。因为对相距遥远、彼此没有任何交流的生产者的商品进行匿名的、在社会上不可控制的比较引发了所谓“供求法则”的确立：商品必须通过价格彼此竞争，因而生产也被置于竞争无声的强迫之下。这意味着，“分离的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

只有通过经济竞争的反作用力才得以建立。每一个狼群的组织形式都要比市场经济中的人类更具有社会性。因此“竞争的狼群法则”作为对狼的诽谤而必须予以驳斥。

霍布斯察觉到这一竞争的逻辑，但他不认为应当从根本上去批判这一逻辑。他之所以成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是因为他运用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极端地推导出整个人类的一幅黑暗的画面，但是他忽视了一点，即他描述的根本不是人类社会的“本性”，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开始发挥推动作用的一种过程之历史性结果，也就是促使消除一切自愿、自主的社会合作形式。所以霍布斯笔下的人是一种原则上自私、“本性上”比动物还孤独的生物：

“群居对于人类来说不是快乐，相反，凡是在没有一种统治的力量控制的情况下，群居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天性中找出引起争吵的三个主要原因：竞争、猜疑和追逐名誉。竞争是为了获利，猜疑是因为安全，追逐名誉是为了威望。第一种激情使人不惜使用武力将别人的女人、孩子和牲畜据为己有；第二种激情让人想方设法保护好巧取豪夺来的东西；第三种激情促使人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伺机报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人类还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一个有能力的最高层的强权维护秩序，就会爆发战争。而且这是一场每一个个人与其他所有个人之间的战争。”（出处同上，第98及下页）

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人类的“自然本性状态”，据说存在于所有还没有建立约束机制的地方。而且为了让人们相信，这里是种种自然力量在盲目地起作用，霍布斯竟然在拉丁文的版本中将人和动物作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比较：

“假如连狗都似乎明白其中的道理的话，有理解力的人怎么还会需要更多的论证呢：它们冲着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狂吠——白天是对每一个陌生人，而夜间则是对每一个人。”（出处同上，第100页）

直至今日，自由主义仍然信奉以上话语中包含的人实际上与狗没有什么区别的真谛。市场经济将个体贬低为狂吠乱咬的竞争主体，而这个竞争主体成为了人类意识的自然法则，于是完全属于历史范畴的市场经济被转定义为超出历史范畴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形式”。这一定义的阴险狡诈之处在于，它假设所有不愿认同这与狗一般的人类形象的人是在“犯下了违背自然本性的罪孽”。继霍布斯之后，亚当·斯密也在霍布斯发出此言120年之后谈到，“人有进行贸易以及互相交换物品的天然爱好”（Smith，出处同上，第16页），劳动分工以及文化也是从中产生的。

300多年以来，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尽管有着众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在他们的理论中一再发现的一个共同基调就是：“将社会事物自然化”，将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竞争生物化和物理化。因为这种做法是如此美妙，因此也不能少了最近东欧“自由革命”中诞生出的神圣的和平人物形象——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认同过某一种意识形态、教义或信条，无论它是右倾、“左”倾或者是任何一种倾向……虽然我的心脏一直在我胸膛的左侧跳动，但是我一直知道，市场经济是惟一有效而且根本可行的经济形式……只有这样的经济形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对我而言，市场经济就像空气一样是我们理所当然需要的：是经历了几个世纪（依我之见——是几千年！）考

验而立足于世的、最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人类经济行为的准则。”（Havel, 1992, 第 59 及以下数页）

这里吸引人的又是他言语中包含的无礼与放肆。他在宣称自己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流派的同时，不假思索地重复了现代所有意识形态的原始形式，用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严厉的“人的自然天性”的教条主义来论证某一种对世界和人的认识。

要推翻这一教条并不费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早就上千次做出论证，亚当·斯密关于人对于商品交换的“天然爱好”的大胆设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社会的职能分工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小型群体内部诞生出来的。同样，要说明自由主义理论家假设的金钱至上的人们那种抽象的自私心态的矛盾性也很容易，因为在几乎所有事情中，只有拥有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和处在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感觉到幸福。抽象的自私理论在根本上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实际上，顺应资本主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自我毁灭的特性。

要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根本不需要构想一个理想主义的、楚楚可怜的、伤感而又幼稚的人类形象。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个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必然具有资本主义的混乱形式，而且在人类历史的 99% 以上的部分中也确实不是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作为个体互相争执，他们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建立共同的生存条件，这一事实与“市场法则”和货币交往模式丝毫没有共同之处。个体的人有勇敢或胆怯、虚荣或嫉妒、好感或反感等特性，人的需要和品味各不相同——这一切并不以经济竞争的逻辑作为前提，而经济竞争的逻辑也不是由于人的这些特性而出现的；它是直到 16、17 世纪才形成的。人不是没有目的地奋斗也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赏赐而努力，这个不言而喻的状况，也根本

不是在竞争的个人之间抽象的等价交换这种特殊关系中才出现的；而是其他的并非由竞争而确定的社会关联形式也完全有可能存在，这在历史上也找得到先例。与此相反，惟独是资本主义创立的“竞争法则”一再强迫大多数的个人接受降低他们在社会生产中份额的条件，其他任何的社会形式都不会如此。

自由主义的阴险动机将人甚至置于动物之下，因为在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观点中连动物的直觉都不是必要条件。“强者的权利”是这种“自由”的内在结果，而具备在平庸无味的市场关系中站住脚的能力是首要标准。“强者”的这一定义优先采用了一种特别可怜的模式。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是这种自由主义竞争理论的延续，只是它们运用了其他的手段，即将自由主义的竞争模式运用到种族、“民族”和其他非理性的群体性上。因此，将法西斯主义称作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追求霸权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后裔是毫不夸张的。

这一点最终也适用于起镇压作用的国家以及它管理人民的国家机器问题。霍布斯在做出人作为存在的个体是相互为敌的断言之后，也必须寻找一个能将这些被称作强盗的人调教成具有相反社会属性的一个“统治力量”。为了避免抽象的个人在自相残杀的竞争中不彼此完全毁灭和吞噬，他将国家定义为必须置于个人之上的必要的强制性权力机构，并赋予它圣经中的怪兽“龙形海怪（Leviathan）”的名字。这个名为“龙形海怪”的国家怪兽应能驯服市场经济竞争中个人主义的所有小怪兽，强迫它们遵守一定秩序，以便它们能相互缔结条约，而不是用尖牙、利爪和快刀互相攻击。这是一种俾格米人（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身体矮小的一个种族——译者注）、澳大利亚的土著以及成吉思汗的部落都不曾熟悉的迷人的社会形式。但是“用国家机器驯化猛兽般的人”成了现代思想（不仅是自由主义，而且更是保守主义以及极右派）的根本出发点，这一点比如也体现在 20 世

纪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 1904~1976）的精湛的人类学著作中。

就像热带丛林般的社会与在社会上丛林密布的市场一样，“龙形海怪”自然也无法成为一个文化与社会总体机构。其原因在于，国家并没有消除绝对竞争，它是一个镇压性的和一个对于社会中单个的竞争者而言外在的强制力，是一个为市场中狂躁的个体们建立共同的和必要的框架条件的机构。从霍布斯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可怕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了4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的个体已经从意识形态上宣布了自己对这一强盗形象的认同，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事实上的确只是资本利用过程中的活饲料而已。霍布斯并不了解“人类的本性”，他只是用苦涩与灰暗的笔调预言了市场经济的未来。

霍布斯的“龙形海怪”思想显然迎合了极权主义。他维护君主的权力，支持当时在英国也已经兴起的极权国家明显的发展趋势。因此在卡尔一世被处死（1649）之后，共和派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同样很重视他，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霍布斯的社会及国家理论并没有固定在某个确定和具体的模式上，所以可以——例如通过他的继承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通过文字上的变化和宪法的修饰为所有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提供基本模式。这一抽象的模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者直至今日仍然以同样的严厉力度重复着他所列出的种种前提条件。因此，当代自由主义者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谈及核心问题时，也会放弃自己通常的缓和与审慎的语气，气势汹汹地攻击马克思“自由的人的联合”的思想和哈贝马斯（Habermas）关于“无统治权的交流”的思想：



“所有这些希望都只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所有的社会性联合都要求统治权的存在，而这也是有利的……民族学家给我们讲述的关于‘无统治者的部落’的故事可信度不太高……社会即意味着统治……社会不是友善的，而是必要的。”（Dahrendorf, 1992, 第47及以下数页）

所有历史事实与所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可信度不太高”的，因而是可以被抛弃的。我们必须去相信：“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使用坦克和机关枪。社会应当以资本主义为它造就的形式存在并保持下去：即“必要的”、痛苦的以及强迫个人为世界市场上的“必然性”奉献自身这种人为制造的贫困状态。持同样看法的包括在此期间转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派的那些西方前左翼人士，如德国联邦议院的一位副主席，一个体面的绿党党员借助人类学的理论激动地说：

“一切都起始于人是有愿望的。一切都起始于资源的匮乏。一切都起始于人不是单独存在着。一切都起始于对所有生存基本条件的无法避免的竞争。食品、父母的关爱、工作、空间、呼吸的空气、承认和人的尊严，所有这些都是匮乏的物资……我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某物，而事实上我们的这种渴望又与和我们有同样愿望、同样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人们发生了冲突，所有的暴力即由此产生。因此如同尼采（Nietzsche）所说，暴力确实产生于生存斗争。而这一过程之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生存斗争不仅在物资匮乏的时期，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只要存在或者人们感受到了某种竞争气氛。”（Vollmer, 1996, 第69页）

也许连霍布斯自己也会为如此笨拙的论述感到羞耻，因为，

即使是他提出的与人为敌的前提条件都不会如此简单地重复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公理。福尔默（Vollmer）的论证方式无非是在为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突变公开进行辩解，是在嘲讽所有关于社会历史的知识。除了自然灾害的极端情况，因“食品”之类的物品而引发社会内部的竞争，这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人眼中是荒谬的。“无须吃完”并将剩余的食物喂猪，即使是最穷困的农民也视之为自尊心的最低标准。暴力情绪的冲动，例如发起战争，也不能强行用偏偏对“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竞争”的动机来解释。被理解为个人所能拥有空间的宽余度和没有竞争的社会环境的“呼吸空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深入毛孔”的资本主义竞争原则和市场经济狭隘、吝啬的结账和分配方式产生之后才消失的；商品生产体系无疑强行将基本的“商品”，甚至例如这一完全物理意义上的呼吸空气变成了只能通过市场经济体系合理分配的“稀缺物资”，而福尔默女士关于真正物理性质的呼吸空气这一观点真是堪称商品生产体系的前卫。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中，不仅是食品，连为自卫而采取的暴力都少得可怜了。霍布斯（以及后来的尼采）至少还虚构了一个可怕的、惊人的和名符其实的猛兽形象，而福尔默关于抢夺一小块奶酪、关爱、“工作”、甚至空气的老鼠式的竞争的论述连那种对人类诚实的仇视都一并侮辱了。立宪自由主义（和在此之后20世纪的民主自由主义）标志着人类思想史的最低点，它的做法不仅把暴力的动机，也把对暴力的批判降低到小市民对金钱的仇视以及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对于警察当局怀有“卑贱的恐惧”的水平上。

后期自由主义者把个人的自私心态清楚地改变为纯粹市场经济的竞争动机，并为这种“绝对必要”的改变作辩护，他们以此对霍布斯仇视人类的理论体系中的重点作了调整。霍布斯自己并没有从真正的“经济主义”意义上来进行阐述，所以他公开坚持

把“龙形海怪”看成是一个虚拟的资本主义总企业主的这种极权主义及重商主义的理论诠释。当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企业界的经济主体列为唯一“必要”独立的极点时，他们不仅承袭了霍布斯关于人的论述，也运用了他的“龙形海怪”的构想。

因此，自由主义教义是对霍布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并没有放弃“龙形海怪”的驯化功能，而仅仅将市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调整并对竞争的原动力和竞争主体提出了控诉。这头巨大的国家怪兽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应当通过镇压手段来保证各种竞争力量开展自由竞争。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国家机器对外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将竞争搬到强盗国家之间的自由猎场上继续进行，比如从殖民侵略到撒切尔(Thatcher)夫人发动的民族主义的福克兰群岛战役；同时，对内不仅能够和可以，而且也必须通过装备精良的暴力机器的铁拳来阻止竞争中的牺牲者不服从“市场法则”规定的方式而自行建立新的生活。并不是皮诺切特(Pinochet)的出现才证实了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与血腥独裁、警察国家和宪兵队密不可分的。

自由主义并不相信它自己的“自由”具有造福人类的作用，因此它只能一再地将自己托付给“龙形海怪”：一方面自由主义将“人”，即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假想成生来就水火不相容的一个个独立的斗士，他们只有在国家机器的指挥下才能存活；另一方面也需要“龙形海怪”来统治和奴役那些不愿屈服和顺从于做那种反面人类形象的人，因为他们了解或可以设想出另一种人类形象。

因此，自由主义不仅源自专制主义的最高峰，而且它也随时可以再以专制主义的形象出现。就这点而言，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国有社会主义（以及所有的现代独裁统治）都只是自由主义柏洛托士(Proteus，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译者注)

的变种或表现形式而已。它们的共同点正如早在 16、17 世纪自由主义的原始形态中就已经表现出的对外侵略扩张和在全社会的篡权要求，从对商品形式和货币关系的巧取豪夺直到使社会越来越绝对“经济化”或“价值化”。

与西方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始形态一样，东方和南方正在追补实现现代化的国有社会主义或“致力于解放的民族主义”的政权也将本国居民视作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增加值”而必须发动和监督的“抽象的整体劳动力”，全然不顾他们的幸福安逸。正如西方的自由竞争中始终包含暴力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一样，国有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制统治在进行行政规划时也不能缺少“对个人的金钱刺激”、企业间的经济竞争以及“市场经济改革”等种种组成部分。在每一处人如同马戏团的动物被驯服得围着货币和“抽象劳动”团团转的地方，驯兽师都必须以权力的名义或扬鞭威慑或以黏糊糊的小糖果奖赏来诱惑。

市场与国家、私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经济要人与政治精英，无论从历史或是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这些对立面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时刻都有发生突变的可能。因此，1989 年之后，国有社会主义的领导精英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极端主义近乎顺利的过渡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现代化”的柏洛托士只是再一次地变换了它的外表形象，而不是它的内在本质。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纯粹表面性的对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圈套以及极权主义 - 自由主义利用自身的两面性而做的一种变形游戏而已。这个柏洛托士懂得如何将社会解放运动诱入一个逻辑和文化的陷阱之中，并用代表金钱个性和国家权力的这两只刺猬去追杀象征解放的兔子。

假如说，霍布斯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鼻祖还同时体现了两种特性的话，那么在他之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中具有压制性

质的“现代化”在这对立的两极中有重点地进行了选择：尽管现代统治所要的两个因素到处都相互渗透并互为条件，但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总体上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故乡，而与此相反，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东方则成为了国家极权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之所以扮演这个角色，其原因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对此霍布斯便是证明者和诠释者：假如他是从对17世纪英国内战绝望的思考中（肯定也旁观了欧洲大陆上爆发的30年战争）构拟出了扭曲的人类画像的话，那么1688年战争的结果——君主立宪制的温和复辟为“私人业主”发展其不幸的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则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前提条件；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不同，从此再也无法形成以国家经济为中心的专制主义，而是更倾向于建立一支面向国际市场、由国家扶持的私有力量。当然在17世纪，这一私有力量还只是以（拥有大量土地的、有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非贵族绅士的）地方土地财产和私人佃户为基础，根本不能与今天意义上的企业界相提并论，但这使私有资本主义得以最迅速和最不受侵扰地发展自己的土壤。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建立国家机器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它作为维护私有资本主义“策划者”的利益的工具。就此而言，它后来承袭了一些在自己本国就不太站得住脚的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以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为首的所谓“重农主义者”——这一名称已经显示出普遍的自由主义信条，即所谓的经济的“自然统治权”——要求必须保留“自然秩序”对于经济的统治。独立分散的、与货币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应当与货币具有同样的灵活性，并能够在正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作为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工厂主和商人与极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一学说被归纳为一句名言“让它去吧，无论风云变幻，世界不会更改它原有的轨迹”，简短地说就是“让它去吧”。它成为路易十四的经济部长让-巴普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的极权主义国家经济学和同样相当注重国家经济的革命政权之间的插曲。与此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系统性地扩充了这一名言的内容并强调它在现代化发展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原因在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想法最接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在紧接的200年中也如此发展下去。

### 私人恶习成为公众优势

可是一开始，自由主义与它“自由的”市场经济就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似乎属于道德范畴的难题，因为霍布斯很遗憾地将伪自然的、单个的竞争主体作了完全负面的定义，即人类具有必须加以驯服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下理想的人还看似一头畸形的牲畜，而惟有国家这个驯兽师代表正义的一方，它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就必须在自身方面形成一种怪兽的那些特性。假如现在倒转善恶的天平、让竞争个体对自己作正面定义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有被认作坏、恶、劣的品质肯定会被尊为高贵的品质。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早在尼采之前就完成了对“所有道德品质的重新定义”。

对在此之前的所有道德观发出猛烈撞击的是现代思想中最杰出的玩世不恭者之一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这位尖锐和大胆的小册子作者却并不总被认为是重要的思想倡导者。他是荷籍英国人、医生和启蒙运动者，对欧洲大陆以及英国岛屿上早期资本主义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他的描述不论明晰度还是尖锐度都无人能及。理由很简单，曼德维

尔不作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粉饰。他为市场经济所做的严肃的辩护中流露出一种尖刻的嘲弄意味，因此直至今日仍有人怀疑他实际上是否在尖锐地讽刺美妙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一句坦白和不另修饰的辩护词也许本来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全盘否定的批判。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热衷于这种形式的讽刺，他称曼德维尔是一个“头脑清醒者”，“他比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庸俗的卫道士要诚实一些”。

直到1705年，曼德维尔才在一本小册子里以双行押韵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到1723年，这本小册子不仅多次出版发行，而且因增加了作者的注释和解析扩充成一本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启蒙运动思想的讨论中享有一定的影响。这部被称作《蜜蜂寓言》的书却与蜜蜂在人们心目中传统而完美的“勤劳”形象没有任何关系；顶多与成了作者标志的那幅凶狠的漫画有着某种联系。副标题“私人恶习成为社会优势”已经透露了这首诗的真实内容。他说，所有丑陋的品性，如自私、贪婪、相互欺骗以及血腥竞争是最终建立一个“繁荣社会”（曼德维尔显然是指当时的英国）的惟一动力。这幅描绘着纯粹由卑鄙的万只蜜蜂构成的王国的画面正如诗中的一些重要段落生动准确地反映出他的基本思想：

尽管每个部分都充满了罪恶，  
但它的整体却是天堂；  
只有战争使它变得可怕，平时则被世人渴望，  
享有全世界的尊重和赞美，  
浪费着财产和生命：  
这就是蜂民们引以为傲的标志。  
国家的昌盛毋庸置疑：  
累累的恶迹使它强大。

美德借鉴政界  
施展出的种种阴谋诡计，  
还与恶习称兄道弟，  
结果是  
最终连最卑鄙的恶棍  
也必须为公众谋利……  
恶习中诞生出理智，  
懂得艰苦创业、珍惜时间、  
创造富裕的生活、  
舒适、快乐和享受……  
享有世上的幸福，  
攫取圈内的荣誉，  
清白而富足地生活，  
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梦。  
错误、狂妄、奢华必须存在，  
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利……  
因此只要法律得体地加以限制，  
恶习也可以为我所用。  
是的，假如人民希望更加强大，  
国度之中就必须有罪恶的存在……  
世上只依靠美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繁荣与强大。  
你们想重返金色的时代吗？  
那时的人们嚼着橡实，天真烂漫。

曼德维尔以这种方式为自由主义神化其最卑微的反社会本能提供了基本模式（他自己把它称作“罕见的怪论”）。假如将每个人的恶习汇总起来的结果会理所当然地促成“国家的繁荣”的



话，那么这一幸福也绝非指所有人的幸福。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才完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大批人陷入一种人为的、社会原因造成的贫困之中而不得不真正“吃橡实为生”的过程，因此这些邪恶的欲望最后所带来的美好结果显然只能适用于“高收入者”以及抽象的国家总体核算。而作为“劳动牲畜”的人民大众却正如曼德维尔在他诠释《蜜蜂寓言》的文章中以无与伦比的讽刺语调所形容的那样，可怜地被人以极其狡猾的方式强迫着从事“劳动”。

“每个人都知道，在织工、裁缝、布工和其他 20 多种手工业中，有众多的帮工如果 4 天的工作可以维持生活就绝对不会再多工作一天；也有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工人，即使在不能保证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也不辞各种劳苦地通过激怒雇主、挨饿以及借债的方式来为自己赢得一个休息日。既然人对于偷懒和享乐有着如此特别的偏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会在没有直接必要性的逼迫下自愿工作？……在我们的手工制造业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发展趋势会怎么样呢？假如商人想出口布料，他必须自己生产，因为织布厂主无法说服他厂里 12 个工人中的任何一位来为他工作。……由此可见，只要牢牢把握住穷人，就可以通过过剩劳动力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虽然不应该让他们饿死，但是也不能让他们有节余的可能。假如偶尔有最低层的人通过节衣缩食以及非同寻常的勤奋冒尖地改善了原先的生活，人们也不应该阻拦他。是的，对于社会中的所有人以及每个家庭而言，最聪明的办法无疑是满足于现状；但是绝大多数的穷人孜孜不倦地工作，并不断地支出他们的所得，这是符合所有富裕国家的利益的。”（Mandeville, 1988/1723, 第 177 及以下数页）

这里，他第一次清楚地阐述了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气质直至今日都从根本上塑造了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策划者”们、领导们、董事们、精英们、财产继承者们、资产阶级的尊严和信誉以及具有偿付能力的代表们的思想：即极端无耻地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生来属于上等人，可以通过赚钱和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从事上等的工作，而必须有一批贫穷的人力资源来做下等的工作。他们生来懒惰，命中注定要“劳动”，却又不理智甚至是“不道德”地采取抵制态度，因此需要有一双强有力的监督秩序之手来引导他们到达自己下等的位置上。曼德维尔真的直言不讳。他将“对其他人的不幸和贫困表示同感和同情”的态度解释成“最软弱的情感”的体现。怀有这样情感的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市场中的男人们断不可以对此有所让步：

“过多地关爱周围人最容易加重人的惰性和懒散，除了产生游手好闲的人、泯灭人的勤奋之外几乎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避难所和贫民院建得越多，人们要求得到的就越多……我并非主张人要残酷无情，也绝无意去追求非人道的东西。我认为，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为病人和伤者建造足够的医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幼小的孤儿、无助的老人以及所有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我们都应当带着爱心热情地接纳他们。一方面，我不希望忽视任何无辜和需要帮助的人；而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助长穷人的摇尾乞怜和惰性。所有还能劳动的人都应当去工作，甚至病人也应该尝试着工作。应该让大多数的跛子和盲人从事轻体力的工作……”（出处同上，第250页）

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者一直运用着扭曲的“双重思维”和“新鲜说法”，对这个问题，他们也照此办理，很专业地、口

是心非地说：“原则上”他们认同“人道的信条”，但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而这个必要性应当被降低到人们生存最紧迫的程度上，以便将老人、病人、弱者、盲人和跛子都置入这个资本利用的机器之中，从他们身上捞取最后的一点能量储备。直至今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en）、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或是格拉夫·拉姆斯多夫（Graf Lambsdorf）等一类人仍会从这个浑浊的意识形态的泉眼中汲水。曼德维尔在清算“过度同情”的时候，甚至攻击起“贫民学校”来，认为由此会产生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内疚情绪。他的论述又一次如此尖酸刻薄，以至于险些变成了对自己的激烈的批判：

“首先我们应考虑一下穷人们在贫民学校学习的文明举止和礼貌。我承认，在我看来，穷人们对此无论掌握到什么程度，即便无害，也是完全无益的；至少对于穷苦劳动者来说，没有比这些更多余的知识了。我们需要他们做的，不是恭维和称赞，而是尽他们所能为我们效力。”（出处同上，第254页）

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们圆滑的脑袋里一直在这样想，曼德维尔的功劳是将他的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他更加露骨的直言是关于学校教育是奢侈品或必需品的尖锐论述：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在一个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国度里，最安全的财富是拥有大量的勤恳工作的穷人，因为他们除了能为海军和陆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外，还是社会娱乐的来源。而且没有了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件商品也就失去了价值。为了给社会造福以及让人们在最艰苦

的条件下仍然感到满足，必须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贫困，而且无知……因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君主国要发展，要繁荣，就必须使贫苦劳动者的知识面限制在他们职业的范围之内，绝不能超出他们工作的范畴（指看得见的东西）。牧羊人、耕田人或是其他任何一类农民对与他们的工作和劳动无关的世界和事物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不会愉快和满意地承受艰苦繁重的劳动。读书、写字和计算对于工作中需要这些技能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不依靠这些技能谋生的穷人而言，掌握这些技能只会腐化他们，使他们不愿通过现在的日常工作来挣钱度日。学校里成绩好的孩子只占少数，这些孩子却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些时间去从事一项生产劳动，因此穷人家的孩子在书本上花费的每一小时时间对于社会而言同样是一种损失。上学与工作相比是一种偷懒，小男孩以这种舒适的方式生活的时间越长，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无论从体力上还是从意愿上，都越加不能胜任真正的工作。一辈子都必须从事繁重、艰苦的工作并在贫困的环境中艰难度日的人，只有越早被送入这样条件的环境，才越能耐心和坚韧地承受这样条件的生活。……一个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也许会选择农场主的工作，然后勤劳地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但他不得不这样干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并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雇佣工人，为一点微薄的工资给其他农场主打工；至少他无法像其他一直与耕犁和粪车打交道、从不知道还有其他生活方式的按日取酬的雇工那样胜任这份工作。需要服从或从事低级劳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他们绝不会像下级对上级那样甘心情愿地那么做；我指的下级不仅针对财产和地位，也同样针对知识和智慧。一旦奴仆聪明到可以发现他在为一个笨蛋服务的话，他是不会真正地尊重他的主人的。……没有一种生物会自觉自愿服从

于它的同类；假如马和人一样聪明，我是不会骑它的。”（出处同上，第274及以下数页）

假如这里“明白”了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国度”的真实本性。虽然这里“不允许奴隶的存在”（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农业史告诉我们，并非一直如此），但是自由主义者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努力建立一种用看不见的铁链束缚住人的新奴隶制，而且他们也做到了。曼德维尔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灵魂：绝不允许人自由地获取知识，而是只能掌握相关的职业技能，并且对于自己的职业应有自我奉献精神，旨在维护超然于所有知识之上的一种怪异可怕的目的。

因此，在现代化进程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获取“更高的”知识的途径总是一再地受到限制；资产阶级毫无道理地自认为，中产阶级以上出身的“自己亲生”的孩子，哪怕再笨，也要借助无数的营养针连哄带逼地让他通过高等中学毕业考试。当国家财政紧张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取消免费上高等学校或大学的机会，使得“穷人家的孩子”甚至连资本主义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均等”都享受不到（或让他们首先通过统治知识方面的“选拔考试”）。

此外，19世纪以来，出于资本利用职能的目的而必须向“下层居民”传授的知识也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被尽可能系统化和完全地限制在“必要的领域”内，并渗透了思想驯化的内容。抒情诗人赖纳·孔策（Rainer Kunze）关于国有社会主义施行的知识专制恰如其分的描述实际上也适用于现代商品生产体系整套的愚昧知识：“无知的人，为了让你们保持无知，我们要培训你们”。此外，资本主义还成功地让个人牢牢掌握住了导致自己愚昧的这种知识形式；如今有一些识时务、野心勃勃的大学生攻读企业经济学，其实从心底里他们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知识，只是

为了将来能从事某一种单调无味的“挣钱”行当而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学习那些实用的并可以使他们成功的知识，这正好是一例证。无论现在的大学生学什么专业，其实都只是企业经济学的的一个变种而已。

最后，曼德维尔明确指出，当（霍布斯原话就已这样讲道）一个社会下贱到为了一个荒谬的国家目的而使“私人恶习成为社会优势”，并为此随时准备残忍地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只有无情的暴力才能维护它；由此我们又回到了“龙形海怪”的话题上。把邪恶、贪婪的人在市场上站住脚的能力作为成全社会的美德来兜售，这种诡辩必然会像热爱市场上的“自由”那样热爱为这样的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犯罪行为而设立的监狱和绞刑架：

“一个巨大的、人口过密的城市，如伦敦或巴黎，最大的缺点之一是：在这里，骗子和罪犯可以像寄生虫躲在粮仓里那样隐藏起来。……当他们被抓住的时候，总会出现各种情况：或者证据不充分，或者出现其他缺陷，或者起诉有漏洞，或者陪审员甚至是法官动了恻隐之心。检察官们即使开始时铁面无私，但临到诉讼程序开始时他们往往又动摇了。……一个善良的人不会轻易夺取他人的生命，即使他罪有应得……这就是成千上万本应处死的人最后得以逃脱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有这么多的罪犯敢于期望在他们被抓住的时候还能够侥幸逃脱。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认定，当他犯下死罪的时候就一定会被送上绞刑架，那么被判处死刑的人就会极少了；那样甚至连最老奸巨猾的罪犯都宁可自己吊死也不去入室盗窃了。”（出处同上，第256及下页）

这一关于恐吓想法的论述也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蓝本：不是要消除犯罪的社会根源，而是要显示警察和法律的强硬手段。资

本主义造成的贫困被更名为“安全问题”。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胜者应当有权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的胜利果实。曼德维尔以此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教义中“伦理”法则的构筑。历史应当感谢他在此过程中的冷酷的坦诚，他因此会在资本主义杰出的玩世不恭者的圣殿中占据一席之地。

## 女人是男人的狗

曼德维尔式的玩世不恭直到著名的马基斯·德·萨德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 出现后才再次被超越。德·萨德得到的名声不佳的荣誉是用他的名字构成的萨德主义，它意味着虐待狂不是没有原因的。德·萨德继霍布斯之后，在这有史以来最深不可测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初期就直接而尖锐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单独的个人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所有的生物从出生之日起就是孤独的，他们之间互不需要对方。……我的邻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和他之间也没有一丁点的关系”（转引自：Luckow, 1998, 第184页）。而且和曼德维尔一样，德·萨德直言不讳地表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尽管过去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掩饰自己的想法，但德·萨德式的坦率是无人能超过的，连后来的种族主义理论也只是望尘莫及。

德·萨德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即富有寓意的尤斯蒂娜 (Justine) 的故事（或称《尤斯蒂娜》或称《美德的厄运》），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书的诞生过程上看都与《蜜蜂寓言》相似。1787~1797年，这本最初薄薄的小册子随着每一次再版不断地增厚，因为作者不仅增加了许多的情节，还一再地补充哲理性的新说明。如果说德·萨德在这本书的最初几版中还假装因恐惧而写出该书的话，那么到最后他连这层（反正很薄的）遮掩也完全丢开了。他和曼德维尔不约而同地并以赞同的态度让一个虚构的

自由主义的金钱恶棍扬言道：

“我反对所有自称布施和救济的行为，所以即使我比现在富有3倍，我也不会决定施舍给一个穷人哪怕是半个芬尼。在这方面，我有自己永不改变的行事原则。穷人是生来注定的……帮助他们就意味着否定现有秩序、违背自然规律并破坏极其敏感的生物赖以生存的平衡。这样会导致危害社会的平均主义，也会助长懒惰和无所事事的恶习。”（De Sade, 1998/1787, 第138页）

当人们指责他的观点将会导致（资本主义意义上）弱者不得不走向毁灭时，德·萨德冷酷地答道：“那就让他们毁灭好了！反正法国的臣民超出了国家的需要。只要国家机器在运转，综观全局的国家是很少顾及个人的利益的！”（出处同上，第21页）回答社会的牺牲者发出的叹息（“啊，假如我刚生下来就被掐死就好了！”）的却是理智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锐利的声音：“说得对。”（出处同上）在他的名为《贵妇人小客厅里的哲学》的小册子里，德·萨德进而发展到仇恨“劳苦的穷人”及他们“多余的”和过多的后代，他的仇恨尤胜于曼德维尔，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国家为贫民院提供的那一丁点儿可怜的救济：

“摧毁这些恶心的房屋，毫不留情地拆掉这些你们直接收容贫民们无节制地鬼混的地方，这些日复一日地将一群群人厌恶的新造物吐泻到这个社会上的丑陋下水道。他们惟一可以指望的就是你们的钱包。我要问，人们花这么大的力气让这些造物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这些多余的东西就像寄生虫，必将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树。你们还记得吗？无论在何种社会，每当居民的数量超过可供他们生存的物资



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衰亡。……不应为这些可恨的无节制地产出的崽子提供避难所；不要让这些如同粪便一样令人厌恶的结果再现……”（De Sade, 1980/1795, 第126及下页）

这里我们已经能够找到他的冷酷论证的线索。几十年之后，当工业革命陷入重大转轨危机的时候，它才被“人口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拔高成一门“科学”——而且马尔萨斯一再援引霍布斯就已提出的“自然之声”。德·萨德甚至比霍布斯更进了一步。他作为启蒙时期的“放荡者”表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思想。直到20世纪初，他的思想才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系统化，在德国的土地上它最终以社会性谋杀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希腊共和国，每一个刚降生的孩子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如果结果表明他将来没有保卫共和国能力的话，他立刻就被杀死；那里的人不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一钱不值的人类糟粕保存在昂贵的国家机构中。……希望今后国家取消这一完全不必要的开支；一个人如果从出生之日起就不具备有一天为共和国效力的前提条件，他就无权存活；立刻结束他的生命仍始终是最佳的解决方法。……人类必须从摇篮中开始精选自己的后代；因此务必要淘汰那些估计对于社会毫无益处的人……”（De Sade, 1980/1795, 第284及以下数页）

和曼德维尔的情况类似，尽管德·萨德如此坦率的鄙夷只是资本主义一般逻辑的一种极端化的体现，但仍不断有人怀疑是否可以将他的论调视为一种极端的批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资产阶级洞察力独一无二的特性，蔑视那些进行道德说教的“好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借助可怜的伦理道德观只是掩饰了不合理并且具破坏性的资本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法则，然而他

们又不想失去这些社会关系形式的约束力并依靠它们来维护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但当这种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后果坦率而讥讽的告白相形之下仿佛是一种英雄之举的时候，这份蔑视也让人觉得模棱两可了。以肯定的口气说出消极的事实（“我这样认为”），这突然让批评显得多余起来。

这种模棱两可一直保持到现在。它在后现代的“过分肯定式的社会批判”中取得了新的胜利，这些胜利随时可能再回到“无辜的”、以所谓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谋杀理论上去。谈论这样的话题不可能用轻佻的口吻。德·萨德也没有这样做。他依照事物的本色显然完全平淡地叙述着，没有一点幽默感，也丝毫不含讽刺意味，他也完全陶醉在他自己几乎已经按照后现代方式“营造”的卑鄙无耻的境界之中。对于“穷苦劳动者”玩世不恭的憎恨以及要将“无用的人”、残疾人等等从社会中斩草除根的幻想只是体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主导见解。有其他足够的资料来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曼德维尔）；由此可见，德·萨德无论是对暴力的推崇，还是他的其他任何观点，都必须被理解成非两面性的正面表述。整个一代左翼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沉湎于在写作中玩弄德·萨德式的讽刺并捏造他的“间接”批判能力。

和曼德维尔情况不同的是，德·萨德的坦率没有得到正统资产阶级世界的原谅，其原因首先在于，他超越了面面俱到的国民经济合法理论的界限（借助国家来限制自私自利的不道德心态而达到经济繁荣），使这一坦率态度达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他的不可原谅是同时涉及了“安全”和所有制两方面的问题。德·萨德当然不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提出质疑，但是他又一次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并允许偷窃的存在（事实上偷窃绝不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身，而恰恰是以之为当然前提的）。因此他在《贵妇人小客厅里的哲学》一书中写道，小偷的行为“只是在

遵循自然界最高而且最智慧的动力，即无论牺牲谁的利益也要使自己存活下去的动力”。(De Sade, 1980/1795, 第 256 页)于是，自由主义者关于“强者的权利”的意识形态首次以一种决不愿意受到束缚和驯化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

“你们用一种自然界中神奇的声音对我们指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荒谬的建议总是从弱者的嘴里吐出。强者是绝对不会想到去说这样的话的。……相信我，我们万众的母亲——大自然只会对我们谈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比她的声音更自私的了。我们从中听得最清楚的是她赐予我们的不可改变的神圣忠告：无论牺牲谁的利益，我们都要让自己感到愉快。但是人们会回答说，其他人会报复的……强者永远有理，这是对的。她的手创造了我们是为了永远保持充满战争和毁灭的原始状态……假如说一个人损人利己的行为是一种罪过，那么必须首先证明，对于自然界而言被损害的人要比得利的人珍贵才行。因为在自然界的眼中，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厚此薄彼，因此损人利己的行为对于自然界是完全无所谓。”(出处同上，第 175 及下页，第 213 页)

由此德·萨德建议社会惩罚让别人的偷盗有机可乘的“漫不经心者”，而不是小偷。所以他最终为谋杀辩护是必然的：“在斯巴达，人们追杀奴隶就像在法国人们追猎山鹑一样。谋杀在最自由的民族中是最受器重的”(出处同上，第 282 页)。因此，公民应当“带着大自然这个万灵之母明确的许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完全享有互相追杀的自由”(出处同上，第 250 页)。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公民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即便只算作一堆物质的人也可以依据竞争法则和强者权利，就像《尤斯蒂娜》中所写的那

样，随时可以“被转化”。

“在自然界的眼中，每一种形式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无法估量的大熔炉里，物质在进行着转化，但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毁灭；所有跌入熔炉的那些物质都会不断地更换成其他的形体……肉这种物质今天还以一个女人的形象出现，明天却又转化为成千上万的昆虫，对于永无止境地创造的自然界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被人们称作罪行的举动把另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苍蝇或者一棵莴苣，这对自然界来说又有什么关系？……”（De Sade, 1998/1787, 第49页）

由此看来，自然界原本允许所有可行的事，因为所有可以想象得出并可以实施的事也就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一个少女碾成肉酱而不投下一点罪犯的阴影”（De Sade, 1980/1795, 第315页）。在一个显然蕴涵了对20世纪做出猜测的设想里，德·萨德让“自然界”走到了极端的尽头：“假如它要求我们这些服务于它的灵感的盲目工具将宇宙点燃的话，那么拒绝它是我们犯下的惟一罪过。”（出处同上）。事实上，德·萨德重复到令人厌倦的话是要说明“采取其他手段继续开展竞争”的观点，因为其中充满了无理性的自相矛盾，所以它突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这种力量可能向外爆发，例如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德·萨德津津乐道描绘出的恐惧中，哪一种被发泄出去了？）；在国内，它也可能使得“龙形海怪”撤退到竞争主体当中去。某些看法激进的自由主义人士偶尔也会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他们当然与“肆无忌惮”的先辈们不同，采用的是比较缓和的方式。当现代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私人保安服务和“保镖”接替了“龙形海怪”越来越多的基本职能的时候，德·萨德在他狂想中勾勒的一幅社会内部崩溃的真正画面显现出来了。

也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般思想来说，对“龙形海怪”提出根本性的质疑还不至于让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这种论调却没有出现在某种社会解放运动的宣言中，而相反是竞争主体自己把它作为宣传的武器，他们早在尼采之前就认识到了不受法律约束的、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人上人和嗜权力成性者的权利。可令人难堪的是德·萨德无意中泄露了那个怪物的愚昧逻辑造成的虚无主义后果。他早已毫不留情地使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家丢尽了脸，这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德·萨德做的第二件可能更加不可原谅的事是他以不怀好意的热忧逼近了被视为禁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性心理，试图用肯定其无辜的方式来揭开其中的奥秘。“美德的厄运”恰好发生在一个名为尤斯蒂娜的女人身上，特别是女人、少女和小男孩作为“施虐狂”的对象，为性屠杀的狂想（偶尔也为现实存在）敞开大门绝非偶然现象。人类的性的确总是包含着侵略的乐趣以及相反的被动奉献的乐趣两方面的因素。（但两种角色分配在不同的性别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绝不是自动和在某种程度上由生理单方面决定的结果）。妇女处于父权制度中从属地位的现象也确实是历史上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社会的特点。但是上升中的资本主义依靠它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男人在性交中的侵略性，而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方式使之更加残酷了。德·萨德用疯子般的敏锐眼光洞察了这一事实真相并以他无羁的狂想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两性关系最极端的结果。

这里并不是要彻底探究人类性生活的深渊，而是涉及到一种对结构性变化的盲目想法。在18世纪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已经有了对这方面内容的明确表述。将生产者贬低为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人力物资、挑起匿名的竞争和两性关系结构的改变，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曼德维尔曾把社会的同情心批判为“妇女和儿

童”可鄙的感情冲动；如今德·萨德（在《尤斯蒂娜》的增补版本中）把这一问题进而引申为女人的不良“天性”。

“……她们柔弱的器官使得她们比我们更适合表达‘同情’这种怯懦的感情，也促使她们毫无任何意愿和不为任何功绩地抱怨自己面临的痛苦并用安慰减轻自己的痛苦……但这根本谈不上是美德或无私，纯粹是出于自私和本能。将她们的这种感情需要说成是美德，并在软弱和恐惧之外来寻求这些让我们在失去理智的时候受迷惑的这些美好行为的动机，这完全是令人生气的胡闹……”（De Sade, 1992/1797, 第 344 页）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万能的“自然界”又一次被抬了出来，这样好使得令人憎恶的同情心归咎于女人意识的“天性”，并且因这种天性有摧毁冷酷的男性竞争主体圈子的危险而蔑视它。自此，起源于中世纪后期和基督教新教的女人=自然和男人=文化的等式成为男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定式，而其中的“文化”恰恰代表金钱这个空洞的社会抽象概念。由于女人“令人作呕的体质”（De Sade, 出处同上，第 342 页）会自然而然地摧毁男性的竞争逻辑，这甚至使得她们做人的权力都受到了怀疑；德·萨德说，她是

“……这样一种退化的造物，以至于在马孔举行的高级神职人员大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大家都在认真思考，这种与男人有着很大差别的——如同林中猴子与人的区别——古怪的个体是否有权要求拥有人的名称并且是否应该承认她是人……”（出处同上，第 342 页）

这一显然将女人和男人与“自然”和“文化”等同起来的荒谬而恶毒的分类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进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前（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只占次要地位的时候，物质化的经济再生产主要发生在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的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和女性有着界定的、或多或少平等的工作领域，这种家庭在社会上对外所具有的代表性是当时家长制模式的集中体现。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一些生产方式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分裂的经济”——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扩大了的需求，而正是出于抽象的自身即目的的需要（最初是要满足早期现代社会军事机器的“需要”），直接的生产者被强行绑在了这样的目的上。又名资本主义的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第一次在广大的社会范围中建立了一种类似“公共经济”的东西，在开始阶段它与军事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是结构性的“男人事务”。

给女人留下的只有旧时家庭中次要的“剩余事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并被呈上升趋势的男性竞争主体鄙视的感情因素。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进一步降低以及直接生产者的贬值是同一发展过程中两个相关的方面，在结构上与独立的货币经济和竞争经济密不可分。现代的女权主义即使认识到这点，大多也只是停留在它的表面，没有发现其真正的本质；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妇女运动只是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解放妇女而已。直到最近，两者之间的联系才在女权主义自我批判的文章中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批判家长制这两个概念的统一形式表示出来：

“物质（内容、自然）与形式（抽象价值）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由性别特点决定的。所有其感性内容不能以抽象的价值形式表现、但仍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的事物都委托给了妇女（感性、感情等）……这一基本结构……与私人

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形成相符。因此，私人领域具有典型的‘女性’色彩（家庭、性爱等），而与之相反，公共领域（抽象‘劳动’、国家、政治、科学、艺术等）则属于‘男性’。最理想的情况是使女人成为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男人在社会中的‘靠枕’。”（Scholz, 1992, 第23及以下数页）

实际上，以这种方式不仅将女人困入了私人 and 家庭的领域当中，使她们从事无法从资本主义意义上理解的劳动（“家务”）以及发挥“同情的功能”（照料孩子和护理老人等），而且女人也因此成为了所谓的“自然因素”的代表。这一点也引起了专横独断的竞争主体对于社会结构的不满，因为女人单纯的存在不断地让他们想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逃避了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极权要求、制造开销和麻烦的人。德·萨德在那时候还没有将这个问题推演到全社会；首先涉及的是有社会等级的资产阶级或进入货币经济领域的贵族，也就是男性竞争主体的家庭：“穷苦劳动者”和自己的女人及孩子以笨重的“非自然”形式突然出现在必须驯化的“自然”的“物资材料”行列之中。必须用同样的方式教育女人和“贫苦劳动者”，使他们服从男性的竞争主体。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在他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中这样写到：

“所以一切针对女性的教育都必须在考虑男人的前提下进行。让他们高兴、对他们有用、让他们喜欢和重视、在他们小的时候养育他们、像男人一样照顾他们、给他们出主意、安慰他们、为他们创造一份舒适而甜美的生活；这始终是女人一生的义务。从孩提时起，人们就必须教给她们这些。”（Rousseau, 1986/1762, 第733页）



女人的从属地位又如何能符合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呢？这里并不是前后不一致的、形式上的排斥，以至于自由与平等会按照众所周知的“兄弟情谊”被作为“姐妹情谊”而遭到控诉。因为平等永远只降临在据说是由“大自然这个万灵之母”规定的事物身上，而女人只有遵照必要地强行施加于她的自然天性行事才能被纳入资产阶级的平等范畴之中。按照卢梭的说法即是扮演和善的家庭小主妇的角色，这个角色为女人的从属地位披上一层适合照料家庭的外衣。但是从一开始起，母亲形象的对立面就是妓女，即女性另一面（性爱的一面）的体现。德·萨德的观点有时被理解成“丑化的卢梭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确恰恰是把性关系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因为性恰恰是男性竞争主体的组成部分，它自己无法违背其自然天性，所以它在经济被分裂后出现的抽象的、排除感性因素的世界关系面前不得不显出阴森恐怖的面目。假如性隐含的意义是女性和自然天性，那么男性竞争主体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性角色恼怒地向他的被征服者做出让步，这一让步威胁到他们在社会中独断专横的地位。不仅是作为生物，也不仅是作为可鄙的同情心的载体，而首先是作为性（也包括男人的性）的代表者使得“被分裂的”女人成为仇恨的对象。

从根本而言，这里显示出现代意识形态中一个双重的、自相矛盾的自然天性概念，因为一方面女人代表着需要被驯服的自然天性，而另一方面，男性——资本主义主体作为“文化”的代表既体现自然天性同时也要受自然的支配，即成为具有特定风格的、孤独的竞争猛兽。在双重的遮蔽之下，自然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目的只是为了将所有的文化重新再变回到（意识形态化了的）自然形态中，而同时又赋予自然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两种性别的分布中，这一意识形态形成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自然天性概念恍若男人和女人完全不同及相反的“自然天性”。

由此，两种性别的人就像不同种类的或者来自其他世界的生物一样“天生”迥异。

当然，对这极其异化了的两性关系没有人会真的十分在意，而且虽然存在这一切资本的逻辑，人也不会停止相爱。尽管如此，最亲密和看起来最纯洁的爱情关系中也混入了那种分裂的尖酸成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并随时都可能以暴力形式突然迸发的性别憎恶。

德·萨德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变异的性关系阴暗面的不可超越的代言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为了保持对性进行不可避免的感性形式的控制，必须将它尽量降低为一种纯生理的行为。因此他在《尤斯蒂娜》的第一版中写到：“我只根据需求来使用一个女人，就像别人用夜壶一样”（De Sade, 1998/1787, 第135页）。因此，被驯化的性关系中必须清除一切危险的感情因素，近乎把它变成一个机械化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贵妇小客厅里的哲学》中顺从的女人显出喜欢这一机械化过程的样子：

“当有人和我的想法一样的时候，就愿意在任何地方做爱，而且无论一部机器进入到身体的哪一部分，都因能感觉到它而快乐。”（De Sade, 1980/1795, 第189页）

将性爱简化成机械化的生理过程的这一做法导致任意更换性爱的对象也成为符合逻辑的事情，再一次与商品生产和匿名竞争的逻辑相仿。性爱必将原则上成为一种商品和一种与社会个体情况相符的、孤独地享受：

“在性交的过程中也许我需要参与此事的这个对象；但是我问问你，一旦过程结束后，我和这个对象之间还剩下什

么？有什么具体的义务会将性交的结果与他或我联系在一起？……成百上千其他的、相似的和常常更好的对象将成为我们损失这一位的安慰；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种爱情能经受理智的思考……人们在享受性爱时希望的是什么？那就是周围的一切只关心我们，只想着我们，只为我们操劳。当为我们服务的造物自己开始享受，那就证明了他们关心自己比关心我们更多，因此也就使我们的享受黯然失色。”（De Sade, 1980/1795, 第215及下页, 第297页）

在追忆霍布斯时，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如同一种兽奸：“应该要求女人像母狗和母狼：她应当属于所有渴望得到她的人”（出处同上，第131页）。因为这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生物“自然”必须接受“被交配的动物”的被动角色，正如顺从的男人和男孩也被当作性爱对象一样（德·萨德只是以这一形式来理解同性恋的放纵行为）。当对象不愿意时，当它自卫时，当它提出危险的感情要求或者甚至引发感情时，那该如何应对呢？那就得让“暴力的乐趣”发挥作用了。这一点只有当“性机器”广泛的匿名性得到保障时才可能实现。德·萨德开始神化“女性的性自由”，他把“女性的性自由”置入一个完完全全卖淫的反面乌托邦的幻想之中，只能在卫生的“公共处所里”完成：

“没有人可以行使占有一个自由人的权利；独自占有一个女人就像占有奴隶一样不正当；所有的人生来自由，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这些原则我们决不能忽视；因此决不能赋予一种性别的人独自占有另一种性别的人的权利……根据未经篡改的自然法则，一个女人甚至不能够以她爱另一个人为由拒绝一个追求她的人，因为这意味着将他排斥在外，而当一旦规定了一个女人属于所有人之后，不可以剥夺任何一

个男人占有她的权利……我们有权颁布法令来强迫她接受追求她的人的激情，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连施暴都属于行使这一权利的结果，所以我们有权动用暴力……追求任何一个女人或少女的男人可以将她……召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处所中……但是人们会抗议说，处于某个年纪的少女如果和男人性交肯定会损害她的身体健康。这一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当人承认对性欲的要求时，这一要求就与性欲的后果无关了；从这一刻起，至于这一享受对于服务于它的对象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就无关紧要了。”（出处同上，第261及以下数页）

从表面上看，关于“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并因而“从未赋予一个性别的人独自占有另一个性别的人的权利”这种口是心非的声明与德·萨德对社会和性屠夫式残酷的设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正如资产阶级自由只是意味着无条件地直至自我奉献式地服从所谓的“社会自然法则”，所以“平等”也就只能表现在所有的主体可以同样尽情发挥他们原则上不平等的“自然天性”，即弱者被逼迫的弱势及强者践踏弱者的强势。

由于男人和女人具有完全不同的“自然天性”，因此他们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只能意味着遵循各自的“自然天性”行事。男人不可以独自占有一个女人；但并非因为承认女人在恋爱关系中是独立的主体，而是因为这一单方面的占有违背了自己的以及性的“自然天性”。女人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体现在她依照强加于自己的“自然天性”而充当性奴隶；假如她违背这种“自然天性”，一切的暴力行为都是允许的。

这里不仅体现出所有现代施暴者的原始想像力，而且也根本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阴险的辩证法。德·萨德这个“放荡者”完成了将自由主义视作性暴力幻想的逻辑推理；即使他的“性欲

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无法存活，它也还是作为最极端的推理结论潜伏在资本主义两性关系的结构之中。尽管表现形式有变化，但这种两性关系的核心始终根深蒂固地停留在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根基之上。

### 看不见的手

自由主义以“价值的重新估价”的方式才赢得了一个（不）道德的开端。甚至曼德维尔也似乎被他自己发出的攻势吓了一跳，尤其是当他因无意间道出了自由主义思想中最隐秘的部分甚至被指控亵渎神灵而送上了法庭的时候。因此至少他自己（与因无所顾忌的言论及尖锐的论调被关进监狱的德·萨德不同）赶紧在公开讥讽“穷苦劳动者”之外，也答应给他们一定的社会奖赏。这一奖赏借助于“私人恶习”不仅会对国家的抽象概念有利，也应作为“社会优势”给公民带来益处：

“整个民族正直和知足的品质带来的结果之一无疑是只要旧的物品还能用，就没有人再建造新的房子或需要新的物资。这种情况下，3/4的石匠、木匠、瓦匠等就会失去工作，而且如果建筑企业垮台的话，绘画、雕刻以及其他为奢华的生活方式服务的艺术的命运会如何呢？哪些艺术将被那些相对于繁荣和富裕的社会更倾向于建立一个顺从和诚实的社会并努力使他的臣民们在道德上比物质上更富有的立法者禁止呢？”（出处同上，第206页）

即使这一表面上的让步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字中夹杂着嘲弄的意味，因为曼德维尔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在他的那个年代里社会中的人还未成熟这样一个还无法完全让人接受的想法。按他的说

法，似乎没有了“提供工作”的资本家人们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无助，也没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程度为自己建造房屋和进行艺术创作。他以此论述已经将整个“世界的私有化”确定为前提条件，而“世界私有化”的背面即是人民大众对于工资的绝对依赖。以自身为目的的资本利用插入人与自然之间，剥夺了人的合作能力并将它转变为资本形式，以使个人能慢慢适应不凭借“赚钱”的间接手段就再也无法为自己和他人服务的生活方式。

假如自己的行动能力、生产资料以及自然财富不能“给”抽象的赢利生产过程“带来收益”，那就理所当然应将它们搁置一边或者甚至毁掉。因此建造房屋的根据不再是现有材料、能力以及需求的状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据需求进行生产的社会空间大多被统治者的要求（比如以贡品、税费和劳役等等形式）撕开了道道裂口，因此曼德维尔已经呼吁将这些要求大力渗透进直接的个人再生产中，使得“外来势力”可以干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并且所有的物质都融入它的经济磨盘的转动之中。被市场剥夺了对自己生产条件控制权的人成为在经济上被致瘫痪并被夺去社会交流能力的生物，只有依靠一位“投资者”得到“工作”。

18世纪全部启蒙运动思想的秘密核心即是这种荒谬性。曼德维尔的有关论述已经不再只是纯粹从道德伦理的意义上为其辩护了。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利润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而被容忍的广大民众的生活却被改头换面地谎称为资本的“富裕特征”；与此同时显示出他对建立一种社会“制度”的想法，在这个制度中，关于私人恶习和所谓的公众优势的狡诈诡辩成为（德·萨德已经暗示了的）社会机器的齿轮装置。由此还产生出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的诡计，它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和具体化的全过程。提出这个新制度思想的大思想家中也包括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伊玛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他同样也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为自私的个人之间的竞争

作辩护，他在一篇名为“论世界公民关于普通历史的意愿”（1784年发表在《柏林月刊》上）的文章中把这一竞争的原因直接归于一个神圣的法则：

“所有自然界用来发展自己赋予的各种天性的工具是使得它们在社会中处于相互对抗的关系，只要这种对抗关系最终能够导致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合法的秩序。我认为，对抗关系在这儿是指人群的不合群性，即他们虽然有进入社会的愿望，但这一愿望又普遍伴有一种势必不断地分裂社会的抵触情绪……这一抵触情绪激发了人的全部力量，促使他克服自己的惰性并且在名誉心、统治欲以及占有欲的驱使下在他既不能忍受又离不开的同类之中获得一级地位。这就是从野蛮走向文化的真正初期阶段，而文化原本体现在人的社会价值中，渐渐地产生了各种天赋，形成了品味。在启蒙运动的进展中甚至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为了在道德上区分优劣，它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粗野的自然天性变成某些实际的原则，并以此将一个充满病态的和睦谐调社会最终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整体。如果那促使抵触情绪滋生的、每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自私自利的要求而必须具备的、但本身并不可爱的不合群个性不存在的话，那么在充满了完美的和谐、知足和互爱的田园牧歌式的牧羊人的生活中，人的一切天赋只能永远隐匿在萌芽状态之中了：如同他们放牧的羊一样善良的人将无法为自己创造出比他们的家畜更有价值的生活；鉴于他们的生存目的，即作为理性的生物，他们无法填补创造力的空白。因此要感谢自然界中存在着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猜忌的竞争虚荣心、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许还有统治欲！没有了它们，所有卓越的自然天性就无法在人类中得到发展。人希望和睦，但大自然更清楚地知道，什么对人这个

种类更好；它希望不和。人愿意悠闲而愉快地生活；而大自然却希望，人能从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地安于现状的状态中走出来，投身到劳动和辛苦之中去，以找到聪明地再次逃脱辛劳的方法。自然界为此提供的动力是产生出不合群以及普遍对抗情绪的源泉，从中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却又导致人的力量得以重新发挥从而推动那些自然天性的持续发展。这体现出一个智慧的造物者的安排，而绝不是——一个胡乱地动用它神圣的权柄或出于妒忌而损坏它们的恶毒神灵。”（Kant, 1993/1784, 第37及以下数页）

康德的论述也完全符合霍布斯观点，他打着启蒙运动的旗号，拥护“狂吠的狗一般的人”的理想，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例如拉尔夫·达伦多夫仍可以愉快地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他的这段话（Dahrendorf, 1992, 第48页）。同现代化进程史上的所有思想家一样，康德也把已经作为现代风格的负面“成就”站住脚的、现存的资本主义形式完全看做人类的发展法则。他也赞同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人民大众“生来懒惰”，必须借助有益的竞争压力来使他们克服自己的惰性。如果康德直至今日仍被资产阶级看做令人尊敬的民主伦理准则的奠基人，那么在他自己认识到资本主义“道德高尚的整体”来源于“充满病态的社会和睦谐调”时，他本人也还是泄露了民主的这一真正性质。

而且康德的猜想——一种合作的、以非商品形式开展的合作社式的生产方式会使它的成员“沉醉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羊一般的生活之中”——和他自由主义的先辈们一样，将每一种“更高的追求”以及人类的所有创造力都与人在庸俗的市场关系中站稳脚跟等同起来。勇气和活力就这样地服从平庸的市场经济的摆布，而且只能通过最低级的本能来激发。此外，自由主义在用到羊的比喻时应当谨慎一点，因为市场经济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而言只是意味着自己被贬低成受非理性的经济虚荣心驱使并定期被修剪羊毛或被屠杀的羊群。

可是康德为竞争谱写的赞歌中首先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超出了曼德维尔的委婉影射方式，不再只是对“私人恶习与社会优势”作道德上的调和，而是从竞争身上看到一种自成一体的、与恶习或优势毫无关联的、类似抽象的理性体系的东西。康德的理性是资本的可怕理性。由此，他超越了统治阶级纯粹的社会家长制范畴，为的是使自然界本身和最终使“智慧的造物者的安排”作为“明白什么对于人这个种类更好”的资本主义强制力来发挥作用。这样，在源于霍布斯的使社会性质的事物自然化的过程中近乎出现了倒退：不仅受抽象自私心态驱使的资本主义强盗是“自然人”，市场是人类存在的近乎生理上的事实，而且这个庞大整体的内在合法性仿佛成了存在于人纯粹主观的自然天性之外的“第二自然天性”确定的惟一宏伟规划，环绕世界的资本的暴力机制也成了“上帝之手”的作品，它从自身的角度控制并领导着“自然的”个人自私主义这个主观因素。换句话说：“社会优势”不再只是众多资产阶级个人意愿的偶然而有益的总和，而恰恰相反，是上帝的天命所安排的整体关系与体系的“更高自然天性”导致了“分离个体”众多的自私自利行为。

在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神学）上的扩展中，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了其完整的体系，并超越了曼德维尔或者德·萨德所做的其实相当艰难的和纯道义上的辩护。这一扩展反映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从一个新型苛求的聚焦点发展为一个自我封闭的、成为客观现实的并已设立公理条件的疯狂体系。康德所提出的“智慧的造物者的安排”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亚当·斯密理论中著名的并业已成为固定用语的“看不见的手”的表述。“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并不是在他论及“国家财富”的经济学巨著中才首次出现，而早在17年以前的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书

中亚当·斯密已经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他的文风当然也就摆脱不了自由主义在论及道德时那种牵强附会，这也成为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辩护之特色。在他的著作中，斯密已经立足于超越出人的意愿的、独立的制度内部关系的层面：

“宫殿以及富人家中设施的美观和舒适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也惊愕地看到，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依照增加他们的舒适程度、满足他们的需求、实现他们的愿望以及为他们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欲望服务、使他们感到愉快的标准来安排的。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和脱离开为提高这类满意程度而做的各项安排的完美性来考虑符合以上全部标准的真正的满足，那么它在我们眼中永远显得最可鄙和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很少用这样抽象和哲理的标准来衡量它。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把它常常与使它得以产生的秩序、制度有规律并和谐的运转、机器或者经济设备相混淆。假如我们与此相联系起来看待富裕以及权贵所带来的快乐，那么在我们的想象力中，这样的快乐就不由得会充当起值得我们十分心甘情愿地不惜以辛苦和恐惧为代价去争取的伟大、美好和崇高的东西。自然界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是好事。因为这样的欺骗可以唤起人的勤奋，并使他们日夜辛劳。是它第一个促使人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建立城市和国家、发明和完善所有这些使人类的生活更崇高、更美好并彻底地改变了地球面貌的科学和艺术……骄傲与无情的地主将目光扫过他广阔的田地，并且在自己的幻想中毫不考虑他兄弟的需求，自己一个人独吞田地上所有的收成，他这样的做法却是徒劳无益的。在他的身上，那句原汁原味的和粗俗的成语，即眼睛大肚子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完整的证明。他的胃的容纳能力是无法与他无止无尽的欲望相提并论的。是的，他的胃并不能

比出身最卑微的农民容纳下更多的东西。其余的部分他必须分给那些极其细致地准备他所需要的那点东西的人……土地的收成大致在任何时候都养育了它所能养育的那么多居民。只是富人从全部的东西中挑选了最宝贵、最能让他们舒心的那一部分。他们吃得比穷人多一点点；尽管他们生来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他们还是与穷人们分享所有改善带来的收获……假如土地被平均分配给它所有的居民的话，那么他们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实现将生产出来的生活必需品近于公平的分配；这样他们在不自觉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有利于社会的事，并为人这个种类的繁殖提供了条件。当上天将土地只分配给少数的统治者和地主时，它并没有忘记也没有完全遗弃那些在分配中看似被忽视了的人。即便这些卑微者也享受着土地产出的所有东西中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在所有构成人类生活中真正幸福的事情上，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落后于那些看似比他们地位高出许多的人。就身体的舒适和内心的平和而言，任何的生活环境都几乎是一样的，在公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所拥有的安全感和无忧无虑的心态正是国王们所奋力争取的。同样的原则、对于有序的整体同样的热爱、对于秩序、艺术以及构思严密的计划的精美同样的关注，也常常有利于向我们推荐必能促进大众富裕的设施……能够看到这样美好和卓越的制度的完美状态可使我们感到欣喜，如果不能消除会对它的正常运转造成哪怕最轻微的故障或妨碍的因素，我们是不能安心的。”（Smith，1977/1759，第314及以下数页）

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固执想法是主张“简朴的生活”自有其如乞丐可以终日享受阳光一样的幸福，这样可以让他们以不危险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社会感伤。这种想法不仅在家长制式的保证

中——通过资本主义“策划者”狂热的能动性可以实现最大限度改善生活和以最佳方式分配的目标，（理所当然也包括乞丐的生存在内！）因此所有的批评都是多余的——达到了顶峰，而且斯密更是完全淡化了感官的需要和满足，目的在于颂扬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秩序的美好”、经济“机器”的光辉以及“这个制度规律与和谐的运转”。

“看不见的手”所谓善意的作用对于斯密而言显然比朝拜这个世俗化的、除了自己不容忍他人的上帝要次要多了。因此他忘不了用低沉的语调恐吓说，“必须消除会对它的正常运转造成哪怕最轻微的故障或妨碍的因素”。

为“看不见的手”谱写的这首赞歌显示了现代经济学的宇宙观是系统地建立在机械物理学的宇宙观基础之上的，亚当·斯密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一致强调一种相关性：

“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哲学、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致力于将形而上学，即我们的心理学以及伦理学补充到由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创立的机械宇宙观中去。他们将宇宙看做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旦启动起来以后，就自行调节。因此斯密用了这个同样的比喻……来为经济的运行作一个样板式的定义。”（Recktenwald, 1993, 第34页）

机械的斯密市场经济论符合牛顿的机械宇宙观。因此，资本主义思想由一种纯粹的辩护理论完成了向完整的制度概念的进军。康德和斯密在此过程中都继承了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的观点，即认为世界“预先规定的和谐”是从一开始起就由上帝制定的规划预先确立下来的。上帝在创造万物时使“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的所有物质，当它们只遵循从诞生之日起就接受的自己的法

则时，与其他物质处于一种和谐一致的状态之中，就好像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或上帝始终用他的手干预而促成了和谐似的……”（莱布尼茨的这段话转引自：Störig, 1966, 第 293 页）。这一推理只需联系到从历史中血腥地诞生出来的“抽象劳动”世界，就可以将具有压制性质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定义为一种世界理性的“必要”制度。直到全部市场体系开始盲目运行，才会在对它的肯定性反思中出现由莱布尼茨、康德和斯密开创的并由现代社会学的系统理论 [如尼克拉斯·路曼 (Niklas Luhmann) 的理论] 结束的现代制度思想，这些理论的客观化范畴将人贬低为他自己的社会制度的“环境”，抹去了它本身形成过程中的一切历史痕迹。

因此在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客观化并将它在思想上上升到制度概念之后，亚当·斯密高兴地开始着手探明和描述由“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制度的内在规律性并将这些规律性作为人的行为信条归还给他们。这就是被称为民族经济学或国民经济的真正诞生。该理论意欲跻身于自然科学的行列之中，研究人类历史上一个疯狂的体系，同时不断重新“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性。

亚当·斯密以此方式已经将一个完完全全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及普遍存在的商品生产体系作为前提，这种做法在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始终是超前的（即使最符合英国的情况）。他一反所有的自由思想，为这一体系设定了独立于参与者意志之外的“机械地自行调节”的原则。启蒙运动思想的根源在这里表现为独立的、社会史的“规律性”，这诚然是客观化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虚假地符合自然法则的假设，但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却也认为它是正确的。按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个上紧发条的、缺乏主体而自行调节的钟表是控制着经济化的社会运转的价格机制。他把作为资本体现形式的商品之“自然价格”称为调节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合适呢：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恰好等于足够支付在商品的生产、加工和运往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根据自然情况定价的土地租金、劳动力工资和资本利润的数额时，它的价格被称为自然价格。”（Smith, 1993/1776, 第 48 页）

这里，斯密悄悄把首次出现的历史性结果作为原理引用：生产任何一件商品时，所有人的再生产活动都只能在注定要“诞生”的资本主义收益范畴的先兆中进行；即便在还没有建立资本主义收益范畴的时候，历史就已经经历了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斯密却仍想当然地把这种情况完全看成是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在为“自然价格”规定了前提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将其以市场价格的波动作为调节工具的独立运行机制定义为几百万次竞争行为共同作用的合力：

“人们将一种商品在销售时通常的实际价格称为其市场价格。它可能高于或低于自然价格，也可能恰好与自然价格相等……如果市场供给量恰好符合有效需求，那么市场价格就完全自动地等于或几乎等于自然价格……一种商品的市场供应量会完全自动地与有效需求相适应。因为，绝不允许供应量超过有效需求是符合所有为把一种物品推向市场而投入土地、劳动或资金的人的利益的。与此相反，其他所有人都希望供应量绝不要低于有效需求……由于这个原因，自然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谓所有商品的价格在不断追求的核心价格……为保证一年的商品供给所谋求的所有收益都以这种方式很自然地适应了有效需求……”（Smith, 出处同上，第 49 及以下数页）

直至今日，一个自动运行的价格机制的假设仍然不仅是“科

学”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抵制国家对系统地自行调节的“美妙机器”进行经济干预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出发点。这个绝妙的想法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既不再对总是在某些方面漏洞百出、陈旧腐朽而又不堪一击的人治负责，也不再对来源于纯抽象意识形态的这种资本主义无理要求的伪自然性负责，而是听从一种如今已实际存在和完全客观的机制的“统治”；其次，一旦社会中安装了这一自动的调节机制，它就会狞笑着诱惑人们相信，本身与荒谬的资本运动法则不相符的、人自身的感觉和欲望是不合理的，而且几乎要劝告人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总是一再援引当然也适用于商品化劳动力的价格机制的“自然规律性”为证。

对扭曲的人类形象和纯理论上的自由主义离奇的反道德论调，人们还可以提出相反的论据。可是假如人们自己一下子被变为一头标价的劳动牲口，他们就再也无法抨击这一实际运行的、符合体系法则的价格机制的无情了。一旦货币流通形式占据绝对地位而且历史的陷阱以这种方式关闭了出口，那么哪怕只是在思想中持批评的元立场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认识到资本主义要求中怪诞的无耻了。

因此可以向依赖于工资的“自由奴仆”证明，并使他们清楚：任何违背“美妙机器”指示的独立而固执的动机，都只会使他们伤害自己或甚至“不道德”地损害他人。谁不愿意出卖自己，他就可能饿死，因为这一体系已经占据了整个生存空间。而谁出卖自己，他就必须接受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分配给他的东西。假如按照这个机制的标准所要求的工资“过高”，自行调节的社会机器就会以失业作为惩罚；如果劳务市场的调节器在劳动力价格下降后把人们逼到了卑微的生活水平上，那么，那些奋起反抗的工资奴仆们会因与已失业者“不团结一致”而遭到指责。

根据他的爱好和能力想成为自然科学家或医院看护的男孩可能分到的是汽车销售员的职位，而梦想能接受版画或记者培训的

女孩得到的可能是超级市场收银员的糟糕工作，这真是一种嘲讽。而且，由他人意志决定的空间移动也可以通过劳务市场的价格机制强行实现，从几个小时的上下班路程到在工作日远离家人，直至彻底失去社会根基和在劳务市场中漂泊；资本的人间上帝比天上的基督教新教上帝更无情地利用了路德赞美诗中的格言：“离开这里吧/房子、女人和孩子/他们是不会带来利润的”。

最绝妙的一点在于，无法使任何一个人对这一切承担责任。与曼德维尔更偏加于主观的玩世不恭手法相比，用客观的体系法则作为论证的依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连经理们、官僚们、法官们和市场经济苛求的执行者们都可以无耻地把自己与牺牲品等同起来，并以他们共同受到客观、真实的命运之力的摆布为证；他们总是遗憾地耸耸肩说，可惜，“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要求的，而且这“很自然地”合乎那些具有“按照有效需求”自动卖身天性的人的想法。C'est la vie（法文，这就是生活——译者注）。

在资本主义世界机器运行的条件下，生活相对改善、工资增加等情况只有在其高速转动的时期里才可能出现，即在因残酷剥削“抽象劳动”而形成的繁荣时期；但市场机制又随时可能重新收回它的恩赐。尽管如此，即便当“看不见的手”显然连它最后剩下的信徒都无法再供给任何机会和奖赏，而是自己盲目地在危机中挣扎并造成了一片破败景象的时候，人们也仍会把这些情况当作一场如地震、海啸般的自然灾害来对待，他们还含泪（在抵御危机时强烈地）呼吁公众在普遍的、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苦难中发扬“团结”的精神，而且连想都没想过要制止“看不见的手”的活动。

### 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

自由主义是所有完全盲目地建立在同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和作为其行为方式的“抽象劳动”（以赚钱为目的的劳动）的公理基



础之上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源头和主干，在托马斯·霍布斯到亚当·斯密的那段时期里，它已经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名为“龙形海怪”的镇压性质的辖制怪兽；一方面提出责任自负和所谓自主的主体之间缔结条约（劳动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无主体、自动运行、装备了自行调节的价格机制的社会资本机器确定为前提条件；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不再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

尤其是在自由主义设定的责任自负原则前提背后，隐藏着一种深不可测、具有煽动性、同时却通过体系而客观具体化的玩世不恭，因为该原则要求的主动性涉及的是一个被剥夺了所有进行社会合作及个人生活中再生产自决权的抽象个人。在这种条件下，“责任自负”只能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听从“市场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最屈辱的条件下）都迫切地寻找“工作”，并在持续不断的苛求中“取得最好的成绩”，而即使在梦中都绝对不对这一荒谬的社会结构产生怀疑。

莱布尼茨早已将这极端苛求的现代世界称作“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市场经济的追随者们从他的话中找到了狡诈的自我肯定论据，即尽管这一体系中肯定存在着许多弊病，它在某些方面简直是丑陋的，但它仍是所有可能产生、到目前为止为人所知的社会体系中最完美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各种收益范畴越充分地渗入社会的躯体并成为生活中不变的主导线索，资本主义论证的语气就越似是而非，表面上也越柔和。此时此刻，自由主义思想家把自己当作“力求尽善尽美”的仁爱者，当然是在不可动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继这些玩世不恭者以及使市场经济体系成为神学的机械论者之后，职业乐观主义者、靠祈祷行医者、鼓动者及表演行善积德

的行家们登上了现代化的历史舞台。首先登场的是一位不可信的“幸福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是英国法学家, 宣扬“为尽可能多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也起源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 即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生 (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7) 的思想, 他也是亚当·斯密的一位老师。这时, 资本主义制度被赞许有加地诠释成一个给予或应当给予每个人“创造他的幸福”的权利的社会。这一成为“追求幸福” (pursuit of happiness) 公式的“权利”甚至被写入了著名的 1776 年 7 月 4 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

“人生来平等, 造物主赋予了他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转引自: Förster, 1987, 第 42 页)

边沁是首先把这一套将资本主义的苛求改释为一种甜蜜承诺的幸福思想扩展成一种理论的人。在引入了自动运行的价格机制这一条件并建立了对“看不见的手”的崇拜之后, 他就可以将思考的重点重新放在整体的主观方面, 也就是说, 依照资本主义收益追求的观点思考仁爱的伦理道德。对此, 边沁的每一步论述顺序都是合乎逻辑的。首先他断定了, “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只能被理解为创造“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 他的幸福哲学将自己看做功利主义哲学, 是实利主义 (拉丁文中 *utilis* = 有益的)。所关系到的也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 究竟如何能客观地衡量这一利益。边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金钱是衡量的尺度:

“我在这里用一种如此向金钱看齐的口吻说话, 是想和一个感情丰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缔结停战协议。我是迫不得

已才这样做的，也想要人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这样做。温度计是测量外界温度的仪器，气压计是测量气压的仪器。谁对这些仪器的精确度不满意，他就必须设法找到其他的仪器，或者他得向自然科学说再见。金钱是测量疼痛或兴趣的仪器……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我在本书中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话，他不应该感到惊讶或生气。”（Bentham，1981/1843，第269页）

通过效益最大化实现幸福最大化并将金钱最大化作为它的衡量尺度——这一迷人的构思也许会诱使思想幼稚的人错误地为，人们这时会按照某种公平的原则来分配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金钱。这种想法肯定会立即被幸福哲学家制止：

“因此人们……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贯彻实施一部把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作为目的的宪法时，有足够的理由使得最富有的人拿出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不太富裕的人……可是，一旦人们考虑到如此做法造成的第二层及第三层的影响时，就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不仅没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幸福，而且先是将幸福，进而将人的生存基础彻底摧毁了。第二层的危害在于，它通过引起普遍的不安和把危险性夸大成一种确定的事实而摧毁了幸福；第三层的危害在于，它因为断言人无法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而泯灭了人的劳动积极性，由此人的生存基础也最终遭到毁灭。完全撇开由于人们把平均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平均主义体系……——贯彻到底——或者由于人们只是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而造成的破坏不谈，幸福的积累也会因由盈余物资构成的基础会丧失而减少，建立这一基础原是为了能不断增加对于保障必要的生活费用必不可少的财富。”

(Bentham, 出处同上, 第 267 页)

一言以蔽之: 财产的向下重新分配是有害的, 这种做法会损耗财富。“创造者”可能会生气地退缩并将人类抛进一个“没有雇主”的绝对贫困状态之中。因此, 无论如何都不能阻碍转变为“幸福积蓄”的资本积累运动, 它是效益的源泉;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 资本主义的人力资源哪怕对富裕有一点微薄的要求, 都可能被认为是腐朽的“平均主义”念头(而且这种想法也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财富的抽象形式才能实现)。没过多久, 边沁就道出了, “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句话关键在于“可能”一词: 这就是说, 要尽可能地与“美妙机器”的运行规律相吻合。人人尽力而为之。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特别是位于资本主义幸福金字塔底层的个人), “可能实现的幸福”也许是相当微小的。更清楚地说——很遗憾, 饿死甚至有可能是留给他们的惟一可以实现的幸福:

“现存的物资不足以保障所有人的生活, 其结果是死亡; 在这种自然死亡之前, 会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这种痛苦比在例如判处死刑时伴随那种最痛苦、最残酷之死的痛苦还要深重得多。为了结束这样的苦难, 所有必须忍受这一切的人只要一有机会, 自然而且必然就会不遗余力地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 人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作了多大努力, 或假定他们企图作多大的努力, 财产的安全——或许也包括人的安全——自然就会受到其他人多大的损害。”(出处同上, 第 260 页)

因此, 仁慈的幸福哲学家边沁必须看到, “紧随着尽可能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这一总体目标之后”, 在“具体目标”的排行榜上处于第一位的肯定是——“安全”(出处同上,

第 255 页)。安全问题困扰着边沁，他的思想完全被这个问题占据了。但是与曼德维尔一类的玩世不恭者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坚定而善良的博爱主义者，因此他绝不会在指明了绞刑架和缺乏同情心就告罢休。此外，当“绝大多数人”“可能”实现的幸福降低到令人惋惜的程度时，为保障安全而设置的警察、军队、法官和刽子手的数量以及他们的装备是否充足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所以博爱的自由主义面临着一个难题：应当尽量委婉地教导资本主义的人力资源，他们必须始终遵守游戏规则，安分守己地做失败者，而不得破坏“幸福积累”机器的正常运转。由此，安全问题不再只是警察的难题，而主要成了教育问题。在这一点上肯定得修正曼德维尔的观点了，他之所以做得过分并超出了原本的目标，是因为他只从必要或多余的（可能甚至是危险的）知识着眼来看待“贫民学校”问题。这一观点“自然”必须继续有效，但现在要补充进教育学的必要条件。其原因在于，对人力资源的纪律训导不能够只停留在外在的、单纯以强制性武力为基础的约束行为上。知识的职能化、对知识的限制和控制是一方面，但另一（也许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教育改造、为资本主义目的而进行严格的驯化、纪律的训练和对苛求的习惯适应。为此，除了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也到了进行系统地洗脑的时候了。

于是，在现代化继续推进的过程中诞生了现代教育学，学校式教育、普通国民教育学以及工业教育学取得了始料不及的蓬勃发展，而且那些伟大的和仁爱的教育家和洗脑问题理论家的纷纷出场就不足为奇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已经撰写了他的教育小说《爱弥尔》。这部书打着“返归自然的”教育学旗号，倡导进行现代行为方式以及（如所示）性别角色方面的训练。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不同，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在更大程度上是以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层面为方向；卢梭甚至蔑视贪得无厌的私有资产阶级，并向他们宣传纯政治性自由主义的“公民

美德”。尽管如此，它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另一面。与卢梭幼稚的想法恰恰相反，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s）的《美德专制》一书中，霍布斯笔下集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于一身的“龙形海怪”再次露面了——也以改变了的法国雅各宾派的形象出现。因此，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式自由主义尽管表面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但两者在国民教育学问题以及设计洗脑方法的过程中重新达成一致，这并非偶然现象。卢梭的“自然”（他自己显然没有意识到）早已包含了自由主义的“ordre naturel”（法文，自然法则——译者注）和资本主义的“第二自然天性”。

总之，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数大思想家是在机械论宇宙观的范畴中理解“自然”的含义的。如同斯密的市场经济社会的世界机器依据了牛顿的物理性世界机器的模式，如今霍布斯的“龙形海怪”也逐渐演变成了国家机器，以此类推，它普遍地洗脑的教育职能也因此像社会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弗雷森（Wolfgang Dreßen）所描述的那样，以“教育机器”的形式显现出来（Dreßen, 1982）。在设计这一机器的过程中，没有人比幸福和功利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更具有创造性和更成功了。

在机械论宇宙观中，显然连人自身也被看做机械的客体。法国哲学家朱利安·奥弗瑞·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09~1751）是一位早期的物质主义者，早在1748年就出版了名为《机器人》（L'Homme-Machine）的一书。在他的文章中，断头台也被看做了“美德机器”。当作为世界机器的一部分的人自己变成机器并且他的一切行动成为“功能”的时候，那么按此精神用教育洗脑的方法也就成为一种可取的机械加工方法（并不一定立刻用断头台）。如果把这种想法与安全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驯化意图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教育对象进行持续监视和观察的任务。象征着懒惰和贪图享受的古老而“罪恶”的亚当始终有再次反抗资本主义苛求的危险并损害他自己的“幸

福”。他必须处处受到监视并且自己察觉得到这种监视，直到他完全死去并由透明的、可以承受各种苛求的“新人”取代他而不分昼夜地工作。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都打着“自由”的旗号，即购买和出卖自己的充分自由。

但是，在每人身后都安插一个警察和一个教育者，开支就太大了。而且应由谁来教导这些教育者呢？兼有幸福和功利哲学家双重身份的边沁在优化洗脑方法的同时，又为减少教育开支做出了持久的贡献。监视必须简便易行，从长远来看，病态的人甚至应当尽可能地充当自己的看守。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必须通过一个由自行调节的个人组成的自行调节的社会来补充完整。这也是康德的启蒙命令——人必须从“归咎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脱离出来，并“在不受他人领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智”（Kant, 1985/1783, 第 55 页）——所隐含的深意。这里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不仅要表面上服从资本主义的“理智体系”，而且要从内心里接受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方式：每个人是自己的警察、教育者、监狱看守和监工！

继康德之后出现的伟大的现代化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也将资本主义世界观提升为绝对的世界精神，他的一句名言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同样的观点：“自由即对于必要性的认识”，一种真正自由主义的老一套说法。边沁认识到的是，只借助劝告或惩罚的手段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简直绝妙的主意，即把绝对的观察和监督放到特定的组织中进行，首选的是驯化机构的建筑。

结果就出现了 **The Panopticon**（英文，圆形监狱——译者注），一种依据巧妙原理设计和装有巧妙设备的构思巧妙的建筑物。1787年，边沁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这一建筑物。这些信于 1791 年连同两段附录一起发表了。“Panoptikum”（德

文——译者注)原意是蜡像或珍品陈列馆;在古希腊语中,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是指一种“到处可以望见里面”的房间,众所周知,它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展览形式。据迈克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猜测,边沁也许是受凡尔赛动物园的结构的启发才想出了这个主意:

“……和往常情况不同,动物第一次不是分散在公园里展出。中间立着一个八角形的亭子,它的第二层只有惟一的一间房间,即国王的沙龙。透过墙上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7个被高墙圈起的兽苑(第八面留作入口),里面关养了各种各样的动物……”(Foucault, 1977, 第261页)

边沁的全景圆形监狱具有一种类似的构造。它是一个“展览馆,但其中的动物被人取代了”(Foucault, 出处同上)。这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一种新型的监狱。但边沁看得更远。他把他的这一构想称为“The Inspection - House”(英文,监视屋——译者注),即观察和监督的地方。在这篇关于全景圆形监狱的文章的扩展标题中,他就已经对这一全景圆形监狱的功能范围作了说明。他的想法应

“适用于将任何一类人置于监督之下的机构,特别是教养所、监狱、工场、手工作坊和工厂、贫民院、疯人院、医院和学校。”(Bentham, 1995/1791, 第29页,译自英文原著)

边沁尽情发挥着功效的想像力:

“这一建筑物是圆形的。囚犯的住所分布在圆的半径周边上。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单人牢房。这些



单人牢房彼此隔开，囚犯被从圆的边缘通往圆心的隔墙分离开来，相互之间任何的交流被隔断……看守人员的住所位于圆的中央；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称它为看守室。最好在圆的中央和外圈之间留一片无人居住的中间地带。各个单人牢房之间也应有足够的空间，这样可以留出从这个建筑物的外面直达位于中央的看守室的通道。每个牢房有一扇朝外的窗户，其大小不仅要使牢房内的光线充足，还要让足够的光线照射到看守室的相应部位上。牢房的内圈半径由一道铁栅栏组成，它的构造不能妨碍看守人员从他的包厢中观察牢房中的一举一动……看守室的窗户蒙有遮光帘……因此囚犯从他们的牢房间中无法看到看守室中有没有人……”（Bentham, 1995/1791, 第 35 及下页, 译自英文原著）

这一精心设计的安排使得监视更为合理和完善：囚犯应当始终处于明处，而“监视者”对于他们却永远是隐匿的。边沁以自由主义者无辜的功效思想关注到了每一个细节。无论是安置警报器还是建立精密的粪便排放和利用的技术体系，他都考虑到了。出于人道主义情感，他反对死刑，因为他认为，死刑会导致“积累幸福和功效”的劳动力的丧失。因为囚犯的劳动力应该得到最佳利用，而这既是一种训练，也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所以，边沁不仅对于推广当时在一些监狱中普遍用来改造罪犯的踏轮非常感兴趣，还想将它连在各种各样有用的机器上（参见：Dreßén, 1982, 第 94 及下页）。休息的时间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也是功利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考虑：

“工作 15 个小时，最多允许睡 6 个小时。这不仅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利用囚犯的生产力，也是为了防止他们产生愿望和想入非非。边沁写道，囚犯应当精疲力竭地倒头睡去，因

为，否则他们就可能在想象中逃离监视人和教育者的控制。”  
(Dreßben, 出处同上, 第 94 页)

此外，调换工种的方式也被用来不断地掩盖疲倦。但即使这样还远远不够。居住者必须在自己无法观察的情况下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监视，他们必须几乎一刻不停地运动；不仅如此，重要的还在于用最别出心裁的方法把他们尽可能地隔离开来。因此，边沁也发明了隔离监禁。他甚至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给囚犯戴上眼罩或者在他们的耳道中塞入小球。在他的“刑法原则”一文中，他激动地解释说（他仿佛预见联邦德国民主司法机关是如何对待英国皇家空军俘虏的）：

“这样一种孤独的监禁，特别是当黑暗和少量的食物供给伴随而至的时候，无异于刑讯，但是它又不会引起刑讯通常导致的愤恨。”（Bentham, 转引自：Dreßben, 1982, 第 95 及下页）

但即使在监狱之外，也必须以其他的形式贯彻这个原则，比如在学校里。教室里通常的位置安排起源于边沁的全景圆形监狱：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座位，通过合并或打散座位可以将学生任意地组合起来。讲台的位置稍高，使得课堂情况一目了然，如同从看守室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牢房里的一举一动一样。边沁这样赞扬道：

“教师凭借他的中心……位置可以有效地制止各种游戏、没有注意到的闲话及所有精神不集中状态。每个学生之间的隔墙或挡板也可以发挥作用。”（Bentham, 转引自：Dreßben, 出处同上）

边沁这位仁爱者也竟然想方设法地使殴打的行为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理性和有益了。尽管残暴地对待战俘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许多文化中，对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施以暴力仍被看做可耻的行为。几乎只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留有打自己孩子的习惯，这一美好的习俗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逐渐升级，成为家庭、学校、监狱和军队中普遍的体罚式教育法，并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尽管在这方面普鲁士德国无可非议地扮演了先进的排头兵角色；但是自由派的功利主义者边沁却执意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技术合理化的观点，并且借助于一个千真万确的打人机器：

“人们应该建造一种能带动一定数量用藤条或鱼骨制成的弹力鞭机器。它的数量和大小应当由法律做出规定。犯人的身体将遭受鞭子抽打的惩罚，其强度和次数由法官来规定。这样就避免了惩罚的任意性。执行惩罚时应有一个官员……到场监督。如果应有几个犯人受罚，这样的方法既可以节约时间又可以增加威慑力……”（Bentham，转引自：Dreßen，出处同上，第88页）

用一句话来说，即：“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全性，并由此增加公民的幸福。边沁主张在这一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以进一步优化这些措施。同时他肯定地指出，“体罚”这个棘手的复杂问题符合了哪种社会逻辑关系：

“体罚产生的疼痛就好像是等待赢利的资本……研究不同形式的体罚所产生的效果并指出不同疼痛级别的人……可以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例如分析绳子或鞭子打出的不同程度的淤血和腱撕裂。”（Bentham，转引自：Miller，1996，第19页）

但是全景圆形监狱的世界还没有就此建成。因此，边沁又增加了一条全面的身份检查原则：无论是在全景圆形监狱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的全景圆形监狱中，每个囚禁者都应当能随时被识别和逮捕。他不知疲倦地搜寻着能说明这条原则并为之润色的范例：

“在日本的首都，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姓名别在衣服上……在英国的大学里，学生穿着特别的制服。在 charity school（英文，慈善学校——译者注）里，每个人不仅必须穿制服，而且还要别上编号牌。士兵就更不用说了。也许至少要让穷人穿上制服。”（Bentham，转引自：Miller，1996，第32页）

1804年，在给卡鲁爵士（Sir Carew）的一封信中，边沁甚至建议给英国的居民无一例外地在皮肤上强制性地纹上一个标号或不重复的名字（Miller，出处同上）。现在还剩下一个大问题，即应由谁来监视“监视者”以及教育教育者。对此，这位极具创造力的自由主义仁爱者也准备好了两个小办法。第一个方法是，他建议对包括监狱在内的这些全景圆形监狱机构，进行私有化改造，由私人资本家从事赢利性的经营。与撒切尔夫人异曲同工！为此，边沁深得要领地制定了衡量记账是否合理的最严格的标准。应该与自由职业监视者们订立条约，规定不允许超过的“年平均死亡率”。另外，每有犯人越狱，监狱的经理必须支付罚金（Dreßen，出处同上，第95页）。关于第二个办法，边沁已经在他的“刑法原则”一文中作了阐述，即把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都公布于众：

“公开化是对付滥用职权的最有效的工具……全景圆形监狱变得所谓透明了。对于享有特权的官员，它任何时候都是开放的；而在指定的钟点或某些的日子里，它对所有人都开放。观众被带到中央的看守室，可以从这里观察监狱的内

部情况，他成为监禁条件的见证人，可以准确地评价犯人的状况。”（Bentham，转引自：Dreßén，出处同上，第84页）

这样，连教育者也受到了教育，所有的社会成员相互监督：边沁预先规划了一种从体系上无可非议的公开化，一种绝对的监督公开化，它甚至能将资本主义人为导致的贫困状况转变成对统治制度的认可。资本主义理性成为公开化，而公开化成为资本主义理性。法国社会哲学家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这样刻画了全景圆形监狱式自由主义思想可怕的逻辑：

“因此，自私理性在全景圆形监狱般的世界里实行着独裁统治。这是一种对监狱的统治……如此看来，全景圆形监狱构成了理性的神庙，一座光芒四射而且透明的神庙……公众的眼睛将监视着其中内部的眼睛……于是，作为隔离之地的监狱重新融入了社会之中：它成为社会中最光辉、最被了指掌的一地。”（Miller，1996，第17页）

很显然，边沁的这些带有偏执狂症的文章充满了一个疯子发出的奇谈怪论，但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的疯子做出的符合自身内在逻辑的撰述。这样，这位幸福哲学家与他的学说一样，最后以一种剩余物质彻底利用的状态而告终：在他建议出于功用及节省开支的考虑将尸体制成标本并用作教堂和剧院的塑像之后，他也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解剖学。这还不够，朋友们依据功用精神，还对他的骨骼进行了理智的使用。他们给它裹上一层蜡制的躯体，再给它穿上边沁的衣服，所以直至今日，他（在一个能搬动的柜子里）还作为“1830年的伦敦人”被多方用于教学和展览中。边沁不仅在自己身上贯彻了绝对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功用理性，而且也把它作为自我教育以及自我压制的方案成功

地留给了后人。

这一疯狂理性的意图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重要方面。第一是绝对可视性原则：“可视性是一个陷阱”（Foucault, 1977, 第257页）。所有人始终处于被观察的状态之中，但又不知道此刻是否真的有人在观察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会养成一种行为习惯，即觉得自己受到别人观察的人会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说明，在边沁时代还并未成为不言而喻的资本主义常态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是具有相似性的）。

第二是个人之间相互孤立的原则。这里情况也类似：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行为模式，就可以除去单人牢房的墙壁和隔板，而个体们仍会照样将自己看成孤立的生物并相应地待人处事。由霍布斯开始，纯粹在理论中假设的“分离的个人”被有意识地在构筑全景圆形监狱的过程中制造出来，并成为附着在人们头脑中的自我感知。

第三条原则是借助器械、组织形式、建筑物、座次等手段使得行为模式在外表上失去主体，所以，资本主义的命令会“通过躯体、表面、灯光和目光的集中排序”自动涌入“一个装置中，其内在机制建立的关系对个人具有约束力”（Foucault, 出处同上，第259页）。

最后的第四条原则是使暴力、统治、纪律训导、施加影响等行为脱离个性。这不仅发生在自行调节的市场经济总体机器的宏观层面上，也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微观领域。边沁不无自豪地说，彻底公开的机制所具有的绝对透明度和简易性使得即使没受过教育和甚至愚蠢的人都有能力进行监督。“几乎任意一个个人都能操作这台机器：除了经理以外，也可以是他的家人、他的客人，甚至他的仆人”（Foucault, 出处同上，第260页）。

列宁认为，在国有社会主义中，“每个厨娘”都能“统治国家”（或至少应以这个能力为目标）。在全景圆形监狱逻辑的明示下，他的观点获得了非同小可的意义。我们会突然发现，这里的

目的根本不是要解放厨娘（正如康德要求人成熟也并非要将人从压制性原则中解放出来一样），而是要以这种方式持之以恒地使社会的工作机器和利用机器独立于个人，使得无论是厨娘还是专家都能发挥监督的功能。

因此，其目的是达成主体和客体自行压制的同一性，使之成为“美妙机器”普遍的作用方式。自由主义“自我负责的机器”中同一的主客体将监督与被监督等同起来：所有人都自我监督，并以一种无主体的理性的名义、即在“劳动”和“利用”的独立体系理性的名义下互相监督。

所以，教育专制的完美状态是自我教育专制。而且这一消极的自决权被在物质、组织形式及社会心理方面深入进社会的微观躯体中的种种模式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支撑、塑造并预先定义了，而人们已经不再能有意识地察觉到这些模式的压制特性。“厨娘”是如此兴致勃勃地参与统治：她积极和习惯性地加入公开化和客观化的监督机制，和其他所有人一起每天为自我压制的钟表上弦，办法是通过自己参与监督而受到监督。

让人对列宁的“厨娘”产生出前所未有的联想并不是边沁文章中出现的惟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将他的想法不是与恐怖的现代化专制，而是与最高发展程度的、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时，边沁的可怕之处才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我们不禁要猜想，全景圆形监狱的全部原则恰恰早已在“自由”的西方世界中（并且只在这个世界中彻底地！）得到了贯彻，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容忍着彻底的市场经济，只因为我们是过去的牺牲品被驯化得具备了自动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后代。

一眼就可以看出，边沁之言比奥威尔的“1984”年早了将近200年。但是，他这样做并非只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而且也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种在当年还闻所未闻的结合），因为他将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奉为典范。在他看来，民主作为一种真正的自

我控制与全景圆形监狱的原则达成了完美的一致。民主是受过全景圆形监狱磨炼的、自行调节的主体的统治方式，他们渴望地追随着市场经济的种种苛求，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驯服工具，穿着器械构成的外界环境的紧身衣而“自由”地相互交往。所以，这些人的自决权恰恰体现在，他们作为自行调节体系的巴甫洛夫式的狗，在听到体系命令的铃声信号时自动流出口水（据说是英勇的猛兽真正的“第二自然天性”）。于是民主无非是凝固的专制，由那个市场经济体系妖魔的“看不见的手”实施的幸福专制。伊曼纽尔·康德和亚当·斯密都通过大量夸张的理论来阐述，将这个怪兽标榜为世间的新上帝。而它的心胸狭隘而且冷酷无情的历史教官会像杰里米·边沁一样，成为思想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仅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已经具有凝固的专制特性。在它所有的机构中都渗透了全景圆形监狱的痕迹。在四面开放、一目了然的现代大型办公室里，职员们坐在一个巨大的展示台上；快餐店开放、透明的大厨房使得工作人员始终暴露在观众的目光之下，这些都与全景圆形监狱如出一辙。伴随人一生的评分、评价和成绩单，编号、姓名牌子、证件和身份证体系都是圆形全景形监狱原则的“成果”。

人们应当公开组织一次竞赛，让隐藏在我们民主的环境中并且其本质不再为我们所认识（被专制制度腐蚀的行为轨迹）的全景圆形监狱的要素、规定、建筑和器械等重新显露原形，并批判性地理解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民主终极阶段。这样做是为了认识到，自边沁以来的现代化专制制度无非表现为市场经济的民主或民主的市场经济这两种机制原型，而如今我们由于“别无选择”，自愿地蹲在惟一的边沁式的整体监狱之中。尽管聚集的“监视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让我们感觉自己处在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和无法意识到的监视之中的那只硕大的眼睛，即“专制国家”的眼睛，不属于任何人类“监视者”；它是已经



附着在我们灵魂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则的无主体之眼：即所谓的自我审察和密切注视内心世界的、我们的“第三只眼”。

### 恩惠号上的哗变

口是心非的自由主义者利用“自由”和“富裕”的双重谎言来描述关于谋求解放的兔子与刺猬的游戏：当欲盖弥彰的急剧贫困化使得所谓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一句空话时，他们就把资产阶级“自由”作为伦理价值观提出来；当在某个地方暴露出对“自由奴隶制”的专制以及自我摧毁的特性时，他们就以口头保证提高生活水平来作为安抚人民的额外奖赏。为此，官方的舆论以及它的种种机构敢于伪造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并牵强附会地粉饰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困化。在必要的时候，连贫民区也被描绘成“绚丽多彩的风景”，或许有一点肮脏，但却洋溢着生活的欢乐，充满诗情画意。就这一点而言，自由主义玩世不恭的经典作家们对奥威尔式“真实谎言”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世界顶极大师的水平。例如，亚当·斯密竟敢面对着前工业化及工业化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状态扬言说：

“很显然，英国每个工人现在的收入比他养活一家人所必需的费用高得多……劳动的实际报酬，即人们可以用它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用品的实际数量，在本世纪中可能比名义工资增长的幅度还要大……”（Smith, 1978/1776, 第64及以下数页）

看到这儿，读者不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就在几页之前，这位作者还义愤填膺地针对“非自然”的骚乱和雇佣劳动者的联合作了如下陈述：

“无论他们联合是为了进攻还是防御，他们都会让天下不得安宁，因为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大声地叫嚷，以逼迫人们尽快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作决定，有时候连粗暴的武力和侮辱都无法吓退他们。他们是那样的绝望，他们的行动中充满了那种……快要饿死的人……的愚蠢和极端。”（出处同上，第59页）

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骇人听闻的矛盾，但是这一矛盾不会对斯密及他的评论者造成特别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所谓充足的生活物资和实际工资奇妙的增长似乎“自然而然”地与“挣扎在饿死边缘的人的绝望心态”和谐地相随相伴。如果人们看到，斯密是这样理解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话，这个问题就有点清楚了：

“眼下，在英国的广大地区，土豆的价格只相当于30或40年前的1/2。芜菁甘蓝、胡萝卜和白菜的情况也一样……对于工人来说，衣服的价格更便宜了，质量也更好了，因为人们在生产亚麻布料和毛料的工艺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相反，肥皂、盐、蜡烛、皮革和发酵饮料贵了很多……但是，相对贫困的平民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是很小的，因此它们价格的增长远远不会抵消许多其他商品价格的下降。人们通常抱怨，奢侈的生活已经扩展到最低层的人民之中，连最穷的工人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满足于普通的饮食、服装和住房。这些情况应使我们确实相信，工人的名义工资和他们的实际收入都提高了。”（出处同上，第67及下页）

把充足的土豆、芜菁甘蓝和粗麻布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相比之下，比较富足的中世纪后期早已经被遗忘了），与此相反，把穷人买不起的肥皂和盐说成是对他们“不太重要”（让我们回想一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关几十年以后德国情况的

陈述吧)——自由主义的厚颜无耻几乎达到了令人不得不佩服的程度。而斯密则援引“高收入者”对人力物源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的无耻抱怨来绝对地“证明”他关于富裕程度增加的观点之正确,这又比前者更胜一筹。他诚恳地补充说,“在英国的任何地方,工作收入的下降还没有达到我们认为是泯灭人类的地步”(出处同上,第64页)。

这是历史上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为由资本主义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人为贫困找到的一种奇怪的安慰。在市场经济中变穷了以及正在变穷的人应当愉快地享用他们贫困生活中的“相对富足”,而这种相对富足据说已经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匮乏境况远远超出了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条件——这种虚构和歪曲是如这样的成功,以至于它渐渐渗入了现代的大众意识。曼德维尔在他关于《蜜蜂寓言》的文章中已经练习运用这一原本荒谬的论证方法:

“假如有人想在一个穿着粗制衬衣、外面套着厚厚的贫民罩衣走来的男人的简朴衣着上寻找奢华的痕迹的话,会遭人耻笑;然而——为了生产这种最常用的约克郡布料需要多少人从事多少种不同的职业以及运用多少不同的技能和工具?”(Mandeville, 出处同上,第152及下页)

半个世纪之后,为了给现代社会的穷人捐献一些荒谬的安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关于庆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诞生的章节里完全全地使用了同样的论证方法(他显然是抄袭了曼德维尔的原文,甚至没有注明出处):

“人们只要看一看发达国家和正呈上升趋势的国家里一个完全普通的手工业者或按日取酬的临时工的衣着就立即可以发现,所有为他的生活所需做出了大大小小的贡献之数目

超出了我们所有的估计。临时工穿的毛外套，即使看起来那么笨重、粗糙，它也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成果。即便生产这件很简单的商品，也需要牧羊人、羊毛分选工、羊毛梳理工、染色工、羊毛柔顺工、纺工、织工、毡合工、裁剪工以及许多其他的工种的分工合作。”（Smith, 1993/1776, 第 14 页）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穷人应当自我安慰地想，即便他们寒酸的穷人装束也是由那个极其复杂的、令人钦佩的、将所有人转变为它运转的小轮子的“美妙机器”生产出来的。为了使这种想法具有说服力，曼德维尔和斯密这两位先生又不谋而合地将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社会中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友善地勾勒出来。已经运用了先人“吃橡实”画面的曼德维尔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援引过去的黑暗年代，为了让现代社会中的穷人津津有味地享用他们在“厚厚的贫民外套”里拥有的“相对奢华”。

“毫无疑问，在远古时代，人以生吃大地上的果实为生，并与其他动物一样，赤裸着身体在他们共同的母亲的怀抱里小憩。”（Mandeville, 出处同上，第 152 页）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斯密在他的时代相应地指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是自 18 世纪以来被欧洲现代化思想意识及其哲学先锋视为在人类发展程度的线形图中处于“最低”阶段的非洲“野蛮人”的光明出路。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野蛮人”竟然被与远古时期“野蛮”的、未开化的人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生动而直观的教学工具（此外，也在纯哲学意义上只被当作动物来看待）。这里，亚当·斯密构思的动物人同样出色地充当了粉饰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的比较尺度：

“然而人们应当考虑到，欧洲的诸侯与勤劳、知足的农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也许要小于后者与非洲某些完全控制了成千上万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之生命的和自由的统治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Smith，出处同上，第15页）

就其可信度而言，曼德维尔和斯密等理论家碰上了倒霉事，因为在他们的那些被夺去财产并且遭受侮辱的同时代人和英国的同胞中，至少有一些人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考察凭空杜撰的那个将头枕在光秃秃的大地上的“赤裸的野人”的形象。战舰和商船上的水手是遵守监狱纪律原则的“自由”英国人，他们被上司用棍棒殴打，常常只能以变质的食物充饥，属于“穷苦的劳动者”中最贫困的一类。他们有足够的机会直接接触到“野蛮人”，亲眼看见他们还没有被殖民奴役摧毁的真正生活情况。

由此产生的对比与曼德维尔和斯密描述的完全不一样。一场著名的事变揭露了自由主义思想家这一虚构中包含的欺骗性。这就是“恩惠号上的哗变”。当然同类事件并非只此一例，但是它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其本来的时代背景在就此改编的冒险故事及儿童读物中被淡化了，因此，在保存下来的文献中，它显得尤为突出。1789年4月29日，当“恩惠号”战舰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将近两年之后，船上的大部分水手发动了反对海军上尉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船长和他的军官的哗变。

布莱曾是著名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船上的导航员，当时库克正在进行他的第三次探险航行，也就是在这次航行中，他被海岛居民打死了。当布莱掌管了“恩惠号”之后，即使按照英国舰队的标准，他也是一条特别“冷酷无情的狗”，对他的手下从来一毛不拔。以“恩惠号”和它的命运为题材的小说，常常把人们无法忍受布莱的虐待描绘成水手哗变的根本原因，但故事从未就此深入。有关这场哗变的文献资料

由约翰·赖因霍尔德·福尔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和他的儿子，德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乔治·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在1791~1793年间翻译成了德文，乔治·福尔斯特曾参加了詹姆斯·库克于1772~1775年的第二次探险航行。重新改编并出版了这些材料的赫尔曼·霍曼（Hermann Homann）为布莱船长辩护道：“与那个时代的所有船长相比”，他显然“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也绝对不是一个“残忍的人”（Homann, 1973, 第15及下页）。在谈到这场当时“在英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取得了众多人的支持和反对”（出处同上，第13页）的哗变之真正动机时，布莱船长本人在他真实可靠的报告中作了甚至让人吃惊的陈述：

“现在人们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哗变。对此，我只能根据我的猜测回答说，因为叛乱者期望在塔希提岛上获得比他们在英国也许将要面临的更加幸福的生活。我认为，这一点与他们与塔希提岛上的一些妇女的关系是这场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塔希提岛上的妇女体态健美、温柔、开朗、富有感情，而且善于让自己成为男人青睐和爱慕的对象。塔希提岛上的上层人士非常喜欢我们的人，鼓励他们留在自己身边，甚至答应给予他们岛上可观的领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海员受到诱惑，愿意在这个不需要他们劳动又洋溢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纵欲诱惑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的地方住下来，是毫不奇怪的……到过这些群岛的不同船只上都发生了逃跑事件，但是船上的指挥官都成功地让岛上的头领交出了逃兵。而我的人也许正因为知道逃跑是不保险的，因此才想出了占领整条船、哪怕只是条小船的主意。”（Bligh, 转引自 Homann, 出处同上，第148及下页）

这里，布莱船长代表的当然是“劳动”世界的资产阶级官方，从此立场出发诅咒不愿为积攒资本服务的人力资源的“纵欲”；但是在他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无意中揭示出一个事实，即叛乱者和潜逃者发现，甚至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都比在文明的英国要幸福。普通的水手和下等军官〔叛乱者的头领是弗莱彻·克里斯蒂安（Fletcher Christian），据布莱说，他甚至是“上等家庭出身”〕显然认为，那些“野蛮人”比资本主义和英国海军的苛求要文明得多。因此，“恩惠号”上的哗变，归根结底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在历史上遭受的一次耻辱。

“恩惠号”的命运如何呢？叛乱者乘坐夺取来的船只驶向了塔希提岛。但由于英国政府的追捕，他们在那里得不到安全感。因此，他们带上自己当地的妻子以及一些喜欢冒险的塔希提岛上的男子，开着船在太平洋上盲目地漂泊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偏远的皮特克恩小岛上定居下来。这一乌托邦式的景观后来变成了一场灾难，但不是经济上的灾难：这些刚刚逃离了自己的统治者的白人水手开始以最恶劣的嘴脸暴露出白人对“土著人”天生的统治欲。随之发生了谋杀、争斗、酗酒和疯狂。直到10年之后，最后一个幸存下来的叛乱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才成功地依凭自己关于“基督教社会”的设想，将10个女人和在此期间在皮特克恩岛上出生的19个孩子组成了一个能够存活的集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皮特克恩岛上的人偶尔被人发现，但又总是再次被遗忘。哗变渐渐成为了历史。于1825年12月登上皮特克恩岛的英国船长比彻（Beechey）描述了他在那儿见到的“古怪而感人的事实”。

“他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到处可见被露兜树和椰子树环绕的、简朴而干净的小房子。居民们看起来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养鸡、养猪，田里种着山药、香蕉和芋头。岛上的居民，即

英国男人和波利尼西亚女人的混血儿，长相和善可爱，发达的四肢既灵活又有力。”(Homann, 出处同上, 第 298 页)

不然，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将“恩惠号”的历险记以及皮特克恩岛上的居民区最终看做一个成功的小乌托邦。完全与世隔绝使得这里的人只能利用简单的工具和热带的有利气候条件为自己创造一种还算过得去的存活条件。“恩惠号”上的哗变不是一个正面的，而是反面的例子。其关键不在于岛上的乌托邦，而是因为它对欧洲的资本主义作了毁灭性的判决：甚至连在许多方面都很乏味的、所谓的“原始民族”条件下的自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的劳动地狱和现代化的全景圆形监狱结构更富有吸引力；而且与欧洲“穷苦的劳动者”的患软骨病的孩子们相比，我们还可以说皮特克恩岛上拥有“发达的四肢”的孩子们更加幸福。现在仍有将近 200 个叛乱者的后代在皮特克恩岛上过着也许仍然相当简朴和单调的生活——而且也许仍然（或者又一次）比伦敦、纽约、莫斯科或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的许多人生活得“相对要好”。

不仅“恩惠号”上的哗变事实让正处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产生了幻想，在整个欧洲，无论是市场经济社会模式的支持者还是批评家都对岛上乌托邦产生了兴趣。而且在这方面，英国的“航海式资本主义”做出了榜样。两部直到今天仍为每一个孩子熟知的真正的“世界书籍”抓住了这个题材。早在 1719 年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就出版了《鲁滨逊漂流记》；1727 年由乔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撰写的《格列佛游记》出版了。与其他有强大示范作用力的书籍的通常情况一样，这两部小说一下子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探险读物，而它们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历史上社会变革和社会批判的模式。

很少有人知道，笛福与斯威夫特在这个方面的立场是对立



的。笛福出身于一个信奉基督教新教的“非国教派”家庭，自己是中产阶级商人（但快要破产了），具备了建立资产阶级世界理想的前提条件。他的《鲁滨逊漂流记》一书如同“愚惠号”的故事一样，源自一个真实事件 [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库克 (Alexander Selkirk) 乘船遇难的经历]。他在这本书中勾勒出呈上升趋势的市场经济的积极模式：笛福通过“克鲁索 (Crusoe) 的内心转变，即从一个无所顾忌、不信神明的航海者变成了一个虔诚地管束着自己灵魂并改造着野蛮人的和善的人” (Reisiger o. J., 第 562 页)，描绘出一个理智、勤劳的白人形象。他有计划地从一无所有的状态中创造一个舒适的世界，同时还通过贸易和“工作”使名叫“星期五”的那个“土著”黑人掌握了美妙的资产阶级行为方式而成为一个文明人。卢梭在他的《爱弥尔》一书中将《鲁滨逊漂流记》定为教育大纲中的必读书籍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笛福的另一个小说人物，即“著名的莫尔·弗兰德斯 (Moll Flanders)”与鲁滨逊·克鲁索很相似：“笛福塑造的主要形象与他小说的形式反映了……整个 18 世纪中最重要的发展变化之一：形成了在思维和行为中遵循公共意识，即遵循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社会道德的、自我负责的个人” (Pache, 1979, 第 401 及下页)。但是这里被天真无邪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积极地认为是在赞赏启蒙运动思想的那部分内容，直到后来在康德和边沁自我揭露性的反思中才显露出本来面目：“公共意识”随之就必须破译为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虚伪道德的形态。从根本上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提供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原始模式，因为它为抽象个人和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状况进行自然归类的做法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但是他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构想出一个阴郁的人物形象，而是以早期的进步乐观主义方式并带着少许资产阶级的殷勤——那个自由主义的戈耳戈 (Gorgon, 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译者注) 头部经常使用的伪君子面具。

《格列佛游记》与它完全相反，是一部具有讽刺意味的童话。斯威夫特以自有有人类探险航行以来广为流传的、关于远方奇异怪兽的海员惊险故事为背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进行了彻底的嘲讽。当主人公给“布劳伯丁格里克”（Brobdingnag）巨人国的国王讲述了他的英国故乡的风土人情之后，国王评价说，那里大量的“土著”其实是“一种最有害的、天生注定在地球上爬行的、丑陋的小寄生禽兽……”（Swift, 1991/1726, 第189页）。而在会说话的马的王国里，人是一种肮脏的、受孤僻自私的本能驱使的动物，他们因在自己沾满粪便的圈里堆积“闪光的石头”而荒唐地表现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通过这样的描述，正如在一个后来出版的德文版本的序言中所写，斯威夫特塑造的“格列佛”是在有意识地“反鲁滨逊”。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颇具讽刺意味地效仿了笛福笔下的“资产阶级的人的美德”。

斯威夫特充满着诡秘色彩的尖锐论调在历史上是没有归宿的，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中也包含了很多不恰当的想法。但是与霍布斯所不同的是，斯威夫特塑造悲观的人物形象是要说明，只要人容忍资本主义存在，就只配被称作狗一样的畜生。因此，这位被人诋毁为无神论者的都柏林市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除了“格列佛”之外，给“自由的”资本主义又打上了一个即使在250多年后仍然千真万确的烙印，他的墓碑上不无道理地刻有“强烈的愤恨”这一骄傲的字眼。1729年，几乎与曼德维尔关于《蜜蜂寓言》的那些文章发表的同时，他向资产阶级的公众就贫穷的家长们如何“利用”自己孩子的问题献上了一点惊世骇俗的“小建议”。

“当人们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穿行或在乡间旅游时，会看见这样一幕令人悲伤的场景：大街上、道路边以及茅舍的入口处挤满了乞讨的女人，她们向每一个走过的路人乞求施

舍，在她们的身边围着3个、4个或6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我想，人们都会一致认为，这些数目吓人的孩子给一个目前景况堪忧的王国造成了额外的负担……我们的商人肯定地对我说，不满12周岁的男孩或女孩不是畅销品；即使他们达到了这个岁数，在交易所里价钱也不会超过3镑，最多3镑外加半克郎。这既不能给父母也不能给王国带来任何收益，因为食物和破衣服的费用至少是这个价格的4倍。所以，我现在想略为表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大家对此不会有任何异议。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十分有经验的美国人向我保证说，稚嫩、健康、营养良好的一岁婴儿是一道极其美味、营养丰富而且有益健康的佳肴。无论是炖、煎、烤还是烧，都非常鲜美。我丝毫不怀疑婴儿也同样适合做浓汁肉丁或五香肉丁。所以我非常谦恭地请公众考虑我的建议，从……12万孩子中保留2万人用于育种；其中只需要1/4的男性，这比我们养羊、黑牛或猪的时候规定的数目要多……剩下的几万人，当他们长到一岁，就可以卖给全国的贵族和富人。同时人们要叮嘱母亲在最后的一个月里给婴儿喂足奶水，好让它肥肥胖胖的，可以做成一桌美味佳肴。为招待亲密的客人，一个婴儿足够做两道菜，如果一家人独自享用的话，前面或后面的四分之一的量就够了。烧时加一点胡椒或盐，那么到第四天它的味道还很好，特别是在冬天……我承认这道菜会有点贵，但正因为如此，它特别适合大庄园主，因为既然他们已经吞噬了大部分的家长，肯定最有权来吞食这些孩子。”（Swift, 1991/1729, 第486及下页）

斯威夫特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人物形象的卫道士们，如曼德维尔和他的同伙。这一苦涩的讽刺直至今日仍然贴近现实，因为每一个令人尊敬的资本主义“策划者”即使没有亲手

屠宰或亲自吞食孩子，而只是间接通过无主体的“美妙机器”的功能来残忍地屠杀儿童，他们也对孩子犯下了比希律王更加深重的罪行。

回顾18世纪，如同望见了我们自己的地狱般的未来。我们能不再做“狗一样的人”了吗？这个由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不能借助“科学上”的客观化抹去。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孩童”，他们也同样是在那个时代中的冒险者。一切都无须原谅。笛福、曼德维尔、斯密、康德、边沁等先生陈述了他们对业已存在的市场经济种种客观化趋势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相反又有效地促进了全景圆形监狱体系的进一步客观化。大多数名气或大或小的启蒙运动的现代哲学家（同样还有法国大革命的代表）只是“反对”老朽的统治外壳，而不是反对统治本身。而正相反，他们将新型统治体系无主体的根基，即资本的世界机器，描绘成世间的神灵。他们的思想形成了自由主义把“抽象劳动”和绝对竞争确立为最崇高理论的精神基础，如今，这些观点渗入了普遍的思维方式，好似一场梦魇潜伏在人的大脑之中。斯威夫特绝望的讽刺论调以及“恩惠号”上的哗变都显示出，这一发展决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想证明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必然和直线“上升”的。

但是，首先资本主义的绝对竞争理论与人这种所谓的生物无关。自古以来，大多数人类个体都没有在某种疯狂竞争中成为“赢家”的野心，也无意以钱的抽象形态来积累荒谬的财富或在一个金马桶上解手。如果我们从现代化发展史的阅读中可以得到一点教益的话，那就是，被贬为物质资源的人在内心深处渴望有朝一日能终于得到自己的安宁，能终于不再听命于种种异化结构盲目行使的权力，能终于不再被独立“发展”的动力搞得心神不定和疲于奔命，能终于不必再见到世界机器形形色色的统治者嘴脸，也不必再听到它的教育者、监视者以及管理者喋喋不休的蠢话。

## 第一次工业革命史

---

当亚当·斯密、德·萨德侯爵、伊曼纽尔·康德、杰米里·边沁等理论家正在建筑自由主义的精神大厦时，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了它的活动半径并加强了客观化的程度，但它还根本没有发育成熟。敏捷的思想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而勾勒出的完美事物当时才刚刚在缓慢、笨重的现实社会中萌芽、生长，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全面完备的状态。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仍然局限于大庄园资本主义的世界农业市场、很重要的纺织业领域以及基础性采煤与冶金工业。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梦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恐怖以一种很难定义的方式与社会中对成长中的私有资本主义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旷日持久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弑父篡权式的争执同资产阶级幸福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令人难以琢磨的伪善仁爱一样让人困惑和迷惘。身处这一混乱的历史局面而且必须艰难度日的人，肯定无法轻而易举地将分别来自社会的各种因素统一协调起来。最终整个社会最后陷入了痛苦之中，痛苦在不断加深，这个趋势再也无法扭转。人们又如何才能认清方向呢？

当越来越多在市场上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中产阶级人士察觉到自己的机会到来的时候，这一新体系的能量、匿名竞争的威

胁、贫困和走投无路唤起了大多数人对未来的种种恐惧。尽管自由主义者预言幸福就要到来，可是这个逐渐成长起来的社会经济怪胎已变得面目狰狞，有着惊人的贪欲，令即使还没有被它吞食掉的人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业已建成的根基受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迫不及待地要完成他们伟大的社会理论。黑格尔（Hegel）宣称，世界的主导精神已以它微不足道的形态在立宪的普鲁士国家中苏醒过来，然后就不再改变，再不会有任何新的变革，现在要做的事是建设商品生产体系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使之合乎道义，并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它的必要性。

启蒙运动思想通过为自己打造防御工事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实证主义”。这就是说，它试着将自己限定在资本主义划定的“确凿事实”的范围中，而将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放逐到徒劳无益的形而上学的幻境中去。简而言之：当资本主义和它的市场经济“走狗”占据了历史的桥头堡并在社会中建立了足够坚实的根基之后，这些先生们就可以宣扬“现实主义”了。从此以后，资本主义从未缺少过装腔作势的实用主义者和夸夸其谈的现实主义者。除了市场经济制度、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直到后来才允许用“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名称）不应该再考虑其他任何社会形式。此时，资本主义这部自身即目的的机器和它的基础——“抽象劳动”与金钱的关系——不再受到明确的袒护，而是成了必然的前提条件。而对此提出原则性的批评也不再受到重视，至少不允许出现在官方的科学圣殿中。

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将它的重点逐渐放到了组织科学和自然科学上。由于社会形式据说永远都不再改变，因此那个著名的进步也无法继续发展，而是应当立即单方面地转向技术和自然科学领域。于是19世纪对进步的信仰转变为对技术的肤浅热衷。人们期望，那些在这“空前绝后的极乐世界中”爆发的、被委婉地

称作“缺点和错误”的社会危机在技术至上统治精英的努力下会逐渐被消除。理智爬进了机器，自己也变为机器了：这不再只是比喻，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由于是资本主义的理智，所以按照逻辑也会产生出资本主义的机器。

这一趋势与在上几个世纪形成的世界面貌完全吻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就早已在人的大脑里成形了。在牛顿宣布了宇宙为物理性质的机器，斯密把社会宣称为“美妙的”世界经济机器，德·萨德发明了匿名的性机器以及拉·梅特里（La Mettrie）甚至将人本身定义为机器之后，资本主义的“世界精神”转而研究以它自己的设想为蓝本的工业技术发展只能是合情合理的了。同时，资本主义思想的这一要素也使自己客观化了，而且是在竞争动力的推动之下。资本主义企业越多，大型市场的网络越密集，人就越能感受到竞争发挥出的“缄默的强制力”（Marx）。为了让自己供应的产品保持市场竞争力，市场参与者被迫不断地“提高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在竞争的马达开始飞速旋转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尽管亚当·斯密已经见识了机器，但他认为，新的生产力的最大优势还主要体现在手工制造业的劳动分工中。但之后不久，机器的使用就独自操纵了企业劳动分工的发展。工业革命从有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并已酝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英国开始并非偶然，因此英国也率先成为技术革新者的故乡。早在1733年，约翰·凯（John Kay）就发明了飞行的梭子，所谓的“飞梭”；1765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1771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织布机。到19世纪初，英国各自分散使用新机器的生产者聚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工业体系的萌芽。工业化必然首先发生在纺织品生产领域，但蒸汽机很快就在其他的生产领域得到了多种运用。

欧洲大陆上的人开始只是在一旁观望，然后惊讶地发现，在

那个不受欢迎的邻国里释放出一种显然将人类带入一个新时代的巨大能量。1820年前后，歌德在他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描述了还没有被卷入竞争角斗的纺织工人的居住区。这位诗王用亲切但仍不失倨傲的语气写道，那儿的人在“简单而清洁”的房子里，一边工作一边还能愉快地唱歌、聊天：“悬挂的笼中不时传出黄雀和金翅雀唧唧喳喳的歌唱，很难找到比这更生机勃勃的生活画面了……”（Goethe, 1982/1821, 第347页）。但是工业竞争的乌云已经显现出来，歌德描述了纺织手工业者的情绪：

“虽然心中充满了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的忧虑，但他们仍然愉快地……沉浸在平和的气氛之中；因为国内的机器越来越多，并已渐渐威胁到手工业者劳动的双手，使它们无所事事，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仍给自己摆出一切获得安慰和希望的理由。”（出处同上，第346页）

当工业化在英国高速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德意志土地上才有了很少的几台蒸汽机。尤其在小诸侯国中，手工业行会能较长时间地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18世纪扼制机器大生产的萌芽出土。因此，如在库尔-萨克森地区，1765年之前普遍禁止使用机器（Abendroth, 1965, 第13页）。强迫加入行会做法的取消也并未立刻促成生产方式的改变。直到1820年之后才发起了工业化运动，而且动力来自外部。因为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强烈而痛苦地感受到“便宜的英国布”的竞争力。在此准备阶段中，也是作为对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反应，德国的各界人士也逐渐意识到工业化的问题。

与欧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情况一样，关于所谓赤贫这一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和使用机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美妙”的



社会竞争机器协同采用蒸汽技术的机器可以压过人群并在社会上把他们轧扁碾平的事实看起来是不合理、不道德，总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可尽管如此，成熟起来的竞争现象已经作为一种自然的强制力而被接受了。因此，1844年2月，《亚琛报》以外来竞争的强制力为由，为西里西亚的中转经销商的残酷行为辩护，而且没有忘记之后挤出几滴仁慈的鳄鱼眼泪：

“当从其他地方来的商品因产地的有利条件而更具竞争力时，必须降低价格。在这些有利条件中，最主要的是投入的资本比较低廉。假如这些条件的有利程度超过关税的话，那么外国的工业就会抑制本国的工业的发展。即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也仍会迫使国内厂家将工资降低到能够抵御外国厂家竞争的水平，但结果必然是本国工人工资的缩减。在上西里西亚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帮助不幸的人是高尚的行为。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赶紧来阻止这一灾难吧……”（转引自：Kroneberg/Schloesser, 1980, 第74页）

由此引发了一种“所在地辩论”，直到今天，它仍在比那时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中进行着。当时正在萌生中的国际竞争造成的完全现实的压力被用作社会压榨的工具，以进一步加深纺织工人的贫困程度。人们非但没有因此而结论性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站不住脚的，反而希望某一天从机器中能诞生出一种自然科技之力，使他们得到解脱。人民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神话的无知促使拥有健康理智的人以机器能节省劳力而造福人类为由，来掩盖其将要造成的社会危害。因此，鉴于织工的灾难，《西里西亚特权报》在1844年1月就工业的未来作了详尽的论述：

“机器到来了，它是先进时代的产品，也是整个人类文

明和国民工业发展的结果……假如 100 个手工纺纱工人用整整一周的时间都没有能力达到一台机器一天或一小时内的产量的话，那么让 100 个人去做一项依靠自然的力量、通过机械的力量可以完成得同样出色的工作，难道不愚蠢吗？把一切机器可以承担的工作由机器去承担，然后将高贵的人力用在机器无法完成的事务上，这绝对是更人道的原则。机器是上帝手中解救人类、唤醒人类尊严意识的工具……”（转引自：Kroneberg/Schloesser，出处同上，第 70 页）

鉴于这些地地道道的织工们自己面临的现实困境，这篇关于未来工业化的短文却只能建议他们随便迁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可是，新机器引发的贫困化和日益逼近的大规模失业的后果不容忽视。很久以来，也有人对被实证主义阉割的进步信仰逐渐萌发的技术狂热提出了警告，即使是用一种茫然无助的声音。因此，当经济学家卡尔·冯·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于 1840 年在“国家词典”中谈到在德国也即将进行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时，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即使有无数值得我们热情颂扬的地方，但同时仍有一个方面使得机器的作用显得不太确定，甚至是有害的。如今在国家中，刚刚形成了令人羡慕和憎恶的富人与遭到蔑视和畏惧的穷人之间的敌对分裂局面。穷人不仅缺少为富人服务的赚钱工作，而且他也失去了作为自由或独立生产者从事按劳取酬的工作的机会。他依靠自己双手（只借助简单的工具）的辛勤劳动所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已经不足以养活他自己。”（转引自：Treue/Manegold，1966，第 194 及下页）

但是，这类悲观的想法仍是少数现象，也没有任何结果。几

乎很少被从这个角度去看待的资本主义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形态成为了社会的自然现象，其自身矛盾如今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想到可以通过机器来节省劳动力。为什么这个变化没有提高社会的富裕程度和解决社会问题呢？这是一个（直至今日）需要回答的价格大问题。

## 企业经济理性

在资本主义这个庞然怪物诞生之前，虽然也已经存在为规模较小的手工业生产而设的市场：与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农民一样，手工业者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家庭为基础，这就是说，各工种之间不存在广泛的合作。生产中较为稀疏的联系使得人们有必要通过交换并以此通过市场来填补社会化过程中的空缺。但是这些市场，不仅大部分局限于某一地方和地区（也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缓慢），而且也缺少竞争机制。因此，他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为什么会缺少竞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市场没有成为独立的体系。尽管手工业者的生产是分离的，而且各自为政，社会化过程只能通过市场以成品交换的形式进行；但是这一交换既不是匿名的，也非遵循盲目的机制。因为交换商品的人相互很熟悉，而且他们相互之间还在某种组织中（行会、委员会等）进行元信息交流。这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规划”市场总量。需求与生产被有意识地协调起来。这就是说，针对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一定的需求水平，必须严格限制生产者的人数。只有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各个生产部门相应增加一些生产者。这样应能保证生产与消费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其中包括相互购买力的相应平衡。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只存在于巨大的农业自然经济的边缘）没有竞争的容身之地。

在必要的时候，这一严格的调节也在生产方法中实施。因为在实际生产的相互分离状态中，始终潜伏着抽象的竞争可能性，即试图通过改良的生产资料而牺牲同行的利益来争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以这种方式夺去别人的面包被认为是可耻的行径。为了强调对道德标准的共识，大多数行会颁布了一条严格的禁令，不允许通过技术革新改变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因此，比如托伦市的行会规章里写道：“没有人应该设计、发明或使用新东西，而每个人应当出于对其他公民或同胞的爱护，与他人保持一致”（转引自：Eichberg, 1975, 第18页）。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单个生产单位的**经济核算**，也不会有如今被称作“企业经济学”的东西。与此相反，只存在一种已形成传统的技术流程，即一种收集原料加工方案的方式，其中还掺杂着规范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师傅与学徒之间、主人与雇工之间）的道德标准。行会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会议的职责是监督社会经济结构、调解争端，并在监督之下最多做细微的改进。

这一体系的大部分结构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的干扰，只是各种税费还是使它有了一道经济的裂口。从它旨在达到社会均衡及所有社会成员（但只是有限的）的和睦相处这点上看，它本身决非无理性和破坏性的。但它又是狭隘的、因家族亲缘关系而愚钝的、微不足道的、停滞不前甚至僵化的。它的毁灭并不是由内在原因造成的，并非因为它的内部成员发动的解放运动超越了它有限的范围。这一巨大的压制力来自外部，即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和此后自由主义的自由企业界提出的过分要求。大型匿名市场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独立化引发了过去遭到最严厉唾弃的竞争。同时诞生了“企业经济学”，这意味着单个生产单位的独立经济核算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核算，并废除了进行调节性元信息交流的机构。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机器也就不再是以往行会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会议扩展和改良之后的产物，而相反成为专

制主义的畸形产物，是一种摧毁生产者之间的自主交往以使他们遵从一个抽象、独立体系的法则的外在和陌生力量。

使用节约劳力的机器从根本上来说是另一种历史抉择，在此背景下弄清楚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要长时间地阻止人类发明的想像力和行为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全面竞争。节约劳力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所造成的影响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就是让人少工作、多一些闲暇时间的绝妙境况。

因此，打破对家庭生产单位及行会的谨小慎微的狭隘性本来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达成对发展生产力的共识来实现，办法是经常重新讨论并共同确定以扩大生产和需要为一方与缩短工作时间及延长闲暇时间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当然就要求通过一种共同商讨筹划的、日益密切相连的生产方式来消除市场关系与分离生产者的委员会式协商交流并存的现象，并且改变过去控制市场总量的做法，自行决定如今直接社会化的生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产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才有可能与所有人工作时间的缩短相平衡。

有证据表明，通过共同协商可以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技术革新。在所谓的中世纪，就完全可以断定，生产者通过自主的解放运动而大力推进了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中世纪的社会团体，甚至行会都并非普遍反对发明；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也出现了节约劳力的发明创造，如水磨或矿山里的挖掘机。只是人们遵循着一条原则，即新发明不能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食物”。因此从根本上看，在这个意义上在监督之下共同发展生产力是可行的。

但在这种可能性得以考虑和尝试之前，由专制主义引发的企业经济单位在大型的匿名市场中展开的竞争就强行抢先了一步。英国的“贵族”地主们和私人佃户与拥有奴隶和大田产的农业资本家、国有手工业工场的管理者、纺织品生产行业中的资本主义中转经销商以及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体系中最早的“自由”企业

家一样，不拥有生产者原有的交流体系。对他们大家而言，机器的投入使用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即他们是从面向匿名市场的竞争企业的独立企业经济理性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机器在节约劳力方面的潜力仅仅用在延长生产者的闲暇时间上简直是根本不理智的，甚至疯狂的。为了赢得更多的或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生产力的提高必须完全用于竞争。当生产者本身之间缺少交流，生产与消费的比例没有有意识地通过协商来确定时，就只有一条法则：根据企业经济学的狭隘视野不惜一切地“降低生产成本”，以形成“竞争力”。因为所有匿名的市场参与者始终处于这一强制力的控制之中，所以生产力才会持续发展，但因生产者之间完全缺少交流，所以它造成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在矛盾可以从诸多层面上体现出来。企业经济“理性”不是缩短所有人必要的劳动时间，而是要求一些人完全“失业”，彻底失去了生活资料，而让另一些保住了自己“工作”的所谓幸运者却反而甚至要延长工作时间，并提高工作强度。因为依照这种方式可以加强竞争优势。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让较少的劳动力更多更长地工作，意味着进一步改善企业经济关系中资本支出（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与产量或者由此可实现的货币收益之间的比例。企业经济学中的经济核算仅以这一抽象的、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投入产出比为标准。

但是这种核算不仅引起了相互矛盾的社会后果，并证明了企业经济理性是社会性的神经错乱，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由此陷入了无法理顺的逻辑性自相矛盾之中。因为一方面，它本身要将“抽象劳动”的积累荒谬地转变成经济“价值”的积累，表现为货币资本以增加自身为目的的跳跃式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伴随着生产力加速增长的疯狂理性又不断地用科技的推动力来取代人的劳动而因此自己损害了“增值”的实质。如果越来越少的

工人生产出越来越大量的产品，那么这一进程从某一点开始就不再能表示“增值”及货币增长了。在市场上，这一自相矛盾状态最终必将表现为产品数量的增加与购买力的衰退之间的极端失调。

所以到最后，被康德和斯密尊为人间上帝的、无主体也无交流的资本机器或市场机器的“看不见的手”根本不可能实现普遍富裕，而只能将人引入一个根本上自相矛盾的状态并随之引入独立市场体系的社会危机之中。资本主义这一内在的危机隐患是毋庸置疑的。它证明，社会各机构中人与人的交流被匿名市场上的商品与它的价格之间自相矛盾的交流取代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买主与卖主不再是由共同的社会交流统一起来的同一概念，他们发生了分离：甚至个人的情况亦如此，他们在作为消费者时与作为生产者时有着截然相反的利益（因此，如东德加入西德后，原东德的居民因为偏爱使用西德的产品，而为他们自己的生产基础的崩溃做了贡献）。无声的价格机制取代了人这个行为主体有意识的自我认识。由此产生的盲目的、无法对话也无法协商的体系进程理所当然地再次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之中，因为这一进程永远只能机械地重复同一个已安装了的程序。恰如一部机器。

于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就得到了解释，即它一方面提高了人的潜力，而另一方面却用企业经济核算的社会反理性一再地制造出新的贫困和危机的隐患。这一理性的错误在于，它系统地否定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特征，并将之引入了相反的方向。因此，机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像应该出现的状况那样必然地和合理地促成过去手工业生产者通过对联网式生产的共同监督而进行的预先商讨式交流，而是与此相反，连基本的交流也被彻底地废除了。

依照这种方式，科技水平的提高必将在竞争者普遍的排挤斗争中被白白耗费了；与此同时，人又通过对他们自己狭隘的、非社会性的个人经济核算的盲目合计结果而相互把自己共同推入一个自我

残害的可怕境况中去。因为这一破坏性的逻辑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直到今天它还始终有效并仍然起着作用。事后所有试图通过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进行的调整，最后都不得不一再地屈服于疯狂的企业经济理性中难以摆脱的内在压力。

### 魔鬼磨坊

在企业经济核算的支配之下，第一次工业革命非但没有减缓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反而使之更加恶化了。处于边缘位置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廉价奴隶劳动的竞争与劳动分工式的国家手工业工场的竞争由于机器体系的竞争而加剧了。因此，在新工业时代的最初阶段已经出现了第一次由工业技术导致的结构性大众失业，同样的情况现在重新出现在高得多的层次上。但是在19世纪早期，失业要归咎于形成之初的工业体系的转轨。首先受到牵连的是走下坡路的手工业生产者，如今，他们不得不最终投降认输了。此外，失业主要集中在大型的、仍然有典型性的纺织工业生产领域，而在其他的生产领域里，老式的生产方式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英国，甚至在整个欧洲，纺织手工业完全被便宜的英国产品摧毁了。歌德笔下的1820年纺织工人的悲观情绪完全是合理的，连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也是间接由机器竞争引起的。整个中转经销业和对此具有依赖性的家庭工业渐渐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配备了越来越多使用蒸汽驱动力的大型机器设备的工厂。与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织工们有着同样境遇的、受中转经销商盘剥的“穷苦劳动者”全部遭受了失业的厄运，社会的荒芜化趋势席卷了整个地区。

16世纪以来，由于奴隶主大庄园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和英国地主血腥的圈地运动，农村居民的大批失业和流离失所达到



了第一次高潮。一贫如洗和背井离乡的农民涌进了以伦敦为首的城市，并在那儿不断扩增的贫民窟（“泥泞区”）中形成了“失业”社会渣滓的百万大军，城市也因此急剧地膨胀和密集起来。我们今天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处处可见同样的发展过程：一些人被迫屈从世界市场种植园中的奴役，而另一些人迁进了居民已达一两千万而且人口仍在不断增多的城市里的贫民窟中。过去的伦敦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幅“第三世界”的恐怖画面（如今在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统治下再次出现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失业浪潮，它迅速地席卷了整个纺织手工业领域。大批失业的纺织生产者加入了当时广大农民的贫困队伍之中，而且由于市场上的竞争，这一进程也大规模地向欧洲大陆上扩散。只有一部分失业者在正形成中的工厂体系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但是以何种条件！完全失去了根基的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变卖自己，屈从于糟糕得难以形容的工作方式。在半奴隶化的农业工人、乞丐、流浪汉、劳动教养者和贫民院的居民以及沦为贫民的临时工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穷苦劳动者”类型：工厂无产者。

面对着这一屈辱人的事实，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像伟大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们那样表现出一副如此漠然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当吉约坦（Guillotín）医生的公民“美德机器”开始运作，和自由主义的冷血动物边沁设计出他旨在节省开支的鞭挞机器的同时，英国的神秘主义者及早期浪漫主义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用灰暗的诗句攻击了正在形成中的工厂体系的噩梦：

上帝的容颜  
是否曾在我们阴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  
而耶路撒冷

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常常被现代语文学家（和已经是“高度文明”的同时代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的诗人布莱克，据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说，实际上代表着“悠久的民族传统中惟一没有变质变味的声音”（Thompson, 1987/1963, 第57页）；而且恰恰上面那段诗中的最后一句经证明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形容：“魔鬼磨坊”成为工厂的别称而时常被人引用。受到资本主义屈辱和压迫的人们也会从心灵深处体会出其中的含义。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作岗位”实际上是真正的地狱洞窟。无节制的企业经济核算恰恰是借助节省劳力的机器强行建立了一个彻底榨干劳动者体力的、残酷无情的劳动政权。这不仅涉及当时直接的工作条件，也涉及普遍的生活条件。私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工厂体系不仅保留了国有手工制造业体系的最恶劣的情景，而且超越并推广着它。

关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地狱有着许多文献和研究报告。对这一内容，德国的一位年轻学者于1845年撰写的著作到目前为止仍旧无人能及；他是乌珀塔尔一家纺纱厂厂主的儿子，在英国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并怀着浓厚的兴趣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研究了工厂体系中出现的新的“工人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25岁时撰写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因其对当时工厂情况颇有独到见地的分析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为从根本上了解企业经济的合理性中所包含的社会毁灭机制提供了依据。

当然，特别引起了人们关注的是“魔鬼磨坊”的观点。如今，中欧西部资本主义中的普通公民认为这种情况已经被消除了，并兴致索然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糟糕、但早已过去的时代中的可怕童话。这种可怕的状况主要是由不人道的工作时间长度、

童工以及绝对贫困的生活条件构成。如果说，自16世纪开始的早期资本主义一再逐步地延长了工作时间，那么这种情况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厂体系中就愈演愈烈了。企业经济核算促使日工作时间延长到12、14、16小时，有时甚至更长，而儿童是最不受保护的。市场经济吞食儿童的野蛮之举从社会中尚不普遍的贫穷乞丐（如斯威夫特所描述的）的间接方式转换为工厂吞噬儿童躯体的直接方式。甚至原本对自由主义的企业界完全持友善态度的特派调查员也被这一地狱酷刑吓坏了。恩格斯引用了特派调查员楼顿（Loudon）博士的有关调查报告：

“我想，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孩子必须工作的时间达到了违背理智和无情的地步，连成人也必须承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忍受的工作量。其结果是，许多人提前死亡，幸存者也落下了永远的生理缺陷……”（Engels, 1976/1845, 第381页）

因此，这就是节省劳力的机器在“提高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产生的社会效应。资本机器对于人类抽象劳动量无止境的贪欲真是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对此年轻的恩格斯无比愤怒地写道：

“当人们开始读到孩子们经历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待遇，他们是如何被看守光着身子从床上揪起来，衣服还搭在膀子上就被拳打脚踢着赶进了工厂……他们是如何被从梦中打醒，他们是如何干着活就睡着了，当机器停止运转之后，一个还在睡梦中的可怜孩子是如何在看守的呵斥之下跳起来，没睁开眼睛就继续转动机器的手柄，当人们读到，孩子们是如何累得回不了家，躲在烘干房里的羊毛下睡觉，最后被人

用鞭子赶出工厂，成百上千的孩子是如何在每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疲惫之极，又困又没有胃口而吃不下晚饭……当人们读到这一切以及这个报告中其他几百个千真万确、有许多人做证的可耻和丑恶的事例……当人们想到……特派调查员自己属于资产阶级一方，他报道的这一切全是违背他的意愿的——那么人们难道就应该以无所谓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一边吹嘘自己的仁慈博爱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一边关心的只是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地填满自己钱包的阶级？”（Engels，出处同上，第388及下页）

也许恩格斯读边沁的书还不够多，所以无法理解这一切并把它看做是“自然”而然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冷酷无情，恰恰是因为它不是纯粹来源于人对利益的主观贪欲，而是从竞争和企业经济合理性的结构条件中产生的。这些条件会借助一个人受制于经济的行为的效应，将哪怕最温柔的人都物化成连残暴的集中营看守都难以想象的惨无人道者。

能够大规模地“使用”童工也要归功于机器，它不仅本身节省体力，也用蒸气力替代了人力。儿童竞争力不强，又缺乏组织能力。因此，使用童工和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时间一样，都是因经济核算而导致的，经济核算的精明手腕迫使男人们不得不依靠童工劳力的低廉价格来竞争。这急剧加速了独立手工业者的毁灭，因为他们无法与机器加童工的组合抗衡。他们的收益下降到无法满足生活最低需要的令人羞辱的程度，对19世纪初符腾堡的纺织工人的一次工资调查报道了这一情况：“自那以后，符腾堡的一个手工纺纱工人每天从6点工作到22点挣得的收入与一个机械纺纱厂里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的孩子相同，而他的收入只有成年工厂女工的1/3到1/2。”（Fischer，1992，第140页）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成年男人失业了，而工厂以低廉的工资

聘用了孩子和妇女。把这些情况纯粹归罪于历史的迷惘，并认为如今它已经彻底被消除了，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即使在西方核心国家中，为了至少让工厂体系粗鲁之极的暴行得到缓和，也需要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只能说明一点：即植根于经济核算之中的自由主义一旦挣脱了缰绳，它就会从根本上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再现资本主义“魔鬼磨坊”丑态的倾向。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时间和无限度地使用童工与属于企业经济合理性结构的工业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只要这一种合理性一天没有被反市场经济的解放起义摧毁，这种情况就随时可能重现。

实际上，只有历史上很少几个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国家消除了童工现象（即使在这些国家中也不是永久性的）。在人类的绝大多数群体中，工业化早期剥削劳动力的现象，特别是骇人听闻的童工现象从未结束过。如今，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人们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在竞争中与资本密集型的中心地区抗衡的。

一旦经济核算被认可并成为公理，社会意识就出现了美化和歪曲它的效应的倾向；只有思想坚定、最睿智的头脑才以公开嘲讽的方式表明他们洞察了一切。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部分企业主非常严肃地把自己视为行善者，因为他们把行乞的孩子从街边带入工厂，并让他们做一件“有益”（当心，边沁！）的工作。自由主义管理理论家安德鲁·乌勒（Andrew Ure, 1778～1857）声称，在魔鬼磨坊里工作的孩子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看着他们等骡车一回去就立即灵巧敏捷地将折断的绳子再次系好的样子真是迷人（让人愉快）……这些矫健（轻快）的小精灵的工作看起来如同一场游戏，在这样的游戏中他们练会了让人喜爱的机敏。”（转引自 Engels，出处同上，第 390 页）

如今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人们的观察方式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西方慈善组织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它们即使做梦也从未想过要攻击市场经济及其所包含的经济核算。自从国有社会主义崩溃之后这一体系被人们误以为是“惟一的选择”以来，连基督教的儿童救济机构也令人惊讶但却顺应潮流地转变了意识。人们与早期工业化阶段的企业主用几乎同样的证据从根本上为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工业使用童工的现象辩护；即：另一种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乞讨、卖淫及家庭贫困化的加剧。这种理由只有在市场经济范畴中才是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能接受另一种选择的结果而不名誉扫地呢？因此，救助组织心甘情愿地被自由主义的“专家们”牵着鼻子，充当市场经济的模范学生，喋喋不休地宣讲着“经济的必要性”，其目的只是（幼稚地认为可以做到）缓和全球范围内如今仍然主要集中于纺织工业中使用童工的现象，并提高童工的福利。因此，这些组织无意中证明了，认为市场经济是再生产的普遍形式的想法将最虔诚的好人都完全自动地变成一头像边沁一样冷漠的、自以为在编织人类“幸福”的无主观意志的资本怪物。

因为为几百万孩子所设的“魔鬼磨坊”日复一日地继续转动着，结束这样的地狱生活只能通过把救助之举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机制的彻底批判联系起来才能实现，而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者更加丧心病狂地回应混乱的启蒙运动思想理性的那句话，像一枚飞标射向此理性的靶心：“没有无辜的人”。炸弹把偶然路过的行人撕成碎片与市场经济无休止地残害儿童躯体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这个行人尽管作为个人不对残害儿童的行为负责，但是他仍然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个行为。当社会机器产生出这样的效应时，年轻的恩格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呐喊道：

“这和人的谋杀行为性质一样，只是一种更加隐蔽和阴险的谋杀。这种谋杀是人所无法防御的。它看似不是谋杀，因为人们看不见杀人犯，因为所有人都是罪犯，而又没有人是罪犯，因为被屠杀的牺牲品的丧命看上去如同自然死亡，因为它不像是行为罪过，而更像是疏忽过失。但它仍然是谋杀。”（Engels，出处同上，第325页）

但是，体现出“魔鬼磨坊”特性的绝不仅仅包括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的、经济核算中特有的无节制的工作时间和无限度使用童工的现象。即使工作时间略微地缩短，而且消除了童工现象，但企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无法根除的因素仍然存在，卡尔·马克思用“异化”这个一般概念来形容它：谁必须在“黑暗的魔鬼磨坊”中挣钱，谁就会变得让自己感到陌生，而自己最后却根本察觉不到这个变化。这绝不是难以洞察的事实。因为资本利用已客观化地以自身作为目的而使工薪阶层和管理层的经理都失去了通过协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来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直到生产与消费分离之后，在受竞争压力驱使并在没有自觉地了解内容的意义和目的的情况下为匿名市场进行的匿名劳动使得所有参与者的行为成为“抽象劳动”。1844年，28岁的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巴黎记事本中写道，“工人只有脱离工作时才回归自我，而在工作时却失去了自我”（Marx，1968/1844，第55页）。年轻的恩格斯在他一年之后出版的书中第一次准确描述了挣钱的劳动人民至今仍然无法摆脱的、况且他们也已经意识不到的生活感觉：

“没有什么比每天从早到晚都必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更可怕的了。越有人情味的工人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工作中包含的强制力及无目的性。他究竟为

什么工作？是出于创造的兴趣？是受自然天性驱使？绝非如此。他工作是为了钱，是为了一件用工作本身根本无法创造出来的东西……”（Engels，出处同上，第346页）

工厂和办公室成了与自己的生活情趣脱离的抽象时间和抽象行为的功能场所。连房间的布局和机器摆放的样式都由竞争施加的客观强制力来决定。我过去经常在工厂中工作，曾一再地发现，主要是妇女（符合她们熟练掌握的性别角色，即具备布置一个舒适的“家”的能力）令人感动地试着把一点点“舒适”的感觉偷偷带进这个魔鬼磨坊，比如在车间里挂一个基督降临节的枞树枝花环。由此，资本主义功能场所冷酷无情的形象自然就显得更加可怕了。

这里，社会劳动本身的特性是无可指摘的，而应对这所有的一切负责的是自身即目的地为挣钱而挣钱的努力。由于功能场所里的非人性化过程并非由人们纯粹的合作中自行产生，因此在这方面，“雇员”和经理之间存在一种或多或少隐性的斗争，关于这样的勾心斗角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前东德的一个熟人给我讲述了图林根一家玩具工厂工人的境遇。他们期盼着马克能给他们带来奇迹，但后来却大吃了一惊：不仅一半的职工立即被裁员，剩下的那一半所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小咖啡机和“聊天角”因为“影响工作效率”而被禁止了，而且也不允许将生产工具用于个人用途，以前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迫使“雇员”在资本主义的功能时间里将自己变成隐形人和尽可能彻底地转化为付出能量的机器，并因此“在工作中失去自我”。要收集一些通告、警告和规章制度来证明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例如，恩格斯援引了英国一家工厂的规章中的一段话：“被发现正与别人攀谈、唱歌或吹口哨者，处以……惩罚。在工作时离开座位者亦同”（出处同上，第399页）。在德



国工业化历史上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规定。在任何地方，资本主义针对人力资源的“教育要求”都与工厂的惩罚体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任何形式的“过失”都要扣除工资。流传下来的有如1817年在威尔茨堡由柯尼希（Koenig）和鲍尔（Bauer）建立的德国最早的机械制造厂中的“罗特处罚手册”。有如下“违规行为”的工人要处以8~200芬尼的罚款并受到点名批评：

“两个人一同上厕所；以所谓的找钻头为由四处闲逛；星期一早生病，而且病了一天；因辱骂牧师被地方法院传讯；因溜须拍马；因结婚缺勤12小时，还睡过了头；因开幼稚的玩笑；因不顺从；因在酒店斗殴；把水果皮丢出窗外；因多管闲事；工作时睡觉等。”（转引自：Deneke, 1987, 第113及下页）

此外，1869年赫希斯特的“卡尔·西蒙明胶厂的普通厂规”中有如下规定：

“任何工人都不允许让亲戚或陌生人往工厂里送冷饮……工人不可以与陌生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攀谈……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任何工人都不允许在下班之后或在休息的时间里在工厂区停留……在所有的工作室和车间内应当始终保持安静，不允许吹口哨、唱歌以及不必要的闲聊，不允许做买卖或做游戏。”（转引自：Eiler, 1984, 第264及下页）

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量有着相似本质、自身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虽然现在表现为一种更抽象而且普遍的形式），它们具有同样的驯化性质和受他人意志支配的背景。许多东西都不必特别制成法典。我经常看见，当有人“在工作时间里”坐下、看报纸或

到处闲聊时，工头和师傅们，即“资本的下等官员”（Marx）就会变得不安；哪怕是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发生了材料中断的情况或一台机器必须重新调试的时候。

佯称通过提高生产者的舒适程度来加速资本以自身为目的运作的后现代管理新方案在总体上具有勉强和虚假的成分。由于生产的目的是对人本身而言是外在的东西，因此他们只有停止做人，并从内心深处接受金钱这个自身即目的的外在因素，“在工作时”才能“全神贯注”。这里自然不能缺少功能主义的归纳。如果（据说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出于“心理学的考虑”选定墙的颜色，那么这种做法只是使得对人力资源的训练更为周密了。各种“消除等级制”的形式也同样如此，其目的无一不是依照边沁的模式，把人变成他们自己的监视者和催命鬼。

在东德的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完全类似的驯化概念，这又一次指出了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各种现代社会形式的内在亲缘关系。在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中，企业心理学家打着“劳动满意程度”的旗号任意地摆布“雇员”，这恰恰证明存在着与抽象的资本利用过程密不可分的异化现象；它是更多地借助盲目的竞争机制还是更多地通过国家官僚行政手段得以实施并不重要。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无声的绝对强制力相比，国家行政管理无意之中给人力资源“在工作中”的个人空间留下了较多的缝隙。这种现象被西方的学者解释为“效率低下”。在这里，衡量国有社会主义的依据是它自愿接受的商品生产体系的社会形式标准。

很容易看出，在“魔鬼磨坊”中，造成公害的边沁一类疯子的梦想最终在全社会得到了推广。在最早练就了“抽象劳动”的国家手工业工场、面向世界市场的奴隶庄园、劳动教养所和疯人院中对待违规者的特殊情况如今成了社会的正常状况。边沁设计的全景圆形监狱的所有特征都在工厂体系中体现出来。把人力资源称作“雇用人员”（德语为 *Beschäftigten*——译者注）已经说

明，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起源于十八世纪拥有踏轮和精心设计的劳动行刑机器的监狱和疯人院。如今，这些得益于蒸汽动力的生产工具向全人类发起了攻击，并强迫全人类为边沁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功效”服务。在英国，人们把如此被利用的人力物资称作“手”，这清楚地表明了个人被贬为提供劳力的工具的命运。

边沁幻想的全景圆形监狱体系与资本的运行机制相互融合，并因此表现为技术的客观性和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因为这就是边沁所想要实现的：资本主义的苛求应当脱离主体成为种种物化结构，为的是由此成为“内在人”的行为轨迹；除了建筑结构的设计与组织形式的安排之外，还有什么比技术流程的矩阵更适合无辜地充当第二物质天性呢？因此，资本主义世界机器自身即目的运转方式可以由一整套社会经济系统设置转变为一整套真正的技术系统设施，它把自己的暴力隐藏在提高的种种生产力的所谓“必要性”之后。与此后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所不同的是，同时代的管理大师，如安德鲁·乌勒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1835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产品制造的哲学》一书中，以极其坦白的语言叙述了发明家兼企业家阿克赖特（Arkwright）的纺纱厂的规章制度：

“我认为，阿克赖特主要的困难不是发明一个能抽出棉花并把它编成一根连续的线的自动装置，而是……如何使人们改掉不连续工作的习惯和遵从整套自动装置的固定规则。这就是说，设计一个工厂的纪律体系并实施管理……为了改变原来一直随心所欲工作的工人们倔强的性格，真的要求一个人具有拿破仑般的耐力和雄心。”（转引自：Elmer，1984，第153页）

直到资本主义机器体系诞生之后，才真正完成了将人及其社会性降低为无生命的功能机制的过程，即使此后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土地上，它也又经过了一段很长发展才达到了完美

状态。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写了这最后转形的开端：

“看管机器、联结断了的绳子，这样的工作不会占用工人的思维，而另一方面，它又阻碍工人去思考其他的事情……他片刻都无法逃离——蒸汽机整天在运转着，轮子、传动带、锭子的轰鸣声不断地灌入耳中……工人每天早晨5点半就必须到达工厂……他必须遵照命令吃饭、喝水和睡觉……专横的钟声将他从床上唤醒，从早饭和中饭的桌边赶开。”（Engels，出处同上，第397及以下数页）

但是，这种“工作”的非人性看起来好像是技术生产力本身导致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表现出了胆怯，他不愿指出现代生产力的弊端以及犯下的罪过，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为自己的论证承担责任：

“人们会对我说，为了保证大型的、井然有序的工厂中不同的加工操作在需要时可以交错进行而制定这些规定是必要的；人们会说，这里和军队中一样需要如此严格的纪律——好，这也许是对的，但脱离了如此可耻的专横就无法存在的社会秩序，又算作什么社会秩序呢？要么是目的将手段神化了，要么就完全有理由从手段的劣性中推断出目的的劣性。”（Engels，出处同上，第400页）

这里首次间接地出现了那个“劳动大军”的比喻，而且还是贬义的。之后不久，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比喻已经变成褒义的了：这里预示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赖以生存的谎言，这一谎言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衍变成”一个本身具有压制性的现代理论。年轻的恩格斯还没有勇气朝这个方向迈进，但是这个趋

势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其原因在于无法将在机器中物化了的资本之社会的抽象形式从概念上与作为人的潜能的新型生产力分离开来。

恩格斯（不仅在英国）开辟并驰骋于其间的学术界即使打着新的“社会主义”旗号——资产阶级坚定的博爱论者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实际上也完全出自内心地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劳动管教”并使人力资源屈服于抽象的价值生产机器的学说，只是要以比较仁慈的方式来为“抽象劳动”这个外来的上帝进行纪律训导。恩格斯毫无恶意地赞扬着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教育工作”，在这方面思想的创建者中，再没有比功利哲学论的仁爱者和劳改监狱思想家杰里米·边沁更杰出的人了：

“过去一段年代里的两个最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Godwin）几乎是……无产阶级的专有财产；即使边沁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拥有一个学派，但是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发展了他的理论。无产阶级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其主要形式是报纸和小宣传册……”（Engels，出处同上，第455页）

于是人们又殊途同归了。为了避免错怪年轻的恩格斯，必须说明一点，在1845年时，他也许还几乎没有看明白边沁的文章及他的真实意图，或者只是阅读了零星的片段。这也可以从他在自己书中的后几页对为失业的穷人所设的所谓的劳教所的设施和状况表示的愤慨中看出来：

“甚至监狱中少量的饮食也普遍好一些，因此劳教所的居住成员经常故意犯点儿罪过，其目的只是为了能进监狱。因为劳教所也是一个监狱，谁完成不了劳动定量，就得不到

饭吃，谁要出去，必须先得到许可，但根据他的表现或监视员对他表现的评价，申请可能被拒绝……穷人们穿着劳教所的制服，听凭监视员的任意摆布……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劳教所里，一个5岁的男孩因受罚三个晚上被关在太平间里，只能睡在棺材盖上。在赫尔内的劳教所中，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位于肯特郡这个最美的地区之一的劳教所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所有的窗户都向内朝向庭院里面……”（出处同上，第497及下页）

这里，恩格斯显然无意中描述了边沁模式的全景圆形监狱，它的组织方式以及结构特点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但是不知情并不能避免惩罚，尽管这一奇怪的联系当然并不会使得恩格斯这部唤醒民众的著作以及他所叙述的真实性受到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经常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浅薄的轻率进行合情合理的批判，并始终抨击自由的丑陋肮脏，但他们也没有从工业技术和组织的层面上（在所谓的边沁层面上）对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实质进行批判。由于从“劳动大军”中发展出的压制性理论能够兴盛不衰，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种早期的、无意识的而且隐蔽的联系。

### 捣毁机器者

第一次工业革命自身的牺牲品当然不会像前几个世纪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平和地束手待毙。长期以来，无论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忽视了这些反抗斗争。机械地强调进步和现代化阻碍了人们去理解完全独立的、在官方历史的掩盖“之下”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它的轮廓至今只是依稀可见。一方面是因为它如同民间古老的口述野史没有留下官方或文字证

据，一方面是因为证据被怀恨在心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机械论世界观的推崇者抹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人们对它根本没有发生过兴趣，许多文献资料也许直至今日都没有受到重视或必须重新得到诠释。用后来工人运动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斗争毕竟只是不够完美（因此也不必认真对待）的“先驱”而已。

直到近年来人们对隐性的普通史和社会史发生了较强的兴趣，才有人着手重新描绘早期资本主义发家史的画面，但是研究的深度还远远不够。由于目前学术界把关注的重点轻率地放在论证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上，因此这一问题又面临着被掩埋的危险。继西方“新左翼”失利和东方国有社会主义衰亡之后，如今资本主义的苛求体系神圣地风行全球，在这种背景之下重新探讨边沁提出的驯化机制及其在工业化历史中的客观化过程，并把市场经济作为以血腥方式贯彻实施的强制体系送上历史的法庭，这些举动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而且是自毁前程的。

官方的正史与历史真实情况几乎是两回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自己历史的描绘始终是一幅讽刺漫画。在整个欧洲，内战贯穿了整个向第一次工业革命过渡的时期，时而潜滋暗长，时而公开爆发。在所有的历史书和时期概念中，有关这些旷日持久的斗争的密集程度和英勇顽强都被小心翼翼地删去了。

早在中转经销商与国有手工业工场盛行的前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义和社会反抗运动就此起彼伏；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既不是偶然现象，也并非特殊情况，只不过这一普通的事件由于偶然得到了文学加工而具有了特殊地位。早在工业化的巨大推动力产生之前就有这样的话印证普遍存在着的不稳定因素：“对于社会动荡的恐惧贯穿了整个18世纪……其中包括起义、罢工、集会、骚乱、反叛的不法行为——所有这些概念的含义归根到底都只是同一种不确定状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Stürmer, 1986, 第153页）

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与此相关的资本主义核算的极端化才真正点燃了这些社会叛乱之火。当欧洲大陆上的纺织工人起义（除了西里西亚起义外闻名四方的还有里昂的丝织工人起义）还是18世纪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时，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诞生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它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也扩展到了西欧和中欧，并因吸收了当地原有的手工业者的反抗形式和普遍的“面包动乱”而壮大频繁起来。而在英国国内也经常因食品价格的提高而有规律地爆发“面包动乱”，如今这一概念又重新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中无数自发的反抗，这些自发的反抗是由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新自由主义的前瞻者不断地命令并强行要求处在资本主义边缘的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大幅度提高主要食品价格而一再爆发的。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一源自英国的“捣毁机器者”或“勒德运动者”的新抗争构成了社会反抗运动的核心。这一运动是因“勒德将军”而得名，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名为内德·勒德（Ned Ludd）或勒德雷姆（Ludlam）的织袜工人的斗争领袖。是否真有其人，或他只是一个“艺术角色”或社会群众运动的幻想人物，并无定论。关于这位勒德流传着众多的报道和格言，例如汤普森（Thompson）引用的这句格言：

将军中惟有勒德  
一心为了穷人

勒德运动的兴起决非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一种瞬间意识的结果。持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认为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那些“后加入的”勒德主义运动积极参与者，“根本不了解早在几十年之前英国就发生了类似的运动”（Abendroth，



1985, 第 29 页)。而恰恰相反, 有证据表明, 勒德运动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而且它有意识地遵循了广为流传的社会叛乱传统。据汤普森说, 英国早在 1709 年、1740 年、1756~1757 年间、1766~1767 年间、1773 年、1780 年、1782 年、1795 年以及 1800~1801 年间爆发了原因不同、形式各异的较大规模的暴动, 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以及地区性的骚乱。其方式包括罢工、游行示威、纵火、抢劫、恐吓信以及在 18 世纪就已经开始的捣毁机器和工厂设备的反抗斗争: “1758 年, 第一批剪羊毛机被英国工人捣毁了”(Abendroth, 1965, 第 13 页), 而“1769 年, 因伦敦的一家机械锯木厂被捣毁, 英国议会颁布了第一部将捣毁机器、破坏厂房的行为列为罪行的法律”(Wulf, 1987, 第 20 页)。组织相当严密的团体在发动“面包动乱”的同时创立了一种反独裁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 1766 年的一封诗歌文体的恐吓信中体现出来(根据汤普森提供的文献, Thomson, 1980, 第 119 页):

我们是一支三千余人的小型部队,  
为了斗争团结起来。  
该死的, 我们会让  
国王的士兵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假如国王和议会不弃恶从善,  
我们要将英国变成废墟一片。  
假如东西不变得价格低廉,  
那么, 该死的, 我们要点燃议会  
并在地球上重建一个美好的家园。

勒德主义者此时在 19 世纪初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重新开展了激烈的社会反抗斗争。这一斗争延续了几十年, 在 1811~1812 年间及 1817 年达到了高潮。在纺织业盛行的诺丁汉郡、约

克郡和兰开郡，企业主收到了大量署名为“勒德将军”的恐吓信。信开头的称呼常常不太恭敬，如“你这该死的猪猡”（Thompson, 1987/1963, 第 611 页），信中时常出现如“我们要将你们的楼房烧成灰烬”的宣言（Thompson, 出处同上, 第 646 及下页）。1811 年 3 月，诺丁汉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规定最低工资和反对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之后发生了“捣毁机器”的暴动：

“当 1811 年 3 月 11 日织袜工人的示威游行被警察暴力镇压之后，为表明其对镇压的态度，他们就在当天夜里捣毁了 60 台袜子编织机。这一暴力行为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约有 1000 台袜子编织机被砸坏，并有次品被销毁。工人们的行动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Wulf, 1987, 第 21 及下页）

在约克郡“这一勒德主义的第二大中心……里，由剪布工这批技术高超的手工业专业工人严密组成的团体构成了勒德运动主力”（Paulinyi, 1983, 第 237 页）。他们反对采用起绒机和剪毛机：这些生产技术使剪布工产生了失去工作资格及工资下降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这一斗争升级为公开的内战：

“与诺丁汉的织袜工不同的是，约克郡……的剪布工觉得自己面临的对手不仅是小企业，而且还有决不会被吓退、也难对付得多的采用工厂生产方式的大企业。1912 年 4 月，勒德运动者开始了较量，150 人手持武器对位于若福特的威廉·卡特赖特的工厂发动了攻击。卡特赖特对这样的进攻已经有所准备，他在工厂中预先安置了士兵和配备武器的工人。当勒德运动者试图冲进大门时，被卡特赖特的人打退

了。进攻的一方有两人死亡，一些人受伤。假如说勒德运动者在此之前还仅限于有选择地捣毁机器的话，此时，当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他们的运动升级了。作为对两个工人被枪杀的报复，他们杀死了一个名为霍斯福尔（Horsfall）的令人憎恨的企业主。他曾挑衅地宣称，他要“让勒德运动者的血流成河”……由于这次谋杀，勒德运动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这又导致了运动的进一步升级。抢劫和内战式的纷争相继发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反抗由粮食歉收、战争和经济危机引起的物质生活贫困化的斗争。政府对此所做的回答就是大量投入军队并对捣毁机器的行为判处死刑。”（Wulf，出处同上，第23及下页）

显然，“正义军”——勒德运动者也是这样自称的——广泛地得到了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持。汤普森认为，即使在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之后，人们也不可以“过分夸大织袜工和剪布工陷入的孤立局面。在勒德主义‘暴乱’的整个过程中，捣毁机器者得到了中部地区和约克郡西区的公众舆论支持”（Thompson，1987/1963，第635页）。尽管投入了正规军打击自己的人民（市场经济“放任主义”的发家史中的精彩部分），尽管“勒德将军”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但反抗、罢工、纵火及捣毁机器的事件仍然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其实是英国整部第一次工业革命史的伴奏。

1818年，棉纺织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罢工，织工们“收集了所有的梭子并把它们全部锁进了小教堂或车间里，这不仅发生在曼彻斯特，而是在所有有织工的城市里……罢工以企业主的暂时让步结束，但一些织工领袖被迫害和逮捕”（Thompson，1987/1963，第303及下页）。1819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彼得鲁惨案”，即军队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队伍开枪射击；1826年再次发

生了捣毁织布机的事件，1831年23个男人因捣毁造纸机被送上了断头台。农业工人奋力反抗使用“节约劳力”的机器、降低工资和劳动条件恶化的斗争也同样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根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了解到的情况，在勒德起义结束了20年之后，农民和农业工人用同样的方式反抗农业资本主义：

“纵火是他们所喜欢的社会战争形式……1830~1831年的冬天……佃农堆在田里的谷物垛和干草垛，还有他们窗户下面的谷仓和牲口圈被点着了。几乎每个夜里都会发生一些这样的纵火事件，恐惧在佃农和土地所有者中扩散开来。肇事者从未或者很少被发现，人民把这些纵火案归咎于一个被他们称作斯温（Swing）的传奇人物。人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这个斯温会是谁……从那年开始，纵火案每年冬天……都会重演。1843~1844年的冬天发生的频率又一次特别地高。”（Engels，出处同上，第478页）

“斯温”显然是一个类似于“勒德将军”的人物，而这个传奇故事的诞生显示了反抗资本主义及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斗争有着多么深厚的群众基础。勒德运动失败了40年之后，人们还会谈起“午夜的聚会、军事演习和煽动性的演讲”以及1812年被掩埋、“在后来的危机中又被重新挖出的”勒德运动者的武器（Thompson，1987，第579页）。自由主义理论也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即使其着重点不同）都把这部战斗性的、简直是英雄主义的反抗斗争史视为反对“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的“倒退”和“无意义”的反抗。

这里一方面再次体现了“现代化倡导者”的整个机械论世界观。他们认为牺牲人命是正常现象，并如同一种偶像崇拜者那样自觉地膜拜机器人式的“抽象劳动”的现代化莫洛赫神

(Moloch, 也称摩洛神, 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 要求以儿童作为献祭品——译者注); 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无动于衷地谈论“必要的结构性变化”, 完全承袭自由主义的传统将它诠释成这种违背人的需求而盲目发展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并加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 “捣毁机器”初看起来似乎纯粹是“不成熟的运动”犯下的愚蠢错误(不久之后卡尔·马克思也对它表示不屑一顾), 它的参与者依据自己的直接经验过于简单化而且错误地将“机器”描绘成一个敌人的形象。但是这一经验又无法用“科学的”魔力消除。年轻的恩格斯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伯明翰的爱德华·P·米德(Edward P. Mead)在“蒸汽国王”一诗中的语句, 论证了真实感受与对机器体系的愤恨的一致性:

国王, 一个怒气汹汹的君王,  
没有长着诗人梦想中的国王容貌,  
而是白人奴隶们熟识的暴君,  
蒸汽便是这野蛮的国王。

他有一只臂膀, 一只坚硬如铁的臂膀,  
尽管只有一只;  
其中却蕴蓄着,  
打击上百万人的神奇力量。

如同狂怒的莫洛赫神,  
他的那位曾经端坐在西蒙山谷的祖先,  
他的胸中充满了火焰,  
他的恶口对准了孩童。

他那善性的牧师群,

嗜血成癡，无比地傲慢和恼怒，  
他们操纵着——无耻之极啊——他那只巨手  
点血成金。

而他那凶残的下属，傲慢的磨坊主们，  
金色四溢血光映照，  
人民的愤恨必将推翻他们，  
也击毙那只怪兽，他们的上帝。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真的只是狂怒的愚昧吗？恩格斯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当时的工人对毕竟不同于完全直接接触的机器的工厂体系所持的态度。人们实际上很容易看出，这里的“蒸汽国王”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一个被“错误地”解释或消极地神化了的自然科学与工业技术的因果关系。这里涉及到的更主要的是设想成与机器体系的具体形象一致的**资本的社会抽象形式**。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同样是已经在荒谬的企业经济的自身即目的运营中“翻转成”新兴工业潜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决不能让这种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方式用工业技术为自己“开脱罪名”，可是后来，这却是让人们心目中理所当然地认可的成功之道。

如此看来，勒德运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尽管缺乏“较高的觉悟”，但是他们却比带着资产阶级的学问癖的后来的“正式”工人运动更能细致地鉴别出工厂体系的社会特性。将“勒德将军”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长远来看，这对历史上每一种社会运动都不利，并且更会损害它可能享有的积极地位）。在这一点上必须赞同汤普森的观点，他刻画出勒德主义反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它既非“反动”，也不是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进步”运动；它根本不属于100多年以来精

心塑造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体系。

可是这些社会反抗运动绝不是阿本德罗特等人认为的“反应不理智”的文盲的低级本能举动。而实际上他们拥有着使用岗哨、信使和通信的广泛的团体，这些团体不仅作为乔装打扮的武装小分队在无数冒险的指挥行动中登场，而且他们也探讨社会的未来发展纲领。据报道并有证据表明，他们秘密的领袖“机敏而幽默，据伦敦的手工业者说，其中的几个属于‘劳动阶级’中最博学的人……”（Thompson, 1987/1963, 第 630 页）。

这些运动和叛乱中毫无疑问也包含了一种消极因素。很容易证明，勒德主义者的动机是回归过去，恢复过去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的社会狭隘性。这一点例如体现在他们提出的遵守完整的学徒制（剪布工为 7 年）和不雇用没有当过学徒的工人的要求中。因此应当制止由工厂体系造成的工资水平的迅速下降。这一运动的成员主要由社会地位下降或有下降危险的手工业者及与手工业者仍有共同之处的工厂或手工业工场的工人组成；勒德主义者得到小工匠、小商贩、纺织工业以外的其他生产部门的工人的拥护，甚至得到神职人员、士兵及学者的支持。这表明，这些叛乱代表的并不只是个别群体的利益。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的普遍状况明显恶化了，而于此之前的前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早已被人们视为社会面临倒退和受到威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隐约记得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活情形视为“黄金时代”是一种理想化的行为，但人们从心底里憎恶呈上升态势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化主义仍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因为“所有的证人一致认为，社会普遍拒绝接受工厂体系”（Thompson, 1987/1963, 第 613 页），而且他们决不允许自由主义的“专家”和边沁式的虐待狂来劝说自己放弃拒绝的态度、否认自己的体验和感受。

直至今日，随波逐流的历史学顽固地坚持着那是一个市民中流传的神话的观点，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反抗斗争（此外它的意义也被淡化了）是因为广大人民受到一个纯粹的神话蒙骗，他们完全出于“幻觉”而自愿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汤普森曾以一个该观点的现代卫道士之言为例，此人天真地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厂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差”（出处同上，第294页）。一个真正有力的论据！

但这一切不仅关系到对过去还没有受到市场经济强力束缚的年代或多或少有些理想化的回忆，也不只是涉及对工资水平降低或劳动条件恶化的真实感受。更主要的是这些社会反抗运动也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标准，汤普森在一个著名的表述中将它形容成“平民文化和道德经济”（Thompson, 1980）。勒德主义者及其他人是“流传下来的农村法律和正当的平等观念的继承者”，他们处事的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劳动力市场的盲目机械化的法则，是一种“道德正义感”和一种既考虑到“工作与闲暇的节奏”、又包含了“合理价格”及“适当工资”观念的“文化模式”（Thompson, 1987/1963, 各处）。这些人不愿听凭任何一种“各方力量的自由游戏”的摆布，他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巨大的欺骗，因此他们反对“工人丧失地位，尤其是丧失独立性，反对工人完全依赖于企业主的生产资料……抵制劳动纪律和单调的工作……反对失去业余时间和舒适感；并抵制将人贬低为一种‘工具’……”（出处同上，第218页）。

这些标准决不意味着纯粹的倒退，它们为被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和工厂体系彻底摧毁了的人类自由之根本而普遍的条件提出了控诉。有关德国情况的种种报道也一再显示出，人们不仅将这个摧毁过程看做是对道德标准的损害，也把它视为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因此，比如在一项关于巴登和弗登堡地区工业化开端的调查中这样写到：



“但是，通往工厂的道路——倘若存在这类可能性——对受过训练的手工业者而言简直就是有损他们‘尊严’的一步，而他们宁可选择可以自己做主的贫乏生活。因为尽管工厂劳动的平均工资要高于在家里‘制作’，但是这种工作始终受到监督和控制，而且因每天长时间工作总体上增加了工作强度。”（v. Hippel, 1992, 第178及下页）

且不说工厂工资纯粹是由于手工业生产者的大量破产而“比较高”，这里已显示出反对全面丧失自主权的基本立场，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采取这样的态度本应是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的“客观强制力”还并没有深入人心，因此有可能被人们厌恶地抵制。1844年6月《德意志汇报》上登载的一篇批判性的推理文章间接地说明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也包含了类似的动机：

“在一个工作缺乏、竞争激烈、而食品价格异常高的年代里，织工们并没有比其他所有勉强糊口的按日取酬的工人遭受更多的困苦。如果说他们所处的情况比上述的阶层更为窘迫的话，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任何其他的工作。成百上千的男女织工可以被农民乐意地雇用，他们也可以在筑路或其他事情中找到活计；但是他们必须辛勤工作、俯首听命，而他们只想完成他们愿意完成的工作量，也不愿超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转引自：Kroneberg/Schloesser, 1980, 第185页）

从这些含蓄、间接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勒德主义者只是遍及全欧、不愿被打垮的生产者的根本性对立态度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已。这种“平民文化和道德经济”当然仍以家庭生产单位为基础，但它从一开始起就并不拒绝更高的组织形式；这一点从勒

德主义的反抗运动能广泛产生分支的现象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从感情上”遭到激烈抵制的只是遵循金钱规律的纪律约束和受制于人。在这一社会意义上，“荣誉”的概念现在显得过时了，大多数人听到人宁可挨饿和造反也不愿适应一种资本主义的“工作岗位”的说法时，也许只会摇头。这当然只能说明人已被改造到如此缺乏荣誉感和尊严感的地步，以至于他们因为根本无法再设想一种共同组织、自主决定自己生活的再生产方式而一味渴求着“工作岗位”。

这一社会荣誉概念绝没有从根本上将妇女排除出去。即便就这一点来看也无法美化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民—手工业生产方式，它在本质上是父权的。但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妇女们权利尤其是能力的丧失，因为她们凭借自己在生产中的位置完全可以拥有发言权。正如自主的生产力发展没有被从根本上排除，因此女人的参与和共同决定权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剥夺了妇女在“官方”社会中的独立位置，目的是让她们承担家庭妇女的义务，从而使她们一方面降格为母亲，而另一方面降格为德·萨德所指的“性机器”。即使在此之外女人还有一份挣工资的工作（大多情况下工资偏低），她们仍然固定在这两个角色上，因此将市场经济的上升形容为女性解放的条件是一种恶劣的误导。也许社会下层的女性在资本主义还遭到社会上大众抵制反抗的变革时期要比在后来的“现代化”驯服和适应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得到解放——即使她们的意识肯定与男性一样处于那个时代的水平上。在法国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下层女性”的顽强斗志广为传颂。在“面包骚乱”和反对手工业工场或工厂的纪律化的行动中，常常有女性冲在最前面。在整个工业化历史的早期阶段，女性曾担当过暴动的策划人。这段时期的警署报告中充满了有关的内容。因此当1831年在法国又一次发生捣毁机器事件时（不在里昂，而在圣艾蒂安），一位检察官抱怨说：

“极其令人痛心的是看到女人们特别顽固地与国民卫队作战。她们用围裙盛满了石头，时而自己扔，时而把石头递给别人扔……尤其在女人中有一些可怕的人物……”（转引自：Perrot，1981，第82页）

即便在勒德运动发生之前和进行过程中的英国，女性也被称作完全有自我意识的行动者。汤普森以很多地方与勒德主义者的起义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众多“面包骚乱”中的一次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1812年，诺丁汉的女人们用棍子举着一个画上红道、裹上黑绉纱的圆面包步行穿过街头：象征着‘穿着粗麻布、被榨取血汗的饥荒年代’……”（Thompson，1980，第128及下页）

人们当然不可以从这些文献中得出女性在这些社会叛乱中得到普遍解放的结论。西方基督教国家里特有的父权主义自宗教改革以来在早期现代化阶段更为极端了，它对反叛的手工业者家庭、“穷苦劳动者”或贫民窟居民的影响程度之深也许与对其他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但是，当“旧时权利”意欲确立合法地位的要求（绝没有明确规定女性的不利地位）与有女性参与的社会反抗运动交叉到一起的时候，还是能让人看到其中也包含着“向前开拓”的可能性的。在对父权制的批评方面，“在大城市激进的手工业者之中也存在少数顽固保守的人，他们经常提出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未想到的深远的要求”（Thompson，1987/1963，第443及下页）。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所有其他问题上。

勒德主义运动和欧洲其他“捣毁机器者”的反抗斗争以其敌对立场和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制于人的暴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

社会保守思想的界限。在此之前潜藏在没有被意识到的传统中的“平民文化和道德经济”的价值标准是通过抵制资本主义的苛求才为人知晓并成为纲领的，从这点来看，勒德主义与手工业者的社会（非技术）传统之间的联系可能超出了它自身的范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18世纪以来本身已经成了传统的反叛精神，因为“正义军”的反独裁、“偏袒”、辛辣刻薄的思想也许与旧时手工业界的“毕恭毕敬”也没有什么关系。

恰恰从这一逐渐觉醒、不断发展的意识来看，勒德主义者不是盲目地与机器和工业为敌，不仅仅是汤普森指出了这一点；剪布工也明确表示，“只要同时制定补偿性的，即确保他们工作岗位的措施”（Wolf，1987，第23页），他们就同意引进起绒机，而且捣毁机器完全是选择地针对煽动降低工资的人和工厂暴君进行的，也就是并不针对机器本身。

从根本上说，勒德主义者的愿望是，“经济增长应依据伦理原则加以调节并……符合人类的需求”（Thompson，1987/1963，第640页）。假如这一反抗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能发展成为一种确定了长远革命目标的运动”（出处同上，第641页）的话，那么它就能——因为它距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揭示出不合理的企业经济“理性”的弊病，并要求另一种途径的、与边沁模式的驯化截然相反的、能真正在“节约劳力”和“提高富裕程度”的意义上调动新的生产力的方法。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反抗才会遭到如此血腥的镇压，丝毫不给它任何一点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承认是为了将这个隐约萌生的思想永远地扼杀和消灭掉。

在反对资本主义使金钱及市场机器独立化的斗争中，私有资本主义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然也可被利用，当然其含义与后来持国家独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者使用它的含义完全不同。勒德主义者根本无法设想“国家计划”，他们谋求的是生产者

的独立自主，即使这个理想始终根本没有酝酿成熟，他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具体发展这样一种想法和通过经验和反省克服停留在过去的、最终不切实际的“公平价格”和“公平工资”的思想。

1818年，一位善于思考的棉纺学徒强烈地抱怨说，专制主义时期从人民大众手中榨取来的金钱的力量占据了人民大众和新的生产力之间的位置：“蒸汽机得到运用，为了购买机器和建造足够大的房屋……需要巨额资本”（转引自：Thompson，出处同上，第217页）。失去财产、地位下降、被税收和涨价盘剥得一贫如洗的人们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起，即使共同（可能的）团结合作也不再拥有合法获取新的生产力并脱离从专制主义中继承下来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经济而自主完成生产任务的资金。

一半出于留恋过去、以手工业传统为导向的动机，而另一半则面向未来对企业经济的表面合理性和“市场规律性”提出了仍然十分含蓄的批评，在反抗运动的这种两面性中存在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实现的历史可能性：即拒绝接受市场机器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伪自然法则，目的在于通过人类直接的相互理解寻觅到独立于盲目的价格机制的、自主的社会进程。

### 人口法则：从地球上消失！

勒德主义者只是所有反对工厂体系和资本主义苛求的社会反抗运动和群众运动中相对最有觉悟和最具打击力的一支力量。在所提到的欧洲大陆上的运动中，“面包骚乱”仍然多于“捣毁机器”，但它们反对独裁和争取自决权的动机是一致的。即使在沉闷的德国省份里，也不仅存在着消极的社会自豪感，而且还有着抵制社会后退、反抗“贫困化”和面包涨价、其反叛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大力宣传的西里西亚事件的手工业者、工厂及手工业工场

的工人及部分农村居民。例如 1847 年 4 月柏林发生了所谓的“土豆起义”（Price, 1992, 第 27 页），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叛乱的记载。在德意志国家中，“集体抗议和抗议示威在传统上属于正义行为的范围”（Langewiesche, 1992, 第 433 页）。这同样也只表明，资本主义和刚刚启动的工业化使得人们的生活情况不断恶化。与英国的情况惊人地相似的是，当时在德国也有关于社会革命运动发出恐吓信的记载。例如 1847 年西德意志埃伯斯巴赫的乡议会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公民们，我已不得不告诉你们那些你们还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乡议会和乡长都不起任何作用，根本不为穷苦人着想，有朝一日我们掌握乡镇财产就不会如此，但眼下却别无它路可走，乡议员们，我们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不提供面包、水果和土豆，就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转引自：Langewiesche, 1992, 第 432 及下页）

“贫苦劳动者”的满腔怒火、社会恐吓信、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许多省和州的“面包骚乱”、对自由竞争的抵制、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市场经济始终没有发挥出的“提高富裕程度的效应”：德国的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作“毕德麦耶尔（Biedermeier）派时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绰号 [由作家路德维希·艾希罗特（Ludwig Eichrodt）首创，从 1850 年起，他就以施瓦本一个虚构的中学教师“戈特力布·毕德麦耶尔”的名义发表讽刺模仿诗]，但它却在历史学和人文科学中成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时代概念。由此，德国的全体资产阶级对于社会的漠视就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作为时代中“进步的代表”以狭隘的、“中产阶级的”、富裕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方式来消除市场经济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危机，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在

科学和学术中涂改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将社会中的战争状态和公民失去权利的事实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牺牲，是社会的少数现象。

在文学上，毕德麦耶尔时期的典型代表是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 1787~1862）。他自1811年起在图宾根当律师，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符滕堡州议会的自由党议员，当然也是一位资产阶级爱国者（“在清新的橡树林中/德意志上帝情趣盎然”），不过他更热爱的是符滕堡（“哪里有陈年美酒/哪里就有符滕堡人在狂饮”），作为诗人，他还是“施瓦本地区后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格罗·冯·维尔珀特，德国诗人辞典（Gero v. Wilpert, Deutsches Dichterlexikon）]。我们之所以说这位擅长撰写德意志叙事诗和影响深远的军国主义贵族悲歌（“我有过一位战友”）的作家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十分重要”，并代表了毕德麦耶尔时期的世界观，其原因体现在他的“穷人之歌”的诗句中：

我看见富人鲜花满园，  
我看见金黄的种子；  
我的路却很贫瘠，  
布满担忧和辛劳。

而我喜欢带着默默的痛苦  
与高兴的人们一起寻欢作乐  
并祝愿每一良宵佳日  
都这样开心和温暖

啊上帝，你不会  
让我没有快乐：  
一番对人间的甜蜜安慰

从天而降。

太阳、月亮和星星  
仍将光辉亲切地投射在我身上，  
当晚钟敲响，  
我说，先生，跟我来吧。

曾向每个好人  
开放你的迎宾厅堂。  
那么我也身着节日盛装  
坐到餐桌旁。

当人们想到，这首诗写于一个饥民暴乱和社会战争的时代，那么它不羁而平实的语言就又几乎显示出了风采。与海因里希·海涅的“织工之歌”“蒸汽王”一诗或英国18世纪具有煽动性的双行押韵诗相比，这首诗表现的是德国19世纪自由爱国主义者的夸夸其谈和对社会的冷漠。只要被欺侮和伤害的人仍遵守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逆来顺受，“对每个人说你好”，以便自己能愉快而耐心至极地期待更美好的彼岸（或者等待着可惜很有必要的“结构调整”产生出仁慈的效应），那么市场经济造成的大规模贫困和失业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引起的就只是一种廉价的多愁善感。

德国中产阶级的这一心态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每当他的市场经济信仰及其圣地出现危机，他们都一边坚决地保卫财产，另一边则忧伤地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情感。世界应是市场经济的世界，但也应当是崇高、互助和美好的。前些日子，一个正派人家的小女孩对我说，她希望再听到别人讲“小红帽”的故事，“但请省掉恶狼的那段”。童言无忌，因为这可以作为德国200年的



毕德麦耶尔时期和资本主义危机史的座右铭。

可惜，凡是资本主义就都有狼。毕德麦耶尔人士胸膛里的第二个冷漠而坚硬的灵魂十分清楚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条件的控制、但同时又不能充分“就业”的大众，对社会形成了“干扰”，并被看做潜在的威胁，这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已不再满足于只打击比较安分守己的贫穷居民，而是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打击。

“正如三月革命之前迅速膨胀的贫困文学所显示的那样……在就这一危机状况不断地发表看法的政府官员、教士、国家科学家、作家、国民经济学家和地主等等中，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型的大众贫困现象，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贫困。”（Wehler，1987，第283页）

如何处置必将成为对美妙市场经济的持续威胁和控诉的愈演愈烈的大众贫困和大众失业呢？因恐惧而辱骂穷人很快就又再次成为上层社会的礼仪。这方面的例子是普鲁士男爵冯·施泰因（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一位市场经济和国家政治的改革家。他的画像不知为何（或完全理所当然）被国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收入了森严的祖先画廊。他就曾指着“蜂拥而至的粗俗无礼的流氓”激动地怒吼道，这些“因社会最底层”“和流氓无产者的人数和需求的的增长而产生的”人滋生了“嫉妒和占有欲”，并对财产和秩序构成威胁（Wehler，1987，第282页）。这位男爵道出了整个高收入阶层的心声。我们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引用的一位女士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坚定地信奉市场的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将贫困与“落魄”的大众视为可恶和危险的禽兽：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这个城市中的主要街道上会见到一群乞丐，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借助褴褛的衣衫和病态的外表，另一部分则是依靠恶心的、裸露的伤口和残疾，以一种通常十分恬不知耻和纠缠的方式来寻求过路者的同情。我认为，如果人们不仅交纳了穷人税，而且经常慷慨地向慈善机构捐助的话，那就已经完全有权利不受这种令人不快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每个人安宁地进出城都不能保证的话，人们为什么还要为维持他们的岗位而付那么高的税呢？”（转引自：Engels，出处同上，第488及下页）

资产阶级正是及时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后的回答，当然仍首先在先进的英国，因为那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起了最严重的深层次结构性大众失业。解决“贫苦劳动者”的问题，必须与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同时进行，而且要尽可能彻底解决。只有一位持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牧师假仁假义地想出了一个最终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法。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这位盎格鲁的神职人员成为国民经济学家并以纯朴的方式创造了所谓的人口法则。

如果说边沁负责驯化“就业者”的话，那么马尔萨斯则与“过剩者”打交道。他旁征博引，是为了给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一个可怕的新理论依据。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自然本质或“自然规律性”在这里又一次充当了科学依据。如果说十八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将一切社会现象虚假地归结成自然规律的做法还可以用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的形而上学来解释的话，那么马尔萨斯则此时第一次将社会危机生物化了，其中继承了马基斯·德·萨德的幻想。因为马尔萨斯建立起来的人口法则理论打着所谓社会发展的生物法则的旗号。他武断地认为，由生物的自然天性决定，“所有生物都有远远超出为它们提供的食品之数量

而繁殖的持久倾向”（Malthus, 1924/1826, 卷1, 第14页）。在必要时,这也适用于人类:“只要有自由,繁殖力就起作用,越过适当限度的后果此后会面临空间和食品紧缺的压力”(出处同上,第15页)。如果不加以限制,那么人口将每25年翻一番,并以几何方式递增,而食品最多也只能以算术方式增长。

马尔萨斯使这个问题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目的是将资本主义人为制造的贫困,甚至是人的“过剩”与兔子或海狸在特定条件下的“过度繁殖”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这些“生物”总是在它们活得太好的时候才会这样。从这一认识出发,马尔萨斯先生可惜不得不出于自由主义的仁爱而承认,“社会下层人民遭受的贫穷和痛苦是绝对不可救药的”(出处同上,第5页)。实际上,从边沁开始,亚当·斯密的这一自由主义福利承诺就有了小小的改动,但他还没有提供如此有说服力的“生物学”理由。

尽管马尔萨斯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构想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但因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条件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和无法更改的,所以两者就完全相符了。当然马尔萨斯也认为这一不易之论是悲剧性的,并掉下了几滴基督徒的眼泪;可是,是什么样,就必须是什么样,因为“自然法则的稳定……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基础”(出处同上,卷2,第10页)。

作为一个聪明人,这位推行生物化的牧师也充分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阻止人的出生当然可以构成人口增长的一种“预防性障碍”。早期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为了持续不断地生产“人力资源”,严格禁止古老的避孕方法,并阻止人们获取有关知识,其目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流水线输送“士兵和工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人口过剩”问题的影响下,马尔萨斯此时说,这是一个错误;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基督徒,他当然不愿回到前现代的有意识避孕和“非常规”的性关系的状态,后者也

包括过去（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末期）实际上并不很成问题的同性恋关系：

“无规律的性交，直至妨碍生育的程度，似乎是对人类尊严最肆意的践踏。它不可能不对人类产生影响，这种行为贬低女性品格，而且破坏其所有最可爱和最优秀特性的发展趋势已极为显著……不受控制的性交、非自然的激情、婚姻破裂、掩盖无规律性关系的后果的肮脏做法，都是明确属于恶习范畴的预防性障碍。”（出处同上，卷1，第24及以下数页）

马尔萨斯在其主要著作中用了近千页的篇幅，不厌其烦地把所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方式谴责为“极其不自然、不道德”而且“令人厌恶”（出处同上，卷2，第43页）。对此他一本正经地严肃建议“过剩”的民众过一种“道德的节欲”生活（卷2，第225页）。他们的义务是“使激情服从于理智”并过一种“严格禁欲的生活”（卷2，第238及下页），目的是让自己认识到，“在我们有能力养活一个家庭之前放弃婚姻和在这一段时间里实现一个完全纯洁的转变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卷2，第249页）。当然连马尔萨斯都知道这一要求是荒谬的。他这样说也只是为了警告大家，因为谁不愿听，谁就得自食其果，他还几乎是兴致勃勃并较为乐滋滋地描绘出此后会不幸出现的“自然必要性”。

“……战争——这种悄然而可靠地消灭大城市以及工厂里的人的生命的的方式——和许多穷人窄小的住房以及短缺的食品——阻止居民的增长数量超出其生存条件，而且，如果我可以一种刚开始会显得有些陌生的说法的话，巨大的和灾难性的瘟疫免除了消灭一切过剩现象的必要性。”（卷1，第479页）

不，怎么会呢，马尔萨斯先生！这从自由主义者的口中听起来一点也不陌生，而是十分自然。人们都很容易理解，当“美妙机器”的操纵者们在富有奉献精神地努力通过战争、通过工厂里悄然而可靠地灭绝人生命的方式，以及通过窄小的住房和匮乏的食品来减少“过剩的”人口时，能得到瘟疫的一点点支持，他们会感到欣喜的。在此意义上，马尔萨斯对天花之类病症由衷的好感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天花当然是大自然在近千年以前就已创造出的、为使人口保持在食品数量范围内的、适用范围十分广阔的方法之一”（卷2，第270页）。

也有人这样反驳马尔萨斯说，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能量是不可能达到极限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引起的工、农业危机中，完好的生产资料恰恰因为无法赢利而停产，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受到限制。马尔萨斯回答说，谁这么想是因为不懂“宏观经济的法则”。因为在一个有“理性”的体系中，人的劳动只不过是一件商品，它必须“通过与市场上所有其他商品的类比而服从于市场法则”（卷2，第256页）。而且假设社会“始终由一个有产阶级和一个劳动阶级组成”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卷2，第386页）。根据财产的自然必要性，生产食品只能遵循谋取利润的企业经济法则：

“而且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一些人认为田产和地产是人民的财产……（这些论点）表明了一种高度的无知……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地主或佃户，如果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没有超过其报酬的数额，而且如果这一报酬平均起来不够用，就没有任何一个劳动者可以被雇用来进行农业耕作……那么二者，无论是人口还是生产，都显然不得不陷入停滞状态。”（卷2，第36页，第134页）

没有“适当的利润”（卷2，第82页），任何生产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完全不受需求和实物生产资料的影响。在出现了工业危机和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新情况下，马尔萨斯重新表述了著名的宏观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自然法则”。他特别着重指出，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于：

“劳动的市场价格必须满足正常供养一个家庭的需要，而且必须使有劳动意愿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这一结论与最浅显的供求原则相矛盾……但想通过私人或国家的努力一下子重新创造出充分的劳动力需求是无法实现的。促使这些需求丧失的事件，无论是因何而起，现在都变得难以控制了……当劳动力供给在总量上超过需求时，让所有社会阶层既有好报酬又能充分就业，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卷2，第83页，第86页，第97页）

几百年以来，人们因受野蛮的强制力的逼迫而违背自己的意志进入到资本主义状态之中并因此而走上受制于人的“工作岗位”，并且一再地用将来的生活富裕聊以自慰，而今，马尔萨斯却以寥寥数语表明，在工业革命阶段，这架“美妙机器”的效用“不再会受到控制”，因此连为了资本主义的上帝而被迫“就业”都无法保证了。当他把因食品生产过量（用资本主义有限的大众购买力来衡量）而引发的危机以及由此停止技术上可行的生产的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时，他就陷入了与自己假定的所谓“生物”自然法则的根本性矛盾之中——但是，他不会因这一谬误而停滞不前，因为他会以极端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漠视而泰然处之。相反，他却以为已经“证明”了，贫困与饥荒应完全归咎于穷人的生理繁殖欲望：

“导致贫困的主要和长期的原因与政府形态或财产的不平均分配没有或只有很少的直接联系，因为富人确实没有权力为穷人找到工作和生计，根据这两件事物的本质，穷人也沒有权利两样都要求得到，这是源自人口法则的重要真理……”（卷2，第383页）

因此，马尔萨斯这位仁爱者认为，在工业危机无法避免时，“过分重视穷人的就业”是完全错误的（卷2，第354页）。他提出的更好办法是，原则上接受“一种贫穷的标准尺度”（卷2，第315页），“向各劳动阶级说明其处境的真正性质，并且鼓励他们耐心地、并且用‘心灵的力量和听天由命的态度’（卷2，第409页）来忍受这一无法避免的困境”（卷2，第291页）：

“事实表明，由于无法避免的人类自然法则，某些人将会遭受穷困的厄运。他们是一些在生活的大型抽奖中抓到了空签的不幸者。”（卷2，第31页）

马尔萨斯还没能来得及为此流下基督教的眼泪，就只得谴责他在英国的贫民救济立法中发现的有害谬误。这位以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可怜先驱与其说真正地救助了受压制的穷人，还不如说成为了专制统治的工具，因为那些“过剩”的穷人被禁锢到恩格斯等人所描绘的、条件极其恶劣的、如同监狱一样的边沁式贫民窟中，以至于许多人宁愿选择在大街上死去。但即便是这种强力压制的“善举”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也还是太多了，就此德·萨德已经满腔仇恨地表述过。“我们在穷人身上浪费了大量钱财”（卷2，第311页），当下，马尔萨斯这样抱怨道：这些邈邈鬼和“堕落者”只会因此变得“无忧无虑”和“不懂节俭”，而把富人纳税的钱花到“啤酒馆”里（卷2，第73页）。为了一

劳永逸地制止这种浪费纳税款的行为，应该结束这种“需求思想”，并消除这种对基本“权利”的错误想法：

“但是我相信，有（一种）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他既没有拥有，以后也无法拥有它——获取工作所不能提供的生计的权利。可是我们的法律认为，人有这种权利，而且要求社会履行为他提供在一般市场上都得不到的就业机会和食品的义务。但他们采取的这种做法推翻了自然法则……”（卷2，第281页）

因此马尔萨斯建议（在这一点上与德·萨德完全一致），废除已经少得可怜的贫民救济法，并将繁多的社会关系完全托付给种种盲目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会对纵欲的人类的繁殖冲动有治疗作用，并将悄然无声地以磨难的方式执行“人口法则”。因此，“自然的声音”应具有积极的法则效力：

“对现有体制的每一次重大的变革也许只能获得有限的、甚至完全得不到的支持，我觉得作为这样一种变革的先锋，我们出于正义和荣誉而有义务剥夺穷人以任何形式维持生计的权利。为此，我想建议制定一部法律，其内容是：所有在该法生效一年之后出生的婚生子女，以及所有在该法生效两年之后出生的非婚生子女都没有获得乡镇资助的权利……这将具有公开的、明确的和一定的警告作用，而且没有人会产生误解……在发出了我所建议的警告并由于为成长起来的下一代考虑而取消了贫民救济法的制度以后，如果有人不具备供养家庭的能力就想结婚，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么做。尽管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是不道德的行为，但社会还没有理由制止或惩罚这种行为，因为自然法则为此制定的惩罚将直接



并非非常严酷地惩罚这样做的一些人……因此，应把他交由自然去惩罚，交由贫困去惩罚。他没有听从最明确和最严正的警告，所以他除了谴责自己外不能谴责任何人……乡镇应拒绝给予他任何的资助，他就不得不依赖于有些个人做出的无保障的善举。他必将由此明白，作为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判处他和他的家人受苦，是因为他对一再的警告充耳不闻；他也没有权利向社会再索取任何东西……至于非婚生子女，在恰如其分的警告下达之后，他们就没有权利获得乡镇的资助，私人善举应是他们惟一的指望……相对而言，孩子对于社会来说价值不高，因为他的位置很快会被别人取代……”（卷2，第296及以下数页）

马尔萨斯保证说，这一切尽管十分悲惨，也还是有其好的地方。因为他与曼德维尔、康德、德·萨德、斯密、边沁等先生以及整个启蒙运动思想哲学一样，认为人力资源具有“天生的惰性”，必须让他们认识到“必要性法则”，即“贫困以及对于贫困的恐惧”（卷2，第18页）。为了不让那些天生怠惰的人产生愚蠢的想法，“必须用贫困来驱使他们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卷2，第32页）。毕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明里人们已不再生活在“劳动价格无据可依的野蛮状态”之中（卷1，第32页）。在这一意义上，马尔萨斯先生与这一“美妙机器”的所有组装者一样感到了充分的安慰：“我始终把人口法则视为一种特别适用于一种驯化和考验的状态的法则”（卷2，第468页）。

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版本的马尔萨斯理论已经是“缓和”的了，因为在1803年第2版的序言中，他急于保证说，自己已经为“缓和第1版中的强硬结论”做了努力（卷1，第4页），而且在1826年第6版的跋中他再次表示，“经过考虑”，他已“删除了那些最有争议的段落”，并在“当前这一版中作进一

步的修改”（卷2，第469页）。

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纲领以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自然法则”的名义向全人类发出了空前绝后的宣战檄文。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提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灭绝威胁论（德·萨德的理论还仅是一种纯文学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为人间上帝服务时，才有这样说的可能和必要，而正是启蒙思想家使这位人间上帝以经济的“世界机器”形象登基即位。当这一宣战檄文不再是用曼德维尔惊人的文学调侃，而是用尖细的传教士声音带着宗教狂热者的语调表述出来时，它作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对大规模社会反抗运动的回答，作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内战纲领和对贫穷与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显得愈发锐利了。

这一理论在“上流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鉴于始终潜在或已爆发的社会反抗运动，在马尔萨斯著述的推波助澜下，上流社会竞相为如何以最人道并且最隐蔽的方式来消灭“过剩者”而出谋划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4年在《德法年鉴》中写道，最后取胜的是1838年以“马库斯”为笔名发表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建议设立“一种无痛苦消灭穷人孩子的国家机构”（转引自：Meek, 1956, 第62页）。过去斯威夫特苦涩的讽刺诗在这里却以上层资产阶级严肃思考的形式在一个社会中再现了，而这个社会显然正在向着真正丧失尊严、分崩离析和自我毁灭大踏步迈进。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尔萨斯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及其自由主义学者对一场没有出路的危机所作的结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朝不保夕的从来不是市场体系，而始终是深受其害的人的生存。一旦社会现象的“自然化”向“危机生物学”迈出了第一步，便一发不可收拾。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延续至今，在市场经济已不言而喻地占绝对地位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界中还潜伏着它的影子。

这一点也体现在官方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回顾中。这些历史学家如今不仅又一次将前工业资本主义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内战掩盖起来或刻意缩小其规模，而且也承袭了马尔萨斯论述的核心以作为巨大转轨危机的解释原理。因此，柏林自由大学的经济和社会史教授沃尔夫拉姆·菲舍尔（Wolfram Fischer）在对巴登州工业化所作的一次近期调查中断定，社会批评家及资本主义批判家完全错误地解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大众贫困现象：

“许多人，即使远不是全部，都相信是工厂的新生产方法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如今，这一看法已十分明确地遭到驳斥。我们不仅能证明，工厂工人比按日取酬者挣得多……而且我们也知道穷人增多的原因：人口，特别是下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作岗位的增加。”（Fischer, 1992, 第139页）

在这里，历史的真实性和诚实性也如语法一样遭到了践踏（尽管菲舍尔自己的有些材料可被引证来反对他顺应市场经济潮流的观点）。遐迩闻名的社会历史学家汉斯-乌利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其深受赞誉的《德意志社会史》一书中持同样观点：

“这其间形成了一种显然能公正而经验性地维护基本要素的解释模式。它要求从新出现的大众贫困的真正历史原因出发。每一次解释贫困化最先必提的基本事实是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人口急剧增长。有关这一欧洲‘人口革命’第三次膨胀浪潮在中欧的特性和影响可找到记载。它对德国社会在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基本状况框

架内所能支配的、用以维持人民生活的一切资源产生了阻遏不住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如此急剧的增长之所以持续了这样长时间，是多种起推动作用的原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两大经济条件：向前推进的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首先创造了就业岗位……其次，产量的增长，生产率的上升，市场份额的提高……都有助于供养……膨胀的人口。同时工业化最初时期的中转经销业……也为许多人提供了面包和生存机会……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担心这种饱和状态的出现，从20年代起这一讨论达到有史以来最热烈的程度。不同的经济部门能从这批寻找工作的大军中吸收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人口和潜在劳动力的增长超过了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Wehler, 1987, 第284页）

菲舍尔和韦勒都运用了纯马尔萨斯的论证法，它不言而喻是为现代化发展史作铺垫的；但这种做法绝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代表了历史学界中忠实于国家的学院派学术研究的主流。此类实证主义精神矢口否认资本主义苛求的整部基本发展史，并似乎若无其事地指出了某些客观化了的结果，对它们做出的解释颠倒了黑白，并忽视几百年来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而绝望的反抗。

于是，粗暴地剥夺人对自身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把人变成纯粹的“价值利用”的燃料似乎成了创造“工作岗位”和“生存机会”的造福人类之举，这在此后成为一种嘲弄；而与此同时，在专制主义“人口政策”的强制下，为现代化战场进行的额外的人口生产则被称之为无社会前提条件的“人口爆炸”的自然现象。然后，菲舍尔和韦勒做出了与马尔萨斯雷同的估计，即单纯的人口增长已超过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事实上，情

况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始终快于人口的增长。但绝大部分的生产力增长被耗费在专制军事机器和匿名大市场的竞争中，以至于大众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不仅是绝对份额，也包括人均份额）甚至低于前现代社会的水平。

贫困和饥饿的危机并非因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比例失调而产生，引起这一危机的惟一原因是依据企业经济理性和通过国家官僚机构的榨取而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即使在 20 世纪，生产力的增长也远远快于大众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如今，这一生活水平又在全世界范围内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中迅速跌落。韦勒似乎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源限制是中性的，可以套上实证主义的外衣，并委婉地称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基本状况的框架”或仿佛“由上帝所赐”的“现存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他又一次回到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资本主义卫道士的论述必然是这样的，因他们认为“已增加的市场份额”本身就属于“有利因素”，并把它与“已提高的生产力”相提并论。

同样，声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劳动带来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恶意的歪曲。连工厂里一个童工的经济状况都好于一个成年的手工业织工，这究竟证明了什么？这只能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毁掉的人数比它所接纳的人数多得多。由于机器的竞争，手工业者才被逼到了极为穷困潦倒的境地。这难道不是工业化的影响吗？在这一灾难性的社会条件下，工厂工资仅相对高于按日取酬工人、手工业织工、农工等的收入，——但这是在工资水平普遍残酷地剧烈下降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因此，1848 年卡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做报告时援引一些当时的观点来说明，在英国，手工业织工的工资在 1815~1843 年这段时间里，从每周 28 先令降至 5 先令；工厂织工的工资在 1823~1843 年间，从每周 20 先令降至 8 先令（Marx, 1977/1848, 第 445 页）。在非舍尔教授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据

此得出的具有职业乐观主义的结论，即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神奇效果，最后工厂工人比手工业者的收入高出 $2/3$ 。

或许这些先生们不愿接受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即使它是十分客观而且论据充足的。但他们至少得相信他们自己的权威和领路人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自己也根据向英国上议院提交的一些报告，无动于衷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下降：“在审阅这些报告时人们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织工的工资降低了 $1/3$ 甚至是一半，而且与此同时，小麦价格上涨了 $1/3$ 或将近一半”（卷2，第196页）。马尔萨斯在这里对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作的报道也完全适用于欧洲大陆和德国以后的发展情况。人们既然已经以维护偏袒的语气和马尔萨斯的方式来论述这些问题，那至少也应像马尔萨斯那样开诚布公，而不是像非舍尔和韦勒那样歪曲事实。

### 社会解放运动或国民的民族革命？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早在专制主义时期就已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并且自由主义在工业革命伊始就完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弑父篡权，那么在德国这两大发展是同时交织进行的。与其西方的同仁们不同的是，德国“美妙机器”的开路先锋首先得在两条战线作战，既面对着诸侯割据、看来还毫不示弱的专制主义，又面对着下层民众不断发起的社会叛乱。各条社会和历史战线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情形下尤其明显。以不同形式相互交织又相互斗争的动力和动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结构分界线直到后来才从超越了所谓的现代主义的立场中分辨出来。当时的各方冲突力量受自身条件限制无法了解他们自己历史的进展，也没有完全认清这些分界线。载入欧洲和德国工业化史册的所谓“1848年革命”也是在这一相互矛盾的背景下进行的。

首先，专制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始创者”，其日益脆弱的贵族外壳已被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破坏殆尽，而且它向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中央集权也因让位于“自由企业界”的利益而从经济上被取消了。

第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派作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排头兵一方面希望货币和市场的尽可能无限的自由能与新闻、选举权、资产阶级法制等“公民自由”相结合，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强硬的“龙形海怪”来对付人力资源的社会叛乱，只要后者仍然拒绝“抽象劳动”及其强制法规。

表面上迥然不同的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其政治形式则仍有争议。虽然在西方，专制主义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但这一形式仍然只是为了满足专制主义自身的需要，而且被理解为纯功能性的。随着自由主义超越专制主义而自己担负起民族国家的职责，它也改变了自身的地位：民族的总体框架赢得了它不曾有过的、自身特有的、不合理性的“同一性”。只要专制主义仍占统治地位，国家与市场的结构性对立就仍会表现为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但现在自由主义却想独自占领两极（或者已这样做了）。为此它需要一种能缔造同一性的架构，以便把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强捏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们寻找的是一种臆想中奠定基础的历史性本体或实体，并找到了所谓的民族：一种无法明确定义的关联，它把特定的地理单位和文化共性，如语言，以一种先前不为人知的方式划定为这部“美妙机器”及其国家主持人的基本活动区域和外部界限。

19世纪上半叶，这一民族同一性结构体在社会心理上和感情上受到自由资产阶级阶层（特别在资本主义仍很落后的德国）的高度认同；此前内容含义完全不同的（城邦、诸侯统治等）“爱国主义”臣仆感，如今与新的、更抽象的民族总体框架相接合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商品生产时代

的爱国主义。因此，这一情感首先主要是被进一步推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决策者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这一情感在德国是由路德维希·乌兰德之类的德意志狂和洋洋自得的立宪爱国者惟妙惟肖地体现出来的那样。尤其在莱茵河以东地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起源于专制主义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支仍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思想的对立面保留了很长时间。其权力要求更多地是以诸侯家族的基准体系为取向，尽管由这个分支亲自组建的国家机器和市场经济似乎自发地形成了民族经济的各种关联。

第三是社会下层的反抗运动和民众的叛乱，由“低于资产阶级”的阶层发动，并完全在资产阶级官方社会以外的范围活动。因为这些运动自己的智囊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文献流传下来的很有限，还遭到歪曲和扣压 [如据我们现在所知，甚至格林 (Grimm) 兄弟对其民间童话进行了迎合资产阶级的改写和修饰]，因此对于他们的“社会政治的总体情感”我们也只能认为就是汤普森所指出的“道德经济和平民文化”对闲情逸致、“公正收入”等的那种向往；无论如何，这种向往在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的设想及其概念的范畴中是完全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而且它在新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也不是民族主义的。

使社会暴乱者与存在于他们世界中的民族仇恨或地区憎恶分离，并强加给他们一种历史的超意识，似乎他们在现代民族主义实现以前就已经超越了它，这种做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勒德主义者有时自称为“生来自由的英国人”，这显然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独立性的比喻，而并非一种已发展成形的资产阶级民族情感，尽管他们对法国人（出自以往对英国岛屿遭受侵略的恐惧）或“肮脏的爱尔兰人”怀有仇恨，但人们还是必须把相当严重的仇外因素与资产阶级时代真正的民族主义相区别。此外十八世纪多起英国人民起义的社会动机即使是“反天主教”等等（如在伦敦发生的所谓的戈顿骚乱中），也完全显示出了社会区别：



“这一与富人清算的需求在戈顿骚乱中表露得更加直截了当，叛乱者尽管响亮地宣布了对天主教的普遍仇恨，但之后却只攻击了居住在城市西部富人区的天主教徒，而放过了人口密集的天主教徒街区……同样，他们只把天主教的贵族、工厂主、商人和店主作为攻击对象，而天主教的手工业者和雇用工人——即与他们命运相同的人——却安然无恙，这体现出一种无疑在当时其他城市骚乱中也能得到验证的社会区分。”（Rudé, 1977, 第 61 页）

在以后年代里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中，特别在 20 世纪，我们再也找不到这类区分了，因为这些运动的出发点根本不再是确保生存条件，而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竞争观点，这一观点转化为不再顾及社会阶层属性的种种凶残的意识形态敌对观念。如果说 18 世纪伦敦贫民窟中的暴乱者还并非代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那么 19 世纪初主张“道德经济”的勒德主义运动就更谈不上什么民族主义了。这些“低于资产阶级”的阶层发起反抗运动的含糊和倒退的动机在整体上与其说是属于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更多地具有大众文化、宗教和家庭的本质，即还没有浸染上现代主义的特殊仇恨。

这已清楚地表明，此类运动没能成功地稳步发展，并通过初步的理论见解形成一个自己的、谋求解放的世界观，以抵制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机器。但是，由于在世纪之交至 1850 年之间的工业化最初阶段里，大众贫困如此地加剧，暴乱有再一次全面蔓延的危险，以至于希望全社会对新生产力能够有自决权和自行协商的解放性思想或动机——反对机械的、绝对的现代化体系——似乎仍在继续酝酿之中，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便立即携手反对这一“危险”并联合采取了行动。受到禁锢的社会解放运动反对极权市场体系的思想至今仍期待着被解救，在官方的思想史里它只被

看做是受穷挨饿的民众“不理智”的想法。马尔萨斯先生这方面的观点也是明确无误的：

“我承认，我在近几年的灾荒岁月里与工人交谈时，曾不止一次地感到极度沮丧，因为我发觉他们在粮食问题上抱有顽固的偏见，并最确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自由的政府与这么严重的无知状态之间几乎绝对达不到统一。如果他们根据自己错误的想法而行动的话，那么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卷2，第311页）

我们已经知道，这一问题不会仅仅停留在虚拟式上。一旦马尔萨斯对把“一些最简单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卷2，第310页）教给“不理智”的人力资源感到绝望，他就准备舍弃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及军事独裁的对立，因为在资本主义原则不被接受和爆发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所有利益和思想对立必须让位于用武力拯救制度的义务：

“只要任何一个心存不满的人凭天赋能使下层民众相信，他们所有的穷困仅仅由统治不当而引起……那么显然又一次重新播下了不满和革命的种子……群氓通常是过剩人口的毒瘤，他们使格林为其真实的痛苦所动但却完全不清楚痛苦的来源，他们是威胁自由的妖魔鬼怪中最危险的一种……我作为自由的崇尚者和庞大常备军当然的反对者，只能不情愿地承认，没有庞大的、组织完善的国家陆军，人民在近几年的饥荒岁月里遭受的贫困……会驱使他们犯下最可怕的暴行……如果同样景象经常重现（一种让我们在国家当前状况下不得不非常担心的重现），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前景就是最悲哀的。此后，英国宪法将以飞快的步伐向休谟（Hume）

所预言的安乐死方向行进，除非一场人民起义中断了这一进程，而这一选择可能性给想像力留下的是一幅更可怕的画面……我们难以相信，接受任命的英国自由卫士们会不害怕这种更为恐怖的罪恶，而姑息在过去发生的对那种最高权力不断侵犯的举动。尽管腐败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我也不能这样小看英国的地主们，这样我才会相信，即使不受到真正恐惧的驱使他们也会放弃一部分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即当时是民众而不是皇权对他们构成更大的威胁。他们在表面上听命于政府，其条件是保护自己不受暴徒攻击……毫无疑问，对暴政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那些惹是生非的人，他们把穷人的一切贫困和几乎所有危害社会的罪恶都归咎于以人为对象的各种公共设施和政府的不公正……基于这些原因，一个自由的真正崇尚者，一个真正人权的积极捍卫者会与极权暴政的支持者为伍。一件本来的坏事会得到好人和有德之士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与它敌对的事物还要坏得多，并且目前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卷2，第275~284页）

马尔萨斯十分坦率地承认，尽管官方一再粉饰，但至少在英国，事实上还是发生了社会内战。他的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话毫无疑问地表明，自由主义面对着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器之外和超越它的社会自决要求，条件反射般地企图把从它最初阶段宣传至今的压制性国家怪兽的“必要性”确定下来：统治了人的生活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货币自由凌驾于其他所有标准之上，并且必要时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来捍卫这一自由免受社会地位下降的民众的侵犯。在紧急情况下，自由主义毫无顾忌地投入到“龙形海怪”的怀抱之中，后者将对人力物源，而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首先将对“过剩者”进行无耻的武力威胁始终留作最后的手段。

在19世纪中叶紧急的危机情况下，当然不仅在英国如此，

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德国。从公民立场出发反对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即与国家权力融为一体，不管是哪种国家权力，只要它反对非资产阶级的社会叛乱。关于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中大学生的“进步性”有许多民主赞歌；但这一“进步性”绝大部分又严格限定在“公民自由”的含义上。大学生们为反对专制主义的官方审查而斗争，但也经常与专制主义一起反对任何下层民众自发的社会运动。具有典型意义的比如有图宾根的“大学生卫队”，在对所谓的由低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发动的“哥根起义”的镇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学生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参与政治并享有发言权，获取自由权并扩充宪法——他们并没有感到有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他们曾两次，1831 和 1847 年，为了镇压城下发生的社会动乱而在军事上组织集结并与其眼里未成年的骚乱发动者，即，更贫困的葡萄园的农民、(Gögen) ‘哥根’和手工业学徒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与此相反，令人感到很奇怪的是，地方当局两次都向这些并不正式存在并禁止成立的社团求救。”(Sieber, 1992, 第 97 页)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可爱的小秘密，德国的左派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被神化了的传统出发，在准备哪怕只是认真思考一下社会解放问题之前，总是一再地退回到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窠臼中去。这也表明“左派”其实严格说来一直只是自由主义的“左翼”，因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定性上受到了牵制。这一观点也许显得有些极端，但强调一下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把一种通常被掩盖的关联公之于众。这是一种表面上“无声”的社会叛乱（事实上是官方舆论和科学的阐释史使它变

得无声了)与在资本主义内部由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双层的、几乎是自相矛盾的关系中发展出了后来的整部历史。

在社会叛乱的非常状态下,两个资本主义内部的派别均一致反对“穷苦劳动者”和忍饥挨饿的大众。他们同时也都采取策略来对待低于资产阶级的阶层及其社会骚动。在英国,保守地主的政党“托利党”为了反对代表金融和工业企业主的自由主义“辉格党”,把新的工厂工人称作“白色奴隶”(未摆脱种族主义语气)。反过来,辉格党宁愿把大众的贫困状况归咎于旧地主“贵族”与时代潮流不符的机构和行为方式。但由于英国在十七世纪已成功地摆脱了专制主义,这一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内部的策略上的对立已微乎其微,并转变为一种更多是修辞上的争辩。同时由于英国的社会叛乱在1848年前远比欧洲大陆的有关运动组织得更好也更有打击力,为了共同的体系利益,政府和在野党、托利党和辉格党,“皇权”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很快按照马尔萨斯的意愿联合起来:

“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部分甚至是采取暴力手段的抗议和叛乱,比德意志联邦国家要激烈得多,但这些叛乱并没有发展成为革命。为什么没有?英国有什么不同?……英国在1848年春也出现了组织大规模示威和起义的尝试,但与从法国直到俄罗斯和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边境的欧洲革命地带不同,英国的这些运动立即遭遇到一个由政府 and 资产阶级组成的、断然采取行动以阻止一切革命尝试的联盟。”(Langewiesche, 1992, 第436页)

但这只意味着,英国根本不再需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因为这一革命在本质上早已完成,还因为对于自由主义来说

重要的是最终打垮那些始终未被扼杀的社会解放运动。这也说明了，规模最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和社会暴乱不同于通常人们的设想，至少在思想方面与这场革命关系不大，也许根本就与现代革命的概念没有多大瓜葛。这一事态作为一个单纯的事实对历史学家并不陌生：“显然前工业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会直接导致革命”（Langewiesche, 1992, 第431页）。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官方的现代意识倾向于把所谓的革命看做激进的完美化身和最高形式。这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从前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早期的社会暴乱来看，似乎这些暴乱还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民族-政治的）革命。但也许这根本不是叛乱者们的目标，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无意识的，更非未表达出来的。难道他们因此就不怎么激进或者干脆是“改良主义”了？肯定不是，我们不妨想一想英国的勒德主义者。

这里有误的纯粹是将这些运动掩盖起来了的概念体系。这些运动的激进性显然是另一种性质的：他们根本不想让自己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现代化”，因此“国家公民权利”和“民族国家制度”也绝不可能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目标；因为他们也许更多的是预感到而不是已经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将成为“抽象劳动”永久的人力资源。这类暴乱在反对资本主义所提要求的不自量力和市场体系危机的不可救药的斗争中赢得了自身的特色，这个特色也总是在不断验证汤普森所强调的“平民文化和道德经济”。有充分理由表明，这种“平民文化和道德经济”与自由主义的“公民自由”和“民族情感”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后两者只是一个受剥削和受制于人的可恨制度下一阶段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公民仅仅意味着跳进形式上虚假解放的陷阱，以使自己作为“挣钱者”以雇用劳动形式成为资本这部不可理解的无主体社会机器的永久臣仆。当然这些社会暴乱的发动者那时对这些相互关系还根本不可能有明确的概念；但他们的暴乱本能地同时

针对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超越出资本主义内部的“政治”冲突。

在这一方面，我绝不想偏离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显而易见的冲突格局，而宣布存在一种“纯粹的”和完全独立的社会叛乱意识。动机、思想和运动根本不能毅然决然地相互隔离开来。有利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恰当做法是在历史的观察中不考虑现实的混乱状况，而是利用一条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时而显现、但从未鲜明和清晰可辨过的分界线来区分社会暴乱的冲动以及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一事态只能理解为，这两种难以统一的冲动和运动在历史上相互交叉和缠绕：即一方面这些社会暴乱在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无理要求（包括还未完全定型的外壳），而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相对的、与政治形式有关的资本主义内部冲突在其历史上的顶峰被称为“革命”，得名于法国大革命的最初经历。只不过奇怪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和民族国家的革命如果没有受到本质上全然不同的反资产阶级社会叛乱的支持，就根本无法释放出其震撼世界的力量。与专制主义相比，自由主义本身在大体上总是“改良主义的”。革命的爆发仅仅出现在自由主义改良运动与在它看来肤浅而不同路的社会叛乱陷入某种形式的共振的情况下，人们几乎要说，这只是偶然情况。

对这一问题可以用更加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表述：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火车头”，只有在它与本质上反对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抽象劳动”的社会暴动相交叉时才可能出现。但这里必须明确社会解放与反动的“反现代派”之间的根本区别。专制主义、其诸侯和君主等首要人物以及曾倡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官僚机器如今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新生的民族主义的最后防御战中开始酝酿一种保守甚至反动的态度和意识形态，以抵制将让它们面临灭顶之灾的进一步资

本主义现代化。经过多种变形，由这一格局中产生出现代的保守思想。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民主世界土壤上浓缩成为极右派和精英们反对解放思想的并很快也变得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特有的反现代主义动机。

民主现代化的宣扬者和资产阶级自由的骗子很懂得把这一纯粹是反动的和精英式的反现代主义描绘成惟一可能和可以想象的思潮，并且避而不谈过去社会运动中具有解放思想的反现代派，极力把它从社会记忆中抹去。其倒退动机（此外，如同已经显示出来的情况那样，有关参与者也绝没有献身与此）与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动势力的动机完全属于不同的性质；那些反叛者不同于后者，是反权威和反精英的，因为他们坚持的动机是要求有自决权，反对工厂体系的“策划者”。“左翼的”、表面上抵制反动势力的自由主义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从此把社会运动归入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范围，并为它们提供一种虚假的选择可能：要么是在商品生产强制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法治，要么是反动倒退的专制主义（或20世纪的极右独裁和野蛮统治）。

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倡导者”以这种方式渐渐成功地把社会思想简化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自由主义还认为，如果独立的社会暴乱已不能完全阻止，那就从策略上操纵它，使它尽可能发挥削弱保守-专制主义阵营的作用：一方面在紧急情况下协同专制国家一起剿灭社会叛乱，另一方面则让其成为自由-民族主义改革努力的有力手段！

这在法国革命中差一点失败。当时（与英国几十年间的情况类似）社会叛乱的冲击力如此之大，以致事实上一段时间内处于失控状态。因此这一革命虽然最终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从此成了所有资产阶级人士及其政治说客们可怕的噩梦。这次大革命“可怕”的革命性在于，某些革命行动后来



(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发展方向恰恰是其发动者本来不愿看到的。除个别情况之外,自由主义者既不想在这次也不想在其他任何一次革命中把自己宝贵的身体置于旧秩序的枪林弹雨之下。人民起义所提出的实际要求,对于代表公民利益的改革者而言,完全是形同陌路,但却在无意之中帮后者决定性地打开了旧机器的缺口。当权的自由主义同样也可能成为叛乱的牺牲者,在许多“自由企业主”和资产阶级奴隶贩子中也有个别的牺牲者;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还处于专制主义的阴影之中,自由主义者倒在原本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形式的群众运动的簇拥下掌了权。

社会暴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缺乏稳定能力当然是促成这一荒谬局面的“可能条件”;但当权的或与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联合的自由主义因采取了残酷的军事和独裁镇压政策也难逃其咎。一旦社会暴乱获得较大的独立性和持久性,如英国的勒德主义运动,就会反对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后者不愿再陷入“法国式的”尴尬局面,因此从一开始就释放出“龙形海怪”的所有复仇女神去打击谋求社会解放的激进运动。这似乎已经描绘出了现代革命史的基本模式。

1848年,这一模式再次重现,但它已被延至此时的现代化历史所打破。大众贫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是勒德主义者却只存留于人们的回忆之中,在欧洲大陆上实际不为人知。由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各式各样的暴乱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以致如今确实难以延续下去,并只能自发地做出直接的反应。莱茵河以东的自由主义与其英国和法国表兄弟不同,它还处于与专制主义旧秩序严重的对峙之中,因此在不到必须进行直接镇压的情况下,它还有可能进行政治上的操纵。据此,尤利乌斯·赫尔德(Julius Hölder),这位“后来符腾堡自由主义的伟大领袖和1881年之后的符腾堡内政部长”(Langewiesche, 1992, 第435页)在一份战略分析中写道:

“开始时，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公民们增添了力量；因为如果后者对此有所感觉的话，就绝不会再去关照思想狭隘的王国和官僚制度；因此必须实现公民的愿望，实现他们从而使国家获得昌盛的期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参与发表见解、参与行动，在与上层阶级进行法律斗争时，对社会下层的恐惧会使他们在绝望之中产生出勇气。公民们不应错过这一时间，而应通过集会、讨论等形式调查出何处缺少什么以及如何援助。他们现在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必须采纳执行，否则他们不能保证维持秩序……无产者为中产阶级火中取栗；但如果后者获胜了，我们也许会成为政敌。但这还很遥远。”（转引自：Langewiesche，1992，第434页）

但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民们始终惴惴不安地回忆着法国的经历，这一战略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可是，鉴于陷于绝望之中的社会暴乱在意识形态上的弱点，人们仍可以希望，尽可能给这些反叛行动的先驱者注射一剂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以拔去他们身上追求解放的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本身具有的最低级的本能和道德的因素也有可能被用作工具。原因在于，反解放的牵制动机绝不可能不对这些社会暴乱构成干扰。当时在德国已经萌生了现代反犹太主义，想把犹太人当作社会灾难的替罪羊。1819~1830年在德国西南地区发生了所谓的“嗨嗨动乱”，以传说中罗马军团士兵冲进耶路撒冷圣殿时的呼喊声而得名。在海德堡和卡尔斯鲁厄，犹太家庭的房屋被抢劫，家具被扔到大街上等等，与100多年之后的“帝国水晶之夜”非常相像。此时资产阶级新闻出版界也趁机发表煽动性评论，这表现在拉和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一位犹太籍学者，其著名沙龙对浪漫文学很重要）在一封尖刻的信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

“三年以来我一直说，犹太人将会受到袭击。我有证人。这是德意志民族的愤恨。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最有教养、脾气最好、最爱和平、最尊重政府的民族……这就为产生对这批人——犹太人——的嫉恨留下了空间……多年来所有报纸都在暗示这一点。弗里斯和吕斯教授，还有那些不管是叫阿尔尼姆还是布伦塔诺的教授……以及职位更高的带有偏见的人物……无论从行动上还是动机上，都是真正的坏人，而并非那些被教着呼喊‘嗨嗨’的人民……”（转引自：Wirtz, 1981, 第72及下页）

当然“人民”在这些情况下并非只是表面上被操纵和跟着走的原本善良的无辜者，而在他们内心也萌生了一种阴险奸诈的奴隶观念，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从内部”堵住了社会暴乱的道路，并试图以一种自相矛盾的赞同态度与各种统治努力联合起来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灾难的祸水引向一种非理性的替罪羊大屠杀。这一在“嗨嗨动乱”中第一次暴露出来的、与其他社会暴乱（特别是英国的勒德主义者）相比极端可耻的综合症伴随了德国的全部历史。在拉和尔·法恩哈根的信中，他也隐约预感到出于最低级本能的穷苦大众与“幕后”具有聪明才智的资产阶级邪恶的勾结，而正是这样的勾结最后导致了奥斯威辛惨案。面对社会暴乱中的这种道德败坏状况，德意志当局也表现得不太强硬，正如一份有历史根据的调查所报道的那样：

“在这一情况下，治安部门毫无任何行动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故意的行为。当时的记者很清楚，尽管也有许多市民参与，但官方只把暴徒和街头的混混看做肇事者……‘袭击犹太人’的过程很顺利，这显然表明有关城市当局

和治安力量对此装聋作哑，因此在随后的调查中出现类似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向居民发出的呼吁显得相对温和并且赢得了很多理解。”（Wirtz, 1981, 第 63 及以下数页）

资本主义政府机构、司法和警察机器对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袭击的态度较其对解放运动的、严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暴乱的态度要相对温和得多，此后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一再发生，但在德国尤为突出。在这里，这一事实已成为固定的民族传统。即使在今天，当地的左派示威者对“公共秩序”的极小损害，或哪怕仅是单纯的手势（如对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吹口哨起哄）就会遭到程度不相称的野蛮攻击和迫害，而当（最近又一再地）甚至发生了无数起针对申请避难者住所的严重纵火事件、极右翼分子对外国人的攻击以及对左翼青少年采取的暴力行为，警察和司法部门通常只进行相对缓慢和轻微的干预。德国国家和“治安”机器的这一心态和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 19 世纪。

假如德意志的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和伪社会暴乱之间早在“前三月”时期就以反犹太主义大屠杀的变态方式偶尔达成的秘密共识因此似乎有着“避雷针”的作用，那么这些事件便暴露了 1848 年三月革命的双重弱点：自由主义的改革意愿由于害怕社会叛乱和出现“法国状况”而不够强烈，不能实现尤利乌斯·赫尔德所描绘的那种战略，同时，社会暴乱在总体上也缺乏韧性和反权威力度，也就不能在其与自由主义之间那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中唤起社会政治方面的共鸣，而法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依靠这样的共振作用把专制主义真正送上了西天。如果用 19 世纪以来采用的概念来衡量，1848 年的德意志革命理应被视为一次惨痛的失败。

## 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星期日学校

但正是自由主义抵制德意志专制主义的历史性失败才决定性地形成中的左派（例如以后的“社会主义”）永远地束缚在自由主义的难题上，并使其跑入了一条长长的历史死胡同中。如果说处于萌芽状态的“政治”社会主义早在英国和法国就已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一个分支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矛盾的产物，那么德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独立的社会叛乱和自由主义的“左派”分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而且也不清楚他们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由于反资本主义地下活动的历史不为人知，它们也因此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明确的定义，并且从一开始起，就需要对它们所处的环境做出解释。

汤普森把英国的勒德主义运动的性质定义为“暂时性运动”（Thompson, 1987/1963, 第692页），他把勒德主义者的起义含蓄地解释为后来更多地带有政治-民主倾向的工人运动“先驱”，因此而仍停留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水平上（尽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评，并支持社会叛乱具有独立性的观点）。这也许是因为对他而言雅各宾式民主的革命概念仍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使社会运动（公民）“政治化”几乎是其必然的继续和更高阶段的发展方向。虽然当时的英国大众可以证明雅各宾式民主潮流的存在，但勒德主义的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活动之间也存在许多联系、交叉和重叠。如果一旦确定勒德主义叛乱的根本目标是抵制资本主义的纪律约束，那么民主概念是否在其中起了一种重要作用就很可能令人质疑了；如果的确起了作用的话，存在的问题是它是否被理解成一种与公民民主概念完全不同的含义。

汤普森本人列举材料证明，社会叛乱中具有解放意识的反现代化思想与民主-左翼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存在逻辑上

的分界。一位英国雅各宾人士在信中这样说：“我们否认并谴责与捣毁机器者、焚烧工厂者、勒索钱财者、抢劫私有财产者或行刺者的任何联系”（Thompson，出处同上，第 688 及下页）。这些人对他们也同样心存厌恶。

实际上，社会暴乱与以后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绝不能理解成一种或多或少呈直线形的向着被称之为“更高的”“政治”觉悟的发展。这里涉及到的肯定是一种近于深刻决裂的转轨，并且不仅绝没有导致解放意识的增加，而反倒促使其减少了。人们不愿意提起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和马克思主义的教父全都不是社会叛乱的领袖和先驱，而是方向性不明和道德观不定的自由派。为了必须掩盖自己的耻辱，后来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一直轻视和贬低“疯狂”的、谋求解放的反现代化社会运动。等到社会暴乱被击败并被国家恐怖主义抹煞掉，现代社会主义就宁愿从资产阶级以下的阶层中顺从的改革队伍中产生，并组成了所谓的工人协会：“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协会由具有良好意愿、思想自由的市民领导”（Rovan，1980，第 4 页）。人们可以把大多数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人协会尽管放心地称为一种资产阶级博爱的社会政治星期日学校，与其说由现代工人运动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像叛逆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原来自由主义的星期日学校的门。恩格斯也毫无恶意地告诉我们，在这些人的祈祷书中甚至有边沁的作品。

从根本而言，这些努力的起因在于，自由主义出自本身的利益试图对低于资产阶级的阶层施加影响，在工厂之外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以边沁或马尔萨斯的名义教给他们“国民经济学”的某些“必要性”和基本概念，阻止或压制社会暴乱，并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局限性单方面归咎于专制的保守主义。在这里我们认清了社会民主最深层的灵魂，正是它影响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整部历史。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首席教

师被派到“危险”的社会团体中去说教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由于自身的经历而“发生了转变”。他们揭露出自由主义中包含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矛盾和社会虚伪，为了最终转变其自我认识并采取对自由主义进行社会批评的立场。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始终是这一转变中最杰出的人物。常常被人遗忘的是，他们两位最初也以自由主义者自居（马克思曾是科隆工人协会的主席）。弄清楚历史的这个选择现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选择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危险阶级”联合了起来，特别是在以何种形态把握和发展新生产力的问题上。如果先不考虑社会暴乱在反对资本主义工厂体系时那些狭隘和倒退的因素，那么它具有普遍意义和前瞻性的动机就显露出来，尤其是对闲暇和一种面向具体需求的活动（而不是“抽象劳动”）以及对合作性自决权和自行协商的要求（而不是对盲目的市场机制和/或官僚监护的依赖）。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新理论批判能不能用这些概念解释反现代化社会暴乱的解放动机，并把这些动机与新的生产力联系起来看，或者这种新理论批判依然沾染着压制性自由主义思想的附带因素？换句话说：诞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否让社会暴乱成为一种自觉的、具有解放意识的反现代化运动，或会像我所暗示的那样，它反过来自己也在商品生产体系及其“抽象劳动”的基础之上成为了第二个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始终充满了矛盾。要了解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过渡，当然必须考虑个人情况和历史背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不可能再与英国社会暴乱的高峰阶段有直接联系：在勒德主义运动最终被镇压时，1818年出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婴儿。但如果说马克思在构筑社会主义思想王国时，不采用他的思想发源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学说中的任何内容，原本也未必不可能。

正因为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矛盾在哲学上加以普遍化，才使得技术生产力绝对地成为整个历史进程的推动性的因素，因此马克思也不能完全否认青年时代的恩格斯在其有关工人状况的著作中初步观察到的机器体系的“实证主义”定义。虽然马克思始终对各种社会起义表示同情，但他对“捣毁机器者”思想意识的消极评价却表明，他在本质上把这种冲动视为反“生产力”的迷惘。尽管他有时暗示，社会压制手段和资本的非理性组织形式也完全可以反映在其工业技术形式上，但社会暴乱者很重视的这一方面，在他的理论中未得到充分阐述。当他谈到“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自行培训出来的……工人阶级”（Marx, 1965/1867, 第791页）时，甚至可以看出他与工业的纪律化私下里的暧昧关系。对于以后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来说，在作为人的潜在能力和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技术表现形式的各种新生产力之间已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罪恶只是纯粹在表面上从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而把工厂和机器体系显而易见的形态（与消费品一样）直接当成可以占有的财产。

这一观察方式扎根于自由主义持有的实证主义和在技术—自然科学上被简化了的进步概念，而且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承袭的不仅包括或多或少未加批判地理解的工厂体系的技术形态，也包括自由主义从基督教新教和专制主义政权那里继承并进行了资本主义加工的抽象劳动概念。虽然马克思原本对“抽象劳动”概念持批评态度，但他从不明确说明它与肯定性理解的区别。他总是把消极的和积极的劳动概念交织在一起。在诠释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美化基督教新教劳动品德的现象（在民主德国的教科书中把“抽象劳动”荒谬地看做国家的经济教义）。这已经违背了原先那些社会暴乱的初衷。自由主义的训导大师们经常指责暴乱发动者们说，如果人们不强迫他们接受教育并给其规定少许饮食定量的话，他们每周只



愿工作三四天，并仅仅“间或提起工作兴致”。

马克思主义自以为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对后者而言，这完全是一种值得怀疑的荣誉。因为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反抗运动起初曾竭尽全力地抵制成为金钱奴役下的“工人阶级”。而把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民众发起的社会暴乱归入（对“左”倾分子而言，已经用滥了的）受人欢迎的极“左”或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中的范畴则是一种恶意的歪曲，因为这些直接生产者和“穷苦劳动者”的起义与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勤奋或愚鲁的小私有者和“中产阶级”毫无关系。这里并非偶然地产生了一个社会类别的空缺，因为几乎还没有人探讨这个现代主义理论史上的难题。从根本上抵制压制性的边沁式现代化进程可能是合法行为，也许在推行现代劳动监狱的理智者们的所有意识形态阵营中，还无人考虑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马克思不仅以一种迄今为止无人能超越的方式批判揭露了这部“美妙机器”的工作机制，而且还与反叛的、具有解放意识的反现代派的动机之间建立了一种神奇的联系，在他的理论中，这一关联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并占据了一席显要之地，并以对资本独立的自身即目的的形式中包含的社会“拜物教”的揭露形式出现，它发展成为对无意识地以货币为手段的社会化过程的严厉批判，并主张建立从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联合会”。这一联合会脱离商品、货币和国家范畴，通过有意识的自行协商进行再生产，并让新的生产力为闲暇和享受服务，而不是为无休止的压制、竞争、对工人的仇恨和无止境的积累。马克思在早年就把这一动机比喻作梦想不是没有缘由的：“事实将证明，世界早已拥有了对一事物的梦想，而且世界只要拥有了这种思想意识，便能真正拥有它”（Marx, 1956/1843, 第346页）。

在他批判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同时，也含蓄地批评了疯狂追求劳动和业绩的行为。由此，马克思开创了一个理论的先河，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为谋求解放的社会暴乱所具有的反现代思想动机提供前瞻性的概念并克服其狭隘和倒退的因素。但当时未能成功地架起这座桥梁，因为组织最严密并且最有觉悟的社会暴乱已经衰落，并且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障碍。他设想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运用哲学的智慧，并以无产者作为核心。而实现这一设想并不是通过将社会暴乱与对资本主义拜物教彻底的批判相融合，而是通过将自由主义的工人星期日学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受自由主义熏染的因素相结合。所以其结果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具有解放意识的反叛与对现代拜物教的理论批评之间彻底的融合，即一直深入到压制性和非理性的现代化史的源头的融合至今仍没有完成。“工人阶级的立场”，听起来很富有斗争精神，事实上却采取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立场，并被纳入了其持久的、无意识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虽然人们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中还时而回忆起，“工人阶级”的任务必须是与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尤其是让自己站起来；但这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遥不可及的任务。历史的事实表明，“工人阶级的立场”成了“劳动”的立场，即抽象、压制的原则立场，自由主义一直试图把这一原则强加于“穷苦劳动者”，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自己的追求政治—组织独立性的星期日学校的门生如今要把它划归自己名下并且变成自己的原则。

当然即使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那类社会暴乱也不可能放弃这样积极的劳动概念；它当然也不能脱离基督教新教的遗产，并在这一方面显出意识形态上的软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反驳自己的“超我”因素。尽管如此，反对“抽象劳动”的暴乱仍是可能的，因为农民—手工业积极的劳动概念面向具体需求并通过传统的闲暇文化得以实现。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却根本没有能力把它的积极劳动概念与自由主义相区别。

社会解放的概念于是开始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行动原则。“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立场在尚未废除的商品生产社会机器的社会形态之内被用社会学方法简化了，也把生产者自身的意志禁锢到了市场经济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用以压制的客观形式，即为资本主义的目标而构建的机械设备和工厂体系、“抽象劳动”、经济价值和在资本主义以自身为目的的不断膨胀的背景下广泛作为社会媒介的货币，仿佛都变成了利益斗争中的“中性事物”，并且它们不仅不应被视为苛求而遭到拒绝和放弃，而是应得到积极的组建。

从自由主义及其未能缓解的矛盾中也得出对如何进行这种组建的回答：即通过在民族国家土壤之上进行民主“国民革命”。那种通过摆脱资本主义苛求以及有选择地自主决定使用新生产力的直接和现实的解放被间接和非现实的解放取而代之，后者寄希望于民族国家公民的地位及其对“穷苦劳动者”的额外赏赐。曼德维尔、斯密等非现实的、半带讥讽的承诺因而得到了认真对待和“国民”的强烈要求。1848年革命的失败之所以有利于这一取向，是因为从自由主义分离出来、后来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左翼”不是从谋求解放的社会暴乱的立场，而是从还未兑现的自由主义理想或意识形态承诺的立场出发去解释旧势力的、在德国始终仍是专制制度的暂时胜利。

反现代主义的社会运动与自由主义现代化之间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内部联系被曲解了，并似乎被变成一种“自由主义”（社会学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市民阶级）对“本民族和国家革命的出卖”。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专制主义的弑父后代根本不可能想到一定要发动一场摧毁专制主义机器的具有社会震撼力的运动，这始终只有通过来自自由主义思想以外的和方向截然相反的谋求解放—反现代的社会暴乱的共振才有可能。自由主义本身所孜孜以求的一切也应该在逐渐推动改革的情况下发展，因为这归根结底

只是在同一社会基础之上的继续发展。

但向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的自由主义左翼却始终坚持这种形式上反对专制主义的、民族-国家公民的“解放”。于是他们又以一种错误的、“理想主义的”结论丰富了自由主义、民族和国民与诸侯专制主义之间仅仅是相对的对立，并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令人捉摸不透的矛盾的意识形态继承人，他们从此自以为这一状态对他们而言会永无终结地继承下去，而自身却早已陷入了这部“美妙机器”的齿轮装置之中。他们被包围在了一个自我反馈的、今天早已松动了的历史时间回旋循环之中，无休无止地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哈贝马斯(Habermas)]来重复，却从未去努力达到一种毋须统治的“交流行为”的目标，这一目标由于资本和“抽象劳动”的拜物教形式，也由于它自己以此画地为牢的做法而先验性地宣告失败。只要社会民主主义还认真地坚持社会解放的目标，并着眼于那些资产阶级内部从边沁式民主到专制独裁或此后的“极右”独裁的虚假选择，就自始至终构成了一个“不幸意识”(Hegel)的经典案例。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始终着眼于臆想中尚未兑现的自由主义的国民理想，这个做法也通过两种情形得到了关键性的加强。一是(不仅在德国)只有自由主义的最左翼是“民主的”，即愿意做出让步，让雇用工人享受国家公民的自由并获得完全的投票权(目的是为苛求体制自动承担义务)。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固守国民革命的“民主”成规定论，没有觉察到从此落入了边沁设下的陷阱：因为边沁正是由于他远远赶在时代之前发现了这一机会而成为民主主义者，即毫不松懈地抓住“抽象劳动”，通过一种完全的公开性和“消极的自决权”使人们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名义下自动地进行自我压制和自我调整，并且消除自己头脑之中原本桀骜不驯的反叛意识。在社会主义事实上积极接受了“抽象劳动”

体系之后，以其倍加推崇的国民革命的自由—民主定论已成为实行自我调整的边沁式民主化的一个变种，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另一种情形在这里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它强行要求这一糟糕的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源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和民族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同他们与资本主义劳动概念的关系相比矛盾的程度毫不逊色。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国家政治机器的“民主”和民族形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压制的职能，这一职能一直与让人受制于资本这部世界经济机器的目的密不可分；但他们却未能考虑到随之出现的资本主义行为规范“深入人心的过程”。从自由主义那里接受过来的、机械的进步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方式直截了当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为“必要的发展阶段”，并且十分简单地宣称，摒弃专制主义而向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国家继续发展的历史时刻现在已经“到来了”。

特别是马克思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权和民族的形式还保持着距离，如同他与“抽象劳动”保持距离一样，他认为后者是必须被战胜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但是与他对现代拜物教的隐晦批评一样，正是这种距离使他站在一个对于他的同时代人（也与如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其他自由主义“双重思想”不幸的精神继承者）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一个理论层面上，他与恩格斯一起在这一层面上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沙盘战略，即优秀的“工人阶级”如何必须在必要时战胜“不坚定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才能在所谓“有历史必要性的”商品生产体系基础上构建公民权和民族的外壳，为的是随后再为了别的目标把这个体系也送上西天。这些十分牵强的规划表明，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学说中上了拙劣的历史决定论的圈套并且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

四方成群结队的马克思追随者当然不需要这种麻烦的理论敏感。他们十分片面和积极地把“抽象劳动”、民主公民权和民族

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原则，而未通过任何元理论批评加以修正。即使在1848年革命后直到（在时间上紧接着的）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这个时期里，所有后来闻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都没有摆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正如社会民主主义的鼻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在其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

“运动所具有的规模和它能够产生的巨大意义促使有远见的自由主义者们把注意力及时地放到工人身上并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争取他们……于是他们从1860年起利用了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的渴望并予以支持，设法把他们感到可靠的人安插进联合会的领导层……此后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了在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帮助下得以建立的联合会……当时的机器制造设计者成了柏林工人中的精英，并成了进步政党真正的禁卫军。”（Bebel, 1946/1910, 第54及下页, 第64页）

1848年还是一个孩子的倍倍尔显然不知道，在早得多的英国工业化时期、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和1848年革命时期，自由主义的工业联合会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并且他所尊敬的老师也是从这个学堂里出来的。在这方面他更不知道的是，历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过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大众暴乱但与自由主义星期日学校的历史毫不相干。于是他觉得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脱离自由主义的进步党是“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独立运动，并且把“在政治上”诞生于自由主义母体看做理所当然的前提。除此之外，正在形成中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有几年甚至在组织上也陷入了自由主义的魔掌：

“当李卜克内西 (Liebknecht) 和他的朋友倍倍尔组织工人联合体的时候, 也在其中奠定了政治和民族经济教育的基础, 但他们仍长期与“民主主义的”, 即左翼自由主义的政党联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萨克森和符腾堡。但他们渐渐相信, 自由主义的左翼不可能在民主主义和反普鲁士的道路上实现德国统一……” (Rovan, 1980, 第 12 页)

这里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即艰难地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接受了自由主义为创建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新基准体系而设定的任务。但是作为对此极力反抗的社会暴乱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社会解放运动本来对“实现德国统一”这类任务只会表示出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彻底拒绝“抽象劳动”并选择动用新的生产力来发展闲暇和社会自决权的可能性必然就会等同于彻底拒绝构建民族国家的外壳和向社会关系的其他形式发展, 例如超出以资本主义—“民族”为基准区域的自我管理单位, 如参议会或委员会。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自由主义的民族眩晕的传染, 而且似乎与此同时在“科学上”又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强化, 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狂热的民族白痴; 并且这一精神上的障碍在东西方一直保留至今。民主德国在其衰落阶段就为塑造一个“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而做出的特殊努力也属于同一类型, 同样的情况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马恩全集) 第一卷推崇备至的前言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观念进行的相应修改:

“这两位最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和革命家的生活充满着真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在 1848~1949 年间, 当他们站在战斗的最前列为以民主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激情满怀地奋斗时, 就为此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Institut

für Marxismus - 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1978, 第 15 页)

也许这番虔诚得不当的肉麻言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心翼翼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略沙盘游戏是一个公正的惩罚，他们正是借助于战略沙盘游戏把他们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遗产带进了社会主义，并且断定危险的民族认同狂热在历史时钟的机械运转中有一种“相对的进步性”。总之：因为谋求解放的社会暴乱和马克思理论在历史上失之交臂并且互不衔接，马克思主义（不包括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协调的矛盾因素和超出马克思主义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简缩为一种在商品生产体系和公民权法律界限之内的另一种资产阶级进步理论。在正形成中的各“社会民主”党中，对资本主义苛求的彻底批判被制度内部的“社会福利政策”所取代，这些政党在名称上就表明已落入边沁体制的圈套，而臆想中的激进立场则转化为一套宣扬公民权和民族国家的辞令。正如自由主义是从专制主义的上层阶级中产生的一样，国民和民族的社会主义均是从自由主义领导层之中产生的。当然 1848 年及之后的几十年中没人能预料到 20 世纪的民族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可怕的变化，但意识形态方面的可能性在当时就已萌生。正如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争斗是同一历史家族内部的弑父一样，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斗也是如此。尽管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表面上有着种种对立，我们却必须始终与那种共同的市场经济连续体打交道，“难以捉摸的”、未被理解的马克思把它称为现代主义的拜物教。1848 年以后，它以雇用劳动和企业经济理性的政治 - 经济形式无可辩驳地成为所有参与力量的中性的社会自然基础。也可以这样说：从今以后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丑恶的东西全是从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



## 自由贸易和后起的民族主义

向民族国家与民族经济基准体系的转变不久就像民族主义的和非理性的狂躁情绪一样普及开来。不仅是取代拼凑起来的独立社会反抗力量地位的社会主义党派，而且（在德国）表面上取得胜利的极权主义的贵族统治阶级也越来越成为民族狂热的隐君子。德国唯心主义的“大哲学家们”在理论上和文化方面已经为此做了充分的铺垫。约翰·哥特里普·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本是一个纺织工人家庭的儿子，后来在社会上青云直上，1807~1808年在他那些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讲演”中强烈反对拿破仑在法国的独裁统治，并创造了德国—“日耳曼”的文化和语言优越于“罗曼国家”的罗马语族世界的荒谬理论。在此之前，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就已引入了“种族”思想。在这种观点中，“民族大众”由于他们不同的“大众文化”被看成是具有某些特殊个性的有生实体，它们经历着一个类似于每个人成熟与衰老过程的自身发展。

赫尔德提出的“种族”观点还未单方面独自成形和发展到清晰地显露出狰狞面目的地步，这个概念的这副丑恶容颜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形成，此时还与对启蒙思想的荒谬性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行径的尖锐批评混合在一起。“厌恶战争”与“对待其他民族公正的情感”的观点都同属于他在《关于弘扬人性博爱的书信》（自1793年起）中所极力宣扬的“信念”。尽管如此，把赫尔德看成是给德国带来历史性灾难的非理性主义的创建者之一也并非不合情理。在他身上已经显出那种日后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的所有“德意志式的”、“右翼的”和受权威约束的虚假批判的基本形态特点：不是从批判与拆卸这部强力镇压的世

界机器的立场出发，而是站在资本主义其他的表现形式和行为的立场上来拒绝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行为。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样，国家和市场并未被看做是同一历史区域的不同极点并从这样的视角受到批判，而是仅仅被利用而相互进行争斗。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为一方，种族的民族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两极关系。

于是，赫尔德便以臆想中民族的“种族”根源来对抗商品与金钱的抽象世界主义，而没有认识到“种族”的综合构架产生于同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背景之中，它标示出“普遍适用的”资本主义原则本身的真正作用范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中，赫尔德的“种族”思想改头换面成这样一种版本：它抛弃了每一个“人性”观点的外衣，把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经济、民族国家与民族之间相互残杀的资本主义竞争工具。非理性的种族情绪特别是在德国得以蔓延滋长，其原因在于英国与法国的资本主义优势地位：如果说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英国是同更富有经济色彩的功能主义有关，在法国是通过大革命用政治概念和感情得到充实的话，那么德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创造了“德意志文化民族”的一种独特的、而且狂热地宣扬种族的“血统与乡土”概念，它被用以突出德国的独特风格，并有别于英国和法国的“西方”民族概念。

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事关紧要的已不再是在全社会把资本主义完全作为普遍适用的社会化原则来贯彻的问题，而是形成超越极权主义的一种民族国家竞争的新准则。此后的事实表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比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中王侯的“君权神授”统治政体，不仅对社会一体化和同质性具有更高要求，而且在各方面煽起和加剧了民族的竞争狂热。正如独立的自由主义资本经济已不再被看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被认为是一种宗教式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追求，同样，

产生于单纯统治空间的民族（连同作为主体的极权王侯）也转而变成独立的竞争元单位，类似于企业经济的一个个分支部门，但又位于它们之上。

历史上落伍的境况中产生出怨气十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它因此而成了一种“后起的现代化”和“后起的民族主义”的范式。“德意志民族特性”在同更发达的法国，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夸耀着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以非理性方式自以为超越出资产阶级的“贪婪之欲”。可耻的利润法则仅仅被看做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变体，而把（奋起直追的）“德国”自身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升华为臆想中的“崇高的使命”。源自资本的作用范围和表现形式的民族在意识形态上也就被说成是所谓与“纯粹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荣辱与共的集体”。

这种“德意志范式”后来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不胜枚举的变体中一再重复出现。鲜为人知的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东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他作为大文豪和“种族”-民族认同感的倡导者被热情地接受。他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欧洲范围以外“大众文化”也抱有的兴趣直到20世纪都在为后起的现代化提供食粮，为的是使自己在文化上保持活力，并给那些为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沦为本土上资本机器所需的人力资源民众套上一件束缚思想的同一性紧身衣。就此而言，德国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力远超出它所处的时代，继续作为“大众民族化”（Mosse, 1976）的发酵剂存在于第三世界广大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追补确立下来的价值观的表现方式之中，此外还戴上了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与德国和欧洲曾发生过的情况一样，20世纪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口头流传下来的前现代时期的大众文化也遭封杀，或被套入资产阶级的程式，已篡改得面目全非，为了创造民族主义的和“种族”的构架而惨遭滥用，目的是对这部“美妙机器”用一套

文化体系加以包装与保护。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左派自1968年以来把这个过程的诠释改为“解放运动”，这必须要归功于机械论的进步概念这个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装备，这个概念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国有化吹捧为“历史的必然性”。

纯文化的和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当然在十九世纪还不足以赋予民族近似本体论意义上的性质。另外，对民族还必须加上一个更为精确的经济学的界定，这个界定在亚当·斯密和他的前辈们那里还未曾出现。因为斯密理论中的“国民经济学”首先被理解为那种普遍适用的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在自由主义鼓吹这一法则的同时，民族以及民族经济学的基准体系只被附带提及。从当时正在奋力追补现代化进程的德国人的视角来看，这种状况必须加以彻底改变。于是，绝非偶然地出现了一位德国经济学家，他闯进了英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这支了不起的精锐部队，使狭义的“民族经济学”观点登上了历史舞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不仅成为德国的，同时也成为整个民族经济学的预言家。他为了与抽象——普遍适用的英国经济学理论相区别，特意把自己主要代表作的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List, 1841）。

如果说李斯特曾如此透彻地描绘了当时“德国的土豆吞噬者们”贫困的生活状况的话，那么绝不是因为他打算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相反，他本人正是一个信仰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处于资本主义落后地位的德国应实现工业化。出于这个目的，他才批判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和让-巴普提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的经济理论，当然他并不保证不同意斯密的一般原则，只是想就民族经济的自身逻辑添加他批判性的补充：

“我们……绝不打算以此否认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他凭借……一种非同寻常的敏锐洞察力，把光明带入了从前曾是一片漆黑的经济学的最重要分支领域。在亚当·斯密之前只有一种实践；通过他的工作才得以建立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由于他的这一思想特点，他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时做出了如此重要的建树。而他思想的这同一特点也是他……只考虑个人而没有意识到民族，仅仅考虑个体生产者自由从业的周至安排而忽略了全民族的目标的全部原因所在。”（List, 1922/1841, 第 459 页）

李斯特是“美妙机器论”虔诚的崇拜者，但他在经济学中反对“完全废除民族与国家暴力”（出处同上，第 456 页），反对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后者教导人们如何使全人类能够富强，这与主张仅仅教导人们如何使一个现有民族在现存的世界情况下获得财富、文明及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鼓吹了一种“德意志民族”工业化的两面性战略。一方面完全根据自由主义模式，建议取消分裂的德意志各诸侯国关税边界，旨在建立一个“民族自由贸易区”，以此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经济作用范围的预备步骤。这一主张通过李斯特的大力宣传与促进，于 1834 年成立了“德意志关税联盟”而得以实现。在普鲁士的统治下，当时有 18 个德意志诸侯国加入了这一联盟。

另一方面，李斯特要求正在形成的德意志民族经济从培养“一个民族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利益出发，通过一个保护关税体系对外抵御英国极为强大的竞争，保护自己仍然年轻与脆弱的工业。因此，他针对国际贸易会带来一个普遍优势的假设发起论战，即抨击斯密，特别是李嘉图提出的观点：“世界竞争将会变得非常完美，它只会使所有民族都将处在工业发展的同一阶段，

而不只是其他民族由于更早地缔结民族联盟……赶在我们之前实现无法估量的飞跃。”(List, 1928 及以后数年, 第五卷 / 1841, 第 191 页)在他看来, 这一问题由于工业革命而激化了, 并与前工业的市场经济已根本无法再进行比较:

“大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事物, 但都比不上给工厂自行发展壮大起来的学说, 即所谓符合自然规律地诞生这一学说带来的彻底变化。只要一个纺纱杆、一台小纺车和一台织布机就已是需要购置的全套机器设备, 即可开始纺纱和织布……那么, 假如有人声称, 国家根本不需要对此加以扶持, 此话听起来似也并不怎么荒谬……这一学说却是难以站住脚的, 但它的荒谬程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仍乃小巫见大巫, 当今建立和开办一个出色的机械化纺纱厂和织布厂需要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人, 而成百上千名工人则必须先在三四十个各类手工作坊里练熟操作技巧……事实上, 人们必须有意识地闭上眼睛, 才会看不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 在建造纺纱厂和织布厂方面, 甚至在这方面最有能力的国家中, 在同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强国的自由竞争时存在着哪些障碍。通过技术最先进的机械化生产……也通过一个民族曾掌握的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英国的工厂主有能力向无比广阔的空间扩展他们的企业, 尽可能压低他们的价格。如果出现外来竞争, 他们就会放弃向海外出口的产品利润, 直到国外年幼的新生儿被扼死。”(List, 1928 及次年, 第五卷 / 1842, 第 232 及下页)

李斯特甚至硬说英国为了使它的工业优势地位永久化, 正在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进行一种经济大战。按照李斯特的观点, 斯密和李嘉图违心地使用了“世界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作为思想

武器，目的在于牵着愚蠢的德国人的鼻子走。但同时他也宣布，他绝不打算反对自由主义的准则或是恢复（16~18世纪欧洲封建专制时代的）重商主义的片面教条。因为第一，保护关税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教育关税”，延续到“德国接受的工业教育”取得充分的进步和具有同英国竞争的能力为止。第二，内部竞争不会停止，而是能够暂时取代外部竞争和积极地吸取竞争体系所有“有益的功用”。针对德国对于世界工业市场竞争普遍存在的无知，李斯特在一段著名的章节中提出警告，称欧洲大陆面临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危险：

“全英国将要……发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和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城市。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将会形成英国那样的文明，按照英国的模式建起许多新的国家。从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个英式国家的世界并听从母国的指挥。欧洲大陆各民族将作为无关紧要和被阉割的部落而衰亡。法国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起按规定向这个英语世界进贡最好的葡萄酒，而把最差的留给自己喝。……而德国除了提供玩具、木挂钟、哲学文章以及一个救援军团，在亚洲或非洲的沙漠中为了传播英国的手工业制造业和贸易统治、英国的文学和语言而备受煎熬以外，则很难拿出更多的东西。”（List, 1922/1841, 第218页）

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劳苦大众的贫困，在这种境况中，李斯特把他的赌注全部押在了世界市场—民族主义这张牌上，用以把对整个未考虑成熟的社会状况问题的解释改换为国际竞争能力的困难，以此从一开始就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来确定这场论战的基调。德国的“穷苦劳动者”和“过剩者”在他们敢于考虑继续采取社会反抗行动之前，首先要承担

顾全国际竞争大局的义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斯特夸大其辞地渲染生活在竞争力强大的英国的穷人们能得到的所谓身体上的享受：

“每周吃四至五次上好的肉，有些地方每天一磅；每天一磅小麦面包，半升黑啤酒或淡啤酒；早餐有麦片粥或牛奶甜饭（毫无疑问加有食糖和桂皮）、蔬菜和土豆，尽可随便放开吃，另外每周还有半磅黄油；晚餐有奶汤、豌豆、土豆或茶加小麦蛋糕（其中有牛奶和食糖是不言而喻的）；星期日有葡萄干布丁；另外还有供暖良好的房间和干净的床铺。这就是目前通常年月里英国 60~70 万穷人悲惨的生活状况……”（List, 1928 及以后数年，第五卷/1842，第 243 页）

这就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蛊惑民心者使用的语言。他让那些事实上几乎被市场经济饿殍的听众垂涎欲滴，以把注意力从这种备受崇拜的制度上转移到对“外国”竞争者的仇恨上去。必须注意到的是，李斯特这里谈到了臭名昭著的英国贫民院和劳动教养所的伙食。根据恩格斯的调查，那里的伙食比监狱里的伙食还要糟糕（比如“肉”和“蔬菜”往往是实际上根本不能食用的垃圾），这些贫民院和劳动教养所一再被描述为野蛮的管教所，根据目击者的报告，甚至濒临死亡的人都从那里逃跑。因为李斯特一般都被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所以说他在这里是故意欺骗他的德国同胞，以达到从意识形态上阻拦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行社会反抗的目的并不过分。尽管他表面上装出一副理解的态度，但他归根结底又是如何冷淡地看待这场社会危机的，他的论据又是如何地确凿，从他一年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均可找到答案：



“如果仅仅因为物质幸福和民族权力这样一个本源所萌生的这些不可估量的善举和优点也随之带来这个世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摆脱的弊端，所以打算放弃它的话，那才真是天大的蠢行。如果人们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不要制造出由于偶然情况就可能陷入窘迫和贫困的社会阶层的过度谨慎——全民族的某个重要机能就会被……夺走……但是在极端盲目的情况下，还是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做法。此外，人们是根据在英国看到的这方面现象来衡量上述现象的，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些弊端做出的想象是一个极度夸张的和错误的想象，而我们的民族工业状况同英国的状况是决然不同的。英国企图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垄断全世界的市场，它的这个目的之所以能够达到，完全由于它低廉的生产费用。英国一切考虑的出发点都是根据当地情况尽可能地压低工资，以至于各下层阶级被迫为了得到一份已定额的工资而尽可能地奋力工作……于是乎英国就用残暴、匮乏以及——几百万——下层阶级老百姓的贫困为代价换来了它的工业垄断地位。”（List, 1928 及以后数年，第五卷 / 1843，第 271 页）

显然，李斯特用完全相反的论点来阐述他自己的见解并没有使他受到妨碍。他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地描绘着正在英国进行的同在欧洲一样毁灭性的企业经济合理化进程的作用，把它翻改为他自己的世界市场—民族主义的逻辑，但却毫不顾及它可怕的荒谬性。他可以以此要求获得成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所有有关“所在地”的辩论的意识形态之父这一不光彩的荣誉，这些辩论始终把人们自觉承担起对非理性的竞争体系的义务作为前提，目的在于迫使人们用抽象的、民族的竞争兴趣取代自己个人对“幸福生活”的基本兴趣，并奴隶般地服从这个兴趣。

同赫尔德提出的“种族”观点一样，李斯特的“民族工商业生产力”以及民族保护关税和“教育关税”观点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发挥了作用；不仅在1871年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以及之后，而且20世纪在东部和南部后起的现代化专制国家中也同样如此。直到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家们仍在向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推荐李斯特的整套或部分方案。李斯特在德国成为纳粹和东德的经济民族圣人和保护神是绝非偶然的，无论是纳粹还是东德都从未否认过它们的经济学理论中继承有自由主义的遗产。比如纳粹当政时期出版的李斯特著作的前言和引论中就曾宣称，“历史的使命”就是赋予德意志“种族的存在”以新的形式，这是对李斯特思想的最透彻的解释。在他的理论中，他“毫不在意”地容忍“他的历史-政治世界观与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因素之间不协调”的关系，但仍然懂得要“唤醒民族的非理性主义力量”（Forschepiepe, 1938, 第7页及以下数页）。在东德早期关于李斯特的一本专著中，他被封为揭发“美国垄断资本”“阴谋瓦解民族意识”和“西德帝国主义者”“世界主义的”、因而也是“反民族的政策”的主要同案犯见证人（Fabiunke, 1955, 第11页, 第17页）。李斯特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也被德国资本主义所利用，这只能表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中，敌对阵营如何归根到底始终站在“抽象劳动”及其机构这一共同的立足点上。

把“种族”和民族作为经济主体的观点从未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具有过解放意义上的性质，它们也总是仅仅意味着同现代商品生产体系某一被界定的作用范围的统一关系。尽管它们偶尔（并且主要是在德国）被作为工具用来反对西方“世界主义的”和抽象的经济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然而，它们却是从自由主义本身的当代正宗意识形态中、从它内在的矛盾以及它同集权主义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最终达到向工人运动-社会主义以及

后来的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反帝运动”进行渗透的目的。19世纪德国后起的现代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给民族的领地提供的支持越多，各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大国中的地位也就越强。资本主义、它的国家“龙形海怪”和它的自由主义的早期思想家进入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一个关系场的时代，这一关系场将会取代以自由贸易思想（尽管并不总是具有相应的现实性）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形成与构建阶段。在通往以后灾难的行程中，资本主义一直携带着年轻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并令人丝毫察觉不到地与它牵手同行。

### 平衡法则与工业的滚雪球式体系

拥护“民族的荣辱与共集体”和民族主义的“所在地”——竞争的强烈呼声虽然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得力工具，目的是把大量“穷苦劳动者”和正在形成中的产业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但直到19世纪中叶，由市场经济与工业的扩张所造成的大众普遍的贫困状态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光靠发出一种还根本没有普遍扎根的民族意识的空洞呼声是不足以安抚和平息社会中的受辱者与“过剩者”的。在发出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社会性的甚至是肉体上的灭绝威胁的同时呼吁民族认同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处在深渊的边缘，因为虽然社会反抗运动被血腥镇压了下去，但无法控制其爆发的威胁依然存在：贫穷会造成心灰意冷，但毫无转机的饥寒交迫却可能导致绝望。资本主义在潜在的内战与军人独裁的重压之下要继续发展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从它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的巨大陷阱中摆脱出来，如果它想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它至少也应给大众一些最低的赏赐。今天我们当然知道，19世纪后半叶那次巨大的和灾难性的转轨危机的确已被资本主义所克服，尽管牺牲品们直

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统计数字。一种经济机制使 1850—1914 年这段时间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经济机制当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的增长逼迫（根据当今社会经济观点作为“增长妄想”）而著称。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声称：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盖子都能自动地找到它的锅，价格机制将会制造一种可以满足所有人要求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社会平衡。然而，1850 年之后真正开始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只能被似是而非地标榜为“平衡”。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使人们想象成一个静止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却恰恰相反，即只是在无节制运动和无目的、不可控的活力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暂时的和相对的平衡。

只要工业革命还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件的发生，直到亚当·斯密时代还是如此，由增长动力而产生的危机在维护自由主义合法性的理论中就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 18 世纪，与其说急需解决的是“过剩者”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穷苦劳动者”的问题更关键。直到手工业者被新的“机器存在物”摧毁而造成结构性大规模失业，这才使经济危机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由于长期缺乏利润，或许今后不再能像以往那样充分“雇佣”大批“人手”，这个前景必然使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感到不安，并向它提出了挑战。这种经济学思想无法再借助自由主义者马尔萨斯提出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毁灭威胁，这只能是穷途末路。难道市场就没有把“过剩者”重新变为正常的“工作臂”、再把这种变形物再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加社会福利的”潜能来出售的活动余地吗？

亚当·斯密的法国学生和宣传普及者（及庸俗化者）让-巴普斯提特·萨伊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回答直到今天仍然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萨伊著名的论点是：每种供给均可自己创造它的需求，前提当然是不出现对

市场进行干扰的“非经济”因素的干预，这一点也长期适用于必然会充分扩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幅度急剧增加的供给。因此他明确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他的说法是，正在增长的人口数量和货物数量绝不会导致危机的出现，而是完全可以在生产力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中创造一个新的平衡。

鉴于这一“销售途径法则”（销售与生产的同一性），萨伊很早就确定，通过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来降低物价绝不会（因为由于价值创造和“过剩者”购买力的不足）使产品制造无利可图，而恰恰相反，肯定可以激发生产与销售产生反作用。他坚信：“……无论生产出的商品数量有多大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压得有多低，某种货物生产出的数量却总能足以使原生产者有可能获得其他某种商品提供的数量……”（Say, 1979/1821, 第 72 页）。他认为，在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扩大生产的任何阶段，即使国家并不胡乱干预市场的自由发展（例如通过社会立法），那么市场也会相应地扩大，于是萨伊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声称：

“制造出的产品在同一时刻以它们的全部价值为其他的产品提供一个市场，这个看法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当最终生产者制造出一个产品，他的最大要求是把它卖出去，以便产品的价值不在他那里停止。但他也并非不急于把通过销售收取的钱花出去，以便钱的价值也不要滞留在他手里。此时，人们只能通过努力获得另外一种产品的方式把钱周转出去。于是可以看到，同一时刻一种产品生产的单纯情况为其他产品开辟了市场……从这一重要的真理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随着生产者数量的上升和产品的成倍增长，销售市场也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样化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鼓励辛勤的工商业劳动……（必须）激发能够唤起老百姓购买

欲望的那些愿望和要求……一国人民普遍和持续的需求激励着他们进行生产活动，以便使他们获得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将持续不断地引发新的消费……”（Say，转引自：Hofmann，1971，第49页及以下数页）

萨伊的创见在于，他把已经由斯密做出的断言，即市场经济即使在任意地提高生产力和通过技术“节省劳力”的情况下也可保持平衡的趋势，看做内在固定规律，并以此断定市场与生产会无限制地扩大。他的定理在形式上有些混乱，并且尚未完全阐述清楚，例如根本没有把不独立的雇佣劳动包括在内，但在国民经济学中已逐渐被修饰美化为“萨伊定律”或“平衡法则”，并进一步扩展为普遍的、而且也可应用于雇佣工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理论”。

这一经过修饰美化的观点表明，由竞争的压力导致的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产品的价格产生大幅度下降，从而市场得以扩大，因为大量的人越来越经常地购物（消费频率的提高）或者第一次有购买能力（新顾客层次的开发）。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每件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比以前少得多，但与此同时产量的提高却比在每一件产品中劳力节省的劳力幅度大得多。于是，市场的扩张过度地补偿了人类劳动力的过剩；最终，扩大的生产绝对需要的工人比相对剩余的更多。一种“供给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不是指望通过诸如提高工资、社会福利、国家消费等刺激需求的手段来排除危机和制造“平衡的”繁荣，而是指望通过降低供给价格促使市场自主扩张（也就是说通过企业经济意义上有竞争力的降低成本方式）来达到上述目的。这个供给理论应用于劳动力市场便意味着：雇佣工人也应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提供他们的“劳动力商品”，来使劳动力市场自动得以扩展（“降低成本”这里意味着个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从事劳动的贫困”）。生产与销售市

场随后的扩大最终将再次自动导致与市场情况相吻合的工资的提高；另外，工人通过产品降价（甚至在挣更低工资或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买得起更多的物品。

如果说这个定理由于灾难性的转轨危机到了19世纪中叶而似乎已出尽洋相，那么相反在随后出现的相对稳定时期却使这一定理的卫道士的看法得到了更为辉煌的验证。事实上，结构性“过剩者”已多达一个危险数量的麻烦已经消失，这与工业革命超越纺织品生产的狭窄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席卷一个又一个的生产行业的态势同步。如果说在手工业纺织品生产者的经济崩溃与工业—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廉价毛巾”市场吸收他们的劳动力两个阶段之间曾经存在一个相当长的绝对贫困的潜伏期的话，那么此时爆发的工业化雪崩以迅速扩大的规模吞噬着劳动力。

“人手”现在直接在资本的指挥下再次得以大规模地活跃起来。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在民众意识里等同于公开卖淫，此时又陆续恢复了正常，尽管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而且许多手工业生产部门仍继续存在（当然它们已经进入了它们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脱离了传统状态，也就是说不得不自动以企业的合理性为准则）。新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现在按照市场循环周期的脉搏跳动：结构性大规模失业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为的是给“适度的”和经济周期性的（暂时的）失业让位。失业者已不再成为受马尔萨斯主义威胁的“过剩者”，而是一支“工业后备大军”（此系卡尔·马克思用于经济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名称）。

在相对稳定状态最牢靠时期，早先对技术进步所抱的乐观主义情绪又回到变得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意识中。铁路交通的发展简直可以说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进行着，不久以后，几千公里的铁轨就贯穿欧洲各国。火车机车和车厢的建造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世界博览会不断展示新的科技奇迹。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发明了电报机(1837)，约翰·菲力普·莱斯

(Johann Philipp Reis) 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 发明了电话机 (1861/1876), 露易斯·雅克·达盖尔 (Louis Jacques Daguerre) 发明了摄影术 (1839), 尤斯图斯·冯·里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发明了化肥和浓缩肉汁 (1864), 卡尔·冯·林德 (Carl von Linde) 发明了冰箱 (1876),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发明了留声机 (1877) 和电灯 (1879), 维尔纳·冯·西门子 (Werner von Siemens) 发明了发电机 (1866), 海因里希·赫兹 (Heinrich Hertz) 发明了无线电通讯 (1887), 哥特里普·戴姆勒 (Gottlieb Daimler) 和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 (Karl-Friedrich Benz) 发明的内燃机和汽车震惊了世界 (1886)。化学工业与电气工业诞生了。1889年, 为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 按照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 (Gustave Eiffel) 的方案建成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铁塔, 作为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纪念碑。人们谈论着“19世纪的胜利”, 例如自然主义者并靠拢社会民主党的诗人卡尔·亨克尔 (Karl Henckell) 于1886年用他的诗歌恰当地歌颂了这些胜利:

没看到神秘的力量在升起,  
人的思想在奋力?  
一条船儿顺着神圣之流漂至此地,  
承载着未来奇迹游戈。

热切的渴望在大脑中膨胀,  
新时代的画面中电在闪光,  
假如蒸汽不再是传动皮带的主子;

假如以廉价的非凡之力,  
人人都能轻易解决生计



幸福便不再是梦想——祝福你，维尔讷·西门子！

这首令人惊愕的生日贺词勾画了当时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情绪与意识，这种进步不仅是以工业基础的拓展，而且也是以资本主义人力资源的相对“驯服”为依托的。正在形成之中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不能完全摆脱在技术上已缩简的资产阶级的拯救信念，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在滑向超出真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和经济“价值”的实际范畴基础之上阐述他们对立性的社会观点（包括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的，不再为致力于解放而对此采取拒绝态度。

当然——正如以今天的观点看来，社会民主党之前的社会反抗运动才明显具有倒退和破坏作用——过后要求他们具备历史的超意识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另外，他们只能在他们的经验及其“主体意识之间的”诠释范围内活动。他们与大的社会反抗运动形成极为成问题的差别，即虽然一方面同这些反抗运动前现代时期的目光狭窄已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也不再赞同这些反抗运动在原则上对资本主义以自身为目的的做法采取的拒绝态度，这一差别再加上他们自己在表面上以弑父方式来反对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出身——这些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存在缺陷的“秘密”在1848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已不可能再成为批判的主题，便被保留了下来。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必须把单纯减轻社会贫困的巨大压力直接理解为负担的减轻，就像著名的“疼痛的减轻”，它只是相对地并且从负面来表示一种好转。但假如不考虑这些限制，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这种减轻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同时是否还有作用相反的感觉和经验——可以说是“驯化的疼痛”。由于工业革命的展开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状态毫无疑问带来了普遍的，也就是生活水平静态的（相对

的)改善;假如人们看到是从什么样的最低点来衡量,就会知道这是种技巧。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他从一开始就为此进行辩护的(现代化-实证主义的)分析中,把这个事实描述为即便不是一个纯洁无瑕的,也是一个在根本上有积极意义的事实:

“大多数产业工人经常在同时代最低生活标准线附近徘徊,这仍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业革命在1849年之后的时期中取得的经得起长期考验的成功经验不仅包括名义工资的直线上升,而且也包括1873年危机之前实际工资的日趋稳定,尽管这一切受到经济周期造成的维持生活费用波动的影响。决定性因素是:当(1815-1848年德国的)前三月时期的贫困化逐渐消失时,并没有出现同样程度上新的工业贫困化……截止至1868年,工资翻了一番,到1873年的23年中甚至增加了两倍……”(Wehler, 1995, 第144页)

如果说尽管工资增加了一倍和两倍,但工人仍旧徘徊在“最低生活标准线附近”,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奇特的改善呢?只有从已进入内心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盲目的结构变化过程的“必然性”的立场出发,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些市场经济本身在进步的工业条件下和积累的迅速扩张过程中给社会造成的明显损害之外的东西。韦勒本人引用了仍然长期存在的工人在患病和工伤造成残废(一个由于缺少防护设备经常出现的现象)时毫无保护性措施的状况,认为这种状况与一生中较高工资阶段的短暂期限同样是一种限制性,“直到58-68岁之间的、日渐虚弱和早衰的工人降至按日付酬的临时工水平”(Wehler, 出处同上, 第146页)。与此相比,对于19世纪下半叶“穷苦劳动者”为工业高涨

做出贡献的奖赏所作的结论性总判决相当奇特：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与前工业的结构性的就业危机相比被证明最终为数百万人创造了新型的生存机会，那么这种情况的确——恰恰在它的初始阶段——也是同极度的负担联系在一起。”（出处同上，第146页）

首先，这里再次把（所谓由纯人口增长引发的）“前工业的就业危机”在表面上同工业的就业可能性进行了对比，而没有把两种过程的交叉部分考虑在内，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初的推进本身造成的前工业生产直接的和间接的崩溃。人们不能把处于工业革命潜伏期过程中大众绝对贫困化的半个世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不知为何不属于此列”就一笔勾销，而且全然未顾及的是，一种社会性自豪感的原动力就是不受外来影响支配地去“就业”。其次，很难理解的是，“极度负担”和“早衰”如何开辟“新型的生存机会”？而且更费解的是韦勒自己在此之后重新传播社会史的素材，这些素材将从根本上表明“市场经济造成贫穷”这个题目对于1850年以后的时期也是正确的。

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总是根据以前的经济业绩来观察意识形态的发展前景：如果对谋求解放的抵制行动一类的其他途径和立场连想都不愿再想的话，那么继续推行根本上的无理要求便只要根据少得可笑的一些非根本性改善就能够被重新解释为“一个机遇的开始”。韦勒的语言规则使人回想起与更早的英国工业化有关的关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生活水平”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同样在一种值得怀疑的（在阐述方面经过过滤的）“客观性”的假面具下，达成了为此辩护和迂腐的一致意见。爱德华·汤普森与这种建立在不可靠的猜测基础上的、随体制之大流的一致意见进行了论战：

“统计数字的平均值与人的经验朝着相反方向运动是非常可能的。数量因素方面的人均增加值会同时随着质量方面受到很大损害……而出现……我们以工商业和采煤业为例，那里的实际工资在1790~1840年期间是上升的，但付出的代价是增加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以至于那些养家糊口者还不到40岁就已经完全‘累垮了’。这在统计数字中呈上升趋势。受害的家庭会更加体会到这种现象是在走向贫困。”（Thompson, 1987/1963, 第227及下页）

汤普森这里跟韦勒（“累垮”）一样部分地阐述了社会“蓬勃发展”中存在同一类局限性，但却是用另外一种不太肯定的观点。从总体上看，在1850年以来工业相对稳定时期中，市场经济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仅仅在于制度的变化过程仁慈地放弃了直接的社会毁灭和将人饿死的做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恩赐是相当可怜的。

这绝不仅仅关系到吃、穿和住这些直接生活需求的标准。在劳动时间、童工等问题方面，尽管由于（密度已浓缩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劳动日“降低”到了通常的10~12小时，也尽管在这个时间内有一些法律限制，但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在这个时期还远没有达到中世纪的标准。甚至与19世纪上半叶困苦的几十年相比，社会独立性的余地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被大大地缩小了，这就是在那些“黑暗的魔鬼磨坊”里为了实际工资的一点点提高而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不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威胁。19世纪下半叶，当工业革命像雪崩一样扩展开来时，欧洲的资本主义距离可以勉强说得上广大群众享受到社会福利的状况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微弱提高令人难以置信地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提高，但这不仅是由社会外部影响决定一切的代价换来

的，而且还带有深深的文化裂痕的特点：连同独立的社会反抗运动一起消失的还有旧时的农业—手工业悠闲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能力、文化的自发性、内容丰富的无为思想和地地道道的梦想。即使这种悠闲文化也没有在社会自决权和自我认识的环境中得到继续发展，而是被消灭并逐渐被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所取代。

被活动与悠闲贯穿始终并以这种文化构成的有生之年被分拆开来，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作用范围内的抽象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作为有生之年中废弃物的可怜的、只是附庸的“业余时间”，在这种范围中，文化的自发性开始向消极的和补偿性的商品消费的“物质化”方向发展。当然，只要商品消费继续局限于满足那些基本需求，那么这种转变还不至于使别人眼馋，绝对贫困仍旧是关键性难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飞跃发展，文化也确定了发展方向。

且不说外来因素支配的文化裂痕和继续郁结的社会困境，这种困境仅仅从一种绝对的灾难演变成为一种相对的、属于正常的生活灾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的企业经济合理性之间固有的矛盾仍然继续存在，丝毫没有减弱。这一矛盾已进一步加剧，并只能通过生产和市场持续不断的扩张得到化解，以求重新在更新的和更高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因为提高生产率、产品降价、开发新的消费者阶层、增加生产与吸收新的劳动力的周期不能永远在一个生产行业持之以恒。某个时刻肯定会出现市场饱和，也就是说，总会出出现代用品供购买，而动力就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下一次由于竞争而被迫提高的生产率都再次无情地解雇比新聘需要数量更多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与“价值利用”的内在界限之间的根本性难题有着卷土重来的危险，每件产品的“省工”与市场的扩张关系之间的过度补偿机制也面临逐渐消失的可能性。如果说积累的运动并没有因此中断，那么

只是因为工业化过程是从一个生产行业跳到了另一个生产行业。纺织生产产业的巨大“结构性断层”只是后面无数个断层中的第一个。当然潜伏期越来越短，因为当时的工业基础日益宽阔，关联日益紧密，同时增长的动力日益增强。盲目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一种无规律的和双重性的循环周期，一方面是经济周期的动荡（“相对危机”），另一方面是结构性断层和强制的“结构性适应”。

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工业滚雪球式体系；它现在也只能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而同时也几乎可以断定，在它的逻辑原理中潜伏着的崩溃危险仍旧存在并且无法消除。任何一种滚雪球式体系最终都注定崩溃。资本主义的座右铭却总是这样讲：此后的事我们管不着！只要眼前的事还在“运转”，烟囱还在冒烟，那就无需为未来头疼。滚雪球式体系暂时还能像一场行将过去的雪崩一样得以遍及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一时在视野中还看不到一场新的绝对的危机出现的征兆。已沦落为给一个阴险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径当帮凶的人们将从现在起在一个多世纪中就像是在一场历史的狩猎中被市场经济追赶着，注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总处在一种永远不能安宁的状态中：更快地改变思想，更快地转变方向，更快地工作，更快地吃饭，更快地消费，总要不断适应新情况，适应，适应。

## 民族帝国制

---

当 19 世纪行将结束时，资本主义实现过程中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彻底改变了世界。通过专制政体的统治、自由主义的上升和纪律教育的运动使得市场经济得以具体实施，在经受了市场经济具体实施带来的长期冲击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充满血腥和灾难的历史现在开创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的帝国制。在一种有着众多分支的工业私有制资本主义基础上，出现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取代了建立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农业—资本主义、手工业强迫劳动和纺织生产中中转经销业基础上的王朝官僚主义。在战胜法国并且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随着 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种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欧洲“强国”中得以完成。

在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内部，正在发生一个奇特的同质化进程，这个进程与社会性的相互适应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生活水平当然是不能强行一刀切的，但所有社会阶层都必须统一参照一个抽象的经济“利益”的共同基准体系，这些抽象的经济利益已经把作为社会的自然基础的资本主义范畴作为前提条件，并通过同等抽象而且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越过去君主王朝结构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基准体系得以补充完善。这一发展使得自由主义

的企业界与当时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当时在德国至少形式上仍然存在）之间越来越弱而且并非总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完全消失了。

“……一方面，1849年之后那些最重要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德意志国家一步步转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些在法律上、政治上和行政上与独立自由的企业界对立的、可笑的限制得以废除。行政当局明显失去了往日狂妄的监护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转而采取一种合作的、甚至是直接促进现代化经济利益的态度。……另一方面，无数企业家在革命年代学会了重视强大的国家。它们的机制为：从管理、裁决直到军队都被看做是同无产阶级进行对抗的最可靠的支柱……这一喜爱国家的转折点被政界的精英们暗自高兴地注意到了……”（Wehler, 1995, 第120页）

早在帝国成立之前，民族自由党就从自由德意志进步党产生出来，民族自由党行动的座右铭就是“从统一到自由”。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民族统一应高于一切，国家资产阶级的“自由”和通过立宪（议会）约束官僚主义政权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形成才能逐步得以实现。为了应付抗议浪潮，当所谓的国家资产阶级“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游行自由对于反抗运动来说几乎得以成为构成现代法律体系惟独的一些进步特征时（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以此可以把抗议活动转引到一些无害和无效并且与公民权相关的形式进行），恰恰是这些权利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最不重要。这样，人们可以等待，直到民众的驯化更加长足进步，民族意识更加根深蒂固。

在这个意义上，1892年民族自由党人的《科隆日报》在慢条斯理地回顾1848年形势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当中不少人本来就是共和派的、醉心于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只是由于俾



斯麦和那个伟大而且出色的皇帝才在思想上转变为理性的拥护君主制度者”（转引自：Schulz, 1976, 第 286 及下页）。重要的看来只是，民族的统一是在国家机器掌握了更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样一种经济气候下实现的。李斯特曾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例如一项保护关税政策，原则上不一定绝对不可能。

正如君主王朝专制主义在经济上不得不向新工业资本主义这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投降，旧的国家机器和工业企业界不仅在一种社会学意义上互相靠拢，而且还在市场与国家间形成了一种与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相同的、但已有所改变的资本主义关系。由一个仍很粗糙的、没有精细分类的资本主义从专制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社会等级结构明显解体了，为了让位于一个社会的万有引力空间或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决定的种种机制和社会范畴的一种“力量对比”。

君主王朝专制主义及其贵族领袖人物们面对他们自己在一个盲目进程中创造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也放弃了保留制度的条件和要求，尽管“封建等级的自负”与旧有的社会文化模式仍将长期存在下去，不论在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时代，还是在英国和法国这些西方民族国家都是如此：时至今日，社会等级观念恰恰在英国备受精心培植，欧洲上层贵族以工业和财经资本主义的人物形象继续苟延残喘，以使用与时代不相符的那些滑稽可笑的模仿作品来满足家庭妇女的梦想以及同属此类的彩色报刊登载的需要。作为旧时社会反抗力量并以解放为目的的反现代派连同它提出的社会自制权要求一并被血腥地扼杀，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在资本主义职业范畴中思维问题的“工人阶级”，其代表形式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当然还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也同其他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一样，仍然存在着农业和（建立在部分自给自足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产业部门。即使

在为市场进行的各种生产中，工业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中根本不占优势，只有英国是例外。

1910年前后基础产业中就业者的比例

单位：%

国家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英国	9	54	37
法国	30	43	27
美国	32	41	27
德国	34	38	28

资料来源：经济学小词典，转引自：Schäfer，1989，第76页。

除农业之外，服务性行业的高比例是不能与后来由于“邮政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第三产业”的扩张相混淆的。直到进入20世纪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产业令人吃惊的规模都一直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而形成的，大批人被滥用来作为“高收入者”的仆人而从事私人侍从、家庭女佣、女厨师等职业，这些人被迫从事这些工作，因为除了被饿死以外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即使在中世纪全部人口中，这种仆人所占的比例相比之下也小得多。直到20世纪20年代，全欧洲的中等级别官员和职员家庭中雇佣一个女佣人和/或女厨师也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她们大多被安置在家中一个破旧的小房间里。在第三世界和人类大部分地区，这种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习俗就像童工现象一样直到今日仍没有消除。眼下在西方国家中，这种侮辱人格的劳动形式又卷土重来，即使规模要小于从前。

直到20世纪初期，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在各地均已成为充满生机的主导力量，构成了社会中主导继续发展的领导产业。在根本性的反抗运动被镇压和扼杀以后，社会矛盾虽然继续存在，但

却包容在社会的一种新外壳之中，这种新外壳使得各种行业的利益之争得以协调，同时把它局限于目前工业已在实践的生产方式已经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那些形式上。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参与其中的社会团体、党派、意识形态、利益、愿望和目标设想目前都与工业资本主义积累这个惟一的整体结构联系起来。于是，一个整体的、从根本上不再存在争议的基准体系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也就是工业的滚雪球式体系及其民族国家的疆域同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构成了很大的区别。

正如货币使用的结构作为面向各种行动者的社会“机器”在这个历史时期已经独立，国家调节这一对应结构现在也就相应地具备了自身特有的规律性。围绕着调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内部竞争和联合成国家的各民族之间的外部竞争，恰恰由于已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此方式得以大规模扩张而赋予国家和它的国家机器一种新的意义。不仅是跨越工业化进程中所有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自由主义与旧的国家机器两者的相互靠拢赋予了这个国家新的意义。工业扩张本身出现的经济问题、它的条件以及结果甚至也使自由主义越来越倾向于重新给予国家除了作为“龙形海怪”的恐吓作用以外的干预社会和经济的权力。

从某些角度来看，在社会经济全线获胜的自由主义企业家、经济政治家以及部分思想家因此能够从国务活动中赢得更大的利益。另外还有保守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试图在年轻的工业社会的土地上重新表达他们在旧时对国家的热衷，以便重新在这个环境中赢得优势。随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交融，自由市场的僵化教条也日渐衰弱，即使以往专制主义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君主）国家的要求自然也不可能再有效了。工业民族帝国时代的整整一个世纪成为了一个面向工业竞争的、新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时期，而且这个国家干预主义的程度还将一浪高过一浪。

## 祖 国

在经济的崩溃由于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展开而得以避免以及“穷苦劳动者”最终被用纪律稳固在“抽象劳动”之中以后，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得以重新思考“社会问题”。如果人们希望在未来可能出现危机时不再重新陷入类似的境地的话，那么19世纪上半叶从普遍的悲惨境遇和大规模贫困化得出的经验最终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归纳总结。因此，1850年之后已逐渐站稳脚跟的自由保守主义比“古典”时期的亚当·斯密、边沁、马尔萨斯和他们的合作伙伴更倾向于让国家承担某种社会责任，这里当然是指发挥“龙形海怪”的恐吓特点，也就是和它的镇压职能密不可分地掺和并联系在一起。

为了在经历了转轨危机之后仔细考虑国家的职能并且重新塑造它的形态，自由主义同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改造后已改邪归正的、当年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代表人物的再婚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的相互靠拢或者甚至是融合，在欧洲所有国家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但堪称典范的却是德国。在这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迟到的形成是“从上面”，也就是由旧的君主王朝政权自己来贯彻实现的。德意志威廉二世帝国因此摇身变为这个国家新兴资产阶级眼中的先锋派。这个“龙形海怪”日后将防止危机的发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方面满足资本的奴隶们的要求。光彩照人的市场自然规律性超越旧的贫民窟-监狱-体系，通过一个由国家管理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得到补充，尽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永无止境的、固有的扩张能力的著名“萨伊法则”，但人们私下里已经不再完全相信市场的自然规律性了。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相应做法是，维护专制主义合法地位的那些官方理论曾带有的那种家长制专权做

法又被重新拾出并粉饰一新。为了能够理解新的发展阶段中这一复兴现象，有必要进行一下简短的重述。

事实上是专制政体的官僚主义本身开始把百姓们变成了金钱的人力资源，直接和彻底地把劳动力变成了工具。任何一个自发活动，任何一个反抗行为均遭到无情镇压。专制主义这方面的奸诈在于，与从前所有政权的统治情况相比，它把更大的干预权力和它建造的镇压机器伪装成君主父亲般的预防措施与慈祥关怀。“臣仆”则几乎应以家长制社会中至尊者的未成年孩子的身份出现，这些至尊者个人首先是代表，其次是体现慢慢苏醒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俄罗斯一些著名的小说中，例如在屠格涅夫 (Turgeniew) 的小说中，地主的确常常非常随便地把他们的农奴称为“孩子们”]。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的阴险却狡猾得多。它借用“价值利用”盲目和系统的实施作为时机，让任何个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于某种所谓的“社会自然法则”并把它冒充为“自由”。专制主义家长式的监护遭到抵制，这就有利于个人以同样的拜物教式的、当然得到继续发展的并已成为目的本身的原则的名义进行“自愿的自我克制”。由于受资本主义标准这道铁幕的限制并被送进商品生产这部运转的社会机器，个人应该“自己承担”在社会中被这部机器的齿轮压碎和消灭的“风险”，以不失使自己提升为这部“魔鬼磨坊”中机器的主人的“机遇”。家长制做法被落实为国家的“教育任务”，通过强制教育和洗脑，使人把制度的要求转化为内心生活。所有拒绝这些无理要求的人，就会像我曾指出的那样，会像从前受到专制主义迫害一样，受到自由主义的迫害。

根据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这种阴险地对待社会的辩证法现在要求一种资本主义的综合观点，这种综合观点一定要考虑到“风险”会过于剧烈上升并可能成为“制度的风险”这个已被工业革命的转轨危机证明的现实问题。自由主义必须额外涂抹上一层家

长制专权的防护油。或者，正如德意志帝国建立者、极为保守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侯爵（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喜欢表达得那样：人们不得不给国家在药方中增添几滴社会福利之油。（转引自：Adler, 1897, 第41页）这种新的家长制是不会满足于只进行意识形态说教的，而是必须要建立一套致力于社会预防措施的现实机制，哪怕只是保障（须下定义的）最低的生存标准，以驱走未来崩溃和反抗的幽灵。

但是，这种监护的直接人格化在目前已不再可能采用旧的专制主义方式，尽管在德国至少还有“威廉皇帝”这样一个合适人物可供使用，在满足了社会最低生活水平的气氛中他的可笑行为已不再引人注目。新的家长制不仅更迫切需要制度化，而且要比旧的家长制具有一种更为抽象的特征，也就是要体现出新的民族国家的“抽象的普遍性”，并要正式在法律中固定下来。在这个“龙形海怪”的特征中，这一点经过修改再次得到强调：如果说现代的国家机器原本在霍布斯的书里被比喻为一种外形像龙的怪物，后来在机械主义的世界观中又被改称为市场机器与暴力机器或与“教育机器”的对立统一体，那么，此时它开始使用“祖国”这个称号。随即对社会国家感到高兴的人类把机械官僚主义这头怪物当成了充当监护人的继父，除此以外，这一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当时不愿抓住机会，把刚刚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和正在形成中的、但长期以来已经接受资本主义根本性要求与社会规范的工会至少部分接纳进建立在“龙形海怪”基础上的这种新的家长制社会福利国家的萌芽阶段，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盲目与自负。边沁当时已具有相当程度的预见性，但即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尽管他的智力水平一般，他的最后结论甚至都没有被自由保守主义完全理解。

但是，理解问题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对于这个时期自由保守主义的一般精英们来说，对人力资源

进行调理虽然与承认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具有同样的必要性。然而，他们难以想象的是，由过去自由主义的工人联盟中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组织会成为国家的正式组成部分，参与管理资本主义，甚至共同领导资本主义。这在那些体面的先生们看来就如同和他们的男仆及女佣同桌吃饭一样荒谬。可是直到20世纪，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才被承认为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参与组阁；在联合组阁的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担任好似游戏场地的劳动部的部长，就像后来必然由妇女担任家庭部部长一样。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社会主义党派参与组阁却只有一次，而且是在法国：1899年，社会党议员亚历山大·艾蒂安·米勒兰（Alexandre Étienne Millerand）以个人身份（不是在联合政府中）在自由保守党内阁中任商业部长（因此随即被开除出党）。

从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和自由保守主义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由于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存在错误认识，而不愿给予继续被违反时代潮流地看做“阶层”的“工人阶级”任何独立的（哪怕是一种基本与社会制度意见一致）的代表权，并最多在社会与政治的“一家之主”专制下把广大的人力资源当成家长制关怀的对象来对待。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俾斯麦虽然间或出于战术的考虑在幕后同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调情，目的在于反对自由党人（这里再次表明，由自由主义演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19世纪中叶是如何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成是战术上的一群阴谋之辈的）；然而，自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于1875年在哥达联合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以来，“铁血宰相”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社会民主党看成为国家的敌对力量：“这一新运动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加强政治力量和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上，而卡尔·马克思已

经提出的革命设想却并未涉及，这些俾斯麦却未注意到。”（Loth, 1996, 第 59 页）

为了对付主观中想象的、并已被列入纯政治 - 国家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不再根本拒绝工厂体制的观点）中的政权被推翻的危险，俾斯麦发明了一套与社会民主党势不两立的迫害与镇压政策。因此在 1878 年，俾斯麦在帝国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但这项法律 1890 年又被废除了。在起初还犹豫不决的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赞同下，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会、新闻机构和任何“社会主义的煽动”均被禁止（诚然并未让警察进行过多干预）。

俾斯麦政策的出色之处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多地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引进新的立法措施，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非常法，正如他在那个增添“几滴社会福利之油”的说法里对此所昭示的那样。德皇威廉一世与此相应地于 1881 年 11 月 17 日在一次由俾斯麦亲自宣读的议会演说中，用符合君权神授的夸张口吻宣布道：

“已在今年二月我们就表达了我们的信心，即根治社会弊端的方法不仅仅是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破坏活动，同时也包括积极促进工人生活的幸福。我们把重新提请帝国议会关注这项新的任务看成是我们皇帝的义务。假如我们今后成功地形成一种意识，应给祖国内部的安定提供持续的新保障并给那些急需帮助者提供更大的安全感和他们所要求的大力援助，那么我们将未来会以更加满意的心情回顾上帝所赐予我们政府的成果。”（转引自：Diehl/Mombert, 1984, 第 185 页）

俾斯麦采用了传统的两面战略：他的政府一方面用旧时“龙形海怪”式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采取已成为“经典的”方式将



自由保守主义家长制的社会福利国家想法付诸实践，并自上而下地在社会福利立法中进行一场“白色革命”，这种社会福利法后来在 20 世纪成为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原型。俾斯麦政府于 1883 年建立了法定的医疗保险体系，1884 年建立了法定的意外事故保险体系，1889 年建立了法定的养老保险体系。

民族自由主义者和其他此时已四分五裂（并由于向保守主义靠拢而在意识形态上被削弱）的自由主义党派与团体，无论是对于高压政策，还是对于社会福利政策，在这两方面都采取了非常典型的态度，宁可作为缓冲派和犹豫不决的观望者，而没有从根本上持反对立场。在取缔党派问题上，只要他们自己没有处在执政的优势地位并且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威胁性紧急情况出现，他们就会对保守主义的国家机器抱有少许的不信任。在这种温和的局面中，他们宁愿接受企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上“一家之主”的立场。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他们的态度与他们的传统相吻合，理所当然地更愿意将俾斯麦的倡议至少加以淡化并阻止过于强大的国家保护。自由主义者也确实成功地限制过本来已规定的用于社会保险的帝国财政补贴，“工人的代表权……也彻底被一笔勾销了……养老和残疾保险方面被迫削减的资金则更多……工人必须要达到 70 岁，并且要连续 30 年不间断地交纳了保险费以后才能享受养老金；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工人能够符合这一条件。”（Loth, 1996, 第 71 页）

俾斯麦自己的主导思想当然也更多的是强权政治，而不是博爱主义。他在 1880 年就确认，他计划中的社会福利立法应“在大批无产者中制造保守思想，而这一保守思想可以使人产生有退休资格的感觉”（转引自：Loth, 出处同上，第 68 页）。权利比“感觉”要重要得多，哪怕只是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实际可能性并非如此。首先是俾斯麦的社会福利立法取代了雇佣工人自己决定、解放性地自己管理的“互助会”的所有方案。自现代

“福利国家”开创以来，社会保险的保险费均由国家强迫征收并由国家监督管理。企业和国家参与的保险费筹集是以剥夺有组织的自发行动和合作的权力为代价的，即使只在次要方面。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一种家长制的精神来宣传来源于普鲁士的一种“社会福利君主政权”的妄想。这些思想都是长期以来在德国酝酿炮制出来的。正是那些保守主义的经院派人士，按照处理重大的转轨危机的传统方法策划出一种社会福利的国家干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变种。波莫瑞州的地主、普鲁士的法学家约翰·卡尔·罗特贝尔图斯-亚格措（Johann Karl Rodbertus-Jagetzow, 1805-1875）采取一种（甚至受到马克思赞赏的）介乎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之间的中间派立场，他对资本主义利润以及基本养老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并要求按照国家乌托邦设想的模式建立调节社会福利问题的经济“中央政府当局”。

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中，与犹豫不决的老牌自由主义相比而言，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势头因为更习惯于同家长制式国家干预制度的新命令打交道也就逐渐趋于保守。当然这种倾向决不仅仅限于德国，而是或多或少地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俾斯麦所采用的镇压与国家社会福利家长制两面战略的原本样板在英国和法国，无论是在思想史方面还是在社会政治方面，也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在英国，雇佣工人各种形式的利益组织均已被 1799 年的“联合行动”所取缔。这项禁令由保守政府于 1819 年再次颁布，直到 1824 年才有所松动，于是温和的“工会”得以成立。尽管如此，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还是遭受到了无数次的镇压与刁难。同时，作为对工业化恐慌做出的反映，很早就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英国社会福利家长制。晚期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与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 从主子与奴仆之间忠实与正直的相互关系这种旧时贵族价值观的立场出发, 咒骂“拜金主义这个可悲的宗教信仰”, 直到 20 世纪, 他都是主张镇压的、反对解放的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反现代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人物。卡莱尔把“穷苦劳动者”试图推翻政权的暴怒的原因归结为自由主义的工厂主缺乏领导管理人员和关心。

“一切暴动和民众愤怒的爆发原因何在? 咆哮, 像是一个聋哑人在愤怒和痛苦中发出的无声呐喊: 在智者看来, 像无声的哀求: ‘指引我吧, 支配我吧! 我无用, 我可悲, 我自己已不能指引自己!’ 确实, 在所有的‘人权’中, 无知的人在智者的指引下, 友善地或是以武力被带领走上正路的权利是最不能转让的权利。假如自由具有某种意义的话, 那它就意味着享有这种权利——这也包括享有一切权利。”(转引自: Adler, 1897, 第 9 页)

在这种独特而又厚颜无耻的思想中, 卡莱尔呼唤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工业—贵族”, 即所谓的“工业首领”——这个概念在英国已成为了一个时髦词。工业贵族应配合“国家对下层阶级的资助措施”让“竞争中的高雅风尚和对所有职员的热情关怀”发扬光大。卡莱尔从此是“第一个发出要求现代职业封建化呼声的人……”(Adler, 1897, 第 11 页)。在 1868 年以及 1874—1880 这些年里, 著名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本亚明·迪斯累里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便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他曾说出了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 “他们相当于两个民族, 在他们之间没有那种亲情感, 在习惯、思想与感情方面彼此非常陌生, 他们就像是不同地域的儿子或是不同星球的居民。”(转引自: Adler, 1897, 第 18 页) 所以, 迪

斯累里早在他的年轻时代并在俾斯麦上台之前的很早时间就曾宣扬过“社会福利君主制的原则”。他在担任部长、财政部长和最终担任首相期间，曾于1867年和1878年颁布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工厂劳动保护法律。

在法国也产生了完全相似的发展趋势。资产阶级革命立法机构的国民大会于1791年就用“勒沙普利埃法”（Loi Le Chapelier）禁止任何工人联盟的活动，这项禁令到1864年才正式撤消。当“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被推翻和1848年大革命以后，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 1808~1873）掌权并作为拿破仑三世加冕为“法国皇帝”（第二帝国）的时候，他也同样推行一种国家干预的两面战略，在此推行过程中进行过大屠杀和疯狂迫害。“开始对所有业已形成的工人联合会进行征讨……于是不仅他们所有的政治联盟组织，而且他们纯经济性质的合作社，其中还有很多兴旺的消费协会和一些生产合作社均成了‘拯救社会的专政’的牺牲品”（Adler, 1897, 第32页）。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在他登基之前也曾制订了一个保守的“社会政治纲领”；他也把卡莱尔提出的工业贵族奉为一种理想……“一方面对工人采取纪律与监视措施，另一方面改善工人的物质条件：这是一种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s）的对内政策中从来没有否认过的思想”（出处同上，第29页，第34页）。1850~1870年期间，在法国因此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开始建立现代工业的社会福利国家，这些措施使人回想起曼德维尔关于为了解决“就业”而鼓励“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必要性的那些玩世不恭的论点，同时使人开始预感到20世纪国家将推行的经济景气政策：

“拿破仑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行动……就是他致力通过修建一系列公共建筑……来解决失业问题……15年内，仅仅

为在首都修建公共建筑就花费了 15 亿。在里昂、马赛和波尔多也大致如此。大规模推行的这一措施收到了各种不同的重要效果：不断有大批‘人手’得到了支付长期工资的工作，而且工资有了提高的趋势。劳动热情由于建筑业扩张的刺激而被激发了起来……同时也要注意，……由于资助的款项数额巨大，围绕这些……新建筑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投机和使帝国走卒受惠的现象……此外还提供修建工人住宅的财政资助，但只是零星可见；慈善机构得以重新组建，其中增加了由国家资助为老百姓修建的浴室、为工人子女修建的托儿所和为残废工人修建的救济院。”（Adler, 1897, 第 33 页）

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虽然显而易见地大力推行了高压政策，但这一法令被撤消了，19 世纪下半叶，从资本主义政府通常做法的框架中诞生的新的家长制福利国家制度也一样不奏效。令人尴尬的是，欧洲的现代福利国家原本是由一种极端的保守思想及其强权政治目标孕育出来的。直到今天还可以从民主福利国家的体制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出身的痕迹。资本主义制度就其本质来说也只能带来极度国家集权的、并始终与镇压和监视相连的、甚至在个人交纳了自己应付的那一半保险费后仍然具有资本主义国家规定下来的施舍形式的这些种种社会福利恩惠；从这种社会制度中所能期待得到的“福利”看来也就算达到顶点了。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的这些开端是欧洲最重要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在德意志帝国最为有效，并且最为持久。在这里，福利国家与国家干预的思想比在西欧更为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中。虽然不像洛贝尔图斯（Rodbertus）那样极端，但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福利政策观点却走向同一方向。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是一个

由教授组成的倾向保守的派别，他们于1872年建立了“社会福利政策协会”，从他们这个协会中产生的建议对俾斯麦以及后来所有的福利国家的改革起了决定性影响。俾斯麦自己也以一种嘲讽和煽动的口吻把这些观点正面地解释和戏称为“国有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是国民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首创并鼓吹的。在一个国家集权的工业体系土地上，由家长制的精英们创造的独裁的“普鲁士社会主义”思想也毫不令人惊奇地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被左翼和右翼的现代化思想家们作为一个合法概念来使用。

尽管自由主义者决不无视关于体制风险和用独裁方式保证社会安定这些问题的讨论，但它也必须登上国有社会主义这趟时代的列车，哪怕它按照传统宁可选择制动器的角色。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是威廉二世时期组织上分崩离析的自由主义者的首席思想家，他阐述了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以及向国家调节的新的制度要求的适应过程。直到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亲自由民主党（FDP）的瑙曼基金会仍以“政治教育”而闻名。他本来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后为职业政治家，理所当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开创了一种进行道德教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1896年他联合起各色各样分散的自由主义派别建立了“民族-社会联盟”；把“民族-社会”联合组成的这个带有不祥之兆的概念作为党的名称并首先出现在自由主义的场景中绝非偶然，而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在很多方面，瑙曼都可以被看做是“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提出的这些思想试图取代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激进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1906年他在他的《新德意志的经济政策》一文中确认：“大约在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背离自由主义理论和不重经济的国家的趋势，并让位给那种被称为国有社会主义的观点”（Naumann，

1964/1906, 第 454 页)。璠曼作为自由主义者有保留地赞成这种倾向,但同时他也对老牌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抱怀疑:

“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大规模的、普遍性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场文化运动在近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从精神和物质上改变了欧洲……这不是一种强迫,但也不是一种保护!谁走运,谁就高升;谁失败,谁就进坟墓!谁打算培养经济界人才,谁就不能有同情心!……任何人都无权根据供求关系得到报酬。他走向市场并为自己报价:我为这个价格工作!劳动变成了投标商品。如果明天有人来,他可以比你更廉价地生产同样东西,那么你就可以走了,一旦有另一个人用更少的钱承接这份工作,你的劳动就失去了价值!……此处应看到经济自由主义完全不加任何掩饰的想法。供与求!你们这些孩子推行的方针就像交易所的股票一样忽涨忽跌!这种学说又怎么可能让情感充满希望,又怎么可能使它成为我们全部劳动体制的基础呢?……当时自由主义所进入的经济世界已经完全不是它今日可以找到自己位置的经济世界了。正如它以往的表现形式是当时年代里它基本原则的运用方式,那么只要自由主义还应该继续下去,它今天就必然带有当今时代的色彩……只有重新唤醒亡灵,只有对自身进行批判,它才能维持它的再生……”  
(出处同上,第 314 及以下数页,第 525 及下页)

自由主义为了能够与别人一起在时代精神的美茵河水里游泳,因此允许自己例外地对它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抱有些厌恶感。璠曼同样首先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把“龙形海怪”出于制度的必要性向“祖国”的变形看做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妥协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处在萌芽状态的国有社会主义思潮的靠近:

“归纳为‘社会福利政策’这个带有普遍意义标题下的东西是‘权利与经济’的一部分……国家政权作为它们的生产者和担保人登场。这里涉及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些干预对于保护弱小者是必要的。对于是用基督教仁爱的原则还是用国家的必要性来解释这种干预就事情本身来说都无所谓。干预的实质是认识到，仅仅摆出私有财产与自由劳动契约这两项原则并不足以解决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大量的法律关系……不，事情是这样的，必须公开承认：为了学习工商企业礼节学说的原理，我们需要国家的强制手段！在我们的纺织行业和其他男人所从事的职业中，还存在部分完全非人道的劳动时间，对妇女的剥削过重，儿童从事着缺乏任何保护措施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尽管‘八小时工作制’这个词是一个过于老一套的套语，但是我们人民的健康和道德文化要求保障今日大多数人身不独立的工人能够在职业范围以外获得多得多的自由。今后肯定也总会是事先预见性地通过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的保护措施，避免使最底层的雇佣工人陷入暴力行为……为了他们的缘故，法律规定的对工人的保护必须是一个长期行为……当德意志帝国建立保险体系之时，自由主义者曾多次投票反对……今天……几乎已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个民族杰作。它们是自由劳动契约的一个必要补充。”（出处同上，第496页，第499及以下数页）

如果说罔曼以这种方式使自由派的思想接近已发展成形的工业体系中这种新的国家干预思想的话，那么他不让任何人怀疑他本人也赞成这个独裁—家长制政体应属于这个范围。虽然他根据自由派的传统反对国家全面强制实行独裁，并要求（企业或工会的联合会以及根据它们之间的协议组成的）“自由组织”应该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始终比官吏机构领先一步”（出处同上，第



502页)。但这种社会经济的“自行调节”同国家干预的并行关系其实在边沁的理论中完全已有考虑，并且用精英设想加以丰富。瑙曼1900年在他的《民主与皇权》一文中便强调过独裁统治的“必要性”。

“贵族因素是在民主中完全自发地产生的……没有一种在大众中广泛产生的影响是不带有某种贵族气派的……世界上官僚统治势力到处均在增长，甚至在正与之进行斗争的地方也是如此……人们为了争得首席地位而争斗，社会民主党人也试图挤到前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历史就是惟一这样不断向上进取的范例。”（Naumann, 1949/1900, 第144页及以下数页）

在这位自由派首席思想家看来，一个“上等阶级”执掌“受到位居他之下的广大劳苦大众支持的”政权是完全理所应当的（出处同上，第146页）。极端保守的卡莱尔关于工业理想即“工业首领”的思想也在自由派人士的大脑里作祟。正如瑙曼的社会自由主义与民族-社会世界观那样，这种精英理论与威廉二世主义完全兼容相通。威廉二世主义从自己方面来说，从来不愿意放松福利国家制度与人力资源向独裁政治的服从两者的结合。当1888年老皇帝死后上台的威廉二世同俾斯麦在“社会福利立法”与“工人问题”上陷入争执时，最终于1890年把“铁血宰相”予以免职并撤消了他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威廉二世恰恰是以独断独行的专制手法做出这一举动的。尽管社会民主党得以合法化，但官僚主义-家长制的福利国家制度与高压政策的两面战略则没有任何改变。例如1899年威廉二世在一次访问他的领地卡蒂能时要求：“务必杜绝工人住所的条件还不如猪圈这种现象”（皇帝圣谕，Johann, 1966, 第82页）。正像这里倨傲而又宽容

地显示出的那种独裁精神那样，这位皇帝一年以前针对采矿业和其他行业的罢工向威斯特法伦的工业家保证：

“就像所有领导工业企业的人一样，你们也要密切关注我们社会状况的发展。我已尽我的权力之所能去帮助你们，使你们在经济困难时刻得到保护。去年……我曾庄严许诺，保护德国工人，保护愿意劳动的人。法律正在接近完善并将于今年提交人民代表。其中规定任何人——他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人，并意味着他打算如何去做——如果试图阻止一个愿意工作的德国工人去工作或者甚至鼓动他去罢工，那么都将被处以监禁。”（转引自：Johann，1966，第79及下页）

现代福利国家的开端不仅带有独裁当局和精英意识形态的印记，而且它的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用“穷苦劳动者”严峻的待遇改善状况来衡量一下就够了。在回顾以往时，“国有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瓦格纳仅仅确信的是，社会福利立法的成果可能使“居民变得工作效率更高了、更健康和勤奋了”（Wagner，1912，第16页）。这里讨论的并不是福利问题本身，而是如何用功能主义的眼光去评价“抽象劳动”这个社会镇压机器的用途问题。为了对此真正不表示怀疑，这个保守的普鲁士社会主义者在“下等阶级居民”问题上立刻陷入到一个极为熟悉的老自由派的信条中了，就像我们自曼德维尔、德·萨德、斯密、康德和马尔萨斯以来所了解的那样：

“我们不能向他们许诺能过上天堂般的生活，不能许诺一种虚幻飘渺的幸福生活——世上总会出现贫困，也许出现倒是好事，这事关人的教育！”（出处同上，第17页）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还谈不上市场经济“提高富裕程度的作用”，在附随福利国家初步方案出现了一些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也一样谈不上。仅仅从史无前例的普遍贫困到“正常化的”普遍贫困的这一步在民族国家的帝国阶段得以“成功”。令人难堪的是，即使在进入20世纪以及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扩张中，生活水平总还是没有得到明显提高。根据当时的消息来源获悉，俾斯麦帝国图林根的玩具制造工人的食物是这样的：

“它大多由端到桌上的各种做法的土豆组成。早上在喝用菊苣根制成的代用咖啡或‘稀薄的淡咖啡’时吃土豆。然后面包和咖啡再作为第二顿早餐。午餐是各种土豆食品，还有鲱鱼，或从肉铺再来点大油；最穷的人们吃不起鲱鱼，只好凑合着用腌过鲱鱼的盐水替代，称它为‘鲱鱼汤’。肉是极少吃的……晚餐又是喝稀薄的淡咖啡，或者从肉铺取来整锅的‘香肠汤’，他们把它称为水，因为曾经煮过香肠；这种水是不用花钱便可得到的，或只需花很少的钱，然后把土豆切块放进去煮。‘早上吃土豆，中午土豆汤，晚上连皮一起吃，——永恒的土豆’，一首诗歌中这样写道，诗中对他们一天的饭食进行了概括。”（转引自：Ritter/Kocka，1982，第262页）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描述过的、并从中推理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必然性的这种贫困状况产生的几十年以后，在已经取得进步的工业化过程中仍未消失，这种描述一字不差地得以再现！

但是“待遇已得到改善的”工人阶级的家政状况与生活方式几乎没有摆脱这种贫困。1890年柏林一个技术工人的餐单就使人在这方面无法抱有任何的乐观想法：

“豆类、土豆、面粉、面包和牛奶的消费很大。除了廉

价的——用于涂抹面包的，但不是夹面包的——香肠以外，肉类食品中，消费最多的是牛肉馅和肺，用它们来做肉丸子或是‘假兔子’（肉馅掺小面包渣或是小方块，然后用一点大油煎）。考虑到星期日和节日，平时生活就特别节省了。”（出处同上，第276页）

看来19世纪市场经济中提高福利的作用首先在于使老百姓不至于总是吃土豆和喝菊苣根制成的代用咖啡了，以便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逐渐慈悲地赐予他们这种了不起的生活水准。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如果总是必须反复听到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将令人厌烦，但可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报道。威廉二世时期的状况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个阶段已完全发展起来的欧洲的全貌。如果再把各个工业城市持续不变的恶劣居住条件一并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实际的改善少得多么可笑以及这样的状况使民众心灵中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生活得到保障就一清二楚了。

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没有能够使民众在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水准超过中世纪晚期；在闲情逸致方面的要求就更谈不上。甚至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事实上现在也只有“在虚幻飘渺的幸福云雾中”才能设想。

独裁的社会福利家长制在总体上是可悲的。但即使在世界上各民族之间展开竞争的背景下，以民族国家强权政治的形式出现的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以自身为目的的社会假面具变得越发抽象，并使首领们显露出来，而人力资源必须服从于这些目的的无情性却保留了下来。极端保守的（后来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1888~196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宗教修身演讲中所说的话可以作为适用于威廉二世时期的座右铭，同

时也不仅仅适用于德意志帝国：“我们德国人……学会了……为了一个打算扮演伟大历史角色的民族首先要做一件急需之事：艰苦地工作，挨饿和服从。”（转引自：Berthold，1960，第106页）

资产阶级文学知识分子自毕德麦耶尔派诗人路德维希·乌兰德的那些充满不可名状情调的作品以来没有根本性变化。他的诗人同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据说在世纪之交之际陷入了对宗教的陶醉，醉心于研究上帝的经历，在他集诗歌和宗教为一体的《祈祷书》中竭尽全力庄严地歌颂20世纪新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在乌兰德死后几十年以后，他于1903年从这个意义上写下了关于“饱受饥饿折磨的”德国中神圣的穷人的诗行：

因为他们比纯洁的石头还要纯洁  
就像失明的动物，才刚刚开始，  
充满天真，你的无限  
他们别无所求，只需一件：  
本来怎样穷，就让它穷罢了。

因为贫穷是内心的光辉……

穷人的房子就像圣坛的壁龛。  
里面的永恒变为了食物，  
当夜晚来临，它悄声转了一大圈  
又返回到原形之中  
带着余音慢慢进入。

穷人的房子就像圣坛的壁龛。

在这种近乎自由的和玩世不恭的内心喜悦中，不仅早期资本主义的多愁善感重新浮出水面，眼含泪水喂肥了自己制造的社会贫困化的感情预算；而且除此以外还暗示创造了一种新的“贫困的美学化”，不久以后它又突变为“武力的美学化”。恰恰这些像里尔克的诗歌一样怪诞的和追求内心感受的诗歌通过威廉二世时代的感情狡诈已经预示了19世纪下半叶将要发生的血腥的资本主义大屠杀和大灾难。

### 1871~1873年经济繁荣骗局与大萧条

老百姓完全听凭盲目的经济增长周期与危机周期的摆布，对于他们的贫困化和造反的深度恐惧成为1870年以后促使资本主义的精英改用国家干预办法的一个主要动力（尽管绝不是惟一的动力）。当工业资本主义自1850年以来的持续迅猛发展突然一下子被中断时，这种恐惧就更有理由了。1873年，工业化进程第一次大的高涨期便宣告结束。

这时，一种现象第一次以更大的规模引起人们的不安，这种现象其实早些时候也不时伴随着资本主义问世时的分娩阵痛而出现。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是一种工业的，而且是一种金融的滚雪球式体系。确切地讲：实际的经济增长某些程度上是以贷款的形式预先提前得以实现的。这一过程的实施者就是银行，它们把储蓄的钱和持有者暂时不用于生产的货币资本收集和集中起来。反过来总有工业企业从自己过去的利润中拿不出钱或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未来增值的投资。于是它们通过银行系统以各种形式借得货币资本，当商品生产成功地实现利润收益时，借贷的货币资本就必须连本带利加以偿还。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分析的那样，货币资本分裂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发挥作用的”企业经济资本，它推动生产过程并维持着反馈到自身的

剩余价值这种以自身为目的的状态；二是生息的“纯粹的”货币资本，它并不直接推动商品生产，而是出借给“发挥作用的”资本并因此得到它在以利息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中的份额。在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中，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一再相混淆或合为一体，因为从货币资本“抽象的”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利润究竟从何而来以及如何通过那台“美妙机器”不同部门的协调而产生盈余的过程是无所谓的。马克思不无嘲讽地对此说明道：

“资本被作为利息的，也就是它自身增值的、神秘的和自我创造的来源……因此生息的资本自动地塑造出这种偶像，即自我利用的价值，孵化出钱的钱，形式上已不再带有它形成时的印记……这种形式的货币已经成为潜在的自我利用的价值，并以这种形式出借……货币的特性已完全成为创造价值和产生利息，就像梨树的特性是结出梨一样……对于把资本描述为价值的及创造价值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种形式自然是天上掉下的一块饼，在这种形式中，已经看不清利润的来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同过程本身相分离——获得一种独立的存在。”（Marx, 1965/1894, 第405及下页）

问题在于，如果借来的外资预先提前产生的未来剩余价值日后并没有真正以更为有利可图的和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实际商品生产的形式出现，那么就可以使人强烈感觉到资本两种形式的区别，不管是因为“事实上投资的回收没有那么及时”（Marx, 出处同上，第361页），还是因为产品由于竞相降价的竞争和缺乏社会购买力而无法销售出去；或者是因为借贷的货币资本花费到了“不恰当”的用途上，（比如用于支付以前的债务或消费、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项目等等）。然后随之而来的最大

困难是：“发挥作用的”企业经济资本破产了，因为偿还不了全部贷款及利息；生息的资本这方面因此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并同样大多破产，因为在相应借贷数额的情况下债务人的崩溃也就是债权人的崩溃。这种事情在个别情况下属于资本主义的家常便饭；假如这些个案积少成多并形成浪潮，那就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危机。经济低潮时便存在这种危险，这种经济低潮可能以螺旋上升的形式激化成危机，如在错误地期待经济繁荣将持续的时候事先提前获取过多的未来利润，并用借来的货币资本大规模进行错误投资。生产资本原先潜在的危机总是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

19世纪的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上当然还是有些迟疑不定的，特别是在集法律财产和经营管理于一身的古典式家庭企业中，使用大笔贷款被视为是信誉不够可靠的。这种老式诚实的、同时也是愚蠢的信誉可靠性当然是已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的，而且患上了一种历史厌倦症。正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推动这种发展的主要代表中一个行将消失的阶层开始恼怒地意识到这个以自身为目的的怪胎的真实本质，同时另一个代表阶层正大胆和无忧无虑地前来接替。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描写一个老式汉莎同盟的商人家庭在当代陷入到破落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在主要人物身上的这种厌倦的初步认识在几个地方就有所闪现：

“人的出场、讲话、举止、作用和行动……并非被看成是同别人相同的和用以反对别人而想达到的实际利益的一种天真的、自然的和半下意识的体现，而被看成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人为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中，必须具有……极高难度的和耗人精力的高超技巧，而不是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参与感。”（Mann，没有出版年代，第474页）



眼下无忧无虑的新“名家们”即将登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波浪式发展，又出现了一个由资本主义的新贵和撞大运的人组成的新阶层，他们急功近利。随着从一开始对于家庭企业就无法胜任的铁路修建正式起步，到至此一直靠边站的股票业掀起了一个出乎预料的经济高潮，开始摆脱家长制家庭氏族的远古形式的企业创造出一个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类别：在股份制公司中，从信贷体系产生了一种企业经济本身的新模式。就像以前资本分裂成商品生产中“发挥作用的”资本和“生息的”纯货币资本一样，现在商品生产的企业自己分裂为由不行使职责的财产所有者（股票持有者）组成的一个与借贷资本方式类似的公司和一个不再与法律上的财产相关联的（以与工资挂钩的形式或少量持股参与）纯“功能资本”或管理。

对于资本的实际生产过程不行使职责的股票持有者参与“他们的”企业的形式完全类似于纯外在的贷款提供者，因此他们以股息的办法通过类似于生息资本的方式参与利润分成，当然不是以通行的利率来衡量，而当然是根据“他们的”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来衡量。与纯货币资本或信贷资本交织在一起的投机因素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生产资本自身。用股票可以赢得双倍收益，也就是除了股息以外还可以通过投机的证券交易获得可能的利润。股息是在一个经营年度的年终作为股东参与的真正的利润分成，得到一笔由股份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并按每股计算的红利。此外也可以通过股票交易中股票价格的上升获得利润。股市行情也就是交易所中股票交易的价格，它可能超过所谓的股票面值许多倍。

股息涉及的是已过去的事，也就是涉及的是业已结束的实际经营过程；股票价格关系到未来的情况，也就是关系到可能是非现实的期待与希望。当股市价格长期走高时，这种非现实的因素就总是值得注意。因为股价升高中预先支取的未来的利润尽管事实上已经到达，但是它们作为股息将再次分配或者用于新的生产

设施的再投资。股市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实际的经营利润同时出现的，完全就像是资本可以得到两次使用一样。从根本上来讲，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商的乐观主义本身业已资本主义化了，也就是已变成了一种“虚构资本”（Marx）。当后来的期望与随后发生的实际经济景况不相符得到证实的时候，这种投机性创造就变得困难了。交易所当然没有能力通过单纯股市价格上涨来持续制造虚构价值，而免遭“崩盘”（就是股市价格一跌到底导致大规模的破产）的报应。

这种危机早在向现代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过渡中就曾发生过，如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著名的“郁金香投机案”。当时在欧洲皇室范围内流行起“郁金香时尚”，以至于这种植物的球茎价格上涨，一开始本来是小事一桩。但不久后，投机商界预感到未来价格的上涨，于是歇斯底里地用几千荷兰盾或以数所房子的代价进行这种植物培育的交易，（一位从远洋航行归来的舵手还对郁金香投机一无所知，吃早点时，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吃掉了他的船老板的一个珍贵的球茎，据说差点被拷打致死）。这一过程绝不是仅仅从心理学角度可以解释得清的。这方面还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前提条件。因为在一种买与卖体系中，一件商品的价值并不直接等于反映在用货币体现出的价格上。价格面对实际价值可以暂时独立存在。每个人自然都清楚，一个郁金香球茎“实际上”没有一整座房子那么值钱。但是当投机大潮涌来时，一切现实的衡量基础都很快被遗忘。

在股票投机中，某些特定商品的虚构升值转移到整个企业，这方面也早有先例。例如18世纪初期，为法国服务的苏格兰金融冒险家约翰·劳（John Law, 1671—1729）创造了一种股票——纸币，依靠这种纸币于1717年成立的“西方公司”以北美洲路易斯安那那殖民地所有权的形式，用未来的巨大财富迷惑大众，把各种各样的确可以取得的价值用纸币投入流通领域，直到

不可避免地崩溃。也就是说，货币经济的资本主义扩张与现代纸币的早期形式已经伴随着投机浪潮，当然这些投机浪潮几乎与社会再生产毫不相干。

股票的繁荣作为 1850 年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的附带现象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范围，它特别适用于德意志帝国，赢得 1870~1871 普法战争后，几十亿的赔款从被战胜的法国流往德国。今天一再被提到的“1871~1873 年经济繁荣期”尤其是一个大骗局，这个大骗局非但没有创造，而是结束了第一次工业化推动下的高度繁荣。越来越忙碌而且也越来越不守信用的股份公司（就像蘑菇出土一般）大量涌现：“1850~1870 年期间，在德国总共只有 295 个股份公司得到了许可证，从 1871~1873 年，每年都有 300 多家新的股份公司……成立并且上市”（Lichter, 1998）。在整个欧洲，铁路投机达到的荒谬程度可以同当年荷兰的“郁金香狂潮”相媲美，类似这样的事件后来流行起来，接踵而来的还有不动产投机，因为——如此非现实的期望——在这种望不到尽头的繁荣时期将无休止地大兴土木。后果反而是像柏林这样的城市里住房困难急剧上升；恬不知耻的投机财富与日益严重的大众贫困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普鲁士的权力中心突然再次陷入社会危机状态和暴动的边缘：

“1872 年 7 月，警察与闹事的无家可归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巷战。当警察根据一个投机商的请求把一个木匠从他布鲁门大街的家中硬拉走时，引发了暴动。600 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和同样多的便衣费了很大劲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甚至柏林周围卫戍部队的军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一场内战似乎也不排除在外。一位军官，即后来的符滕堡国王，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或许要同无房可住的同胞们、其中一部分是从战场归来的战友作战，那将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Ogger, 1982, 第 200 页)

投机浪潮也在寻找特殊的领域，比如啤酒酿造业。其后果是部分无法饮用的酒类的产量得到提高和啤酒价格上涨。1873 年在法兰克福发生一次街头战斗以后，啤酒厂和饭馆遭到哄抢。从担任着领导职务的诸侯到家庭佣人（包括俾斯麦本人在内），投机的心态在所有阶层中弥漫，而且他们只涉及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拥有流动资金的人。这些“小人物”把他们的积蓄送到各处新开张的交易所。那种仍然活跃的保守—等级观念不管怎么样仍旧喜欢道貌岸然地批判不正当的投机，把它同远古的和正派的经商精神进行对比，但同时自己又卖力地参与其中，以便不错过挣得“快速马克”或“快速塔勒”的机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仅从正经的商品生产和实际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论”的立场出发批判这种过度的投机。在这种奇特的情感中，这一以赫尔德和费希特的德意志民族形而上学的名义对“罗曼国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的虚假批判重新变得格外轰轰烈烈；《德意志之歌》（现为德国国歌——译者）的词作者和 1848 年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奥古斯特·亨利希·霍夫曼斯塔尔·冯·法勒斯雷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曾写过一些带有嘲讽色彩的《创建者之歌》：

我是一个创始人活泼又快乐，  
今天就要在办公桌旁来落座。  
我不能再继续自己折磨自己，  
只能埋头计算我的利息。

谢天谢地，我总算有了主意，  
不论城市还是国家与我没关系：  
忠实献身于创始人生活

自己创造体面的生活。

功劳与我何干？

只有收入是我的老天：

为了奖赏我自己

用股票编织一个资产者花环。

这种以诗歌形式进行的、温和的、说教式的虚假批判自然很难打动像“铁路大王”贝特尔·亨利·斯特鲁斯贝尔格（Bethel Henry Strousberg）或是不动产大投机商亨利希·奎施托普（Heinrich Quistorp）的心。因为投机的期待值使虚构价值远远超过了未来任何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当股票热走到客观尽头时，顿足捶胸和咬牙切齿便开始了。于是乎爆发了必然会爆发的1873年的“创始人破产”，导火索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倒闭。当时一位记者这样描写了那种巨大的良心谴责：

“一夜之间，德语的词汇里增加了一个……新词，它突然响遍全城，毁灭了几千人的生计，大海盗和搁浅船只财物小抢劫者的命运，给无数殷实家庭带来无以名状的不幸，使整个经济生活突然荒废，这个词就叫做‘破产’！‘破产’这个词响彻公爵王公们的宫殿、议会大厦的花园、交易所的大厅、富人的别墅、宫廷的住所和储存水果与牛奶的地下室。破产！破产！……这个毁灭性的小词响遍整个德国，又像雷声一样从多瑙河、塞纳河、泰晤士河与台伯河翻滚回来，这个可怕而又令人难忘的词汇！”（转引自：Ohlsen, 1987, 第262及下页）

无数的家庭遭到彻底毁灭，其中也有世代在此居住的“上流

社会”。甚至从前居住得曾经像诸侯一般的斯特鲁斯贝尔格也沦为乞丐，不久后就去世了。有个普鲁士贵族的命运非常典型，他曾卖掉了继承而来的庄园，把由此得来的25万塔勒购买了新股票，以便以此安度符合他社会等级的晚年。《花园凉亭》描述了这位投机者由于股市崩溃遭到毁灭的下场：

“股市行情开始下跌，而且不停地下跌；银行家要求现金担保，但这又做不到，于是他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卖掉了交易所中的股票。从前那位地主在还不到半年时间里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另外他还在那位银行家那里欠下2万塔勒的债务。”（转引自：Ogger，1982，第181页）

于是出现了发生这些事件后流行的自杀浪潮。根据1874年10月14日夏洛滕堡市管理部门的一份报告所称，创始人破产的后果之一是“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剧增”（转引自：Ohlsen，1987，第265页）。一句话：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特点在社会气氛中突然发作；从此，炒股热和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了反复发生的特点。经济方面的后果（不仅）在德国称得上是灾难性的：

“61家银行、116个工业企业和4个铁路公司破产。交易所中的股票价格一跌到底。1876年的价格比截止到1873年2月的经济繁荣时期上市时平均低了50%。银行家盖尔森·布莱西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幸运地度过了这次危机，他估计在这次股票交易所崩溃中，德国国有资产损失了整整1/3。在柏林有数千所房屋闲置着，数不清的房主已偿还不起银行贷款。”（Ogger，1982，第202页）

仅在柏林，40家新银行中就有30家倒闭（Geinitz, 1996）。此次崩溃的波及面比以往所有的、只波及到社会表层的金融危机都要广；但尽管如此，事实上这次崩溃并没有像势头最猛时会让人想象得那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当然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德国和奥地利虽然是此次欧洲“地震”的中心，但它们大部分地区仍属于农业结构，工业资本主义只占社会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急风暴雨式的工业化进程在整个欧洲进行了将近20年，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悄悄转入到了一个停滞阶段，后来这个阶段被称为“大萧条”时期（Rosenberg, 1976）。

### 日益加强的国家行动法则

在经济繁荣期危机中的经济萎缩与日益加剧的工业世界市场竞争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呼吁国家进行干预，其中也有年轻的德国大工业。这不仅是由于对危机和社会动乱再次爆发的恐惧，这些危机与社会动乱已使铁杆经济自由主义的信誉扫地。对于资本其他的结构性要求来说，进一步的国家行动已经证明是愈加紧迫了。首先，从前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宣扬的保护关税体系又旧事重提，这个体系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阶段中的关税同盟基础上经历了第一个繁荣期之后被自由贸易排挤出局：

“自从价格暴跌也侵害到小生产者的利益和粮食生产者陷入来自俄国和海外的竞争压力以来，对抛弃自由贸易的呼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1877年，由保守的地主们组成的‘税收与经济改革者联合会’转而要求建立农业保护关税制度；1878年，人们逐渐普遍地认识到也必须接受以重工业为主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要求的工业保护关税。

农业与工业保护关税收税员同盟作为开路先锋很快就被证明具有广泛代表性：1878年10月17‘日帝国会国民经济联合会’向公众发出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向保护关税转向的号召。204名议员，也就是帝国议会的多数，均赞成这项声明。”（Loth，1996，第64及下页）

虽然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矛盾，因为自由派发出反对这项新的关税保护政策的呼声（璩曼也包括在其中），但是许多自由派议员都赞成这项倡议。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重工业的资本主义“策划者”对于纯理论的顾虑不予理睬的态度。如果直接的资本利益参与进来的话，那么只关心利润与权力的企业经济或政治的实用主义者一向对于纯自由派的信仰问题是毫不理会的。除了能够继续仰仗其工业领先地位的英国以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依靠一项类似的、被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保护政策来对付“大萧条”的停滞倾向。保护关税倡议当然只是经济领域中超越福利政策的国家行为的一个小小环节。不久以后就表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只要规模扩展到更大的程度，就需要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框架条件和扶持行动。

这次又是普鲁士的国有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瓦格纳首先试图把这种发展总结为普遍的经济规律。他著名的“日益加强国家行动法则”开辟了新纪元，这一法则从金融理论角度出发使用的措辞为“提高国家份额法则”（通过货币表达的社会产品中的份额）。在他的《普通或理论国民经济学》文稿中，他甚至把这一法则同人类的文化进步联系在一起，日益加强的国家行动对他来说理所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举动：

“历史的（时间的）和空间的、包罗各种国家的比较显示，在发展中的文明民族中，国家行动和除国家以外由自我



管理团体采取的全部公共行动会有规律地增加……尤其当国家被理解为是对某些需求进行援助的经济时，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和各个个人绝对是越来越重要。但它的相对意义也在增加……假如……把国家同……其他对国家行动进行补充的强制性集体经济归总到一起，这个做法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是必要的，那么整个强制性集体经济的或‘公共的’行动、特别是国家的和地方的……行动也将会增长……生产技术的原因将在这方面日益导致国家和地区等甚至在物质的和个人的需求领域中加强它们的行动……国家与强制性集体经济或‘公共’行动扩展的内在原因一部分是在发展中的文明民族中由国家与地区固定的本质所决定的（先验性地）；另一部分原因可从造成这些行动扩展的事实中归纳出来。掌握这些知识使我们有资格谈论公共的、特别是国家的行动不断被扩展的一个（国民经济学的）法则，这个法则对于金融经济来说可以被表述为国家与自我管理团体的公共金融需求不断在增加的法则。”（Wagner, 1879, 第 310 及下页）

即使一位德国教授只是打算叙述不加批判地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迫切必要性，他自然也不能以历史哲学的方法来做此事。如果说作为一种超历史的“文化进步”的表示而对国家行动有规律的扩展进行“先验地推导”纯粹是一种理论思想的话，那么对于业已发现的当代事实提出的“归纳性”提示就完全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了。因为这里决不仅仅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一个假设或是一个预测，而是在瓦格纳时代对开始可以经验性地断定的一种事实做出了解释：国家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秘密地、自然而然地同工业化一起朝着与一切经济自由派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方向在扩展。瓦格纳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竞争的扩张所取得的成果中寻找原因：

“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日益深入的国家与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自由竞争体系制造了越来越复杂的交往和法律关系。从此之中产生了逐渐增多的法律纠纷、违法事件以及个人与社会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冲突，这些情况向国家为实现法律目标所采取的镇压和预防性措施、向立法的、消除对立的或调解的职能，以及法官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法律和政权为目标的领域中国家行动粗放性和集约性的扩展因此在文明国家中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长期以来，每年国家平均用于法律、内务、警察、陆军、海军、外交方面巨大的管理机构的开支不断增加，国家行动都可以从归结为‘钱’的相应开支数字上体现出来。”（Wagner，出处同上，第315及下页）

日益深入的市场经济化与不断扩展的国家行动的一致性并不仅仅产生于法律、管理以及行政需求的不断增加。因为市场是一台盲目的和没有意识的社会“机器”，所以不仅在法律和社会层面，而且在物质层面形成了一种第二位的调节必要性。随着这种荒谬的和无情的生产方式科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作为孤立起来的社会的这级抽象与普遍的主管机构必须提供越来越多公共机构的和业务方面的拐杖，为的是让资本主义企业在根本上还能够运行。除了对于持续不断造成的损失采取补救措施以外，这方面还涉及工业市场体系自身的社会的生产组织流程，对此又是瓦格纳首先做出系统的阐述：

“但是，一个决定性的主要因素，即生产技术的转型（蒸汽！以及其他等等），恰恰为了有利于‘公共的’地产与资产和‘公共的’实物商品而已经在当前经常加以引证：由于这个因素和由于与此有关的全部经济企业的建立，一部分

情况下由国家本身、一部分情况下由其他公共机构，特别是社团，从现在开始并估计会越来越适合接管与私有经济并行和取代私有经济的实物商品生产部门。私有经济的生产部门已经一再地受到这些公共机构的排挤……发达国家选择……那些国家企业在技术-经济方面最适合的、具备某些优势和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相比避免某些缺陷的……实物商品生产部门。所以从总体来看，尤其是鉴于交通部门、道路建设、铁路建设领域的情况，发达的现代国家现在就已应该在物质生产领域中采取比以往力度更大的国家行动。此外，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和值得引人注意是因为国家由此看来也是国民经济中物质与体力劳动领域里最大的雇主，这个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就某些特定的工种而言，国家是惟一的或几乎是惟一的雇主（官员）……那些生产技术因素越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私有经济体制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福利政策中经受的考验越少，实物商品生产部门随后在日益适宜的情况下将会越来越多地由国家，特别是由地方政府接手。”（出处同上，第319及以下数页）

恰恰是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实物商品生产部门”，按照瓦格纳的看法，可以由国家适当地作为私有资本来经营；他也马上列举了逻辑上有说服力的经济原因：

“强制性集体经济需求通过国家的调解得到满足的情况绝对地并常常也是相对地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频繁。尤其当这些行动的空间与时间上的高度集中和制度上的一致性成为必要时，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随后就会出现。有时仅是国家适合于这样做，有时是对这些行动转移到私有经济部门如赢

利团体存有顾虑，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当国家行动的扩展也能包括私有经济和其他的集体经济形式的时候，这种扩展也常常与对更高、更完美、更高尚的成就有需求相关，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鉴于成就的质量或是考虑到这种行动的巨大而普遍的文化意义，让收益的观点在有关行动中出于事情本身的利益退居次要位置，至少不能让它上升到主导地位……随后迫切需要认识到的是：投机性的私有资本、特别是、但并不仅仅是以资本联合（股票业）的形式经常甚至会面临造成挥霍浪费的危险，但一般至少导致资本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运动。资本运动将完全取决于交易所和目前的经济形势，倾注于完全与国民经济生产无关的或是并非在这个范围里真正从事国民经济生产的应用，并且在时间上出现极不均衡的现象，一段时间里狂热不已，过后又完全沉寂下来……。由直至目前的私人行动向国家行动……转移方面的突出个例……是：学校，除了传统学校和大学以外，特别是高级中学、专科学校、技术学校和实用中学；邮局之外的电报局和铁路；城市交通部门（有轨马车）和煤气及自来水厂；银行（发行银行和储蓄所）；保险机构（养老金基金会及人寿与火灾保险）以及许多另外的部门。”（出处同上，第321及下页）

虽然瓦格纳这里还没有在概念上把为市场而进行的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作为市场经济框架条件的一般（整体社会的）实际—物质性基础设施区别开来，而是仅仅述及“实物商品生产的各种分支部门”，但却隐伏着这种质量上的、经济上的区别：工业资本主义要求备有全套生产组织流程结构，而这些全套的生产组织流程结构自身不能按照纯粹企业经济合理性法则重新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否则它们将再也完成不了作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

的整个社会前提条件的任务。市场经济（最广义上的）基础设施有些不同于市场经济自身，因为既不能单独把它看成孤立的企业，也不能把它置于经济周期的波动和资本运动之下，它必须广泛地、持久地和稳定地供支配使用。所以，在追逐利润的体制本身应具备再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在这些方面不能（或不能不加以限制地）把赢利作为指导思想。亚当·斯密就曾已在原则上承认这种观点，当然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现在在工业资本不断扩张的条件下，必须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内把这个难题重新表述为“日益加强的国家行动法则”。

这方面尽管在术语和符号上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旧时专制主义的要求无论如何是不会突然再重新提出的，可是那头“龙形海怪”的法则却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阶段中必然得以扩展。保守的“国有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瓦格纳一再强调，他的学说绝对不是与企业家为敌的，而是完全承认“企业家，即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社会主义从未在纸上，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取代私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Wagner, 1912, 第14页）。无论是在瓦格纳还是在俾斯麦的观点中，“国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都没有触及到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而只涉及已得到扩展的框架条件的难点和体现民族综合能力的国家所发挥的一种“领航作用”。

从发展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可以描述为辩证法的三部曲：“龙形海怪”的论点、反论点与综合论点不仅涉及福利国家性质，而且涉及国家行动更广泛的多样性。从专制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原本就是服务于王朝敛钱目的的社会“总企业家”。与此相反，从专制主义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把国家降格为“守夜人国家”；它作为“龙形海怪”只限于镇压和教育职能，对于经济听凭其放任自流。19世纪晚期自由保守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此时试图修正这个钟摆的摆动，重新拾起法国大革命“国家经济”思想；法国大革命把专制主义转换为共和主义，

而没有像英国那样完全牺牲掉国家对经济应拥有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再对私有资本主义的企业界提出任何疑问，而是“国有社会主义”只将“于民族生死攸关的”部门置于企业界的管辖之下。在跨入 20 世纪以及工业化取得进展之际，那些位于真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行的新的国家任务显露了出来，根据瓦格纳的观点，这些任务体现出“正在加强的国家行动法则”，除了纯粹的镇压和“守夜人功能”以外，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同市场经济和它的契约以及易货贸易一起不断增长的法制化需要和管理方面的需要（连同属于它们的机构）；二是福利政策和国家的社会保险承担者角色，以消除和减低资本主义的“形势变化”和结构断裂所带来的危害；三是经济政策的各类干预手段。这些手段虽然不再以一个国家“总企业家”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具有针对资本主义各种流动数值的调节功能（保护关税政策、货币政策等）并需要相应的结构；四是最终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同样一起成长的物质生产组织流程或基础设施（交通与能源、邮政与电讯、医疗卫生、排水工程、生态破坏情况的补救、垃圾清除、教育与科学机构等等）的国家企业（和与此相关的国家所有制行业部门）。

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已经表明，国家经济与私有经济旧有的对立本来不是什么根本性难题。金钱的裂变把社会成员逐个隔绝开来并变成了抽象的个人，由于他们之间全面形成竞争，于是需要国家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充当权力机器（“龙形海怪”）。同样由于恰恰是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工业化对国家的需要越来越强烈，超出了专制主义的老一代国家经济学家曾唤起过的梦想。

因此必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费用问题，这个问题潜在地包含着一种真正的危机可能性。原因在于目光短浅的企业经济合理性不断把费用问题“外部化”并把它抛向全社会，因为根据它的本质

它必须声明自己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的“一般”框架条件负责，于是随着由此产生的全社会的任务和问题出现了大量的预付费用问题、后续费用问题和附加费用问题。市场经济和它不合理的资源管理造成的这些“一般营业费用”或“管理费用”连同相应的实际任务必须由国家来承担。

因为国家事实上并且在自由保守主义派的理解中不再是创造利润的“企业家”，而是把这部“美妙机器”的职能转交给了私人，因此在工业市场经济中由于任务不断增多而合乎逻辑地产生了一个“财政问题”。国家不再担任“总企业家”，而“只是”必须为框架条件提供保障，这就在工业化的条件下提高了，而不是阻止了它自己对金钱的需求和贪婪。从市场经济严格的意义上讲，对市场收入征税是国家惟一的正常财政来源。然而作为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守护神，不允许国家过分加重私有经济的负担（利润和工资），为了不至于毁掉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投资与消费。“国有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瓦格纳就曾不顾虑地声明：必须“考虑到这些负担不允许超过某一限度”（Wagner, 1912, 第16页）。

愚蠢的是这些任务遇到的并不是主观上的，而是由盲目的市场过程与工业化进程本身制造出的客观上的麻烦局面。瓦格纳本人就用不断增强的国家行动和国家（以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日益提高国家份额的形式）不断增强的财政需求的“规律性”的这一表述确认了这种客观性。不允许超过“某一限度”的警告本来应该针对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体制本身创造出来的无主体的机器物神，并因此被证明是毫无意义而本应予以取消的。

不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对于新形成的调节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除了它的正常收入仍然负债以外，它别无其他办法，而且这种负债的规模相比之下只有上升没有下降。19世纪末国家新的负债务的数量等级虽然没有突破制度的临界线，却被自由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十分不悦地记

录在案。著名的瑞士文化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尔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在他的《世界史观察》一书中再次对这些社会要求措辞严厉地表示了愤怒，他激动地写道：

“人们不再愿意把最重要的大事交给社会来处理，因为人们打算做的事是不可能实现的，并认为只有国家的强权能够保证这些……人们迫使国家在其日益增加的责任范围内做人们知道或预料到社会将不做的所有事情。各种需求及与此相应的各种理论无处不在，数量越来越多。同时债务也在增长，这是19世纪中一个可悲的重大历史讽刺。挥霍浪费未来几代人的财产的这种做法证明了一种冷酷无情和傲慢自大的基本特点。”（Burckhardt, 1978/1905, 第135页）

且不论布克哈尔特此处把“正在增长的需求”作为对国家提出的要求完全纳入主观愿望的范围，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疑难问题；从此以后，他也同样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正在增加的国家债务绝不仅仅是为了社会性目的而支出的，而是大部分均用于资本自身的经营费用。在针对信誉不佳的国家急切借债的欲望进行的伪道德说教中显露出来的只是资产阶级意识的精神分裂症，这种急切借债的欲望“无情地挥霍浪费未来几代人的财产”，这类说教自此之后被自由保守主义的社会家长模仿者习惯性地背诵着。一方面，由资本主义合理性的自我矛盾中产生的体制危机的威胁得到消解；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乞讨来的小钱使这个体制的代表们在征收它的时刻就已经感到后悔。虽然这些小钱的接受者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逼迫才变得如此急需救助，但他们仅仅为了存活下来而需要解决的财政资



助问题被看成“无情的傲慢自大”。

甚至对于工业中的“价值利用”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基础设施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只是被不情愿地看到；从来就在企业经济方面目光短浅的市民（这是用思想家布克哈尔特的话来说）最不愿意考虑他自己独自追逐利润的社会生存条件，因为它们要“花钱”。是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本身也让“国家的义务簿”每天都增加新的内容，这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理解的。这种精神分裂症的理智—不理智的症结是一种预感，即体制的自我矛盾通过持续扩展的国家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债务得不到解决，而是只能转移。一个新的幽灵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平线上：即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管理费用或经营费用由于固有的非理性主义原因可能会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致它再也降伏不住危机的发生，而是只能加剧。即使布克哈尔特那时已看到了这个幽灵，但它在世纪之交时还比较弱小。

### 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

与工业滚雪球式体系开始形成和福利国家政策正式实行的同时，民族帝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成长为一支社会力量并揭开了它自身的内在矛盾：也就是一方面抽象地宣传反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的社会解放，另一方面又打算在盲目接受过来的资本主义范畴中实现这种解放。从“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特点来说，当然不仅它的自由主义及其组织的出身，而且还有它在群众运动中质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社会性群众暴动还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无理要求本身并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与此相反，自由派的各个“工人协会”始终介于两者之间，充当着反对专制主义的资产阶

级现代化倡导者的后备军。在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早的群众暴动已遭到削弱而消亡。与此同时，由自由派的工人协会中产生的社会民主党的派别还不具有新的群众基础，只是或多或少地在幕后进行宣传鼓动，试图对自发的运动施加影响。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才逐渐赢得了自己新的群众基础，而且正是由当时在工厂工作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工人居民组成了这种新的群众基础，在这些人之中已不再可能幻想唤起他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之前时期较好境况的集体回忆了，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习惯遵守工厂纪律。这个几乎被资本主义当做“家养宠物的”工人阶级本质上是使社会主义的党派和工会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群众运动的基础。

与此相应的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行动已经远远不再具有从前社会反抗运动具有的那种军事的、叛乱的和反专制的性质。如果说俾斯麦—行政机构类型的各个自由主义保守派政府尽管如此仍旧想象会面临“被推翻”的危险，那么主要是因为那个曾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奇特的闪光点的事件：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在1871年3月至5月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周并以一场血腥大屠杀而告结束，当时（并直到今天）公社的定义充满了双方的传说与神话，这些传说与神话根本没有触及原则性的社会问题，而是囿于一种被历史客观化了的格局。

巴黎公社有着武装“工人革命”的特点并发展为武力对抗，这一事实被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各个资本主义政府（特别是被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者）解释为“法律与秩序”崩溃的证据、自边沁时代以来已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需求的财产与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安全性”的终结，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末日”的威胁，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拯救社会”而采取任何一种血腥镇压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最后，巴黎公社事件成为用对待从前社会暴动的战争方法对待正在上升的社会民主党的理由，而不顾其全

部的性质和出身。反过来讲，在社会党人的辩白中，巴黎公社成了自身这种“危险性”的同伙见证人，它被后来的左翼激进主义作为一种含混不清的和没有得到实现的革命思想尊崇美化为圣像。

双方都是带着被社会学缩短了距离的并且局限于资产阶级意志范畴的眼镜来看待这些情形的：雇佣工人及他们的政治代言人登上权力的舞台并贯彻一种政治意愿，这个社会学的“威胁事实”足以使自由主义保守派的资产阶级精英们陷入恐慌和暴怒之中。此时浮出水面的无非是那种老式的等级偏见，这种偏见仍像在早已消逝的时代中那样错误地把“美妙机器”的社会形式同一个社会阶层、特定的环境、精英和“家庭”的主体势力混为一谈，资本主义这个以自身为目的的怪物早已超出了这个势力范围。反过来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把雇佣工人及其组织真正作为雇佣工人执政或参与执政已经看做是社会解放的一种保证。一旦“工人党”（或是“劳动党”）真的说了算的话，双方阵营也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仅通过这一点资本主义也就完蛋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去主体”的社会形态与结构状况则与此相反（超越了各自主体的以及社会学上可以识别的支撑基础），几乎丝毫没有引起思考并早已进入人的内心深处，它们是在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盲目的体制过程中形成的，持肯定态度的思想学家霍布斯、曼德维尔直到马尔萨斯和李斯特等都对此进行了正面的阐述。如果说对自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初期的理论思索首先集中在伦理道德与人类学的问题上，并在亚当·斯密、康德与黑格尔那里成为对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制度神学朝拜，那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理论的兴趣得到再次转移：已世俗化的制度神明的新颖与奇特已经消失，它的实际范畴（抽象劳动、劳动市场、市场社会化、现代国家机器等等）已沉积为近似本体论的理所当然之事，与此相同的是在此期间形成和已稳定下来的社会范畴或制度的“阶级”以及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体行为此时已成为中心。

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理论才超越建立在阶级和阶层的观点基础之上、被实证主义肤浅化了的“社会学主义”，开始思索“结构主义”和制度理论。而这个理论直到今天仍得到肯定并得以保留下来，而且以一种比斯密或康德更高的抽象程度，把资本主义形式提升为超历史的“自然的”生存条件。特别是与康德不同的是，大家再也看不到这种社会形式的建构问题，同样因为以为根本再也不必对它们进行辩解，而索性将其看做理所当然的前提。

在1870年和随后的“工人运动历史”中，人们带着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眼镜来看待发展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出现的“武装的工人阶级”情况中看到巴黎公社的反资本主义危险性，而没有考虑它同资本主义结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关系。于是巴黎的“工人阶级”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拿起武器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人这个社会范畴已经充满了形而上学，这是关键所在。涉及的问题是：整个第二帝国自始至终，法国的社会对立从来没有按照19世纪上半叶或18世纪末革命时期的模式引起大的动乱。事实上不是任何群众运动，而是同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法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巴黎公社的出现。

当拿破仑三世沦为战争俘虏，普鲁士-德国军队迫近巴黎时，已经证实了腐朽的、内部四分五裂并且腐败到可笑地步的第二帝国已经破落到何等地步。此后震撼法国的“雷鸣般的呼喊”变得越来越民族-爱国主义化了，它只是捎带着把社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始终停留在商品生产制度及其“抽象劳动”的框架内。于是出现了一种离奇的情景，它预投下整个灾难阶段的阴影。丧失斗志的正统资产阶级的官方政府连同议会及左翼议会党团恰恰开始害怕群众的爱国热情，从巴黎跑到了凡尔赛，最后向“外来的”敌人投降了。产业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和代表各种意识形态的（原社会民主党的）“劳动”组织则与此相反，内心深受震撼，奋起保卫资本主义的民族形式原则，表示

准备为爱国而做出最大牺牲。公社的成员和传记作者普罗斯珀·利萨加雷（Prosper Lissagaray）下意识地在他同资产阶级—议会中左派的论战中准确地报道了这种情景：

“只需要一个打击就可以横扫帝国的这一堆垃圾。人民本能地提供他们的援助，为的是把民族还给它自己，但左派予以回绝，他们拒绝通过起义来拯救祖国，却把他们的全部努力局限花费在可笑的建议上，把拯救法国的重任放手给雇佣军……经过三个星期时间，人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卑躬屈节的帝制又完完全全地返归故里。由于统治阶级在一旁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袖手旁观，被绑住手脚的民族跌进了深渊。”（Lissagaray, 1894, 第3页）

公社的、国民自卫军的（一支大部分由工人组成的武装）和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所有宣言都充满了深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这种热情越来越升华为一个虔诚的愿望：“为祖国而死！”（*Pariser Kommune / Dokumente*, 1931, 第235页）。虽然在那个时代最忧郁的语言中也不时出现这种希望，即“各个祖国”愿意今后同“一个集体的和崇高的品格：人类”结为一体（出处同上，第225页）；但这些声明并不比深深扎根的狂热爱国主义的某个装饰图案强多少。倘若正统资产阶级政府在拿破仑三世政治与军事垮台以后大力向“保卫祖国”迈进的话，那么永远也不会出现一个巴黎公社。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这里单单涉及到被普鲁士—德国军队包围的巴黎的城市管理机构，这一机构在社会主义派别重新选举之后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与逃到凡尔赛的政府的意愿相反，主张将战争进行下去。在这种形势下，关于何谓真正的“保卫祖国”的争论演变为一场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公社当然没有足够的时间从根本上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除了模糊不清的表述以外，当时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超越当时就已有局限性的、并打上了工业资本主义烙印的社会民主党设想的纲领。例如公社人摘下学校中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或是用巴黎大主教作为赎金交换在凡尔赛被判死刑的巴黎公社社员（但被鄙夷地拒绝了！），这些都表明革命思想是如何固执地停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上和概念范围中。除了这些非主流的小人书——行动以外，公社采取的具有远见性的措施还是很充分的，没有在任何方式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一开始还着重对政治体制进行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变革：公社决定了议员和官员的随时落选制（“强制性议会席位”）和所有的国家官员享受的、著名的“工人工资”；一方面这个举措是纯形式的，另一方面也是纯数量的。

卡尔·马克思受到这种“英勇的工人革命”的激励，热情地把这些政治改革描写为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性进步：第一次关系到“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民主—军事这部机器从一个人手里转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而是把它彻底砸烂……”（转引自：Pariser Kommune / Dokumente, 1931, 第290~291页）；后来“东方的法国革命”与“后起的现代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家列宁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把公社的榜样称之为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出处同上，第292页）。纯粹的激进民主主义始终与商品生产体制未被废除的范畴有联系，它同经济的世界机器一样很少触动那头“龙形海怪”。“落选制”和“工人工资”根本没有从质量上触动作为“抽象劳动”调节机器的国家，而是作为采取的种种措施在不可思议的制度范围内活动着。

在这种情形下，“改革者”（按照后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含义）与“革命者”（按照后来十月革命类似雅各宾党的含义）的区别只是相对的。马克思把“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仅仅是

接管它)当作公社自发的伟大发明加以颂扬,这总是被马克思主义从纯社会学的角度并以此概括地理解为仅仅是“赶跑”某些社会群体,也就是赶跑所谓的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的“激进行动”。归根到底,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这种革命的“激进”形式就是赶跑贵族这个社会群体或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然而,这种激进行动并不涉及“砸碎”在更高级别和质量意义上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取消商品生产体制、它的抽象劳动和因此在逻辑上也属于这些范围的国家机器的调节行动。

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创造了“抽象劳动”和现代拜物教这些批判性概念,虽然他自己可能在大脑中也曾顺带考虑过这样一种关联,然而当他面对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的具体情景并被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受社会学局限的思想所打动,便已不再能够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这种按照社会学简略的理解“砸碎”国家机器的形式上的激进主义发展到最后,其结果与致力于接管或加入现存的国家机器的改革派的变体基本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中,结果只能是:在未被取消的商品生产体系的背景下,就是由那些“自己的人”,也就是由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领导人,来接管那头“龙形海怪”的代表权。

归根到底,工人运动中形式上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与改革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在整个发展中处于历史的不同时期:革命的雅各宾派变体能更适合位于资本主义边缘的“后起的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因为那里的商品生产体系的要素只能是在专制政体的快速方法中凭空制造出来;改革派变体则与此相反,他们更适合西欧国家的中心国家中已经形成基本特点的工业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那些中心国家中,更要紧的是改善在这个制度中已习惯于雇佣劳动的民众的处境。巴黎公社可以说是还处于这两种可能性中间;但在它的法令中还根本谈不上对“抽象劳动”进行具有解放性质的批判。在几个社会与经

济的法令中特别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在《关于劳动力供求问题的政令》中这样写道：

“在所有的区政府中都放着一个登记簿，工人们均要把自己登记入册，而且一边是他们的职业，另一边是他们的要求以及他们的劳务具体情况。各区政府里同样还有一个登记簿，公司、各种企业主、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等均要用一个详尽的招标说明书把他们工作的特点及他们有能力为社会奉献的益处记录进去。巴黎每个区政府的管理人员都必须立刻给感兴趣者提供实施这项法令所需要的房屋、登记簿和人员。” [Dokumente der Pariser Kommune (巴黎公社文献)，出处同上，第 308 页]

直截了当地说：用今天的角度看，公社这里的目的无非就是需要极为普通的劳动局这样一个机构；然而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作为“劳动管理”必要条件的陌生的机构却完全站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边，所以后来在完全不需要武装的“工人革命”的情况下，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里都设置了这种机构。这里毫无疑问已经把以自身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确定为先决条件，这也适用于工厂纪律的方式方法，正如公社另一项关于工厂规章的法令所表明的那样：

“吃饭时间内，任何工人不得在工场停留……吃饭时间开始前五分钟和工作日结束前五分钟通过铃声宣布工作结束……工人上班来到工场应向工长报到，工时加以记录……任何不持有新通行证的公民一律不允许进入工场。” [Dokumente…… (文献)，出处同上，第 315 页]

这样一个规章不仅使人回想起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厂规章制



度，在这些规章中，工人就像身处专制的教育体制中的孩子一样受到刁难，而且上述这个规章和从前的完全相同。受到大量赞美和大量辱骂的巴黎公社采取的许多措施已成为一种边沁式的方案，一种镇压式的自我教化的自由派发明者可能会从这个方案中得到喜悦。除了荒谬地“为民族起义”这个特殊的历史形势以外——这种起义也同样是自愿委身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原则——公社的思想与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偏离后来的“各个工人党派”的思想与行动。

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工厂体系的内部经验已同自由主义继承的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的要素相融合，与只有这些内部经验所能达到的程度同步，也形成了包含着自我纪律化的积极的（而不再是消极的）工人运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经过驯化的工人组织或多或少下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即在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练会遵从资本主义的纪律并使之更为精美，这个做法一直延伸发展到“业余生活”组织，比如体现在新近出现的类似于劳动的体育项目中和在无产阶级的青年与文化组织机械的、某些方面类似于军事化的集体主义中。

面对表面上的、并被社会学的简单化定义确定的“阶级敌人”，社会主义的党派和工会一方面通过（大多情况下气氛温和的）罢工、劳资双方工资谈判和政治集会，为推进制度内部的改革与改善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它们的各种机构建立起工人运动的一个治国组织体系。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机构上僵硬地程式化了，直到今天这些组织的结构中仍旧保留着等级和专制的特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在通常情况下已偶像化的巴黎公社进行的谨慎批评后来听起来大多并非是多余的，但这种批评是不够“集中的”。这种意识形态同带有俾斯麦和瓦格纳特点的普鲁士国有社会主义的近似之处是完全一目了然的。拉萨尔就曾经把国家“本身”吹捧为文明发展的推动者和人的教育者，这完全是

继承自由派的人民教育者和工业教育家的传统，后来社会民主党接受了这一遗产。

但这个被作为长远目标来追求的国家自然是一个在主观臆想中完全与众不同的国家，因为这是一个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一个为了工人由工人领导的国家，一个“工人国家”或是社会福利的“未来国家”，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所称。虽然卡尔·马克思私下对这些表述大发牢骚，因为对他来说这些表述带有他从前的对手拉萨尔的品味，也因为在他起初在历史上没有兑现的并对现代拜物教进行彻底批判的理论性《秘密纲领》中蕴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把本来源自专制主义并已异化的国家机器重新送回到一个“自由组合的个人”的社会中。但另一方面，由马克思自己带来的工人运动的自由主义遗产必然包含“龙形海怪”的要素，在日益增强的国家干预这种时代精神的压力下，马克思只能把他的原则性异议当作理论牢骚发泄一下，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恰恰借助于这个遗产，以便较为轻松地适应上述的压力。

社会民主党面对这位哲学上的鼻祖和他理论中的神秘性，极为理所当然和虔诚地但在缺乏真正理解的情况下把“取消国家”作为空洞的公式纳入自己的纲领，当然只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和不现实的未来；而为了社会转轨所必需的实际行动、改革与思想，国家机器则作为近似于“自然的”基准体系的形态出现，另一面的同样情况是产品的一般商品形式和雇佣劳动作为经济的与社会的再生产中相应的“自然的”状况已经深入人的内心世界。

社会民主党只在一点上超越了瓦格纳和俾斯麦的国有社会主义，却不是向前，而是倒退：“社会主义的”国家或是“工人国家”（它的幻想尽管向马克思的理论疑虑做出了各种让步，但仍旧决定着工人运动的未来景象）不仅应在管理、基础设施、社会均衡等方面补充企业主的作用，而且应在工业体系的核心中完全

取代企业主的职能。恰恰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相对于纯市场经济形式的、旧专制主义机构的要求伪装成社会主义卷土重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死后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在他对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在当时仍在世的恩格斯的同意下）制定的《埃尔富特纲领》的解释中毫不怀疑地相信在生产未被取消的范畴中（也就是在经济“价值”与货币的形式中），只有借助于包罗万象的国家机器才能使臆想中取消商品生产得以实现：

“在当今现存的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框架的必要的规模，以便在这个框架内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不仅是现存的社会组织中唯一的一个拥有足够范围的组织，可以提供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框架，而且也是这同一合作社唯一的自然基础……经济的发展推动国家……把更多的企业联合到它的手里，其原因部分是为了国家的自我维持，部分是为了更好地让它履行职能或是最终提高它的收入……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那种朝着社会主义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出发点。然而这无论如何都并不表明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任何一个经济企业的国有化都是向社会主义合作社前进了一步……而不需要在国家的本质中改变什么东西……正如迄今为止国家没有把国有化继续推动到超出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那么国家今后也将长久保持这种状态。只要有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企业与其职能的国有化就绝不会发展到使私有的资本和土地财产普遍因此受到损害……只有当国家中的劳动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国家才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企业；然后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合作社。从这一认识中产生了社会民主党

给自己确定的任务：该党的目的在于让劳动阶级夺取政权，以使用它把国家变成一个伟大的、从根本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合作社。”（Kautsky, 1922/1892, 第 115-126 页，强调部分为考茨基本人所标示）

这里所描绘的景象以及全然再现的工人运动-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构成了社会主义未来一幅阴暗的图像。通过工厂体系已被劳改营般社会化了的、受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所具有的基督教新教的刻板特点以一种奇特和怪诞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卑躬屈膝地巴结迎合资本主义标准，另一方面对来自自由保守主义的精英及其所采取的禁止政策或至少压制政策的鄙视性拒绝而感到失意。在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矛盾被加工成向一种荒谬的资产阶级-俾斯麦模式国有社会主义的“极端化”的大逃亡。“工人阶级”这个被形而上学地鼓吹起来的“历史性主体”按照臆想以古代王朝的角色出现，社会民主党的机构继承了它的专制主义祖先极力主张的国家调控做法，而同时资本主义的民族形式超越资产阶级现实状态被抬高到恰恰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基准空间；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中升级为一种近乎自给自足式的社会与经济的自我封闭思想。广泛宣传的、与此观点表面上相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跨国的（取消民族这个基准领域）及民众本身不受控制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毫不相干，而是缩减为一种各个国家政党机构之间的外交往来，这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空洞的宣言里被记载下来。由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构成的那些噩梦拼凑出一种昏暗的反面乌托邦，它得以用一种考茨基的道貌岸然风格构成“经过科学论证的”、积极的和有益于人类的一种未来幻境，但这一切本身却不无费解之处。

社会民主党主张的国有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自然也是没有完

全在它的同代人面前掩藏得过去的。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始终处在边缘的，而在罗曼国家却有一定影响的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派别一再批判社会主义固守“现代国家机器”的立场。被纳粹杀害的无政府主义诗人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 1878-1934）曾为此创造了一个恰当的词语，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信仰国家的思想称为“俾斯麦马克思主义”。德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也恰好把他对德意志帝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工人运动做出的概述称之为“社会主义中的专制主义思路”（Rocker, 1974/1950）。但是无论无政府主义者这里嗅到一个什么真理，他们自己总归也是这个时期的稚童，作为自由主义及其使人虔诚的星期日宗教学校的意识形态后裔，他们与社会民主党相比也相差无几。在罗克（有保留地代表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现代重大的社会理论的地位和内在关系发表见解的时候，他对此坚信不疑：

“现代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是 17、18 世纪自由主义重大思想流派的一种自然延续。自由主义曾给王侯专制主义制度以第一次致命打击，把社会生活引到了新的轨道之上。它的精神推动者在个人自由达到最高程度的情况下认识到各种文化新格局的杠杆作用，打算把国家的活动限制在最有限的界限内，这些推动者为人类开辟了它未来发展的崭新前景，倘若他们对经济的理解与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认识当时能够保持同步的话，那么这些前景则必将导致排除所有的强权政治企图并产生出一个精通业务的社会事宜管理制度。但可惜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所有天然的财富和通过社会劳动生产出的财富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实现垄断化，在这种垄断化不断增长的影响下，一种新的经济隶属关系的体系发展起来，它越来越危险地对自由主义原先所有的努力以及一种政

治和社会民主真正的原则产生作用……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可以筑一道堤坝来阻挡这些事态的发展……它也本来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遗嘱执行人，办法是通过同经济垄断进行斗争和为使社会生产为所有人的需求服务付出努力来给自由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基础。通过为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想流派提供经济方面的补充，它本来可以把自己浓缩成……人的意识中的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只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盲目性同自由主义社会观中自由的基本观点进行斗争……国家已经遭到过18、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流派的一次重大的打击，而此时对国家万能的信任却又被重新唤起并有计划地得到加强。独特的是，专制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同自由主义的斗争中经常从专制主义的武器库里借来武器，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后来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显著影响的德国学派的代表都拜黑格尔、费希特及其他专制国家思想的代表为师，成了他们的信徒。”（Rocker，出处同上，第3页及下页）

这里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中一次也没有能够为自己使用上一半真理。自由主义的奥威尔式语言被极为幼稚地从字面上加以理解，而丝毫没有用批判的眼光钻研自由主义经典作家们（例如“穷苦劳动者”）清楚不过的文字并探明他们的社会与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被用社会学方法简略化，看上去完全类似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中的表述，也就是说社会集团以“财富垄断化”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意志，而同时亚当·斯密的“美妙机器”、“价值利用”的拜物教形式和他们的企业经济标准却渐渐消失了。

无政府主义显然与社会民主党一样，没有多少能力重新吸收

以往社会反抗力量的推动力并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理论意识批判性地传授这种推动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二者同样出自自由派的星期日宗教学校，思想上原本也是同吃一桌饭，各方面对立的观点仅仅在于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以及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正像社会民主党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背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也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的“遗产”，在这些争论中都没有离开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及其“劳动”这个压制性宗教信仰的影响范围。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思想上先行一步的）市场经济民主的基础上，重提了在她自己的机构的庇护下广泛实行国家调控的专制主义要求，而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却反过来宣扬尊崇抽象经济个人思想的经济“反垄断主义”。

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在精神上已分裂为“自由的”个人竞争的庞大物为一方和集“龙形海怪”之大成的国家庞大物为另一方的两个部分，这就是商品关系的极权体系必然造成的后果，在这一体系中，货币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主导整个进程的目的本身。因而没有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在同专制王朝及其以商品生产民主制为基础的、历史上的后代进行了斗争以后，赋予社会何种形式的问题不仅仍旧存在，而且甚至将更以纯形式表现出来并被激化。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还在为他们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关的、源自自由主义的概念争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在超出这个范围后达到什么地步，生产方式的体系特点又是如何超然于“君主制”同“民主制”或“共和制”政体日渐淡化的相互矛盾而被客观化的。

经过对几代人强制性的或通过洗脑筋方式进行的纪律教育，（自觉纪律化也日益加强的）“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运动也不可能再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化这座森严壁垒的监狱，这绝不令人惊讶，而是他自己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工业化时期相一致的“工人

运动”时期也只是仍在大力宣扬已被简化和残缺不全的解放思想，而那些思想也无非是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派生词。如果说主张由从事商品生产的个人组成的一个“自由”社会的这个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已在很大程度上降格为一种陪衬并且在工人运动中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这一切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当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思想家和创造者以一种温和的、使国家干预思想复活的方式对工业化的需要做出反应时，社会民主党则在一种“超限定”版本中占据了“龙形海怪”的极点，这个版本把现代的（民主地得到继续发展的）国家机器宠爱有加地奉为“总企业主”。

### 装甲巡洋舰和掠夺性民族主义

国家机器与经济之间的新关系并不能始终局限在业已形成的国民经济的内部关系上。这绝不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中所有阶级和阶层爱国主义感情上的陶醉，此时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刺激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甚至超过了永远在进行争夺王位继承权之战的旧时专制主义的现代化政体的侵略扩张欲望。世界工业市场上各国经济竞争的角斗使经济用政治方式向外扩张，并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均成为经济的一个参数。

已变得抽象并不再与个人联结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职能关联（甚至“威廉皇帝”也只是一个职能上的代表）以“龙形海怪”般“超人”的形象出现，不仅要在各民族内部调节竞争主体之间的法制与基础设施的关系等等，而且同时成为对外竞争的政治与经济的大主体。在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几乎还是在刚刚形成不久的国民经济空间和国家政治辖域之内进行。然而在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新国家干预主义时期，国民经济的空间连同它的代表国家的“思想上的总资本家”



(此为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关联时所使用的名称)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市场的超级辖域,在此之中,政治主权和经济竞争的因素几乎完全合并在一起。

与此直接有关的自然而然仍然是那些独立进行企业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那些不断合并的大型康采恩,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已形成了互相竞争的关系。但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并没有能出现一个与民族国家相应的、调节“世界国家”关系的元机构,所以民族的国家机器只得作为辅助的、提供保障的和贯彻实施的权力机制来替“它的”企业的对外关系撑腰,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这些企业同十九世纪早期不同,已作为某种由国家总体构成的民族经济的代理人或代表者出现。换句话说:与它仅仅对内的调节功能形成区别的是,民族的国家机器对外事实上至少已具有一个民族的“总企业主”的一些特点。

民族这些大主体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竞争与在国内经济中的竞争不同的是未能制定出一个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框架,这一点使得竞争成为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情。正如现代经济的概念所阐明的那样,市场上的交换蕴涵着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总企业主”;现代国家的概念也同样阐明,某个特定地域的国家主权蕴涵着其他地域的其他国家竞争的存在,一个在拙劣的乌托邦中一再被呼吁的“世界国家”按照逻辑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与国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交往,恰恰也包括经济层面上的交往,是根本无法进行总体调节的,而只能按各种不同情况重新通过谈判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并用文字确定下来;所谓的“国际法”始终只能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一纸空文。

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外贸关系与过去几个世纪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仍旧是“龙形海怪”抢掠财物的“自由猎场”。正像后专制主义的政治是经济采用其他手段的继续一样,根据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卡尔·封·克劳塞维茨(Carl v. Clausewitz, 1780~

1831)著名的诙谐名言,战争是政治采用其他手段的继续。首先,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自身为了工业区域、原料产地(煤炭)和势力范围而争斗;法国与德国这对好斗的“世敌”之间,阿尔萨斯-洛林仍旧是一个祸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核心的头脑中,占领与吞并的计划也正在萌芽。

其次,殖民主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拉丁美洲的伊比利亚(即西班牙和葡萄牙——译者注)殖民化仍属早期专制主义阶段的话,那么荷兰、法国特别是英国在北美洲、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化就成为正在上升的自由主义阶段的标志。于是,各工业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中的自由主义保守派政府此时也加入到了殖民地侵占政策的竞赛中。1880~1914年期间进行的这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后来被称为“帝国主义阶段”,这是个带有任意性的阶段划分和容易使人迷惑的名称,因为欧洲强国(以及不久以后欧洲的分店——美国)的帝国主义企图无论是在这个时期之前还是之后都在决定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

区别仅仅存在于形式上和意识形态的伪装上。如果说当初自由派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大多还满足于殖民地国家海岸的贸易壁垒的话,那么此时它们追求的目标在不久之后就是让殖民国家遍地开花,尽管有英国在北美洲失败的经历。英国占领印度(1856年)就表明了这个方向。在可以称之为“正式的”帝国主义时期,世界上剩下还没有被占领的地方主要就是非洲大陆了。不仅英国和法国在此地区重新陷入冲突(例如1898年在根据苏丹一个城市命名的法绍达危机中,英国与法国的殖民部队发生了冲突),而且德意志帝国作为殖民地“迟到的参与者”和最年轻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候选人也以强力介入了非洲(以及东亚部分地区)的争夺。虽然在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40~1688)当政时期,普鲁士曾企图在黄金海岸争夺殖民地,但只不过成为一段插曲。19世纪末,新的德意志帝

国主义致力于用强权建立自己的一个殖民帝国。1884年，多哥和喀麦隆被宣布为德国的“殖民地”；同年，德国-西南非洲保护国宣布成立。1891年，威廉帝国接管了德国-东非保护国。（西南非洲的——译者注）霍屯督人和赫雷罗人的起义遭到德国殖民军队血腥镇压。在此之后那些留着大胡子的主要人物长时间以来对此特别感到骄傲，其程度不亚于对1870~1871年同法国战争的胜利。在太平洋地区，威廉帝国只是接管了几片小的殖民领地：1885年宣布德国-新几内亚成为“保护国”，1897年占领了中国东部的胶州湾，1899年买下西班牙在南海的群岛（加罗林娜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900年提出了割让萨摩亚群岛一部分作为“保护国”的领土要求。

欧洲强国之间的霸权争斗提出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挑战，这轮军备竞赛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军事方面的努力。因为军事工业此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极高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加速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系列新的或“改进的”杀伤技术和武器系统。1867年，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发明了一种具有前所未有强大威力的新炸药，即臭名昭著的甘油炸药。诺贝尔康采恩成为了第一个在许多国家设有炸药工厂的大型国际军工企业。受良心的谴责，新的毁灭能量的发明家和大工业家诺贝尔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金。在全世界都受到敬仰的这个享有盛誉的国际科学奖，甚至还有“和平奖”，竟是由最大的火药康采恩设立并以一个军火工业家的名字命名的，恐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个最具深刻象征意义的事实更能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已成为客观事实的厚颜无耻了。几乎成为多余的一句话是，这个奖通常情况下只考虑授予那些顺应潮流的科学家；“诺贝尔和平奖”的橄榄枝也总是只允许那些捉摸不透的或是虚情假意的人物去摇摆。

当然大炮和其他射击武器在工业发展进程中设计制造得越来越

越“好”，越来越大，射程也越来越远。与机器时代相对应，美国人海勒姆·斯蒂文斯·马克沁先生（Hiram Stevens Maxim, 1840~1916）1883年发明了机关枪，该枪以每分钟发射上千发子弹的射击速度成为此后步兵的主要武器。在“发生大饥荒”的德意志帝国，作为中央军工厂之一的克虏伯公司引起了广泛注意。正如通常被后来的宫廷传记作家所歌颂的“从小的起点做起”的精神那样，克虏伯家族也是商人世家并已兜售了几百年的武器，这个家族的后代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却使自己同他总部设在埃森的同名股份公司一起成为德国的“炮王”。在帝国成立很久以前，这个家族便开始生产铸钢炮管，自1859年以来就是普鲁士王国宫廷的军火供应商。在普鲁士慷慨地解囊资助下，克虏伯的军工企业规模迅速膨胀起来：

“他把钱投资于设备，例如50吨重的‘弗里茨’锻锤，为了固定它不得不用整个一片森林的树干打入地下作为地基。克虏伯用这个庞然大物可以把欧洲最大的钢锭加工成大口径的大炮，或者也可加工成未来新型轮船的推进轴。”（Ogger, 1982, 第145页）

事实上除了传统的射击武器—杀伤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外，特别是海上的军事化成为欧洲军备竞争的主要内容。因为庞大的陆军虽然适用于欧洲范围内的权力之争，但并不适用于殖民扩张；当时还没有飞机，这样海军军备和海军政策就成为了新帝国主义的中心环节，被具体落实为建造越来越巨大的“装甲战舰”。

“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激化的利益冲突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的驱动下，耗资巨大并且规模空前的舰船制造计划最终使海军得以建立，它的主战舰，即火型战船，与活动

的钢铁碉堡相仿。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普遍进行的军备竞赛中，根据类似的基本原则建立和分设了各种海军舰队……普遍适用的原则是把最新的科技知识尽快地应用于海军建设事业……为此出现了一种迄今为止不为人熟知的政治与科技在军事上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所有刚刚成熟的技术方案马上用于海军军备的制造，以便通过拥有更强大的海军达到野心勃勃的扩张目的。这就不仅涉及造船业和装甲制造，也涉及火炮制造业、动力装置、舰船上电的应用、通讯与信号业等。遇到极深处，回声探测器将发出警报，水下声波发射器和接收器开辟了信息传递的新途径。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的无线电报对于海军和它的指挥系统的协作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的装甲舰船上就可以反映出那些国家科技已达到的总体水平以及他们此时相应的经济实力。”（Israel/Gebauer, 1991, 第8及以下数页）

在普遍的民族主义背景下，海军军备不久以后就创造了它自己的神话。新的“海景画”偏爱描绘笼罩在俗不可耐的朝霞中的重型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军国主义的吹牛机器也甚嚣尘上地高速运转。在德意志帝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对海军舰队的激情掀起了惊涛骇浪；在军事重工业的利益和成为歇斯底里的普遍现象的扩张主义快感这一奇特的混合体的作用下，到处都成立了从事宣传活动的“海军协会”并发展成为一场真正的“海军运动”。根据1896年的提尔皮茨计划——该项计划是以它的发起人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v. Tirpitz）命名的——威廉王朝海军装备建设宣布要达到的目标是“把英国从它所占据的海上和世界强权的首席位置上赶下去”（Deist, 1976, 第10页）。

国家军备计划的这种非理性的特征当然也在费用的雪崩中反

映出来，而这一费用雪崩正是由于军队、舰队及其技术装备的扩增造成的结果。1875~1914年期间，德国军队的数量从43万人增加到80万人以上，海军的数量从6000人增加到8万人。军费开支总额在1880~1910年期间从4.62亿马克（金马克！）增加到约15亿马克，到1914年已达70亿马克以上。军费预算根据“递增的国家份额法则”在国家开支中所占比重在20%~30%之间，远远高居榜首。在其他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大帝国中情况也完全相似。

问题自然在于合乎其真正词义的“发疯似的”开支是否值得。从总的情况和从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制造不幸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强权的野心从始至终使所有参与其中的“强国”支出的费用比他们最后能够得到的多得多。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从来不愿承认这一点，该理论在所有的变体中都是明确地把整个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成果看成是前提。这一做法用静止的方式做出的背景假设始终是：凡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事肯定对资本主义有益。原因自然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从自由主义那里盲目地接过了资产阶级理性的种种范畴，使马克思理论中所有那些超越上述范畴的东西失去了光辉。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总体商品生产及其经营方式的概念范围中思考它自己全部的社会批评，并没有认识到拜物教的制度特点；而且它以此不仅为了自身，同时也为了对方而接受了“理性的利益考虑”这个最早的自由主义观点。反过来说，这种生产方式的非理性特点完全没有或只在表面意义上（被解释为欠缺控制市场经济过程的能力）被加以理解。当马克思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用他的物神概念接近这个制度的偏执狂特征时，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不再能够把“理性的利益考虑”当作一种荒诞客观化的纯内部理性来理解。他们也以这种简化的方式来认识帝国主义。

殖民扩张事实上与海军军备政策一样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同一

个已经独立和荒唐无稽的结构的表现、继续和延伸，这一结构曾创造了“抽象劳动”本身及其边沁意义上的那种教养所。帝国作为“思想上的总资本家”不仅从“外交上”继续坚持经济竞争的非理性主义，而且它也因此没有能力把局部的“理性的利益考虑”提高到全社会的层次上。这种基本逻辑的荒诞性必然在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竞争的层面上再现，并反过来打了自己嘴巴。

资本主义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原则上和从长远观点上看什么也没有赢得，那么一个拜物教的和盲目地引导全过程的制度体系究竟又能“想要”赢得什么呢？“美妙机器”的主体代表和偶像崇拜者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骚动不安的精神错乱症的语言。于是帝国之间的竞争这种自我毁灭的性质在进入 20 世纪的世纪之交时几乎并不令人惊奇，它也符合本质上在自我毁灭的社会形式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早在进入 20 世纪前他在 1913 年出版的一本论述帝国主义的书中就针对帝国主义吞并政策的原因进一步阐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的观点。霍布森的论证 [类似于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理论] 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内部界限与危机作为出发点，他的这一观点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 (Hilferding) 和列宁 (Lenin) 所继承并尖锐化：已积累的货币资本在欧洲的民族经济中被内部市场和增长潜力消耗殆尽，已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有效益的再投资。所以民族资本主义需要殖民扩张，以开发资本出口的空间。

这个内部限制的论据虽然在纯逻辑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这个界限在即将进入 20 世纪之际实际上根本没有达到。从 19 世纪上半叶那场大的转轨危机中产生出的工业滚雪球式体系即使在欧洲

也绝没有终结。从旧的生产行业部门向新的生产行业部门的过渡中，它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的实施危机；但是因为这个时期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全社会再生产还远远没有实现普遍的资本主义化，还面临着根本上的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革新，所以资本在内部、在国内经济中的扩张还根本没有走到尽头。另外，霍布森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普遍忽略了一点，即通过不断扩增的国家借贷的形式产生了一个额外的、国内经济的推动力，目的在于从时间上推迟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界限并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几乎是人为的增长。如果这种可能性最终注定要转化为一种危机潜势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同样要在历史事件的范围中寻找原因，这个问题甚至在理论上的讨论也刚刚处于开始阶段。

霍布森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论证尽管如此却并非完全是错误的，至少一部分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不仅自1880年以来新获得的热带殖民地被纳入分析范围之中，而且还涉及全部殖民地区和（特别是列宁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周边地区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但这种调查的结果首先只符合英国的情况，它占有着虽相距遥远但地域幅员最大的殖民地；英国的资本输出不仅比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多至四到五倍，而且逞明显上升趋势，到1914年，进入英国殖民地以及或多或少地依附于它的地区的资本增幅已达30%至50%以上。

法国却与此相反，它虽然也统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但它资本输出所占的比例始终不到10%，因此显然要比英国低得多；德意志帝国的这个比例则几乎没有超过1%，因此在这两国均没有想到会出现大的投资危机。英国作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强国，它格外突出的境况被仓促地一般化了。其次，正如历史学家格罗弗·克拉克（Grover Clark）1936年在一项大型调查中明确断定的那样（参见：Mommsen, 1979, 第100页），恰恰对于帝国主义十分发达而且居主导地位的英国来说，作为资本输出



的结果，在非生产性的（主要是军事、管理技术、后勤等方面的）开支与长期“收益”之间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比例失调。巨大开支的原因肯定也可归结为交通、后勤和通讯的工业资本主义技术尽管在世纪之交有了蓬勃发展，但无论如何没有能力胜任跨洲的再生产这一巨大的任务。

这一切自然都改变不了几百万人在强盗般地掠夺殖民地政策的名义下被屠杀、被伤残和被侮辱的命运，整个国家被荒芜并由于肆虐开采而毁灭。这一灾难性发展由于最终连一个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有利可图的结果都没有产生而只是出现在一片更为刺眼的光线中。还有一种极度表面化并竭力辩解的做法就是，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淡化为单纯的“历史错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属于外部的和原本陌生的现象，如可能的话，还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专制主义和前民主主义思想方式等讨厌的残余。这个做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后来的“第三世界”政府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形式上平等地参与世界市场绝对没有能阻止这些国家中大多数人遭受贫困和欺侮的发展趋势，反而在数量上和结构上加速了这一进程。取代相比之下更肆无忌惮的殖民主义残暴行径的是“美妙机器”以它在新的质量层次上的全球化形态实施的并且合法的残暴行径。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完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的再生产还普遍位于民族的中心。然而这并不是说，非理性的对外掠夺的民族主义同资本的内在逻辑未曾有过关系。市场交换虽然根据它的自然属性有别于武力掠夺；它是以一种法律关系和商品交换的等值原则为前提的。所以有关辩护常常声称，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和平的事情，并是那些武力的、强盗式的和强制性的状况的决然对立面。但这完全是按照边沁的观点来考虑问题的：完全忽略了经济活动的目的（与作为农业自然经济的边缘形式和零散形式的前现代市场不同）并不是交换双方所需的物资。而在

积极推进形式上平等的交换关系的背后是“美妙机器”在非理性地以自身为目的，即不停地积累资金（经济价值，“抽象劳动”的份额）。未能得到足够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生产方式的一个第二作用领域。

虽然这种自身即目的在价值反馈到自身（剩余价值）的经济形式上自然同简单的掠夺形式并不一致，而在全社会的实施中却狡猾得多。“掠夺”被扣留下的剩余价值这种工人运动的观点因此始终是天真的，事实曾多次表明，这种观点本身也受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束缚；尽管如此，这种观点还是指出了一种正确的，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怪诞的感觉，指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强制性和暴力性因素的实际经验。这不仅是在经过长期的社会抵抗斗争之后采取了极为残暴的手段才得以实施的并构成这种因素的“社会境况无声的逼迫”（Marx），而且官僚主义的人事管理机器和公开镇压的机器为了能够立即将人力资源想逃脱“魔鬼磨坊”惩罚的任何尝试扼杀在萌芽中而时刻待命。正如瓦勒施泰因所指出的那样，为国际市场而直接用武力强迫从事的奴役劳动也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假如市场上的“交换伙伴”不同意按照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和西方国家的条件行事，那么市场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交换甚至也可以用武力来强迫进行。

一种掠夺性的和暴力性的因素于是在存在许多细微差别的同时成了资本主义的家常便饭。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非理性的殖民主义和兼并主义野心能够这么长时间支配现代思想就不难理解了。开支与破坏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殖民主义独有的一个特点，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全部资本的立足点是一种虚构的、抽象理论的和观察的立足点，它不被任何一级决策机构实际接受。在这个层面上，也不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成本核算，因为这种核算只限于局部的企业经济层面。国家的核算同样不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核算，而只限于国家自己的收入与支出。

然而，帝国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宏观经济的非理性主义却是完全可以转换到各层下级决策机构内部理性的目标上的。因此，“各国用于殖民地的开支与其殖民地对于民族的国民经济的真正价值之间明显地不成比例”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各个经济团体因此而不能获得高额利润”（Mommsen, 1979, 第100页）。这不仅涉及直接的殖民地投资者和“殖民商人”，而且也主要涉及军事工业和它政治上的国会院外活动集团，这一切不久后就发展成为今天仍然存在的并得到进一步扩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这种情况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从来不只涉及用于居心不良（如吞并主义和镇压等）目的的手段，而且也总同时涉及到当时在昂贵到极点的装甲巡洋舰和大型战列舰中显现出来的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自身即目的，这一自身即目的体现了普遍的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状态内部的一种特殊的因素。因为虽然从资本主义整体上来讲，它是一个非生产性的成本因素，从长远观点看还是一个财政方面的危机因素，所以军事-工业联合体同时不仅是一个给参股进来的个人资本创造利润的企业，而且也是一个由国家贷款人工抚育的并在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起辅助作用的行业，这个行业首先起着抑制危机的作用。当由此产生出国家金融危机时，上述因素的潜在危机最终就会重新显示出来。当然这一作用也可能会通过其他行业中预算赤字的筹资政策体现出来，但是自由主义与它保守派的同道比起为社会福利乞讨得来的那点儿令人心酸的小钱来，眼下却是更喜欢花费在制造毁灭性武器上的巨资。如果已出现赤字，那么只需要往天平的一个秤盘上滴上几滴那种臭名昭著的“社会福利之油”，而往另一个秤盘上则砸上用于制造大炮的、重50吨的蒸汽锤。

军事-工业联合体绝不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内部理性的惟一因素。从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从作为前提的非理性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其他部分理性的方面是完全可以识别

的。战略原料储藏的索取可能性于是就给以民族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以及整个工业体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和间接的并由材料-技术方面的必要性所决定的理由：尽管开支与收益普遍存在比例失调但仍旧坚持帝国主义行径。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这一切首先涉及煤炭和铁矿，那些帝国主义政府这方面同工业资本的民族联盟组织一样，渴望着兼并相邻的欧洲地区和获得殖民地。工业家和社会民主党重要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 1867~1922）也是他父亲创建的AEG通用电器公司的董事会委员，是联邦德国世界市场-民主正式的创始人之一，直到今天德国几乎到处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1913年他在一篇名为“德国的危险及新的目标”的文章中针对就上述联合体发表了一系列最强硬的声明中的一项，他对支出-收益关系看得一清二楚。

“在以往的岁月中，人们认为殖民地可用来做纳贡国或是过剩人口的卸载场或是商品销售地。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些殖民地大多费用大于赢利……所以我们很容易倾向于……低估这些海外财产的价值。不久以后我们将会认识到，地球上每块地方作为物质来说都是珍贵的，因为哪怕是极小的一块地方也拥有或是生产某一种原料，如果这种原料并非是直接可利用的东西，那么就用来进行交换。近几百年的历史意味着瓜分世界。我们真是不幸啊，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获取和得到！并非是政治野心也不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引发这个抱怨，而是刚刚开始的经济上的认识。一个时代正在飞速接近，在这个时代里自然原料不再像今天一样是任凭选取的市场产品，而是处于争相购买的热销物品；矿床终有一天会比较经由数道加工工序锻造出来的装甲巡洋舰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没有能力在人的一生时间里用50万平方公里本

国领土和一小块非洲土地上的产品养活上亿德国人并给他们提供工作，我们也不想指望世界市场的恩赐。我们需要这个地球上的土地。我们不想从任何文明国家那里索取土地，但是在未来的领土划分中必须分给我们应得的那部分，直至我们像我们的邻国一样能够吃饱……对于这样的语言是根本无言以对的，因为原料的理由毋庸置疑是正确的……”（转引自：Opitz, 1994, 第 204 及下页）

从此段话中听得出另外一种内部理性的动机，这一动机驱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精英们策划一种帝国主义的兼并战略，也就是他们自己极为害怕爆发一场也许将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才能见分晓的新的社会危机，正是这样的危机曾激发了俾斯麦半心半意的“国有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可怜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网络绝对不可能承受资本积累再一次百年不遇的冲击，对此极为清醒的认识使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对可能的就业与生存危机起着决定性的缓冲器作用。这自然是一个在当时投资的统计中不会被记载下来但又具有实际含量的因素；因为即使是资本主义决策机构对未来的恐惧也会演变成物质性的暴力，尤其是这一恐惧从来都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恐惧迫使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来补偿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限制，英国这个世界强国本身也同样包括在内，其代表人物同样也一再想到这一主意；这方面正如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事关百姓的基本生存方面，民族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正像它并非偶然地表明了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纲领的特点一样）一再占据重要地位，例如邓拉万（Dunraven）勋爵在 1884 年的一次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放弃我们祖先留下的殖民地这一宝贵遗产的话，那简直是近乎疯癫。我希望那一天将不会太远，届时我们仅

仅从具有亲缘关系的殖民地就能得到我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做我们吃的所有面包所需的粮食都是在我们的殖民地种植的。仅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有义务把我们自己与殖民地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并对它们加以保护。”（转引自：Lautemann/Schlenke, 第 575 页）

与此相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德国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宣告者，他的社会学著作今天是被过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家当作学术经营活动中的理论阻击阵地和撤退阵地（人们可以在声望无须受损的情况下引用他的观点，这比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要容易得多）。韦伯把扩张政策首先看做是一再形成威胁的“失业问题”的一个可能解决的方法。1896 年他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警告：“我们为此需要向外扩展空间和扩大就业的可能性……这就是向外扩大德国的经济势力范围。从长远来看，这一扩大绝对是由向外扩大政治势力的情况所决定的。”（转引自：Lautemann/Schlenke, 1980, 第 586 页）一年以后，他又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而且是直接面向尊敬的“工人阶级”。

“德国的工人阶级今天还可以选择是在祖国还是在国外寻找工作机会。无论工人愿意与否，这个选择的机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最终结束。那时工人将只能限于在他祖国的资本与权力给他提供的养家糊口的活动余地中生存。没有人知道这一发展进程何时运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进程是要运行的，可以肯定的是会形成争夺政权的无情斗争来取代表面上和平的进步。”（出处同上，第 586 页）

由“龙形海怪”的威胁和帝国的诱惑组成的混合体与由资本主义决定的“养家糊口的活动余地”的先验形成了一种关系，社

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以货币工资这个惟一可以想象的社会再生产的形式至少已经含蓄地承认了这一“养家糊口的活动余地”。同在1897年里，自由主义首席思想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领导的民族-社会联合会的观点更加鲜明，瑙曼的思想直到今天仍被视为德国自由主义中“社会自由”派系的基础。帝国时代的自由民主党人不仅在世界大战时期而且还在纳粹时期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也许再也不如此时更显而易见了。在宣传一种受“社会”限制的自由派思想的《民族-社会问答手册》中这样直言不讳地写道：

“1. 你们为什么自称是民族社会的？因为我们确信，民族与社会是休戚相关的。2. 什么是民族的？它是德国人民在地球上扩大影响的动力。3. 什么是社会的？它是劳动大众在人民内部扩大影响的动力。4.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德国在地球上影响的扩大没有劳动大众的民族意识是不可能的；劳动大众在人民中影响的扩大没有世界市场上德国威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可能的。5. 德国在地球上影响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大众的民族意识？因为假如德国要想在亚洲、非洲、美洲，特别是在欧洲有一定地位的话，就不得不为舰队与军队付出巨大代价，如果长此以往缺乏劳动大众的意志，这样的代价是不可能承受的……22. 所有文明民族的影响不能共同扩大吗？不能，因为这些民族的商品销售市场还不够大。这一市场扩大的速度没有文明民族中扩张的努力上升得那么快。世界市场上的斗争是一种关系到生存的斗争……”（转引自：Opitz, 1994, 第125页）

专制的福利国家与帝国主义完全公开地交叉混合为一个政治-经济的复合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从民

族的内部被转移到外部。这种关系不仅在英国和威廉王朝的德国，而且也在所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体现出来。早在19世纪，“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应运而生。但这一方面再怎么重要，它也仍然无法单独或从根本上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曾称，他认为选择社会帝国主义至少对于德意志帝国来说是个核心问题，而且首先是保守派对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努力的抵御对此阐明了缘由。与此相应，这里必须要指明的不仅有对原料储藏战略性的索取、殖民地商人或是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以及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自身动力连同它能在整个社会发挥的作用这种种独立的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有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这一竞争通过民族经济的基准体系已转移到了政治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层面上：在相互对立的“思想上的总资本家”之间以政治与军事形式进行的竞争必须在完全与任何益处无关的情况下作为毫无目的地（或是在同一层次上以自身为目的地）争夺“势力范围”的角斗而继续下去。这种或那种益处被作为一个接一个后补的理由，哪怕仅仅是抽象的“希望，即虽然有关领土的经济价值眼下等于零或者甚至是负值，但将来可能会有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发展”（Mommesen，出处同上，第100页）。这一断言只有当它涉及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自来就有的非理性特点，而不是在公理上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形式时，它才具有一种诠释的价值。

### 恰恰是香蕉

将社会帝国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要求对立起来，也不太令人信服。“已成为家养宠物”的工人运动的思想方式已经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赢利范畴，固守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民主定式，因



此这种工人运动已经孕育着社会帝国主义的萌芽。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里一贯反对给海军建设提供经费预算，多次在国际上召开的社会党人大会也发表了一份又一份的和平宣言。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从未被任何人认真对待过，只有少数最左翼的人士除外。德国这类最左翼人士的代表在一战前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只在表面上抵制帝国主义的扩张及军备政策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社会党人和工会的组织机构被帝国主义的精英们继续排斥在对国家的共同管理之外，重要原因倒并非两者之间原则上的真正对立。

使工人运动和社会帝国主义衔接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工具自然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它是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派早在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就已用所谓的左派自由主义的母乳喂养起来的。在1870/1871年间的德法战争中，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友谊之所以避免了公开的破裂，只是因为当时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本身畏惧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把自己出卖给“外敌”，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倒让真实的情况扭曲失真了。但是，在一战爆发的近50年前，当这种特殊的局势连同“巴黎公社”尚未形成和当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完全“正常”的现代战争状态时，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莱茵河两岸社会主义者们的真正立场，即站在各自资本主义“祖国”的一边——准备兄弟之间反目相戮。尽管后来人们不再喜欢引用有关文献，但它们的明确性却无可指摘。比如，当普鲁士—德国的统治者向法国发起进攻时，在奥格斯堡举行的一次“工人盛大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可以被看做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当时情绪的集中反映：

“当前的战争由于并非以德意志及法兰西人民利益为前提，因此从拥有情感的人们、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它应当受到诅咒。但对当前的问题完全采取否定态

度在目前尚不可取，因此这次工人大会做出以下声明：遭受了路易·拿破仑这个扼杀一切人民自由的罪犯……侵略的德意志人，有义务全力以赴保卫家乡的土地……”（转引自：Deuerlein, 1970, 第46及下页）

不久之后，法国军队战败，不伦瑞克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份充满德意志民族主义气焰的胜利宣言，这份宣言已经含有此后社会主义者们表现出的热衷于世界大战的全部令人作呕之相：

“这样一种保卫战不排除向敌人发动进攻；它同任何一场战争一样，包括迫使敌人实现和平。因此，即使在德国边境所受到的直接威胁解除、我们英勇的军队深入到法兰西国中之时，我们自己也要祝愿德意志军队取得胜利；我们那些德意志兄弟们以他们罕见的英勇气概、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令我们倍感欣喜。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为归属于这样一个英勇的民族而倍感自豪。但是，现在在胜利给我们带来种种荣誉感时，更重要的是牢记我们的义务：不要沉醉于胜利的狂喜之中……”（转引自：Deuerlein, 1970, 第107页）

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的各工人联合会和不久后便成为“巴黎公社”前身的国际劳工协会法国分会在民族主义问题方面也毫不吝啬，在一份声明中向德意志的同仁们提供了一种友好的击毙方式：

“致德国人民！致德意志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法兰西共和国以正义的名义要求你，撤回你的军队。否则我们会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个人，你和我们将都不得不血流成河……回到莱茵河对面去……世界共和万岁！”……（转引

自：巴黎公社 1871 年文献，1931，第 114 及下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所有诡辩和虚伪已端倪渐显；所有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左派“现实政治家”们在最初就采取了极其令人作呕的态度，即他们不能对资本主义本来“应当受到诅咒的”的种种丑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实际行动上做出相反于理论上被认为（所谓）正确的事情来。他们不但盼望参与资本主义对“抽象劳动”及其荒谬行为的组织和管理，也愿意投入民族主义的血腥屠杀（今天是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警察”），他们的这种参与欲望已明显变得十分强烈，连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想通过政治上的压制来抑止他们的这种欲望都步履维艰。不过，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 1871 年的时候还在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是抽象的“国际主义”的残余，它后来也未久存。这种动摇性甚至表现在“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us）”的概念本身，这个概念以“国家（Nationen）”的实际存在为前提条件，因而它也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形式的实际存在为前提条件。

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得继续下去。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都持“反军国主义”的正式立场，而他们在幕后的行动却的确很实际。从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思想状况来看，一战前几十年，他们就已成为“民间”军国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军国主义也是以他们的思想状况为基础的。普鲁士推行的卓越才干意识形态把所谓的相关美德，如纪律性、准时性等当作道德标准大加颂扬，在通过工厂体系和“大众教育”进行长期的灌输和洗脑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深深植根于广大雇佣劳动者的头脑中，而且自然也影响到作为“国家的学校”的军队。在这个造福社会的机构里给年轻的新兵好好“开导开导”并“教育他们懂得礼貌”，可算是父母、老师、老兵们谆谆嘱咐中的基本保留节

目。所以，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工人们在酒馆饭店等地口头流传的口号是完全可信的：“我们是士兵和社会民主党人，为两者俱献出灵与肉。”（转引自：Grebing, 1979, 第134页）

1887年，当《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还禁止社会民主党时，他们就在一次呼吁中宣称：“我们要求全面武装民众，对全民族进行自卫教育，建立全民族参与的自卫武装力量”（转引自：Schulz, 1976, 第255页）。这个充满诚心的愿望可使人得出一种推测：即这样的一种“人民武装力量”只适于防御，但这一点却并不能反证，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状态与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已相去不远。俾斯麦倒台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废除之后，新上任的帝国首相、普鲁士将军雷欧·冯·卡普利维（Leo von Caprivi, 1831~1899）大加赞扬在军队中受过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训育的士兵们所付出的“努力”。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回应他时用的不是尖刻的嘲讽，而是极度的谄媚：

“这根本不使我感到惊奇，而只是证明，右派人士和政府里的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卓越才干曾完全看错了。我甚至相信，我的党内同志们会积极遵守规定的纪律，这种积极性是生活教会他们要遵守纪律的一种结果。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转引自：Rocker, 1980/1950, 第45页）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倍倍尔这种带有背叛性质、但却同时又属同一意识形态范围的一时错误既没出现在现有的各类文献集里，在有关工人运动史的种种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要探明这类史实的踪迹，就需要有罗克（Rocker）等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的论战兴趣。1891年11月，皇帝在卫队的新兵宣誓典礼上感谢社会民主党显示出的忠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热情，他用生硬的话语宣布：

“你们宣誓向我效忠，你们就成为我卫队中的孩子，这就是说，你们现在是我的士兵，你们向我奉献出肉体与灵魂；现在对你们来说，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我的敌人。面对现在社会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形：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亲戚、兄弟、甚至父母开枪射击——上帝可能会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即使如此，你们也必须毫无怨言地执行我的命令。”（转引自：Schulz, 1976, 第284及下页）

尽管出现过这样一类挑衅行为，10年之后政论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 1861~1927）在他的《未来》杂志中令人惊奇地提出：“倍倍尔对军队预算的批评表现出比某些国家管理者的态度更发自内心的关注。无论如何，显示出的是更多的理解和取得一致的意愿”（转引自：Schulz, 1976, 第319页）。在如此热衷黩武、喜好黩武的双重美德气氛中，社会民主党内自由主义“龙形海怪”的继承人越来越朝着殖民主义方向突进。即使在这个方面，社会民主党冠冕堂皇地采取的拒绝政策也更多是出于对被排斥在统治与管理之外的一种失望，而非原则上的对抗。所以，在表面上公开反殖民主义的立场背后，欧洲所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向帝国主义扩张利益靠拢的信号，而在多次国际社会党人大会上，一股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少数派公开提倡帝国主义的扩张。

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成员都没有认为殖民主义在原则上应当被诅咒，而相反地把它看做资本主义“促进文明的使命”的举动，对于“促进文明的使命”马克思曾在完全不同的关系上论述过。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是想要肃清马克思理论中一切带有市侩气改革政策的“有失体统内容”的修正主义者的一位领头人，在他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一书中纲领性地、直言不讳地表示了

这个观点：

“否则，大概有理由在获取殖民地时坚持严格审度殖民地的价值和前景，并且严格监督提供给当地土著人的补偿、如何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但是没有理由把这种获取从一开始就看成卑鄙下流的行为。他们由于当今的政府体制而必须采取的政治态度禁止社会民主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除批判态度外的其他观点……但是未来也向我们要求它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目前每年进口数量相当可观的殖民地产品，我们也不得不对自己说，如果可能的话，但愿有朝一日我们也能从自己的殖民地至少进口一部分这样的产品……在这里，关键的因素不是‘是否’，而是‘如何’。欧洲人占领热带国家既不必让当地人的生活受损，况且，至今总的来看也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野蛮人的权利在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只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承认更高等的文化在这里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也享有更高等的权利不是占领土地，而是经营土地的行为才会赋予使用这个历史性的合法权利。”（Bernstein, 1969/1899, 第180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殖民主义原则上为人所接受并且“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所谓“更高等的”欧洲文化享有“更高等的”占领权被大肆宣扬。伯恩斯坦还直言不讳地说，仅社会民主党“由于当今的政府体制而必须采取的政治态度”（可谓：被关在权力的大门之外）就可能使他们公开反对殖民主义。但尤其暴露他们真实态度的是“更高等的权利”的理由，即指出了“经管土地”，意为通过“抽象劳动”使土地“产生价值”，而那些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则被宣布为没有权利。

不仅仅是“修正主义”派，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整个社会民主

党（又是不重要的最左翼属例外）都痴迷于殖民主义思想，这个事实不久之后就显露出来。伯恩斯坦的著作出版一年后，中国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所谓义和团运动，被欧洲八国联军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德意志帝国十分乐意地加入了这次殖民者的屠杀行动；不过，1895年一位名叫克纳克富斯（Knackfuss）的画家受德国皇帝的委托制作了一幅名为“黄祸”——一个用来为吞并亚洲的欲望作辩护的口号——的大幅油画。在帝国主义共同利益的名义下，德国参与到这次事件中来，打着自此之后便臭名昭著的口号“德国人冲锋陷阵”。这在当时的情况下颇得人心，特别是还有一个要行使“和平使命”的外部原因：遭人唾骂的沙文主义者、驻北京公使冯·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eler）于1900年6月20日在大街上被枪杀。威廉二世在布莱梅港同他的屠杀队告别，把他们送上前往亚洲的征途，此时他发表了一篇“匈奴人的讲演”。

“谁落在你们手上，便栽倒在你们手里了！几千年前，匈奴人是怎样在他们那位直到今天仍然以高大形象出现在传说和童话当中的国王艾泽尔（Eizel）带领下为自己赢得美名，那么德国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名声也要由你们以某种方式赢取，使不再有一个中国人敢哪怕斜眼看一下德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彻底打开一条大路吧！”（转引自：Schulz，1976，第314及下页）

这一公然的野蛮行径、纪律、严谨和“文化要求”共同构成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的显著特点在后来几十年里升级为人类最残暴的罪行。“匈奴人的讲演”在这段时期里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致在一战中协约国士兵使用的黑话里德国人还被称为“匈奴人”。原本为基督教新教牧师和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的

自由主义领导人物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从此便得到一个“匈奴人牧师”的尊称。这一臭名远扬的讲演发表后4个月，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在帝国议会反对官方实行的中国政策，他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体现了伯恩斯坦的思想：

“在世界上所有缺少真实的、真正的德国和欧洲文化和文明的地方传播这一切，是一项伟大而美好的事业，但重要的是取决于实现这个想法的方式和方法，要看怎样去接近欲向之传授文化和文明的异邦民族。”（转引自：Schulz，1976，第318页）

一战前的14年，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大部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没有在殖民地问题上超出“温和的匈奴人思想”。这种态度也相应地体现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我本人的祖父，一位机械制造工业部门中虔诚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会员，在一战中甚至开过小差，老年时还情绪激昂地反对过美国发动的越战。尽管如此，他要是回忆起殖民时代那些乐事，也只选择其积极的一面。这也正是大部分雇佣工人后来的感受：德意志帝国被抢走了“属于我们的殖民地”是极其不公正的。“殖民地商品店”里的热带水果肯定给“遭受严重饥荒”的德意志帝国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让人们不由地联想到自己享有了“几分豪华生活”。而与此相比，“野蛮人的权利”就算不了什么了。

如果我能够相信祖父母的讲述，那么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从那时起显然同流传的民歌中甚至被赞美过的香蕉（“恰恰是香蕉”）有了一种奇异的关系。对民主德国的群众来说，香蕉还升格为象征西德马克—民族主义愉悦感的水果，这也许已成为一种集体性潜意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香蕉的诱惑将工人运动的前辈们引向了世界大战时代的战场。



## 世界社会的生物化

---

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为划分世界进行的竞争、军事和工业的联手、海军舰队的活动、对殖民地提出的要求和文化优越性的宣传，这一切对于即将跨进 20 世纪门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没有影响。出于由对世界市场竞争和外族威胁的恐惧、民族主义的必胜信念和文化弥赛亚主义的恐惧混合而成的奇特情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酝酿着一个侵略性的、疯狂的新意识形态。如果说最早期的自由主义自霍布斯之后便将社会中的种种关系从意识形态上“自然化”并从亚当·斯密开始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市场机器中机械论的伪物理学原理的话，如果说马尔萨斯用他的“人口法则”迈出了将危机生物化的一步，那么帝国主义竞争中的思想家们则发展出超过所有这些理论的、涵盖面更广的生物学世界观。自由主义制定的将社会现象自然化的纲领本来更多是意在隐喻，却被人们按字面意义去理解，这种方式的理解把人类文化和社会的整个体系定义为（自身也被意识形态化的）生物学的直接组成部分，这在后来人们的思想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种至今都未单独发挥作用、而总是重新以新的竞争状况为源流的生物学主义对现代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一再揭示出现代思想中极度非理性的、社会病态的潜在因素。

称得上新生物学主义先驱的是现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的人物，除了牛顿以外，没有谁再能像他那样能彻底改变世界的形象。他就是英国的乡村贵族、失意的牧师候选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用生物学解释世界，从而补充和扩展了人们看待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机械论视野。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一个真正伟大的发现完完全全与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冲动及资本主义的崇拜体系融合在一起，最终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

达尔文的家庭是富裕的“辉格党”，属于最拙劣的一类自由主义者，同时，就像他传记里（Desmond/Moore, 1995）写到的那样，这些人对自然科学满怀兴趣；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Erasmus）是医生、诗人，也是个爱钻研的人。他还设计出可以背诵天父之言和十诫的说话机。18世纪末期，他猜想物种可能变异，并认为可建立起“物种起源论”。这个起源论却要留待他的孙子去建立——但祖父至少还是给他留下了表达出有关“畅想”信念的词句：

生无父母，独自问世的

是史前迷雾中的有机生命

今天几乎无法想象，直到19世纪前半叶，在已经完全处于工业化时代和资本主义自然科学正蓬勃发展的时候，理解一部真正的自然史（在康德之前，这个概念只指自然现象之间的一般联系，而并非延续意义上的发展史）的理论才刚刚开始虚弱地起步。即使黑格尔也认为这是一种古怪的想法。尽管经过了“启蒙运动”，对大自然的认识和资本主义工业技术也都有进展，但在这方面，圣经一如既往仍为主流社会大部分人一句不差地全部接受。虽然自然科学早已研究了比6000年长得多的地球发展史，

但仍旧有不少人——其中不仅包括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上帝在大约 6000 多年前就创造了包括所有动植物种类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永恒不变的。而且，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生物进化的思想就已萌芽，如法国的自然科学家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即已质疑过物种不变的思想，却没有将自己的怀疑继续扩展成一种学说，也没有设法去突破这种思想。达尔文在一次 1832~1837 年作为自费科学研究随员随英国勘探船进行的环游世界的旅行中不仅收集了大量标本和化石，而且在笔记本中创立起“物种起源论”的基本思想，几十年之后，他才在朋友们的力劝下把这个起源论发表出来。直到 1859 年，几乎就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同时，他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了。经过又一次长期犹豫不决之后，他于 1871 年将自己的学说运用并扩展到属于动物界的人类，出版了著作《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

### 为生存而奋斗

达尔文在勇敢地将自己用充分证据支持的进化论公之于众之前，曾长期踌躇、犹豫和怀疑，这完全是原因的。因为，对于物种长期发展、变异的证据对于当时仍旧代表着强权的基督教教会来说，其挑战性不亚于哥白尼（Kopernikus）和伽利略（Galilei）对宇宙的发现。随着物种起源学说的出现，由教会构建的圣经解释大厦的最后一块基石被砸碎了；如果说基督教中所谓的“万物之冠”首先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被逐出宇宙的中心，发配到银河里的某个区域，那么，上帝同人的相似性现在也受到了怀疑：“没有头的、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是人类的祖先”（Desmond/Moore, 1995, 第 9 页）。更糟糕的是，近代进化史要查明人与灵长目动物的近亲关系，这使得民间把达尔文的理论庸

俗化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几乎与达尔文及其先行者对生物自然发展史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地质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发现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球史无法测量的发展时期中“深度时间的发现”（Gould, 1990）。地质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发现几乎与达尔文的发现是在同一时间里，但其重要性近来才被人们较准确地评价。如果选写物种的生物发展史要查考几百万年的话，那么地质的自然发展史就得概括无数亿年的历程。人类的历史已经抽缩为行星发展史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圣经”里创世纪的叙述降格为孩子们阅读的童话故事，至少从对圣经文字上的理解来看是这样。但在地质学的“深度时间”的发现及其意义尚不为广大公众所重视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招致了所有支持“王位和祭坛”的正统派的愤怒指责，这也是他预料中的。人们不能忘记，所谓的启蒙运动绝没有彻底否定基督教，也没有对宗教思想有所扬弃，而只是在社会中重新定义了宗教的地位，并把科学和经济两者世俗化了。这时的情况好似达尔文及其追随者们所塑造的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停战状态，重新跨越了分界线。直到今天，正统基督教的愤怒也未平息，强大的美国还在不断因其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大丢其丑，这些人竭力要把达尔文的进化论逐出课堂，换上圣经旧约里的创世纪。

如果动摇了宗教意识的最后一部分根基的话，也许就会激怒保守的政治思想；但资本主义的大众教育学却也通过开展强调纪律的品德训育而不断向大众广为宣传宗教观念，并且希望让“人民大众”保持一种愚昧幼稚的谦恭状态。因此，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保守派的精英们面对“达尔文主义”也要愁眉不展了。

但另一方面，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起初只有少数人组成的、但随着“自然科学化”进程迅速扩大的“畅想”圈子，达尔文的祖父也曾经是这类圈子里的一分子。他们可能（私下或公开）已经不再认真严肃地对待宗教，表面上看来是

接受了大获成功的自然科学及其对世界“除魔”作用的影响。这种自由主义的畅想精神实际上却并未令人解放，因为它早已使基督教的上帝让位给“美妙机器”，令其取代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这部“美妙机器”即资本在全世界的循环流动和它自身即目的运作方式。拘泥于这种世俗化了的近于宗教的思想意识的做法不允许去考虑和有意识地使作为“资本主义魔法”的自然科学融入这种无理性和破坏性的关系之中。

自由主义的异教徒，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社会背景也完全没看清。马克思在达尔文主义中首先看到的是自然科学的发现所做出的贡献，并且尊崇达尔文，达尔文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进化论似乎恰好支持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虽然马克思顺带取笑道：达尔文在动物王国重新认识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社会，但是这对马克思来说无关紧要，并没有影响他的推崇。《资本论》第二版（1873）出版之后，他给达尔文这位大师赠送了一本新书，当然没有再遭婉拒。因为达尔文的双脚已稳稳地踩定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土地上，甚至还因自己读神的自然科学野心心怀愧疚。达尔文心灵中的思想冲突只反映出一个现实：自然科学的畅想精神和保守的教会观念之间的矛盾几乎不过是自由主义内部及其领导精英之间的家庭内部纷争而已。

从另一方面看，畅想者们或者想为精英们保留自然科学对宗教的表面扬弃，而“人民大众”则由于纪律之故仍继续被灌输基督教所倡导的对信仰恭敬的思想；这样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启蒙运动中“神甫行骗”的说法，也就是说，宗教归根结底只是真正持唯物主义立场的精英们手中的一个统治工具。或者，畅想者们愿意将“人民大众”囊括进来，并对他们进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自边沁以来最拙劣的民主主义者：用自然科学替代宗教，用大众自

我纪律约束的巧妙形式取代原来对大众从外部进行管束的粗俗形式。现在更是要遵照所谓“自然科学”的、甚至是生物学的规律，只有在这个方面，畅想者们才算得上先锋，他们的影响遍及自由党人的工人协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主义最终谱写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诗篇。不仅民主主义的自由派中那些畅想的先锋们，而且连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头面人物们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达尔文这位古怪的学者给他们送去一份意识形态的厚礼，这位学者即使因为他“对某些猴子有颜色的屁股产生了细致入微的兴趣”（Desmond/Moore, 1995, 第14页）而被教会贴上了不受欢迎的人的标签，他仍然毫不掩饰自己这种令人生疑的兴趣：

“但是他创立的科学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自由主义的支柱。否则，应怎么解释一位伯爵和两位公爵作为格莱斯顿（Gladstone）政府的代表在西敏寺教堂举行的葬礼上为他抬棺的事实呢？”（出处同上）

尽管新兴的这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一个带有异教色彩的彻底变革，自由主义保守派对此科学的评价也还是没有不带褻瀆成分，但这种做法的理由无论如何却是充分的。因为，如果说达尔文没读过边沁的著作，但他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并将他获自大自然、但从意识形态上错误推导出的“人口法则”又反过来投射到大自然上，以解释物种进化的所谓“必然过程”。达尔文依据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自己发现了物种进化的必然过程，那就是：每一物种里“过多”数量的生物都在进行“生存奋斗”，在这场竞争中，只有生命力强盛者能够作为优胜者生存下来，通过这样的“选择”，产生了物种逐渐的变异和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这样一个观点即使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早已站不住脚了，但

它却能被运用到一种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去。在1859年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之前由他撰写的《秘密笔记》里，他就用投射到大自然上的竞争和战争的比喻作过假设：

“我们认识到，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高级财富，即较高级动物的产生，是死亡、饥荒、劫掠和自然界隐蔽战争的直接结果。”（转引自：Desmond/Moore, 1995, 第335页）

达尔文主义很快便上升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他的理论蔓延到一切事物，甚至牛顿解释的机械论宇宙观在这方面也不得不让位于生物化：1874年，巴伐利亚哲学家卡尔·杜·普雷尔男爵、博士（Dr. Carl Freiherr du Prel, 1839~1899）发表了一篇题为《天空中的生存奋斗——达尔文公式的星际力学论证》的论文。科普作家威廉·波舍（Wilhelm Bölsche, 1861-1939）因1887年发表《诗歌中的达尔文》而声名远扬。事实上，要把这个“生存奋斗”学说反向投射到社会上去，并且为资本主义竞争及其泯灭生存和生命的作用从“自然科学”角度作一番奇妙辩解，这在理论上并不需费很大力气。不久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便遍地开花了。

如果说帝国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希·瑙曼、瓦尔特·拉特瑙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德国对世界强权的种种要求，那么他们于此间就并非偶然地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言辞，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生存奋斗”，它在很短时间内就演化为政治术语。同样的语言也被用在国家间的“选择”上：“各国人民”应当为竞争而强大和武装起来，竞争能力弱者则应当被从社会中剔除出去。有观点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的理论之间就像“占星术与天文学”一样，共同点极少（Wuketits, 1987, 第101页）。与众多持有这个观点的传记和学术著作所作的美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尝试相反，那类野蛮的观点并不是对达尔文理论

的歪曲解释，因为达尔文自己就以“第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公开登台（Marten, 1983, 第69页）。他本人就把“发生在平和的森林中、宁静的田野里有机生物体之间你死我活、悄无声息的激烈斗争”（Desmond/Moore, 1995, 第323页）重又引申到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中去，借此把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第二自然天性”直接回转解释为它的“第一自然天性”及其主观臆想中的生物性的选择过程。达尔文根本不可能幼稚到连自由主义派社会理论中的竞争意识形态（他自己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成长起来的）与他自己的生物学选择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准则也看得出来。正相反，他在自传里明明白白地说明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给了他决定性的启发，他以此间接地承认了，并不是像有言声称的那样在耐心积累了经验事实后纯粹用归纳法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而是把从意识形态上对经济竞争必然过程的辩解用作先验的解释基准。

如果说达尔文于1859年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就采用到了这种说法：“一切有机体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Darwin, 1995/1859, 第100页），那么，可以说概念的转义套用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从保持一定距离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里所运用的意识形态上的高超隐喻技巧在于利用现代市场机制的一个概念自然而然地证明了动植物王国的关系。达尔文在注释作为选择机制的“自然选择”这个概念时，又自然而然地恰当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不过，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使用的说法最有卓越才干者有幸存活更好，而且更合适。”（出处同上，强调标记为达尔文所加）而这位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恰恰是一个社会哲学生物学家，他为极端的竞争思想大力辩护，将此说成这是社会的“有机原则（organisches Prinzip）”，达尔文对此当然会了如指掌（并且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转套用明显表现在他晚期的著作《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里，其中，他将选择理论直接运



用到现代社会上：

“英国人作为殖民者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所取得的奇特成就要归功于他们‘不会因畏惧而退缩的持久耐力’；但谁能说出，英国人怎么获得这样的持久耐力的呢？就像事实表现的那样，许多真实的现象都证明这样一个假设：这个联合王国令人惊叹的进步连同其人民大众的性格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是为生存而奋斗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地球许多地方的大片肥沃土地上……只居住着野蛮的游民，就可以推断出，生存奋斗的激烈程度还不足以将这些人向前推进到他们应能达到的最高阶段……比如，按照我们在南美某些地方看到的事实推论，似乎一个可以被称为文明开化的民族——如西班牙殖民者——在生存条件太有利、优越时便容易懒惰，进而退步。高度文明开化的民族是否持续进步，取决于自然选择的程度不很大；因为这类民族不像野蛮部落那样互相取代、互相灭绝。尽管如此，在时间的长河中，同一合作团体中，比较智慧的个人比智力较低的个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也会留下更多的后代：这便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Darwin, 1986/1871, 第157及下页）

这里清楚地表明，达尔文如何在“社会理论”中不仅将自由主义者为社会经济竞争机制创造的一些归因于大自然的形而上学套用过来，而且甚至最终真正将社会现象生物化，所采取的方法是把“卓越才干”和生产能力本身（当然是按照卑鄙无耻的资本主义标准）作为所谓生物遗传和“选择”中的问题归咎于动植物层面的原因。这样，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然法则最终进入到一个具有新质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的自然哲学变成了社会的自然科学，即成了生物学的一个部分。

## 人的培育和生殖卫生学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最终是生物遗传问题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也不得不由能起调控作用的生物学社会工艺来解决。因此，助自然发展一臂之力和有意识地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人种选择”进程，似乎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在帝国主义发展的背景下，随之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和组织便升级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奋斗”和本民族存活能力的“人种繁育”乌托邦思想。

这种乌托邦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并且推出了大量新概念和新方法。“优生学”这个名称指主要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国家和德国开展的有利于“民族遗传健康”的人种培育运动，它一直存在和延续发展到20世纪。它提出的要求是：在社会中开展和组织直接源自生物学层面的“适者生存”运动。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时期里，美国甚至还举行了题为“更优家庭”的竞赛：

“1920年，堪萨斯露天的自由市场上，第一次给发育良好的猪和南瓜授了奖，‘遗传出色’的家庭也得到了奖励。一份同时散发的宣传册上解释道：‘如果说我们当今文明中更优者应当占主导地位或者即使只应当让他们存活下来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按照科学的农业原理发展人种选择科学的时候了。’在美国优生学协会的庇护下，‘更优家庭’竞赛……每年举行，举行地点多达10处。竞赛的赞助者人数众多，直到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才将他们对此的兴趣打消。”（Baumunk/Rieß, 1994, 第169页）

人们却很少对一个问题搞得更清楚：生于同根、互为条件的

资本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愚蠢如何骤变为资产阶级嗜权成性的自我嘲讽，而且如此公开和残酷。随着在一个民族开展人种选择培育的正面“优生”思想的出现，也相应出现了反面的选择淘汰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符合逻辑。如果宣传和组织“遗传健康”的生殖可以有助于“选种”的话，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通过“科学”的鉴定和淘汰“有着遗传病因”的不良个体或某类人来进行“选种”呢？在这个方面，达尔文本人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里也留下了社会生物学的词语：

“如果各种……阻碍都不能防止社会中轻浮、有着恶习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劣等成员在数量上比较高层次的人增加得更快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像世界历史上频繁出现过的现象那样濒临倒退。”（Darwin, 1986/1871, 第154页）

如果说曼德维尔、斯密、康德等证明了资本主义中那些新出现的嗜权成性者还具有一种社会优越性，而且确认那些厌恶劳动者或刑事犯罪分子道德低下或误入歧途，那么那些按照资本主义标准区分的优秀或恶劣社会道德品质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归入了生物学决定论的概念范畴。这一方面是指经济竞争中一场场残酷竞赛的优胜者可以被称为生物学中价值较高的人，完全是能够由大自然本身来定义的“超人”，这也是尼采于此时并非偶然地发明的一个术语。另一方面，“厌恶劳动者”和罪犯的生物性质同样也是天生注定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救药的，通过道德教育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他们只可能以某种方式被逐出历史。如果说马尔萨斯当时为去除在他看来只是“道德低劣的人”而意欲使“人口法则”盲目而有益的“自然性”大行其道的话，那么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为了灭绝“生物性质低劣的人”而要求社会有意识地实行自然科学的选择机制。

这在一方面涉及“刑事犯罪分子”，也就是那些出于直到今天看来也主要是出于种种社会原因而以某种方法触犯了资本主义法律的人（财产犯罪不仅在统计数字上占第一位，而且受到自由主义者更深切的憎恶，通常受到的惩罚比未涉及到财产犯罪的人身伤害罪更严厉）。如果说，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许多麻烦，使人很难用谎言去否认犯罪行为的社会根源，那么，“犯罪的本性”现在便可以通过庄严的自然科学被轻而易举地定义为生物遗传特性，可以说先验地与资本主义的苛求毫无关系。

用社会生物学尺度去鉴定“越轨行为”的思维方式的先驱是所谓的“颅相学”，这是由医生弗兰茨·约瑟夫·高尔（Franz Joseph Gall, 1758~1828）创造的一个荒诞的自然科学副产品。它认为外貌上的一些特别之处（如太阳穴边的隆起之处）是性格特征的，尤其是负面性格特征的原因，可以确定人的头脑里哪一部分决定他的社会行为方式，并可以对此根据这一部分的大小加以测量，比如大脑中“感知财产”的那一部分可以以相应的方式被确认为“偷盗器官”。在自然科学这样一种荒诞的自我扭曲基础上，一种为罪犯“测量头颅”的诊所开始建立起来，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日渐泛滥，并且不断在理论和社会生物学领域推出新花样。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的影响下，由生物性质所决定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多地被归结为返祖或退化现象的后果，渐渐地，“物种退化”这个概念流行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也纳性科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1~1902）早在1868年的一篇论文里已把刑事犯罪分子和性犯罪者定义为生物性质上“退化的人”。

“（其中包括）那些自胚胎形成时就注定是病态的人，那些不做好事的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些本能上作恶的

人，他们从孩童时代起到少年时代就总使父母惊恐不已，让玩伴们受折磨，以后则成为老师恐惧的对象，而在此后的一生中他们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有道德的人。”（转引自：Bergmann, 1992, 第149页）

都灵的法医切萨雷·兰布罗索（Cesare Lombroso, 1836～1909）以其内容广泛的《物种退化论》在国际上获得了声誉和承认，这本书同样提出了“天生犯罪者（Uomo delinquente）”的观点。比如，兰布罗索比较了犯罪者和癫痫病患者所谓的步行姿势，他认为那是与“正常的步行姿势”不同的步姿；从这些怪诞的“调查研究”中他拟出了“癫痫、卖淫、刑事犯罪和无政府主义”等的一个共同的“病症”（转引自：Bergmann, 1992, 第151及下页）。

另一方面，生物学性的选择问题自然涉及到所有身体和智力残废、患有慢性病、躯体畸形的人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那些虽然不是犯罪者，但从资本主义角度看来是无劳动能力的人。在这方面，连达尔文本人也早有更甚于马尔萨斯的言辞：

“在野蛮人中，那些身心都处弱勢的人不久就会被清除掉，而那些存活下来的人通常都表明他们身体状况强健。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文明人尽一切可能阻止这个清除过程。我们为痴呆者、残疾人和病人建立各种避难所；我们颁布贫民救助法；我们的医生竭尽全力用医术将每一个人的生命挽留到最后时刻。完全有理由认为，注射疫苗留住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会因体质虚弱而死于天花。由此表明，文明社会里的成员即使比较柔弱也会繁殖出他们的种类（！）。没有一个关注繁育驯服的动物的人会怀疑，这样的做法定会对人种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令人惊奇的是，缺乏谨慎或不

当的谨慎很快就造成一个驯服动物种类的衰退，但即使涉及到人本身的情况属于例外，大概几乎也没有一个驯养者无知到允许他最劣等的动物继续繁殖下去。”（Darwin, 1986/1871, 第 148 页）

达尔文言不由衷地要求，出于文明道德的原因，社会仍然必须“承受弱者继续生存和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毫无疑问的恶果”（出处同上），他虽然以此削弱了上述一类言辞中隐含的结论的影响，但当达尔文提出的前提得到普遍承认的时候，社会生物学选择的结论却仍然流行起来。从保持一定距离的角度来看，达尔文提出的论据在两方面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一方面来说，即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强”和“弱”始终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常常意义不明确；而当基准体系发生变化时，“强”和“弱”会变化和颠倒。

从另一方面来看，特别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秩序特性不同于生物的自然天性；要认识这种最基本的区别根本不需要伦理道德的特殊证明。很明显，达尔文在建立和阐述物种生物进化学说时已经通过他的基本论证方法掺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相关状况的一些概念。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从达尔文在集中社会能量和凝聚社会成员方面显示出的能力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混杂社会形式，它在人与人之间全面竞争中判断“强”的标准同时也体现出整体构造上无比的“弱”，而且到了起自毁作用的地步。

从马尔萨斯到达尔文、再到自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流派林立，社会生物学主义的这种发展过去和现在却都没有被看成是一种完全错误或者明显不通的论证所造成的问题。社会生物学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施以伪自然科学化的意识形态）不单单显露出现代自然科学非理性的本质，而自然科学本身也早已不仅仅只在表面上受到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抽象的和破坏性的自身即目的运行方式的侵袭，更重要的是，社会生物学主义本身是对以各种表面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竞争所提出的、已扎根于人的灵魂深处的种种要求起反作用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虽然绝对令人作呕，但同任何一个疯狂的体系一样，它本身又是合乎内在逻辑的。

能够对社会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对竞争体系的反作用提出批判的在过去和现在都只能是一种对竞争本身和与此同时对竞争赖以生存的“美妙机器”的拜物教机制提出的彻底批判。但所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纯道德性批判都以竞争和抽象“劳动”的体系为前提，也就是说，都只是在争取形成一种社会民主（或现代基督教的社会学说）意义上的“温和的匈奴人种族”。在出现令人疑惑的情况时，这些批判在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交锋中肯定总是打不出好牌的，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不管是多么的无理性，但其无理性的程度不比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本身的无理性程度更深，它可以在本身凶残的后果中始终以资本主义“为生而进行的奋斗”的真正凶残特点为基础。

所以，社会生物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潜伏期不仅是一种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治理以最简便的方式提供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同时也作为一种为受屈辱、人为地被迫受穷、受过思想熏陶和严格训练的民众提供的可怕的补偿性意识形态，以最廉价的、即便还很麻烦的和为进行自我毁灭的“奋斗”开道的方式发挥了消极的凝聚力作用。这个意识形态允许广大民众在被利用的过程中为自己无条件的自动屈服的媚态戴上一个侵略者的面具：一无用处的人可能感到相对于那些“退化的人”更高一等，而且是有权提出要求的完美的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至少也还可以展示自己鼻子的“正确”形状或他那小市民特有的肥头大耳的惊人体态。

积极的人种培育“优生学”和消极的物种选择“优生学”首

先带来的是一个生物学的人口政策，被称为“生殖卫生学”。当“劣等人”和“退化者”在必要时被法律和警察的暴力阻止生殖时，另一项社会政策正在逐步达到目标：按照农业中的各种观点把“遗传健康”的人力资源集中到一起。虽然（这样一种毫不令人怀疑、但肯定与“社会特征”无关的）遗传学和生物进化论的机制、形式和内容至今仍引起争论，也未得到充分研究，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在当时便立刻以一种演滑稽剧的粗俗方式大叫大嚷，直到今天人们也仍会对这种方式报以阵阵笑声，要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不那么残忍的话。当时人们以一种粗暴的严肃态度测量头部大小和身体形状，以往妓女、罪犯等人的所谓有特殊意义的“头颅”被公开展览，种种统计、图示和表格被制作出来以说明一些完全任意专断、荒诞无稽的关系。产生于这样背景之下的一个保留下来的残余是至今（首先国家机器坚持）一直在进行的所谓“智商测验”，它不仅以一个被功能主义缩减的（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作过修改的）“智商”概念为前提，而且一再显示出种族主义的内涵特征。

自然科学发展中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作为却完全是要通过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的内在理性来达到密切监视种种社会表现的目的，首先是监视性生活和性欲——最终目的是由国家来控制生殖。主张“控制生育”的各路先锋们在这些方面至今都没有达成一致：到底现在如马尔萨斯所言人口过多呢，还是正好相反——倾向这个观点的又是（与以往专制主义的炮灰思想家类似的）那些军事战略思想家，他们已预想到未来战场上的牺牲品。然而，男人们在争论中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是：在控制生育的同时也要对未来的产妇产们，即“妇女”，严加管束。因为有一种怀疑是有理由的：人类中的女性们不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躯体和性生活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人种改良家们畜牧般观点的要求，于是乎社会达尔文主义便立刻发明了“女性生理迟钝”的观点，这是1900年发



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这篇论文由威廉二世时代臭名昭著的神经学家保罗·尤里乌斯·莫比乌斯（Paul Julius Möbius, 1853~1907）撰写，其内容可谓既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又可谓荒谬怪诞。

资本主义从来就是男人的活动，它早已形成了对女性人力资源的不信任和同时认为她们卑贱的思想，由于女性愿意进入那些“分散隔离”、不能为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充分理解接受的领域，她们也就不能完全符合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种种标准。这一从根本上厌恶女性的态度在启蒙运动哲学中早已初露端倪，通过萨德得到了最为肆无忌惮的表述，这个态度甚至堪称资本主义中生物学主义思想的根本所在，以往社会历史上早已出现的贬低女性的思想现在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环境中更加能够蓬勃发展了。

在这个方面，达尔文自己又可算是第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性的选择”最重要的手段是“奋斗”（这是一个由达尔文完全任意地做出的假设），只有“雄性动物”能完全胜任，经过改良的（“奋斗”）特点也只传给雄性后代，所以，“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更多样化”（Darwin, 1986/1871, 第251页），是“向更高级状态进化”的真正载体，性别的等级在人身上也产生后果：

“男人比女人更勇敢，更好斗，经力更旺盛，拥有创造精神。他的大脑绝对大得多……据说，女人……头颅的形态介于儿童和男人中间……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男人在所有自己已着手进行的事情上可以比女人所能做到的达到更高的水平，它不管是需要深思、理智或想象力，还是只需要感官和手。”（出处同上，第629及下页，第637页）

这种“深思”的成果被满腔热情的头颅测量家牟比乌斯

(Möbius) 先生更进一步大力渲染一番。他断定：

“本能使女性更像动物……女性身上许多专有特点同与动物的类似性有关。首先是她们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就像自远古以来动物的行为一样，人类如果只有女性的话，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转引自：Bergmann, 1992, 第 268 页）

这样，牟比乌斯并无恶意地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女性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可以被看做是‘病态’的”（出处同上）。所以，“女人”突然在某种程度上与“退化者”的“生理状态”等同起来，属于此类的还有同性恋、“无节制手淫”和其他的“病态特征”，在性爱时，这些病态特征会反映在她们头脑里，使头脑中出现的不是为人民和祖国去进行“遗传健康”生殖的荣誉，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如果不是女权主义的女性研究〔如本书中多次援引的柏林女政治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安娜·贝格曼（Anna Bergmann）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最近才系统地开展起来，那么，将社会状况和特点用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进行生物化这一可怕的滑稽举动至今仍会被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直到今天，不论从方法和内容角度，还是从纯数字和在各机构中的领导角度来看，男性都占据主要地位，自然科学运用的这种“资本主义魔法”鉴于自己那段既不光彩又可笑之极的历史，只勉强承认其中已有无数明证的那一部分。即便如此，仍有（像达尔文一样的）所谓历史著名人物令人发指的荒谬行为或理论错误被系统地加以粉饰和隐瞒。所以，尽管错误的和隐藏着毁灭性后果的各种历史社会性自然科学已发生了短路现象，它们在奥斯威辛事件之后更改了自己的术语和论证方法，并予以更好的乔装打扮，但其本质与原来一般无二，因而无法公开和毫无保留地从根本上批判和驳斥社会生物学主义

(因此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发展史)。

### 种族斗争和世界阴谋

这一关于社会中的人的自然科学虽然不令人欣慰、而又愚蠢至极，同时又危害公众，但它与资本主义竞争意识的邪恶现象和复仇思想一拍即合，旨在能轻而易举地同产生于竞争意识并形成体系的另一思潮融合在一起，即与现代的种族狂热会拢。以往早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伟大哲学家把非洲人定义为最低级的“动物人”。在他那本美化推崇竞争的小册子出版之前9年，这位资本主义理性的创立者之一已经在传播他关于“人类不同种族”的思想了，并在最后总结道：

“另外，潮湿的热气总是促使动物强壮地生长，简而言之，黑人的出现大概是符合当地气候状况的，也就是说黑人很强健、肌肉发达、行动灵活，但在他们母亲家乡丰富的供给条件下，又懒惰、懦弱、游手好闲。”（Kant, 1993 XI/1775, 第23页）

为了开展反对“懒惰”、促使人力资源“勤奋努力”（进行工业化）为目标的运动，“黑人”不得不充当反面典型，而且毫无疑问：是“美妙机器”的主人们十分成功地地为非洲人民将“他们母亲家乡丰富的供给”人为地转变成处于世界市场金字塔中最低层的资本主义“父亲祖国”短缺的供应。但非洲人毫无用处，也一无所成，命中注定受人欺侮，这个观点康德早在题为《对优美与崇高感情的考察》那篇著作中阐述清楚：

“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超出过愚笨的感情。休谟

(Hume) 先生要求每个人哪怕举出一个能表明黑人有才能的例子，他还宣称：尽管成千上万被人从自己国家诱拐到其他地方去的黑人中有许多又重新获得自由，但从中找不出一个黑人或者在艺术、科学领域出类拔萃、或者以某一才华完成了某一丰功伟业，然而白人中间总有一些人从社会最底层的乌合之众中一跃成为杰出人物……黑人们爱慕虚荣，但是以黑人的方式，而且夸夸其谈，结果不得不被痛打得四下逃窜。”(Kant, 1988 II/1764, 第 880 页)

连黑格尔的发展理论也延续了这一种族歧视的思想，把“黑人”的文化打上了已被遗弃的不开化的、最低级的“世界精神”的烙印，比如，在讲授历史哲学的课程时，他说：

“真正的非洲是块……幼稚的土地，位于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白昼以外，它被黑夜的乌色笼罩着……在黑人身上……典型的特点是他们还形成一个有固定的客观性观念，如上帝、法律，人的意志理当符合这个客观性，并在其中确定自己本质上的观念。因非洲人是一个毫无差别、相互渗透的统一体，还没有区分开个人特性及与他人本质上的共性，所以，他们缺乏对一个绝对本质——一个与自我相对的、更高级的本质的知识。黑人是……完全野性的、不受管束的自然人……从这样的特点中找不出任何人类应该有的特点。”(Hegel, 1992/1837, 第 120 及以下数页)

“本质上的共性”体现的是“绝对本质”，而“绝对本质”又是指相对于“自我”的“更高”本质，这种“本质上的共性”当然除了指资本这部以自身为目的的机器外别无他意，这部自身即目的机器绝对地（或者说全面地）要求必须把任何一种不符合市

场和竞争范畴的人的存在形式驱逐出人类。在法国，用实证主义将黑格尔思想庸俗化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炮制出一个人类的“阶段理论”，其中包括所谓“野蛮人”的食人肉阶段到人类出现“中选者或排头兵”阶段，而“排头兵”包括的范围是“大部分白种人或者说欧洲各民族”（Comte, 1933/1881, 第167页）。虽然种族的概念到那时为止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从文化理论角度被加以定义和探讨，但按照皮肤颜色来划分种族的标准已带有生物主义的特点。

成功地追随黑格尔的是法国外交官、政论家阿蒂尔·格拉夫·德·戈比诺（Arthur Graf de Gobineau, 1816~1882），他发明了“雅利安高贵人种”的神话。戈比诺还是推崇专制主义精英理论的思想家之一，这些理论家们从贵族在社会中衰落趋势中预见到要尽可能阻止人类的灭亡。他试图通过用一种奇特方式混合自己编造的神话性情节内容和日渐盛行的社会生物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来验证人类衰亡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当作全部人类历史衰败的模式。源出于纯语言史研究结果（所谓印欧语系各语言具有相似性）的“雅利安人”神话被任意地渲染成妄自幻象般的种族论，自19世纪初便久盛不衰。种族理论指出了所谓共同的“血”却应（如同戈比诺理论中的一样）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比喻。

种族理论由于与达尔文主义融合，也具有明显的生物学主义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性质加重了种族理论本身具有的妄想和破坏的性质。戈比诺早就已经持这样的观点：对付（被宿命论认为无法阻止的）由于“长久的混血”而导致的衰落的惟一手段便是为“保持种族的纯正”而奋斗。同时，他还认为前途未卜的雅利安人中“剩余的相对最纯正的一部分”是白种人，而在白种人中，日耳曼人有望成为优胜者，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北德某些地区还保留着日耳曼人“最纯正的人种”。戈比诺

撰写的《试论种族的差异》一书早在1848年就已出版，也就是说，还早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来，种族理论中才加进了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学和“优生学”内容。

一方面是某种“近亲婚配”哲学，另一方面却是通过遗传变异本身而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思想，从逻辑上来讲，这两者在生物学主义的建构中未必相互协调匹配，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种族主义（或者说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达尔文主义）发挥效力。这其中的荒谬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原本意义上的生物学对象在种族主义幻想的社会大背景下只不过徒有虚名，其原因就在于，种族主义妄想的力量同样来自于与生物学的实际研究只发生间接关系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逻辑。种族理论与达尔文主义优生学之间时隐时现的诡秘联系不断徘徊于文化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的模式之间，并日益扩散，而后，两种模式相互重叠，不断产生出一些荒谬的组合形式，甚至将宗教生物化，或者说，形成了宗教的种族生物学。

鼓吹资本主义竞争社会这一偏执思想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家之一是德裔英国人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他撰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的毫无价值的大部头作品《19世纪的基础》，此书自1899年后大量出版，并被译成最主要的西方语言。在1000多页的书里，作者从“种族”角度极其详尽地将包括艺术形式在内的全部历史从头至尾述一番，并由此给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一种历史文化层面上的社会生物学主义的解释。于是，为保持“种族纯正”的奋斗上升为20世纪初意识形态的目标通道，毫无例外地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化社会或多或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达尔文主义和种族妄想以及两者的结合，以雄性为中心地研究人的自然科学中那些无意中因滑稽地效仿而极具讽刺意味的组成部分，“雅利安人”和“日耳曼族”的神奇故事，优生学和

“种族卫生学（后来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农业育人思想）”以及淘汰“劣等人”，这一切混杂结合在一起，结果是在所有层面上都形成了帝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二元等级关系：一方面是生物特性为优等的嗜权成性的“白种”男人，“遗传健康”的正常人和强健好胜的男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受控制、生物特性属劣等的人力资源，“退化者”和病人，天生的罪犯，女人和“有色人种”。

如果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妄想中一个个幻想出的光明形象没有黑暗的反面对照的话，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勾画出的这幅最美好世界的图景自然就不能完整。因为，不管对帝国主义外部和内部竞争固有的处理和反映形式多么虚无缥缈，也必须顾及不断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自然要算竞争中的嗜权者们自动听任和服从“美妙机器”这个在暗中被当作上帝崇拜的偶像和竞争带来的危机、破产及衰败等命运的摆布。一套盲目并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基准体系中的“自动主体”与竞争中独断独行的主体相对立，这个事实必然表现在上述两方面有关思想的可怕特征上。

另外，还要提到一个幽灵——生物学恶魔的化身。每一个没有对自身存在与发展具有一个清醒认识并以伪自然规律和自身即目的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的社会都必须找出一种声称存在着外来的异类恶魔的思想，以祛除自身内部那些受到排斥、又尚未被意识到的种种因素。从纯粹表面和政治上的意义上来说，那些“恶魔的帝国”自然指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竞争对手，它们被相应地涂成黑色。但这样的归类远不足以充分定义恶魔的不可思议性，恶魔即使在本国的社会里也可以是鬼怪一般的“内部敌人”。如果对价值利用和全面竞争的体系本身良好，那么那些不可忽视并威胁到未来的消极影响一定来自于一个涉及范围广、但生物性状不明的邪恶对抗力量。低等人不可能是这个邪恶力量，因为他们还不足具对抗的能力。对于那些相互竞争的嗜权者们来说，在自己

建立起来的妄想体系内被“退化者”、女人、有色人种或其他“下等人”战成下风、被他们逐上历史的下坡路或甚至毁灭在他们手中，简直是有损名誉的事情。

逐渐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必要为自己在生物学主义世界观的大背景下表现出的消极性找到一个由“反面超人”组成的“凶恶的对立种族”——这类反面超人便是犹太人。资本主义对恶魔的这种解释传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中世纪，犹太人居住的城镇都被当作“杀害耶稣的凶手”而被强加上各种愚蠢可笑的想象（比如，怀疑犹太人有杀害耶稣教徒并食其人肉的宗教仪式），并不断遭到迫害。由于在大多数国家犹太人得不到进入农业、拥有土地的允许，也被手工业行会组织拒之门外，许多犹太人不得不转为从事商业和现金交易，至少在西欧和中欧的情况是这样。他们从事从只够维持温饱的游动买卖、捡破烂儿的活计到借贷的多项营生。因此，有人通常从反面将犹太人与财主和惟利是图的人相提并论，把他们描绘成不道德的金钱迷和吸血鬼的化身，这样的比喻其实更适合于专制主义统治者及其统治机器（这里已映现出反犹太主义综合症后来为现代化过程开脱责任的功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的普及面越广，越让“美妙机器”纵情运转，对于这样一种映现方式的需求就越强烈，那就是：自我反馈回授的金钱悄然无声地进行着统治，这种没有主体的统治方式中无可言状的阴森恐怖面可以归因于一个外来异类主体的阴谋诡计。中世纪对犹太人的情绪后来演变为现代的反犹太主义，现代反犹太主义又把对犹太人的情绪移植到由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构建的已世俗化的、近似宗教的基准体系上，把价值利用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定义为“犹太人的本性”。金钱统治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一定“来自犹太人”，从犹太人常常不得不在强行划定的地区聚居生活的社会生存方式来看，犹太人居住的城镇被用这种反映方式确定为本国社会中恶劣和异己的部分也是再适当不过



的做法。在由资本主义国家和被发明创造出的“各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分布在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真实建构实体中的犹太“民族”成为映现全球“生存奋斗”中的威胁的大屏幕：“国际犹太人”似乎是与具有民族意识的先锋们对立的反面形象；货币资本因其越来越高的跨国流动性与越来越以国家为中心的工业商品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被宣布为“犹太人的经营对象”，一些著名的犹太银行家家族〔以著名的罗特希尔德（Rotschild）家族为代表〕的存在被解释成“犹太人国际金融资本”丑恶现象。

在与达尔文主义融合的过程中，反犹太主义综合症也染上了生物学主义的解释陋习：从被定义为现代社会中阴险狡诈的可怕势力的犹太人身上得出他们具有劣根性的假想，这种劣根性此时似乎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特征”。反犹太主义的偏执狂思想于是反戈一击，把自己提出的帝国主义要求解释为“犹太种族向世界强国伸手”，又把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反复无常的盲目竞争过程幻想为“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就像休斯敦·斯图尔德·张伯伦在他那部拙劣的作品中描述的一样：

“理想的动机驱使印欧人用友情打开了一扇扇大门：犹太人怀着敌意冲进来强占了所有位置，在——我不愿说那是废墟——体现我们本原特点的缺口上插上他们那面对于我们而言永远陌生的旗子。难道我们应该辱骂犹太人吗？这未免既卑鄙，又失体面和不理智。犹太人理应为人钦佩，因为可以绝对肯定他们是在以自己独特的逻辑和真理行事，人性中的愚钝从来没有让他们哪怕只有一瞬间忘掉自然规律的神圣（犹太人只有在人性中的迟钝为他们带来利益时才变得愚钝）。人们却可以看到，犹太人如何出神入化地利用血缘法规来扩张他们的统治：主脉完美无缺，异己的血一滴也渗透不进去……但是几千条支脉被切割下来，以用犹太人的血去

感染印欧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个世纪的话，欧洲将只会存在惟一一个种族纯正的民族，那就是犹太人，全部其他的人则成为一群伪希伯来混血儿，而且毫无疑问，那是一群在肉体、精神和道德上都已退化没落的人……从那时起，世界的统治权和世界上一切宝物——即一切金银财富——的所有权都将归为犹太人……这就是在梦想中展现在犹太人面前的未来。他们本应谦卑地服从上帝，但不应以基督耶稣倡导的发自内心的谦卑态度，而应在希伯来耶和華面前俯首，因为曾有预言对他们说，若满足了这个条件，他们就会制服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成为拥有整个地球的主人。犹太教的这个基础包含着对地球上所有民族直接进行的罪恶袭击，而且不能因为这种犯罪行为为至今尚未有能力实施就被否认，因为那个希望本身就带有犯罪性质，毒害着犹太人的心灵……在这里，这种思想的巨大力量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它引发了被选择为优胜者的妄想，这个妄想却出现在一个素质良好、但不论身体还是精神都不算出类拔萃的一个民族的心里……（并且这种思想的巨大力量）必然……使犹太民族变成其他任何人公开或暗中的敌人，变成每个文化面临的一个危险：极深的猜疑情绪随时随地都会进入这些天才们的内心，整个民族自信的本能滋生出厌恶心理……通过严禁与异族通婚来使本民族独立于其他民族之外，并在毫无希望地业已退化的以色列人中培育出一个高贵的种族，这个想法可谓绝妙之招……我认为，建立犹太教的那些男人并非处于恶意和私心，而是一种魔力使然，它完全能够慑服虔诚的狂热分子，其原因在于他们所完成的令人生畏的作品在每一点上都是完美无缺的……人们只要还没认识到犹太人身上那股异常魔力的根源所在，便无法理解犹太教和它的威力以及无法根除的生命韧性，也就无法公正和恰当地评判生活在我们中间

的犹太人和他们的性格及思想方式。”(Chamberlain, 1934/1899, 第 382 及以下数页, 第 532 及以下数页)

此为反犹综合症具有代表性的并先于希特勒产生了极大效应的版本, 它不仅代表了一种协助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理性解释成犹太教特征的一种嫁祸于人的做法, 而且通过种族主义的生物化方式, “犹太人的异族本性”也被解释成“魔鬼般的敌对种族”无法摆脱的客观特性, 对这个敌对种族的成员不能指责他们的主观意志, 因为他们只按照生物的本性行事。偏偏这个从伪自然科学角度“承认”臆想中“种族敌人”的做法最终没有解决的只是如何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敌人的逻辑问题, 因为人的理解沟通方式不再可能与无声无息的“(异族的)血的法则”相一致。这个法则与市场 and 竞争中那些无声无息又无法与之商讨的法则显然具有相似性。反犹太主义作为现代化的畸形产物在早期是一种普通种族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的极端化形式, 把帝国之间的竞争变为“雅利安人或日耳曼人”和“犹太异族”两方之间的思想拼杀, 其间, 那些共同对一个几世纪以来受尽折磨的少数民族进行诽谤和监视的卑鄙小人扮演了最终保卫者的角色, 保卫着一个即将被攻占、被“异族”怪物步步紧逼的欧洲和德意志民族雅利安日耳曼人的堡垒。

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愿把它作为一个议论话题),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两种的确确疯狂的思想体系在 1870 年到一战之间的几十年里涉及多广的社会面, 就像莱昂·波利亚科夫(Léon Poliakov)在他那本内容丰富的《反犹太主义史》中揭示的那样。不仅在德国(一个反犹太人情况尤其严重的国家)精英和知识分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这些思想所慑服, 张伯伦的崇拜者还包括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萧伯纳(Bernd Shaw)、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i)等名人(Poliakov, 1988, VII, 第 36 页)。

这种普遍的思想情绪在某些时机被推向高潮，如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因有人密谋被错判为德国间谍，并遭降级，尽管此案被查明是栽赃陷害并确凿证明另有人作案，德雷福斯也只在1897年得到“减刑”，1906年才被宣布无罪。这一事件在公众中引起了反犹太主义风潮。虽然（或恰恰因为）事件得以揭露澄清，这股风潮却有增无减。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相比，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带有些许轻飘”，因而“后果温和”——比如与普鲁士、德国不同，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不拒绝与犹太人决斗（Poliakov, 1988, VII, 第58页及以下数页）。但就是在此事件中那些至少公开严厉指责这一卑鄙阴谋和枉法行为的德雷福斯的辩护者们中间，也听得到完全“无恶意的”、“泛泛而谈”的反犹太主义词语。张伯伦及其思想支持者散布的愚蠢思想——“犹太人”不久便会通过他们坚持不懈的“种族”颠覆行动取得在欧洲的统治权——自然也使亲犹太人和反集体迫害的呼声应运而生。

几乎同样糟糕的情况是，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公民把这些疯狂思想的要素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并且也相应地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犹太人自我憎恨”的动机过于频繁地为反犹太主义所利用，以致不加进一步评判就无法用作实际证明。这种行为的真正核心也许最能够同众所周知的综合症等同起来，那就是：被劫持的人质常常出于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培养对折磨他们的人的好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资本主义病态社会中，作为精英圈和具有彻底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界的成员必须面临巨大的适应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巴黎的犹太教堂里甚至为具有明显反犹太主义倾向并“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祈祷健康：因为他是法国的盟友（Poliakov,

1988, VII, 第 130 页)。

直到希特勒独裁统治时期,许多著名的犹太文学家和理论家都曾经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方式,发表过类似的言语,这是一个至今尚被遮掩和未得到充分揭露的事实,尽管当时那样一种极端的社会意识现象正适合揭示现代社会中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综合症最深刻的特性。但那些在思想上锁定商品生产体系及其种种概念范畴的自由派、左派或民主派知识分子们却公然对此置之不理,因为他们惧怕批判带来的后果而畏缩不前。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康德等人(参看:Poljakov, 1983, V),这同样不仅只是个表面现象。如果继续在历史中寻找共同点,那么可以说,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主义、种族妄想和反犹太主义之间出现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现代化的天然产品,是一个对竞争必然的非理性反映形式,并且也是自资本主义某个发展阶段起(这个阶段大约在 1870 年就已达到)民众意识合乎规律地形成和固有的一种表现方式。现代化历史掩藏了一个实质性问题:植根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这个生物学主义意识形态同国有社会主义相似,都从自由主义的“母体意识”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极右”思潮和党派中的一支,这些流派和党派脱离了以往(贵族-专制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影响,而在 20 世纪经历了蓬勃的发展。

直到今天,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指责实质都是同一个参照系内部的纷争。这个参照系表面上矛盾的思想反映都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追溯到共同的根源上去。这样一个从其提出的要求及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全面推行商品生产和相互竞争的体系必然要创造出“善”与“恶”、“友人”与“敌人”的摩尼教建构,这些建构同样不单单在互不独立的“极右”生物学主义分支中体现出来。只要自由主义还反对自成一体的种

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综合症，就可以仅仅通过相信一种异己的、外来的、源出于堕落灵魂的返祖现象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不能认同说这种“恶”源于己身骨肉，也就只能用非理性的方式来反映非理性主义本身。

同时，自由主义在其中身的思想形式中直接含有生物学主义—种族主义的基质，至今，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极右思潮的交汇仍（公开或隐蔽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思想意识甚至完全被“自然科学”性质的生物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方式渗透，眉目尚不清晰的、以多种已自成一体的形式表现出的新极右主义之所以到一战都只是在边缘徘徊的政治思潮，原因只在于帝国主义的自由保守派精英及其主要党派本身也是源出于达尔文主义的生物竞争和选择思想的主要支持者。

### 德意志种源共同体

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的总体综合症可以从根本上分为个人种族主义和集体种族主义（虽然在社会现实中两个要素混合在一起）。个人种族主义在思想类型上更符合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和属于盎格鲁—萨克逊边沁主义的、民主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生物学主义谈论的幼卵形态分化的决定、“优生学”和“退化者”的淘汰选择首先涉及个人在“生存奋斗”中的“才干”或“无能”。这个观点虽然可以得到种种集体种族主义因素的补充，但其重心和要点并不是集体种族主义，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结构，在这些国家里，公民权至少在原则上与人种或种族的属性无关。

而与入种有关的集体种族主义必然在德国找到极为肥沃的温床，在这里，“追补”的国家形成过程自赫尔德（Herder）以后在与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意识形态竞争中以与纳粹一脉相

承的“民族”形式合法化，要认识其中的联系根本不需要德国“特殊道路”这个迷惑性的概念。“特殊道路”这个术语会使人想到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标准，也就是说，现代化被认为具有某种“正确性”，并且现代商品体系不受任何批判便正确地成为前提条件。但不通过内在的标准而对现代社会形式及其衍生出的拜物主义进行一种彻底批判其实自然也能很好和更好地认清现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区别。而事实却是：在德意志民族按纳粹的“民族”概念合法地形成国家的过程中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在个体性与人种-民族性竞争中明显将重心倾向后者。

由此看来，德意志帝国自俾斯麦以后显示出特别强烈的家长式国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并非偶然，因为由独裁的“龙形海怪”来“济世”的思想额外地得到了与纳粹一脉相承的“民族”意识的大力推动。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表现在德国公民权的法律定义中。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是否成为德国公民直到今天都由 *ius sanguinis*，即“血缘权利”来决定。这样，由赫尔德和费希特倡导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自1913年以后在德国民法中被定义为血缘和苗裔共同体。从血缘同体的角度非理性地定义德国公民权却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定义的问题，而且还作为一种成为国家精神支柱的意识形态在领导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深深地扎根。由于德国从未进行过分裂“民族共同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由原套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带上前进道路的，所以，从血缘角度定义公民权的思想更容易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书籍、军营训练、艺术、日常文化生活、媒体和教区等渠道畅通无阻地穿越各社会阶层进入大众的意识里。

所以，达尔文主义在德国找到自己生存的乐园，社会生物学的各种集体种族主义的变体也把重点放在德国，就不足为怪了。如果说“血缘”这个概念在赫尔德和费希特那里〔与后来的

戈比诺（Gobineau）相似] 还被当做文化的结构体提出来，那么，此时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的”种族学说相结合后，就转变为直接从生物学主义角度对“民族及种源共同体”的一个定义。不过，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倾向的个人种族主义并不缺乏集体种族主义、纳粹色彩的“民族”-反犹太主义的成分，反之，德意志血缘共同体中也拥有个人种族主义的特征，当然，这些涉及到的首先是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的方方面面。比如，1911年，帝国议会中左派自由主义的“进步人民党”议员海因茨·波特霍夫（Heinz Potthof）谈到残疾人和“退化者”的“不经济状况”时说道：

“把社会福利活动建立在同情与博爱基础上的这种做法必然会把金钱与辛劳投入到最困苦的地方。但从社会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这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在两方面都是不经济的。一来花费昂贵：养活一个残废人的钱，可以把两个健康的孩子培养成人。二来不能带来收益：由同情来抚慰的困苦永远不会将已经投入的资本偿还给人民。因此照料痴呆者、残废人或其他没有生活能力的社会成员不管如何确实令人感动，但人们不应忽略一个事实：这种照料是一种奢侈行为，在每付出一笔巨大花费之前，人们都应扪心自问，我们的人民能否允许这样的挥霍。”（转引自：Bergmann，出处同上，第131页）

波特霍夫也没有忘记把这种可爱的“人的经济化”提升为自由主义（应当提请注意：甚至是左派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计算方式的一个总体概念：

“如果人们不学着也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眼光去看待人的



生命，不去学着问问：社会中一个个人所需的花费是多少？他又带来多少利益？那么正确的经济和人口政策就永远也制定不出来。”（转引自：Weingart/Kroll/Bayertz, 1988, 第257页）

这的确是自由主义巅峰状态的体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们也不可能表达得更精彩。资本主义中抽象“劳动”和企业经济盈利性的谋杀法则经过意识形态方面生物化的磨砺，又同德国特有的国家血缘共同体中集体种族主义结合后，明显变得肆无忌惮且无法遏制。德意志苗裔国家正是通过将其达尔文主义-民主主义的血缘意识形态变为一种与西欧进行竞争的近乎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使命，才在实施由西方创建的自由主义性质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时，遇到根本想象不到的后果。

关于社会生物学主义的学术争论不仅由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机构组织进行，而且还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职能部门的推波助澜。早在1900年，炮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赞助设立了“科学竞争”奖，以促进对一个问题的研究：“从物种起源理论的原则中我们学到了哪些与国家内政发展及立法有关的东西？”（Baumunk/Rieß, 1994, 第169页）第一个获奖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优生学家威廉·沙尔迈尔（Wilhelm Schallmayer, 1857~1919），他创造了“种族卫生学（Rassenhygiene）”概念，德国和奥地利成为参与社会生物学主义激烈争论的学者们的实验室，涉及从大学到科普界直至民众日常议论的各个方面，这期间，劳动思想、在“人民共同体”中已普及开的赢利计算、“种族卫生学”和种族妄想等来自各角度的观点相互吹捧，掀起一阵阵高潮。1908年，奥地利经济理论家、金融社会学的创建者鲁道夫·戈德沙伊特（Rudolf Goldscheid,

1870~1931)推出了“人类经济学”的精彩概念,其社会生物学的背景十分显眼。他认为,国家应在“种族卫生学”基础上实行“能赢利的人的培育”,并要注意:

“一个劳动力的生产能力高于一个年轻人在未进行生产劳动的若干年中所消耗掉的食物和教育所需的劳动。”(转引自:Weingart/Kroll/Bayertz, 1988, 第256页)

为了这个高尚目标,戈德沙伊特建议设立“种族优生能力局”(出处同上,第257页)。对“退化者”或那些只不过身体有残疾的人来说这是不祥之兆。按照国民经济和优生—“种族卫生学”的观点他们有朝一日可能被划为附着在德国人民身体和血肉躯干之上的“寄生虫”一类。林道的城区医生约瑟夫·格拉斯尔(Joseph Graßl)还用官僚主义科学家的沉静笔调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利用、因而像“寄生虫”一样的人力资源进行了一番分类:

“全寄生虫是指那些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挣钱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要的人。寄生虫是指那些继承祖辈财产之后坐吃山空的人,也指靠公众养活的病人。这两者中间一类负有罪责,另一类则属无辜。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半寄生或1/4寄生虫指那些只挣钱满足自己部分基本生存需要的人。局部寄生虫指那些过着超过自己能力的的生活的人……他们迫使公众出让一部分产品给他们,却毫无回报。”(转引自:Bergmann, 出处同上,第132页)

就这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和战争间隔期间德国特殊的人文大气候下,“人种退化”的讨论演变成一个有系统地淘汰犯罪者、残疾人、精神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者的一个真正毁

灭生命的国民经济工程，其露骨和残忍超出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于“最终解决穷人问题”的争论：如果说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毫无痛苦地杀死穷人的孩子”还是高收入者的一个谈资，那么这种情况至少还会使公众毛骨悚然，而这样的措施也从来没有被作为国家项目规划严肃地考虑过。但德国集体种族主义却与此相反，它以那种“民族”的赢利计算方法真的在冥思苦索：在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很久，德国就已创造出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对所谓“无生存能力的分子”实际上最终意味着死亡判决。1920年，精神病医生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 1865~1943）和法学家卡尔·宾丁（Karl Binding, 1841~1920）共同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给无生存价值的生命的消亡开路》（转引自：Klee, 1995）。

由此，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无生存价值的生命”打造而成，它被霍赫也称为“累赘生存者”。概念产生的原由也主要出于国民经济的考虑：因对“精神死亡者”进行“毫无意义”的照料，“无以计数的资本以衣食、供暖等形式”被从国家财产中抽取出来（转引自：Klee, 1995）。这个消灭计划被冠以“安乐死”的名称——意为“舒适的死亡”将“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从其无法承受的、国民经济意义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此名称中流露出的玩世不恭态度无与伦比。霍赫本人后来获得了这份谋杀规划招致而来的娜美西斯复仇女神的垂青：就在纳粹统治期间，尽管他利用工业手段杀人的成绩显著，却仍然不得不以“犹太人亲属”的身份递交辞呈，因为68岁的他居然爱上了犹太人黑德维希·戈德施米德（Hedwig Goldschmidt）并娶了她。1940年，他去世的前三年，有一次他在有轨电车上当着一个人的面变得激愤不已，这是因为有人正好给他寄来装有亲戚骨灰的骨灰坛，这位亲戚恰恰是安乐死计划的刀下鬼。（Klee, 1995）

德国的种源意识不仅在对待“劣等人”和“退化者”方面将具有社会生物学主义性质的达尔文主义关于全部资本主义的讨论

发展至极端的程度，连雅利安种族的妄想在这块温床上生长得也比在邻近的帝国主义大国里繁茂。同属德意志民族的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尽管扮演了可怜巴巴的角色，但至少现在可以想象到自己在由雅利安“高贵种族”建立在所谓血缘传统基础之上的、神话般的妄想历史建构中扮演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而且是在玄妙莫测的“种族”神圣战争中的主角。在1871年帝国建立之前很久，德国已经掀起了奇特的日耳曼崇拜狂潮。戈比诺作为种族预言家在自己国家里只不过稍有名气，在莱茵河对岸却是声名远扬。

在文化界，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崇拜偶像之首。他谱写的华丽无比的系列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包括“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众神的黄昏”）及“拜罗伊特节日文艺会演”形式的其他作品至今还作为德国民主国家文化代表节目隆重上演。瓦格纳是1848年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代表了德国文化界一部分资产阶级精英，这些精英们推行的民族主义在那时便沉浸在辉煌的没落道路的幻想里，由“民主节”整套艺术作品构成的瓦格纳的拜洛伊特方案显示出，左派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德国是怎样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瓦格纳的著作及日记中充斥了这样的语句：“在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更高贵的男性之血受到较低贱的女性之血的玷污。”（Wagner, 1988/1975, 第243页）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成为有选举权的德国人并进而成为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便不足为怪了。1894年，追随瓦格纳的德国种族主义分子建立了戈比诺联合会，他们中的一位代表援引了关于雅利安人的神话，充满了对德意志种源共同体的自豪感宣布道：“我们相对来说至少是退化程度最低的人。这已经算是成就了。”（转引自：Claussen, 1994, 第42页）

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的神话早已成为德国民族由血缘联结的公民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帝国建立以后，威廉一世皇帝在德特

莫尔德附近参加“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 - Denkmal）”的落成典礼，这是一个 30 米高的、切鲁斯克部落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立式雕像，有人把他在公元 9 年战胜罗马人的胜利与 1870/1871 年德国战胜法国颇为荒唐地相类比。为此，罗马帝国晚期的蹩脚诗人维克托·冯·舍费尔（Victor von Scheffel, 1826~1886）还为此拼凑出一首歌《罗马人变无礼之后》，歌中最后唱道：

为了历史的荣誉  
人们树立起一座纪念碑  
德国的力量和统一  
纪念碑正向远方传扬：  
“让它们都来吧”

不论为发掘德意志民族意识而曾不断发明出的这些小伎俩多么幼稚，但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并促使在各社会阶层中激发起一种原始的“民族共同体”的自尊心。那些只吃土豆的、最穷的德国人每天遭受来自上级的一轮又一轮普鲁士风格的责骂、折磨，甚至劈头盖脸的痛打，然而他们依仗着人种学的种源假设也滋生出一种强于世界上其他国民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缺少来自外部的强有力支持（强权国家中香蕉消费量极少的朋友除外），不得不首先勉强接受了虚无缥缈的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的神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敌对种族”里飘出的幽灵以及反犹太主义的神话自然牢牢地扎根于德国人的头脑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反犹太主义的党派和思潮遍地而起。但是，没有哪个地方的党派和思潮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比在非理性的德意志血缘共同体里更大，这个血缘共同体在消极看待他们幻想中“国际犹太民族”占有的优势时，只能隐隐感到自身历史的微不足道。1879 年，

至今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撰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我们的前景”。文章中，他把煽动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情绪、严肃客观的学术论证和愚蠢厚颜的挑逗（“我却相信，我的一些犹太朋友会抱着最深切的惋惜之情赞同我的观点”）糅合在一起，方式独一无二，由此，德国的领导精英们反犹太主义的本质昭然若揭：

“在我们民众情绪变化的征兆中，似乎没有什么如情绪高昂的反对犹太民族运动那样令人惊异的了。几个月以前，德国还充满所谓‘反犹太人的嗨嗨喝倒彩呐喊声’……今天我们已经做到，大多数布雷斯劳逃民——显然不是在骚动不安的情绪中，而是在静心慎重地思考之后——发誓绝不将一个犹太人选进州议会；反犹太协会聚合在一起，在群情鼎沸的集会上，大家发表对‘犹太问题’的看法，控诉犹太人的书籍在图书市场上泛滥……然而，这些喧闹举动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下层群氓的粗鲁和做生意人的嫉妒心吗？……不是的，大众以自己的本能感觉到一种危险，真正认识到德国人的新生活受到了令人极为担忧的损害；如果今天人们谈到德国的犹太人问题，那不是泛泛的空话。如果说英国人和法国人谈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多少有些轻蔑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回敬说：你们不了解我们，你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幸福的环境里……西欧犹太人的数量很少，他们对各民族的文明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我们东部，从波兰这个犹太人层出不穷的摇篮里年复一年地走出一群群满怀抱负的卖裤子青年，他们穿过边境，蜂拥而至，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有朝一日终将把德国的交易所和各种报纸控制在手……我们不愿意在几千年之后由一个德意志-犹太混合文化时代来踵接日耳曼文明……那将是一个多么空洞、羞辱的自我标

榜！到那时，在连连不断的恶言谩骂中将会得到证明：康德的民族原来是在犹太人的教育下才具有人道主义，莱辛和歌德使用的语言因伯尔内（Börne）和海涅才让人产生美感、具有精神内涵和幽默！……现在，成千上万的德国村庄里居住着犹太人，他们向邻居们不厌其烦地兜售货物。在艺术和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中间，犹太人数量还不多，数量更多的是活跃的三流犹太人才……但在各日报报社工作的犹太人数量不合理地过多，也是最危险的现象……扭转这一反常状况必然产生的恶果是当今新闻界的昏聩，普通的市民们也不能容忍让犹太人为报纸撰稿，并因此对这样的报纸毫无信任……如果人们纵览四周这些情况……当前喧嚣的鼓动便显然只是日耳曼民族感情对一个异类分子残酷、憎恶、却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不要看错了：这个运动是深入而强大的……如今，包括高等教育界在内……大家异口同声：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Treitschke, 1988/1879, 第8及以下数页）

特赖奇克这里表露出明显而复杂的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卑心理下，对犹太人半“自封”、半自认其高人一筹因而颇具威胁性的“种族强权”的看法实际上是“包括高等教育界”在内的人士对资本主义矛盾通过哈哈镜折射出来的扭曲观点，这种自卑心理与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浪漫主义者身上的反犹太主义传统相一致，而这种反犹太主义传统早已被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批判过。帝国中一些还算勇敢的学者对此的反映中所包含的惊恐成分多于思想解放成分，而他们的反映也无济于事。著名的自由派古代史学家、法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便是一例，他于1902年以《罗马史》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虽然与特赖奇克针锋相对，抨击那些把反犹太主义装扮得“正直高尚”、并取下其遮盖布的“民族蠢材”，说

他们“现在到处捕风捉影”（Mommsen, 1988/1880, 第 222 页），但蒙森当然是从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作此评论的，这个立场自始至终都只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作不痛不痒的批评；对蒙森及其同路人们来说，批判地反映反犹太主义思想中的逻辑根源还在其次，更谈不上为犹太人辩护，而主要在于“修复国家的政治风气”（Poliakov, 1988, VII, 第 38 页），因为蒙森更担心的是刚刚实现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而不是同处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处境，如果可能

“发生一场人人都卷入的（激烈）混战，我们不久就可以做到……只有其祖辈可以追溯到马努斯（Mannus）……三个儿子之一的人才可作为享有全权的公民……除了……最近挑起的钱包内战外……现在反犹太主义者们也开始了大规模行动。”（Mommsen, 出处同上，第 213 页）

蒙森这位自由主义者对于从根本上始终受到维护的市场经济和竞争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担忧不已，德国内部统一问题便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忧虑；但除去德国对外形象和内部统一所受到的以上威胁之外，蒙森也愿意对反犹太主义做出重大的妥协，他只是不愿意让反犹太主义听任“两方下层群氓的不和谐之音”（出处同上，第 212 页）的摆布。但另一方面，他急急忙忙地保证说已完全看到了“德意志西方人和犹太血统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同样，也不愿意否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犹太种族成员具有特殊的性格”，认定犹太人“毫无疑问……是民族腐化的一个因素”，并且“人们的不满确实有真凭实据”——也就是说，“某些犹太人的行为很恶劣”，如“犹太人放高利贷……不是什么无稽之谈。”等等（出处同上，第 217~223 页）

如果说蒙森代表了德国自由主义者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妄想意



识形态的最普遍观点，那么可以想象出资本主义领导精英们的思想总体上必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德国哲学家和作家中，不管是已进入所谓民族文学圣堂的大师或只是一个通俗文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作品中放弃过表现反犹太主义综合症的机会，如威廉·拉贝（Wilhelm Raabe）的《饥饿的牧师》、古斯塔夫·费赖塔塔（Gustav Freytag）的《借方和贷方》。没有哪一个像理查德·瓦格纳那样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份重要设想，他除了在设想中吐露反犹太主义思想，别无他物可言。早在1850年，他便提出了犹太人公民权解放很成问题的意见，作为对1848年（革命）的要求，从而公开了保罗教派民主主义真正的、隐晦的反犹太主义的冲动情绪：

“当我们争论犹太人解放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更多是在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而争吵，而不是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就像我们的自由主义曾经是奢侈的思想比赛一样，我们曾经在这场比赛中为民众的自由争论不休，却并不了解这些民众，还拒绝同他们真正接触，同样，我们为犹太人平等而付出的努力更多是出于纯粹的思想冲动，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同情；因为从所有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言论和文字中，我们感到，在同犹太人日复一日的真正接触中，我们一直被他们下意识地憎恶。这里我们遇到了关键问题，它让我们更迫切地制定出我们的特殊计划：我们必须解释清楚犹太人对我们下意识憎恶的性格和本质，以便为他们这种本能辩解……现在，当我们把公开表露对犹太人自然而然的反感作为遭人唾弃的不道德之举时，就只是在故意自欺欺人。按照……犹太人在世界上当前客观状况来看，他们真的已经不只是得到了解放：他们占统治地位，而且只要金钱是权力，他们便会一直统治下去，在这个权力面前，我们一切行为举动都变得无力……”

(Wagener, 1975/1850, 第 54 及下页)

德意志民族这位手工艺巨匠使用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切中要害的病态心理诡计，把金钱的消极力量转而解释成犹太人的消极力量，他随即把犹太人的消极力量转移到艺术和国家两者的本质上去：

“我们不必去证实现代艺术犹太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以各种感性形式自动证明自己的存在……犹太人说着孕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民族的语言，但始终作为外国人说着这种语言……他们用这种语言只是鹦鹉学舌地说话，随波逐流地从艺——没有真正通过自己的言谈话语来创作文学或艺术作品……传入我们耳中的首先是犹太人或低声细调、或尖锐刺耳、或嗡嗡作响、或唏嘘不断的说话方式，既陌生、又令人难受：这种运用语言的方式对于我们民族的语言来说完全不符合固有的要求，对用词和结构的歪曲使语音变得像婴儿的咿呀学语，令人无法忍受地感到困惑，听到这样的语言，我们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更多放在令人反感的‘怎么回事’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犹太人谈话‘说了些什么’的问题上……”（出处同上，第 56 及以下数页）

不论从文化上还是从国家方面，应当具有“德意志”特点的事物只有从消极角度上与外来者的特点明确划清界限之后，才完全具有合法性。国家抽象的共性似乎只有在一切层面上排除了“对立的犹太人（种族）”条件下才会变成表面上看来具体的、纳粹意义上的“民族”特点。在这样的大气候中，社会情况和各种关系处于一种病态，这从一个情况就可看出：瓦格纳间或与一位犹太指挥家合作，不论犹太人还是德国人中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士都定期前往拜洛伊特，如同朝圣一般。犹太人（尤其是领导精英

中的犹太成员)迎合民族主义,这样自我毁灭性的尝试在德国尤为令人惊恐,因为正是在这里,纳粹性质的“民族”种源标准对犹太人形成了长久的威胁。

以血缘为基础并有宪法作后盾的爱国主义所包含的集体心态变异作为德意志文化的一个部分当时已深入大众的意识。相应出现的情况是民众中的反犹太运动风起云涌,党派丛生,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述和造出的气氛成为普通德国人的精神财富。反犹太主义对资本主义做出的重新诠释和资本主义的畸形产物——如民族和帝国主义——被偏激地赋予积极的意义,这两大因素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集体种族主义的纽带,尽管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矛盾,这条纽带却把包括国家领导在内的整个血缘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德累斯顿(1882)和开姆尼茨(1883)分别举行了国际反犹太大会(Poliakov, 1988 VII, 第35页)。威廉二世时代的通俗文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反犹太主义的创作,德国政治和家庭幽默作家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在作品《虔诚的海伦娜》中,以诗的形式笨拙地提醒德意志民族注意:

犹太人,弯脚跟  
弯鼻子,弯裤子  
摇摇晃晃,要去高台阶上的交易所  
思想败坏,灵魂不在

德国日常幽默诗里的这几句表明,“冲锋队员”和党卫队的大屠杀刽子手不必亲自发明什么理由,他们所需之材在民间文化作品里唾手可得。1874年,连德国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杂志《花园凉亭》由于创办者不和将面临破产而引起了恐慌时,也立即从反犹太人的角度来解释破产事件,并这样谈到“犹太人问题”。

“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劳动，他们剥削其他人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这个外来的民族奴役着德意志民众，吸榨他们的马克。社会的问题实质上是犹太人问题，其他一切解释只是骗人的谎话。”(Poliakov, 1988, 出处同上, 第30页)

就像1848年之前的数年里处理社会叛乱的情况那样，德国当局没有匆忙采取行动对付社会上反犹太人的宣传煽动。这类“资本主义批判”发挥减缓压力、转移视线的功能，始终受到欢迎。1881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其中主要是大学生、学者、教师、公务员）联名签写了一份反犹太人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他们要求把犹太人从所有公务部门中开除出去（Röhl, 1994）。在反犹太人的“嗨嗨风潮”发生几十年后，纳粹分子引发的“帝国水晶之夜”的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些反犹太主义的乌合之众在特赖奇克等幕后唆使者的影响下，开始行动了：

“柏林（曾）在1880和1881年成了展示暴力场面的舞台……成群结伙的人有组织地在大街上袭击犹太人，把他们赶出咖啡店，砸碎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窗。在其他地区，诸多犹太教堂遭到焚毁。参加宣传煽动的人越来越多……”（Poliakov, 1988, 出处同上, 第31及下页）

如果说，这类行为同以往一样只是为敷衍了事而被追究责任的话，那么可以说，官方当局支持了那些名声不佳的“最高层圈子”的好意。基督教新教牧师、皇家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推克（Adolf Stoecker, 1835~1909）利用他于1878年建立的“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宣传鼓吹反犹太主义长达几十年，并且可以在普鲁士众议院把犹太人骂成“欧洲医蛭”（Röhl, 1994）。仅施推克作为宫廷传教士并因而作为最高权利的一个代表都可以如此行

事，便可以证实，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已深入到威廉二世时代国家统治的核心。

只有后来的皇帝威廉二世不幸的双亲——德国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和妻子维多利亚（Victoria），英国女王的一个女儿——是个例外。1880年反犹太主义风潮突然爆发时，“穿着普鲁士陆军元帅军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出现在柏林犹太人教堂的礼拜仪式上”（Röhl, 1994），并称反犹太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同时，他的妻子十分恰当地把大肆叫嚣血缘国家的教授特赖奇克说成是“精神病患者”（Röhl, 1994）。这对夫妇的行为证明，自由主义的思想至少在贵族的最高层中不一定自然而然地导致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且，尽管商品生产体系自然会合乎规律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很大影响，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党派中，仍然存在着抵制疯狂屠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连“因时代条件所决定”也不可能作为理由为随波逐流和袖手旁观的行为开脱责任）。只有一个问题探讨得尚不大清楚（德国历史学家研究得最不透彻）：在1888年这一“三皇之年”里，弗里德里希·威廉作为腓特烈三世仅摄政99天便死于喉癌，随即由其子——憎恨父母并沾染了普鲁士—德国沙文主义所有恶习的威廉二世继承了皇位，这一切给德国及世界带来了加速灾难降临的消极影响。

威廉二世（1859~1941）这个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实为挑动帝国主义一次世界大战的皇帝，头脑里充斥着达尔文主义中社会生物学主义的狂妄思想。他同自己的母亲唱对台戏，还在少年时代，他就诅咒流在自己血管里“可恶的英国血”（Röhl, 1994）。直到遭受不测而丧命，他一直始终不渝地支持让整个帝国都相信“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和英国“小市民民族”有某种联系的蛊惑论调。1905年，反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开

始之后，俄国犹太人逃亡到德国，皇帝咆哮如雷：“把这些猪狗赶出去！”（Poliakov, 1988, VII, 第40页）德国民主派史学界直到今天仍然双眼紧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C. G. 吕尔（John C. G. Röhl）不得不站出来，力陈明证，揭露威廉二世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思想。

1901年，威廉二世皇帝会见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之后，张伯伦带上了威廉二世时代国家哲学家、首席思想家的头衔，并且完全继承了他那位具有民主主义—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岳父大人理查德·瓦格纳的衣钵，将霍恩措伦地区的人颂扬为“十九世纪起主导作用的民主主义者”（转引自：Claussen, 1994, 第93页）。这个说法不仅因实行普遍选举权的“民主的君主制度”（同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将妇女排除在外）表面上具有的政治特点而实质上含带凶残成分，它的凶残也来自于它无意中与一切现代民主政体的实质性统治核心的关系，在资本以自身为目的的运行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互不相依的独立个人之间的竞争作用下，这个统治核心中必然潜伏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时尚。正是以这样非理性的、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使威廉二世这个德国资本主义的战争元凶既成为民主主义者，也是鼓吹反犹太主义的“资本主义批评家”，所以约翰·C. G. 吕尔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以从无数的信函、回忆、记者访谈等历史资料里获取确凿证明。威廉二世始终对所有愿意恭听他言论的人讲，犹太人是他帝国的“灾难”。

“他们使我的人民处在贫困和他们实施的暴力之中。在德国每个村庄都住有卑鄙的犹太人，他就像蜘蛛一样，把人们粘到他织的那张高利贷网上……就这样，他渐渐通过这种手段控制了一切。犹太人是帝国中的寄生虫。犹太人问题是我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Röhl, 1994）

精心策划的这番为造成民众贫困的资本主义的开脱之辞构成了反犹太主义鼓动宣传的主要陈词滥调，在这里表述得再露骨、再明白不过了。希特勒用在犹太人头上的说法没有不是威廉二世及其宫廷奸党一再重复过的。1907年，威廉二世表示，这个外来种族必须彻底剔除。1909年他指控，受“黄金国际”奴役的德国人民让“犹太人新闻界”带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转引自：Röhl, 1994）。在退位之后流亡荷兰期间，他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偏执妄想越加混乱不堪，他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原本”是非洲黑人种，把自己母亲故乡的英国上层社会描述成“完全被犹太腐蚀的共济会会员”。1929年，希特勒上台前的四年，他最终如愿以偿地提出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瘟疫”的奇特建议：“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毒气。”（Röhl, 1994）这就是后来延续下去的德国历史。

### 较高级脊椎动物的社会主义

这里不得不探究一下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冲突的生物化过程起了多大作用的问题。自由主义先前的星期日学校曾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国家或民族经济等概念，并也在社会上羞答答地宣扬了至少一部分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言论后不得不说，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派假如没有被卷进社会生物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大风潮倒是个奇迹。

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关键性的共同点体现在被赋予积极意义的“劳动”概念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将以往那些追求代代相传的“权利”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悠闲”（“惰性”！）生活的社会反叛者对自己的认识换上了“劳动”能力这个范畴，并将这个范畴变成他们从积极方面认同自己的核心部分。由此，他们接受了自由主义自近代初便开始推行的资产阶级运动（“万

恶自情始”)，同以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做法一样，它也一定抵制不住对劳动能力弱者、不信仰“劳动”这个宗教的人和臆想中“不劳动者”的愤恨。这样，从根本上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范畴与另一个资本主义范畴，即“劳动”与“金钱”相对立的状况。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准许”，因为它没有质疑资本主义的大千世界——但正是这个薄弱之处必定成为种族主义、生物学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入侵的大门。

这一点在很多层面上都看得出来。首先，“劳动”大张旗鼓地反对臆想中的“不劳动”，反对“侵占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有一点自然很容易便得到证明：所谓的资本家本身也在“劳动”，即使只是在其他职能范围：企业经济计划、核算等工作也完全应该被定义为“抽象劳动”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在“共同劳动”的私人资本家和只是被雇佣的经理实际上不能轻易地被归在“不劳动”的范畴下。也就是说，由于“抽象劳动”不能被笼统地解释为资本的组成部分，“不劳动”的概念内涵就理所应当地被缩小：或者指“什么也不生产”、所谓只寄生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业，或者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过的）“剪息票的人”，他们是纯粹的货币资本家，从表面上看，他们真的连手指也不抬一下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得到利息。

现在连这个论证也有问题了，因为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里，商业自然是根本必不可少的（即使在国家垄断下，情况也如此），而且还从这中间产生出许多其他职业活动，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商业部门根本不具有“不劳动”的特点。纯粹的货币资本和借贷资本也属同样情况，它们集中在银行系统，银行里当然也有人在“劳动”，正是那些行使职权的银行家们本身在劳动。甚至那些纯粹的投机商也得仔细观望、等待时机、了解情况、处理信息等等。但是，当一种资本主义批判没有揭示出资本以各种



形式显示的内在荒谬性的情况下，积极的“劳动意识”是“不可以”联系到上述逻辑的。

所以，只剩一点可以做到：指出商业和银行业等劳动的“非生产性”特征，但这不是一种社会或道德范畴，而是纯粹的经济学范畴，而且又是作为资本本身内部的一个对立因素；这些部门的活动之所以具有“非生产性”特征，是因为它们不“创造”价值，而只在社会中传递有价值之物和（货币形式的）价值单位；所以，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商业和银行业是纯粹的成本决定因素，在扣除社会创造的价值，但对资本主义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工人运动从道德角度上贬低商业和银行业等部门的“非生产性”劳动，又从道德角度抬高工业商品生产中资本主义意义的“生产性”活动，这种手法使得工人运动本身在此情况之下以此方式更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合拍。生产过程中直接改变原材料形式的活动便成为积极的“生产性”活动，同时也是“好的”、具体的一方，尽管此过程实际上只是抽象的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本身的具体体现，而商业和银行业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介功能则被看做消极的“非生产性”活动，是“坏的”、抽象的一方（因为直接涉及金钱）。

用未遭扬弃的资本主义范畴本身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化、道德化的批判实在绝妙不过地与强加在犹太人头上的行为方式相辅相成，以至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本无法避免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出现。出身于自由主义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仅亲近现代反犹太主义，而且成为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先锋人物。这部分历史（同非社会主义党派和意识形态一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惨案之后，完全被重新粉饰、遮掩、歪曲、隐瞒，以免留下不光彩的痕迹。被遮掩和隐瞒的一页又出现在耶路撒冷历史学家埃德蒙德·希尔勃那（Edmund Silberner）所著的、至少在左派看来经过某种程度编造的书卷中，埃德蒙德·希尔勃纳早在30多年前便在《社会主义者谈犹太人问题》一书中

揭露了社会主义这段家丑。希尔勃纳显然是以色列爱国者和认同犹太“人种”的代表人物，但他没有以揭露秘史的手法，而基本上是以非常客观的文献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毫无挑剔“那些”左派人物毛病的打算。

希尔勃纳发现，反犹太主义早在19世纪上半叶已得到空想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大力推崇，尤其一直备受极左派青睐的是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傅立叶既是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共同体的代表，同时还是法国民族主义者，怀有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由于他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剥削主要来自商贸和高利贷，因此早在1808年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就把种种罪责加在犹太人头上，表现了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

“幸亏……犹太人尚未遍布法国，因为，一旦法国屈从于犹太高利贷，那么，犹太民族将会把大部分财富据为己有，由此对法国施加影响。到那时，这个法兰西便只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巨大的犹太教堂，因为，假若犹太人即使只侵占1/4的财富，他们也会通过自己组成的不可驱散的秘密同盟施加最为广泛的影响。”（转引自：Silberner, 1962, 第17页）

所以，傅立叶甚至全力反对给犹太人以公民权，一生公开反对犹太人，虽然在1815年临终前，他提出过类似“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或者说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建议，认为犹太人应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由“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家族提供资金。谈到这儿，有一点却不能忘记，连纳粹起初也动过这个念头：犹太人可以移民到马达加斯加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 Joseph - Proudhon,

1809—1865)比傅立叶进步不了多少,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蒲鲁东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简略地解释为纯货币借贷人持有的生息资本,他认为,资本生息的“可能条件”在于货币本身的一个特征——货币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商品,因而必须“剥夺货币的特权”。所以蒲鲁东想采用所谓的“劳动货币”,它以劳动量数额的直接核算为基础,不给货币资本家“不劳而获”的利息收入以可乘之机。他的这个理论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只存在于流通领域,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恰恰在于可以让货币“生产性地”回转到自己身上。所以,蒲鲁东(与整个工人运动一样)认识不到商品生产体系中的“抽象劳动”才是资本本身的核心,而在未透彻研究在资本利用过程中“劳动”与“货币”形式上必要的、相互对立的转变情况之下,通过主观臆想似是而非地把货币形式与“劳动”相提并论,并以此方式达到摆脱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状态。蒲鲁东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只停留在用反犹太主义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形式中的内在矛盾重新加以解释,他还不时地突然用煽动性的语言宣扬犹太人天生会同货币打交道,“是搞世界阴谋的人”,比如他在《专制政体与基督教》(Césarisme et Christianisme)一书中这样写道:

“犹太人从天性上就反对生产,既不务农,也不经营,他连真正的商人也算不上。他是四处钻营的人,总是戴着虚伪的面具,寄生在他人身上,他做生意同他的伪装哲学一样,运用的是坑蒙拐骗的手段。他只知道经济情况、运输风险的大小、收成难以确定的好坏、供需不稳定的涨落。他的经济政策全都起着消极作用和带有高利贷性质。恶魔、撒旦、和琐罗亚斯德教中阿里曼(Ahriman)那神推行的原则都体现在犹太人这个种族身上……”(转引自:Silberner, 出处同上,第58页)

张伯伦、特赖奇克等人的反犹太主义言辞和《花园凉亭》刊载的类似语言早已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所使用。正如直到今天，处在社会下层的雇佣劳动者、工业领域中一部分管理人员、负债在身的房主、商品的小型生产者和小企业资本家等社会群体仍在普遍从事着“诚实的劳动”那样，当时就存在着一种具有异质多相社会根源的、代表着“诚实的劳动”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立场观点，从这个立场出发而产生的、完全针对所谓“交息义务”而生的憎恶心理在反对银行势力、高利贷借款和“投机商”时激烈地爆发出来，在爆发过程中，它为一切倾向于“健康的民众感受”、“在自己的乡土上劳动”和纳粹意义上的“民族”资本主义（或者带有国有社会主义定语的民族资本主义）等畸形观念的社会团体、党派和思潮提供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广阔天地。与此密切相关的反犹太主义风潮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扩散蔓延，同时也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去。通过一些来历神秘的种族主义协会、团体，如以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1925）为首的所谓神智学者及人智学者组织，德国—阿根廷商人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 1862—1930）为首的“货币改革宗派”，围绕着各思想阵营共同支持的反犹太主义—批判利息的思想，一张枝杈交结、盘根错节的隐蔽思想网织成了。它最终迅速地推出了国家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理论及184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主流不愿再仅仅批判生息的借贷和商业资本，而欲将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予以全面批判。但是尽管如此，批判中还是保留了意义积极的“抽象劳动”概念，只把私有资本主义对工业的控制用国家官僚主义统治来替代，因而，这种态度在反犹太主义综合症面前仍然仍旧矛盾重重。虽然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工人运动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与“劳动”的范畴相左，在某些段落中曾批判过它，虽然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明将目光盯在生息资本上的

观点是民众的偏见和将资本偶像化的表现，但他多次把这种论战性的语言用在说明“金钱本身”或“惟利是图”、“高利贷”等同于“犹太人本质”的观点上。比如在关于货币向资本的历史性转变论证中，他认为，每个资本家都知道，“一切商品，不论它们的样子怎么破烂，气味如何难闻，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中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精神残缺的犹太人……”（Marx, 1965/1890, 第169页）。

尤其是马克思早期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在以往和当今一再（也被埃德蒙德·希尔勃纳）被纳入反犹太主义的作品之列，因为它把“犹太人”和“金钱”等同起来，这种思想表现得甚至相当赤裸：

“资产阶级社会从自己的内部器官中不断地产生着犹太人……金钱是以色列人热心的上帝，在他面前，其他的神都无立足之地。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祇——而且把他们转化为一件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之普遍的和独自构成的价值。它因而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原本价值。金钱是从人异化出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一外在的本质却统治着人，人向他膜拜着。犹太人的这个上帝下了凡，成为人间的上帝。这个变化才使犹太人有了真正的上帝，他的上帝只存在于这种虚幻的变化之中……只要社会成功地扬弃了犹太人民族特点的经验性的本质，即惟利是图和它的各种前提，犹太人的存在就无可能性，因为他的意识从此失去了对象，因为犹太人民族特点的主观根基——实际需要——人性化了，因为人的两种存在——个人的感性存在和类族的存在——之间的冲突已被化解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是社会从犹太人民族特点中解放出来。”（Marx, 1978/1844, 第374及以后数页）

毫无疑问，这里是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反犹太主义的错误观点。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视角却不同于傅立叶和蒲鲁东（甚至不同于张伯伦等人），并从两个侧面反映出来。一方面，从个人生平来说，马克思本人出身于一个有犹太教传统的经师家庭，他所面对的无数德国和法国反对者和批判者中，不论机会适当与否，几乎没有一个人忘记点破他“犹太人”的真实面目。如果说马克思在他那论战性的语言里灌注了同自己出身划清界限的、近乎反犹太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再次看到德国和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知识分子背负着巨大的适应环境和揭密告发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犹太人不得不采取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态度。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反犹太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会混淆凶手和受害人（即便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但这不等于不应该批判这类说法包含的实际内容，因为这类说法自然促进了社会上反犹太主义的滋长。

另一方面，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着根本差别，这差别猛一看很容易为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选词所掩盖。因为与张伯伦和特赖奇克以及傅立叶和蒲鲁东不同，马克思虽然用“犹太人”比喻金钱统治，但他没有把金钱统治归咎于犹太人，而正相反：“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出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造就了资产阶级社会（更精确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所以犹太人在社会中的解放在于，社会取消金钱统治的或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使犹太人获得解放，令其避免被迫充当这种异化统治的比喻或代名词。也就是说，社会只有从金钱统治中解放出来，才会变得有人性；社会只有解放了犹太人本身，才能把自己从犹太人手中（或被枉加在他们头上的特性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只有废除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反犹太主义才无地立足。

张伯伦不加掩饰的观点和傅立叶、蒲鲁东的倾向却是：如果没有犹太人，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则会美妙无比，根本无需废除这

一生产体系，而“只”需把犹太人驱逐出去——或者以认定“不劳动者”迫使人们履行“交息义务”和进行“商业欺骗活动”为名，或者干脆把犹太人当作消极“种族成员”驱逐和杀害。如果说，希尔勃纳等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重大区别，就不加仔细思考地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著作冠以反犹太主义的罪名，或至少把他同傅立叶与蒲鲁东等同，他们这样做当然是因为真正废除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思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能力。但是，谁认为商品生产体系机器及其种种荒谬的限制是“自然的”和无法废除的，谁就因此——不知不觉或不由自主——而使现代反犹太主义永存。

歪曲马克思的论述，同时自己对反犹太主义持赞成态度，添枝加叶地把金钱统治和犹太教相提并论显然是为此而采取的一种做法，因为，马克思说过金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即使马克思认为这个“特性”不是生物特性或“种族”特性，而是一种文化—宗教特性（因而可以消除），但他从没停止过将金钱统治和“犹太人”本身通过奇特的方法联系起来，这就是他真正与反犹太主义重合之处，遮掩了他实际论证的思想。因为不言自明的是，无论生息资本还是货币形式本身都并非以“犹太人”为修饰语，非理性的指责显然需要一个能够揭示经济学非理性特征的解释。

要破解这种生搬硬套的妄想中的内在机制，大概后来马克思对商品的社会形式及这种社会形式中包含的拜物教所做的分析能提供启示。因为，这种拜物教恰恰体现在对那些没有事先协商好如何有效使用共同资源而争夺匿名市场的私人企业经济中的生产者来说，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商品物质特性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以所谓的价值形式。这个特性是一个社会怪影，它只存在于那些被拜物教施过魔法的商品生产者和“赚钱人”的头脑里。尽管如此，这绝不仅仅是产生一个通过“启蒙运动”便可改变的意识形态上的思想问题，而更是一个“实际的表面现象”

(Marx) 问题：即已在社会中客观具体化的生产和交通形式把握着物质生活的过程并通过各种机构体现出来。人的社会性表现为由人生产出的物品的特性，这就是资本自身的本质。

但是，如果这样的社会关系采取了某种（无生命事物、客体的）特性的罕见形式，那么，这种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消极性质和破坏性的、危机性的因素从其本身内部的情况来看，只能以一种特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必然是一些（消极的、侵扰他人的）人的特性，因为，商品所具有的名声不佳的价值特性本身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已深入人心的这种金钱的形而上学经过一番思想加工后骤变为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形而上学：无生命之物形而上学的、积极的价值特性从有生命之人形而上学的、负面的危机特性里为自己寻求一个逻辑上的对称物。就像商品永远不能摆脱价值这个自然的社会经济特性一样，犹太人（或者在世界其他一些如今已进入有全球化商品生产体系的地区中那些也许被消极定义的人类群体）也不能摆脱社会邪恶性这个自然的生物和“种族”特性。这样一个人为扭曲的、每逢危机都会被搬将出来的机制只有在那种社会关系从上至下全部停止时才会被冲破。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地自己去组织其社会关系和活动，事先共同确定如何使用资源，但同时去除无生命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特性的荒谬形式，人被拜物教扭曲了的、消极的伪社会特性才会消失。从这个意义来说，在马克思对商品的社会形式的分析中，他于1843年在谈“犹太人问题”一文里所论述的真正核心思想才为人所理解，当时，这个核心思想由于没有被识透的虚假现象而被误解，即似乎犹太人的特性是金钱统治的对应物。

但正是在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批判（包括对“劳动”的潜在批判）这个层面上，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从马克思那里只吸取了源于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思想（特别是“龙形海怪”般的国家政体建构），而忽略了



他对现代拜物教表面上“模糊不清”的批判。所以，在彼大加颂扬的“劳动”名号下，已顺从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对反犹太主义综合症采取的态度始终懦弱和暧昧。社会主义者虽然本身并非真正反犹太主义的政治派别，而且一战后还形成发展出一些新的“极右”党派和潮流，这些党派和潮流与自由主义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的竞争之处恰恰在于，他们把普遍作为基本思潮而在社会四处传播的生物学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提升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政治纲领。但是同自由主义者和以往的保守派一样，社会主义者暗地里也投靠这种潮流，并对反犹太主义的宣传蛊惑始终采取两面态度。

按照奥古斯特·倍倍尔引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佩纳斯托费尔（Pernerstorfer）的话来说，反犹太主义是“那些蠢家伙主张的社会主义”。如此的刻画完全是指，即使反犹太主义的氛围是由较低阶层的民众造成的，它仍然只是未经深思熟虑地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这一步之后可以由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地继续推进，去反对“一切资本家”。1881年，在普鲁士“帝国水晶之夜”骚乱连连发生，倍倍尔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从容、平静地描述这种反犹太主义现象：

“如今，在反犹太主义者煽动群众走上的轨道上，犹太人被毒打至死，明天自然会轮到宫廷传教士、帝国首相、国王、皇帝，连同所有非生产性的‘追随者’。”（转引自：Silberner，出处同上，第204页）

12年后，年迈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社会主义的一位领袖人物、马克思多年的亲密助手，面对反犹太主义集团选举连连获胜的事实，不禁摩拳擦掌：“是的，反犹太主义的先生们耕耘播种。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将

会收获。对他们的成就我们绝不会不抱欢迎态度。”（转引自：Silberner，出处同上，第205页）。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前进报》也对德国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发表了类似看法：

“它虽然违背文化，但它却是违背意愿的文化载体——名符其实地为社会民主的种子提供肥沃土地的文化养料。因此我们很高兴期盼着反犹太主义取得成功，它的成功几乎同我们自己取得成功一样，对于其他所有资本主义政党都是沉重一击……”（转引自：Silberner，出处同上，第205及下页）

这些话里流露出无比昏乱的思想，它后来造成了十分可怕的恶果。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思想比反犹太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从国有社会主义的转轨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性的批判。但同时他们忽视了一点：反犹太主义所体现的“那些蠢家伙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给大众们忍受着痛苦、但已被资本主义驯化的思想意识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反犹太主义不仅可以从国有社会主义吸收某些成分，而且除此之外还可以以一种极度非理性的方式把由拜物教主要造成的痛苦根源——价值和货币形式的社会抽象化——变成主题，而这却是社会民主主义用另一种理性的方式做不到的，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基于的理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未被扬弃、只在国家经济方面必要地加以现代化的理性。也就是说，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只许下空洞无物的诺言：将借助“工人国家”理智地、有计划地重塑全部商品生产和金钱统治及其毁坏性的抽象形式，从而为民造福。相比之下，反犹太主义可以做出强有力的、非理性的保证：将消灭已成为现实的金钱统治的抽象形式，其方法就是消灭犹太人。这种情况下便必然出现影响深远的、不可救药的危机，这个危机却是

连社会民主主义也以一种奇特的肤浅方式梦寐以求的，为的是让破坏力释放出来，这种破坏力可以以精神错乱的方式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源，但却无人有能力并且有意愿以理性的方式去触及这个根源。

不过，大部分左派人士至今丝毫未从中吸取教训，这可算是最糟糕的事情了。虽然反犹太症候中潜在的灾难早已成为历史，然而它仍然固守着一些错误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包括受到肯定的“劳动”概念和因此而不得不采纳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在对国家经济的指导过程中出尽洋相，无法补救），而且还包括关于工人阶级是“为完成某种历史使命而特地由世界精神创造、本质善良”的假想。所以工厂里的工人、农民、失业青年和没有社会特权的人的活动，简而言之——在社会所强调的意义上的人民，他们的一举一动被臆想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也许他们的举动还表现为“下意识”的形式，但原则上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当成体系的谋杀思想用种种社会动机似乎可以得到解释时，连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也被人们公开或暗地里认为“不是那么糟糕”。有人——善意地——估计，带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青年工人或农民在“没头没脑地”与想象中的敌人在斗争，据说还没有真正认识资本主义。这种为“有其社会原因”的（难道这不一直是反犹太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吗？）反犹太主义作荒谬粉饰的言辞显然与发展至此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简略化的、骨子里仍属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的批判密不可分。

肯定“劳动”和民族的概念不仅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易受反犹太主义思想影响或粉饰反犹太主义行为的侵蚀，而且不易抵制生物学主义世界观的另一个方面，即对“害怕劳动”的有色人种和本国的残疾人、罪犯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采取蔑视态度。集体种族主义和个人种族主义反对“劣等人”的思想影响都在工人运动的群众思想中表现出来。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这样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人物曾接受生物学主义“优生学”

观点，著名的乌托邦主义作家、忠实的社会主义者 H. G. 威尔斯 (H. G. Wells) 甚至要求对那些“具有劣等遗传特征者”采取强行绝育手段，社会主义性质的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领导人锡德尼·迩布 (Sidney Webb) 担心“种族的本体继续恶化，那就等于种族自杀” (转引自: Koch, 1973, 第 134 页)。由此看来，早期的英国工党持有认为只有“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统治世界” (出处同上) 才能保证实现理想的观点便不足为奇了。

推崇优生学的种族主义必定对受到血缘意识形态侵蚀的德国已展开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受炮王克虏伯嘉奖的、发明“种族卫生学”概念的发明家威廉·沙尔迈尔 (Wilhelm Schallmayer) 表示同情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过滤提纯的社会主义，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宣传自己的观点；另外，他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 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大卫 (Eduard David) 的推崇。考茨基毕恭毕敬地称沙尔迈尔为“科学家”，大卫为他这位“种族卫生学家”鼓掌喝彩，因为他提醒人们避免“民众身体中各部位的器官发生萎缩” (转引自: Weingart/Kroll/Bayertz, 1988, 第 109 页)。1910 年，考茨基发表了宣扬达尔文主义的著作《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长和发展》，书中最后一章并无过错地以“种族卫生学”为标题，这一章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相应的批判，同时也勾画了未来的前景：

“人类的技术正在破坏……自然界的平衡，降低生存奋斗对人的要求，因而不仅减轻了身心状况低劣的个人的生存负担，也为他们的生殖提供了方便……不仅是儿童，甚至连残疾人、精神病人现在都可以被安排工作，他们挣到的钱足够使自己不用忍饥挨饿……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促使人的退化。医学远不再是令病人恢复健康的艺术，而更多是让病人

在疾病中延长生命，借此增加他们生儿育女的可能性。这就是近几十年来降低死亡率的意义所在，对此，资产阶级的和其他的美化大师颇感自豪……首先，那些今天代表‘国家智慧’的人——高层及最高层的统治者必须身先士卒，因为退化最容易通过劣等个人的留存和生殖在他们身上产生影响……生殖在这些人的圈子里是为某个目的服务的，就像婚姻服务于家庭的利益一样，并不是为了改良种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不再有人作为资本家当他自己资本的奴隶，这种资本规定他必须与一个可能自己根本不爱、患有疾病、但拥有财富的女人结婚，并且还必须生育一个继承人。一切如今在无产阶级和较高阶层中引起疾病和退化的生活条件都消失了。体质健康的人才将发挥并且强化这种体质。虚弱多病再也不是避免不了的普遍现象。如果仍旧有先天患病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长年疾患也不会再由社会状况承担责任，而仅仅是父母的过失……新的一代人将会出现，强健、美丽、热爱生活，就像希腊英雄崇拜时期的英雄，就像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勇士……”（Kautsky, 1910, 第262及以下数页）

这种带有某些集体种族主义雅利安-日耳曼人妄想色彩的优生学个人种族主义对于“龙形海怪”的国有社会主义阴暗思想却是有价值的。“劳动”不息的帝国只可能是消极的乌托邦思想，想象存在着强壮无比的大力士和“人种”，大众都有着“健康”的身体，也不乏激情满怀的工作狂。这里一目了然的是：这样的乌托邦思想充满了资本主义的雄性特征，这种雄性特征起源于在父权家长制统治下通行无阻和征服世界的幻想。所以，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还从自由主义吸收了生物学主义的歧视性贬低妇女的思想成分，并非奇事。随着资本主义的“劳动”概念被接受，便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家庭思想，这种家庭思想要把妇女放到一个由生物学决定的位置上：她们是被资本主义划归为低贱部分的私人生活领域（因为不赚钱）的产妇、母亲和管家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甚至首先激烈反对妇女从事职业活动，比如，德国工人协会（ADAV）1867年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写道：

“雇用妇女在大工业的车间里工作是对我们时代最为可耻的滥用行为之一。之所以可耻，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没有因此而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尤其是在家庭毁坏之后，广大工人被推向更困苦的境地，连最后剩余的一份美好的财产也丢掉了……今天应更强力抵制扩大妇女劳动力市场的做法……”（转引自：Mahaim/Holt/Heinen, 1984, 第30页）。

这就是说，妇女应当靠丈夫的工资来养活，停留在低等、所谓“自然”的地位上。与此相反，联合社会党和后来的社会民主党要求实现妇女在职业活动和政治（妇女选举权）上的完全平等。然而，拉萨尔派尽管在正式场合口口声声表示应实现妇女平等，它采取的男性联盟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暗地里大行其道，在工会的日常活动里随时可见。由于妇女被预定为掌管从商品生产中分离出的生活领域，贬低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始生物学主义便渗透到资本主义劳动社会的层层结构中去，也就无法通过形式上的平等决议宣布与它断绝关系。因此，在流传最为广泛的、马克思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阐述中，谈到性别关系时也些许带有生物学主义的狭隘眼光。再比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大量发行的畅销书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中极为抽象地要求妇女彻底解放，但在具体论述中处处透露出生物学主义的思想：

“连我们也认为，让男人担当起保卫祖国的职责、让女人管理家乡和灶台是恰当的分工……受过教育的妇女自然会向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人求教，这样双方才能进行思想交流，互教互学……它（社会主义社会）关心的首要对象……便是产妇、母亲……只要可能和必要，就应理所当然地为儿童保存住母亲的胸脯……”（转引自：Burgard/Karsten, 1981, 第84及以下数页）

这就是说，妇女不仅永远掌管“灶台”和充当“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人的学生，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她们首要的角色不是社会成员，而是按生物功能（母亲角色）定义出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生物学主义的这种消极界定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运动，从一战前社会主义者进行的“罢生大辩论”可略见一斑。在生育了七八个或更多孩子之后已被无止境地怀孕生子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妇女中间，“罢生”的口号得到了热烈响应。不过，这个问题马上就成为生物学主义者的讨论话题。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医生尤利乌斯·摩西（Julius Moses, 1868～1942）等男性宣传鼓动家从“种族卫生学”角度，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论证这种可能抵制生育的现象，他的理由是：尤其对那些疾病缠身、患肺结核的妇女应“采取不应让他们受孕的措施”。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和一些知名的女性社会民主党人士，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坚决反对任何“罢生”的做法。党刊《前进报》认为，尽管因子孙满堂而操劳过度 and 疲惫不堪的妇女处境困苦，“罢生”的口号仍旧是彻底错误的，“孩子少并不是通往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政治的途径。”（转引自：Bergmann, 1992, 第289页）。为什么不是呢？克拉拉·蔡特金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大批“投身革命的战士”，所以，这就要求妇女不能

“胆怯和畏缩”而应采取生物的“阶级行动”（出处同上，第291页）。不只是这场大辩论表明，（恰恰连知识界的）妇女本身也是生物学主义思想体系的“帮凶”，她们也为此类行动和思想中暗含的性别界定方法助了一臂之力。

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兽医哲学”社会生物学主义最晚从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之际充斥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在已被资本主义驯服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大肆泛滥并成为天经地义，而从伦理角度、批判角度或以任意一种方式寻求解放的激情似乎都只能在上述混杂形式中表达出来。已达尔文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用“自然科学”来阐释社会的行为还得到了学院派达尔文主义者的补充和促进，如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虽然他抵制社会主义，但许多工人运动成员仍然读过他的书。在他撰写的普及性著作《世界之谜》中，他把有机自然界和社会直接置于相同的“规律性”之下：

“人类各个分支几千年来以各种族和国家的形式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进行激烈争夺，他们的命运同几百万年来生活在地球上的有机体世界的命运一样，都在‘永恒不变的伟大规律’的支配之下。”（Haeckel, 1960/1899, 第341页）

这就是说，包括伦理学在内的一切表面上特殊的人类文化形式只有与作为构成“较高级脊椎动物”组成部分的人类的自然天性相符合，才能发挥效力。如果这个论调被运用于“兽医哲学”的资本主义批判中，那它只意味着一种“较高级脊椎动物的社会主义”。有鉴于此，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侯爵 P. 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jotr Alexejewitsch Kropotkin）以一种感人的方式、用“动物世界相互帮助”的道理来解释社会主义，因为，众所周知，动物之间绝不仅仅是相互吃光杀尽的关系，也无论如何



不总是在造装甲巡洋舰。1911年，法国大文学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编写了一本书替同性恋作辩护，他提出的理由绝非同性之间的肉欲是人类性生活一种变体，完全应当被人们接受，而是试图在动物界中寻找生物学主义的论据：“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见过一些狗，它们跟在其他一些显然尚未交配过的狗后面，纠缠不休。”（Gide, 1964/1911, 第84页）“鸭子之间”也有同样的“习性”，这种“极其正常的现象”在一对对雄性金龟子配对时也可看到（出处同上，第8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大师的高足卡尔·考茨基在1927年才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此书谨献给我忠实的路易斯，我儿子的母亲……坚持不懈和通情达理的助手”）两卷本鸿篇巨著中开始十分严肃地一页页摘录布雷姆（Brehm）的《动物生活》中的段落，主要讲述鸣鸟科的群居、鹤科动物对配偶的忠实和火鸡的智力特征（“它们的愚蠢令人吃惊”）。从这一较有把握的基点出发，考茨基也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种族问题”郑重其事地表态。当然，他反对“种族战争”的思想，因为他觉得，“为什么连不同种族之间也非得刀兵相见不可呢？”（Kautsky, 1927 I, 第515页）但是，他也认为，“人以种族分成群体，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出处同上），这种情形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差别，但这些差别却不应被高估并且绝对不应在解释时作为歧视的依据：

“某些种族肯定具有一些令其他种族厌恶的特点……不习惯的事物容易令人感到惊讶，甚至令人厌恶。不光我们的视觉，连我们的嗅觉都会遭到外族成员的非议。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令我们感到不适的气味由遗传而来，是一个种族的特征，更不起源于特殊习惯和食物……我在大英博物馆曾多次有机会数小时与进行研究工作的黑人并肩工作，却从他们身上闻不到哪怕一丝种族的气味……自然，并不应否认

存在着某些种族散发某种特殊气味的可能性……个别种族对肉类有特殊的品味也是可能的。有报道说，生活在东南亚某些水域中的鳄鱼贪食中国人，对马来人的兴趣却少一些，而它们准备咬欧洲人之前，却得好好思考一番……虽然这些观察未必确切肯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每个种族有其特殊的秉性……”（Kautsky, 1927 I, 第 515 及下页）

对人类种族生物学进行这样一番充满宽容的全面巡视，着实是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支撑它的是一种极其缜密、名符其实的动物般兽性的严肃科学态度。这位大思想家在他那部德国社会主义重要哲学著作的开始部分还开诚布公地承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后，我思想历程的初始阶段自然也持续了几十年……当时，达尔文主义是风靡世界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还谈不上达尔文主义。他们两人都以黑格尔为基点，我则从达尔文那里出发。达尔文先于马克思吸引我，吸引我的题目中，有机体的发展早于经济学的发展，物种和种族的生存奋斗早于阶级斗争。”（Kautsky, 1927 I, 第 17 页）

鉴于这类粗俗、兽性的社会基础理论，同时期的哲学家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一般情况下会被人们认为怪异的所谓“走光明大道”的要求，却似乎有些道理了。

## 第二次工业革命史

---

带着病态的心理，资本主义踉踉跄跄地进入了崭新的 20 世纪，继续盲目地高速发展，充满恐惧与愤怒，毫无节制，矛盾重重。就像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上升过程中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一样，在由迷信进步和幻想衰落、技术万能思想和生物学主义的“兽医哲学”、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和市场竞争、个人要求和“民族”与“种族”集体主观妄想等各个因素组成的奇特而荒谬的杂乱混合物中，一切事态都在迫使帝国主义大国内部和之间已变得无法控制的紧张关系爆发出来。已变得十分疯狂的自由主义保守派的领导精英们自认为是“中选者”，同时也是一种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超级凶猛灵长类，他们推行扩军政策和黩武主义，与此同时，从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传统的社会凝聚力正越来越快地瓦解着。

但是除了不知所措和丧失理智之外，别无其他可能性。尽管工人运动中社会主义工会和党派成员人数与日俱增，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越来越多，但他们的思想与纲领始终空洞无物，作为臆想中的另一种历史选择已变得不可置信了。作为偏离正统思想脱胎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利益范畴的高度感染。它的民族主义和达尔

文主义性质的真实面目已成为历史，所以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和运动在各政治领域和社会阶层中时隐时现，对于加速发生在人们身上不可理解的巨大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显得天真幼稚，这种天真幼稚却带有一些阴险成分。对社会和对自己本身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仍愿意参与和投入——工人运动这种潜在的窘境接二连三地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和“毛孔”里的大大小小的派别发起的运动形式体现出来。

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定要做些“事情”，又说不清该做些什么，这种感觉包含在许许多多自成一体、似乎没有相互联系的思想所表现出的、给人造成假象的间接联系中。如果把这些思想归纳一下，找出其共同点，那么也许可以总结为一种“回归自然”的抽象假设。自卢梭以来，每阵混杂了各种因素、消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化浪潮都以这个假设为挡箭牌。自这个思想与“兽医哲学”的达尔文主义相结合之后，就完全无法指望它会对任何解放浪潮起推动作用。追求“生活改善”的运动、素食俱乐部、“裸体者联合会”等组织和运动纷纷涌现。青年和徒步旅行者运动致力于抵制维多利亚和威廉二世时期绅士—资本主义中已为人们所习惯满足的僵化生活方式，在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中，这个运动由“候鸟协会”和其他社团倡导发起，在英国由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勋爵倡导的“童子军运动”几乎同时兴起。这些运动的目的却不在于用批判眼光看待社会现实，而是通过文化上的替代行为、化装游行的外在形式和知识上低水平的营火浪漫主义来滤清社会，这种滤清行动所显示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甚至超过了表面上由于生活形式而受到攻击的小市民们。

此类运动追求的既不是闲情逸致，也不是享受乐趣；既不是能真正有生命力的色情，也不是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它对文明的批判只针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本来就日渐衰落的外表上的方方

画面，而并非针对这个社会具有的破坏力本身，而这种破坏力的盲目性在生活改革者和青年运动者的头脑中（也相应地在“工人文化运动”中）不断地再生。一个经过精练提纯的想法——全面“纯洁”成为这种抽象新浪漫主义思想的中心概念。它的意义却颇为神秘。19世纪新建的人口密集工业区中环境令人作呕，瘟疫时时威胁着人的生命，因而不得不开展卫生运动，这个概念中部分正是含有浅薄的卫生运动思想，另外，（同样从一开始就完完全全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体育运动也倡导类似的思想。1888年，信奉民族主义的文化批评家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 1851~1907）胡编乱凑了一本毫无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大部头作品《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在这部后来成为德国青年和改革运动中畅销书的作品里，可以看到鼓动宣传“清洁德国精神生活”的文字表述：

“当今的英国人有些像古希腊人在生活中那样怀着对体育的热衷之情；他们比现在的德国人受到更好的训练……尤其是德国人应该注意防止身体因饮用啤酒而虚胖起来，否则，数不胜数的餐馆对于民众健康的影响就如大量芽孢杆菌对于个人的健康……这里也要说到德国大学生，按照英国在体育方面的经验改革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会对他们大有裨益，这对其他德国成年人同样奏效。如果代替现今普鲁士5万家酒馆的是5万家公共游泳场所，那么全体公民身心健康甚至道德健康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身体的纯洁和道德纯洁是相辅相成的。倘使德国游泳场所再多一些的话，很可能社会民主党人会少一些。”（Langbehn, 1922/1888, 第312页）

这里的“纯洁”概念用的是一种奇特的隐喻技巧，它把生

理卫生学的各个概念转用到社会的肌体上，梦想对道德和文化实行清洗，有人认为，通过“纯洁”运动借助一种用水清洗的克奈普氏疗法也许能冲刷掉资本主义中形形色色令人发指的矛盾。“纯洁”运动也将卫生学的目光投向身体内部，投向渗透在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主义思想中所推崇的“血液纯洁”。真正“纯洁”的新人类应当尽可能“种族纯正”——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种族纯正”。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候鸟运动”都不吸收犹太人作成员，或者强迫他们自成一体，另外组成社团，这种方法被称为“清除犹太人”（参见：Poliakov, 1988 VII, 第43页）。这一令人悚然的内涵至今回响在德国家庭主妇使用的对芽孢杆菌表示忧虑的言辞和洗涤剂工业的宣传用语里（“深入清除毛孔污物”）。

同时，冷水浴、强身锻炼、非色情性质的禁欲裸体行为、控制饮食和节欲、军队里男子色情组织（不允许真正发生同性恋关系）、越野等等做法实质上都在为战争做实际行动和心理上的准备——演习和适应战壕中的生活。巴登-鲍威尔勋爵对童子军毫不隐讳地讲：“足球是一项很好的游戏，但驱逐人更胜于任何其他一种比赛。”（转引自：Koch, 1973, 第111页）进入大工业和群众性民主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蜕变引起了动荡不安，同时，社会中又缺少抵制抽象“劳动”体制的严肃的、具有解放性质的首创精神，这两个因素使得在社会意识中时常闪现出带有侵略倾向和玩世不恭意味的向往灾难的倾向。不久之后，种族主义的衰落幻想就在一战对人的磨炼中通过对血肉之躯的最后“清洁”得到了实现。

生性敏感者可能从威廉二世时期时代精神的残余预感到即将来临的是一个灾难时代。1910~1911年，年纪还不到25岁、后来在一战开始两年半前溺死于滑冰事故的年轻诗人乔治·海姆（Georg Heym, 1887~1912）用昏暗的画面预言了全面的

毁灭，这些画面的想像力甚至预示了20世纪中期的整个二战场面。“国家布满死亡的城市”，这是他遗作中的一个诗句。他那梦魇般的诗作《战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预言了一个时代：

起身了，那曾经长眠的他  
从苍穹深处站立起来。  
他站立在暮色之中，身躯巨大、形象模糊，  
月亮在他漆黑的手掌里被揉得粉碎。

一个城市消失在黄烟之中，  
无声无息坠入深渊的腹地。  
然而在火光熊熊的废墟上巨人般矗立的他  
在狂野的天空中三次挥舞火把。

1912年，还在威廉二世时代最平静的中期，教育家威廉·洛姆苏斯（Wilhelm Lamszus）撰写了一本题为《人类屠宰场》的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在这部书里，他预言了未来10年中即将发生的历史，其精确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书中描述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情节内容及苦涩的讽刺手法，与从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到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等作家在真正亲身经历这场大屠杀之后的描述一般无二，仿佛作者曾亲身经历或目睹了全部惨状：

“那里躺着一节腿，已经脱离了膝关节，只有长长的肌腱还留挂在上。这条腿曾经载着一个邮递员上下楼梯，现在，它很高兴自己已被丢失，心里暗暗在笑，因为不会再有人找到它。在它旁边，从一个已经没有脑袋的躯干里，曲曲

弯弯地流散出一摊破碎不全的、软骨质的气管，好像还在恋寻着空气。它曾经包容的是一个工人沉重的呼吸，这个工人直到生命结束一直被微薄的收入和养活7个孩子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导致气管落荒而逃。正在嘲笑一切的是一个首席教师长着金发的头。颅盖像苹果一样已经裂开。这里又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者含有蛋白质的大脑……我看见一具具已经腐烂的狗的尸体，它们身上的腐气飘散着，好像经过风箱吹动一般。土地被彻底底翻掘过了，军用背包、破损折断的枪械、炊具都四仰八叉地躺在铁路路堤两边……”（Lamszus, 1928/1912, 第78及下页, 第155页）

洛姆苏斯还准确描述了后来政治灾难的过程，从起初的战争狂热情绪到人们迅速清醒和绝望，直到彻底崩溃、国民战争和对叙述者“我”来说自然是姗姗来迟的革命等种种景象。在这一系列令人悲痛的惨厉预言中，也提出了战争的原因和意义何在的问题。4年之后，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战壕中气氛的转变，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竞争的非理性主义会发展成工业的“人类屠宰场”。

“那时，我们出征了，但我们出征时的确意识到，这出于一种不容改变的必要性。当时，有人说，最终总归要有决断……欧洲大清算——它突然就来到了：最终的大清算……可是，到底清算什么呢？……仁爱者和哲学家们一跃而起，四处奔走，而对着血与火，他们额头紧蹙，想最终做出决断。然而，到底决断些什么呢？是什么让我们的腿脚这般软弱无力？……我们不是曾经想搞清楚，是谁造出了最便宜的裤扣和大部分的大头针？……这难道就是我们把成千上万的是一家之父掏空内脏的原因？”（出处同上，第129及下页）



历史跨度更广阔类似画面也袭入了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 1877-1959)这位阴森画家的脑海中,他于1909年在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另一方》中描述在地狱里走向灭亡的、类似后来“第三帝国”中介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专制政体,名为“珍珠”的梦幻城市的毁灭像电影胶片连续放映一般极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炮火连天的场面和纳粹帝国的最后终结:

“狭长的街巷倒塌了,于是,我看到了宫殿,那是原本从这里看不到的。淡红色的封闭式建筑群光彩夺目而庄严肃穆地矗立在一片废墟之上。我想,现在应该吹起长号,启用最新成立的法庭……土地像橡胶一样延展开去,如同几百门大炮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让空气也颤抖起来。渐渐地,宫殿的正面发生倾斜,像风中的旗子一样弯曲下来,把巨大的广场埋没在自己的面额下。从珍珠城所有的钟楼里传出钟声,它的旋律和宏大气势都仿佛为这正走向死亡的城市哀鸣……持续不断的钟声沉寂下来,好几个钟楼都倒塌了,只有大钟楼还树立在那儿,它那巨大的低音钟闷声嗡鸣。我几乎看不见生命。一小群人似乎在逃命,他们向各个方向四散奔跑……从地上的一个洞穴里一阵冰冷的风扑面而来,逃命的人们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那个阴森恐怖的洞穴又将吐出的空气吸回去,木板、屋梁和人群都跟着消失在里面,就像一阵旋风……随后,一切都在我面前变得模糊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注意到城边金字塔般的房屋群在‘轰隆’声中坍塌变为瓦砾……一片广而又广的断壁残垣;成堆的瓦砾,泥浆,碎砖——一个巨大的城市垃圾堆。”(Kubin, 1994/1909, 第231及以下数页,第246页)

## 20 世纪的空前浩劫

那是一个美妙的、诗意绵绵的夏天，20 世纪第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使夏日的和谐宁静荡然无存。“避暑消夏”（系指当时大多数雇佣工人无能力享受的年度旅行休假）中的高收入者对此大为震惊。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地利的皇储伉俪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者杀害，该事件并在一系列政治连锁反应中引爆了积聚已深的资本主义矛盾。此后，同年的 8 月 1~4 日之间欧洲最重要的大国相互宣战，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确切地称之为“20 世纪的空前浩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战争爆发时，只有极少的人明白，这场在危机四伏和社会性整体不幸事件四起的现代化历史中至此最大的灾难会导致哪些关键性的社会变化。

对此出现的第一个反应是群情鼎沸。在柏林和在巴黎的街头素不相识的人相互拥抱，他们仿佛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喜讯。每个身着军服的人到处都成为注目的中心。而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知识分子终于肯乘坐轨道小车游览魔鬼宫。诗人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 1863~1934）竟然说出了这样一个有叛逆精神的隐喻：

“德国的音乐曾是我们的战时动员：这样的乐曲正如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总谱那样：充分精确时的充分陶醉。”（转引自：Schulin, 1994, 第 9 页）

就连当时文学界的一颗流星，那个于 1901 年出版了《布登伯洛克一家》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在 1914 年秋天当大战开始的消息传来时记下了他的振奋心情：

“艺术家，身为艺术家的士兵怎不该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崩溃而赞扬上帝呢，对这个世界他是如此地厌倦，如此出奇地厌倦！战争！我们感觉到的是净化，是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转引自：Fries，1994，第825页）

这是一个以医生的疾病证明被免去服兵役的人写下的一段话。很显然，战争的爆发被感到是一种拯救——社会意识中的紧张情绪在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盲目支配下已经上升到如此难以承受的程度。对出现根本的和积极的变化和希望，对世界的新生和恢复青春的希望完全用一种全民族的战争狂热形式表达出来，这展示了人类社会由于屈从竞争的法则已经达到的道德败坏和精神颓废的程度。被驯化得俯首帖耳并已丧失了自己社会尊严和基本反抗意志的人力资源也早就成熟到足以去发泄民族仇恨了。不难见到工人们在大屠杀怀着一种有奇怪的、孩童般的期待喜悦而在滚动着的军用品运输车厢上手写上沙文主义的口号：

每枪一个俄国人，  
每剑一个法国人  
每脚一个英国人，  
塞尔维亚人该毙命。

知识界的前瞻思想家们和人民大众之间从未达到过如此的一致。尽管新近的调查研究自认为已经查明，这种高度的战争狂热也许只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源自一种进行“事后正面美化”（Ulrich/Ziemann，1994，第17页）的正式的历史观。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但凡篡改历史都愈加要颠倒黑白地去否认已作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圣灵降临节载入了历史的那个被疯狂庆祝的1914年“八月事件”。实际上，估计有两种因素同时起了作

用：唤醒民众的兴高采烈和面对大批人将送死这一前景的恐惧与深重的抑郁不安。这样截然不同的双重感受与通过用武力继续竞争而只能演变成公开的歇斯底里的资本主义结构性精神分裂症完全吻合。这正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状态，有关见证不胜枚举。斯图加特警察局长在1914年8月9日的一份值勤命令中如此写道：

“警卫人员们！居民们开始发疯了。大街上已经挤满了亢奋地粗暴行动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把自己旁边的人看成是一个俄国或法国间谍并自认为要义不容辞地把这个间谍和来保护他的警卫人员打个头破血流……云彩被当成飞机，星星被当成飞艇，自行车车把被当成炸弹……”（转引自：Ulrich/Ziemann, 1994, 第29页）

这种歇斯底里的普遍情绪也许来源于模糊的预感：现在要向“劳动”和竞争的自动屈从、要为几十年以来保持不变的民族感和要为达尔文主义的过度放恣付出血的代价了——况且不再有退路，而只有向前逃逸。永远跟着干的局面突然面临的绝境旋即变成一种疯狂的希望，似乎现在终于将斩断现代化历史的戈尔迪之结了（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后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利剑劈开——译者注），似乎恰恰通过自我献身的最后庄严结局，通过逃避自我而投入战争，一切才会好将起来。一个在根本上起压制作用的社会秩序积聚起的全部愤怒在划分为民族的大众胸中隐伏着，这郁积的愤怒如今可以发泄了——朝外发泄。因此必须更加强烈地号召“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威廉二世于8月1日在柏林皇宫前对大批怪声高唱“祝你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和“德国，德国高于一切”的民众所作的一次即兴演讲中说：

“假如发生战争的话，任何党派都将终止，我们都只是德意志兄弟。在和平年代曾有这个或那个党派攻击过我，但现在我诚心诚意地原谅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转引自：Johann, 1966, 第125及下页）

这段喻旨在几天之内被多次重复和略加变化，最终被压缩成著名的格言：“我不再知道任何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对于各种不同的自由党人来说，当然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一种号召，他们从民族自由党人到弗里德里希·瑙曼的左派自由党人团体全都由衷地宣传帝国主义的竞争政策，甚至制定出有关的方案。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首当其冲地被看做是民族中的不可靠者，当然只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在德国）早已被资本主义制度排除在外：他们是犹太公民和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威廉宫廷奸党和他们的争斗对手却毋须担忧。尽管种种迫害和大屠杀，尽管发生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1859~1935, 法国军官，犹太人，1894年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1906年经重审予以昭雪——译者注）和犹太教堂被焚烧，尽管他们在柏林被殴打并赶出咖啡厅，并且被皇帝圣上亲自称为寄生虫，大多数犹太公民（至少是精英领导者们）即便在世界大战的前夕也还在一同为所在国的狂热浪潮推波助澜。主张适应和自我克制的旧政策骤然变为公开疯狂地加入到相互之间的诅咒中去。恰恰是年轻的犹太诗人恩斯特·利绍尔（Ernst Lissauer, 1882~1937）在8月4日英国参战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反英仇恨歌”：

我们将怀着长久的憎恨仇视你  
我们不会放弃憎恨  
对水的憎恨和对土地的憎恨

锤子的憎恨和皇冠的憎恨  
七千万人按捺不住的憎恨  
他们共享友情，他们同仇敌忾  
他们只有一个敌人：  
英国。

大多数犹太人的上层人士、大学师生、科学家和经济界领导人员就这样也一同踏上民族主义向前逃逸的征程。正如根据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起源和历史并不出人意料那样，他们也都加入了可怕的、全民族的战争和团结的狂号之中，即使还夹带着几分悲哀的杂音。早就足以明了，世人皆成兄弟这一“劳动”-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肤浅思想实为何物了。要把社会民主党人变成战争喊使者，就只需要提供一个抵御“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不管还多么微弱无力）的借口——尽管“不为这个制度奉献一个人和一分钱”的口号表面上看起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实际上只隐含着被对方一直拒绝的人伙动议，这正如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去世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多次申明的那样——在1904年3月针对当时国防部长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所作的国会演讲中他这样说道：

“您将来不可能打没有我们参与的胜仗……如果您获胜的话，将与我们共同胜利，而不是战胜我们……如果这场战争会成为一场侵略战争，一场关系到德国生死存亡的战争，那么——我向你宣布——我们之中每一个男人甚至老翁都准备扛起枪保卫德国的土地……”（转引自：Schulz, 1976, 第333页）

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继承了1848年的资产阶级精神，从不

越出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基准体系的雷池半步，这个做法早在1870年就助长了军国主义的膨胀，现在依然如旧。如同在1870年那样，怀着自由主义—共和制激情的人们在“外国暴君”拿破仑三世面前宁可选择自己本国的暴君，如今为了能够宣称民主选举权利和德国工人运动会受到“外来的”威胁和使与威廉二世的资本主义联合合法化，必须把尼古拉二世的沙皇政府搬过来承担罪名。

在8月这些灾难性的日子里，驱策整个欧洲参战双方的社会民主党行动起来，不是无辜的社会主义新犯的“原罪”，而是其已上千次地被证实的历史本质的必然体现，即它不过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分店而已。

尽管如此，恼怒和相互猜疑表明了转向各自本国的民族—帝国主义统一阵线的激烈程度。1914年7月31日，正当战争动员期间，刚从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人办事处归来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在巴黎的一家饭店进晚餐时被一个右翼民族主义的狂热信徒杀害——一方面是因为此，而另一方面是尽管他像德国的倍倍尔那样扮演着一个类似矛盾的角色，并根本上对民族和军队也持积极态度。历史的恶作剧是：饶勒斯本人原本曾有过担心，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可能会被一个“和平主义的狂热信徒”（转引自：Abosch, 1986, 第124页）杀害。

但是就连这次谋杀行为〔它的幕后操纵者据猜测是那个煽动战争的俄国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伊思沃尔斯基（Alexander Iswolski）〕都不能够阻止莱茵河两岸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横冲直撞地奔向事关民族荣誉的沙场。在他们党的主席被以民族的名义击毙的当天晚上，已闹翻了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组织为了“保卫”恰恰是这个民族而联合起来，并决定停止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就在饶勒斯的遗体为葬礼穿戴就绪后的次日，他们与其他的党派（其中也有民族主义者，刺客即属于他们追随者的

圈子)结成“神圣同盟”。为了大肆渲染,这个行动被赞美为饶勒斯策略“身后的胜利”(Abosch,出处同上)。既然法国的社会党人都不因自己的头领和首席理论家的被害而动摇其对战争的痴狂陶醉,他们在另一方的弟兄们当然就更不示弱了。仅有过的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道德上的一瞬间踌躇,像许多人那样从左翼倒向右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康拉德·黑尼施(Konrad Haenisch, 1876~1925)在对1916年——这期间战争激情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作的回顾中可以说是无意间透露出这种看法:

“都极为迫切地渴求投身于全民族高潮的洪流之中,而另一方面在心灵深处又极度地恐惧,害怕自己会毫无保留地跟随着这种渴求,害怕自己会完全沉溺于这种在身边沸腾和激越的并且——人们倘若探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早已存在于自己内心情感之中的气氛!这种恐惧:即便从你本身和你做的事情来看你不会成为无赖——你也可以这样感觉到,就像你内心中充满的感觉那样。直到……那种巨大的紧张感突然消失,直到人们敢于成为原本的样子,直到人们——不管一切僵化的原则和死板的理论——第一次(又一个几乎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可以由衷地、心安理得地和不必害怕因此而成为叛徒地加入到喧嚣的暴风雨般的歌潮中高唱: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转引自:Grebing, 1979, 第140页)

在短短几天中,一切都明朗了,“劳动”-社会主义之真正民族的和资本内在性的本质暴露无遗了。战争贷款被批准了,而于1916年锒铛入狱的犹太裔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少数极左翼异己分子遭到唾弃:一夜之间,这些反正很久以来就



只是被勉强忍受和被长期敌视的、从前的同志们要比边界那方的军事敌人更加陌异了。除了工人运动的这一小群人外，只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被卷入这种普遍的狂热高潮，并试图通过文学形式从各种不同的方位来表达反对战争的立场，例如文化和语言批评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女诗人和历史学家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1864～1947）、作家施特凡·茨威格（S Stefan Zweig，1881～1942）或者犹太-基督教抒情诗人弗兰茨·威弗尔（Franz Werfel，1890～1945）。反之，像纽伦堡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歌唱家卡尔·布勒格尔（Karl Bröger，1886～1944）那样的“工人诗人们”却开始大谈沉闷的民族“信仰”。

我们一直都怀着对你的热爱，  
只是我们从未直语道明白。  
你面临的重大危险却是如此壮丽，  
即你最穷的儿子也最忠实于你。  
好好思索吧，啊，德国。

车床和啤酒桌边的专业和业余的抒情诗人心潮澎湃地讴歌着自己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钢铁风暴”中痛苦丧生的战争狂热和效忠誓言。这种臆想中的英勇阵亡被自觉地接受和歌颂，正如鲁尔坡特的锅炉锻工海因里希·莱尔施（Heinrich Lersch，1889～1936）用“工人之手”写下的另一首著名的战争诗歌的词句所表达的那样：

一个自由的德国人不懂得任何冷酷的义务：  
德国有义务活着，而假如我们有义务死去！

这个在此期间被派往前线的作者懂得咽下自己的恐惧和负罪感，而且表现出“工人阶级”如何极其出色地学习了他们的社会生物学主义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并在此时能够将其作为坚持到底的口号运用于实践，因为战争确实是一种“自然规律”——犹如“劳动”和“种族”，犹如国家和民族：

我的法国兄弟，我会击中你！  
你不要介意我向你射击：  
我的确是你的兄弟，你的同志；  
我们会通过神明之血得到拯救。

这必定如此。犹如草木的生长  
同属人类的各国人民追求着光明；  
两棵相同的树不能并列矗立，  
这一棵会夺走另一棵的光明和空间。

毫不奇怪，面对这种达尔文主义的歌颂激愤和杀戮的抒情诗，正统的日耳曼学能对“工人诗歌”作如此评语：它终于通过了毕业考试，并且把自己从各种“党派和阶层的狭隘性”中解脱了出来（转引自：Fries, 1994, 第 829 页）。接着很快来临的自然是现实中的震惊。就在莱尔施发表他的战争抒情诗的同时，他在私下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却流露出明显的失望：

“亲爱的佩措尔特（Petzold），我本不能够去做这样的想象——无人可以做到，因为如此之事是如此新异，以致突破了以往战争的范围……勇气、胆量和机警——一切都是多余。神经麻木到极点的人对此的感觉是微乎其微，而其他一切都是相同无异。”（转引自：Fries, 1994, 第 840 页）

从这突然可以听到的另一种语言中，不仅表达出一种歇斯底里意识的分裂性结构，而且还表达出一种诚实的惊奇。诚然，人们已经预料到会战死在沙场——但那是一种个人英勇的阵亡，而不是再渺小不过的那种默默无闻地在工业中谢世。人们的确想通过“经历战争”逃离资本主义的呆滞和工厂以及办公室生活的贫困，并且眼下不得不认识到：让这一切继续下去只有靠其他的、流血的手段。显然，没有人真正为战争的工业化作好了思想准备，思想意识远远落后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资本主义现实。技术实施方案和工厂的纪律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还带有相当的等级意义，还充斥着前现代化的幻想、荣誉观念和个人行为模式。工业战争对于这种思想状态来说是一种文化休克，威廉·洛姆苏斯（Wilhelm Lamszus）已于1912年有先见之明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感受：

“以前曾有过一种骑兵之死，是一种光荣的战士之死。现在出现了一种机器之死！……我们被技师和机械师从生路送上死路。犹如大企业里生产出纽扣和大头针，机器的运转如今生产着残废者和死尸……机器朝着我们袭过来，我们也只朝着机器奔过去。而机器胜利地进入了我们的肉体。机器从我们的血管中吸吮痛饮着鲜血，一桶一桶地吸干……只有禽兽才被这样大批地、这样冷酷地、这样内行地根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只是禽兽而已……来看看吧，你们这些发动战争的统帅……人已经自暴自弃，变成一部克虏伯军事机器。”（Lamszus，出处同上，第21页，第52及以下数页，第115页）

但当战争真正开始时，首先在头脑中唤起的是来源于读物的种种煽惑人心的军国主义场景。尽管机器自数百年来已成为一种

资本主义灵魂的原型，同战场的画面连接在一起的仍旧是举着“闪光的战刀”在隆隆的炮声中冲锋陷阵的“勇敢骑士”的虚幻想象。一本以高印数用“德国妇女们向战争儿童的募捐”为儿童出版的、名为“爸爸在打仗”的宣传画册在愚蠢地夸赞各种各样的武器时十分真诚地歌颂了“德国骑兵”，尽管在图画和诗歌中也附带上了潜艇和战斗机：

敌人常常听说：  
他们跨在怒号的坐骑背上奔驰，  
重骑兵和轻骑兵，  
龙骑兵和铠甲骑兵。

鲜艳的旗帜在飞舞，  
这是疾驰的持矛骑兵的旗帜，  
他们跨马飞奔，他们凯旋得胜，  
发扬着德意志的威力。

他们作为胜利者入眠，  
在温暖的厩圈的漆黑中  
他们拍击着乖马  
那湿润的脖颈……

事实上，主要是在战争开始时还使用了大量马匹；当然，并不是用于传统的骑兵部队，而是作为实际上的炮灰，即火炮活动炮架和其他军用技术设备的挽畜。洛姆苏斯已经预见到的这种生灵在工业战争中被前所未有地折磨、撕碎和致残的不幸，在后来几乎所有著名的战争书籍中都提到过；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在他闻名于世的作品《西

线无战事》中这样写道：“我还从未听到过马的呻吟，也几乎无法相信。这是世界的恸哭，是上帝造物被践踏，是一种野性本能的、恐怖的疼痛呻吟。我们脸色苍白。”（Remarque, 1952/1928, 第 55 页）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当还是打“运动战”时，英雄的幻觉曾经昙花一现，但其残酷无情却已彰明较著。据悉，1914 年 11 月 10 日在对佛兰德人居住的小城市朗格玛克的一次猛烈攻击中，几乎一个年级的高级中学毕业生挥舞着军刀，嘴里高唱德国歌曲在机关枪扫射的火光中成排地倒下。这个成为民族主义传奇的事件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它只表明一直还带有前工业化烙印的战争观已经失去意义，而正是以这种战争观的名义，为了作为“帝国的殉难者”（Wehner, 1932）而在魂魄和意识形态中永垂不朽，幼稚的“儿童团”去白白送死，依此种永恒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再一次成为民族狂热的工具。

但是，随着残杀不断持续并僵持成“阵地战”，与传统的军事悬想迥然不同的战役的工业化和机械化越来越不可辩驳。这就使人不由得把在前线暴露出来的新战争的本质看做是“资本的负面生产”，以致像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998）这类清醒和极其保守的人物也在他相当著名的战争著作《钢的雷暴之中》的第三句话中认为有必要使用“前线的滚轧机”的隐喻，这个隐喻被不断重复使用。而且魔鬼的“磨坊”那个古老的恐怖概念完全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宛如自动地回来了，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开始阶段曾表达出被迫过着新型的“自由”奴仆生活的人们心中的绝望，并在“踏轮磨坊”这个词中使人对早期资本主义刑具般的工作机器的严酷无情至今记忆犹新。在凡尔登城前的一场“技术装备战役”现也被称为“鲜血磨坊”，那些奇特的“工人诗人”之一的马克斯·巴特（Max Barthel）用同一个古老的比喻描述他在前线的感受：

前线是一个巨大的白骨磨坊，  
在炎热的混战中碾磨，  
也在冬寒中碾磨  
地平线上恐怖异常。

漫长的一天又一天，惊恐的一周又一周  
战役在持续。  
上百次捣毁，粉碎，  
它碾磨着年轻人的尸骨  
碾磨工却在不停地大笑。

身处 1916 年的这位德意志民族的无产阶级拙劣诗人大概不会知道，他在这里展示了一幅百余年前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刻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画面——但决不再是充满着真心的愤怒和憎恶，而是出自为这庞然怪物做出癫狂和自杀式奉献的愿望，并也同样而且恰恰描绘出了它的大型人类屠宰场这种“美妙的”战争机器的形象。反正从未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真正的历史定位一致过的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道德，在所谓“必要性”的巨大作用下烟消云散，这种必要性在和平时期就已使工厂纪律能够刻骨铭心，并在此刻也发起了向“鲜血磨坊”宣誓效忠。离奇的是，一种与右派保守思想对立的意识形态做出的反应是如出一辙的癫狂和最终的俯首帖耳，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恩斯特·荣格尔。他也认为，工业化战争的形成给了每个怀有“骑士豪情”的爱国军人迎面一记耳光，而他也几乎是在把另外一个面颊伸过去：

“在这次交战中，不再像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不是个人能力，而是大型组织之间的较量。生产、技术水平、化

学、教育事业、铁路网线：这些皆是在技术装备战的烟云背后无形的力量较量……这种让个人的生命听凭于一个不可抗拒的意志的摆布在这里昭然若揭。战斗以巨浪般的规模向前推进，淹没了个人的命运。原野的宽阔和死一般的孤寂、钢制机器的远程作用和各种转为夜间进行的活动给战争的爆发罩上了一副刚硬的泰坦巨神面具……做出裁决的是一道算术题：谁能够把最大量的子弹倾泻在一定数量的平方米上，就胜利在握。芸芸众生的野蛮角逐即是战役，是一场生产和物质的浴血角斗。因此，这些斗士们，这些杀人机器背后的操纵者，常常几周时间内都意识不到，在这里是人与人在对阵……这从根本上来说或许是同一种毫无意义的感觉，即面对工业城市光秃秃的住宅区时而在悲伤的脑海中闪现出的同一种毫无意义的感觉……”（Jünger, 1978, 第16及下页）

在工业性大型战役不断增强的影响下，这种自动屈从于那个以荒谬的方式自己制造出来的盲目的“规律性”的欲望——这种规律性此后作为一种被极度夸大的外在力量出现在各个人面前——夹杂着变态的性品味。资本主义的男性狂热崇拜对象是历史进程中的“泰坦”，这在根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最“无男性品味的”方式。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一种深深隐藏着和被抑制的同性恋嗜好，其所起的作用之所以很可怕，是因为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生存的许可，而且，它若上升为一种意识的话，将会引起厌恶和激烈的抵制。

更为明显的是其中施虐-受虐狂的弦外之音，它甚至更加接近所准许的性感觉，因为它显示了与必要性-伦理的某种一致性；众所周知，直至今今天大部分古板的资本主义策划者属于那类只有在向受虐狂施虐的娼妓的鞭笞下才能够达到性满足的男子汉气概表现者。这里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种自我惩罚仪式，更多的

是一种屈服的乐趣，在社会上与此相吻合的是为“更高的权势”献身的精神——为了从他的方面来说更有乐趣地虐待劳动者。这种现代的政治家和经理们的施虐—受虐狂心理可以称作一种资本主义莫洛赫神（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译者注）的圣殿淫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级的指挥官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世界机器“大伤元气”，这次世界大战使这种社会性的施虐—受虐狂的语言公开亮相：在工业化战争的“钢铁风暴”中，现代的启蒙者最终也逊位了，为的是向他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神祇无条件地投降。

这种逊位和献身与这些结构性变化虽然已在地表下萌发生长，却是在大战中破土而出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诸如在化学工业（毒气的生产）、在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在加速。在技术装备战的恐怖景象中呈现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显露出首先出现在战场上抽象“劳动”的新形态。有一位工人在战地发出的书信中写道：“昨天我们进行了沉重的浴血劳动”（转引自：Ulrich/Ziemann, 1994, 第85页），这可不仅仅意指用其他手段继续从事战前的劳动。不久前还满脑军刀梦的同一批男人们现在眼见着飞机冲向自己和着沉重履带的铁甲“坦克”压向自己。在毒气战中，那些衣冠禽兽的比喻终于成为现实：双方的战争勇士们变成人类属性的实验老鼠，成了化学工业的实验品。法国将军莫尔达克（Mordacq）这样描述最初的几场毒气攻击战之一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到处都在像潮水般地后退……到处都是逃窜者，后备军士兵、非洲士兵、狙击手、佐何夫轻步兵、炮兵，他们手无寸铁，惊惶失措，脱下或敞开军服，摘下衬领，像神经错乱者一样惶遽逃逸，呼喊着重要水喝，吐着血沫，有些士兵甚至在地上翻滚，难以喘息……仓皇逃命的不



再是士兵，而是突然之间发疯的可怜生灵。沿着运河俱是同一幅画面：两岸都聚集着一群不幸的疯狂者，为减轻痛苦的折磨而呼喊着想喝水……”（转引自：Heydecker, 1997, 第 278 页）

这样的场面除了战争之外还表示了首先由战壕里近似“企业经济”的极端纪律性预示出的资本主义苛求所拥有的一种新质和一种“劳动”的密集化。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承诺和预言的那样，工厂和办公室的纪律以社会民主的形式深入人心，作为工人运动的价值观念有益于战争机器的运转。一位前线的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诉说自己第一次交战中的感受：

“死者中有些样子十分可怕……鲜血、紧握的手、呆滞失神的双目、扭曲变形的面容。许多阵亡者手里死死握住步枪，另一些人满手攥着泥土或在拼死搏斗中拔起的草……诸如胆量、勇敢之类都无从谈起，因为实际上的确只有可怕的纪律，只有驱使士兵向前冲和去送命的逼迫。”（转引自：Ulrich/Ziemann, 出处同上，第 87 页）

这似乎表明，战争之后再也不能够回到 1914 年之前年代的生产和劳动条件；于战壕里几乎已经训练有成的“劳动”和纪律的密集化或精确化已证明是不可逆转的。这不仅要归功于在战争中惊人地加快了速度的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随之出现的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变化。此后的日常生活再也不会似从前的样子。这同时也涉及交流的种种形式：

“大众传播在世界大战中才获得它现代的格局：此前在极大程度上定居某地的、没有文字的各处居民现在同样被送

往‘所有的国家’，可以毫无菲薄嘲弄之意地说，这种流动带来了传播的发展前景并唤起了传播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后来的公众舆论。上百万封战地书信……对于下层社会的醒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农民，他们在战争中首次被迫并且习惯于用书面的形式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境况。当然，必须注意到的是，在世界大战中成为日常生活现实的公众宣传除了其直接目的之外，在传播结构以及听、视和读的习惯方面都引起了何等巨大变化。没有这些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先驱们，就无法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宣传。”(Krumreich, 1996, 第15及下页)

如果“传播的发展前景”和一种“下层社会的醒悟”只能以军国主义公众宣传、战争机器的通讯网络和一个走向死神的炮灰的战地书信的形式进入社会生活的话，这便不是菲薄的嘲弄，而是对继续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已成为冷峻事实的嘲弄。事实上，这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以后大众民主的公众舆论原本的、血迹斑斑的根基，这一大众民主的公众舆论就这样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边沁(Bentham)结构体系的真面目。因为这种包含着自我强暴的“醒悟”已经先验地预构成形和疏浚航道，并受资本主义的世界机器的操纵一直渗透到神经末梢，这部世界机器作为战争机器运转得更快，并把社会在它预先机械地确定下来的轨道上向前推进。正是在这个边沁主义的意义上，全体男性青年在战壕中的挖沟掘土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人力资源“全面化”，而且从技术和社会方面来看都是如此，正像恩斯特·荣格尔在他《钢的雷暴之中》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是真正的多面手，战壕每天向我们提出上千个要求。我们深掘坑道，建造掩体和混凝土板房，布设铁丝网障

碍，修建排水设施，围盖包罩，支撑抵托，平整填补，架高斜切，垫平粪坑，简而言之，我们尽自身之力施展各种手艺。为什么不呢，难道不是所有的阶层和职业都派代表于我们之中吗？这个人做不到的事，那个人准能做。”（Jünger，1990/1920，第53页）

这种马克思曾经梦想过的“全面的人”在他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只能作为一个“通用的人”出现，就这个词最真实的含义而言这种人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他的当然出生地必定是技术装备战的那个泥淖淤积、血浆漫溢的地穴。也正是这个地穴最终喷发出20世纪的大众民主模型。到那时为止，民主的平等只不过是一种法律上和表面上的平等：参加国家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很长时间内并未“按标准尺寸”制定出统一的人物类型来，每个这样类型的人物应只在职务地位和金钱财富方面相互有别而已。而阶层的、籍贯的、职业的和文化的界限还一直如此高不可越，以致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填平文化和社会沟壑的障碍。雷马克在以第一人称叙述骤然起变的局面时回顾了急转直下和童话般地消逝而去的战前时光：“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两个穿着褪色军服的士兵……他知我多少——我就知他多少，以前我们的任何想法从未这样接近过”（Remarque，出处同上，第82页）。只有工业战争的“鲜血磨坊”才创造出不单是“通用的”人的，而且也是统一铸造的大众民主人的20世纪原型：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受着时光推移的揉捏……所有的人都这样，不仅是我们在这里的人如此——以前曾存在的，现在已不算数，并且人们也真的是不再记得它。文化和教育造成的差别已差不多都被抹去，几乎无法辨认得出……这真好比我们从前曾是各个不同国家的钱币，它们被一起熔炼，

如今都有同样的铸造印记。”(Remarque, 出处同上, 第220页)

在“20世纪空前浩劫”的前沿阵地上对人力资源的集体熔化和统一重铸才创造了有效的“民主平等”的基本形式,于是,这个民主的平等也就名副其实地作为一个畸形的怪胎而问世:那个至此还只是勉强实行的在金钱面前的消极平等也只能以在“鲜血磨坊”里死亡和粉身碎骨的消极平等的形式在酝酿着。这个在20世纪处于上升趋势的边沁主义民主的原始形式最终给每个人送来一份平等的样本——当禽兽的平等。大众民主人的原型是那个万人坑里的男人,同样也是那个带着永久记号的幸存者:从未如此地屈辱、顺从和懦弱,从血污中爬出,他终于达到了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治理自己并成为自己的民主“龙形海怪”的成熟程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世界大战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她们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涌向工矿企业中空缺的“工作岗位”,当然首先是到军工企业,尤其是弹药厂。事实上,战争年代里整个妇女就业机会的上升幅度却不如战前高度繁荣的发展时期;此外,军工企业中雇佣妇女的工作也由于大都未受过职业培训的妇女缺乏合格的技术能力而规模有限,并且有意识地规定时间期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就业赢得的公众好评不可以使人忘记此乃权宜之计,无人会希望它在战后持续下去。在‘男人的工作岗位上’雇用妇女本来并不受人欢迎,得到赞赏的是她们在‘男人紧缺’的年代里履行了战时义务。在裁军之后——此为所有重要的社会派别的共识——妇女们应该重新给男人让位。女工们本身对这种期待态度——1918~1919年裁军的过程也与此相符——也十分清楚:在整个战

争年代这种想法遍及公告和印刷品中，并且在不少情况下就等于用劳动合同的方式确定下来，所采取的方式是妇女们在被雇用时必须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字，她们以此声明同意在‘工作岗位的拥有者’返回后被解雇。”（Daniel, 1996, 第163页）

尽管有这些限制，在军火工业中补充妇女就业却是一个深层结构上的和思想史上的转折：官方的民事部门和军事机构一反以往社会生物学主义的所有性别思想，首次正式为动员妇女们就业而做出努力。尽管持久的结构性变革后来才开始，但这个做法为妇女就业开了先河。正如男人在前线那样，妇女们也可以在军工厂的“家里”庄严地加入大众民主的阵营。恰似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在回忆录中记叙的那样：

“总是‘有事发生’。尤其在上夜班时。没有一个夜晚不发生一位或数位妇女累垮在机器旁的情况，由于精疲力竭、饥饿、疾病……在饭厅里几乎天天都有妇女在大声吵闹，有时还令人颓丧地相互殴打，因为据说‘勺子没盛满’。”（转引自：Ullrich, 1994, 第610页）

如果妇女就业这种方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正式接受战争洗礼，这肯定令人喜悦，为的是避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的性质产生误解和让妇女们尽量从一开始就从历史角度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的家园和自己通过听命于他人的抽象“劳动”获得的货币收入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鼠疫和霍乱之间的关系。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的民主方面的报答是很多国家里的妇女得到普选权，大战也同样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突破。使妇女们融入资本主义公众舆论的关键性第一步与在前沿阵地上对男人进行的大众民主“熔

炼”的原型同属一个模式：性别平等也只是作为一种负面的形式出现，即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将人“变成禽兽”的特征。

在大战给予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新的“边沁主义推动力”的环境中，社会民主主义就像在玻璃暖房里一样枝繁叶茂起来。它终于成形和成熟，可以四处插手，并能纵情饮血来庆祝它久已盼望的能以民主的方式加入这同一世界的这一“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Bebel）。对这种思想状态提供了一个可靠证明的是：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于1916年可以说是以一种“消极的国际主义”的姿态用大量印发的小册子发表了恰恰由让·饶勒斯写下的关于“祖国和无产阶级”的一篇论著，把它当作宣传坚持不渝的口号的精神燃料。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恩格贝尔特·佩纳斯托费尔（Engelbert Pernerstorfer）撰写的前言值得逐字细读：

“饶勒斯作为法国人的杰出特点在于他真正的国际主义，这个特点也正是在这些并且是全部非德意志的民族中十分难得的。他尊重和赞许所有的文化，尤其是德意志文化……尽管他本人是法兰西民族的人，但他却没有犯法国人一般常犯的错误，即用法国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错误……他用各民族的万花筒看到人类世界的美妙，其真实性在他看来是人类理想的前提条件。他远离那种把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大杂烩看做人类进步的含混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他是和平爱好者，这并不妨碍他去写一本论述法国军队改革的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中包含的广博的军事知识已足以令人钦佩。因为，在他眼里，保证民族不受侵犯是每个国家的人民至高无上的职责之一……他憎恶战争，却惧怕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他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和人民严阵以待，这只有使法国的军事装备尽可能完善才有可能。他因此而不可能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尽管他内心充满深切和真诚的和平情感。只是军队的组

织建设应是无可指摘的。他对军队的探讨使他这个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编制了一套极为详尽的军队改革系统方案。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本国通行的概念来说这似乎非常不得体。但只有当人们竭力要求社会主义彻底废除祖国和民族思想时，才会如此……饶勒斯本来也就无法阻止的战争使他陷入深邃的困境，每个了解他的活动和个性的人肯定会证实这一点。他是一种最高尚的现代文化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四海皆兄弟不是一个用作标榜的词语，而是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需要。然而，谁会怀疑他在战争爆发后会不满怀热诚和激情地站到他的人民一边。他的行动会似我们的席勒所言：‘不管结果是什么，和你的人民站在一起’。在事关民族命运的时刻，不能精细盘算，不能刚愎自用。他会在心中准备以死尽忠！……饶勒斯首先证明了发展史的必要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我们社会主义者都知道，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但这一认识是否像所希望的那样为广大群众所知，却是个疑问。然而，资本主义本身也不仅有阴暗面，在资本主义内部之中各种相争的势力也为进步起了作用。我们必须希望它继续发展……饶勒斯其次证明了祖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他反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套语：‘工人没有祖国’。但或许饶勒斯和所有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这句话的人都错误地理解了它。或许马克思只想说：‘工人今天没有祖国’。这对于他的时代来说是正确的……但从他那个时代到今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工人有了一个祖国……第三点是饶勒斯指出了民族的文化价值……他认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是对立的……只有怀有民族感情的人，即感觉到明确地和有效地与他人同属一个具体群体的人，才能够以此为起点在思想上升华到世界主义的高度……因此，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最有必要的是重新

坦诚地信奉祖国和民族。这样，其国际主义信仰才是真实的……德国工人在读这本著作时会重新看待某些问题。他们首先会向国际主义的空洞言词告别，就像他们最近充满激情地站到祖国一边那样，他们会继续有觉悟地这样去做，而且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不仅不会损害国际主义，而是贯彻其精神！”（Pernerstorfer, 1916, 第1-12页）

思想上的不忠实和毫不掩饰的狡诈诡辩在这里透过笨拙的语言表达显而易见，的确绝无仅有。在法国导致饶勒斯本人遭枪杀的民族主义激情被作为他的“战术上”的“胜利”来庆祝，这似乎还不够过分，他对祖国的义务、军队的改革和军事行动必要性的令人振奋的详细论述照样还能被用来激励“敌对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以更高程度的人类进步的名义去屠杀他的法国同志。历史上很少有比这个社会主义者领袖更不幸和更悲惨的人物了，他事实上被他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复仇女神致于死地，并在死后仍受其迫害。

但恐惧的回报已经到处都在向社会民主党人招手：因为他们忠实地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并证实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肉体上的一块肉，他们便能够像早已渴望的那样进入权力中心，或者至少进入权力的前厅和后院；社会民主党对“龙形海怪”的追求终于在人类屠宰场里以学习者参与民主管理的方式找到了实践的用武之地。迄今靠边站的社会主义者领袖们摇身一变成为“美妙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家们的小字辈合伙人，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直到牺牲者的尸骨堆积成山之后，社会党人的参政才能够成为通常政务的组成部分。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作为部长进入战时内阁。在德国倒还没到这个地步，但在“跨议会党团委员会”的咨询顾问小组里构成多数派的社会党人是受欢迎的和勤奋的成员；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以这种方式至少对这些刚



踏入权力校门的社会主义者新生们打开了后门和旁门：

“政治上孤立状态的解除属于战争中社会政治的根本变化。战争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促使社会民主党人与政府、官方部门和官员建立联系，尤其是在许多委员会和作为国会各种会议之间最重要的委员会的总委员会里。这超出了正常的议会框架。曾被贬为帝国敌人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政府和其他党派当作对话和谈判伙伴接纳。这个过程在地方基层能够令人更加明显地感觉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战前得以大幅度地拓宽进入官方机构和地区的代表性团体的通道；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选举了不领薪金的市议员之后首次得到市官方机构的承认。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在各地区得到承认的程度上升而由衷地感到满意……”（Mühlhausen, 1994, 第664页）

但肯定的是：最大的喜悦总是满意，首先是在国内；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几百万可怜的牺牲者极其成功地促进了民主的进步，甚至捞到了第一批地方政权的受俸职位，这就使社会民主党感到必须召开一个“国内的帝国党代表大会”。通过这种迷人的方式，奠定社会民主党人合伙的传统和甚至在许多大城市的管理机构中最终占主要地位的局面，这种主要地位也自此渐渐产生出他们自己的一伙宫廷奸党。这些新权贵们的官服上卑鄙肮脏的血迹虽然任何时候都无法洗净，但总是被故意忽略。

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概念以完全特有的方式逐步形成。如果对于尽管受排挤，但已经“成为家养宠物”的工人运动来说，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无非只是资本主义加上社会主义者合伙的“龙形海怪”形式而已，这个基本思想此时就这样开出新的战争社会主义的花朵，并与在德国普遍称为“1914年思想”

的东西相掺杂。这些“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同样也像毫无理性的战争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那样模糊不清的思想，这个意识形态宣传反对“不忠的阿尔比恩（Albion）”（英国）和抵制西欧的“斤斤计较者”的“德意志帝国思想”。其中不仅带有很强的反犹太主义成分，就像威廉二世皇帝一再公开表达的那样，而且主要透露出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追补起来的民族形态所患的那种特殊的精神分裂症：“德国资本主义”本来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实际在本质上带有英雄主义和超验主义，但尽管如此却以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种种形式为了共同幻想出的、同血缘的德意志精神的目标在运转着。

这个被继承下来的、并经由数代人不断编制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与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内部统一”的誓言和接受或颂扬工业世界战争条件下的抽象“劳动”融合成那个包含着一种新型的、无理性的和公开或隐蔽的反犹太国有社会主义的“1914年思想”。正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本是同根所生一样，在大战的推动下，这对反目的兄弟也能共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尚不知晓的结构之中。而且并不仅此而已——它们同时可以在现代化历史的亲密家庭里欢迎作为反目的小兄弟的另一位意识形态——政治怪婴：20世纪的极右派，它作为旧时保守主义残酷的漫画形象，与其轮廓还不清晰的新大众民主从同一个泥血洞窟里爬出来。相互竞争的党派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表面上是如此地势不两立：社会民主党的合伙参政和现代极右派的诞生都源自同一个因世界大战而大大加快了速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在德国，这种发展表现得极为强烈，其范围早已大大超出了社会民主党之外，因为在这里较长时间以来就一直起作用的一股意识形态旋流通过战时的特殊状况直接增强，跨越了各个党派：德国受到敌方的海洋封锁，不得不改由国家为原料进行控制。这

个涉及全社会的项目的总组织者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自由党人犹太裔大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通用电气公司（AEG）总裁和德国帝国主义思想家，他以此成为资本主义领导精英里犹太人成员中的“祖国保卫者”的首领。为了能够胜任此项工作，他必须令人佩服地保持对德国战时浴血同盟的反犹太基调视而不见。1915年12月20日他在一个报告中阐述了国家经济社会大型试验的基本特征：

“先生们！我想向你们报告我们经济作战方案的一个部分，它是史无前例的，会对战争的过程和成就形成巨大的影响，估计将在以后的时间持续发挥作用。这是一个近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法的经济举措，但并不意味着像各种极端的理论所预言和要求的那样。我提供给你们的是一个僵硬刻板的制度的理论纲要，而是一段经历过的生活，这段生活……最终导致了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全面转变，并使一个政府机构越出旧普鲁士国防部的围墙而问世，以令德国的经济能为战争服务……当去年8月4日英国宣战时，发生了令人愤慨和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成了被包围的要塞。陆地被封锁，海洋被封锁，一切要靠自力更生……为了重组国内的经济，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当时有四条道路是可能的和必须要走的。第一：对国内所有的原料加以控制，任何原料都不能自行任意支配……第二：我们必须责令把境外的所有可动用的原料调入国内，只要是调得动的……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可能性是通过工厂制造。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在国内制造出的产品中哪些是不可缺少的和购买不到的……第四：难以获得的原料通过其他容易获得的原料替代……为了完成我们担负起的任务，我们曾需要很多官方部门的配合……完成我们承担的任务首先关系到创造新的法律概念……必须找

到有可能使我们改变经济循环流的基本概念。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征用概念……这个征用概念并不意味着一个商品转为国有财产，而只是对它加以限制，它不能再听凭它自己或者它的所有者的支配，而是要服从更高权力的意志……这一方面朝着国有社会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物资流通不再服从各种力量的自由竞争，而是对其实行了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新的组织形式努力使工业实现自我管理，而且是在较大的范围内……这样，战争经济的概念便从自我管理的本质中脱胎形成，而不是源自放任的自由。在严格的官方监督下成立起诸多军用原料公司……它们以此方式成为体现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形式的股份公司和官方机构的组织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这是一种预示今后时代的经济形式……它是德国创造的一个产品……成为德国和普鲁士制度的又一次荣耀……”（Rathenau, 1929/1915, 第25—58页）

德国的国家战争经济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参战国家家里都有市场隶属于国家政治的类似形式。尽管在德国还留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残余部分，因为（正如拉特瑙指出的那样）财产国有未能全部得以贯彻落实，而只是普遍实行国家调控，然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大多数参与者看来是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社会主义与国家调控的直接等同即以这样的方式在人们的思想中打下根基。1914年11月《金属工人报》就发出欢呼：“社会主义，我们眺望着它”（转引自：Schönhoven, 1994, 第675页）。拉特瑙在一次谈话中也说：“我们已一半迈进了共产主义。”（转引自：Bieber, 1981, 141）一位政府代表在与工会谈判时谈到战争经济的食物供应政策时也发表同样的看法：“我们已经有个社会主义国家了——你们大概不会要求整个的吧！”（出处同上）因此，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一直能

够以普鲁士-德国战争经济的组织奇迹为依据，把“完全的”社会主义作为战争经济的延展为在“无产阶级标志”下的完全的财产国有。甚至普鲁士的将军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也为出现这样的兵营社会主义而感到高兴：

“有两件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必不可免的：国家思想的加强和随之而形成的国家政权，即人民变为军队之后得到强化的国有社会主义……”（转引自：Klönne, 1981, 第 137 页）

这样，大战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大力配合下给国有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阿道夫·瓦格纳所认为的新的推动力。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战争敌方中从前的兄弟姐妹组织相仿）也参加了关于战争目的以及要求兼并、新殖民地、德国在欧洲的最高地位、甚至德意志帝国的世界霸权的辩论。工会的经费大规模投入到战争贷款中。社会民主党人为证明民族同心协力的合理合法而提出的思想从所谓的民主成果受到沙皇和他的“乌合之众”的威胁转为德国的世界市场利益受到英国的威胁，按许多工会干部之言，英国战争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从经济上损害德国（转引自：Bieber, 1981, 第 889 页）。这样的一个倾向本来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抽象“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的正面价值得到采纳和在此基础上“工人的利益”被从民族经济的和国有社会主义的角度赋予定义之后，民族对外竞争的利益（无论是用雅各宾革命党人的还是用改良主义的言辞）就势必成为己任。这个完全没有考虑从根本上形成另一种选择可能性的理论方案的做法把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和工会纳入当时的民族对外竞争的利益，这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行径在大战中已初见端倪。工会领导人特奥多尔·莱帕尔特（Theodor Leipart, 1867~1947）敏感地意识到，工会

“除了强有力地代表工人利益之外同时也早已经把德国工业和德国国民经济的利益确定为自己的目标了”（转引自：Bieber, 1981, 第 222 页）。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温尼希（August Winnig, 1878~1956）后来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推动我们争夺世界市场的力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德国的工人。如今引发战争的政治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而是 200 万以双手从事劳动为生的德国人。”（转引自：Bieber, 1981, 第 889 页）

面对“1914 年思想”旗帜下出现如此多的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工会免不了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装填进部分是新发明的，部分源自至今一直是讥笑对象的反犹太主义这个被误认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小傻兄弟的理论库中的概念。社会民主党人保罗·伦施（Paul Lensch, 1873~1926）首次提到“战争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久之后被右翼保守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圈子所使用，后来又出现在俄国革命中。与此相反，长期以来在反犹太主义者和青年运动方面受欢迎的“人民同盟”的思想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词汇；在这个背景下，自 1915 年产生了可能由拉特瑙创造的“共同经济”概念，它后来指地区和工会的商品生产企业体系。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右翼保守分子共同为一个“民族劳动国家”孵化出“人民合作社”思想。由弗里德里希·瑞曼的“左”派自由党人首先使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通常叫作“战争社会主义”）也在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文章中重新出现就不足为奇了：纳粹党的几乎全部基本词汇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积极协助下“创造性地”问世的。而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名称一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紧密的亲缘关系（为了避免说同一性），只是被各组织之间的表面敌对和不同的意识形态

传统的这类薄膜相互分隔开来。最强硬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肯定没有被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接受，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广泛存在包括少数公开的反战者在内的各种派别。但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派别之中呈现出含有右翼民族主义的、“左”倾激进的、社会生物学主义的、“人民同盟的”和劳动军国主义的多种多样成分的思想混合物，它们大都在后来被美化修饰成互不相容的思潮。然而，大众民主的正式成形，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最终构成了由世界大战导致的结构破裂而形成的内部统一。就像俾斯麦的国有社会主义已展现的那样，德国又先行一步，类似的现象也同时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微弱地显露出来。

在位于低层次上做着肮脏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组织力量的策应下，拉特瑞的战争经济铁腕牢牢地掌握着德意志帝国，使战争机器冒着德国面临的封锁继续保持运转。在“战争社会主义”组织的密切配合下，以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 Hindenburg, 1847~1934）和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为首的最高统帅部（OHL）渐渐演变成真正的权力中心，帝国政府甚至皇帝也相形失色。鲁登道夫被视为处于上升地位的军事和组织天才；他的政体随着战争的继续明显地具有军事独裁统治的形式，并因此而预先展现出二十世纪各式各样现代化独裁统治的很多特征。

不过，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双方的形势就越棘手，尤其是在渐渐筋疲力尽的德意志帝国。参战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预见到如此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的工业大战，也没为此而做准备。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来填塞战争机器的欲壑。食品生产降低到不可置信的最低点：

“由于劳动力减少而受影响尤其严重的农业从1913~1917年期间的生产在德国下降了50%~70%，在俄国下降

了50%，在法国下降了30%~50%。其结果是对百姓的食品实行定量配给供应，例如面包、肉类、马铃薯等。在所有的参战国中，德国首当其冲忍受食品短缺之苦……从1914年起，由粮食委员会来决定面包粉的成分构成，往里添加了一定比例的马铃薯粉，并且限制面包的消费。将油脂用于制造甘油同样限制了食用油脂的消费，其他产品的限制不久便接踵而至……英国……只需对咖啡、黄油等一些从海外进口的产品实行定量供给。法国此外还短缺肉类和食糖……在双重君主政体的奥匈帝国内，与奥地利、斯拉夫国家和给养极其匮乏的军队情况相反，匈牙利没遇到特殊的困难。‘食物中的蛀虫对胃无害’，这是1918年发给各个部队的一份公报所宣称的。在营养不良的公民中蔓延着伤寒，土耳其的死亡率急剧上升。在德国和奥地利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内部，首先是妇女们遭受食品短缺之苦，由于营养不良而月经不调，一段时间内几乎毫无例外地出现了不孕现象。”（Ferro, 1988/1969, 第215及下页）

这些是我们在关于饮食及其质量方面所能听到的陈词滥调。资本主义在和平状况中就已经做到的一切，在战争中它自然更能办得到：即在让广大民众不断和极力提高生产力的时候，甚至把最基本需要的满足压低到十分可怜的水平。一位青年士兵向雷马克抱怨说：“早晨甘蓝面包，中午甘蓝菜肴，晚上甘蓝肉排和甘蓝沙拉”（Remarque, 1952/1928, 第34页）。有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回答他说：“甘蓝做的面包吗？那你们就很幸运了。他们用锯末做面包。”（出处同上）甚至一个名叫恩斯特·荣格尔的人也惊诧道：“一到晚上军厨便摇摇晃晃地到了，送来一份猪食，可能是放了冻僵的喂猪萝卜一起煮的”（Jünger, 1990/1920, 第15页）。“家里”的境况也并不好些，无数文献都证实了这点，



1917年一位汉堡的女市民在信中写道：“人们饥肠辘辘地上床，又饥肠辘辘地起床……永远只有萝卜，没有土豆，没有肉，一律水煮”（转引自：Ullrich，1994，第609页）。一位被困在莱比锡度过战争年月的澳大利亚女公民在信中写道（同于1917年）：

“我们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星期……实际上没有食物——似乎再也没有土豆了——每个人得到半磅所谓的土豆片……我看像是干的土豆皮……我真不知这里可怜的人们是怎样度日的。换成这个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人民都会起来反抗一个把本国人民带入苦难深渊的政府……”（转引自：Schulin，1994，第15页）

换言之：“提高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于数百年工业化之后，在其引以为自豪的作战争机器的特殊性质中，反倒是感觉有必要和有理由，把刚刚费尽力气仁慈地重新确定的土豆吞噬者标准再次取消，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口居住地区，尤其是在德国，被土豆皮标准、喂猪萝卜标准和锯末标准所取代。像恩斯特·荣格尔这样的业余战争艺术家能够把战壕和技术装备战的不幸精心绘制成一种“恐怖美学”，在他名声不佳的著述《内心经历的战斗》中他把用机器进行的屠杀颂扬为“一场壮丽的浴血奋战”，极端推崇“没有被每日的生计问题罩上阴影的伟大命运”（Jünger，1925，第15页）。于是，“猪食”大概就成了把伟大的总体艺术作品搬上舞台的道具之一。那些不具有恐怖美学素质的普通人这时候却开始——为时已晚——摆脱禁锢。

1918年首先在法国军队里发生了哗变，遭到血腥镇压并被掩盖起来。此后，甚至德国人终于也开始造反了，因为他们连死前连一顿凑合一点的餐饭也不再能得到了，而“发战争财的人”和校级军官们却在无拘无束地挥霍。于是便发生了每个孩子都能

在教科书里读到的情况：德意志帝国崩溃了，因为在美国参战后（1917年），协约国占优势的资源就再无法匹敌了。皇冠纷纷滚入尘埃，俄国革命震撼了世界。然而，接受了包括送命在内的几乎所有苛求的、已被驯化了的人力资源在经历这一切后如今怎么还会想到把自己从屠戮人命的世界机器中解放出来呢？延续了几十年的自我献身并不能就这样神速地一笔勾销。威廉·洛姆苏斯根据他的想象也预感到崩溃和革命的来临，但并不将此看作美好的结局，而是最后的嘲讽：

“穿过城市的游行……拘捕……煽动性的演说……妇女们在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要求讨还她们的丈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总归为时已晚。现在需要对子弹给你们留下的一切感到满意和知足。请把被枪炮打断的残废肢体充满柔情地贴在你的胸前……”（Lamszus, 1928/1912, 第147页）

而事实上，经过大众民主思想改造和鲜血洗礼的人力资源在很长时间以来只会按资本主义的思想范畴来构思他们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观念，最终对子弹给他们留下的景况感到知足。战争机器的运转共消耗了近1000万死难者的性命。1918年阿尔卑斯地区的一位阵亡军人的遗孀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

“尊敬的陛下！请允许我向陛下提一个请求。我的丈夫于1914年8月2日奔赴前线，英勇参战……如今他……在西线为国捐躯……因我家境贫寒，所以有没有能力让人把他的遗体运送回来……请允许我向陛下提个请求，请陛下帮助我能用少量的花费得到我的好丈夫的遗体……”（转引自：Ulrich/Ziemann, 1994, 第209页）

革命也大致以这样的风格在进行。资本主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空前浩劫”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如同对着一个哈哈镜，它通过德国“战争社会主义”中两个重要主角和总组织者的个人命运预先映现出来。前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军事天才和最典型的工业独裁者 [政治家和后来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累瑟曼（Gustav Stresemann）称他为“德国的克伦威尔（Cromwell）”]，他简直发了狂，并把他个人的妄想狂症与社会的妄想狂症联结到一起：身患啼泣痉挛症和歇斯底里瘫痪的他（Poliakov, 1988, 25）发展成一个病态的迫害狂，成为疯狂的反犹太主义者，开始信仰日耳曼民族主神渥顿（Tschupik, 1931, 424），像鬼火般地穿越德国的历史直到1937年他寿终。他起先是德国纳粹党的成员和帝国国会议员，后来与他所有的大战中的战友和本民族的血肉同志们翻了脸，因为他最终甚至谴责希特勒把德意志种族出卖给犹太人和罗马教皇（Poliakov, 1988, 29）。作为德国战争经济头目曾肯定与鲁登道夫紧密合作的瓦尔特·拉特瑙成为外交部长，在1922年被任意妄为的极右军官当作“叛徒”、和平条约的“执行政客”和“犹太猪”像条狗一样地枪杀了。

### 亨利·福特和汽车社会的诞生

这次大战的一个根源不仅是任凭摆布和逆来顺受的民众心存的，而且也是资本主义领导精英本身所怀有的对未来不可名状的恐惧。德国经济繁荣年代危机引起的漫长不景气时期直到1890年后才结束，并只是向缓慢的增长过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究竟能否汇总为覆盖全社会的制度，仍一直是个问题。社会和文化性质的最后一些外部障碍虽然通过世界大战被拆除了。但在鲜血磨坊里被熔炼的大众民主模型也必须在经济上纳入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此需要朝着至此还未曾有过的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形式过渡。

为了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困难，资本主义不仅必须荡除那些比较陈旧的文化和社会模式的残余部分，还要荡除它自身内部结构中的一个特殊障碍。原则上每种生产都能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机器、工具、楼房等等）和消费品的生产，马克思称这两类行业为“部门1”和“部门2”。资本逻辑的基本倾向是偏爱生产资料或者资本货物的部门，而对消费品的生产则相对加以限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已经充分说明，它真正的目标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作为媒介的货币以自身为目的而进行的流通便逻辑性地相当于在最广义上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工具的流通，这样的目的性只把消费作为必不可少的弊端来容忍。人最终荒唐地当了他自己的工具的工具，这只不过是这种拜物教式的流通的登峰造极。

这个基本倾向在思维方式史上的根基是资本主义逻辑原本的宗教来源：基督教新教（首先是它的变体——达尔文神学学说）强行要求那些担心自己在上帝面前没有合法资格的人一方面完全像一个傻瓜那样苦干和积累财宝，以示他被上帝看中；另一方面却指示他们不能罪恶地享用这些果实，而是克己吝惜地节省下来，并使其变成更高阶梯上的、以自身为目的新的“劳动”的资料——永无休止。这种怪各地积累财富的陈旧陋习的强制性推动与专制主义军事独裁的金钱欲望同出一辙，都属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本驱动力。

与此完全相吻合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经济中节约费用的合理性，它为了不断重新在自身即目的的祭坛上供奉上省下的时间和经营资金而反对生产者获得舒适和享受。资本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经济神经机能症，它之所以制造出巨额的资金，只是为了无限推迟享受和把这些资金变成新的和更多的资金。而如果消费已不可避免，则要么应对它加以约束和

削减，要么最好它本身就带上一种类似于投资的性质。因此不受限制的生产力大部分都体现为部门1的生产，并首先是生产蒸汽打桩机和大型发动机、火车头、钢轨和炼钢厂，而大众需要的消费品则居后，或者制造那种国家消费需要的大炮和装甲巡洋舰、战斗机和机关枪、监狱和教养院等，自由主义对这种消费的热衷一直就大大超出对其他的消费形式，因为它是违反常情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体系一个整体上的组成部分，而且始终不顾及大众享受的因素。

当然，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的是，得以提高的生产力也部分地进入大众消费品的生产；尤其是在为工业化的起飞做出重要贡献的纺织工业中。在许多其他的生产行业，“廉价的工业制品”也自然而然地用于日常需要。若不如此，资本主义早就不能继续生存并维持其工业的滚雪球式的体系了。但虽然这样，消费仍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堆积如山的资本货物相比几乎只是微不足道的涓涓细流。一方面不加控制地发展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企业经济“理性”鼓励竞争的强制下把雇佣劳动者的普遍收入极力保持在接近于生存最低限度的水平，资本主义这个荒谬的自相矛盾甚至构成其不可避免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这些已被马克思言中。

但是，这种自相矛盾也是资本继续在结构上的进一步充分发展和完全控制人们的一个内在障碍。因为，只要在生产潜力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不仅滚雪球体系重又面临崩溃，而且民众的生活也不会完全被资本主义的逻辑容纳。只要雇佣劳动者是用工资在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就迫不得已自己额外生产一部分食品和用品。为满足自身需要的自然经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妇女身上，直到今天，凡不是通过“挣钱”而得到的一切基本上都归她们去做——而这类行当无论在领导精英们，还是在男性雇佣劳动者看来都是“低贱”的，因为为世界机器而创造价值的活

动的“高尚”与这些行当没有直接的缘分。妇女们注定要干这些，或者作为家庭妇女活动的扩展领域，或者当她们已经“受聘”从事雇佣劳动时，作为她们职业和家务双重负担的一个部分。

除各式各样的自然经济和家庭环境中自足生产之外，资本主义对消费的限制也还给本地和地区性的非资本主义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商品生产留出一定的空间。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占领的这些社会行业部门和边角领域同时也带有自发和执拗的文化特征，即使只令人想起古代农业社会那曾经是丰富多彩和分支广袤的生产者和闲暇文化。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无论怎样都阻碍着把雇佣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彻底分解为由抽象“劳动”和“业余时间”构成的一种机械的时间节拍。虽然战争经济创造了完完全全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原型，但现在需要把在前线训练培养成的全盘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推行到民间平时的正常状态中去。

新型的大众民主也就必须相应地“被采用”，而且超出纯生产的范围，也要进入消费领域。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暗中存有的渴望决非偶然地与工业的流动性的形式联结在一起。这是因为，首先，机械化的流动性最适合使消费变为一个结构上独立的自身即目的体系，并以此令其与世界机器的逻辑相匹配：这种消费与大多数感官和文化享受的对象物不同，即它不可能通过对消费对象本身的使用来体现，而是要求有一种覆盖面十分广袤的具有物质性、组织性和社会性的生产组织流程，以使消费恰如其分地发展成一个有强制力的、在精神世界中扎根的边沁主义的“行为轨迹”，这个轨迹有望把纪律化体系扩大成至此还鲜为人知的规模。

其次，所有消费形式的这种机械化了的流动性与资本货物的特性最接近，因而在经济的意义上也是最合适不过的方式，以使人们甚至还在消费中就摈弃一切执拗性并将其变成他们工具的工具。就铁路的情形而言，这两种要素诚然是分隔开的：作为工业

流动性的直接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本身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纯粹的资本货物，并且越来越多地（一部分出于无利可图的原因，一部分是出于对战争经济—生产组织流程的考虑）被转为国家财产。与此相反，大众私人消费仍被局限于仅仅满足对服务的需求。在这种盲目的发展逻辑中，这个制度所面临的任务在于把资本货物和大众消费这两种要素合二为一。也就是说，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立刻出售生产资金本身来取代体现“服务流动性”的票证——给资本主义的每个人提供一辆自己的私人小火车头！这一谬说的后果随着内燃发动机汽车的发明便已见端倪。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是有关先驱者人之一，他在六十年代初期作回顾时认识到这种“消费—投资”的经济意义，并提出“消费者也在投资”（Katona, 1965, 第36页）的见解。出于这个观点他以资本主义进步的名义批评把消费和投资截然分开的陈旧经济观念，着重阐述了以下对汽车的看法：

“消费者消费，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使用而消耗着农业和工业的产品，这个观念确立了企业家的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统治地位，而相反地把消费者的作用排在第二位。虽然人们总是用言语来称赞消费者，消费者在十九世纪被称为国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一格言从国民经济学本身问世之时起即有之。但是，传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却并不是：消费者的需要和他明确提出的需求属于最具有意义的要素。相反却认为已经证实，消费者既不能够创造收入，又不能够引导收入的使用……（但是）下决心购买一辆汽车却与决定购置房产十分相似。有些私人拥有的汽车……便是同样为创造收入服务……因为消费者所拥有的各种耐久物品在购买的当年内不会报废，而是像企业主拥有的机器那样长期均匀地服务，所以它们是生产的一个节余部分，应该被作为资本看

待……”（Katona，出处同上，第37页，第46页）

对已具雏形的汽车社会的回顾所提出的这个新看法固然是反叛性的：在与消费为最终目的的那个正统的、虚伪的昭示对比之下，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即目的的特性之所以被揭示出来，只是为了通过向寿命长的、未消失在直接享受的、瞬间的、“重型”的、自身即目的的消费品（以汽车为典型代表）过渡而把消费本身纳入基督教新教的拜物理性的高尚情操之中。当然尽管如此，汽车从经济上看仍是纯粹的消费品；在汽车的消费过程中既无价值的转移，也无价值的创造，除非是汽车作为企业的生产资料在使用。尽管如此，卡托纳的论证也有其道理，因为从为了成全资本以自身为目的而把生产和消费合为一体的角度来看，汽车的使用体现了一个质的飞越：只有汽车社会连同它的所有内涵才能够把整个生活环境塑造成资本主义的形态。

然而，在这里供与求之间首先还隔着一道深谷：大众的收入过于低，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造出的汽车过于昂贵，致使这个领域中新一阶段的“投资性大众消费”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消费者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花费在非耐用的消费品上和仅为诸如房租等某些服务而支出，那么，他们就无法节制和积蓄他们的购买力”（Katona，出处同上，第36页）。汽车是“上层社会”花花公子们的奢侈品，它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私人飞机。

有两个传奇人物，他们解决了朝世界机器意义上的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转轨的难题：著名的汽车制造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与他基本齐名的合理化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两人无独有偶都是美国人。因为悄然之中美国人从欧洲老牌世界强国的下风处缓慢但稳健地爬上了资本主义的首席地位。随着全世界工业化程度的加大，两种重要



力量对美国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其一是美国社会的几乎还是资本主义“处女”的性质，美国社会在大规模地灭绝土著居民之后不再需要克服前现代的文化和社​​会障碍，而是能够在没有这方面冲突的情况下直接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发展（正如马克思已经预见到的那样）；其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陆性国内市场的单纯性，这样的国内市场允许完全另一种规模的生产能量和技术上的结构转变，这个规模对于相对狭小和视野受限的欧洲各国民经济来说是不可能的。美国的这个分量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并为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秩序的成型作好了准备，这个新世界秩序的预言家是福特和泰勒。

首先是亨利·福特（1863~1947），密执安一个富裕的农场主的儿子，他远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他展示出的传道士般的热诚，把自己的经营业绩扩展成为“哲学”（在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大胆冒险），并不知不觉地踏上边沁的足迹。随着福特的崛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尤其是工业实践潮流的领导者由英国变为美国，大大早于世界强国政治地位的变换。当“远在背面的欧洲各民族正在发生冲突”时（美国直到1917年才正式参战），这个在那时还鲜为人知的预言家在他于1903年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引进了一系列塑造出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重大革新方案。福特完全与边沁一样，是十足的博爱主义者和功利鼓吹者（但不是纯粹理论上的创立者，而是直接成为工业企业家），他精确地、纲领性地宣布了自己大慈大悲的意图，正如在他大量“工业哲学”回忆录的其中一篇里所道明的那样：

“我意欲为众人制造一种汽车。它之大足够容纳一个家庭，它之小能令一人独自驾驶和照管。它将用最优质的材料，由最出色的工人，并采用现代技术能够构想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来制造。尽管如此，价格将保持低价位，以使每个有

正当收入者能够买得起一辆汽车，用来与他的家庭在上帝自由的、纯净的空气中享受他恩赐的休闲时光。”（Ford, 1923, 第 84 页）

福特当然没有想到，正是资本主义首先对时间、城市建设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才使工业制造的运输工具成为必需品，以便能够寻找“休闲”的区域。至于汽车这种铁皮臭鼬给“上帝自由的、纯净的空气”带来什么后果，20 世纪初叶天真幼稚的技术拜物教对这个问题也还不需要费神。对于这个制度来说至关重要的仅仅是为了继续发展的需要解决投资逻辑、消费逻辑、批量生产和缺乏购买力的消费不足方面的矛盾。就此而言，福特纲领的精髓是指明了“最简单的方法”。在这些话的背后，隐匿着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西。福特在他第一部著作的导言中（这时，实际取得的成绩已经确定无疑了）仔细阐述了他采取的方法的基本特点：

“当大多数工厂主都决心改变产品，而不是他们的生产方法时，我们走了恰恰相反的道路……要求在任何一项工作上使用超出绝对必要的力量，意味着浪费……在这种生产过程中，支付最高的工资，即发放最高的购买力同样是我的目标。因为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成本降到最低点……所以我们有能力使我们的产品与购买力相一致。”（Ford, 出处同上，第 16 及以下数页）

福特思考的是降低成本的老逻辑，但使用的是新手段并力争达到能够克服生产能力和大众购买力之间“差距”的那种程度，而且不损害自身即目的的资本积累逻辑。换言之：不仅成本必须大幅度地降低到有可能提供更加廉价的产品并以此经得起竞争，

而且同时甚至还能够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尽管如此尚可赢得抽象的“赚头”。这个起初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艺术杰作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企业经济的合理性注意到一个此前被忽视的领域：劳动的组织本身及其进行过程中的流动速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福特和泰勒看法一致，泰勒大约在同时把这个领域发展成为“科学管理”或者所谓的“劳动科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版的泰勒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则》（1911）之德译本的前言中，编者同样详细地并且露骨地概括了提出的问题：

“自从大工业……发展成熟以来，领导机构和工程师们曾主要致力于完善机器设备……机器的运转事先已经过深思熟虑，工人们如何完成任务的问题却被留给他们自己来解答……泰勒制……无非是一条尽可能合算地利用人力的途径……泰勒断然否定这种观点，即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付出的劳动与支付的工资等值……如果对于相同的工资额要求做出比以往更多的劳动，而那时的领导者并不知道工人‘实际上’需要多少时间来做自己的工作，那么就谈不上不合理或繁重了。”（Roesler, 1913, 第11页及以下数页）

这里寥寥数语就已经说明，福特提出的在任何工作上都不允许使用“超出绝对必要的力量”这一表面上善意和理智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直言说来就是：在任何动作上都不许使用“超出绝对必要的时间”。这无非意味着一种简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劳动密集，远远超出了至今通过机械设备系统所达到的密集程度。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套设备替代了手工艺工具，这些机械设备在生产者身上贯彻了他人的资本自身即目的的意愿，并驱散了生产者全部的安逸，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披上“劳动科学”的外衣，开始用启蒙理性的刺眼的审讯灯来通透地

照亮机械成套设备和生产者活动之间的整个空间，以捕捉住生产过程中最后剩余的孔隙和角落，创造出“玻璃工人”并向他演示与他在客观上“有可能取得”的成绩之间的每个差距——一言以蔽之，把他最终变成一个机器人。那么，对同时降低产品价格、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博爱奇迹”的惟一解释是，男女工人们被榨取的生命能量实际上要比他们以消费“善举”的形式所收回的额外奖赏多得多。泰勒本人坚决地维护他“科学的企业管理”的主要动机和国家主旨：

“他（工人）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地多工作而用出全部的力量，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开始就故意地在不为人察觉时能少做就尽可能少做工作——远远少于他毋须特别费力就能完成的工作——在很多情况下不超过诚实的日工作量的1/3或者最多一半……工人们暗自或公开地达成协议，尽可能地逃避工作，即有意识地放慢工作速度，以致完不成真正诚实的日工作量……这在工业企业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毫无疑问，普通人在从事任何职业时都倾向于缓慢和舒适的工作速度，只有……在环境的压力下才会加快自己的速度。”（Taylor, 1913, 第12及以下数页）

泰勒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这个问题，他对此如同着了魔，养成侦探般的洞察力和挖空心思想出种种办法，用以持续地观察工人并在他们做每个动作时仔细地察看他们的手指——一个真正的边沁工程！这个新型“劳动科学家”在谈到对一家滚珠轴承厂的年轻妇女进行的暗中侦察时说：

“从一个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是，人们相信女孩子们一天要工作十个半个小时，实际上其中的大

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地度过的……正如这个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至今女孩子们在半停止的工作状态中度过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工作……”（Taylor，出处同上，第91及以下数页）

为了谴责这种“怠工行为”和搜集精确的数据资料，泰勒采用了“时间和动作研究”的绝妙概念：使用自此之后臭名远扬的跑表把所有的动作都分解成子过程并精确地审查，目的是结束“雇主们对完成任务……所要求的最低时间的无知”状况（出处同上，第17页）和通过科学的客观性来突破雇佣劳动者的“性格弱点”。与此同时，泰勒甚至把他的那些并非自愿的受验者的个人特点作为嘲弄对象：

“例如我对一位生来就精力充沛的工人做时间调查，他总是以每小时三四里的速度走完上班和回家的路程，甚至经常在下班后一路小跑回家。然而，一走进工厂大门他就把脚步放慢到大约每小时一里的速度。假如他推着一辆有装载物的手推车向前走，他的步伐就相当快，即使在上坡时也如此，目的是尽可能地快速结束工作。在推着空车回去的路上他又重新回到每小时最多一里的慢速步伐，并利用一切机会停住脚步，以致每时每刻都让人以为他会就地坐下。”（出处同上，第19页）

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作的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不再允许“一路小跑”，最多也就能爬行，否则就没达到“诚实的日工作量”。出于这样的想法，泰勒的目标是：在工作过程中“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动作，用快的动作代替慢的动作，用经济的动作代替不经济的动作。”（出处同上，第24页）

为此当然有必要剥夺生产者们通过口头传授、观察和经验获得的淳朴的“劳动知识”，以便取而代之地将其在管理时以通过“分类”、表格等客观化的新形式加以浓缩提纯并清除掉所有的疲沓怠工成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后来在对泰勒主义提出批评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泰勒主义用他科学客观性的仪态表示的“似乎是一种‘劳动的科学’，而实际上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管理其他人的劳动的科学”（Braverman, 1977, 第76页）。这样，从拉丁文词语manus（手）和agere（引导）派生出的概念Management（管理）的语义以最出色的方式在人的身上得到证实：“英语动词to manage……原本的意思是训练马的所有奔跑步法，让马在跑马场进行练习……”（Braverman, 出处同上, 第61页）。

这个发展了的边沁主义的问题完全在于，在工作量的监控和消费额外补偿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中保持资本主义的以自身即目的，以使人力资源为自己的（为了全盘资本主义化而必要的）消费向压榨和监制付出二至三倍的代价。在前线把人当作实验室老鼠的训练现在必须在平民的生产过程中使“劳动科学性地”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甚至那些最低级的职业活动的“大脑功效”能够从直接生产者传输到“美妙的”机器的士官们那里：

“一种科学方法的发明带动起一系列规则、法律和公式的建立，它们取代了各位工人的个人任意判断。只有当它们被系统地记录成文和汇总起来，才能有成效地被应用。科学记载的实际应用要求有保存这些书籍、统计数字等的一个空间和一张使进行计划调度的脑力劳动者能在上面工作的桌子。以往在旧体制下所有的脑力劳动都由工人顺带做了，其结果成为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如今在新体制下脑力劳动必不可避免地要由领导层来做，并且要与科学地建立起来的法规

相一致……”（出处同上，第40页）

丝毫不能听任任何偶然，直言道明：即不给工人们的自我判断留有任何余地和存有丝毫侥幸。泰勒甚至提出了一种“铲运科学”（出处同上，第68页），他首次得以证明以这种方法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是在柏利恒钢厂里，而且是以一个劳工队装卸生铁为重要例证：

“一个生铁装卸工人俯身躬腰，拿起一条约重42公斤的铁锭，扛起它走出数步，然后把它扔在地上或者堆放在一个垛上……我们断定，这个劳工队每个工人的平均装卸量大概是每天12.5吨；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进行深入调查时我们发现，一个一流的生铁装卸工人每天应该完成的装卸量不是12.5吨，而是45至48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项工作是在没有停顿、工人之间不发生争执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工人们在完成每天47吨的装卸量时比以前完成12.5吨时更愉快和更满意……”（出处同上，第45页）

这样一种对人的极端客观化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谨慎地加以筹划，明确地说：必须首先找到一个特殊的白痴来以儆效尤。愚昧与（完全与一般公民对“合理性”的理解相反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个人工作能力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具体的企业研究中一再对此做出判断。从对霍索恩的西部电厂所做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是：车间内工作效率最低的女工在做智力测试时排位第一，在做灵巧测试时排位第三；工作效率最高的女工在做灵巧性测试时排位第七，在做智力测试时排位倒数第一。（转引自：Braverman，出处同上，第84页）泰勒找到的一位名叫施密特（Schmidt）的德国傻瓜作为其工作效率的测

试对象（这位劳动科学家已经知道，最大的劳动愚痴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所采取的做法富有启示，并达到了一种极为放肆的程度，因此值得详细引述：

“在与工人打交道中总是一次只找出惟一的一个人来，新体制已将此确定为不可动摇的规则……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到一个能够从他开始的合适人选。所以，我们用约三天到四天的时间仔细地观察考虑范围之内的75个人员。最终我们注意到四个人，他们在体力上看起来很适合每天装卸47吨生铁……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仔细考察的对象。我们尽实际可能做到的去调查他们生活的历史状况，深入调查的内容涉及到他们的性格、习惯和事业心。我们终于找出一个……能够从他最好地入手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矮小敦实的德裔宾夕法尼亚州人……我们愿把他叫做施密特。我们的任务是让施密特能够做到每天装卸47吨生铁，然而却不影响他的生活乐趣，反让他对此感到喜悦和幸福。我们采取了下述做法。施密特被从装卸工中叫出来，与他进行了以下这番谈话：‘施密特，您是一个头等的劳动力吗？’——‘啊，我不懂您的意思？’——……‘直话直说吧！我想知道您是一个头等的劳动力还是一个与其余低廉的工人一样的人。我想知道，是否他们每天想挣1.85美元或者您对1.15美元感到满意，也就是满足于他们那些低廉工人所挣的钱数。’——‘每天想挣1.85美元，这就叫做头等劳动力吗？好吧，那我是。’——‘您让我感到生气。您当然每天想挣1.85美元。这谁都想。您知道得相当清楚，这与您是否是一个头等劳动力没多大关系……假如你现在是个头等劳动力，那么您明天就按照这个人说的话去做，并且是从早到晚。假如他说，您应该搬起一个铁锭，然后把它运走，那您就搬起一个铁锭，然



后把它运走！假如他说，你应该坐下休息，那么您就坐下。您整天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去做。此外还要做到的是不要顶嘴！一个头等劳动力是一个严格按照对他的要求去做的工人，而且不能反驳……’……这近乎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在与人谈话……但面对像我们的朋友这样一个思想迟钝的人，这种方式就是十分恰当和完全不是不友好的，尤其是它达到了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对他有吸引力的更高工资的目的；并同时把他的注意力从他或许会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艰苦工作引开，如果这已经引起他注意的话……施密特开始工作，他旁边站着一个人作为老师的人，按照有规律的时间间隔向他发话：‘现在您搬起一块铁锭，然后把它运走！现在您坐下休息！’等等。每当他接到工作的命令，他就工作，每当他接到休息的命令，他就休息，在下午五点半钟时，他把47.5吨生铁装上火车车厢。我在伯利恒的整整三年里他始终以这种速度做工，并无可指摘地完成这个所要求的工作定额。他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所挣的平均工资超过1.85美元……他得到的工资比其他不按这个定额制工作的工人高出60%……”（Taylor，出处同上，第45及以下数页）

要想不去注意工资提高80%和工作量增加370%以上的对比，人们的确必须是一个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傻瓜才行。这当然也是以各种不同方式缩短工作时间的回旋余地，资本以自身为目的的积累决不会因此而受到妨碍。那些“魔鬼的磨坊”便以此达到了一种新质——在抽取多倍的生命能量的同时把生产者的注意力引向工资和商品消费已成为可能，目的是因此而更有把握地把他们连血带肉通通并吞入世界机器——真是恶魔般地阴险。为了完美无瑕地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亨利·福特必须做的就只要把泰勒的“劳动科学”运用到“合适的”核心产品上。他在底特律的

海兰帕克新汽车厂一跃而成为新方法的实验室。生产的各个部分一个接一个地被分析和调整，每道工序都被分解成多个动作过程。例如福特对活塞杆的安装过程作了以下的描写：

“整个过程简单之极。工人们从活塞中抽出活塞销，在销上涂上润滑油，把连杆装到它的位置上，把活塞销穿过连杆和活塞，拧上一个螺丝，再拧上另一个，任务也就完成了。工长对整个过程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却无法发现此过程为何需要整整3分钟。他因此用跑表来分析各种不同动作，发现在一个9小时的工作日中有4个小时在走来走去中消逝。工人们绝对没有离去，但为了取材料和把完成的部件放到一旁，他们必须来回走动。在这整个过程之中，每个工人要做8个不同的动作。工长便拟定出一个新计划，采取的方法是把整个工序分解为三部分操作：在工作台上安装一个滑板，在每边安置三个工人，再在一端放上一个监工。工人不再独自完成全部的动作，他现在只做第三步的操作——只要尽可能地多做，不再来回走动。这个生产组的工人由28人减至14人。28人工作量的最高记录曾达到每天170件。今天7个人在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完成2600件。计算出节省的总量大概是多此一举吧！”（Ford，出处同上，第102及下页）

可惜并非多此一举的是要注意到这对生产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曾经在工厂工作过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微乎其微的休息和调剂是多么的重要，在某人去取材料时，与在另外一张工作台旁的人聊上几句等等，以在已异化的生产过程中找到“令人感到还可忍受”的因素，无论它们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而一个由时间节拍来决定的工序却把生产者钉牢在他们的位置上，把材料

传送过来，并无情地要求减少动作，这种生产过程引入的绝境把劳动的痛苦提升到最高的极限——然而，这个边沁主义的恶毒的这种新质居然也能被确定为普遍的常态！

诸如重新组织活塞杆安装工作这样的“劳动科学”方法在福特的企业里已然有进一步革新的支持：即装配线，或后来得名的、臭名昭著的流水作业线。这些设备绝非完全新颖。福特很具典型性地从芝加哥的屠宰场看会了这个原理；他自己说，他的流水作业线近似于“芝加哥的肉包装工在将牛肉作分类处理时使用的滑轨”。（出处同上，第94页）然而在其他行业中流水线也已经自世纪之交以来普及开来，例如饮料生产和食品包装。著名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是第一代贫穷的西西里移民的儿子，在他的回忆录中形象地描写了当年孩童时代的心灵创伤，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在流水线旁被剥夺人的尊严——早在亨利·福特时代之前便是这样：

“我用孩子的目光朝妈妈看去。她的脚长满血泡，终日地站立着，我知道，她的双脚永不会治愈；整天在橄榄油厂难闻的雾气中站立着——每天10个小时为每星期10个美元——用飞快的双手把标签贴到她从无尽无休的流水线上机械地拿起的罐头上：罐头，罐头，罐头，随着咣当作响的链式传动带发出的女巫般的格格狞笑声，丁零当郎、摇摇晃晃地驶过来。我朝妈妈的脸上看去，看着她壮实的农民脸庞，她的脸这时候由于劳累发着湿润的光，她的头点着、点着、点着——一个被用链条栓在一个怪物的节奏上的机器人——不敢擦一下额头上成绉的头发——生怕打破这种致命的单调的魔力。”（Capra, 1992/1971, 第447页）

诚然，福特的流水作业线的新质在于，流水作业并不是独自

存在，而是被嵌入对全部生产的“劳动科学”进行合理化的整套方案之中。流水线在此背景之下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即使福特自己竭力强调流水装配的特殊意义，但也像泰勒一样不加掩饰地有意识把男女工人们贬低为听凭摆布的机械：

“安装工作的第一个进步是我们把工作向工人送去，而不是反过来……在安装时遵循的基本规则是：1. 按照将要完成的各个操作的前后顺序安排工具及工人，以使在组装的过程中每个零件经过的路程尽可能地短。2. 使用传送带或其他的运输工具，以使工人在完成操作后总是能将他加工完毕的零件在原位置……放下……3. 使用装配作业线，使需要组装的零件在手工操作的间隙中传送过来和传送过去。遵守这些基本规则的最终结果是降低对劳动者思想活动的要求和把他的动作压缩到最低程度。他必须尽可能只用同一个动作做完同一个事情……我们大约在1913年4月1日进行了装配作业线的首次试验，将它用于飞轮磁铁的组装……以前当我们这里的整个制造过程还是由单个工人一手完成时，这个工人在一个9小时的工作日里能够完成35至40块磁铁，也就是说，他装配每块需要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后来，他的工作被分解为29个不同的单个动作，以此方式组装所需要的时间降至13分10秒。1914年我们把传送带升高了20厘米，使完成时间降低到7分钟。经过对需要完成工作的速度进一步进行若干次尝试后把安装时间减低到了5分钟。这个结果可简单地总结为：借助科学的试验，一个工人今天能够完成仅隔短短的几年前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四倍。”（Ford，出处同上，第93及下页）

这个结果与泰勒从他那德国生铁装卸工傻瓜身上得出的结果

几乎相同：从男女工人们身上压榨出的 300%~400% 的效率增幅使一个新型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有了余地。导致这个“奇迹”出现的当然不仅仅是泰勒的“劳动科学”（时间和动作研究）和流水作业。福特的生产方法也使许多常常是在流水作业的实践中刚开发出来的新机床得以用到现在完全被监控的生产过程中：

“冷却器是个很复杂的情况，焊接要求一定的技巧。它由 95 根管子组成，用手准确装入和焊接曾是一件费力耗时的事情，也是对耐心和技巧的考验。今天全部的工作由一部机器完成，它在 8 小时内生产 1200 个散热器空心体，这些散热器空心体以机械的方法引导穿过一个加热炉，在炉子里被焊接。钣金工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成为多余……倘若一台机器实现了自动化运行，就被投入使用。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手工操作最终能以这种最出色和最廉价的方式进行。”（Ford，出处同上，第 103 及下页）

新型的机床、自动装置和流水作业的这种组合已经展现出到时候必然会向大规模自动化过渡的工业生产过程的道路；然而只要尽量消耗人的劳动力仍然是普遍状况的话，则每台新机器和每个自动化步骤就总是只服务于人力资源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他有权得到必需的每一秒钟，得不到超出此限度的任何一秒”（Ford，出处同上，第 95 页）。提高产品部件和型号的标准化也是为此同一目的：自 1909 年以来福特汽车厂就只制造一种汽车，即著名的“T 型”车，这种车型在所有的方面完全实现了标准化，并使其他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潜力充分得到发挥。对此福特用讽刺的口吻说：“每个顾客都可以让人随便给他的车涂颜色，如果车只是黑颜色的话。”（出处同上，第 83 页）只有“劳动科

学”、流水作业、新的机床和标准化越来越精细的组合才使福特生产方式的模型不可战胜，并且树立起那个新型工业体系的典范，这个典范不久之后便像所有早先的发展阶段一样转化成“已自动化了的工人阶级”的自然习性。

这种对人的客体化大大超出以往的工厂体制，其必然后果是不仅仅时间，而且连空间都受到管辖和种种限制——恰如对待实验室的老鼠。福特也不无自豪地描绘了在他科学的生产设备中的这个“已合理化的空间”机制：

“每道工序进行时工人所需要的空间都被精确地测量出来；当然不可以让他太挤——这样可能会是一种浪费。但如果他和他的机器要求的空间超出所必需的，则同样也是浪费。所以，我们的机器要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厂里都排列得紧密。在一个外行者看来，它们似乎都是上下重叠地堆放在一起；然而，它们却是按照科学的方法置放的，不仅是按照不同工序的顺序，而且还按照保证每个工人必需的每平方英寸空间的体系来排列，但尽可能不多提供每一平方英寸，更别谈一平方英尺了。我们不把工厂的楼房建成公园。”（出处同上，第131及下页）

把资本主义的时间-空间架构中尚存的最后效能也用尽用绝，这种锱铢必较不放过任何可榨取的人的生产潜力，哪怕是一丁点。福特无意中不仅在更高发展水平上重复着边沁的那些方针，而且也心安理得和慈悲为怀地侃侃道出那个名叫曼德维尔的人的刻薄的想法，此人早在18世纪就让盲人和病人都不得安歇——如今有从头至尾组织的严密得多的一整套的“美妙机器”设备可用，实施可能性远远大于两个资本主义世纪之前：

“病人和残废者处处皆有。普遍持有的比较宽宏大度的看法是：把所有没有体力劳动能力的人推给社会来承担……假如把盲人或残废者安置在正确的岗位上，他就能够做与完全健康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和获得同样的报酬……这个国民经济的救助和节约系统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一般情况下，一个工人在受伤时得到无工作能力的书面证明被看做是理所当然……但总是有一段时间的康复期，尤其是在骨折的情况下，但此类人员中的某些人完全能够工作……我们对卧床养病的人做了一些试验——对允许直身坐着的病人。我们在床的铺盖上铺上黑色的油布，让病人在床上往小销子上拧螺丝……”（出处同上，第124及以下数页）

让无望地被剔除的个人得不到任何慈悲的“自行负责”的基督教新教—自由主义原则可以说获得了新的成功：不劳动者不得食（在人力资源彻底地对资本主义“不适用”的情况下得出这个同时也是福特的工业哲学提出的毁灭“不配生存的生命”的“种族生物学”的结论，只是往前迈了小小的一步）。而且厚颜无耻地强加给人们这种想法：他们自我尊重的惟一形式必须是为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怪物服务，并且只以此种方式去“挣到”生命。只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会让在卧榻上垂死挣扎的人去“往小销子上拧螺丝”。福特想都不想稍加粉饰一下包含着连病人和残疾人都严加苛求的效率密集化造成的新质上的摧残折磨方式的这样一个生产过程的异化。相反，他竟然拟定了一套自觉地自我异化的欢乐纲领，犹如一个真正的抽象“劳动”理当如此：

“为了能使各个个人和部门之间融洽和睦而举行会议是完全多余的。为了紧密合作，并不需要相互之间有友爱。过度的伙伴关系甚至是有害无益……我们在工作时必须严肃认

真；如果我们是在享受，那么也同样全心尽情。把这两个不同的方面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惟一的目标应该是做好工作和为此获得一份好收入……我们的组织安排贯彻到每个细节之中，各个部门相互是如此地嵌接齿合，以至人们哪怕只是暂时地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办事也绝无可能性……在这里几乎不存在个人关系——大家做完自己的工作，然后重返家门——一个工厂终究不是沙龙。”（出处同上，第107页，第129及以下数页）

泰勒-福特-混合体露骨的卑鄙无耻之所以能够胜利完全是因为人力资源的过分衰竭和过分驯化，以致一直不能从根本上抵御几乎是被认为不可能的又一新的苛求形式。也就是说，倘若效率密集化所取得的飞跃能够首次无损于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而同时可以降低物价、提高工资和在某种程度上缩减工作时间，那么被榨取的人力资源与他们那些无主体的吸血鬼的新领导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就完全带有双重性质。福特可以挥动闻所未闻的所谓增加收入的粗香肠许愿，它的吸引力把数百万人几乎都变成那个名叫施密特的第一个德国傻瓜：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可能性，并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练就的短浅的时间视野中，表面上超常提高了的额外报酬带来的一时满足可以令人忘却所付出的生命能量代价。

早在1914年的春季，还在欧洲爆发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出现为社会经济的首次鸣锣开道：福特宣布，把日工资从原来的2.3美元提高到5美元——也就是增加一倍以上。同时他声明，在他的企业里开始工人运动长期争取而未果的8小时工作日，这在当时每星期工作6天的情况下意味着每星期的工作时间为48小时。20世纪20年代，他甚至短时间尝试性地实行过5天工作周，这一水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也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里）



才普及开来。虽然不久之后的结果表明，5美元的日工资并没有普遍兑现，5天的工作周也很快被撤消。但尽管如此，与原来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标准相比差额仍是很可观的，致使福特的革新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几乎是一种陶醉，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如此，管理者也如此。福特当然也有充分理由这样宣告：自从1913年引进了流水作业线以来工人们成批地离去，他的方法激起强烈的愤慨，许多人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工作”。在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使提高多倍和持续上升的生产率和劳动密集化能够顺利地向前推进并仍旧获取巨大的超额利润。

福特的造物们当然知道，他们的生命被从骨头里吸走。在底特律有人嘲笑这些高薪国王们，说他们年轻的妻子必须从其他男人那里获得情爱欢愉，因为福特的工人甚至在“长”周末都对此麻木不仁。但无论如何，被信以为真的高工资的诱惑力仍然比所有的顾虑和所有的逻辑思考要强大：在生命的历程中只要是能够短暂地享受到更高价值的商品消费的喜悦似乎产生出与以前只有关于殖民地的许诺才曾有过的类似吸引力——只不过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新的“内部”殖民地化的对象是被诱惑的雇佣工人本身的身体和感觉。

汽车，这个色情化和散发臭气的铁皮堆，对于被驯化成“家养宠”的男性雇佣工人阶级来说成为一个比所有人类情妇更美丽动人、更令人垂涎的妖精。因为拥有自己的豪华机动运载工具的梦想曾一直是一种上层社会的奢侈，现在对普通流水线工人来说也可梦想成真了，至少在美国如此。福特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出过多承诺。使这种“投资消费”在当时已然是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上首次成为大众消费的因素并不见得是工资的提高，而主要是生产成本的极度下降和因此得以使汽车的价格锐减。福特汽车厂生产率上升的千巴巴的数字读起来却如同一个童话。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相应规模的传统的汽车厂平均年产量最高为15000

辆的话，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厂在1913~1914经营年度的产量已千真万确地达到了248317辆，这些车按照相应下降的价格还都毫不费力地被销售出去。并且增长仍在继续：“到1925年，生产的组织能够使单日的产量几乎相当于以前生产T型车的历史时期全年的总额”（Braver，出处同上，第116页）。

亨利·福特的这颗明星不久后能在全世界升起也就不足为奇。福特汽车公司不仅在美国蓬勃发展，而且——继诺贝尔先生的军火帝国之后——成为第一批在欧洲开设分厂的国际性大企业之一，同样也在德国设有分厂。是的，这的确是个童话，最邪恶的童话之一：因为人们真似在童话中一样开始在一种全新的和更高的程度上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抵押自己的生命。在前线那巨大的人类屠宰场里对实验室老鼠进行的试验已大功告成；为了在响起铃声的时候得到扔在面前的低廉的商品消费饲料作为渴求的报酬，人力资源准备辛苦劳作到精疲力竭。一份同时代的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报道讽刺了在柏林福特汽车厂中工作条件的这种新质：

“每天的最高工资是20马克！这是柏林金属工业中许许多多计件工人干整整一个星期得到的数目。这就是柏林饥饿的金属加工工人涌向福特并且甘愿放弃全部人的尊严降为没有灵魂的自动工作机器的秘密所在……这个制度的作用在半小时的午休到来时显得最充分。所有的人都带着满手满脸污垢以冲锋的速度涌向西港口的饭厅，那里连堂馆也传染上福特制。桌子上在确定的位置已经摆好确定的玻璃杯和餐具。在大家吞噬饭菜时，我们有时间琢磨他们的容貌。有一种典型福特式人。这些鼻子、下巴和颧骨都尖尖地向外突出的灰白色面孔、这些紧张地凝视着的眼睛和神经质的动作都似曾相识，我们曾于何处见过呢？饭菜被飞快地吞下。剩余的午休时间正好够解手或者抽一支烟、发一会儿愣。没有人读报

纸！‘福特僵尸’，西港口的工人们言道……（此为福特厂的一个工人的讲述）：他从前在新汽车公司当钻工时每星期挣将近30马克，由于“工作缺乏”被解雇。他9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直到通过一个熟人才终于钻进了福特天堂。如今他身在九重天上！他已经付清债务，买了一套西装，妻儿都有了过冬的衣物。每天半公斤碎牛肉也总算买得起了——‘但必须得有这些，’他补充说，‘否则无法经受住厂里的活计！’……以前他加入过政治和工会组织，……这一切他现在都无心参加了。读报也由他妻子代劳……‘如果我在到家后能躺上一个小时，就很满意了！’……在回答这种活他打算干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时，他耸耸肩。‘目前我还打算干下去。我再也不愿承受长时间的失业了。但是，上帝，我得快跑了！’——他跑开去。此刻，饭厅完全空了。看着他们奔跑离去的样子，我们想起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面孔了。在经过30小时密集炮火之后的索姆河边！”（转引自：Abelshäuser u.a., 1985, 第48及下页）

## 人的合理化

由泰勒和福特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无疑具有产品革新和生产过程革新的双重性质：汽车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至此只是在少量最高档的消费部分中一种处于边缘位置的贵重商品，它在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产品。在汽车成为大众化商品时，它脱颖而出，不再是混同于其他产品的一种单纯的商品：它开始席卷整个的空间和时间视野，为生产和“业余时间”的一体化做准备，逐渐具有直至渗入到私密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社会组织形式，甚至引起对社会的种种虚构和幻

想。即使对此还需要其他多种推动力，资本主义已彻底成为汽车社会。

有了由“劳动科学”和流水作业构成的泰勒-福特式生产过程革新才使向汽车社会的骤变成为可能，这个革新不仅通过对“抽象劳动”进行闻所未闻的密集化和从企业经济角度进行合理化而开创出资本积累一个异乎寻常的新纪元，而且同时还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纪律教育和驯化培训而破天荒地形成将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的新特点。边沁主义的种种心智训练标准从此得以贯彻，直到今天都在起作用。这其中的无耻之处是这种挖空心思地榨取生命能量的做法所具有的伪善性质：不再像早期工业化中那样赤裸裸地用野蛮的和露骨的、常常带有主观专横特征的驱迫来谋求仅仅在短时间内部能够保持的最高工作量；这一方法过早地、并且不能尽其效用地消耗人力资源。这个吸血鬼式的机制同样未停留在边沁所做的一些零散试验的水平上，虽然边沁已经阐述了与外部的组织形式、结构等相结合在一起的“内在行为轨迹”基本思想；但是，纪律化的基本框架仍然不太成熟，无法在所有的层次上自始至终地满足全局性的总方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边沁还必须对大众消费不予考虑，他的方案只涉及生产和资本管理的范围，而消费被继续用早期资本主义的吝啬眼光来看待。进而的诡诈手段是恰恰因其与新的驯化形式叠合的批量性质而作为资本主义悖理的“吝啬的消费财产”接受了“高档次”商品消费本身，这才促成了世界机器朝着完备的方向发起的第二次突破。

泰勒和福特在某种方式上都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范围。这在他们发展过程中的传道特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喋喋不休的业余哲学水平的自我辩白除了纯业务和纯专业合理性之外还显示了这些先驱者是一个新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先锋，即开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一体化新生活方式之先河。泰勒的看法与边沁惊人地一致，他明确强调他的“科学管理”绝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工业

背景下的“铲掘科学”和其他活动的科学，更多的是关系到

“将这些基本思想同样恰当地和同样成功地运用到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用于家政和农庄的管理和领导，手工业和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教堂、慈善机构和大学甚至国家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管理。”（Taylor，出处同上，第5及下页）

也完全在这个意义上亨利·福特（与泰勒不谋而合）的看法格外明确，并且由于他有力得多的强调而作为“仁慈的”社会改革者和未来畅想者出现：

“在我心中重要的是明确地证明我们所采用的思想到处都能够贯彻——它们并不专门与汽车……有关，而几乎可以说也属于通行的法则。我坚信，此法则是自然的法则，我愿意证明它是无可非议的，以示我们的种种想法不仅仅是作为新的想法，而是必须作为一种自然法则来接受。”（Ford，出处同上，第3页）

我们发现的不仅是用自然规律对资本主义的苛求状况做出的老一套解释，而是完全像边沁奸诈的“环形监狱”那样为自己的方案提出在全社会普及的要求：关系到的并不是局部的企业经济成效，而是一个可运用到所有和每个社会机构的一种整体社会模式——根本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如同在120年以前那样，实现严密的监控、征服和自我征服的意愿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出现，它主张的“功利主义”与人类的目标无关，与主观的惬意无关，与美学的标准无关，连与个人的权力要求都无关，惟独与资本抽象地以自身为目的有关。

所以这个全面“人的合理化”的方案具有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神经机能症特点，这个特点突出的代表是边沁或者德·萨德的违反常情的幻想和方案：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对福特-泰勒制的批评中指出的那样，一种带有超越人和社会需要的“效率”的荒唐制度所具有的封闭的内部合理性恰如亚哈（Ahab）船长的境况，他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说：“我所有的手段和方法都是理智的，只是我的目的是荒诞的。”但正是这种荒诞的目的在一种历史性的巨额数量上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积累着生产资料，并且再也无法自拔，用来渗入“手段和方法”的也正是那种荒诞性。第二次工业革命用它的“合理化”重新证实，客观上成为整个社会宗旨的这种狂热幻想的“策划者”不可能是君主们——在以前的人类屠宰场自身产生出的惶悚中不可能，在喷薄欲出的全盘合理化的汽车社会中也同样不可能。作为人，他们更像是值得怜悯的讽刺性人物，显然，正是泰勒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精美样板：

“从心理素质来说，泰勒是对强迫观念着迷的人物的一个超常的例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数自己的脚步，测自己用于各种活动的时间和分析自己的动作，旨在寻找‘效率’。甚至在他飞黄腾达时，他身上也总带着一些被人当作笑料的特点，他出现在车间里时总是引人发笑。他的个人形象就足够会让人把他至少看做神经不正常的怪人……这些特征使他分外适合充当现代资本主义管理预言者的角色，因为，在一个个人身上的神经不正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却为正常，对于社会的作用来说……是求之不得的。”（Braverman，出处同上，第78页）

这绝不是一段纯粹偶然的、人物传记的细节。这些“策划

者”对他人的征服和对自我的征服在每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互为条件；也就在这个方面福特-泰勒制把工业化战争的心理结构置入全社会的民用再生产：泰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鲁士-德意志血统的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型人的美国佬-商务版，这个版本也暴露出恩斯特·荣格尔型人滑稽可笑和神经不正常的面面观。除去他们貌似理性的和/或凶狠的外表，这些势不可挡的预言家们就暴露出只不过是那种嘲笑对象的真面目了，当然是资本主义蜡像馆中那种冰冷的和恰如魔鬼般的嘲笑对象。然而，正在形成的“人的合理化”所具有的强制性的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特征不仅体现在其代表人物身上，而且跨越了泰勒和福特的半瓶子醋哲学一直渗透到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之中，并塑造了整个时代精神。

泰勒著作 1913 年的德国选编者不无理由地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思想与在一年前出版的德国物理学家和科学理论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 1853~1932）论述“唯能命令”的著作的相容性。奥斯特瓦尔德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工作，1909 年因“稀释定律”而获诺贝尔奖，是所谓的“唯能论者”的带头人，唯能论者作为一种自然科学派别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与由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和“桥”协会组成的“一元论者联盟”有联系。在奥斯特瓦尔德、K.W. 比勒（Bührer）和 A. 扎格尔（Saager）的参与合作下，“桥”协会于 1911 年在慕尼黑作为“脑力劳动组织研究所”成立，主要探讨科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中的标准化形式，奥斯特瓦尔德对此用一示例作了描述：

“当很多领域中，尤其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对整个个人类活动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已有一席之地时，对脑力劳动却普遍地，尤其在它已经达到最高发展水平的科学领域中仍然没

有进行组织……如果有人愿意组织的话，也总是只有在最日常的、频繁的而因此便最不需要深思熟虑的那些职务中着手进行统一和协调才能将此意愿实际贯彻落实。于是，比勒便认定纸张规格的调控是组织脑力劳动的基础。如果这个想法像用手枪抵在前胸上那样迫使人们做出决定的话，人们会忍俊不禁，因为像脑力劳动如此高尚的思维 and 一张纸的简单现实这两个何等截然不同的东西怎能有这样紧密的关系。但如果人们想到，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所有的脑力劳动都必须以书面或印刷品的形式出现，脑力劳动的所有组织工作首先要从一丝不苟地整理这样的书面材料和印刷品着手，就会立即认识到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了。”（Ostwald, 1912, 第 15 及以下数页，着重标记为 Ostwald 所加）

尽管某些基础性和日常性职务技术上的标准化自然确实有时能够避免令人心烦的摩擦并使生活轻松起来（闻名的德国工业标准 DIN 就源自奥斯特瓦尔德的协会）；但这要看背景和目标。不难看出，奥斯特瓦尔德和他的并肩战斗者的目标远不止是通过技术减轻负担了。加之所谓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一元论简单地主张上帝和世界的统一，后来甚至于主张物质的统一（如提出“唯物论”）。但奥斯特瓦尔德等提倡的一元论却背离了它在哲学史上〔如以斯宾诺沙（Spinoza）为代表〕的原意，嬗变为强行向人和社会提出的技术术语要求：“一元论即是统一学，一元论这个词用简短的表达方式点明了所有科学的劳动原则。科学也就是思想的统一化……”（Ostwald, 出处同上，第 14 页，着重标记为 Ostwald 所加）。“统一化”是咒语和让人认识极权主义特征的关键术语。关键所在并不完全是从技术上减轻负担，而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的泰勒化，从根本上是在对人用功能主义加以限制的框架里用功能主义限制科学。这个大胆行为的



顶峰即是那个“唯能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中，奥斯特瓦尔德以他对康德抽象的伦理进行解释的“唯能命令”几乎可以说是表达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对命令：

“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解释为能量由已存在的形式向其他形式的转变。目前绝不是所有的能量都同时准备或者适合这种转变的，只有必然被创造出来的能量才如此，所以这类能量被称为**自由能量**……自由能量目前任凭消耗。真是如此，如果它不被消耗掉的话，也自动损耗掉。自由能量也就是所有种类的一切生物都赖以生存的资本……自由能量的获取和相宜地使用便因此而成为每种生命活动的内容，这于所有的生物都一样，从最低级的细菌直至最高级的人类……对于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妥当地对待大自然和所有的同类者的人来说，由此得出一个指导自己行为的一般准则。这个准则指示他目的明确地，即尽可能充分地把自由能量引入所追求的各种形式的目标，不断以此为标准对所有的设施进行监控；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这个意义上去进行改善，旨在尽可能扩大从以原始形式存在的大量自由能量中能够获得目标所需能量的数量。这个普遍存在的倾向，更确切地说，所有人类活动和行为的共同任务，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就是我依照康德的绝对命令建议使用的**唯能命令**，它的意思是**不要浪费任何能量，要尽其所用**。这个简短的格言事实上是所有人类行为最一般的准则，它绝不仅仅对技术性和其他实践性的工作有效，而且作用于人从事的全部职业直至最高尚和最有价值的工作……如果一切都是真正的能量，因为一切都是有效的能量，那么我们会相反地把不能归于能量概念之下的或者在能量原理范围之外发生的所有一切看作**不真实的**，看作与我们生活无关而从我们这里排除

去……我们重申：要想细致地、使全人类尽可能称心如意地构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唯能命令证明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并且，正因为称心如意的事情只会给人带来幸福，所以唯能命令最终完全全意味着科学的指导，目的是使个人和整个人类都通过劳动从一切事情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我们认识到，所有拥有足够智力和意愿以领会一条自然规律的意义和按照自然规律来确立自己意愿的人都不会认为自然规律和本人意愿是相互对立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遵循这种规律与得到最大的幸福是一致的。只有那些无法用这样的方式理解规律性的愚昧落后的人才会力图反对这种自然规律，反对唯能命令……帮助这些愚昧落后者要靠教诲和关怀，要靠一种改进过的思想和向往更高级自然规律的意愿。”（Ostwald，出处同上，第83-97页，着重标记为Ostwald所加）

这证实了一种深层次的怪诞，即热力学的第二条原理完全抽象地和突如其来地用到一般社会行为的指导层面上。但这个不合情理的想法却不给人以任何亲切感，因为它并不来源于任何个人的怪念头。这里，通过奥斯特瓦尔德的大脑在思维的是那种集体的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精神；自曼德维尔和斯密以来实证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反思引起的幽灵般的共鸣令人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这种反思始终只以让生活全方位地服从资本这一“目标形式”为宗旨。福特和泰勒只是暗示的观点被奥斯特瓦尔德发展为整个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然哲学”统一性。这样便完美无缺了，既不缺抽象的自然规律性这个机械的牛顿概念，也不乏使“从细菌到最高级的人类”这些社会性生物顺应自然的过程；既不缺地狱般的边沁主义幸福概念，也不乏与此一脉相承的、对愚昧落后的人类的救世主式的强行赐福。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奥斯

特瓦尔德与此同时无意中用化学家赫尔姆霍茨 (Helmholtz) 的评语扼要地重述了自亚当·斯密以来资本主义的原始隐喻。据说，赫尔姆霍茨曾言道：“他在做这样的工作时常常感到似乎自己在实施自己的思想时是一个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一个意愿的对象，宛似一部在某种权力的影响下必须运转的机器。”(Ostwald, 出处同上, 第 81 页) 这绝非是谴责性的, 而完全是肯定性的提示再次表明, 资本主义以自身为目的的反理性主义和不反思自身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思想如何地同出一辙。奥斯特瓦尔德试图把自己的“唯能命令”也卓有成效地运用到同时代的“种族生物学”上也就不足为奇, 但他几乎转向和平主义自然引起了普遍的惊愕:

“战争在任何时候都在这样的意义上做出一个反面的选择: 战争总是使最强壮的, 甚至最适合打仗的人比所有其他不太适合打仗的人更快地走向毁灭, 所以特别持久的战争完全不能让参战的人民更强大和更卓越, 而相反是更虚弱和更不善战……这里经验性地通过历史得以证明的东西, 也能基于一般原则不费力地演绎推导出来。只有当一种选择成功地阻止那些不合格的竞争者滋生和繁殖, 而使合格的竞争者给子孙后代留下他们的素质, 那么这种选择才会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从这个简单的观点来看, 战争做出了一个反面的选择是确凿无疑的。”(Ostwald, 出处同上, 第 333 及下页)

对和平主义所做的这种离奇的种族生物学的解释(这个解释没有能够阻止它的原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保卫祖国”的呼吁书上签名)很适合“唯能命令”本身很愚蠢的特性, 在奥斯特瓦尔德界定它在社会中的有效范围时, 这种特性同样清晰地显露出来:

“但这个原则以令我都惊讶不已的方式在越来越高层次的领域里是可行的，直到我冷静地面对现实：确实可以通过一句话来表达所有恰当和理智的活动的准则，从穿针引线到治理国家。”（Ostwald，出处同上，第346页）

当这种思想露出无情的真面目时，对这样一种神经不正常的偏执狂发出的嘲笑自然便噎在嗓子里。奥斯特瓦尔德几乎可以说提供了这种社会性神经官能症的一般哲学术语，而福特和泰勒可称做是这种神经机能症的实际革新者和执行者。假如说边沁曾为了资本主义宏观结构及其一般标准（工厂的纪律、按部就班的管理、自觉的勤奋、威严的自我审度）除棱去角地修整了“人的本性”的话，那么福特-泰勒的合理化攻势几乎可以说是边沁主义微观逻辑或者微观经济学的深化：企业经济的成本合理性中所体现的抽象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效率”应该确定为心理上的普遍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奥斯特瓦尔德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由福特和泰勒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的元哲学家。

例如一个强制型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仅数自己的脚步，而且还试图尽可能用空中直线来达到他的种种局部目标，即千方百计通过最短的路程来使“自由能量”最佳地“尽其用”；奥斯特瓦尔德亦将此称为“最小力度原则”。无所事事地闲站、漫行和散步按此原则都是绝不可能的。在进食时，强制型神经官能症努力的方向是为使所提供的食物能作为臆想中最佳状态的唯能使用而提出一个煞费苦心的计划，并毫不留情地加以贯彻；美酒佳肴的品尝、暴饮暴食也使不得了，照此做法甚至单纯地享受一下吃喝在逻辑上也不存在可能性了。在出现神经官能干扰和精神错乱情况时，这种向某一个抽象的强制原则或所谓的功利主义原则做出偏执狂性的屈服的例子不胜枚举。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同样因为与人的生活情趣、舒适和享受、求知欲望或美学塑造毫无关系，而

只是实现自我满足，所以与神经官能症—精神病的结构原理一模一样，诚然是以一个在全社会已客观化的形式。

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抽象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贪婪不是以愿望和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为准绳，而是以“唯能”地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换回生活用品为导向，各种愿望以及现实中的可能性都被强迫纳入生活用品的范围内。一对属于中产阶级的新婚年轻夫妇向我讲述了以下的行为方式：这两个年轻人原本热切渴望的只不过是到加勒比海作一次新婚旅行，他们拥有的资金也比较宽余；但因为继承了一辆野营汽车，就“必须”加以“充分利用”，新婚旅行的地点便改为法国的野营营地——需强调的是，没有服从任何外来的强迫和命令，而是只服从了“节约地利用能量”的内心驱迫。当然不是所有的例子都那么无关紧要。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命令”几乎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基督教新教的守财奴式的贪婪和奠定基础的企业经济成本合理性罩上自然科学面具之后的翻版：因为宇宙也许在百亿年之后会由于缺乏“自由能量”而发生热量死亡（宇宙中能量与物质的退降）（一句绝对无法加以证明的话）“因此”严格地说，“无益地”在海滨上散步就已经是纯粹的浪费！这个荒谬的计算方法绝非牵强附会，它相当精确地描写出企业经济以自身为目的的理性之本质中怪诞的不协调。

尽管奥斯特瓦尔德详尽的自然哲学的唯能说今天已经被忘却，然而它给企业经济核算输入的能量却推动了新型工业的发展，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意识之中保存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这样获得了其时代精神的丰富营养，而且是在所有的领域。福特和泰勒的革新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庸俗哲学的吻合还陆续体现为促进“一体化”的其他新推动力。在这些现象中令人吃惊的是，正在发展壮大起来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在这方面也居然能够从他们的对手那里接过此类中心概念。如同奥斯特瓦尔德毫无罪责地用

种族生物学—唯能的方法甚至推演出和平主义来那样，他和他的朋友们用他们“组织脑力劳动”的设想不仅是助长了全世界范围内新兴的“人的合理化”，而且成为纳粹残暴的强行统一意识形态的帮凶。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建筑和工业设计领域中起着类似的两面作用的是在魏玛和德绍（最后在柏林—施特格利茨）的著名的包豪斯建筑学派，这个艺术和建筑流派从1919～1933年伴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历史，最后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当然也影响到美国。“包豪斯风格”普遍被看做是“现代设计的萌芽”（Wick, 1994, 第14页），成为20世纪的一个现代派传奇——并且也成为一个不幸的悲剧。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艺术和生活的破裂就已令人痛惜，而且一再有人试图改变这种分裂状态。然而作为起因的准则，即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逻辑及其迫使生活屈从于它自身抽象形式的支配的威力，总是被隐去，致使美学只能够剩下一点分离出来的、奢华的部分残存下来。

对现代商品生产制度不作深刻批评地使艺术和生活重新团聚的尝试因此只有两条道路可走：倒退回具有浪漫色彩和倾向于藐视技术的、令人饱享手工业式闲适自得的乌托邦中去，或者相反让艺术消极地溶化到资本主义的技术形式之中——无非是把美学转变为设计。生活世界中的美学元素基本上都成为金钱资本在其社会性的变革过程中以技术和材料作为化身的风格元素。

包豪斯建筑学派和它的先驱者代表着两条道路，这是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痛苦的争论和失望的缘由。然而，在这些方案的自相矛盾对立中一直而且最终占上风的还是简化为资本主义实用设计造型的功能主义。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1861～1927）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早在1902年他就强烈要求，必须“以造就一种与决定了我们现代社会状况全貌

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艺术为目标”（转引自：Wick，1994，第24页）。已完全适应帝国主义国民经济的穆特修斯（Muthesius）一反所有的艺术个性，积极主张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意义上的“客观化”和“典型化”。包豪斯建筑学派后来的领导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思（Walter Gropius）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他在1910年起草了“在艺术统一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共同的房屋建筑协会的纲领”，并把这份方案恰恰呈交给瓦尔特·拉特瑙，这位后来的德国战争经济的组织者。格罗皮乌思的这份纲领读起来就像是建筑领域中的资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知先觉：

“现在，协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结论，并通过工业化的思想把建筑师的艺术工作与企业家的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一个出色的规约因而不能寄希望于强调每个人的个性，而恰恰要通过融合，通过周而复始的节奏，通过统一来体现便于识别和可反复使用的形式……实现房屋建筑工业化想法的关键在于：各个建筑构件在协会的所有设计中都重复使用，并以此实现带来低价格和高收益的大批量生产……”（转引自：Wingler，1975，第26及下页）

格罗皮乌思显然不能区别以技术的实用性或人的舒适感的观点为一方和超越所有社会需要的资本的抽象“目的形式”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在他的带领下甚至在整个包豪斯建筑学派都贯彻了一个“明确的功能主义的基本取向”，以建立惟利是图的“工业的原型”（Wick，1994，第38及下页）。在包豪斯建筑学派以后发展阶段中这种取向更加明显，尤其在汉内斯·迈尔（Hannes Meyer，1889～1954）接任领导的建筑系中是这样。迈尔使包豪斯建筑学派更加面向在工业界的委托书中规定的“典型化”和“标准化”。他作为左派虽然要求“分析建筑的社会

状况”，并强调建筑的“阶级性质”。然而他究竟以此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本人的言论中彰明较著：“为了更好地确定工人和职员家庭的典型居室，对他们的居住情况进行了研究。”（转引自：Wick，1994，第46页）迈尔在1929年全然无辜地使用早已是处于上升趋势的德国纳粹党专用的语言来表述了包豪斯建筑学派的社会政治任务：

“难道今天在德国我们的社会不是在要求数以千计的大众学校、大众花园和大众房屋，数以万计的大众住宅，数以百万计的大众家具吗？……作为塑造者我们是这个大众共同体的服务者。我们的行动就是为大众服务……所以包豪斯建筑学派全部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联合构造生活的各种力量去和谐地安排组建我们的社会……我们当代人只企盼通过艺术认识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循的一种新的客观秩序，企盼一个集体社会的宣言和媒介……新的建筑学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认识论。作为造型学说它是和声的颂歌。作为社会学说它是在一国人民的生活共同体内各种协作力量和个体力量的均衡策略……”（转引自：Wick，1994，第48页）

这不仅是表面上和偶然地使用了法西斯的语言。建筑艺术和美学的结果也完全与纳粹的现代化纲领吻合，纳粹的现代化纲领采用同一套组织术语（“大众共同体”）来包装对人进行的集体性强制合理化，就像它在此之前也已经采纳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德国的乌拉（欢呼声——译者）—社会民主那样。虽有些包豪斯建筑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主党抱有更多的政治好感而使纳粹感到可疑，这个机构遭到警察、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多次镇压后，于1933年7月被迫自行解散。然而，这只是又一次表明，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从它表面上的对手那里接受思想和怎样能够在第二



次工业革命初期阶段聚集成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包豪斯建筑学派美学中功能主义的、“强行统一”的成分也与法西斯主义美学完全不矛盾，法西斯美学虽然以某些显示统治地位的建筑形式展示出一种高大宏伟和拙劣俗气的排场，但在日常居住的建筑造型设计中却越来越尽力追求从包豪斯建筑学派那里剽窃来的那种功能贫乏：

“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有说服力地发生了住宅区样板向成批的标准化住房的方案的转变。例如金融专家默斯纳（Mössner）于1943年在他的专题报告中这样写道：‘在纯收益低微的情况下降低成本而又要达到生产最高记录的途径只能是无情地对住宅经济中各种有生力量的所有自身能量进行合理化和令其充分发挥作用。’与现代化追求成为主导同步的是小住宅区和民族式乡村田园被拆除。强力促进公众住房建造和合理化形式的建筑生产的立场渐渐被普遍接受。”（Kaltenbrunner, 1999）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住宅建造中同样出现了一种可看做在意识形态上反面形象的、倒行逆施的、情趣低劣的乡村田园风格和与亨利·福特产生共鸣的——如以包豪斯建筑学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建筑两者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功能主义的方向化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建筑艺术和美学的“强行统一”动机的作用自然远远超出了包豪斯建筑学派和纳粹现代化之间的隐晦阴暗的关系。包豪斯建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流亡地——美国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设计得以真正施展才能的地方，它在此成绩斐然。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厄（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是继格罗皮乌思和迈尔之后包豪斯建筑学派的最后一位领导者，他在新环境中上升

为资本主义现代派的名星建筑师。在这里，功能美学追求典型性的统一化也首次蜕下了“群众集体”和“大众共同体”形式的蛹壳，为在1945年之后以全面商业化的形态开始展翅。

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还不十分明白，一个为驯服的人力资源开设的真正的工厂地狱究竟是如何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的。这些工厂单纯从表面上来看近似于放大的住宅楼或者别墅和市政厅，其外形还没有完全急功近利地简化，还从多方面给视觉提供比较悦目的比例关系和“多余”的美感斑点，如挑楼和塔楼或者分成块格的房屋立面。包豪斯建筑学派的风格产生的不仅是建筑上的形式，而且也是外表上能够表达“抽象劳动”实质的形式：统一的、标准的积木式系统，符合福特-泰勒的合理化流水生产过程并“清除”掉所有与资本主义“目的形式”不匹配的美学成分。如果说在此之前工厂是按照住宅的各种标准样式建造的话，那么现在住房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几乎像工厂那样千篇一律地统一。为在“流水作业室”工作岗位上的流水线工人们建造的“典型化居室”和汽车这种作为抽象个人的交通工具的“行驶室”拼合成了一个封闭的整体系统。像制造汽车那样生产风格无异的房屋，这条资本主义合理性准则可以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就已在酝酿。连福特的崇拜者、后来的明星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也遵循这个原则。批评家阿道夫·贝内（Adolf Behne）在评论1929年在卡尔斯鲁厄按照相似的观点建起来的达莫恩托克住宅区时说道：

“整个住宅区似乎建立在路轨上。它可以在子午线上围着整个地球绕行，居住者总是可以朝着东方寝宿，面对西方居住……在达莫恩托克这里人们被称为抽象的居住生物。”（转引自：Kaltenbrunner, 1999）

“人的合理化”就是这样广泛地在生产技术以及时代精神—庸俗哲学和功能美学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形成准备就绪。席卷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驱动力量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再避开。在德国只有少数右倾保守的文化批评家在独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对这种“福特人”的构想。例如彼得·门尼肯（Peter Mennicken, 1924）在他的“反抗福特或者失去人的尊严”（1924）一文中阐述了已经在威廉二世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形成的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深刻文化”和西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浅显文明”在思想上形成的对比：

“福特人不再以人性的主干部分为根基……他变得浅显了。他塑造的世界越来越平坦和顺畅。所有的高处被铲平，所有的低点被填平……福特人总是处在他那充满必要性的，即事务性的世界里，在他眼里再也没有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Mennicken, 1924, 第40及下页, 第53页）

美国的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用他著名的电影“摩登时代”极为幽默和恰当地对福特—泰勒的世界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即便所涉及范围仅局限于流水线和他从人到机器人的变化。扮演流水线工人的卓别林于梦中犹如一个得了工厂—夜游症的患者仍在履行着他生产技术方面的职责，这些催人泪下的滑稽表演令人难以忘怀；他或许也全然不知，自己在这里用滑稽的方式讽刺了边沁已经成为现实的纲领，边沁甚至连他的被惩罚者的梦都想控制。

除了这样的一些反对“对人进行合理化”的文化干预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认真严肃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抵御。福特的制度不久之后被称为“白色社会主义”，受到各个工会和工人政党的热烈拥护，尽管因为“劳动”的强化和纪律化这种过

于明显的新性质还使人感到有点靠不住。泰勒这个人物诚然被许多人诋毁成“追逼长官”，并因此而不得不令人至少对原先的泰勒制“对人的鄙视”从道德上感到有些痛惜。但是尽管如此，正规的工人运动仍然赶紧承认他“业绩”的“科学”性质。在合理化的新形式中许多人就像以前在德国的战争经济中那样相信已看到所追求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在破晓而升。社会民主党人路德维希·普雷勒尔（Ludwig Preller）于1927年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用极力强调的语气指出：

“我们看到，由于主要在流水作业中产生的技术问题和其次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疑难，对资本主义商品和劳动市场实行计划周密的管理是何等的必要。从讨论这些问题到贯彻实施肯定道路还很漫长。但是，形成合理化的经济的根本必要性被很快地认识到和企业最近像晶体一样地聚集凝结是否会令人有一种猜测，即流水作业也会更快地找到了通向计划经营的道路？……德国工程师协会——即使是无意识的——通过他们对流水作业这个主题撰写的文章促进了对这种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认识，对此向他们只能表示感谢。获得这种认识的人现在便应该从他自己方面力促流水作业向计划经济迈进。那么，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把这样一种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造就成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转引自：Hinrichs/Peter, 1976, 第241页）

鉴于福特—泰勒革新的性质，初看上去似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极为荒谬。但不容忘记的是，即便这个怪诞的想法也只能是从“抽象劳动”的那段由来已久的纪律化和内在化历史中产生出的逻辑结果，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本身也共同分担和共同撰写了这段历史。甚至都已经热心地参加过

组建过世界大战的人类屠宰场的人，又怎会来指摘奠定福特制基础的那些东西呢？这个自觉投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传统从根本上只会积极地接受对“劳动大军”进行“合理化”的思想。同样像在世界大战中那样（并且以前就已经如此），社会主义的工会领导者——远没有做到对剥夺人的尊严的新性质提出任何彻底的批评——对如何能借助“科学的企业管理”调动民族的竞争兴趣而忧心忡忡地提出疑虑。因此，工会干部里夏德·沃耳特（Richardt Woldt）于1926年在《工会档案》中宣传了以下的看法：

“现代工业经济取决于技术上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的全面完善，即为了我们工业经济的生产能力有必要建立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和为我们的产品找到足够的销路，我们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德国工会不是机器破坏者，也不在此反对技术进步。但在变得优雅的条件下，重要的也是在安排上同时考虑把劳动工资和工作时间固定在使工人能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上。”（转引自：Hinrichs/Peter, 1976, 第267及下页）

工人运动的历史用如此寥寥数语便已被勾画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不是心甘情愿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工人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孪生兄弟做出的最终反应也相同无异。虽然各个共产主义政党一直不断用激烈的话语抨击“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但绝没有在原则上反对福特和泰勒的方法，而是因为这种合理化没有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名义来推行。被设定为为了“谁的利益”来推行劳动科学的标准的不是性质上和社会方面的内涵，而是外表上和政治—法律方面的形式。对加重了生产者负担的无情的“劳动”密集化提出的这种偶

尔指责所具有的宣传鼓动力终究有限，丝毫没有触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大部分共产主义理论家和工会政治家们甚至也像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同行们一样被福特表面上的高工资政策迷得眼花缭乱，他们只是在政治-社会学方面给这个政策打了负分——也就是对腐败的“工人贵族”进行的资本主义贿赂。

这个肤浅的社会学概念的发明者正是著名的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他无论如何也只能从年轻的前苏联“追补现代化”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在这里直接代表了一个还没有像西方那样彻底驯化的人力资源的基础阶段的工业纪律化，其合法地位通过准雅各宾派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确立。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种东方法国革命的载体甚至必须比西方社会民主党更加强调他们社会主义的“龙形海怪”性质。因为俄国的情况是要凭空建起一个现代化专政的国家，而不是以安然作为一个社会中“龙形海怪”式的辅助执政者被吸收进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为目标。这个追补的现代化必须立即在新的发展水平上起步。所以当列宁得知泰勒-福特的方法时，他能够毫不犹豫地着手行动。如果他在1914年作为流亡中的“左”倾激进鼓动者还十分注意泰勒制的“征服”性质的话（诚然那时也已经瞥视到同样的合理化在“无产阶级”手中具有的所谓完全另外一种性质），那么他在1918年在其著名的文章“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中作为一个参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专制的、正趋于成熟的国家领袖对此做出了完全另外一番评价：

“俄国人与那些先进国家相比是坏工人……学习工作——苏维埃政权必须向它的全体人民提出这个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集大成者，即泰勒制汇集了——有如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资产阶级剥削刁悍狡诈的残暴性和一系列分析劳动时的机械运动、排除多余和不灵活的动作、制定正确

的工作方法、引进最好的财务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取得的宝贵成功经验。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采纳在这个领域里获得的一切宝贵的科学和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与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成功结合。在俄国必须开始学习、传授、系统地试验和运用泰勒制。”（Lenin, 1918/1978, 第249及下页）

这段文献记载比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对劳动科学主张的“人的合理化”所发表的肯定性意见更加清楚地表明，即便是拥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最红色的社会主义所持的见解究竟是怎样一回事。除了把国家机器过分强调为总企业主[恰如考茨基(Kautsky)]作为另一种纯粹权力政治的选择方案外，首先这类见解体现了带有企业经济妄想狂症的自由主义对劳动和效率的崇拜精神，而且完全带有一种威胁的语气。当列宁无辜地谈到亟须把“排除多余的动作”作为“资本主义最新进步”加以采纳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泰勒制根本性的强制内涵。

由于资本主义对人的管理的新性质没有遭到根本的反对，关系到的就只是“如何”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推动力再次源自对国际竞争的潜在畏惧。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了能够顶住当时占上风的英国的竞争而大张旗鼓地推行工业化约100年之后，发生了一场第二次的“所在地辩论”。现在要驱除的似乎是来自美国的福特式超强生产率的危险。在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以合理化为主题的文献潮涌而来，与之相关的会议接踵而至，新闻界用各种评论把这个流行的题目真正地推向高潮。其中的大部分今天已被遗忘，因为它们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已经成为多余；有些现在看起来只会是荒唐的了。但恰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场辩论制造出的极为疯狂和难免滑稽的产品常常事

后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整个活动的实质。这些合理化文献的一个来路不明的分蘖是例如卡尔斯巴特的医生弗兰茨·克萨韦尔·迈尔（Franz Xaver Mayr）于1931年出版的小册子，标题很妙：“人类机器的合理化”；还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期间，迈尔在他的小书中就预言通过对人的身体直接采取行动来“彻底根治失业”。

“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最历经考验的、因此从各方面来看也是最可靠和最受肯定的方法无疑是机器设备的合理化……难道……这种经过考验的方法不应该使用，不应该用此来对在那些企业中所使用的输送和创造器械，即人的身体进行合理化尝试吗？……最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对人体进行合理化是我们的职业……从我开始对各种年龄和状况的人类机器合理化不仅从医学，而且从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观点系统和深入地进行探讨以来，已经1/4个世纪过去了。”（Mayr, 1931, 第16及下页，第30页）

这些话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但极力迎合资本主义时代要求的这种目光短浅的追随潮流再一次变成自然科学思想为资本服务的现实讽刺，这个讽刺似乎出自一种地狱的幽默：

“以什么方法和用什么手段可以对人体进行合理化呢？……我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尽可能改善消化系统，也就是首先力图对它进行合理化……这是我取得成果的惟一途径……1899年我开始深入地研究生物和治疗慢性的习惯性便秘这种广泛流行的和难堪累赘的病痛……我很清楚……治疗这种消化机能障碍在国民经济、社会和国家政治方面的巨



大意义……经济困境可怕的蔓延和面对这种困境普遍的束手无策促使我……于此把这项工作公布于众……我对肠子进行的训练，即对它的操练是：我通过轻柔而有节奏的按压、揉捏、推搓等用我与患者的前腹壁最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双手使需治疗的肠壁与肠中之物尽量产生内部接触，以引发肠蠕动……从治疗的第一天开始就可以毫无例外地看到……体内的气体越来越少……气体……表明内脏不合理的工作状态。我们以此合乎自然规律地在减少内脏中气体时有了一个适用的判断标准，在何等程度上……成功地使内脏的活动重新恢复合理状态。”（Mayr, 1931, 第16及下页, 第30及以下数页）

建立起腹内胀气、合理的肠蠕动和国民经济的功利观点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不可辩驳的逻辑性推论比任何表面上合理而出处少且不清楚的论文都更确切地表明了合理化辩论的时代精神。所预言的“人类机器的合理化”的最精彩之处是提出一个恰当的建议，这个建议惟妙惟肖到如同完全出自泰勒或者福特的头脑：

“人现在需要……吃得少的多，常常一次少吃一半就可以饱……以至在行政机构和企业中通常进行劳动分工时可比更容易地取消所有用于吃饭的休息时间。这样不仅会为工作赢得珍贵的一个小时白天的时间，而且还会为以后的工作节省下消化饭食所必需的能量，且不说提供吃饭休息时间给企业造成的费用和损失……”（Mayr, 1931, 第44页）

从欧洲战争间隔期间涌出的有关合理化、泰勒和福特的文献潮水中两个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物分外突出：国家社会主义国民经

济学后起的顶尖级人物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 1868~1958)和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两人都能够当之无愧地宣布自己独立地创造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至今一直在社会理论界的辩论中采用的“福特主义”概念。时而也会谈到“泰勒主义”，但这一名称不无道理地限于某些合理化方法，而亨利·福特的名字被尊为时代的名称。因为福特不仅制定了具有边沁精神实质的、全面的社会政治方案，他也用他的产品，即用为大众制造的汽车为20世纪资本主义的脸上贴了金。于是，第一次在现代化史上不是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管理者的名字跻身于形成认同感的意识形态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地位。

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把“福特主义这个新词”看做一种必然出现的经济哲学的概念，这种经济哲学首先促使“技术理性”的基本原则全面生效，以提高国民经济机器的“驱使动能”(Gottl-Ottlilienfeld, 1926, 第5页)，但也与此同时提高“各个工人的生产动能”(出处同上, 第13页)。这种好斗的官腔并非偶然，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也随即急急忙忙地把新的方法体系纳入在历史哲学上赋予压制和劳动折磨合法地位的背景之中，这种认证现在有必要从自然规律方面加强力度：

“我们西方国家密集聚居的千百万人民就像困坐在逃不出的企业的监狱中……有些十分可爱的梦想，梦想这个劳动兵营的破除，梦想中世纪式的与世隔绝自得其乐生活的幸福，被粉饰以浪漫主义的色彩……企业仍然在整体上，连同它的严酷和阴影，无实质可言……这便是‘理’，我们用它来谈论‘合理的’技术和‘合理的’生产……”(出处同上, 第4页)

值得注意的是，想为公开承认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所有发展阶段上都具有的强制性质作辩护的基本动机是如何自始至终地力图把一个转嫁于“自然”的事物（“密集聚居的千百万人民”在这里再次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提供“人口过密”的论据）与一个所谓纯工艺的必要性联系起来，谨慎地回避了通过资本无理性的逻辑产生屈从和造就技术这个题目。因此，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也能够为福特主义毫无困难地提出“技术理性的独裁”（出处同上，第48页）的要求，尽管面对汽车广泛普及的前景他甚至表达出极大的怀疑：

“汽车……由于道路的阻塞以及一个如此笨重器具的存放，今天已面临灭亡的威胁，多到像雨伞那样的地步……汽车……的行驶并不需要轨道，要求的是造价昂贵的道路。人们总还是会问：被公认为交通发展产物的大众的汽车真的会在技术理性的路线上行驶吗？……多么惊人地分裂出上千万个小单位，每天两至三次的行驶中又会遇到何等的阻塞！……大众阶层的家庭购置汽车会立即扼杀一系列其他需求……”（出处同上，第44及下页）

但这个局部的认识像云雾一样掠过，为了给那些具有显而易见的非理性性质和统治技巧特性的想法让路。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把福特主义誉为“劳动”的新阶段，其目标是人的自动屈服，为的是克服一种玩耍和“嬉戏”的童年状况，“就像从原始野蛮人的游戏和舞蹈能够看到的相同情况那样，这些原始野蛮人如同孩童一般还未最终驯熟到具有工人那样的律己自觉性”（出处同上，第89页）。儿童和“原始野蛮人”的对照在此又一次闪现，后者的范围中还包括妇女；在资本主义的权势阶层看来，这始终是令人厌恶的和存在危险的“状态”。不仅是这部以自身为

目标的机器的“驱使动能”通过福特主义得以提高，而且人力资源的纪律化也大力推进；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在这个意义上把一种“顺从的垂直状”（分等级的、技术和管理至上的制度）与一种“邪恶的水平状”（需加以管教的人相互之间无所顾忌的交流形式）加以对比，“后者大约是从士兵委员会有组织的哗变开始的，很快就使整个军队沸反盈天，并继续向下扩大成中小学生的密谋造反，随之引起教师先生的气恼绝望”（出处同上，第11页）。

反之，德国这位压制哲学家的心在欢呼，此时他在“美国”的方法中辨认出一种近似的精神状况，为使纪律化取得大有裨益的效果他也能够对作为巧妙的屈从形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新的**大众消费形式**持欢迎态度，他明确指出这种屈从形式与德国战争经济的方法所具有的亲和力：

“最终目标已经足够清晰地……显现出来。丰富的，也许是过于丰富的供应也十分明确地要面向广大民众。当然一切都严格地统一化、标准化、‘拉特瑙化’……人人出力；每个人尽其所能，在任何他能够发挥这些能力的地方。不管每个人的需要是怎样的，福特都能提供一个用武之地。”（出处同上，第36及下页）

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在这里过于严肃地玩弄着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制定的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公式受到事实的讥消嘲讽；因为由此在福特主义的表现形式中产生出一幅“自由人团体”的残酷的讽刺画像，它把对一个富裕和令人满意的、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所寄予的全部希望颠倒过来，并把人变成“抽象劳动”的标准化机器人。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也绝非偶然地不仅与列宁，而且也与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

德看法一致，以此否定了他也被算作一份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谓比俄国的工业化—马克思主义更富有批判性的特征。连葛兰西也没有想到要从社会解放的角度去彻底批判企业经济合理性带来的新的劳动密集化情况所具有的强迫和苟求性质。他作为撒丁岛人在地势北高南低的意大利和它鲜明的农业传统中首先看到的是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滞后情况。所以，他也采取主张“共产主义”政治要适应福特主义的立场，他承认福特主义有“客观必要性”。

葛兰西至今还一直被视为一种持不同见解的、招致异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提出者（这当然也能滋生出他与福特主义相吻合的特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了墨索里尼的立场，即后来的法西斯“元首”，众所周知他来自社会党。这个出身并不只是一个个人转变阵线的偶然现象，而完全指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如同与自由党人的关系一样）在对福特主义的正面评价中再次生效，并在政治上敌对的表面现象下也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显现出所有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共同根源。葛兰西在法西斯统治期间于身陷囹圄之时撰写的著名的狱中理论著述里与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如出一辙地利用福特主义来赞誉资本主义的严明纪律是对人的完善教化：

“工业化主义的历史始终是一场针对人的‘善性’成分的斗争（如今以一种更鲜明和更严酷的形式），是使（自然的、善性的和原始的）本能向秩序、准确性和精密度形成的新的、越来越扩展和越来越稳固的标准和习惯屈服的一个持续的、常常是痛苦的和血腥的过程。这就使得集体生活的形式作为工业化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总是错综复杂……至今所取得的成果虽然从直接实践的立足点来看特别珍贵，但大部

分是纯机械的，它们并不会成为‘第二天性’……”  
(Gramsci, 1967/1926~1927, 第389页)

犹如正在成长中的纳粹经济学家给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文化贴上“原始野蛮人的嬉戏”的分类标签，“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赋予的范畴名称是人的“兽性成分”。自由主义的机械的进步概念中的共同的偏见再也无法表达得更清楚了。葛兰西甚至比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走得更远。他坚信，“美利坚主义和福特主义都是产生于计划经济组织的直接必要性”（出处同上，第377页），在赞成资本主义合理化方面他以此表示了与始终为“社会主义”战争经济而感到振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采取现代化理论的客观主义，而丝毫不顾及美国工人运动反福特主义的动向：

“在美国，合理化使培养一种符合新型的工作和生产程序的新型的人成为必要……美国工人的工会更多的是职业特点的团体标识，所以工业家们要求除掉工会有其‘进步的’一面……”（出处同上，第383页）

葛兰西虽然也附带提到过泰勒的一种“残忍的犬儒主义”，即“以最高程度培养工人的机械和自动的行为方式”（出处同上，第393页）；但他把剥夺人性的新阶段仍然理解为一种为“更高度发展”服务的抽象的必要性。在此同时他竟然以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对缺乏“接受福特主义的能力”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本身进行威胁：

“一个被迫的选择即将不可避免了，一部分工人阶级将被无情地排除出劳动的世界，或许干脆被排除出世界！”（出

处同上，第 393 页)

毫不奇怪，葛兰西尽管对苏维埃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局部的）哲学方面的批评，仍然对俄国由托洛茨基（未能如愿以偿地取代斯大林）主张的“经济军事化”大力推崇，对此他用寥寥数语评论说：“在安排生产时直接和间接强迫的原则是正确的”（出处同上，第 392 页）。葛兰西说，按照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被驯服的和“已合理化”的人甚至将成为一个“新的”和不可估量地“自由的”人：

“如果适应过程已经完成，那么事实会表明，工人的大脑达到了一个充分自由的状态，而不是荒芜！只是肉体的姿势完全是机械的：职业的记忆降低为保存简单的、以紧凑的节奏重复的动作，它已在肌肉和神经束中落成，这样便使大脑为其他的活动腾出空间。就像人在走路时不需要去想所有必要的动作，以使身体所有的部分按照走路的需要能够同步运动，在工业领域中按职业特点做基本动作时情形也相同，而且将来亦如此。人一边自动地行走，一边想着愿意考虑的事。”（出处同上，第 398 页）

连葛兰西都大肆宣扬那种无止境地“现代化”的机械进步的思想对人的自由做出了何等的嘲弄在这里可一览无余；或许可以原谅他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已究竟说了些什么。这其中即已包含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居然把在患有企业经济神经官能症的活动空间中高度加剧对生命能量的抽取和强加于人的“自动的”动作过程与散步时运动系统下意识的调控等同视之。且不说福特模式的自动运行机制是一种耗竭体能和损伤神经的劳动疾苦，它当然也不会使大脑获得“自由”；相反注意力始终被迫地集中在

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这样声称：

“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在纳粹党成员中的比例几乎不超过20%，在纳粹党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倒是对其世界观中的核心思想持一种保留态度。”（Mommsen, 1991, 第424页）

如果说这种观点将推动纳粹党迅速发展的大众运动与纳粹党的（看似隐蔽的）世界观中反犹太主义的“核心”分隔开来，而为大众运动辩护：那么作为纳粹党公开卫道士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则恰恰相反，他试图将大获全胜并成为国家意志的纳粹党与其大批追随者中的反犹太主义区分开，而为纳粹党辩护：

“……1935年的纽伦堡法无疑是……纳粹反犹太主义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同时也是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来约束这种凶恶的、混乱的反犹太主义暴行的一种尝试……”（Nolte, 1993, 第17及下页）

这两种见解不仅彼此否定，而且它们形成的这种互补性无意之间还表明了纳粹分子和德国大众对于彼此的重要性。这种积极的“理解意愿”不是试图去面对德国再无法挽回的历史，而是试图减轻这段历史的罪责；这可能导致以后有人重蹈覆辙。其原因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关于世界大战和危机做出的反犹太主义的荒唐解释绝对不是什么“潜藏在”他们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因此根本不可能被大众所忽视；反犹太主义不仅渗透在那本愚昧之极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弥漫在整个纳粹宣传机器抛出的渣滓里。反犹太主义是整场运动的基础和自我认证，后来还提升为国家的教义。由于反犹太主义这种思想



尽管大量凭据证明资本主义的苛刻要求已化为纪律和深入灵魂，但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何能如此成功地把大众卷进这等愈演愈烈的企业经济的劳动摧残制度中。虽然由于福特主义迫使各大工人党派和工会保持一致而缺乏在社会中揭示“福特主义中的弊端”的各种媒体，但这种弊端确实存在，而且今天的情况也仍然如此，即便它已被驱逐到社会和心理的底层。有关福特主义如何得以通过大众消费、汽车和“对机器的喜爱”在大众心理中稳筑根基的一部分现象在歇斯底里的和很大程度上已无形中变得滑稽可笑（以意大利为主）的未来主义的文学中可以看到。这个自世纪之交以来发展形成的艺术先锋派有影响的流派大部分转向法西斯主义不是没有原因的，几乎还在“被合理化的人”在社会中普遍地成为一种社会特征之前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和他具有平衡作用的抑制力的潜意识。尤其是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的文学嘶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福特主义的现代化提供了恰如其分的伴奏乐曲。在他著名的《未来主义宣言》（1909）中，他自豪地预告了大众对汽车的幻想：

“我们宣布，美好的世界又要增添一个新的美景：速度的美景。一辆用类似喷着气的蛇的粗大管子……装饰的赛车，看上去像是吼叫着装在榴霰弹上奔跑的一辆汽车，比萨莫色雷斯岛的奈基胜利女神更漂亮。我们想赞美把握方向盘的人，其理想轴线穿越在自己的轨道上疾驰的地球……我们想颂扬战争——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运动——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性行为、人们为之献身的美好理念和对妇女的蔑视。我们想毁坏各种博物馆、图书馆和高等学府，并与伦理主义、女权主义、任何求稳求妥的和自私自利的胆怯畏怯作斗争……”（转引自：Schmidt -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才稍作间歇。这使得各国政府才能够通过速见成效的节约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中的复苏”为代价）、通过货币改革（以最终消灭大宗财产为代价）、通过部分恢复金本位制（以限制信贷体系的行动能力为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总的来说，其目的在于恢复金本位制，从而在臆想中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如果说美国在1919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英国在1925年也紧随其后达到了这个目标。德国在1924年首先采用了所谓的地产抵押马克作为新的货币单位，这种新货币单位以地产贷款“作为担保”，与旧的马克以1:1兆的标准结算，以期下一步能够向有限制的“金汇兑本位制”过渡。这种“对纯粹的金本位制打折扣的做法”（Aldcroft, 1978, 第152页）在大多数国家得以贯彻，直至1928年。这意味着纸币不再随时能够兑换成黄金，即金币的流通从日常的支付往来中消失了；同时中央银行储备中的增长部分不再是黄金，而是外国货币（即外汇），即中央银行为了达到与另一国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货币（大多为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目标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但是这种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稳定状态让人产生危机得以制止的错觉，而这也只能蒙蔽短短的几年。这种虚假的正常化表象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是：国家免除了自己在他们的债主，即他们的人民那里欠下的高额债务，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贫穷化的过程。在德国，实际收入降到了1913年的一半（Aldcroft, 出处同上，第166页）。怀着将要迎来一场伟大的、意义深远的繁荣的幻想，这台“美妙”机器的机械师和维护者们又一次宣扬一种特殊的乐观主义，就像在对人们实际的经验进行嘲讽。真实的情况是：“通货膨胀中的复苏”犹如在生产和贸易出现严重滑坡的背景下短暂燃烧的火苗；而且从根本上说，即使在货币稳定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正如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德雷克·奥尔德

在地球白色的道路上舞翩跹，  
我放开这金属的缆绳，  
你便狂奔疾驰驶往无拘无束的无限。

马里内蒂已公开表示出内心生活从社会关系向无生命的机械物体的最终转移。马克思的概念异化和物质化在资本的这个发展阶段上才充分显示出有效性。当马里内蒂“无限的遐思”唤起一种与机器相关的“润滑的温情”时，这不仅仅是对色情和性爱被机械化（商业化）做出的一种隐喻。这种不加批判地服从如今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发出的命令的态度也引起了梦魇：直截了当地实现使人成为机器这个自拉美特利（La Mettrie）以来一直作祟的想法并使自我充分地在地物理的机械装置中升华，这正如马里内蒂在他的《未来主义的技术宣言》（1912）所疾呼的那样：

“我们对一块钢板的强度感兴趣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即是由于它的分子和电子令人费解和超乎寻常的结合状态，例如它们能抵御子母弹的射入。一块铁或木的热量早已比一个女人的微笑或眼泪更加令我们感到兴奋。我们愿意在文学中再现马达的生命，这种新的有天性的动物，假如我们透彻地认识构成它的各种不同力量的天性的话，就会理解它的主要天性。对于一个未来主义的作家来说没有比弹奏一架机械钢琴的动作更有意思的了。电影机为我们摄制了一个对象的舞蹈，先分解开来，然后又不用人的介入重新组合起来……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达到每小时 200 公里速度的人。全都是物质的运动，突破了智力的局限性，并因此而意义更深远……未来主义的作家们！我曾教过你们去恨图书馆和博物馆，我现在也必须让你们准备好去恨智力……我们将借助直觉战胜表面上毫不退让的仇视，它把我们的人体肉身与马

达的金属质料分隔开来。继生物的国度之后开始了机器的国度。自然科学家们只能够认识物质的物理-化学反应，我们通过认识物质和与之联谊准备创造有备件的机械人……”（转引自：Schmidt-Bergmann，出处同上，第285及以下数页，着重标记为Marinetti所加）

这都是些陈腐的，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幻想，这些幻想将早已中断的抗御“抽象劳动”的冲动以一种颠倒的、自我毁灭的形式转向种种福特主义的机器享受；飞速的疾驰、机械的数百倍“马力”的肆无忌惮和一个恰因其无条件的屈从和甘愿自我毁灭而危险地咄咄逼人的用“阳刚”气质塑造的自身形象开始融汇成一个工业-心理的复合整体，它对社会的思想意识影响至今尚在。属于此范围内的“兴致勃勃地发挥作用”（恰似一部机器）这种鬼使神差般的状况当然与社会贫困失意的特点十分相称，在后半个世纪历史的数次大毁灭暴行之后出现的那种名声不佳的、每星期六擦洗汽车的小家庭型怪物或者年轻的“开英雄车者”和交通秩序扰乱者正是这种特点达到它悲惨的终极阶段的证明。

## 世界经济危机

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世界性资本主义新时期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福特“白色社会主义”的诱惑力渗透进正在形成的商业大众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成为西方战后资本主义的先兆。在世界大战的前沿阵地“已经过熔炼”的人力资源基本上在“兴旺的20年代”开始练习迎迓自己作为全面资本主义商品人的新形象。仪表和生活情感、时尚和新的媒体造就了一个全盘资本化的“技术文化”时代精神，并开始把日常生活“现代化”为资本利用几乎无孔不入的领域，直至私密生活的各

个孔隙和角落——至少在最初大规模的起步阶段是如此。除了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结构成分的汽车以外，新媒体的出现，即电影（1919年的第一部长故事片，1928年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无线电广播，也都引起轰动。1923年，德国开始普及“娱乐性无线电广播”，当时的第一批参加者为1500人；1928年已经有250万听众。

但是，这类新的消费信仰仅仅像一层稀薄的清漆贴附在社会的思想意识上。原因不完全是，甚至都不主要在于技术的不完善和批量生产、大众消费、商业大众文化这些新形式的作用面比较小。而关键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构性的变革遭受了至此最大和最严重的社会经济转轨危机。与百年之前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渡相似，只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穿透力要强烈得多，它在更大的（首次真正在全球的）范围内碾平了所有的消费希望，尽管这样的希望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适度和对资本主义驯服；福特主义的大众消费总归长不了的兴盛时期直到数十年之后才又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探讨商品生产制度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对战争间隔期间发生的世界经济严重危机的原因有很多猜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基本范畴在整个正式的学术体系中作为“社会的天然基础”在公理上被确定为前提条件，即不是批评性探讨的对象（被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也只不过用其他缓和形式保留下来），所以这场辩论就像以前所有的争论一样肯定停留在表面上，即便它并非毫无结果。事实上是基本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转轨引起的社会灾难；固然是在高之许多的发展阶段上，因而基准体系也不同。

尽管如此，这是同一个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内在的自身矛盾，以前从未能够被克服，现在又在向一个新的危机顶峰行进：一方面是抽象的“工作份额”积累以自身为目的，另一方面由于

竞争而迫使“工作”成为多余，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同出一辙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的逻辑通过其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流动性并未失效，却是由此获得了动力，所以这个盲目地运转着的动态系统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必然继续向崩溃迈进，在这个系统早先还处于上升时期的历史中，局部和暂时的重大危机和灾难就已经预示了这种崩溃。如果膨胀的动力在1873~1890年的“大萧条”期间或经济表面繁荣时期的危机期间被减缓到爬行速度，并且对再度出现灾难也早已有言在先的话，那么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在战争间隔期间便成为现实：滚雪球式的体系彻底瓦解了。随第一场政治-军事灾难而至的第二场祸殃即经济的“20世纪浩劫”。

这又如何可能呢，虽然福特主义在表面上看起来的确通过汽车这个“投资型消费手段”和对人力资源扩大多倍的榨取在原则上解决了大众消费的新的质和量的基本问题？但是“原则上”远不意味着是在棘手的社会现实中。因为对于一个这样广泛深远的、朝着全盘资本主义社会挺进的划时代变革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孵化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它的基础工业已经精疲力竭；世界大战最终结束了这个时代，恰恰还是突然地中断。然而福特主义未能天衣无缝地衔接上来，无论如何无法直接地在世界范围内和覆盖全社会范围内衔接上——就是在美国本身也做不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形式作为一种制度先在理论辩论中、在时代精神中和正在萌生的大众消费贵重商品的技术文化幻想中得以广泛传播，几乎已经普遍生效，但却不是在社会实践中。福特主义的新原则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是一个人们谨慎地朝之行进的未来远景。道路建设、能源供应、用于新媒体和汽车主义的技术网络都远远落在福特生产方法之后，为此整个社会需要投入的资金既无法由私有经济，也无法由被战争耗尽财力物力的国家尽可能迅速地筹集起来。此外，福特主义也需要一个完好的世界市场和一种持续稳定的国际性联手协作，以便能够通过遍及世

界的销售市场来灵活地充分利用彻底合理化的工业能量，而不是局限于国内市场。然而，战争的后果正是在这方面使计划落空：世界市场与战前相比明显地萎缩了，而且重新恢复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外贸网络处于被撕毁状态。此外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还太深，以致自给自足型国民经济的梦想在经济政策上还富有影响力。亨利·福特在国外的工厂仍属于例外情况。下一个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巨大推动力在数十年后才开始。

在新兴工业的尖端领域进行福特-泰勒的革新和在全社会实施曾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成功之前提的福特主义两者之间出现了一段“时间间隔”。从新合理化模式被福特主义工业先锋派，当然首先是在福特本身的工厂里，已经付诸实践的情况来看，它们没有因此实现所期望的通过批量生产、大众收入和大众消费之间的连贯性来促进工业的能动性，而相反引起了劳动力的迅速“解放”，即便不是直接在福特主义企业中，而首先通过大部分还没有合理化的工业中的排斥性竞争体现出来。就此看来，福特主义合理化所有的实施情况都具有类似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和机械织布机那种导致毁灭的结构性作用，“技术性失业”首次作为流行词传播开来。随着旧工业的萧条及其市场的饱和（当然始终按照资本主义的购买力标准），危机的动力以相同的方式被释放出来，它再也无法驾驭。

尽管合理化的释放因素绝没有这样大的能动作用，危机的动力能够升级成为公开的经济灾难这一点却已经通过资本主义的基准体系本身的变化得到解释，这个变化基本上发挥了一种必然加剧危机的“杠杆作用”。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仿效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现方式”。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的领域虽然仍没有普遍和全部地，但已经大为显著地扩展了，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领域在平原地区不断减缩。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远不能像在德国经济繁荣时期出现的“大萧

条”时可通过“撤回乡村”，通过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给自足生产，或者至少通过农村和城市工业居民之间还保持着的亲戚关系能提供的相应援助得到缓解。在此期间，不仅大幅度增长的城市工业人口数量与农村人口比例已完全失调，从个人文化修养和从纯粹的数字来看皆如此，而且越来越在更高程度上瞄准世界市场的农业（甚至与农业大庄园形成对照的小农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性质也在增加，这使平原地带作为危机“缓冲器”的作用丧失殆尽。例如在美国南部的“平均地权运动”在20和30年代欲以“返回乡村！”的口号解决失业问题，实际上是难成气候（Mattick, 1969/1936）。

资本主义的就业率自19世纪末以来一方面已大大升高；但另一方面妇女就业率却没有相应地上升，而且在世界大战后又重新降低。这个相互关系产生出加剧危机的第二个杠杆：不仅农业和自给自足经济提供的支持没有广泛地起到防线的作用，而且工业中的每一个就业岗位必须比以往供养更多的人。不断在扩大增长的资本主义领域所占的绝对主导地位在危机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起着加剧的作用：资本主义在越大的程度上决定性地支配着社会的再生产，危机发出的冲击力就越大和越不可抗拒，并在造成的后果中也直接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地盘上产生影响。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毁灭性的转轨灾难所不同是，现在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生产者的生存被摧毁，而是工业中的工人阶级。

除了危机的内在动力以外，当然还有20世纪第一场“浩劫”的不幸留下的战争负担和战争后果，这些现在才开始全部反馈到经济上，并且绝不是仅仅通过国际贸易的紧缩。或许这个巨大危机与资本主义的作用原理和自我矛盾全然无关，但却不能因此而将战争后果的全部因素解释为“经济以外的”因素。曾经用来证明有必要采取高度军备政策来为战争做准备的理由也同样对战争的后果有效：不仅仅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自由主义者自己为帝



国主义制定出方案并使之高度军备化，而世界大战更是恰恰产生于各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之间的“用其他手段继续的竞争”。竞争的逻辑总有政治的一方面。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就此而言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交叉在一起，以致包括军火工业、帝国的竞争，还有包括技术装备战的费用在内的“死亡的经济”必须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组成部分，且不考虑这场到那时为止最残酷的战争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结构和思想史上真正打开了突破口。这场工业世界大战吞噬了巨额资金，以致短短几个月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参战国的正常的国家收入（税费）承担得起了。与当时的购买力相比，要筹集的资金数额难以想象：

“所有参战国直接承担的战争费用达 2600 亿美元，其中协约国筹措了 1760 亿美元……全部费用的数目估计相当于从 18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上全部国债总和的六倍半……”（Aldcroft, 1978, 第 46 页）

以前只按很小的比例用国家贷款作为海军建设规划经费的情况所预示出的资金困境通过战争的耗费而大幅度地蔓延开来。后果是金融制度领域中采取了一个既不可避免又影响深远的措施：各种货币自 19 世纪以来只与黄金挂钩，现在必须断开。在战争爆发后最初的几个月里有人试图推迟这个做法，例如在德国就有过“我以金换铁”的运动，在此运动中爱国的公民们为了战争机器及其鲜血磨坊献出了他们包括结婚戒指在内的私人收藏的黄金。但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所以必须采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发行债券和国家借贷这条途径。在 4 年战争的岁月里，仅德意志帝国就发行了总额约 1000 亿马克的 9 次战争债券。其他参战国情形也类似。为了支付这些战争债券利息的承诺各国在自己的公民们那里所欠债务的规模致使在战争结束时出现巨大的“货

币壅塞倒流”（Blaich, 1985, 第34页）。

但决不仅此而已。即便是巨额的国家债券也远不够支付工业战争机器的费用。因此，为了无止境地创造货币，各国又使出新的招数。例如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8月4日通过立法决定成立所谓的信贷银行，通过发行以商品和特别是以有价证券作抵押的“信贷银行券”满足正在增长的信贷需求。尽管这种银行券没有正式的货币功能，但是它却可以像货币一样使用。

货币或准货币就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循环流，它们不是正常地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挣出来”，而是由国家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这种变出来的钱现在可以从它那一方面重新发动起生产并以此创造产生出额外的货币收入，例如由此得到报酬的军工厂工人去购买生活用品或者（通过银行系统内部的货币创造潜力）“有保证”的信贷又成为新的贷款的基础等等。因为出发点已经是虚构的，嗣后的过程也就“脚下无根”了。非正常货币创造过程的这样一种连锁反应的最终原因在于包括军备和战争费用以及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公共福利开支在内的社会“间接费用”列为纯成本决定因素。这指的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消费，它不再返回资本主义利用过程中，而是在“使用价值中消失”（正如马克思在另外的意义上描述前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的性质那样），甚至这个“使用价值”亦存在于对人的毁灭和使人致残中——但是这个抽象价值的经济作为“第二本质”同“第一本质”的规律一样盲目。从资本主义来看，军事消费在资本积累中不是重新出现的要素，而几乎是“消失了”并且因此只体现为增加负担的成本决定因素。尽管如此，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谓“必要”，当然只是就整个活动的非理性性质而言。具有恶作剧般讽刺意义的是，自由主义对于“龙形海怪”的军备消费和镇压消费的偏爱纯经济地按照“美妙机器”的法则最终会给制度带来负面后果，犹如不讨人喜欢的社会消费。

在自1871年以来的和平和军备的年代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这个负面的费用性质始终没有能够得以露出真相；只要用于军备消费的国家借贷不超过一个“警戒量”，它甚至还会起到正面的增长因素的作用（把危机潜能推给将来），不管是在军火工业的“就业”方面还是在其企业经济收益方面均如此。然而当实现了军事方面的“使用价值”和4年技术装备战争的费用猛升到天文数字的时候，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逻辑追赶上，通过国家货币机器不真实地预先提高的未来收入不得不真实地作为重大的危机因素而出现了。军火工业过度增长的企业经济利润在与资本经济整体过程完全脱节的国家创造货币的激发下，经过多年的潜伏期之后以货币危机回应了资本主义总制度，这个货币危机与其他危机因素相融合，并且既加剧也加速了战争间隔期间里危机的动力。

显然，货币层面上的危机潜势会自动地显露出来：在极大程度上放任自流的货币创造没有资本主义积累的“担保”只会导致货币本身贬值——一种被称为通货膨胀的过程。形成通货膨胀的是商品的价格，但并非直接按照供与求的市场规律作为基于真正资本主义意义上“挣到的”收入之上的需求推动力。更明确地说：额外的需求不是用上述收入，而是用从经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的，这在一段时间以后必然会体现为这些货币的贬值并因此引起物价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形成了“虚构资本”，类似于一个投机浪潮出现时私有资本层面上不切实际地上升的股票行情或者房地产价格。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贬值震荡，但各自的形式相反：私有“虚构资本”通过崩盘（股票和/或房地产价格的暴跌）贬值；国有“虚构资本”通过普遍的货币贬值（因通货膨胀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而贬值。不管怎样，两种情况也都毁灭了大量货币财产；股票的崩盘毁灭了不符合实际吹鼓的“肥皂泡财产”，通货膨胀通过普遍的货币贬值毁

灭了原本“实实在在的”货币财产（货币资本财产，储蓄等）。

通货膨胀（投机性金融崩盘亦是）已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过多次；其形式例如有法国大革命期间所谓的指券（一种流通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以没收土地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通货使用——译者注）或者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时期的纸币美元。每次的原因俱是国家以与商品生产体系之实际经济脱节的方式创造货币（法国的“指券”大约原则上与德国的“信贷银行券”相同）；每次采取这个做法都是为国家用正常收入无法偿付的军备和战争财政支出服务。但在使用“前线碾压机”的工业技术装备战中，处于战争状态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承担的这些“死的费用”不仅超过了以往战争费用的很多倍，同时此时的通货膨胀也比以前出现的所有通货膨胀对社会再生产的后果要严峻和深刻得多，因为这个制度先前各发展阶段相比，生活中与金钱相关的部分大大地扩大了。

在“国有社会主义”的战争经济中通货膨胀起初被抑制住了，而在战争结束后却更加激烈地发作了。一方面，放任自流的货币创造以军火工业、军用物资供应等的工资和收益的形式作为非正常购买力出现。另一方面，战争债券的还本和付息形成了额外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在战争结束后才真正被激发起来，因为财政上崩溃的国家试图通过无度地开动印钞机来为对自己公民欠下的（一部分也是“友好”国家的公民）巨额债务付息，以维持井然有序的信贷业的表面形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通过战争的负担迅速减少的民用商品的供应（直至基本食品的匮乏）。

按理说人们事先本来应该知道做的是什么样的游戏。但是由于工业化战争造成的印象，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意识很薄弱。此外，还有的人希望能够作为胜利者把战争的费用转嫁到战败者身上。德国是侵略战争发动者之一，并通过它的海军政策在根本上参与引发了战争的势态，事实上它在凡尔赛和约中承担有巨额

的战败国赔款，然而这笔赔款因为经济危机从未完全支付过，另外，尽管赔款额很高，但也不可能抵偿西方战胜国的战争费用。

这样，该发生的就发生：“货币壅塞倒流”变成了潮水般的非正常货币向整个社会袭来，商品价格日益飞涨。在十九世纪期间由于货币普遍与黄金挂钩而使在经济学界都已遗忘的货币通货膨胀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国家；受影响最小的是美国，它能够不太困难地回到金本位制。如果说美国在战前还有 40 亿美元外债的话，那么这时的比例关系以相同数量级颠倒了过来；首先英国和法国为了军事物资和战争经费不得不向这位历史的飞黄腾达者借债。结果是几乎所有其他的货币与美元相比都遭受了巨大损失，美元以此开始成为新的全球主导货币。尽管如此，美国也没有能够完全幸免通货膨胀之苦，当然欧洲“战胜国”的通货膨胀要高得多：

西方大国战后货币贬值的最高值  
(按批发价格的指数计算，1913 = 100)

英国	法国	美国
307 (1920)	584 (1925)	226 (1920)

资料来源：Ott/Schäfer, 1984, 第 225 页。

通货膨胀在战败国中的后果要强烈得多。德国照旧是登峰造极，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绝对的、至今都不能再达到的世界最高记录。在 1922~1923 年的短短几个月中近 2000 部印钞机用纸币的特大洪水淹没了这个国家。价格的上涨已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创造出“超级通货膨胀”一词用于指称这个离谱的货币贬值，这样的过程也以稍弱一些的、但仍然以相当的强势袭击了其他战败国，首当其冲的是东欧：

“到这个过程的尾声时期，物价与战前的基数相比在奥地利上涨了1.4万倍，在匈牙利上涨了2.3万倍，在波兰上涨了250倍，在俄国上涨了40亿倍，在德国上涨了一兆倍。”（Aldcroft, 1978, 第161及下页）

结果当然是货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资本主义深度的反理性在它被奉若神明的基本形式中突然地暴露无遗，使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制度的拜物教已经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就像在一个荒诞不经的童话中那样，所有的人都突然成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也恰恰因此而破产。一个面包的价格是数千马克，最终到了几百万和几十亿马克。在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都是用手推车付钱和运钱。货币形式的灾难迫使官方机构、公司和私人都相应地采取荒唐的行为方式，以使它特有的和已独立的并且失控的社会性幸免于难：

“荒诞不经的现象伴随着上涨的纸币潮水。连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现在也力求实用价值以摆脱困境。因为房地产、大宗股票和首饰对他们来说过于昂贵，所以他们满足于购买可长期保存的食品和用品……在付了工资以后，大多数企业都中断工作。全体职工带着包好的成捆钞票冲进周围的商店，为了在下一轮涨价使工资丧失价值之前购买到任意的商品。就像在战争期间那样，商店门口排着长队……零售业按照马克和美元之间的兑换比例确定自己的销售价格，试图以此作为对付纸币的购买力衰退而做准备。当1923年秋天‘美元汇率’在一天之内多次变化时，商店和饭店里的价格也相应频繁地跟着摆动……所以会出现在点一杯咖啡时价格为5000马克，当服务员来结账时已经价值8000马克了……农村地区……又回到了低级落后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例如

美因河畔奥克森富特的理发师同业工会决定刮一次胡子收取两个鸡蛋的报酬，理一次发的价格为4个鸡蛋。法兰克福地区佩格尼茨的神职人员为不舍祈祷在内的简单葬礼收取10个鸡蛋。死者遗属为一次包括墓前悼辞或者布道在内的一流葬仪向教士偿付40个鸡蛋。最终这种实物交换也进入大城市里。看一次电影的价格便成为两块煤砖……医生和律师宁可收取一瓶葡萄酒或者一磅黄油作为报酬，而不收一捆纸币……”（Blair, 1985, 第12及以下数页）

即使在通货膨胀的后果远远不像德国、奥地利和东欧那么严重的西欧“战胜国”中，货币危机也仍然对日常生活有着深刻影响。首先是在法国，它在1925~1926年才达到通货膨胀危机的顶峰和法郎相对于美元暴跌，大众的意识已能感觉到金融业的破坏程度，正如一个当时的观察家所评述的那样：

“每个食品商人都在考虑汇率对咖啡的影响，每个女速记打字员都力图在一个金本位制的国家开一个储蓄账户。广大民众关心这类问题的程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元的价格是每个街头啤酒馆的话题，不讨论上一番汇率几乎就做不成任何一笔买卖……”（转引自：Aldcroft, 1978, 第172页）

大众的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直至此时的统治下本来就通常是濒临生存的最低线，而且被战争降得更低了，如今仍然广泛处于贫困状态。尤其在德国，货币的自我摧毁在继续生效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会出现导致大城市里闹饥谨的危险，因为农民越来越强烈地拒绝为收取丧失价值的货币而提供食品，而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实物交换只能有限地发挥作用；例如

以“一架钢琴换取供给‘冬土豆’……”（Blaich，出处同上，第15页）。因为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在货币危机中当然更是超越不了心知肚明的土豆标准。在一位当时的矿工的回忆中我们听到昔日的悲曲：

“这种波及面极广的灾难恶化到了难以计量的地步！马克的价值跌到了低得不能再低的最低点。我们领取的工资以兆计，却难以支付日常需求中最必要的物品。一块面包就值1.5兆马克！工人阶级中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鲁尔区所有的城市都有关于食品店被洗劫一空的消息传来……在本周……这些矿山最终被关闭了……失业——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以前我或许以为失业是一场非常令人不快的灾难，但是可以得到救济，所以终究还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是得到了救济，但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救济！救济金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发放，一周一次。我们这些住在单身宿舍的人一周领到2.5兆马克的救济，因为中餐和晚餐由宿舍提供。一个面包当时就值1.5兆马克，剩下的那点儿钱就刚好够给自己买一些果酱之类涂抹面包的食品。如果宿舍的伙食能让人吃饱的话，倒也就说得过去了。中饭……没有肉吃，碗里只是一堆坏烂了一半的土豆，带着一种令人恶心的、微甜的余味，还有一点儿卷心菜。晚上是清得像水一样的汤，我们也像喝水一样把它灌下去，竟没有一丁点儿吃饱的感觉！这样的伙食四五天吃下来，我们总是觉得饿，五脏六腑里有一种灼热的感觉……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失业救济金发放的日子……我会随即立刻冲向面包房买一块面包。一回到单身宿舍，所有的人立即贪婪地吃起来。有几个人一次就把整个面包吃完了，后来又不得不呕吐出来。另外一些人会把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喝酒上，只为了能暂时从饥饿的痛苦中逃脱出



来！为了至少一周中有一天可以有意识地享受吃饱的状态，我一般会吃掉半个面包……”（转引自：Abelshauer/Faust/Pestiza, 1985, 第 50 及以下数页）

这种奇妙的市场经济“提高富裕程度”的结果又一次迅速地从土豆皮的规格下降到了烂土豆的规格！这绝对不仅仅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居民的个别状况（尽管这已足以骇人听闻了），而是大众的命运。首先这不再仅仅涉及集中在工厂和贫民区中资本主义人力资源的底层，也涉及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财富被毁灭，这导致了迄今仍是“国家支柱”的中产阶级和群体空前的集体破产：

“6 万马克银行储蓄的利息收入在 1913 年的时候尚可保证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而……在 1923 年 8 月还不足以购买一份日报……不再具备工作能力或者找不到事儿做的退休人员被迫将家具、家用电器、油画、首饰、瓷器或‘家藏银器’等个人财产减价卖给某位暴发户……而印钞机却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曾经生活富裕、非常受人尊敬的人降格为接受救济的人，如果他们想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的话，就必须排到市政府‘救济厨房’前的长队中去……”（Blaich, 1985, 第 16 及下页）

这里的“暴发户”指的是开始在货币危机的波涛中冲浪的投机商。具有毁坏作用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把那些碰运气的人和投机取巧的人冲向高处，就像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就在普通大众及大部分中产阶级陷入贫困之时，靠投机在危机中牟取暴利的一小部分人却在恬不知耻地展现他们在一夜之间获取的财富，极为神气活现。这一小部分的新贵正是能够在

众普遍贫困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文化“消费主义”和决定时代精神中种种妄想的人。

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种与这种荒唐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抗衡的解放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曾经一度而且以后一直都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有着紧密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嫉恨、卑劣的本能、对危机的非理性解释像在温室里一样茁壮成长。而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进行解放性的批评，而是遍及各个政党的平民主义式的“对投机商的追捕”。

尤其在有着相应传统的德国，对危机的恐惧、幻觉般的反映和对投机商的追捕混合在一起，唤起了反犹太主义这个古老的、久已潜伏的恶魔。就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转轨大危机中出现的“啼鸣骚乱”以及在德国经济繁荣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对犹太人进行集体迫害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中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现在失去理智的反犹太主义浪潮又一次泛滥。而这一次危机的规模要大得多，因而这次浪潮的来势也与此相应地凶猛得多，并淹没了政治体系。在现代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为形式的极右派群众运动，这次运动从根本上认为自己反犹太主义的立场合法，它不仅对左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造成竞争威胁，甚至能够超过它们。以往的倍倍尔—社会民主党因受其蒙蔽而将这种反犹太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小傻弟弟，而现在这位兄弟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庞然怪物。

阿道夫·希特勒，这场畸形运动的“元首”，不仅着手研究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德国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和张伯伦、特赖奇克（Treitschke）、瓦格纳等荒唐的种族思想，而且还把它们合成起来。在他那本1925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他把战争的失败和危机直接归咎于“德意志民族”的

“犹太败血症”，并指责帝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不是那么坚定不移：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一下导致德意志民族毁灭的所有原因的话，那么，对种族问题，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危险缺乏认识即是遗留下的最后一个举足轻重的原因。1918年8月战场上的失败本来应该是能够很轻而易举地被接受的，它们根本就无法和我们民族所取得的胜利相匹敌。推翻我们的并非战场上的失利，而是一股为这些失败铺路的势力，这股势力几十年来有计划地从我们民族手中夺走了赋予人民生存能力和权利的那种政治和道德的本能及力量。旧时的帝国完全疏忽了维护我们民族的种族基础这个问题，所以它蔑视这种给这个世界带来生机的惟一的权力……在战前时期所有种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衰亡征兆归根结底是出于种族的原因……只有一种人在坚持不懈地战斗，这就是犹太人……”（Hitler, 1942/1925, 第359及以下数页）

尽管这种对历史和危机的解释是多么明显地违反事实、不理性性和具有影射性质，但它仍然成功地抓住了德国大众的意识。过去常常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声称，德国的民众不顾“希特勒行径”中的反犹太主义而对此表现出激情时也许根本就没把反犹太主义倾向当作重要问题来认识，这种论调试图以此来减轻德国人对这种荒谬的世界性反犹太主义的宣言所表现出的狂热应承担的罪责（今天又有人更加努力地做此尝试）。换言之：德国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是排斥犹太人的，而是出于社会危机的原因而上了希特勒政党的圈套，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或许还受了某种“法西斯诺莎（Faszinosä）”的大众宣传和瓦格纳为“纳粹党”的登台表演所进行的精心策划的诱骗。所以历史

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这样声称：

“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在纳粹党成员中的比例几乎不超过20%，在纳粹党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倒是对其世界观中的核心思想持一种保留态度。”（Mommsen, 1991, 第424页）

如果说这种观点将推动纳粹党迅速发展的大众运动与纳粹党的（看似隐蔽的）世界观中反犹太主义的“核心”分隔开来，而为大众运动辩护；那么作为纳粹党公开卫道士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则恰恰相反，他试图将大获全胜并成为国家意志的纳粹党与其大批追随者中的反犹太主义区分开，而为纳粹党辩护：

“……1935年的纽伦堡法无疑是……纳粹反犹太主义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同时也是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来约束这种凶恶的、混乱的反犹太主义暴行的一种尝试……”（Nolte, 1993, 第17及下页）

这两种见解不仅彼此否定，而且它们形成的这种互补性无意之间还表明了纳粹分子和德国大众对于彼此的重要性。这种积极的“理解意愿”不是试图去面对德国再无法挽回的历史，而是试图减轻这段历史的罪责；这可能导致以后有人重蹈覆辙。其原因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关于世界大战和危机做出的反犹太主义的荒唐解释绝对不是什么“潜藏在”他们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因此根本不可能被大众所忽视；反犹太主义不仅渗透在那本愚昧之极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弥漫在整个纳粹宣传机器抛出的渣滓里。反犹太主义是整场运动的基础和自我认证，后来还提升为国家的教义。由于反犹太主义这种思想

体系和纳粹的动员活动的联手涵盖方方面面，所以投奔纳粹党及其“元首”的人根本不可能“置之不理”，反而正是“因为他们反犹太主义才予以支持。

这场大规模的危机使得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滋长，自由主义的祖先们从启蒙运动时期以来就已经自行为其打下了思想基础；但是只有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真正具有反犹太主义合法地位的群众党派，并且能够通过民主选举掌握政权。在德国，不仅仅是在通货膨胀中破产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盲目信从反犹太主义的解释方式，而且这种恶性的盲信在各个阶级和阶层中蔓延。因此 1925 年希特勒满怀骄傲地断言：

“不管怎样，在 1918~1919 年间的冬天，诸如反犹太主义的东西在开始慢慢地生根。但是后来的纳粹党运动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推动着犹太人问题的解决。首先它使这个问题不再局限于上层或小资产阶级中的狭隘范围内，并转换为一场大型群众运动的推动力。”（Hitler，出处同上，第 628 页）

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来自下面”的反犹太人的街头暴乱（主要是在慕尼黑和柏林，但也不仅限于这两地），并且没有遇到有力的反抗。正如在 1873 年后的“崩盘”时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极度通货膨胀的 1923 年犹太人在街上被殴打，犹太人的商店被劫掠。在 1924~1929 年间犹太人的墓地不断被褻渎，还有无数对犹太教堂的袭击以及其他反犹太主义的暴行。而且这些暴行常常是青少年、甚至中小学校的学生完全“自发”所为（Walter，1999）。这些纳粹分子可以在这种社会上四处翻卷的反犹太主义波涛上游弋。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才稍作间歇。这使得各国政府才能够通过速见成效的节约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中的复苏”为代价）、通过货币改革（以最终消灭大宗财产为代价）、通过部分恢复金本位制（以限制信贷体系的行动能力为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总的来说，其目的在于恢复金本位制，从而在臆想中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如果说美国在1919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英国在1925年也紧随其后达到了这个目标。德国在1924年首先采用了所谓的地产抵押马克作为新的货币单位，这种新货币单位以地产贷款“作为担保”，与旧的马克以1:1兆的标准结算，以期下一步能够向有限制的“金汇兑本位制”过渡。这种“对纯粹的金本位制打折扣的做法”（Aldcroft, 1978, 第152页）在大多数国家得以贯彻，直至1928年。这意味着纸币不再随时能够兑换成黄金，即金币的流通从日常的支付往来中消失了；同时中央银行储备中的增长部分不再是黄金，而是外国货币（即外汇），即中央银行为了达到与另一国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货币（大多为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目标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但是这种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稳定状态让人产生危机得以制止的错觉，而这也只能蒙蔽短短的几年。这种虚假的正常化表象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是：国家免除了自己在他们的债主，即他们的人民那里欠下的高额债务，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贫穷化的过程。在德国，实际收入降到了1913年的一半（Aldcroft, 出处同上，第166页）。怀着将要迎来一场伟大的、意义深远的繁荣的幻想，这台“美妙”机器的机械师和维护者们又一次宣扬一种特殊的乐观主义，就像在对人们实际的经验进行嘲讽。真实的情况是：“通货膨胀中的复苏”犹如在生产和贸易出现严重滑坡的背景下短暂燃烧的火苗；而且从根本上说，即使在货币稳定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正如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德雷克·奥尔德

克罗夫特 (Derek Aldcroft) 在回顾时认为：

“那个时期被大加赞扬的、令人着迷的工业活动更多的是表面现象，而不是事实。生产提高了，但仅是一种极低的水平；在生产率下降的同时，生产一直停留在远远落后于战前的水平上。” (Aldcroft, 出处同上, 第 167 页)

“表面现象”在这里必须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这种繁荣主要出现在投机领域里。如果说这种投机活动在通货膨胀时期是从遭到破坏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发展而来，那么在货币稳定之后投机活动则跨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人们所期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繁荣景象现在提前出现了，其程度和范围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这与给人造成假象的经济繁荣年代的情况完全相似，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合理化问题的辩论和福特主义长久以来尚未贯彻到工业的实践中或曾一度带来“解放”劳动力的消极后果，如今却虚构出即将按照亨利·福特的原则出现一个新的非凡的“长期高潮”的繁荣景象。这个长期高潮似乎只是暂时受到世界大战带来的沉痛后果的阻碍。因为美国明显具备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所有前提条件，所以这种投机历史乐观主义首先在美国开始扩散。在地产热（尤其在佛罗里达）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空前的股票行情热。作为时代见证人的美国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出生于 1908 年) 对到那时为止最大的投机热潮作了如下描述：

“按照当时全民族的情绪，可以勾勒描绘出一副伟大的、持续的、应享有的富裕的图画，正如总统柯立芝 (Coolidge) 满怀赞赏欣喜之情所描绘的那样。对一个崭新的工业和科技

世界的憧憬更让人对此相信不疑，拥有令人佩服的流水线的汽车工业，并且首先是新的无线电通讯控制着这个新世界。那些年里最受欢迎的投机交易对象是 RCA 的股票，即美国无线电公司。这家公司的前景的确充满希望，它从未分发过股息。由于当时这种气氛的形成而衬托、产生了……一种能够自行不断加强的、推动投机热潮涌动的力量。如在佛罗里达州，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吸引着购买者，他们购买股票，从而把价格抬得更高……20 年代末，无数股票的行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这些人对这个过程有全面的了解，他们为了抬高某一股票的价格而联合起来，通过共同的买卖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支股票上来。如果他们用这种方式吸引了无辜的人、贪婪的人或者轻信的人，他们则以高得多的价格将他们的股票出售出去。这就是联合投机集团。”（Galbraith, 1995, 第 81 及下页）

在联合投机集团的周围还聚集着一批数量不断增加的小投机商，这与德国 1873 年经济崩溃时期的情况相似，只是数量大得多。虽然即使在美国一直也有一部分居民可以动用积蓄，但是这已足以制造出一种普遍的投机心态并使在交易所的赌博成为一种“全民运动”，更何况在个人流动资金不足时可以借助贷款参加赌博。当时的一名证券交易商摇着头说：“我曾见过擦鞋匠只用了 500 美元的现金就购买了价值 5000 美元的股票，一切都靠运气。”（转引自：Terkel, 1972, 第 14 页）当这种投机的罪孽登峰造极的时候，著名的股票交易巨头杰西·李尔摩（Jesse Livermore）（几年以后他用合乎身份的方式在厕所里开枪自杀结束了生命）对一个新手说：“年轻人，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大笔钱财，1000 万又有什么用处？”（出处同上，第 17 页）一名记者这样概括证券交易所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富人家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把耳朵往后靠，想探听到有关伯利恒钢厂股票行情变化的重要消息，因为他自己也买了50股。给经纪人办公室擦窗户的人会停下一刻观察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因为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把他劳动的果实换成西蒙斯公司的股票。聪明的市场通讯员埃德温·利夫弗勒（Edwin Levère）……讲述过一名经纪人的仆人在交易市场赚了近25万，一名护士因为得到对她有感激之情的病人的指点而赚了3万美元……”（转引自：Galbraith, 1989/1954, 第89页）

但是这种投机热潮只是一种迹象，表明真正的巨额投资实际上并没有投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尚未完全成熟的各类结构之中，货币资本相反涌入了金融市场。在整个社会未形成对机器、流水线、工厂等的投资热潮，人们反而不假思索地自行将虚构的未来直接在股票市场资本化了。这个“虚构资本”的气泡自然会像1873年那样爆炸，只是爆炸声更大，后果更具破坏性。1929年10月24日这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事实上那一天在美国还是星期四，可由于时差在欧洲已经是星期五了）目睹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崩盘。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专题论著中叙述了这个戏剧性的事件，由此产生的后果又将世界拖入深渊：

“突然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停住了。价格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毫无指望能跟上这种速度。大约在11点钟的时候市场陷入了一片混乱……11点30分的时候市场上充满了盲目的、无助的恐惧，惊惶失措。人们能听见外面街上愤怒的叫喊，人群渐渐聚集起来了。警官格罗弗·惠伦（Grover Whalen）为了维持

秩序向华尔街派来了一队警察。华尔街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等待着，可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没有一个人知道在等什么。有一个工人出现在一座高楼的顶层，他要在那里修理点东西，可下面的人群却以为他想自杀，于是焦急地等待着他最终从楼上跳下来……股票的出售价格和一块黄油面包的价格相当……空气中弥漫着自杀的气氛。据说有11个很著名的投机商已经自杀了……这一切对于那群数量可观的观望者而言意味着他们完蛋了，他们那些短短的财富之梦也消逝了，还有别墅、汽车、毛皮、珠宝、良好的声誉等等……当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终于停止继续扩散这一天的不幸时，已经是晚上7点过8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还坐着那些早上就已经破产的投机商，他们无言地看着交易所自动记录机上的纸带……市场一意孤行，犹如具有一种独断专行的力量，而且远在任何一个人想控制它的人的能力之上……”（Galbraith 1989/1954，第110~120页）

开始人们还以为这种混乱只是在人们对股票行情的幻想过度奔放后出现的一种暂时的“调整”，股票行情随后仍会往上走。但是当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股票依然暴跌的时候，人们才明白过来这种崩溃是持续性的。而且无法挽救。在股票投机热潮以后接踵而来的是空前的自杀浪潮，持续了好几年。从窗口跳楼的破产投机商成为时代见证人和后人意识中的一种神话人物：

“最著名的国际投机商伊瓦尔·库罗哥尔（Ivar Kreuger）……在巴黎的一天晚上出门买了一支枪，然后回到住处，在第二天早上开枪自尽。为了阻止对本已疲软的市场造成不利影响，这个消息在他死后被封锁了很长时间，直到股票交易所被关闭。尽管报界与黑色幽默几乎总是夸张这

场不幸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对这场不幸类似的反应却并不罕见。饭店的服务员对才抵达的客人订房间是为了睡觉还是为了跳楼自杀不闻不问；但是广为流传的关于两个股票经纪人因为共有一个账户而手牵手跳楼自杀的传言一定是不真实的。”（Galbraith, 1995, 第 87 页）

曾被亚当·斯密誉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像失控的机器人把社会生活打了个粉碎，因为“黑色星期五”后投机商的破产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萧条的序幕。受到崩盘重创的美国银行不得不大量撤回海外的投资资金，自然主要是从欧洲撤回投资，这就使国际信贷的种种链环断裂了。突然间“拖欠的”贷款越来越多，因为债权人、储户、投资者都担心他们的钱财受损而试图尽快收回资金，而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债务人因为投机带来的亏损和实际生产的迅速下降却不能够偿还贷款的利息。

这种螺旋性下降的过程每次都是由于新的银行破产引发的，并分步分批地行进。于是，在 1931 年夏天，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被迫承认无支付能力，随后欧洲的萧条时期才真正开始。外国资金的撤走尤其使德国备受打击，1929 年前的数年里，德国 50% 的净投资为外国贷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贷款。被撤回的国际资本贷款总额超过 90%。投机造成的破产和紧随而来的普遍信贷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真实状况。一批批工业企业或者相继破产，或者生产大幅度下降。在美国失业率上升到 25%，在德国超过了 40%，类似的数字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处可见。就连农业国家和原料生产国也因为全球内生产和购买力的急剧下降而被拖入危机的漩涡中。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迅速下降，美国下降了 30%，德国下降的幅度超过了 50%。

萧条时期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第二次较大的浪潮的形式与

通货膨胀截然不同，即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休克。通货紧缩的含义是商品价格以通货膨胀时上升的速度迅速下降。经济发展中的衰退和停滞为通货紧缩准备好了条件，因为由于与资本主义“正常的”购买能力相比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越来越不值得去做真正的投资。基于旧的支柱性产业的衰竭、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框架条件昂贵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实施等各种因素的作用，此乃两次战争相隔的整整20年时间内（1919~1939）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这种基本趋势只能够暂时或者部分地被并不具备真正创造价值能力的（在生产率水平上利用正规“抽象劳动”的）“虚构资本”的形成所掩盖：首先是国家用非正规的方式制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性的崩溃；然后是股票及部分不动产价值通过投机产生的膨胀，其后果是因通货紧缩而导致破产，通货紧缩导致破产的影响比通货膨胀更具破坏性。

对通货紧缩危机过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源于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即虚构投机资本不可避免地贬值）。由此造成的信贷链环的断裂和随之而来的银行相继破产使社会购买力以不断增大的幅度下降：因为银行的贷款都被拖欠，不能再冒新的风险，所以企业再也得不到贷款；直线上升的失业率使大众的消费购买力也同样迅速下降；国家正常税收收入以同样的速度减少。简而言之：到处都资金匮乏，这种状况导致除了股票和不动产价格以外的商品价格也下跌得越来越快。

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危机与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经典”法则之间的关系不大。正如通货膨胀时市场需求的增加并不是因为真正的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扩大，在通货紧缩时市场需求的减少同样也不是社会需求饱和的结果，而是正好相反。如果在恶性通货膨胀时人们数以兆计的收入高得离谱，却不能好好地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的话，在通货紧缩时期人们仍然遭受同样的命运，只是表现方式相反，因为虽然物价急剧下降，人们的口袋里

却没有多余的马克。但是，通货紧缩危机的冲击力却要大多得多，因为在通货膨胀时，虽然价格和收入上升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但总还是维持了一部分的生产，而在通货紧缩时价格和收入的下降幅度却与通货膨胀时的上涨幅度不相当：在通货紧缩时期，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由于赢利不足而自愿、或者因为银行大量破产而被迫完全停产。这就使失业率继续上升，国家收入继续下降，危机螺旋性的上升趋势无法遏制。

1929年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现代化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通货紧缩休克。奇妙的市场经济因为不幸的经历相应地停滞了，从通货膨胀时期“提高福利”的世界最高记录发展到不加隐瞒的全球性饥荒。在美国，一贫如洗的大众驾驶着他们剩下的惟一财产——福特汽车，为了赚取一点儿食物和汽油在大街上四处奔波，无助地寻找临时工作。福特汽车这个金属制成的废铁堆成了新的悲惨流浪生活中最后的家居：这是亨利·福特所许诺的黄金时代拉开的怎样的一个序幕！除了这种奇特的流动贫民窟以外，在郊区还出现了新的大型贫民区，而且也永远不会再完全消失：“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由金属片或者木板搭造的小房子构成的居住区里……四周满是垃圾和老鼠。”（Sautter, 1994, 第371页）人们嘲讽地用在世界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期中在位的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1874~1964）的大名将这些贫民区命名为“胡佛别墅”。在所有的工业大国，忍饥挨饿的人数都在上升。在柏林，一个工人的妻子被问及家庭的饮食情况时答道：

“您每周怎样用8.2马克购买7个人吃的东西呢？‘面包和土豆，’她回答说，‘绝大部分是面包。我们拿到钱的那一天会买香肠。人一周中至少想吃一点肉，但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周的最后两天就不得不挨饿……’”（转引自：

Abelhauser/Faust/Petsina, 1985, 第 335 页)

1931年8月,普鲁士福利部被迫承认了当时令人羞愧的医疗及营养状况,尤其是儿童的情况:

“父母的失业造成了对年幼儿童的营养不良、大量疾病、卫生要求无所谓的态度……由于家里筹措不到看病买药所必需的钱、或者连车钱也没有,因此总是太晚或者根本无法得到医生的治疗,这使得儿童疾病和感冒不断增加……非常明显的是,学校的孩子常患的疾病是由贫血和饥饿引起的。头晕和晕厥的情况非常严重,即使在年龄稍长的孩子中也是如此。对家庭进行的调查证实因为没有钱使得营养严重不良,大量缺乏维生素(水果、蔬菜)。在大城市的某些贫民区中坏血病的症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转引自:Treue, 1967, 第 248 页)

在柏林一所以资产阶级知识界的高层反犹太主义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命名的高级中学里发起的活动名副其实地显示了对广大的群众而言简单的土豆怎样一跃而成为珍品:每个家境依旧较好的孩子天天早上应该给这个区患病的乞丐带一个土豆!1931年的秋天,《福斯》报的记者报道了始终还很干净的中产阶级生活区中家境败落者的贫困,尤其是老人的窘况:

“情况最糟糕的是这些根本就一言不发的人。只要天亮着,他们就失落地坐在宽阔大街的长凳上;过一会儿就沿着饭店的篱笆走,然后站住,呆呆地看着正在吃饭的人,不说话,不乞讨,也不流露出任何感情。”(转引自:Treue, 1967, 第 250 页)

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危机像炸弹轰炸一样把全社会的水平摧毁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水平。这个资本主义的噩梦自然对文化，甚至对那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文明成就也毫不留情。游泳池、剧院、文化设施相继纷纷关闭，图书馆和整个教育事业的预算、医院和医疗服务的预算均被残酷地一笔勾销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所遭到损坏的程度就是与危机第一个阶段的通货膨胀时期相比也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官方经济学的辩护者不是在神圣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摧毁性的内部逻辑中寻找1929年后这场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反复试图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当时绝大多数政府所采取的所谓“错误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府意识到通货紧缩的危险时已为时太晚，在早就必须向经济注入流动资金的时候，这些政府为了避免破产和危机却一直推行了一种“紧缩银根政策”。从三层意义上来看这种判断都是错误的和与事实不符的。

第一，当时在做出大量牺牲的情况下才艰难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这给人们提供的教训似乎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维持经济正常运作的假象而再次开动印钞机！从这种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全世界在金融货币政策上的共识来看，毫无准备地重新转向事态的相反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尽管如此还是彻底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真正改变，固然是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德国是最迟改变货币政策的，因为在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创伤产生的持续影响最大。这样下去的结果是必须再次放弃刚刚才费尽苦心建立起来的金汇兑本位制。惟独美国能够最终恢复到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以及与黄金兑换的义务，从而在它上升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最终建立和巩固美元作为新的全球储备通货的地位。

第三，危机的原因绝对不是流动资金原本的匮乏，在崩盘以

前流动资金甚至过量；但是在 1925 年以后，流动资金的形式不是国家制造的货币，而是股票虚构升值的投机泡沫（由此是银行系统贷款资金膨胀使商业获得资金）。真正的工业投资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日益加剧而被证明无法获利，所以流动资金被投资到金融和投机领域。只要旧工业再积累的衰竭与新的福特模式工业及生产方式在全社会的贯彻推行这两个方面之间的鸿沟无法填平，这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业滚雪球式体系就已经遇到了体系内部的障碍。这个问题显现在货币和金融政策的表层，但原因并非是由这个层面所致。

事实上，两战之间爆发的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过程表明它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爆发。这次世界危机表明，覆盖面广阔的全盘资本主义将整个社会再生产置于它的逻辑之下，但它却是以极为狂妄且又脆弱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没有在历史上长久存在的希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战争经济是现在也以非军事的形式出现的全盘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根本问题的预兆：在全社会占绝对地位的企业经济合理性所要求的各种费用在增加，例如预支费用、附加费用和后果费用，使得货币形式与资本的真正生产两者之间的比例不能再完全相等，而是相互分离，致使危机萌生。

一个发展完备的资本主义排斥或排挤所有其他的成分，并且掌握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却不能控制本身内在的自我矛盾，基本上只能在由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构成的、波及面或大或小的螺旋形发展中运动，直至达到它毫无出路的终点。其实在资本主义向全盘化发展的起步时，它就已因这种障碍而告失败了。假设没有发生战争的话，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渡就不会实现了。这样只剩下超前逃避到新的军备政策和新的战争经济中去：“绝不是经济学的智慧，而是战争结束了萧条时期。”（Galbraith, 1995, 第 91 页）



## 独裁政权与《星球大战》

如果至今尚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试图尽可能地在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中接踵而至的第三轮世界性灾难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分割开的话，实属自欺欺人和篡改历史。如果说人们被迫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与彼此正在竞争的年轻的国民经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等真正的资本主义进程勉强地联系起来的话（但大多受到“受时代制约的”畸形观点的影响，根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实质），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辩护者们则为了抹去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斑斑血迹而在对待 1918 年后的这段历史时遵循另外一种模式。

从现在开始，“原本的”、恢复元气的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与“良好的”西方民主和它们所谓的息事宁人的市场经济被视作一体，与此同时人们将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和不断地继续演进的现代化历史中的一切的罪戾都归咎于 20 世纪的独裁政权，它们是世界大战和世界危机造成的后果，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大名则成为其象征。正如企业经济逻辑不断地将价格成本“外部客观化”，把它推给社会上的失败者、整个社会、其他国家、未来和自然一样，为了转嫁世界继续全盘资本主义的代价，自由主义（它作为基本意识形态贯穿于西方国家所有的政党之中）用奥威尔的语言规则范式把从 1918 年各种不同的现代化独裁政权到它们今天的继承人和受蒙骗者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垃圾场来加以利用。

这些独裁政权源于何处，其思想植根于历史的何种基础之上，与西方市场经济民主的内在于关系又怎样，这些问题都像谜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在意识形态上被资本主义世界排除在

外，完全被视为从历史的深处形成发展起来的“异类”和“陌生的东西”，代表人类阴暗和反文明的一面。“带有西方特征的文明坠入空前的野蛮”（Mommsen, 1991, 第 424 页）是希特勒独裁的标志，这不仅是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典型共识，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深究市场经济民主与纳粹罪行之间，或者与近代史中国家恐怖主义的危机独裁和现代化独裁之间的内在关系、共同的存在环境或者共同的基础，“带有西方特征的文明”的野蛮行径在这段历史中可能是自行出现的。

如果联邦德国的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利贝尔（Hans - Joachim Lieber）以“告密、无情迫害、流放和对‘不同己见者’大量屠杀”（Lieber, 1993, 第 882 页）为结构特征把斯大林主义确定为一个体系的话，则只需大略回顾一下近 200 年的现代化历史就足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结构特征”难道不也正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保守派及其全部政体对付社会的抵制和解放运动所采取的一贯做法的标志吗？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和 20 世纪的独裁统治之间的区别肯定不在此。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史上独裁统治时期进行理论探讨的最初研究就早已尝试运用类似的辩解理论体系，正如里卡德·勒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在 1946 年 [以笔名保罗·泽林（Paul Sering）] 发表的一篇分析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

“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爆发出一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冲击力，以否定欧洲传统中公认的价值观的方式发泄狂怒，其根源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社会事件的另一个层面去寻找……人道主义传统以基督教的形式、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形式构成欧洲各种文明群体的基础，它和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一样，不断地遇到毁灭的危险……”（Sering, 1984/1946, 第 412 页）

值得注意的是：左派人士的阐述中也出现纳粹独裁被“欧洲传统”排除在外的说法，其方式与保守派及自由派人士试图将这块令人作呕的纳粹污迹从整个欧洲这件开明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艺术品上洗刷掉而一再使用的手段一样。于是，近代史应该被解释为善与恶之间、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与各种独裁统治之间出现的根本性矛盾和进行的人类战争和决战；这是一种丝毫不给有可能揭示这些历史现象之间另一种关系的其他观察方式和批判性分析留有余地的解释。

这种理论体系显然是在蓄意转移视线，用摩尼教的方式在区分善恶，它令人疑惑地想起纳粹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而事实上，有人在用神话化和生物化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危机潜能做出非理性的重新解释，这种源于自由主义的神话化和生物化的反犹太主义核心与所有关于“陌生”和“异类”东西的画面和幻想故事重叠在一起——各个层面上的匿名竞争体系已进入人的心灵深处，面临这种隐形竞争的受威胁感试图通过无数用幻想作伪装的表达方式显示出来，尽管（或者正因为）没有能够有意识和有理智地对这种基础性的社会综合症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性思辨。

在通俗文学中，这种神话式的“异形”的表现形式之一曾经是（至今仍是）“外星人的入侵”，例如19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幻小说就被虚构为帝国主义的童话。

早在1898年，著名的H.G. 威尔斯（H.G. Wells, 1866～1946）在他的代表作小说《星球大战》中就描述了来自火星的更高等生物的袭击。无法与之交流的异类尽管与人类一样有血有肉，但是仅从外貌上来看就如同十分邪恶的妖魔：

“它的眼睛下面有一张嘴，嘴角不停地颤动，沾满唾液……嘴型是罕见的V字型，尖尖的上唇，没有眉毛，没

有下巴……让人厌恶……早在头一次接触的时候，第一眼望去我就充满了憎恶和恐惧。”（Wells, 1974/1898, 第21页）

这种用“外星球”的庞然大物来折射自身社会中的矛盾的方法与用“地球”上的事物（首先是反犹太主义）来折射社会矛盾同出一辙，只不过是一种奇异的变体。所有参与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应在镜子中对照一下被折射的东西。资产阶级一般会有意识地用慢条斯理的道德说教来缓解将社会矛盾投射到“异类”上的危险性：所有的人应该“彼此友好相处”——纳粹分子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与自由民主主义者，地球人与外星人，等等。因为市场经济民主的核心意识形态的排斥作用不得始终受到限制，所以被排斥的东西同样会违反常情地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返回来；从根本上导致这种妄想狂式折射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相互联系被完完全全确定为是“良好的”；只要独裁统治与市场经济民主之间的共同处、接触点和重合处尚未能够彻底被忽视，那么它们会被用作“原谅”独裁统治和在历史上使独裁统治取得部分合法地位的手段。具有典型性的是（尤其在80年代引起“史学家争论”后的德国）这一点只针对纳粹独裁，而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前苏联的遭遇就要坏得多。

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的全套辩解观点也同样技巧精湛。他首先原则上坚决信奉西方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进步”和世界的“西方化”。于是他在半途中越来越多地着手研究与此相关的基本观点：“根本意义上的现代化革命即是在200年前开始于英国而率先在美国完成的自由资本主义或者自由经济的革命”（Nolte, 1987, 第20页）。他激烈地反对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与资本主义和战后民主之间建立一种负面的内在联系：“为了抨击联邦德国或者资本主义体系而批判第三帝国的人会被证明他是多么的愚蠢”（出处同上，第33页）。诺尔特的思

想出发点与他的反对者诸如民主主义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出发点在大体上没有区别,后者也说过相同意义的话:“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的开放是我们战后时代伟大卓越的、富有智慧的成就,这正是我这一代人能够为此感到骄傲的”(Habermas, 1987, 第75页)。

诺尔特在进一步的论证中将所有激进的社会反抗运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从总体上作为一种“古老的”、独裁的、空想的、“亚洲式的”并且完全不能接受的反动归因于现代化可惜难以避免的牺牲品,这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识相距不远。不过,诺尔特的特色在于他以一种迄今在“享有信誉的”学术界中从未有过的坦率试图将纳粹独裁统治“相对化”和“历史化”,其方法是他承认纳粹独裁统治(有别于东方的国家共产主义)与西方世界有着某种正面的亲和性,至少承认纳粹独裁在反抗真正的“魔鬼”中,即反对共产主义中起过一定作用:

“……在纳粹主义用巨大的,甚至可能是过大的能量来抗拒前苏联的全部要求时,是否至少就此而言能够赋予纳粹主义某种历史的权利,这个问题已完全不能够再回避。如果存在一个促进科学进步的推动力,那么这就是这个推动力……”(Nolte, 1993, 第19页)

其结果必然是也将奥斯威辛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加以相对化,而按此观点,历史真正的罪人应该是进行过被诺尔特称之为“阶级谋杀”的俄国共产主义者。诺尔特认为其余种种皆源于这种“原罪”,因此“第三帝国所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反动,或者是一种失真的模仿,而不是首次的行动或者原型”(Nolte, 1987, 第33页)。希特勒及其纳粹罪行退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之后的次要位置上:

“难道纳粹分子、希特勒也许不正是仅仅因为将自己及其同类视为‘亚洲式’行为潜在的或者真正的牺牲品才做出‘亚洲式’行为的吗？古拉格群岛上的劳改营不是比奥斯威辛出现得更早吗？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谋杀’不正是纳粹分子的‘种族谋杀’吗？”（Nolte, 1987, 第45页）

这样，奥斯威辛就消失在“过盛的能量”这个“令人心领神会”的概念之中，纳粹独裁统治在用这种“过盛的能量”抵制“前苏联的多方面要求”中“劳苦功高”，几乎成了西方民主的前哨。这种阴险的论证本来只是一种极低的声音，被视为是在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学术讨论”，而民主对此所表示出的愤怒情绪本身却是模棱两可的。因为问题在于：不知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对诺尔特提出的批评事实上首先是针对诺尔特将纳粹罪行相对化呢，还是他们大发雷霆是因为这种相对化自身积极要求确立一种具有跨越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至少可将纳粹主义中的“一部分”纳入到市场经济民主的大家庭或者家谱中，而共产主义相反应该“永远置于其外”。对诺尔特的论述所感到的不快也许是因为他无意之中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其方式是他同他的民主主义批评者一样以现代中绝对的“善”为前提条件，但是又同时假定并承认某种“恶”的表现形式，即纳粹独裁统治同现代化这种“善”之间的亲和性：这样，在诺尔特的观点中，对西方民主的绝对肯定就转变为对纳粹独裁统治的相对肯定。

这场阴森恐怖的争论给出的谜底，不可能不是为了毫无漏洞地将“恶”排除在外而回到把市场经济民主与20世纪独裁统治的各种可疑的共同性区分开来以保持市场经济民主纯洁性的道路上，而显然是认为需采用截然相反的视角来观察整个现代化历史，并采取与诺尔特完全不同的做法：没有将资本主义、自由主

义和市场经济民主视为具有跨越性的积极的东西，而是与之相反，将其理解为用奥威尔的词汇加以美化了的世界，即那个由于“价值的利用”这台鬼使神差的“美妙机器”所造成的消极的、压制的强制性社会；市场经济民主与20世纪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共同之处与此相应地没有被阐述为“请求原谅的”事实，而是解释为那种“自由资本主义真正的现代化革命”自身在某种条件下成为事实的特殊表现形式。按照这种反面的批判性观点，奥斯威辛尤其可能仅仅被视为以霍布斯、曼德维尔、德·萨德、边沁、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难以超过的最极端的后果，而与诺尔特背道而驰的恰当做法似乎应该是对前苏联“追补现代化”的政体用一种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

从这种视角出发，重要的是20世纪所有的社会形式中共同的、一致的、具有跨越性的消极基本形式，即在十九世纪中形成的商品生产工业体系，它使“抽象劳动”具有强制统治的地位并强制所谓的民族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市场经济民主与现代化独裁统治或者危机独裁统治之间由于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区别因此是次要的，而且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世界不同地区历史上的非同时性的结果。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与20世纪独裁统治之间的区别，还是这些独裁政权相互之间（主要是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与纳粹政权）的区别都只能在这个基本区别的背景下加以研究。法裔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目光尖锐地看清了结构上的同一性与西方民主、前苏联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在历史上的非同时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他的有关讲稿在二战后就立即出版了。科耶夫做出的总结是：

“从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与随之

而来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革命只有一个作用：使边缘地区的落后文明适应欧洲最先进的（真实的或者虚假的）历史地位。如果说俄罗斯的苏维埃化或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执政与（以希特勒主义为过渡阶段的）帝国主义德国的民主化，或者与多哥的独立，甚至与巴布亚人的自治的意义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仅仅是因为中苏实现罗伯斯庇尔式的波拿巴主义后推动了后拿破仑主义的欧洲加速消灭革命前那些或多或少落后于时代的残余。”（Kojève, 1947, 第 436 页）

直至今日，西方民主思想还不能够采取这种辩证的、反映同一基础上的非同时性的历史视角，尤其是将前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和以后在前殖民地建立的民族革命政权）理解为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政权通过推行修改过的国家经济而出现的复活。这种思想早在相应的历史事实出现以前就以幻想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1990 年的先知幻想小说《另一面》中。在这本小说中不仅仅预见独裁统治、世界大战和被炸毁的城市。帕泰拉（Patera）——一个掌握着虚构的中亚梦幻王国的独裁者——有一个对手名叫赫尔库勒斯·贝尔（Herkules Bell），是来自美国费城的“腌肉王”和百万富翁，简称为“美国人”，他为了解放这个王国而闯入这个国度。他的宣言被饰以相关的象征意义：“一位头戴冠冕的自由女神手拿一块牌子，它的背面写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社会、科学、法律”（Kubin, 1994/1909, 第 156 页）。但是噩梦般的情节却显示了帕泰拉和贝尔就是同一个人，合成一个有多种化身的庞然大物，可以将它理解为产生于下意识的关于现代化的隐喻：

“即使我不能理解或者解开这些矛盾——这些到底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恐惧全然消失了；帕泰拉双重人格的幻景占



据了我的心灵，结束了我内心中达到了极点的怀疑和害怕……帕泰拉和这个美国人相互紧紧地抓着，扭曲为奇形怪状的一团，这个美国人完全钻到了帕泰拉的体内。一个巨大的、显目的物体四处翻滚。这个无形态的生物像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柏洛托士一样变幻无常，它体表上出现了千百张面孔在不断地变幻着，喋喋不休地说着，唱着，乱叫着，一会儿又都消失了……帕泰拉的形象一直是不解之谜……这个美国人今天还活着，全世界都认识他。”（Kubin，出处同上，第191页，第238页，第249页）

在帕泰拉与贝尔之间这种离奇的同一性中显示出与民主和独裁之间、与某种吉基尔医生-海德先生〔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Stevenson）所著小说《化身博士》中具有善恶两面性格的人——译者注〕同一性有关的东西；或换言之：首先在美国形成的西方战后民主无异于一种拜物教的、事实上与人类理性背道而驰的社会机器的独裁统治，这种独裁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加以客观化而成为“第二自然天性”。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也就能够较为容易地认识到：在20世纪的独裁统治中，只不过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恐怖统治以变化了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模式再次出现。早在霍布斯的教义中就包含了自由主义与独裁的这种同一性；在第一位自由民主主义者边沁那里，这种同一性则成为纲领。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个纲领的目标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就完全清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怖统治”应该被心领神会地接受，直至人力资源的条件成熟到能够自动用民主的方式实行这种暴政统治。只要这个崇高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对自由党人和民主主义者的先驱边沁而言，包括刑讯在内的所有强制手段都是合理合法的。

如果说边沁对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同一性在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尚处在早期阶段的条件下做出了直接、明确、幼稚、公开的假设的话，那么在1945年后的西方思想中这同一事物的两面之间的同一性便成功地被抹煞，就像边沁在一步步实现他的纲领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奥威尔的“自由”概念来从意识形态上抵制同一社会机器更加原始的、国家专制的、独裁的实际运转方式。用公开的、血腥的镇压加以威胁的办法在组织机构上一直存在，自由主义对此从未提出过怀疑（这类威胁在西方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均在法律上加以规定，以应付出现诸如“内部紧急状态”、“突发情况”等人力资源大规模反叛的情况）。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制约束和苛刻要求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時候，人力资源可能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利，至少允许参与对自己的种种压制方式，继而听任被马克思称为“社会环境无声的逼迫”的摆布——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决定了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与国家资本主义独裁之间在质上的关系所在。

到了以这种方式继续发展的后期阶段，暴力主要被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用于对外“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行为无异于最粗野和专横的屠夫、违法者和独裁的暴君，尤其是在对待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的时候。只要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不愿意在采取较大措施（例如越南战争）的时候弄脏自己的手，它们倒就从不介意去支持、扶植最卑鄙的“白色”专政，并自己亲任地方长官。过去与现在一直是根据情绪和利益关系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例如今天在对待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问题上）。这些世界警察自己私下里议定什么是民主上合理合法的，什么是独裁专制和恐怖主义的等等。

除了用霸道的强权规定诸如侵略、合法自卫及“挽救人权”等的定义以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民主”倒是首先合理

合法地将由历史上的非同时性造成的差距充分为己所用，并指责处在更低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专政国家对内、对外行使的强权。与此同时，它们不仅仅在意识形态上美化自己的强权，而且由于它们比直接动用武力更恶劣的主要罪行源于世界市场“无声的专制”及其盲目的竞争关系，因此根本就不被视为犯罪；今天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依然一样。

乔装打扮成“和平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在发挥其具体作用的时候让很多人，尤其是儿童成为其牺牲品（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其数量之大超过了由现代所有专政所引起的战争及外来压迫而造成的牺牲，可是尽管如此却只有后者被列入了牺牲者之列，而在中性的统计数字中根本就没有把前者计算在内。因为凶手与牺牲者之间的关联只有在受到外来武力侵犯时才是直接明了的，而经济暴力却在社会的中介调解之中销声匿迹，并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表现为“自然规律性”，凶手和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执行者甚至可以以政治上的伦理说教者自居，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要求世界同情和帮助那些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做出牺牲的人。他们可以依赖在高度发达的边沁式民主社会中将资本主义的这种虚伪本性大量地灌输到人的思想深处的方法，不再把自己视为独裁强权的罪犯和执行者，而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的人。

只要 20 世纪的各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同时性没有受到重视并且各国继续排斥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向外转移”自己曾进行血腥镇压的过去，而与此同时民主专制“无声的”经济形式仍然在任何批判性的反思范围之外，那么 20 世纪各种不同的独裁统治就会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外来对手。正如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声称的那样，事实上它们绝不是与这种民主在结构上和发展史上同时存在的“可以与之匹敌的统治形式”（Fukuyama, 1992, 第 11 页），而是体

现了这种民主在不同时代的陈旧的自我。这样看来，被宣称为“胜利者的制度”的西方战后民主并非独裁统治的外来对立面，并非是最終达到的“历史的终点”（Fukuyama），而是深入人心的独裁统治形式和边沁体系进一步的发展形式，这个体系的内部收藏着早期的专制形式和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危机共同造就的大独裁统治形式。

### 劳动者国家和领导者社会主义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独裁与民主在结构上的内在同一性在几个引人注目的社会中突出地体现出来：前苏联、美国 and 德国，这对于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情况具有典型意义。首先有两方面的因素体现出专制与民主的内在同一性，其一是“抽象劳动”的转形，其二涉及一个工业资本主义中“领导人体系”的观念与实践，在这一体系中现代管理才得到了其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诸如勤劳和节俭等资产阶级的第二美德仍被视为一种道德规范的组成部分，几百年来这一道德规范曾决定商人、奋发进取的“企业家”和那台“美妙机器”的执行者的意识。尽管如此，在不同的职业活动之间仍然出现了并不微小的区别：根本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一直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执行机构，然而（自从19世纪初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体系以来）这种劳动显而易见是为“下层的”人力资源保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奴役的特点从外部来看尤为清楚；像曼德维尔这样的人也曾坦率地说：他们想利用“穷苦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来为自己去做不愿屈尊的事。旧时的资产阶级及其德高望重者绝对不会与这些“手”，即工厂的工人平起平坐。至少在欧洲，人们倒宁可遵循“高雅的宴会礼仪”和效仿贵族的

社会文化规范。虽然贵族的封建统治地位从专制制度以来大部分转入了官僚主义的现代国家机器和军事—工业的复合体系的控制中，但是贵族在“上流”阶层中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为人们所效仿。

这些“上流阶层”还不愿意仅仅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机制的领导精英，他们与“抽象劳动”体系之间似乎还有某种外在的联系。正是这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在工厂纪律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偏偏积极地从自由主义那里接受了“劳动”这个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并且还以为可以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看上去自由主义似乎错误地将这个范畴收留在它的思想体系之中，它仿佛只是想借此掩盖被压迫的“劳动者”与近于享有封建特权的“不劳动者”之间那种完全不合法的关系。

工业化的大规模战争使整个社会融合同化并且相继引发各种危机，但是它将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完全毁灭了，不仅仅是从社会经济上，还从思想精神和社会文化上。就像恩斯特·荣格尔所阐述的那样，他们认识到必须听任一种无法控制的历史进程和一部独立运转的社会机器的种种强大隐形力量和“巨大”威势的摆布，这种认识渗入进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中。那种兴致勃勃的自动屈从是致命的，在自动屈从的过程中领导精英们开始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人力资源和资本主义这个庞然怪物的“寄生虫”，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是自负傲慢的上流阶层与工业“劳动”之间保持的那种距离不能持久下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向“福特主义”的全盘资本主义的过渡需要一种新型的、地位有所下降的领导精英，正如他们的原型是在战壕中诞生的那样：工业化的管理，马克思所指的“资本的军官及军士”。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充满预感的抽象概念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向全盘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完全变为现实。

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工人运动也因此而失去了特权，再也不能作为“抽象劳动”性一的、有组织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这种自我意识继而转入从此被削弱领导作用的精英们的思想之中，因此不再仅仅存在于左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还存在于右派、法西斯、自由民主的种种变体中。在福特主义兴盛的20世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的管理人员将自己视为“人手”，是在资本利用过程中社会劳动机器不可或缺的、地位平等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不再把自己视为资产阶级，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广大的“劳动社会”中的劳动者，这个社会通过资产阶级自我奴役的成熟形式会变得更加无情。把过去的世纪称作“资产阶级的世纪”加以责骂，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时尚。

恩斯特·荣格尔对历史上的施虐—受虐狂关系天生嗅觉灵敏，又是他首先将资产阶级中的劳动者或者劳动者中的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加以定义。他那本有名的名为《劳动者》的书出版于1932年，在这书里“劳动者”这个概念被上升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形象”，荣格尔以他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个概念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劳动者与一些基本的力量有密切关系，而资产阶级连对这些力量的存在从来都一无所知”（Jünger, 1981/1932, 第19页）。由此而对“劳动者”这个概念进行了必然的扩展，劳动者的“形象”现在决定整个社会：

“劳动者指的既不是从前意义上的一个阶层，也不是十九世纪革命性的辩证法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我们认为……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与此相反，劳动者的要求超过了所有阶层的要求。尤其是将劳动者简单地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的话，就绝对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意味着仅仅看到他们种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而没有注意到这种形象。”（Jünger，出处同上，第77页）

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即旧时的资产阶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消亡了，但却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在才在向着它的全面发展过渡中甚至从外表上也显示出是一个“自动运行的主体”（Marx），而从它内在的逻辑性来看它一直就已经是如此了。只有在边缘地带，旧时的特权资产阶级的残余还能够保留较长时间（直至今今天尚有部分存在）；但不再是社会中坚的领导阶层，而只是作为某种志愿消防队的名誉董事而存在。恩斯特·荣格尔破译了在这个处于福特主义初始阶段新的、覆盖面广泛的“劳动社会”里资本主义自由的真正特征，即使是“统治者”也屈服于盲目的社会机器的强制力；就像在工业技术装备战中已有过的经历那样，这并不是在揭发一种惊人的苛求，而是被动地容忍一个动人心魄的事件，从现在起这个事件会以民事的正常状态进行：

“在劳动的世界里，每一种对自由的要求只有在它是作为一种对劳动的要求提出时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个人对自由的标准与他对劳动的标准正好相互吻合。”（Jünger，出处同上，第68页）

资产阶级作为臆想中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地位已经不存在了，而必须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中去。这样，18世纪进步的思想家关于人与社会最早做出的机械论阐述直到现在才完全实现，并且被精英们在意识上接受。在这个问题上，荣格尔宣称要“用劳动者的模型取代资产阶级个体”（Jünger，出处同上，第121页），“从自由民主主义向劳动国家过渡”（出处同上，第246页），“劳动计划取代社会契约”（出处同上，第282页）。荣格尔采取了类似于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的做法，也用对福特主义加以理想化和以“润泽的温情”表示“对机器的爱”来抵偿和排除这种向“巨大的”社会机器无条件屈从的后果。早在1929年，这

位《钢的雷暴之中》的作者就在他《冒险的心》一文里记下了这种特别的感受：

“就在昨天，当我晚间在东面我所居住的地区沿着一条偏僻的街道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一幅孤寂的、阴沉的英雄史诗的画面。透过一扇装有栅栏的地下室窗户能看到一间机器间，一个没有经过任何人士保养的巨大的飞轮在绕轴旋转，发出吱吱的声音。里面一股温暖的、油腻的水汽从窗户飘出来，耳朵被一种稳定的、受控制的能量发出的令人惊叹的运转声吸引住了。它像豹的脚掌一样轻轻地踏入了人的知觉，还伴随着细微的沙沙声，像是从猫的黑色毛皮里传出来的一样，钢铁也在空气中发出鸣叫声——这让人有点昏昏欲睡，同时又非常让人振奋。”（Jünger, 1987/1929, 第134页）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次大战间隔期间温厚的、被驯化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包括其极“左”激进的变体，它并不是因为政治上和策略上的错误而失败。事实上传统资本主义的告终使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提出的粗略批评的精髓永远地过时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固守住资本主义的一种尚未发展成成熟的形式，它在被客观化的资本主义范畴内将一种组织社会学上的对立主体（“资产阶级”）误解为整个生产方式的造物主，只是与“特权”和所谓的“统治者”的“支配权力”发生摩擦。已经告退的旧时资产阶级以经理、福特主义的计划人员和“劳动国家”的军官团队等新的形象收回了“抽象劳动”这一被社会主义占据的范畴，揭示出它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本质，借此否认社会主义本已坠落的、与之对立的方案中的核心部分。面对法西斯和纳粹对“劳动”的篡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始终束手无策。挂在奥斯威辛大门上的“劳动让人自由”这句标语揭露



了对“劳动”的自我意识的真正实质，工人运动将劳动的这种本质误解为具有解放意义的准则。

与此相反，这种旧时社会主义对“劳动”的自我意识却能在前苏联、后来在中国和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的政权中完整地存活下来；但这仅仅因为那些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党正是用了战争期间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这些方法甚至能令一位普鲁士的将军着迷，那些社会主义政党在“追补的现代化”中接受了历史性地实施商品生产体系的真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任务。这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军国主义者荣格尔非常高兴地，甚至在布尔什维克的死敌身上嗅到了近亲的味道，1932年他在他的那本《劳动者》中着重指出：

“在有些国家，有人会因为破坏工厂而像擅离岗位的士兵一样被枪毙，在这些国家里就像处于被围攻的城市中一样15年来一直实行食物定量供应制——这些国家就是那些已经最明确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面对数字可以任意增加的这一类论断，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涉及的情况虽然在1914年还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今天却是每个同时代的人都熟悉的。”（Jünger, 1981/1932, 第260页）

正如资本主义的工厂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利用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在组织上也一直曾是强制性的，对生产者而言也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和类似军事化的强制力。而且同福特主义将榨取生命能量的“劳动”浓缩化的程度提高了很多倍一样，社会主义推行军事化的程度也超过了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形式。世界大战、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和危机管理机构都强行贯彻军事化，而且不仅将此作为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外部特征，还把它作为必须随同企业管理合理化一起实行的“人类的内部军事

化”——直至这种特征在结构上和大众意识中沉积下来，在1945年后至少在西方不再能够被人觉察到。

在痛苦地被驱赶进历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英雄史诗的”危机时期，已大众化的领导主体还是尚未完成的理想模式，其象征是技术上已经出现年代排列错误的标志，诸如锤子和镰刀或者纳粹的铁锹图形。在纳粹德国的公共场所和在前苏联一样挤满了肌肉发达的“男性工人”的塑像，这种一致性真是达到了可笑的地步；两个地方都在创造“劳动会战”这个概念。

在希特勒政党取得胜利以后，甚至有不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投奔这个新的“德国工人政党”，或者至少欣赏这个政党的劳动激情。卡尔·布勒格尔（Karl Bröger），这位难以形容的工人诗人，以谱写民族主义世界大战主题的蹩脚感伤歌曲而引人注目，1935年他居然心安理得地在一本献给“创造着的人民和他的第一个工人”的集子里面刊登了名为《汗水的赞歌》这种令人恶心的文学作品：

……你的汗水汇成的江河，  
你劳动的心血聚成的江河，我的人民啊，  
滋润着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  
全世界  
没有一种油或者香脂  
能比从你布满皱纹的额头流淌下的江河中  
任何一滴汗水更甘美……  
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庄严，  
因为你在劳动，我的人民啊。  
而且知道任何虔诚  
都不会比对你那条永远奔流的汗水之河  
的虔诚更伟大。

但是这个对劳动充满崇拜之情的俗气的音乐作品所产生的背景此时已不再是下层的、按照阶级加以区分的“人手”的自我意识，而是整个社会 and 所有阶层都以原始福特主义的方式向扩展为全盘资本主义的“美妙机器”的人力资源的转变。亨利·福特，这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人（他的相片曾一度摆放在希特勒的办公桌上），早已将自己和与他同类的人宣布为“第一批工人”中的一员，尽管比起咏唱同一首歌的欧亚歌手所具有的英雄主义和浪漫色彩要逊色一些：

“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劳动……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要求劳动的权力……按照我的观点，人除了不断地劳动以外也根本不能做其他的事情。白天必须想着它，晚上梦到它……因为它是我们每日生计中具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意义！劳动是支撑世界的基石，是我们自尊心的根源。而且雇主有义务承担比他的雇员更有意义的劳动。面对世界认真履行自己义务的企业家必须也是一个能干的劳动者……”（Ford, 1923, 第 10 及下页, 第 52 页, 第 140 页）

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负责教育和培训的检查官——纳粹分子维尔·德克尔（Will Decker）1933 年在一本为在铁锹的标记下前进的青年人所写的普及性小册子里作了完全相似的论述：

“我们把位于劳动者之上的领导人同最贫穷的手工业工人一样摆在这种朴素的劳动中的同样位置上和没有任何前提的状态中，从而让他知道必须用手创造劳动而不带任何私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青年义务劳动军中新的内容。这种方针最终会让劳动与资本两者再次汇合，因为它们本来就属于

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Decker, 1933, 第 20 页)

当各个层面上的“统治者”的活动如同“人手”的劳动一样被归于一种形式和完全统一起来以后，当他们的活动体现为人类抽象能量付出量的统一单位时，“抽象劳动”的体系才完全地得到恢复。存在的区别不再是本质上的，也不是形式上的，而只是功能上的。洋洋自得地吹嘘早期资本主义劳动时代的经理们的典范与自然灾难或者战争中的英雄的楷模相似，这种英雄既是首领又是组织者，同时又是大众血肉的躯干，富有牺牲精神地抵抗着自己创造出的困境的神秘力量。在普遍弥漫着的癫狂气氛中，这类身居上层的疯狂者又担任着管理社会疯人院的职务，他们的确也就只是作为领导精英而与其余的“劳动大军”有别。

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尔德(Gottl-Ottlilienfeld)的组织经济哲学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的“领导者社会主义”这个受到倍加钟爱的概念，这种理论描绘出了代表“技术理性”的一种等级制度的、“组织”结构与一种工业技术专制相结合的封建资本主义的典范的漫画：

“拥有资产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它与在劳动中起领导作用的集团存在内在关联；亨利·福特也持相似看法而把自己视为资本的管理者。这种领导者是基于自信的工作意志才具备这种资格，然后经过筛选脱颖而出……只要这种观念从上而下打动越来越多的基层大众，每一个领导者后面都会在工作中聚集一批追随者。这样才不需要很多的言语，企业团体就会圆满形成，今天的所有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部分与企业团体达成形式上的统一至关重要；这样，工业企业才能壮大，成为乐于为更加广大的集体工作的人的集体。”(出处同上，第 37 及下页)

自由主义与法西斯在术语上这种紧密的亲缘性一直在今天也体现在对“企业集体”的意识形态的拙劣描画中，这种集体意识与战壕里的团队精神相似得难以分辨，尽管在此期间这种根本的起源已被忘却。这种“领导者原则”源于19世纪资本主义劳动宗教先驱者的主张；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笔下的“工业巨头”，即所谓的“工业贵族”，只是一个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人物，如今却可能出现在真正的生活中，当然是以完全改头换面的形象。如果说对19世纪的工业劳动在形式上进行“封建主义化”的思想确实带有分等级的旧式家长式统治特征的话（像俾斯麦或者路易斯·波拿巴的社会福利国家），那么虽然今天它的称谓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被军事化、被合理化的形式却是“劳动会战中的战友”，这些战友有着不同的级别，尽管如此却都一律成为用同一种材料铸成的“美妙机器”中的车轮和螺钉。这种由“领导者社会主义”、“工业封建主义”和人力资源的民主平等构成的荒唐混合体在纳粹意识形态中尤其明显。在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民族劳动制度法》的引言中这样写道：

“‘社会荣誉’的定义首次被确定下来。雇主必须把他的企业作为从集体那里借来的封地那样来加以管理。如果没有履行他对他的职工和集体利益应尽的义务……将来会由名誉法庭诉讼程序来强迫他想起他的义务。这也同样适用于雇员，如果他忘记了应对企业所尽的义务，破坏了工作的和谐，或者亵渎了集体精神的话。”（Münz, 1934, 第15页）

但是，这种新的“领导者原则”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劳动会战”中，成为在向高度工业化目标的行进过程中同一“工人阶级”的军官和士兵的准军事组织形式，一切从形式上都统一属于“全民所有财产”，“全民所有财产”与处于发展初期的国民经济

这台“美妙机器”的法律形式没有区别。这就使“第一个工人”亨利·福特越发要坚持强调这些原则。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尔德把福特的观点以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用“封地”来重新表述，虽然使它听上去更中性了一些，但却仍然保留了“资本家在效劳”的思想，这些资本家对劳动国家中更高层次的“人民共同体”负有义务：

“资本……是……大众交付给有关人员管理并且对大众有益的日常劳动储备基金。受委托的管理者绝对不允许把它视为自己的收入。是的，任何人都不能允许把这种盈余视为个人的财产，因为这不是某个人创造的……真正诚实的工厂主也只将这种盈余视为受人委托管理的财产……”（Ford, 1923, 第226及下页）

纳粹喊出的“创造性”的资本不同于“攫取性”的资本的口号和与此相关的对“人民共同体”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式资本主义的幻觉一起贯穿在福特的白色变体、希特勒的棕色变体和斯大林的红色变体之中。一个完全被合理化和完全被军事化的社会机器的信托资本家或者经理也只能像在美国变体中被视为“创造性”资本意义上的一种白色“领导者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就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前夕，不停地大谈特谈劳动哲学的亨利·福特同样宣传将“领导者思想”作为教育的目标：

“目的是找到并武装年轻人，以使他们能够发展成为人们的工业领导者……这是我们的教育目标，也许我们努力的结果是找到了几个真正的工业领导者，他们有能力为无数情愿仿效他人的人做出最好的成绩……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教育计划本身就会制造出领导者。但是却有可能想出一种方法，一旦有这样的人出现，借助于这种方法就会立即辨识出

来……” (Ford, 1930, 第 286 页)

## 失去的梦想和资本主义的暴戾

对于都在建立向福特主义的全盘资本主义突破的相关体系的前苏联、纳粹德国和美国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畸形变态都同样表现为同一基本结构的形成。在这种共同的背景下，历史的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前苏联最为明显。前苏联的社会与美国和纳粹德国相比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具有历史上的非同时性，是 20 世纪国民经济“追补现代化”的杰出典型。在前苏联和以后的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中，都同样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激情。作为东方和南方的法国革命，这些政权代表了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及其“抽象劳动”真正年轻的成长阶段，几乎是时间相对意义上的一种较早的物态。就独裁的特征而言，与德国的纳粹主义相比，前苏联不是危机独裁，而是一种发展独裁。从内在特点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别。

这种局面还包括前苏联在“追补现代化”时面临的某种不得已的历史困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或者前苏联的独裁统治本应进行相对化和“历史化”，即刚好与诺尔特的理论相反。这个说法绝不是为了要原谅前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所犯下的特殊罪行，而是为了正确评价资本主义世界边缘地区的困难局面，但这个说法却不能用于解释纳粹德国的情况。前苏联的这种困境具有双重含义。

其一：前苏联除了沿着西方资本主义预先确定的发展道路前进以外基本上别无其他选择，尽管它奠定了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的正式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恰好能够反映正在“追补”过程中的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竞争。从历史上来看，这种世界进程在

18世纪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在某些方面还更早）。在20世纪才进入此进程的那些国家中的始发条件虽然在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它们并不是真的处于17或18世纪，而是在一个已经被资本主义改造了的世界中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远在西方的“外面的”世界，也是走在前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些边缘国家社会内部的体现，即这些边缘国家对国际市场及其标准不仅形成限于技术方面或者早已成为客观事实的依赖性，而且资本主义也已塑造了“世界意识”，“这个世界意识”通过受资本主义深刻影响的媒体将资本主义的范畴和标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知识界。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经过修改的前苏联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绝不仅是在沙皇统治下俄罗斯“不发达状况”的产物，更多的是大体上被资本主义驯服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表现形式（因此列宁和斯大林都强调了“西化”）。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源于西方的国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分支和整体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过西方史上适应商品生产的工业体系的“抽象劳动”的提纯过滤。那么一个与历史潮流相悖的“无辜”的新解释又从何而来呢？

其二：在由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标准决定的世界里，历史上的非同时性却意味着即使是在由西方预先规定的发展道路上追赶也不可能再以同样速度重复同一种过程，而是在20世纪的水平上起步。一方面，以一种不同形态的国有社会主义的合法地位重复在17、18世纪以国民经济的形式进行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这种过程必须以高额的工业资本投入为前提，并还不仅仅是将资本投入工业，而且还是在原始福特主义的条件和形式下进行。因而，让大众承担的也是双重负担：他们不仅必须承担创造一套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费用，还得承担神速地从头建立起具备同时代生产率水平的新兴工业的费用。

今天在为西方狂热的民主思想辩护的文献中不厌其烦地罗列



出的种种“共产主义的罪行”无异是早期资本主义恐怖景况的重复，只是在时间上被压缩了。只有接受过民主的排斥技能培训的“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才能有这样的想法：把前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定义为一种臆想中的反资本主义途径的结果（这样，每一种有关真正途径的想法会自然被驱除），同时完全忘却在实施资本主义过程中长达几百年的苦难。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饥荒是一种僵硬的工业化政策的后果，死者多达几百万人，尤其是大面积的农村人口被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人们愿意细致地计算一下的话，那么这种为时整整10年的闻所未闻的压制相当于在西方现代史上100~200年中所进行的同等程度的压制。但是人的生命是不可以这样来换算的。以此只是想说明：现代商品生产体系是绝对不值得在其实行的历史中为之承受如此多的痛苦代价。

为前苏联的工业化所牺牲的人命却并非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而应归咎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建设和“抽象劳动”标准的贯彻实行。就在领先的西方因世界经济危机而陷入混乱之中和生产普遍停滞表明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时候，前苏联却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从人民那里榨取的资金转变为货币资本，用在外国购买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货物。美国记者H.R. 尼克博克（H.R. Knickerbocker）甚至以此为内容写了一本名为《诱人的红色贸易》（1931）的畅销书。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几十亿的贸易额。前苏联大力推行的工业化居然以这种方式对西方世界经济危机起到了抑制的作用，这是历史做出的恶意嘲弄之一：

“前苏联曾是……惟一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国家……大量的德国技术工人在前苏联的工厂里工作，据实业家们自己承认，他们所得的报酬‘并不差’。但还不仅限于

此，前苏联对资本货物的需求还保证了在德国的工作位置。在1931年，德国出口的机床有74%销往了前苏联。”（Blaich, 1985, 第75页）

当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衰老并达到了它的极限，并且无法再完成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时，前苏联正希望能够利用早期资本主义残酷的方法跻身于世界发展的首位。它强调历史的“合法性”，即作为晚起步者不愿意被降级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具有依赖性和遭受剥削的后方。用以同等权力进入工业世界市场的名义激励人们将今天贡献给未来的这种做法曾有助于给这些苦难和残暴赋予一种相对的“意义”和排斥它们其带来的残酷结果。

但是，对前苏联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相对化和“历史化”不仅仅从这层意义上看是适当的，它没有有意忽略历史上的非同时性所带来的问题。除此以外还须指出这种独裁统治的一个特征，即它的确具有预示未来的作用，尽管以其负面的形式。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统治对于与西方形成竞争关系的“追补现代化”过程也用一种与之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即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来确定其合法地位，这便在这种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增添了一个自我矛盾。马克思的理论当然早已融入被西方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修改过的形态中，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压力下继续被歪曲，使其僵化而成为教条。马克思理论中那些曾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而来的组成部分使激进的社会解放思想遭到资本主义范畴的污染，恰恰这些组成部分以庸俗化的形式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这里源于共产主义宣言的“劳动大军”构成了一个极为粗暴的、况且低劣的原始福特主义的合法模式。

但是“另一个”马克思，那个对“抽象劳动”和自身即目的

的“价值利用”的现代拜物教进行抨击的批判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不能完全被压制下去。这种不愿向任何社会运动都迎合的现代商品生产体系苛求妥协的解放思想几乎像一个幽灵在前苏联的正统理论中徘徊。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会”积极地扬弃社会中具有抽象的资本主义普遍性特点的两极——金钱与国家——这一马克思的思想好比一种问心有愧的理论观点折磨着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由此而来的讨论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也必须存在商品生产和“抽象劳动”这个罕见话题的文献像绿虫一样蔓延并充斥了各个图书馆。人们读起一些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进行辩论的斯大林式人物的见解是难免不心惊肉跳的，斯大林无论如何也要证明这种行为是荒唐的：将已异化的现代国家机器重新置于社会的自发组织中的马克思纲领必须接受一种特别僵化的国家机器的形式。在那个时候和在今天，任何时候这类问题都不属于一个普通的、真正西方资本主义的疑难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在犯下罪行时还从未在理论上折磨过自己的良心。

在前苏联的“追补现代化”过程中，或者一般来说在已成为家养宠物的工人运动和左翼人士的意识形态中，始终（直至今天）含有一个没有兑现的因素：马克思曾经谈到的那个“梦想”只有当一种不再允许将自己定义为在劳力市场自我出售的牲畜的社会运动与对现代的物神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会合时才能实现。自从以往的社会暴乱和马克思理论中部分难以统一的因素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以后，解放运动的两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种分裂状态直至今天还未结束。

但是，这个未实现的梦想像个幽灵一样不仅仅在理论的领域中游荡，它也包含在前苏联的工业结构里。“苏维埃”这个概念就暗示着一种社会推动力，它虽然转瞬即逝并被“追补现代化”的腥风血雨所吞噬，但却不能不提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苏维埃”这个前缀今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已经毁灭的斯

大林及其继任者的国家机器，想到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政权。众所周知，这里原本涉及的是一些“委员会”，一种生产者自我管理的组织，它们提出的要求早已出现在巴黎公社的原则里，即在所有社会成员的参与下讨论和决定所有社会问题，讨论和决定资源和现代生产力的使用。

这种全面自我管理的要求在俄罗斯革命中不仅仅冲击着不够发达的生产力，而且对包括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内的“世界意识”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因这种意识已经不断地受到资本主义的污染。作为当然基准体系的商品生产的货币经济和“抽象劳动”的社会形式出现了，并且它绝没有被理解为与所提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自治组织的要求互不相容，而与此同时通过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这种想法（像在巴黎公社时那样）却在阶级和组织社会学上一直受到局限。但是恰恰要在一个盲目的、自身即目的的社会机器的范畴内对资源的利用进行有意识的讨论并共同做出决定，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能的。这里指的并不是像本身就受组织社会学局限的批评家在对前苏联发展进行批评时所认为的那样，用已经对社会自我管理造成破坏的“政党独裁”取代了委员会，而是把大众意识本身禁锢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种种形式之中。

尽管如此，社会解放的境界仍然应是通过全社会广泛的协商程序来控制进步的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伪物理学及其无法与之协商的“自然法则”。除了亨利·福特之外，别无他人在通过委员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这种思想中嗅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形成的巨大危险：

“一旦这些委员会掌握了工厂的领导权，一切都将崩溃和毁灭；讨论协商将会获得掌握生产的优势地位。”（Ford, 1923, 第5页）

从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立场来看，关于对生产的商品、生产的条件及其结果等的意义和目的进行漫长的讨论当然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纯粹是废话，最终将是“崩溃和毁灭”。生产者不应该将去讨论，而应该为了能够将他们的能量转化为金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将它最佳地发挥出来，否则应该在资本的抽象功能范围内闭上嘴巴。因为充分利用已成为目的本身并毫不留情地凌驾于所有本质性的观点和生产者的幸福感之上，所以人们不应该询问和弄明白他们到底从生产中得到什么问题，而恰恰与此相反，已经独立自主的生产首先询问它是否从人们那里得到点什么（即货币形式的足够盈余）。

不过，福特不必有过于担心。当社会再生产屈从于已经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先驱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的福特主义目标的时候，这些委员也就会很快退化成一种纯粹的自治组织的假象——尽管距离这些原则的实现尚且还需一段很长的路程。就在十月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列宁便谴责了这种“用讨论代替行动、用废话代替劳动的倾向”（Lenin, 1961/1917, 第410页），所用的措辞几乎和福特相同。1923年7月，前苏联郑重其事地建立了一种所谓的“时间联盟”，借此想通过福特主义的大众教育在社会意识中强令贯彻抽象的资本主义劳动流水时间。直言道来做：“争夺时间的战斗就是争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战斗”（转引自：Sub, 1985, 第122页），这听上去很富有斗争精神，但却充满了福特主义味道，还带有“领导者社会主义”的幼稚。而宣布这种“时间联盟”的意义却又令人不解：

“时间联盟是为了引进美国特色的一种集体宣传手段，它的本义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把时间表视作自律、训练、养成时间意识的有利手段。计算时间不仅本身是必要和珍贵的，而且是正确计划安

排时间的手段……”（转引自：Subg，出处同上）

为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歌功颂德的人显然忽略了一点：正是俄罗斯—“前苏联”的发展中独裁所具有的国家恐怖主义在多方面将“美国特色”的宣传方法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加以运用，这是名符其实的“西化”，只不过在俄罗斯的条件下能够以独裁的形式出现。或者换言之：正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强行工业化措施的这种“西化”宣布了委员会这种自治组织的活力的枯萎。正是斯大林精确地表述了这种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的功效思想体系的适应：

“美国人的功效意志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可以战胜和无视一切障碍……俄罗斯人的革命热情与美国人的功效意愿的结合就是列宁主义的核心……”（转引自：Hughes，1991，第255页）

从总体上来看，处在“追补现代化”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前苏联独裁统治一方面与福特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血肉相连。另一方面可以从过去或者在将来用非同时性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别和相对而言的历史境况：就过去而言，这是历史上迟到者的“权力”：用一切办法，哪怕是最差的办法，来防止自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后院和垃圾桶和始终不得处于边缘的地位；对未来而言，在前苏联正统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理论和委员会思想所含有的解放成分已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

这类观点并不能用来引证纳粹德国的相对化。例如诺尔特就根本不会从纳粹主义本身在结构上和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从内部状态来阐述他的有关理论观点，而是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表面的、折射性的论证方法，即所谓的前苏联作为国家所犯罪行的

因果上的“先时性”——即使就此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对的，因为前苏联强行工业化过程中的最残暴的行为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以后。

就是美国也不能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苦和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就以相对的历史境况为理由。世界范围内的崩溃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一样，是发达资本主义在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时失败后其不合理性的直接反映和爆发。

在美国，自由民主的外表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而在德国，世界经济危机则导致了危机中的独裁，其原因是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另一种相对的非同时性。这里固然有一些差别。所以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西方危机的发展状况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典型的国家里尖锐化了。首先，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这两个国家遭受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战争给经济造成的后果使德国大伤元气；美国则成为投机膨胀假象的中心。而英国和法国自然也未免于难，但受到的影响自然要相对小一些。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同时性特点在德国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即领导精英与“工人阶级”两者的不同关系。对人力资源的驯化在大西洋两岸早就结束了，但是所采取的形式却不同。美国“处女”型的资本主义与欧洲的情况相反，不具备由早期的家长制统治关系沉积形成的基础。没有等级冲突的各种市场和货币关系在这里曾是这种民主独裁或者独裁民主的历史起点。因此福特主义的领导精英们消极的新平等主义没有遇到强大的阻碍，贯彻起来就比欧洲容易得多。驯服的“工人阶级”已被高度个性化。众所周知，美国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能够与欧洲在规模上相当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美国的工人运动也根本没有这种必要性，因为工人力量从未受过等级制度的制约并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公民权利”。这种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个性化导致的结果是：与欧洲相比，

危机在美国更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私事，几乎根本不可能动摇国家政治制度。在世界危机中期，记者理查德·莱文森（Richard Lewinsohn）报道了他在纽约观察到的有关情况：

“为什么这在美国是可能的呢？一个工人领袖……为此向我提供了证据。在避难所前他和一个穿着还算得体的人攀谈，问他怎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说‘我没有积攒足够的钱，我是个笨蛋’。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流浪者聚集的一条街上，陪同我的人又试了一次。这次他的态度明确了一些。‘一个糟糕的国家’，他对一个冻得打哆嗦的人说。得到的回答是：‘不，是一个好国家，只是时候不好’。只要连失业者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美国的领导者们尽管发生了危机也不用太担心……这种美国世界观的基础至今没有因危机带来的灾难而动摇……饥饿是个人的私事……因为人们处于经济的背阴面，不应该因此而提出政治上的要求……同财富一样，灾难也被认为是个人的命运……”（Lewinsohn, 1932, 第 231 及以下数页）

这绝不意味着在美国根本就出现过对危机的反抗。但这些反抗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尽管它们同大多数自发的行动一样场面也十分激烈：

“牧场主的抗议游行、城市里的饥饿示威、抢劫和与警察的巷战在 1931 年成了家常便饭。1932 年，在芝加哥警察枪杀了 3 个游行示威者，在底特律附近的迪尔伯恩警察用机关枪击毙了 4 个人，50 个人受伤。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左翼政党居然没能把不满的大众组织起来。”（Sautter, 1994, 第 393 页）



19世纪以来，美国的工人斗争就常有暴力的形式。但是这种常常双方都采用射击武器的冲突更多的是与美国开拓者习俗和受害者的自发报复行为这种传统有关；它们始终只是零零星星地发生，没有持久地反映在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政治组织上，人们可能会参加反饥饿游行，但尽管如此，在思想意识上却将此视为个人的私事或者至少是一场共同面临的自然灾害，绝对不会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肯定的态度将社会机器不同的功能层面统一到一个早在福特主义出现以前就已在历史上训练有素的平等主义意识。

与此相反，在欧洲不仅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和家长制的以及“统治者”与时代不符的传统，而且还保留着对以前抵制“抽象劳动”的社会反抗运动被镇压状况的模糊记忆。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精英对其人力资源持有的那种深刻的怀疑，这已经导致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做出完全错误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甚至在英国和法国，只能艰难地迫使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政权承认工人大众的“公民权利”的原因，这个过程在1918年后才得以完成。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工人运动因此而成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并行社会或者“城墙以外”的阵营，尽管他们本身所希望得到的也就只是“抽象劳动”而已。这样，自从19世纪晚期以后在各个功能层面上并不存在可以转换成福特主义的个人与社会机器的关系，而是“官方的”资本主义与虽然被驯化、但仍然有单独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日趋升级的相互作用。

在这样的格局中，这些官方的精英一方面倾向于在每一次危机中培养恐慌感，并为了在臆想中“拯救社会”而用粗暴的禁令来镇压最无危害的、忠实于国家的工人协会，甚至不惜使用大屠杀、流放和调动警察等暴力手段（这种手段虽然美国也采取，但只是个别情况，不是整个社会的、首先不是已经转换成政治形式

的基本模式)。在另一方面,这种手段真正将忠实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违心地变成“另一种龙形海怪”,它虽然完全受缚于资本主义的种种范畴,但又不被允许与之接近。世界大战使得这种格局首次显现出来,然而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原先形成的恐慌将又会上升。在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德国社会中,这种情况真正发生了。在这个时期,法西斯专政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产生;类似的政体在东欧的边缘地区也当权了。

1933年,“拯救社会”的资本主义在德国将独裁者推上执政的宝座,其动力极少是来源于大体上已经被纳入执政范围的社会民主党的存在,而是源于与之竞争的德国共产党的出现,在经济崩溃的混乱之中共产党此时似乎成为纳粹真正的对立面。在西方和德国的战后民主歪曲历史的自我认证中由此而生出一段传奇:作为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的魏玛共和国是被左翼和右翼的极端狂热分子的冲击无耻地扼杀的;在这段历史被纳粹专政令人遗憾地中断以后,融入西方的联邦共和国才得以加入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息事宁人的市场经济民主。

这种对历史的官方解释根本就不符合历史。且不管这样一套辩护论调当然同样不能正确反映在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中民主和独裁的内在同一性,就是从内部角度来观察它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纳粹党不仅仅是通过民主选举和议会程序等合法途径上台的,而且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赞成“授权法”,这其中首先是自由党人,也包括在战后被证实是自由民主党富有才智的政治代表人物和后来的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 1884~1963)。这完全符合所有资产阶级阶层和大多数公民的愿望,他们不愿意保卫所有人的人权和臆想中的“自由”,而是为了“拯救社会”免遭陷入“共产主义的危险”而宁愿选择褐色的纳粹独裁。

精确地说,就是:无辜的“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是在“来

自右翼和左翼”的凶恶“打击”下崩溃的，这根本是凭空捏造。而实际上正是这个民主政权、它的中流砥柱阶层、它的精英和议员们在资本主义出现灾难性的危机情况下露出了他们本来的专制面目，将这个民主从内部按照他们的逻辑变为纳粹的独裁。理查德·勒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面对正在冒烟的废墟证明纳粹的那种“破坏威力和暴戾恣睢”是这种民主本身最后的结论，是它自身最内在的自然天性。从这种做法来看这种独裁统治在很多地方（拘捕、对“内部敌人”加以刑讯和杀害、禁止建立工会等等）都与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保守派政体“拯救社会”的种种措施相似得令人难以分辨。但是其中的一个区别在于纳粹以“工人政党”的身份出现，宣布建立“创造性资本”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劳动国家”，这与福特主义规划的发展前景完全相符。

同样深深植根于共产党人心中的劳动宗教也不可能是使他们被称之为“所有危险之中的最大危险”的因素。将“劳动”作为所有价值之中的最高价值来看待，对此所有政党和流派无一不持赞成态度。然而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此期间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及其幻觉中，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和以前不同的一些东西，即真是那种社会解放运动模糊的、未曾实现的特征，它隐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触及到了资本主义苛求社会的根基，尽管这在西方共产主义中和在前苏联中一样都只是些微量元素，或者可能以负面的、受到那些卫道士言论抨击的形态出现——过于虚弱，根本没有力量来开创反抗现代化潮流的历史转折局面。但这却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专制特性中、即使是在它最发展最成熟的民主形式中存在的最冷酷的、偏激的暴戾，哪怕是生产者违反社会机器的“自然原则”而想用远水解近渴那样地对自决权产生一点点预感和嗅到一点点气息都可能引发德国整个害怕得发抖的资产阶级危机社会的巨大仇恨。

整个资产阶级的这种仇恨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也因此而融

入纳粹独裁的血液循环之中，因为德国同俄罗斯一样，在大战后的社会动荡中进行过创建委员会和在理论与实践贯彻这种委员会思想的尝试，它是惟一这样做的一个西方国家。不管是在法国、英国，或甚至在美国，尽管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现象，但是没有出现过哪怕是类似的情况。否则在这些国家自由民主也早已显出了它的真面目。委员会自然也不是德国社会运动的传统，而是在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为代表的极少数派的主张下强行实施的，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这支力量曾经徒劳地反对过战争，在德国的工人运动中始终也是异类成员；只有在战争失败后随即经济崩溃的条件下他们才算暂时赢得一定的影响力。

这种尝试自然很快（与俄罗斯那些更为严厉的条件相似）就被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扼杀，而转换为福特主义的关于合理化和位置的争论的另一种形式；以“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形式保留下来的部分成为企业经济合理性的下属助理行政司法长官，这显得有点可怜，直至今日，与其说它像一个社会解放组织倒不如它与纳粹的“劳工阵线”的共同管理机构更相似。但是一个超出这些范畴之外的委员会思想的出现，尽管力量微薄，但已足以让“美妙机器”和它的代表人物为之震怒了，而这个极其微弱的极左翼派别根本就没有仔细考虑过运用这种委员会思想坚定不移地与“抽象劳动”的体系对抗的问题。1918年以后这些委员会极短的全盛时期给资本主义的意识状态所带来的持久的噩梦与世界经济危机，在欧洲范围内产生的空前威力在德国交织组合成一种特殊的复杂形态，为的是使腐朽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腹中产出一个同样史无前例的危机独裁。

当德国共产主义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非理性的仇恨目标并最终被扼杀的时候，它距离任何社会解放的远景早已很远了。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德国共产党和西方所有的共产党都蜕变为

只是一种前苏联的代表性机构，不具备任何在理论上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实质。这种委员会思想的发展并不持久稳定，不应该将它的进程仅限于在现有格局的想法范围之内；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在商品生产体系及其劳动宗教的土壤之上纯粹抽象的有战斗性的力量，在西方就像甲状腺肿大一样多余，只能充当失去地位和工作的人的一个流动聚集地而渐渐失去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人同时也成为纳粹党的一部分群众基础）。

而共产党之所以在诸如法国（及以后在意大利）的西方国家取得了相对较大的影响的原因是：共产党在出现分裂之后很早就接受了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和“任务”。尽管共产党同时也到处研究民族主义，但很快被视为“莫斯科的第五纵队”，尤其在德国。这只是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资产阶级意识中的盲目仇恨，这种仇恨此时针对这个“外来者”双重代表性：其一是针对从现代社会机器解放出来这个含糊的、丧失的梦想；其二是针对在动荡的边缘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引进了“追补现代化”这个具有与之竞争的体系。

在内部矛盾超乎寻常地大大尖锐化这种相类似的局势下，可能在任何一个其他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会出现任何一种“拯救社会”的独裁统治，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肯定会不同于占据合法地位的纳粹意识形态。短暂出现的委员会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创伤、在东方出现的模糊的与之相竞争的政权和本身经济的崩溃，使德国尚不稳固的边沁式民主从内部骤然变为纳粹的褐色独裁，它将会更加持久地、在粗暴地排除所有干扰因素的条件下推进福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此情况下并不是另一种抉择可能性，因为面对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尚未稳固的、作为“亚龙形海怪”的参与者地位，社会民主主义不能给狂怒的资产阶级提供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自然更加不能与共产主义这个刚刚分裂的、结了仇的兄弟结成任何联盟，因为它既不知如何着手代表东

方“追补现代化”的倾向，又不能处理大量失业者这个具有负面影响的潜在问题，更不用提它自己也曾大力扼杀的委员会思想。与之相反，在内容上（在理论上和纲领上）早就已经民主化的共产党人，不是自斯大林实行恐怖政治才开始不再具有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聚合点的，尽管它只是为了用一种不太遭殃的方式开始福特主义的变革。

但是尽管社会民主主义不再能够起到主要作用，由于它忠实地坚持执行了民族主义的战争政策，所以至少是为民主到危机独裁的突变做出了贡献。这种民主并不代表任何一个“更好的德国”，而是骨子里充满恐怖主义，这是一开始就为世人所知的。用边沁式民主训育大众并不仅仅源于世界大战中的泥淖血泊，在战后正式的布局中它是建立在谋杀的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之下。1918~1919年“拯救社会”的死难者中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尸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远古时期的殉葬者一样砌进了这种民主的基石。这不是历史中的“事故”，而是揭露了这种民主的真正实质。

尤其是罗莎·卢森堡将普遍的资本主义意识和特殊的危机意识都憎恨之极的东西集于一身：犹太人，外国人（波兰人！），不像家养宠物那样温顺的女人（女理论家！），相信未来会将社会从“抽象劳动”的体系解放出来的“左”倾激进分子。当然罗莎·卢森堡也受到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范畴的束缚，她自然不能从反对派思想长期被驯化的历史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以她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客观局限性和必要的“大众自觉主动性”的理论比她同时代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更接近对“美妙机器”连同它在政治上对人的管理进行的彻底批判。因此这种民主以急迫的坚定立场所做出的第一个行动是用步枪枪托捣毁了这位49岁女性的头颅，这是它曾经并且一直是在“自卫”的方式。

在“危机临近”的时候，有时必须采取法律途径以外的有力

措施。这绝对不是过分的论战。尽管罗莎·卢森堡身边的“斯巴达克思”联盟绝不代表任何大众运动，但是仅她那触及资产阶级王国边界的思想就已经显得非常“危险”了，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她。在她的影响下，几百名武装起来的工人发动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被降格为物资的人一开始就知道（事实上是让他们铭记）民主牢笼不可逾越的边界是用鲜血划定的。德国新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 1868~1946）对此曾说过一句后来非常著名的话：“总要有一人必须成为追杀的猎狗；我不怕承担责任”（转引自：Strübel, 1996, 第113页）。由此可以预见到从充当家养宠物的领导者到成为资本主义斗犬和猎狗的这种蜕变过程。

由上尉瓦尔德马尔·帕普斯特（Waldemar Pabst）率领的第一近卫军骑兵步兵师受诺斯克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委托执行了这个卑鄙的任务。当尸体被示众的时候，这个十分年轻的民主国家兴高采烈，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先对魏玛共和国蜕变为纳粹专政表露出的喜悦。代表自由主义和最高知识阶层的《福斯报》兴致勃勃地宣布：“对两个恐怖主义的头领执行了人民法庭的裁决”（转引自：Strübel, 1996, 第114页）。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刊《前进报》也同样非常满意地发表见解：

“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意义很大，尤其对于工人阶级，这是一种拯救的行为，是我们面对历史有义务采取的行为……”（出处同上，第115页）

曾经是皮革制件伙计和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在谋杀发生之后很快被选为最民主的德国总统，他得意洋洋地对莱比锡社会民主党

领导人阿尔伯特·康卓夫斯基（Albert Konzowski）说：“阿尔伯特，再有两个像战胜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样的胜利，我们就胜利了”（出处同上，第110页）。原告所指控的谋杀凶手自然被宣布无罪释放。瓦尔德马尔·帕普斯特被上天赐予漫长而平静的一生，他在20世纪60年代多次谈到“拯救社会”的行动时还以自己是这种新民主一名品行端正的公民自诩：

“是我让人处决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德国的利益……而且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在1919年就几乎把整个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推向毁灭。结束这种危险远比除掉两个政治骗子重要得多……我们终究必须信奉过去……任何人不必为他所做过的事情羞愧。是我把任务交给这些人的，而他们按照规定完成了任务。这些人为德国做出了贡献……统治者中只有一个人正确理解了我们为德国所作的事情。诺斯克。他曾同我握手。”（出处同上，第117及以下数页）

以此在它成立时起过主导作用的同一种精神，民主内部的暴力也完成了向危机独裁的演变。就是在这次事件中，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也直到最终都在试图以对民族的忠实而设法平步青云。当大获全胜的纳粹党将1933年5月1日宣布为“民族劳动节”，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满足了工人运动的一个老要求时，工会发布了一个措辞得当的（所用的词汇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呼吁号召大家参加：

“同事们！……政府将我们的节日宣布为法定的民族劳动节，宣布为德国全民的节日，我们表示欢迎……德国的工人在5月1日应该以阶级的责任感举行游行，应该成为德国



人民共同体中拥有一切权利的成员……我们用真诚的伙伴情谊与你们所有的人坚定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日子向你们致以我们工会的问候。1933年4月15日于柏林，全德工会联合会”（转引自：Scharrer, 1984, 第113页）

当这一天临近的时候，在柏林几乎整个工人运动的成员都参加了纳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左派作家弗朗茨·容（Franz Jung）作为见证人记录下了有关的情况：

“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滕珀尔霍夫区惟一的广场上聚集了150万人……德国工会联合会规定加入它的自由工会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这次游行，人数要尽量多。其策略上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新的执政者表明合作的良好愿望……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主播席莱帕尔特（Leipart）同志已听候希特勒的调遣。于是，在这一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德国工人工会的精英们都在滕珀尔霍夫-费尔德广场游行，夹在大柏林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地方的领导人、居民联盟干部、德国女青年会、纳粹骑兵冲锋队、纳粹汽车司机团队、纳粹飞机驾驶员团队和纳粹女性团队中间……游行队伍中有大约20支纵队来自金属加工行业、铁路交通行业、造纸和印刷行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转引自：Scharrer, 1984, 第7及下页）

工会主席特奥多尔·莱帕尔特（Theodor Leipart, 1867～1947）已经把工会的经费交给了纳粹；1933年5月2日，纳粹党的冲锋队不请自来主动把它取走了；工会的房子被占用了，组织被解散了。这一切却没有妨碍社会民主党再次在议会为纳粹的独裁统治服务。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先前还曾投票反

对“授权法”的话，在1933年5月17日他们对希特勒的外交宣言表示了欢迎。社民党议员威廉·赫格讷（Wilhelm Hoegner，1887~1980）后来还一直用夸夸其谈的口吻来回忆这段历史：

“现在开始表决。我们右边的邻座是那些天主教政党，他们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我们和他们一起起身，同意了德国国会的宣言。这时其他的议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连与我们势不两立对手阿道夫·希特勒似乎一时也被感动了。他站起身来，向我们鼓掌……然后德意志民族的议员们开始唱德国国歌。我们这几排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唱，有些人泪流满面……”（转引自：Scharrer，出处同上，第8页）

人们不应该忘记社会民主党在哪些场合总是这样动感情。一个月以后，社会民主党也遭到禁止。纳粹党实行的危机独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推行原始福特主义的“强行统一”，在此过程中它是不能容忍任何多元论的。所有其他政党、社会和文化组织最后也被解散了，并被纳粹统一的下属产物所代替，它们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以前独立的组织（有些是被强迫参加的，但更多的人还是自愿的）。纳粹的“德国劳工阵线”也同样取代了工会。用一切力量从世界危机中摆脱出来、强行实施福特主义的全盘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内部的强烈欲望在德国极为恶化的条件下形成了危机和强行统一过程中的独裁统治，它不愿意再借助于社会民主党这条有可能协助追杀的“猎狗”。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1933年所做出的反应从根本上与1914年和1918~1919年时是一样的，这很符合他们作为推崇理性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后裔的本质。由于实际上无人持有从这段历史中并从而从“抽象劳动”的体系中解放出来的立场，所以受到关注的问题只是危机独裁和福特主义的强

制复苏以何种形式和由哪些力量来实施。

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笨拙的宣传中将纳粹分子与社会民主党人直接对等起来，创造了宣传上的概念“社会法西斯主义”，这虽然不是由于理论上的优势地位和通过恰如其分的分析而产生的，而相反是仅仅源于两个政治上彼此不相容的阵营因为竞争而产生的目光短浅的仇恨。但是完全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的创作者短浅和机械的思想无关的现象使其中的含义超越出他们的理解力，这个名称绝对包含了一个真实的因素。从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表现这个层面来看，它们自然不是同一种思潮，而且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纳粹的分部。但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向“抽象劳动”这个福特主义阶段的变形中，“抽象劳动”在根本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国家恐怖主义中达到顶点，假如从这个背景来观察的话，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和纳粹在这一层意义上是有亲缘关系的，这就像美国的福特主义和前苏联的关系一样。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却与此相反，在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以后，变得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历史性的实质内容，并且已经从历史中掉落下来。

为了完全理解民主的性质，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在1918~1919年是怎样面对罗莎·卢森堡及其他领导的一小批人所造成的虚构威胁的，在1933年又是怎样面对纳粹造成的真正威胁的。这里涉及的不是民族妄想的单纯的象征性，也不仅仅关系到力量的对比。这样的行为倒是让人清楚地看到民主最内在的实质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这一点在危机中立刻就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在有可疑情况发生时，总有罗莎·卢森堡被置于死地，而总有诺斯克或者希特勒被民主地授予权力。作为历史的先行者和狂热的民主捍卫者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归根结底早从1848年起就以对劳动和国家的前瞻性信仰对希特勒卑躬屈膝了，暂且不说他们向他提供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些关键词。这种

民主本身正是这一切的渊源。

### 逆向的工厂——奥斯威辛

人们经常把奥斯威辛称作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滔天罪行。虽然奥斯威辛这个名称的确象征着独一无二的罪行，因为它超出了纯粹的仇恨、纯粹的残忍和血腥，而且这种大规模屠杀也不单是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权衡。但西方的民主思想家们同时也利用了“绝无仅有”这个概念，把奥斯威辛作为一个神话从德国历史、从民主思想、从资本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中分离出去。于是，这种“绝无仅有”也就不再表示现代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本身孕育出的无以复加的不合理，而被说成是那些“陌生的”，外部的或者可以说是“冥府”的黑暗势力所犯下的罪行，这种黑暗势力与纯洁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灵魂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恩斯特·诺尔特就是用某种方式狡黠地利用了这种民主的“绝无仅有”概念显而易见的愚昧，在对纳粹作辩护性历史定性的时候，把奥斯威辛也笼统地列入了现代化的一般罪行之列，把它轻描淡写成“次要的”罪愆。就像上文中已从普遍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危机独裁的角度对他的观点加以驳斥那样，这里有必要从纳粹的大屠杀及其特殊性质的角度做出与诺尔特视线相反的分析，以便在不妨碍那种“绝无仅有”规模的情况下，去对奥斯威辛做出反面的而非正面的历史评价。这样，大屠杀的事实就会成为对启蒙运动思想、资本主义和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全面控诉；在这种意义上，奥斯威辛并非是一种“陌生的”的行为，而是现代化历史本身在德国产生的特殊结果，其根源就存在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广袤的土壤当中。

显然，从霍布斯到斯密、马尔萨斯直至达尔文都把社会现象自然规律化和生物学化，这正体现出奥斯威辛的一个历史层面。

同样，“放荡不羁者”德·萨德的思想也属于大屠杀现象的考古学范畴，他首次宣传了把性和“功能行为”与人类的情感冲动完全分离开来的方法；它在不羁的想像力当中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功能主义社会意识的噩梦，没有它，整套奥斯威辛的系统就无法想象。

波利亚科夫（Poliakov）认为，现代的反犹太主义本身就扎根于启蒙运动哲学。这并非巧合，而恰恰反映出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内部矛盾，这种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正是要求人们以将自己自动置于一种盲目的社会物理学的伪自然规律之下的形式来进行理智的自我反省——一个非理性的基本事实，它表面上已在把资本主义每一种发展动力和危机动力归因于“犹太人的陌生本性”的折射中得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导致奥斯威辛问世的思想所包含的一切成分都来自现代化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潮流。假如说这种反犹太主义综合征早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就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开来的话，那么它在福特主义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就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因为，企业经济的合理化以及人类内心思想的军事化急速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铺天盖地地笼罩住了整个社会的“抽象劳动”体系，丧失品格的、不可名状的对任何感官性质量处之漠然的劳动概念范畴中的负面因素也以同样的规模变得突出起来。

将“犹太种族”这种丧失品格的腐殖质自然规律化和生物学的做法以及将资本主义空洞的和自身即目的的抽象化归因于“犹太人本质”的折射获得了一种新的和更强有力的推动：领导精英和“人手”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抽象劳动数额在社会上同名和统一，现在才开始全面生效的这种同名和统一相应地使对用转嫁的方式清除与此相关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合理性中有害物质的愿望获得了加强。

因此，苛求在质上的升级和深入人心的边沁主义达到的新阶

段也就在膨胀和加剧的反犹太主义综合症的伴随下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前苏联和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使反犹太主义气氛在社会意识中泛滥了起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暂时受挫在西方是强化这种气氛的原因所在。

尽管从社会民主中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以符合其出身的态度正式公开表示，他们认为反犹太主义纯粹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们在十月革命不久之后甚至还对反犹太主义进行了惩罚。但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斯大林周围的人却下意识地摆出了一副欢迎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姿态。这种姿态一直持续到了前苏联历史的结束，并决定性地导致了30年代对所谓的“背叛者、间谍和破坏者”的大规模追捕和公开审判。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据说前苏联甚至已经计划要把国内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当时的内务部还准备了一本名为“犹太人必须迁出工业区的原因”的小册子（Rapoport, 1992, 第207页），但后来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施。以后，在本国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下，前苏联制定了亲阿拉伯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对内又起到了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对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间谍”进行了迫害。

当然，前苏联的反犹太主义趋势是有其特殊之处的。斯大林曾经无比坚决地支持原始福特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独裁。而且或许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观察早在俄国沙皇制度下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综合征。由于前苏联并没有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且货币资本的运动一直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偏执狂式的折射更多的是针对被诬陷为“犹太式”的“抽象理论”，而不是针对同样也被认为是生息资本的“犹太式”抽象妄想。迫害的首要目标也就不是投机商和银行家，而是知识分子。这种反犹太主义变体虽然在西方的反犹太主义当中也起着一

定的作用，但是在前苏联，它却起着核心作用。

列宁就已经不止一次地谴责过那些“游手好闲者和神经质的知识分子”。很显然，这些攻击的起因是前苏联已转入福特主义的发展轨道并由此发出了命令：不许再嘻嘻哈哈，不许再对意义和目的进行讨论，而应该在社会机器里拼命地工作。此后的理论反省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危险，不仅仅因为它是被污蔑为“徒劳无益”的“抽象废话”，而首先是因为这还可能使人回忆起已失去的自我管理委员会社会的未来——那种超越出货币和国家的异化形式。此外，在前苏联，同西方的竞争意识被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是与一种“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发明和越来越严重的病态的外国人恐惧症一起出现的；而“唯理智论”和批评性的反省却与此相反地有着非无产阶级性质的、冷漠的“世界主义”之嫌。一半是由于理论上的愧怍，一半作为对这种愧怍的萌生可能性的痛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成为党派以及国家机构定期开展的活动。

其实，党的各层领导人和干部们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犹太血统的人占的比例很大，这一点使这种思想更加荒诞不经和令人费解。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再允许从概念上反映出来，无论如何不准从批判的角度，这些社会状况中存在的矛盾、裂痕和深渊以一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体现为知识分子相互将对方诽谤为“臭知识分子”中的悲观论者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破坏分子的中伤。斯大林必须只把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综合征和矛头指向不可靠的“犹太式”世界主义的诽谤与同样广泛传播的反知识分子的嫉恨结合在一起，就得以下手屠宰无奈无助的知识分子了。

强行贯彻的工业化政策造成的巨大恐怖、迫使人力资源习惯遵守抽象的福特主义的时间纪律的折磨方法和合法的反犹太主义的迫害手段组合成一件血迹斑斑的完整艺术珍品，它以“契卡

(意为肃反；也指肠道的清洗和排空)……”(Rapoport, 1992, 第 56 页)的名称载入 20 世纪的史册。正因为契卡连同它的独断专行、滥杀无辜、刑讯逼供和荒谬的公开审判必须用奥威尔的社会主义“幸福制度”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生死搏斗的说法来解释，所以它就只能以歇斯底里和偏执狂的形式采取行动，直至造成控告者和被告人的混乱。以此方式要“肃清”的是在社会中大踏步推进的“抽象劳动”的内部矛盾(和可能对此持异议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反犹太主义—反知识分子的综合征才必不可少。一位身居囹圄的帝俄旧军官对此做出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我们沙皇尼古拉的种种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尽管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这些梦想：监狱里关满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Rapoport, 1992, 第 70 页)

在美国，反犹太主义的煽动性宣传同样来势凶猛，或许甚至比在前苏联还声势浩大。美国的投机和金融、银行的巨大危机也都折射性地归咎于“犹太人的陌生本性”。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对“黑色星期五”之后的气氛做出了这样的描写：“浅表之下可以感觉到反犹太主义的存在”(Galbraith, 1995, 第 86 页)。当然，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偏执狂思想体系既不会停留在表面之下，也不会局限为对危机做出的非理性反应。早在此之前，亨利·福特这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预言家和参与缔造者本人的头脑中就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妄想。在他所撰之文中有一篇 20 世纪 20 年代初完成的拙劣作品(曾经被多次翻译成德文)，标题为“国际犹太人”。在此文中，他对“犹太人问题”可能成为议论主题所表示的高兴程度不亚于希特勒：



“在美利坚合众国，犹太人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只是存在于公众舆论的表面之下……尽管如此，一年以前还为人唾弃的‘犹太人’这个词却又已经公开使用起来。这个词现在甚至几乎天天都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到处都成为讨论的话题……”（Ford, 1922, 第116及下页）

这位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当时那个时代的命名者之所以痛恨并且惧怕犹太人，其原因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同：对他来说，让合理化地和科学地对人力资源强行进行压榨的福特体系远离抽象的自身即目的的弊病十分重要。同纳粹一样，福特把“创造性”资本（即，他自己拥有的资本）和“攫取性”资本（即银行系统的生息的货币资本）区分开来。原始福特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一切具有负面作用和破坏性质的现象都被归咎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货币资本，并直接与作为这种资本在文化和生物学上的代表——犹太人等同了起来：

“那些国际犹太银行家们没有祖国，他们利用各国之间的争斗来坐收渔翁之利；而那些国际犹太无产阶级则从一个国家游荡到另一个国家，寻找着他们认为合适的经济环境。这些人就是令当今世界动荡的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移民问题是犹太人的问题，电影院和舞台上的品德问题也是犹太人的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首先应是犹太人自己的事情；但假如他们不去解决，那就只好让世界去解决了……某一个国家由于人为变动的贴现率而被搞得狼狈不堪，而同时另一个国家又因为其资本被从经济命脉中抽出去而贫血……在那些动荡的年代，会有比以往更多的硕果掉进国际银行家们备好的筐篓中去。战争和危难时期是他们丰收的大好时光。人们只要巡视一下政府的办公室，因为那些地方保存着关于所得

税、联邦银行和对外政策的机密——就一定会看到有犹太人坐在国际犹太民族所需要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总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美国的农场主和实业家不会像国际银行家一样善于玩这些把戏，于是在他们资金短缺囊空如洗之时，他们会对资金的藏身之处深感惊讶……”（Ford, 1922, 第 152 及下页）

无论在形式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都不外乎要高歌颂扬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通过福特主义的合理化体系和仅仅作为劳动国家的“封地”和“任务”的“创造性”资本，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开展应该直接为满足大众需求服务——这与“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被诋毁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吸血鬼式的巧取豪夺手段，与用福特主义构筑起来的机器世界及其《汗水的赞歌》迥然不同。面对萎缩和动荡的世界市场，苏维埃爱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和美国的孤立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反犹太主义的世界观结构模式。有了“劳动”这个横跨各阶级的伪具体概念，加上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这个为世界范围的反犹太主义浪潮推波助澜的因素，这些等于在思想上为超越了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了总动员。

这种旨在非理性的和谋杀性的突破的组织形式也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模式，虽然是以不同的形态和强度：从“劳改营”上升到“集中营”。福特攻势的这种强迫的、军事化的特征在这些“营地”中最明显和最残酷地体现出来。而且居然还出现了自愿形式的劳改营，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究竟在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到了什么程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不仅极右翼的，而且左派的、工会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都组成了宗教式的“义务劳动”营地，他们比纳粹后来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先行

了一步。在全世界经济危机中大规模失业的影响之下，自1935年起，这种“抽象劳动”异化的、近似军事化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在美国奠定了根基：

“还在3月的时候，国会就通过了失业救济法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地方资源养护队（CCC）。18岁到25岁之间的志愿者都可以加入某一类青年义务劳动营地，投入到保护自然和风景的劳动中去。1935年就有50万年轻人以30美元的报酬在这样的劳动营地从事工作。”（Sautter, 1994, 第383页）

在这里，并没有在一种更高层次的、充分自由的思想意识支配下的自我管理在发挥效力，而是停留在卡壳的福特主义水平上的、在“美妙机器”及其卫道士和推动者辖制之下的压制性“公共福利”。在前苏联的现代独裁统治下，与一切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行为相悖的强制力则愈加强烈。在一个大部分还并未形成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当中，国家资本主义大力推行福特主义的运动势必采用更加拙劣的形式。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对即将到来的全民劳动社会将具有巨大的强制性深信不疑：

“在一个地方，将会有逃避劳动的10个富人、一打流氓和半打工人（就像彼得格勒的许多排字工人，特别是在党内印刷厂里工作的工人那样不守规矩的人）被关进监狱。在另一个地方，他们将会被派去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在他们服刑之后，人们将会发给他们黄色的护照，以便在他们改邪归正之前，整个民族都可以把他们作为坏分子来进行监督。在第四个地方，人们再从过着罪恶的寄生生活的10个人当中揪出一个来就地枪决……”（Lenin, 1961/1917, 第413页）

在道义上为强制劳动编出的荒诞理由是定期“向贫困家庭的孩子供应一瓶牛奶”（出处同上），这个理由却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都是由国家在装配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机器。这一点尤为明确地在列宁的一句话中显示出来：“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际要求”（出处同上，第412页）。在发出这句名言之后，列宁热衷于谈论的话题——“最繁重的强制劳动”升格为当时的迫切要求。很显然，福特主义的劳动专制在这里也被宣告为绝对的必要性，以便能够对它给人类可能造成的折磨和摧残置之不顾，并且把针对人力资源的军事化劳动强制美化成有积极意义的、理所应当的需要——这一点同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无差异。托洛茨基（Trotzki）的“经济军事化”并不只是内战混乱时期的紧急措施，而是整个时代的纲领。

国家资本主义的“追逼长官们”不仅必须要开展推行福特主义的运动，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尚处于农民式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下的广大国民，这些国民甚至还没有经过最初级的驯化。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在前苏联这种模式的劳动国家中，强制劳动的恐怖就越发显得来势汹汹了。这种历史的不同步性促成了狰狞可畏的古拉格体系，即在整個社会中有组织地建造星罗密布的集中营和劳改营，那里关押着数百万的囚徒。在那里，特别是在高速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劳动力受到最粗野方式的压榨，直至丧生。仅仅是莫斯科修建地下铁路的一项工程就吞噬了上万个劳动奴隶的生命。

这样就势必导致后来有些西方思想家认为，前苏联的这种古拉格恐怖系统设施其实就是集中营的最初发明。在这种意义上，纳粹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可以被弱化成一种步人后尘的做法，从而就可以把这种历史罪恶推给魑魅般的亚洲传统特性，纳粹版本的集中营也就被当成是西方历史上的一次运行事故。但事实却正好与此相反：集中营乃是道地的西方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前

苏联的发展独裁只不过是舶来品而已。正如波兰历史学家安杰伊·卡明斯基 (Andrzej Kaminski) 所持的见解那样, 集中营原本是西方 19 世纪后期殖民制度的产物。集中营这种说法可能是西班牙元帅巴莱里亚诺·魏勒瑞·尼古劳 (Valeriano Weyler Nicolau) 的创造, 1896 年, 他曾经在镇压古巴的一次起义时发布了如下命令: “在 8 天的期限当中, 所有希望与起义无关的农民都必须呆在坚固的集中营地里” (Kaminski, 1990, 第 34 页)。这种营地被称作 “campos de concentración” (集中营) 4 年以后, 在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里抢走菲律宾群岛之后, 美国为了镇压起义者在棉兰老岛上建立了 “集中营”。在同一时期, 这种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也像英国殖民势力作为恐怖系统设施使用, 上万的平民惨死其中。

极具典型性的是, 几十年以后, 国家恐怖主义用于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和游击战的这种军事发明被美化成第二次工业革命 “文明社会” 的贯彻形式, 其中则又包含着从 “自愿的” 劳改营到灭绝性的集中营等形形色色的结构。集中营真正的历史远远比它的名字更悠久。它在更高的发展层次上, 并以更大规模不断重现着早在 18 世纪的时候就不仅仅在一位名叫德·萨德的人的幻想中作祟的妄念。《索多玛的 120 天》一书所叙述的情景就与自由民主主义者边沁对监视看守和以纹身识别身份等种种系统设施和措施竭尽全力的美化异曲同工, 前者反映了描绘资本主义前期阶段中疯人院、贫民院、劳动教养所、青年监狱以及殖民地的奴隶营房的一种集中营和灭绝营。集中营最终无论是从微观还是从宏观尺度来看恰好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强制的基本性质。其整个工厂和劳动体系都不外乎是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军事暴政。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讨论就为 “无生存价值的生命” 这种定义作好了准备, 它也属于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暴政的变本加厉做法。所有不能被用于 “价

值利用”的生命原则上对于资本主义都是“无生存价值的”。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一些西方国家，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案的各种组成部分都被应用到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去了。比如在瑞典正直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下对反对党成员进行的精神病检查以及对残疾人强行采取的消毒措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依然在实行。

揭示奥斯威辛与受到西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资本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逻辑和通史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奥斯威辛从负面做出历史评价的一方面原因。纳粹并非是什么外星来客，他们是现代化历史的亲生骨肉。其残忍的大屠杀罪愆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强行逼迫，直至今日这种生产方式还一直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并被某些人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者”。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结束，奥斯威辛就永远不会真正成为历史。

但从另一方面对奥斯威辛作负面历史定位的必要步骤是把奥斯威辛放到德国特殊的民族历史的延续性中去评价。虽然奥斯威辛这种行为属于整个西方现代化，但这种行为只被德国人完成而且由德国社会履行却是事实。奥斯威辛各种具体的因素以及其思想上的准备都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史，在很多国家都能够找到其踪迹。然而前苏联和美国都没有让屠杀犹太人成为整个国家有计划的行为。就是亨利·福特后来也脱离了反犹太主义思潮，显然反犹太主义对他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设想并不是至关重要的。而惟独德国却出现了公开的大规模反犹太主义运动，而且这种思潮的追随者还掌握了政权。消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的情况也是一样，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很多社会都有具体体现，但它也只是在纳粹德国才在广泛的范围内和在总体行动纲领指挥下有计划地得以实施。

奥斯威辛作为绝无仅有的行为是德国的特殊产物。然而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纳粹分子也并非外星来客，他们的诞生有其深层

的民族史根源，这种根源已经永远地、无可挽救地腐朽了。所有试图把德国历史上的奥斯威辛说成是舶来之物，并企图把它同任何什么比较美好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的等等）传统联系起来的行爲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从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民族的断然决裂，与任何民族自我认识以及任何民族忠诚断然决裂。就像具有普遍性的反犹太主义属于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主义一样，具有特殊性的奥斯威辛也属于具有特殊性的德意志民族。但是，普遍性总是同特殊性相互交叉的，特殊性是普遍当中的特殊，普遍性又包含着特殊性。由此可见，奥斯威辛无疑可以被看做是所有民族终结的开始。于是，资本主义本身既为创造民族发挥了作用，而最终又导致它的逻辑创造出奥斯威辛这种结果。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灾难史中，专门为德国民族形成的合法地位而辩护的正统意识形态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发展之后被废止了：由赫尔德和费希特首创、在19世纪增添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民族理论依据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单位，而仅仅看成一种文化、起源和血缘共同体。在与英国和法国进行的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由此而形成了“1914年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它成为德国19世纪“追补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认识。自阿道夫·瓦格纳创立“国有社会主义”和俾斯麦创立了“社会福利君主政体”以后，这种德国意识形态同国家家长制的设想和机构融为一体。德意志帝国以这种意识形态极力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政治民族”直至国家公民权利划清界线。纳粹分子乃是这种德意志民族自我认识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只必须再给这种自我认识加上“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原本属于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就能在原始福特主义劳动国家的旗帜下创建疯狂的“血缘民主”了。

在这种血缘意识形态与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变体的对立状

态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得以上升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德国革命”：德意志民族的那种作为“抗议帝国”的自我认识没有落入西方“小家子气”的俗套，而是被推上穷途末路，并符合逻辑地以一场历史性灾难而告终，这是数千年来绝无仅有的祸殃。这种文化民族血缘共同体思想的意识形态核心是一种还未具有资本主义功能的、前现代的、本体论的“种族”同一性和客观本体的设想。这种设想诱发了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民族目标。各个“种族”实体的“生存奋斗”虽然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又作为一种原本的现实状态出现，在它面前，资本主义经济不允许成为目的（更谈不上什么以自身为目的了），而只是臆想中的一种手段。这种德意志版本的现代主义用一种反经济的血缘意识形态来推行全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化；在向福特主义过渡的结构性决裂和危机中，这种现代主义被概括为“种族革命”、“保守革命”和“右翼革命”几个概念。

在前苏联和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个悖论式的特征。早在19世纪末产生并在此后的世界大战中被强行实施的国家经济特殊政策进一步受到重视；对“创造性”的、表面上具体的工业资本的强调，对“劳动”的强行统一和拉平，采取民族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特有的各项举措来作为对世界市场崩溃的反应；这些都是共同的结构特征，虽然它们分别有着不同的强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据，但它们处处都体现出“反资本主义”的色彩。合理化在技术及组织上的革命与模糊不清或坚定明确的社会政治变革设想一道朝着福特主义的“劳动民主”齐头并进。这种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和以资本主义形式进行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本身与社会解放没有丝毫联系；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的压制性推进方式。其实，被社会主义承接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概念从来就没有含有过另外的内容。所以，在福特主义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的



“革命”也就享有“右派”革命的盛名了。

然而，在德国，“右派”的意思无异于“种族”（即便是左派也无法完全摆脱所有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恶劣影响）。福特主义“革命”以其群众游行和劳改营地的特点在各个国家都象征着国家的权威性；而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因为民族的形成本身就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并且是通过“种族”思想得到强化。完全达到好莱坞导演水平的纳粹的精心策划将这种社会变革的普遍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场从战壕思想中产生出来的革命，一次齐步走和正步走的革命，毫无带有解放和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特点，而恰恰相反，它采取的形式是福特主义的大众纪律化。可谓一场边沁式的革命。而在德国的“种族”表现形式之下，它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定出大规模屠杀的纲领。

从合法的“种族”意义上来看，福特主义—民主的自律驯化和大众纪律化恰好是一种超历史的神话的圆满完成，它远远超越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观点。福特主义对以往“资产阶级”的货币资本主义和特权阶层资本主义普遍的、虚假的批判中又新增了无理性并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贯穿力。“血缘民主”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使福特主义的“劳动”平等主义限制在建立德意志—“雅利安”种族国家和高贵民族上，这个民族一定要净化“犹太血统的污染”；而在东方这块应该被占领的大片土地上生活的“斯拉夫种族”则应该大批地充当劳动奴隶。这些情况与前苏联形成的区别就十分明显了：如果说，古拉格劳改营是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滥用劳动力的一种完全具有功能合理性的体系的话，那么纳粹的集中营（甚至超越出劳动功能）同时就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物种选择体系了。

仅仅是这种物种选择体系和“雅利安化”本来还不一定会导致大屠杀行为。此外，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还做出了如下强

行规定：所有德意志血缘民主国家的公民都必须出示“雅利安出身证明”，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通婚或者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统统看做是“种族丑闻”；歧视犹太人并剥夺其财产（直至今天都还有不少德国人作为那些掠夺来的“遗产”的继承人从中获利）；制定出将犹太人逐出德国的计划——所有这些都还是些按照血缘民主的逻辑而采取的疯狂的隔离措施，还不是谋杀。

然而“德意志革命”不可能就此停留在单纯的“种族清洗”上。恰恰是这场革命比较普遍的福特主义性质迫使德国的“清洗”作为一种种族-血缘意识形态的“清洗”突破了单纯的物种选择。犹太人不仅仅是“陌生的血统”，而且同时也被看做是资本主义所有弊病及其诸多具有破坏作用的抽象概念的生物代表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建立的模式在福特主义动员的条件之下获得了巨大的爆炸性威力，此时发展成为一种自身冲动：将一切折射性地归罪于犹太人，这样便有望使“抽象劳动”的消极面从福特主义的劳动天堂中消失，而同时又不伤及资本主义本身。假如说福特和斯大林所采取的这种折射手法还只是为了达到种种系统功能目的的话，那么希特勒所采取的折射手法则是别具一格地以自身为目的。

在反犹太主义成为国家纲领和“种族”物种选择行动实际上已在组织上全面完备的条件下，这种冲动在德国上升为真正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经济“价值”，即所付出的劳动数额这种商品的社会性虚假特点的偶像化抽象形式应该以犹太人形象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商品应该只是使用的东西，它虽然终究还是商品，但是要去掉“犹太式”的抽象形式——作为生产过程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也不例外。美国社会学家莫伊舍·波士同（Moishe Postone）率先给纳粹党反犹太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核心概念下了定义：

“资本主义的工厂是一个生产出价值的地方，‘不幸的’是，这个价值必须采用商品生产的形式。具体的事物则被作为抽象形式所必需的载体生产出来。与此相对，灭绝营并非这种工厂一种令人惊讶的变体，而必须被看成是这种工厂荒诞的雅利安式‘反资本主义’的否定。奥斯威辛是一个用来‘灭绝价值’的工厂，它所毁灭的是代表抽象形式的人群。它拥有魔鬼式的工业过程的组织形式，目标是把‘具体事物’从抽象形式中‘解放’出来。其第一步就是非人化，也就是说，扯下人性的‘面具’，让犹太人显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阴影、数字、抽象。第二步是毁灭这种抽象性，把它烧成灰烬、化作烟雾，当然同时也试图把具体事物最后剩下的‘使用价值’利用起来：比如衣物、黄金、头发和肥皂。奥斯威辛才是真正的‘德意志革命’——对当时存在的社会形态真正的虚假变革，而不是1933年的‘夺权’。这种行为应能保护世界不受抽象形式专制统治的侵害。当然，纳粹分子由此也就成功地使自己脱离了人类。”（Postone, 1988, 第253及下页）

有一种分析认为奥斯威辛可以被同时归入自由主义的利益核算和福特主义的纲领中去，这同对奥斯威辛的上述剖析并不矛盾。就像边沁可怕的功利主义甚至把囚犯的排泄物和尸体（甚至连他自己的尸体也不幸免）都派上用场一样，纳粹则用被杀害的犹太人的遗体作成“人皮灯罩”。这样，奥斯威辛就成功地发扬光大了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功利主义。肯定还有其他“人口政策的”利益核算也与并不仅仅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体系有关系。但奥斯威辛的要害问题却超出了这个范围，它同时也超出了前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的大众奴役。在前苏联的那些营地里，人们通过“劳动”被折磨致死，但是那里的人们是逆来顺受地牺

牺牲性命的，并不是直接的目标。这一切也都受利益核算的支配，也就是无所顾忌的、踏过劳动者尸骨行进的高速工业化过程。

奥斯威辛也是一家福特主义工厂，就像“大众汽车公司”一样。屠杀机器就像是完全寻常的资本主义工业一样运转着，参与运营的也是十分寻常的私人公司。其中就包括托普夫父子（J.A. Topf und Söhne）（在埃尔福特）的企业及所属的机器制造厂和为焚烧犹太人提供巨大火化炉的燃烧技术建筑商行（Pressac, 1995, 第 181 页）。工程师弗里茨·桑德尔（Fritz Sander）是这家公司的一名雇员，他甚至还为自己设计的一种大型火化炉申请了专利（Pressac, 出处同上, 第 69 页）。不过，奥斯威辛是一家逆向工厂。那里不生产任何产品，而是在“清除”一些东西——也就是清除一个商品生产体系中社会抽象化过程的臆造代表者。所以，奥斯威辛是福特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劳动宗教和工业宗教最极端的后果：通过屠杀犹太人來拯救德意志的血缘民主。奥斯威辛的大门上“劳动使人自由”的口号具有双重含义：如果作为资本主义存在目的的“劳动”能够从犹太人那里并从而从抽象形式中被“解放”出来的话，那么它就能使人自由。只有这样，希姆莱（Himmler）令人费解、但又被多次引用的关于纳粹党卫队的名言方才变得可以理解：

“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会清楚，如果 100 具尸体堆放在那里，如果 500 具尸体或者 1000 具尸体躺在一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将此坚持进行到底，并且——且不谈那些人类弱点的例外——保持正直，这令我们变得冷酷无情。这是从未被写过，也将永远无法书写的我们辉煌的历史篇章。”（转引自：Piper, 1995, 第 4 页）

个人的仇恨，甚至个人的残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能发挥作用的只有那些会计师类型的人、勤奋的工程师和德国忠于职守的人员“恶毒的平庸”（Hannah Arendt），他们为了能达到某种拯救人类的崇高目标，在面对牺牲者时必须泯灭所有人类的恻隐之心，纳粹正是以他们的方式完成了社会民主党早就抱有的梦想：一场“井然有序的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一切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目的是使它们保持自己原来的模样。这场“德国革命”对犹太人“井然有序”的屠杀仿佛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弊病人格化垃圾的清除，一种艰难的“流血劳动”，正直的人体面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样，他们随后就能淋个浴，去享受一下那被净化过的资本主义了。奥斯威辛和“大众汽车公司”之间有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以犹太人送命流血作为代价而换来由被拯救的福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被拯救的大规模就业可能性和被拯救的业余娱乐消费构成的一个世界，犹太人做出的这些牺牲将把“劳动士兵”从向资本主义机器的自动屈从中无罪释放出来。

这样一种偏执狂式的杜撰必然不可遏止地恶化了普遍的资本主义疯狂症，这种杜撰只会在企图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自我，而这种自我毁灭从一开始就像一场噩梦存在于“种族”意识形态及其鲜明地福特主义特征的内部。“世界末日”，即日尔曼神话中世界的毁灭之日，就在这种思想意识中徘徊作祟。早在推动“德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流派中就曾有过暗下里已对自己所作所为——这样的做法必定要采取自我毁灭的形式——当中潜在的不可挽救的疯狂症的认识，而且这还在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臭名昭著的《西方的没落》（于1918年首次出版）一书里成为了经典的说法。施普伦勒（1880~1936）和荣格尔一样都曾经是纳粹主义的开路先锋，他们虽然不久之后就厌倦了纳粹主义的庸俗性，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成为“德国革命”基础的思想。在施本格勒以生物有机体为出发点的历史哲学中，

主要的文化（这种文化与赫尔德的民族或者人民概念类似）如同“有机体”，它们在经过了一个生命历程之后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消亡。在他看来，当时的历史是对雅利安“浮士德”式西方文化的最后抵抗，而这种抵抗已经预示了一种“英雄史诗”般幻想的没落：

“这是崇尚技术的思想为争取其自由，同崇尚金钱的思想所作的绝望斗争……为数甚少却有着极强理解力的钢铁般坚强的种族人士——他们的这种理解力是普通市民既觉察不到也理解不了的——所进行的激烈搏斗从长远来看，也就是以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使企业主们和工人社会主义之间纯粹的利益斗争完全失去了意义。由其领导者们所塑造的工人运动和对工业领导工作掌管人员（原文如此！）的憎恨则早就转到面向证券交易所的服务中去了……不过，金钱却因此而达到了它最大限度的成功，最后一场较量开始了，在这场较量中文明获得了它的终结形式：金钱与鲜血之间的决斗……金钱只能用鲜血来征服和废除……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场生死决战，而且关系到的始终是生命、种族、权力欲的胜利，而并不是真理的胜利……于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演出的这场闹剧……就又以鲜血永远流淌的残景而告结束，而这永远流淌的鲜血又是与永远循环往复的宇宙洪水同出一源……”（Spengler, 1972/1918, 第1192及以下数页）

由于已被资本主义驯化的劳动马克思主义对“抽象劳动”的“最后决战”始终没有展开，却热衷于在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商品生产体系里进行“纯粹的利益斗争”（如同施本格勒诡谲地一语道破的那样），所以资本主义本身呈现出一种似乎被战胜的光怪陆离幻象。纳粹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恐怖地扭曲的影像，这种社

会运动再也达不到挣脱现代主义拜物教的解放目标。

建立所有人都参加的、自行组织的委员会社会的思想在负面的强迫劳动平等面前，被“钢铁般坚强的种族人士”的“领导者社会主义”这种精英狂想所取代，这一狂想也取代了“种族”的真理。用“自由人协会”征服“劳动”、金钱和国家都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存在于人们的想像力所及之外，即通过“流血”来废除金钱。这种正在自我实现的想法深层的非理性把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基础上“废除”资本主义完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终结”——但与启蒙运动思想家，如黑格尔和孔德的观点有所不同，后者把“废除”资本主义看成是消极的和黑暗的。血缘共同体的“最后决战”不会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历史的开端而通往社会解放，而是会在鲜血的涌流中回到无历史性的状态：

“‘嫡’首先是没落的象征之一，它作为热力学第二个主要定律的主题而为人熟知……力量、意志都有目标，有目标的地方，用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就也有一个终结……圆满完成了内在的必要发展即是世界终结——这便意味着世界末日；这也就是说，对神话最后的非宗教理解，就是嫡的学说……‘历史的人’……是在一个正在圆满完成发展的文化中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和在此之外，别无历史可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作为结论：人不仅在一个文化产生之前是无历史可言的，而且当一种文明达到了其完善和最终的形态时，当这种文明以此结束了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发展，并且文化耗尽了它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最后那些可能性的时候，它又将成为无历史的。”（Spengler，出处同上，第542及以下数页，第613及下页）

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呀！如果说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Wilhelm Ostwald) 还只是努力把“熵”改换为社会哲学概念来表达神经机能症的、企业经济的福特主义时间节约逻辑的话，那么就在短短几年和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施本格勒就把它当成没落的预言。在此，我们不仅能看到正在上升的纳粹死亡欲念，而且也能看到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死亡欲念。这种思想体系把不容磋商的、决定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物理学解释成盲目的、被限定的“流血”逻辑，它同样也把向绝对极限冲刺的资本主义内部自我矛盾说成是不可阻挡的文明的“世界末日”。在奥斯威辛以外的地区也一直存在着这种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威胁：资本的熵就应该意味着全社会万物万众的死亡；如果不通过流血牺牲来自我拯救的话，那么“不由自主的主体”就会“希望”他自己的灭亡也同时是整个人类甚至是世间所有生物的灭绝。

### 开洞挖穴和建造金字塔：凯恩斯主义革命

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以及形形色色专制制度的形成，早已自动朝着保守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方向突变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落到了低谷。几乎没有什么人再那么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教义了。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在 1942 年就曾撰文指明的那样，几乎所有政治和思想阵营当中都弥漫着“与资本主义敌对的气氛” (Schumpeter, 1980/1942, 第 107 页)，这种敌对气氛是从过去痛苦的经验里产生的：

“公众舆论逐渐对资本主义彻底灰心失望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所有这一类的文献甚至几乎成了讨论中必不可少的话题。” (出处同上)



但事实上，这种在战争间隔期间进行的“资本主义批判”根本就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生产的）自身即目的制度的，而是一直都只针对其十九世纪过了时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早就被“国有社会主义”（实际上：国有资本主义）侵蚀了。无论是在民众的意识里，还是在理论的思索当中，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都已经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被社会民主党带进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要与私有资本主义、竞争经济、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完全相符，才能够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设想出现；而社会主义本身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了“龙形海怪”思想这个事实，则被人遗忘了。于是，很久以来，“资本主义批判”就落进了自由主义无意中设下的陷阱：即只能在资本主义实际范畴的范围之内形成表达那些臆想中的其他选择。

因为现代国家机器同市场完全一样，本身也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作用领域。当以拜物教方式溶化于商品之中的“剩余价值”在市场上又退回到货币形式的时候，国家就会调节市场，建立框架条件，并在一部分情况下以企业主的形象出现（如同阿道夫·瓦格纳在分析中所述），而且国家也普遍是资本主义人员管理的职能承担者。所以说，市场和国家总是资本主义这个同一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恰恰是与大众的自发行为和自我组织脱离并且异化了的国家怪兽，即“龙形海怪”，被错误地理解为“反资本主义”的形式——从谋求解放的意义来说这叫做让公山羊当守园人。

市场机器和国家机器只可能是同一部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美妙机器”上两个或多或少相互有摩擦损耗又啮合在一起的机件；因此，私有资本主义和国有资本主义（通常叫做“国有社会主义”）就仅仅是两种不同侧重的表现形式，都有着对人类进行欺压盘剥的魔鬼本质。就像私有资本主义把官僚主义人员管理的恐怖做法作为其有传统的自我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并很久以来

就一直带动它共同发展一样，国有资本主义反过来也在其官僚主义的外衣之下包罗着各种层次上竞争的恐怖行为以及荒诞的劳苦。市场和国家、私有资本主义和国有资本主义就同“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经营管理者一样，只是名目不同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非理性的自我矛盾以这些形式运动着并且历史性地向前发展着。

阿道夫·瓦格纳用其“提高国家份额”的定理从经济角度做出的预言以及在帝国主义竞争和世界大战中不可阻挡地建立了起来的一切，直到此时在为推动福特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中方才进入了关键性阶段：即向着普遍的国家经济调控，向着成为主要经济主体的国家过渡。正是这个客观过程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劳动国家”和“劳动民主”思想体系的基础。市场和国家相辅相成：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在结构上的基本历史公式在向福特主义的全盘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的验证，假如不同时向强行成为经济原主体的国家过渡，全盘资本主义就绝无完成的可能性。被很多人错误地理解成越来越强大的社会主义或者原始社会主义的事物，其实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蜕皮后的形式。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为这整个庞大怪物的蜕皮变形提供了推动力量，而劫难中的痛苦也成了为此服务的工具。

早在世界大战期间，自然又是社会民主党不仅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颂扬之辞重新定义了对人力资源的福特主义合理化，而且还重新定义了由此出现的国家经济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必须超出“战争社会主义”的范围迫不得已地继续下去。社会民主党的金融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不知是由于受刑还是自杀而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身亡，他在20年代末也曾在这种意义上十分乐观地谈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然而，这种理论思索，不管它是乐观的、悲观的还是忧郁的，在此期间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面，而且

一直延续到战后，直至 70 年代。在社会学分析当中，这个过程被看做是“世界官僚主义化”的持续发展 (Jacoby 1969)，这种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上，而且也存在于企业经济层面上。自世界大战起，马克斯·韦伯就从一个帝国主义的好战宣传家转变成了一名成熟的资产阶级大理论家，他也曾经谈到过“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向官僚形式的“隶属性外壳”异乎寻常的发展 (Weber, 1985/1922)。资本主义的“领导者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般“劳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客观基础就存在于这无所不至的官僚主义化之中。20 世纪 40 年代初，社会学家詹姆斯·伯纳姆 (James Burnham) 在一次世界范围里进行讨论的分析报告里，把向以国家官僚主义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过渡称做是“管理者政体” (Burnham, 1948/1941)：

“这是个从一种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类型向我们称之为管理者的社会类型的过渡。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相比，这个过渡阶段估计持续时间会短些。它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大约将在 50 年之后随着新型社会的巩固而结束……在过渡达到终点时，管理者将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成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而且，即便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却必将在所有国家都成为一场全面展开的世界性争斗较量。而为管理者成为社会统治阶层提供保障的经济制度也建立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之上。在这种制度内部比较重要的生产资料将都不属于私有财产……管理者对国家的控制将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政治机构得到充分的保障，这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政治机构来保证自己的统治是一样的。反映管理者的社会任务、利益以及抱负的各种意识形态……到现在为止都还尚未完全形成……当然，人们已经从各种不同的、即

使是相互关联的方向朝这些意识形态靠近了，比如，通过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通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以及——在一个还未开化的层面上——通过罗斯福新政和其他影响小一些的美国意识形态，例如技术至上论。”（Burnham，出处同上，第91及以下数页）

这些考虑在多方面都是值得重视的。伯纳姆并没有把管理者的典型特点定义为对私有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而是把他们同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领导职能联系起来，这种领导职能当中也包括国家经济的行政管理，所以也与意识形态中的“领导人”概念更加接近。同时，他又把这种“管理者的政体”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合法地位无关。也就是说，这种政体无论是在前苏联、纳粹德国还是在美国都同样可以出现。虽然伯纳姆认为，普遍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概念的确存在，但从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情况来看，这种被国家马克思主义者过分渲染的法律上的所有制问题不过是形式上的一个区别，丝毫未触及社会和经济上的本质（也就是被异化的、生产资料以自身为目的的资本性质）。

用原先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来衡量，只有前苏联把国家建设成了整个社会的“龙形海怪”式的总企业主，在纳粹德国和美国，新型的国家调控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全部采纳私有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但这当然也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关键在于，国家必须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更多地发挥经济总体调控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接任胡佛（Hoover）的美国新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1882~1945）开始执行国家经济危机政策，它以含糊不清和具有多义的名称“罗斯福新政”而载入了社会经济史。这项政策原则上同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政策如出一辙。就在这个罗斯福新政的边缘爆发了一场由工程师、管理者

和知识分子发起的小规模运动。这场运动获得了一个后来成为贬义概念的名称“技术至上论”，它成为了同时代世界意识的一个表明特征的边注。

在这个意义上，伯纳姆预测了这种社会变革的性质，但他也没有把这种“过渡”看成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蜕皮变形，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具有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相同的历史性质的新型社会的产生。这种普遍的曲解是由于社会学的粗略化观察方式而产生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的，而且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当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基本社会形式仍旧是一个“缄口不语的”、非历史性本体的以及不反映出来的背景时，理论分析涉及的就只能够是这种体系内部在统治、职能和阶级方面的种种关系。

“管理者”对社会的“控制”完全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继续发展。甚至早在 19 世纪的股份公司里，法律上的所有权职能和实际中的领导职能就摆脱了它们之间直接的同一性。无论是在这种形式还是在国家经济形式当中：资本主义都不断地在更大程度上释放着它自身逻辑的能量，在这一逻辑中，“所有者”被确定为一个拥有“私人支配权力”的和自行负责的主体的臆想破绽百出，而且无意识的“自动主体”也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关键在于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个人制品的个人私有生产者的社会，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超个人的、社会性的生产聚集——但并不是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组织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处于独立的物神形式的辖制之下，这本不符合它旨在加强社会化的特点。早在 18 世纪，这种通过资本的关系而实行的消极的、非理性的社会化就被比喻成社会机器或者社会物理学了。顾名思义，这个最早充满预感的概念率先说明了那些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发展历史当中才能清晰可辨的情况。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消极的、无意识的社会化进入了完全成熟的、还能以国家经济

方式来组织的发展阶段。

对于至此为止最不积极跟着国家经济取向走的美国来说，罗斯福新政的尝试从总体上看虽说有些优柔寡断，但它已经算得上美国经济史上最深远的重大转折了。如果说有关福特主义繁荣的预言还完全接受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观点影响的话，那么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就使得这种错误的自我意识如此持久地进入了休克状态，以至于此时美国也已经成熟到足可以去顺应世界潮流了，甚至是在由国家为或多或少自愿参加的青年人设立的劳动营地的影响之下。波士顿的百货商场老板爱德华·A·法林（Edward A. Filene）是罗斯福新政的追随者，他在1933年进行了一次欧洲之行并访问了纳粹德国，之后，他甚至想要效仿希特勒青年团来发起一次“激起劳动热情”的青年运动（Jaeger, 1974, 第157页）。当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完全相同，这种想法只是要把被遗忘了的欧洲早期资本主义方法带回到更新的、发展层次更高的形式中去。

总的看来，罗斯福新政的国家经济措施缺乏内在关联，倒是更趋向于务实。它首先旨在稳定农场主们由于经济危机而几乎减半的收入。为此而采取的方法一直在农业领域沿用，例如今天它对欧盟的联合农业政策这个荒诞离奇的整件艺术品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通过削减供给，人为地把农产品的价格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这种以国家调控形式实行的方法即是用国家基金为减少的耕种面积发放补贴：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国家专门建立了一个新的主管部门，名为农业调整署（AAA）。当时，在这项法律正式生效的时候，下一批农作物已经播种了。而农业调整署竟然在一次大型宣传运动中，要求人们把种下去的棉花的四分之一翻耕入土。就这样，一亿英亩田地的生产遭受损失。至于小麦

的收成，是当年的恶劣天气助了政府一臂之力。而玉米和肉类的价格则用买新的方法被人为地提高了。几乎600万头猪和仔猪绝大部分被加工成了肥料。当国家全面处于这样的饥荒之中时，却发放补贴，为的是毁灭自然的恩赐，这实在是一种沉痛的巨大讽刺。当然，负责此事的官方人员在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之内找不到其他的出路……最弱小者当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地主们则不再把出租的土地投入生产，而是把国家补贴装进腰包，并与他们的佃农分道扬镳；农场的帮工也必须另谋出路。”（Sautter, 1994, 第381页）

这里就已经清楚不过了，国家经济调控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和何种强度进行，都无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非理性。经济危机虽然部分地被克服了，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使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并且新产生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其荒谬的运行形式。面对反饥饿的示威游行而销毁食品，这尤为明显地证实了，由国家机器承担起接管经济的任务这个做法不可能在理智地对待资源的基础上，而仍旧是在“自动主体”继续保持不理智的条件下来修正“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要这部机器继续以此方式运转，实际需要就还得继续服从这种目标。

此外，公共事业的融资也属于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之一。所谓公共事业主要指的是诸如道路、堤坝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与纳粹德国和前苏联情形完全相同；克服经济危机的首批国家经济方案是与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为汽车产品和新型媒体的大众消费创造至此为止尚不充分完善的后勤框架条件这些项目一起实施的。最后，罗斯福新政还奋起直追，在美国也推行了俾斯麦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以机构的形式确定下来的社会福利国家措施。从这方面来看，有“追补现代化”需要的是美国；后来，新成立的联邦失业救济署（FERA）向各州和城市的社会福利代理处发放了30

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Sautter，出处同上，第383页）。

虽然纳粹德国也没有过渡成完全的国家所有制，但是国家经济干预的力度却比罗斯福新政大得多。以“劳动大会战”为名，希特勒政府公布了一整套的“劳动就业方案”。这又是一个无意之中表明了一种生产方式之非理性特点的概念，这种生产方式使“劳动”以自身为目的，它为了让人们“就业”而不惜一切代价，它使用资源的目的并不是让所有人都获得闲适以及美好的生活。1933~1934年，已有无数国家资助的基础建设项目启动，其中就有著名的高速公路建设，这个建设项目使人们难以忘怀。当时，福特主义的妄想被作为动员民众的重要措施来用。因为当时需要一番思想上的动员才能把修建高速公路的事实也看成是改善社会福利状况的一个组成部分，纳粹对待为此而劳动的“人民同志”并不比斯大林对待其古拉格的劳改奴隶更仁慈：

“他们栖身于年久失修的棚屋板房中，或是粮仓或是马圈里，手持最原始的劳动工具，不得不为少得可怜的工资劳动着。他们平均每小时的工资是68分尼，除此之外，如果能干满4个星期，还能得到价值为25个帝国马克的所谓购物券，拿着它可以在特殊的商店里购买衣服和家用器具。”（Höhne，1996，第164页）

关键在于“劳动”。被榨干血汗的劳动力市场上那些曾经成千上万次被蹂躏、被剥削得只能靠吃土豆生活的穷人们几乎对一切都感到满意。大规模失业率的下降被标榜为希特勒的功绩。然而，对纳粹独裁统治而言，“劳动大会战”和“劳动就业方案”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扩军和备战。军事战略价值并不明显的高速公路建设也至少间接地属于这种情况；从事实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用品以及毁灭性器材的运输主要是通过铁



路，民用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一直都停留在起步状态。所以，“鬼魂高速公路”事实上只有宣传价值罢了。但尽管如此，这个规划并没有脱离正开始推行的扩军政策，因为对于纳粹来讲，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备战的普遍大环境。希特勒与荣格爾的看法类似，他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理解成是一场“技术战争”，认为技术装备因此而成为未来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在他长篇大论的自白集《我的奋斗》里，他就着重用军事观点评论了福特主义的汽车社会，并且警告不充分的现代化将带来的后果：

“世界普遍机械化在下一场战争中将对战斗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它的这种趋势我们几乎无以对抗。”（Hitler, 1942/1925, 第 748 页）

这里就已经暗示了机械化“闪电战”的经济学，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劳动就业方案”逐渐步入这种经济学。如果说，希特勒的“劳动大会战”的收效比罗斯福新政更佳，那么应该归功于由于是不断扩充军备而好转的经济景气状况。当时为了能达到这种情况，必定要动用很多资金才行。仅仅从 1935 年到 1938 年，德国的军备支出换算成美元就达 160 亿之多，这大约是同时期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备支出的总和。德国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支出（包括运营费用和人事支出等）占有“国家行政机构”总支出的比例在短短几年之内从 4%（1932 年）上升到了 50%（1938 年）。（Ludwig, 1981, 第 66 页）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是通过国家赤字来筹集资金的话，那么纳粹德国庞大的军备计划更是变本加厉。即使在前苏联，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也是通过在政治上硬性印刷纸币的货币创造方式提供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对此感觉并不良好，但是福特主义的第二轮兴起也完全是在或多或少的强度上重新采用了战争经济的财

政措施而得以启程。这也为这次较长期的新的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循环的突变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循环当中，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不断运动，其绝对极限也再次向以后推移。虽然，开始时希特勒好像有些害怕再次采用通货膨胀的措施，但“劳动大会战”和军备政策的自有动力却不允许去走另外的道路。

为此而采用的手段也与拉特瑙式“战争社会主义”所发行的“信贷银行券”有着致命的类似之处，就像后者与法国大革命中使用的“指券”有类似之处一样。这种手段其实就是运用“通过期票先期筹资”方法创造贷款资金（Höehne, 1996, 第 167 页）。这是希特勒的第一任帝国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 1877~1970）一手策划的。有“4%利率和无限期兑换可能性”（Höehne, 出处同上, 第 168 页）的这种期票是通过由帝国银行、帝国国防部和重工业企业共同创建的一个名为“冶金研究有限责任公司”（Mefo）发行的。这种假钱不久之后成为纳粹“劳动战役”的动力：“冶金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期票吸引并推动着德国的企业，没有这种期票，德国的经济仿佛就支撑不下去（Höehne, 出处同上, 第 168 页）。

国家调控战争经济的方法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局限在真正的战争状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为了能够使一种按照当时的教义意味着经济政策上的罪孽能够合法地延续下去，理论模式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与罗斯福新政的务实措施和希特勒军备经济景气并行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创立的名为“赤字财政”的同类理论。在他于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从世界经济危机的经验里得出结论，认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市场这只放任自流的“看不见的手”必将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的“经典”萨伊法则则是错误的——直到当时为止这种理论还一直在发挥效用——或者

至少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动荡时期”的特殊情况。反之，凯恩斯断定，只要一个社会里积累了“过多的”资本，以至于剩余资本不足以刺激实际再投资的话，那么一种“消极的平衡状态”其实在远远低于充分就业线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出现：

“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分期款额这两项指标相形之下决定着就业人员的数量……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分期款额不能引起充分有效的需求的话，那么实际的就业水平就会落后于按照目前实际工资支付能力可提供的工作职位……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就能解释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出现贫困这个悖论了，因为只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就可能也会经常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之前，就使就业增长停止下来。有效需求的不足会阻碍生产过程的运行……此外，国家越富有，实际和潜在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就可能拉得越大……因为一个穷国总是趋向于最大限度地消费其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以便在为数不大的投资的情况下就足以实现充分就业；但对于一个富国而言，如果它要把其富有成员的节约倾向和贫穷成员的就业倾向结合起来的话，则必须去发现多得多的投资可能性。假如一个有富裕潜力的国家的投资诱因很小，那么尽管它拥有潜在的财富，却不得不按照有效需求的原则减少它的实际生产……”（Keynes, 1994/1936, 第 26 及下页）

这里凯恩斯用某种方式多此一举地重新发明了已经存在多年的风车，因为他这里用其经济学行话改写了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无异于卡尔·马克思早在 70 多年以前就阐明并受到官方谴责的、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迹象的“过量积累”的理论。然而，与卡尔·马克思不同的是，凯恩斯并没有逼近资本主义在逻辑上的基本自我矛盾，而只是停留在对“经济主体”主观嗜好的表面描

述上（通常叫做“消费倾向”，意指购买力和“新投资倾向”）。对他来说，按照根本不考虑市场参与者“背后”拜物教式客观化的、从主观出发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经济”完全由“不可控的和不安分的商界心理来决定……”（出处同上，第268页）。因此，面对问题他也就不能把问题所在理解为继续在运动着的这种自我矛盾的历史发展——这种自我矛盾必将达到它的绝对极限——而只能把它理解成近乎与历史不相干的“可能情况”；甚至就像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理论从来就与历史无关地用臆想中永久的经济范畴构成的抽象“模式”来陈述观点一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作为一个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以见证人身份撰写的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同样是肤浅的：

“萨伊法则并非是无懈可击的。收入并不一定要被用于支出或者投资；在不安定的情况下以及对未来充满疑虑的时候，收入会被以现金的形式保存或者在银行里储存起来，而银行也会出于恐惧或者因贷款遭到拒付而变得过于小心并不愿意再把钱借出去。或者还由于缺乏具有足够偿付能力的贷款人。此外，价格也不一定总会适应降低了的需求。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弹性和稳定性是有限的，工资也同样如此……在当时个人的收入分配并不平均的情况下（这种状况现在也存在），萨伊法则会继续承受来自尚未使用的购买力的压力，而这种尚未使用的购买力又落到了那些不想花钱或者不愿投资的幸运儿们的手中……然而，最后如果经济萎缩，就会产生建立在低生产量和高失业率形成的新的平衡基础之上的稳定……而且没有什么重要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新的平衡不能持续下去。相信这样会自动地恢复高度乃至完全发挥生产能量的和充分就业的局面的观点则只是以政治上的意愿、希望或者保证为依据，并非依据经济的真实情

况。整个 30 年代的情况都长期证明了这种低就业率的平衡……”（Galbraith, 1995, 第 94 及下页）

作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之全部宗旨在于致力拯救这个制度，所以他的理论也就流于肤浅。按照他的理论，如果说惟一的目标在于“逐渐摆脱资本主义各种各样有失体统的形式”（Keynes, 出处同上, 第 185 页），那么与此相应就不允许有解决不了的自我矛盾。所谓“有失体统”自然是指由于收益率不足，在人民失业、贫穷、居无定所、甚至食不果腹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房屋和经营资金闲置的现象。为此，凯恩斯建议，必须通过国家投资去刺激投资和消费。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双管齐下。在我赞成一种由社会引导的投资率的同时……也会支持所有类型的增强消费倾向的政策”（Keynes, 出处同上, 第 275 页）。因此与前苏联经济（国家作为总企业主）相比，凯恩斯“虚弱的”国有资本主义版本应该在保留私有财产和“个人积极性”的前提下被看成是一种国家计划的“投资 - 社会主义”：

“因此我认为，投资行为相当广泛的国家化将会证明，它乃是达到接近充分就业目标的唯一途径；当然，这里绝不排除运用其他折中办法以及其他方案的可能性，因为通过那些办法，有关当局可以同有积极性的个人进行合作。但除此之外，毫无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涵盖国家经济生活绝大部分的国有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做出解释。这不是指获得那些从占有本身来说对国家十分重要的生产物资。而国家所要完成的必要任务就是要把用于增加这种物资的所有救济金和报酬的基本比率数额发放给他们的占有者……我们要对已经被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批评并不是要在其分析当中找出逻辑上的漏洞，而是要强调，他们缄口不提的前提难以或者永远

都不会成立。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这种理论永远无法解决现实世界里的经济问题。但假如我们的中心领导机构能够成功地确定接近充分就业又可实现的生产总量，那么这个古典理论将以此作为基点正确地发挥作用……中心领导对创造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因之间的均衡来说非常必要，如果这种必要性不存在，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有理由实行经济生活的国家化了……对保障充分就业来说十分必要的中心领导自然会导致政府至今所承担的任务扩大范围……但尽管如此，它仍旧会为实现个人积极性和责任感留下很大的活动空间……”（Keynes，出处同上，第319及下页）

就像凯恩斯只是向世人提供了资产阶级的神经能够承受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复本一样，他的方案同时也只是基于一种打了折扣的国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不会妨碍一种暂时的务实效用）。这样，这个“凯恩斯主义革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和在资本主义种种范畴的基础之上居然成为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典范也就并不奇怪了。凯恩斯以他的经济理论成为一个为的是摧毁火车站、却还买了站台票入站的革命者。他事先就在保守派的理论批评者面前为自己的大胆断言辩护并同时指出，他对萨伊法则的修改乃是“可以避免毁灭全部现有经济形式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出处同上，第321页）。同时当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人们也就只是认为，毁灭了这些（私有资本主义）形式的后果即是走向前苏联模式的全盘国有资本主义，而让资产阶级意识尤其无法忍受的摆脱资本主义拜物教形式的思想，他们更是连做梦都不会再想到。

凯恩斯自然也必须说明，国家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投资引导或者创造需求。他基本上赞成通过国家的货币政策诱导降低利息，达到“利率和投资率之间”持久一致的手段（出处同上，第184页）。而这将会导致“以投资收益为生者不知不觉地逐渐

消失”（出处同上，第 317 页），因为同实物投资相比，这样为获得利息收入的纯粹货币资本投资就不再显得那么值得了。不过，凯恩斯也清楚地知道或者预见到了，国家的货币政策根本不能、不能总是或者不能持久地控制住利息的升降。为了实现这种“下降”，只能采取罗斯福和希特勒曾经实行过的毫无理论指导的措施了：即，靠赤字筹资的实物投资和大规模的公益工作（19 世纪后期路易·波拿巴就已经在较小规模中用公共建筑项目推行了“社会帝国主义”）。自 1936 年起，纳粹德国甚至制定了一个“四年计划”。凯恩斯不无愤慨地表示，恰恰只有纳粹的经济政策才能够成为他理论的样板。而凯恩斯也不愿意把扩军和军备竞赛作为国家赤字—实物投资的重点来宣扬。而他为国家投资项目所选择的隐喻，更多地透露出他的真实想法：

“如果利率——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不能这么快降下来……那么甚至财产占有欲望向事实上根本就不产生经济效益的财产占有数量的转移也能提高经济富裕程度。只要百万富翁们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栖身之处建造雄伟的宫殿，为自己死后安放遗体建造金字塔，或者为自己的罪恶进行忏悔而修筑大教堂，馈赠修道院或神职人员，并从中获得满足的话，那么充足的资本对充足的生产产生消极影响的日子就会被推迟。用积蓄来支付‘在土地上开洞挖穴’，不仅可以促进就业，而且也能提高国民经济在有用的商品和服务方面获得的实际收入……”（出处同上，第 184 页）

凯恩斯不仅（一半是偶然和不情愿地）承认，从根本上说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极限的“推迟”而已。同样他也事与愿违地揭示了资本关系内在逻辑的荒谬性。就像曼德维尔就一直想让人们信服的那样，即便是富人们最荒淫无耻的宫殿和最挥霍无

度的奢侈品从客观上讲都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可以为穷人们“提供就业”机会。所以这样一来，这位新型理论革命者也就不好意思再去对这些正宗自由主义的恬不知耻品头论足了。诚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纯粹的奢侈品已经不再能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了。只有为造就全社会“劳动大军”而进行的国家大型项目才能促使资本主义延长寿命并向福特主义突进。

凯恩斯并不是随便选用“金字塔”这个隐喻的，因为只有用显然毫无意义的项目才能把资本主义的“投资主义”继续推行下去：“为死人堆积的两座金字塔或者两个石冢，总比一座金字塔或一堆石头好一倍，但却抵不上修建两条从伦敦到纽约的铁路”（出处同上，第111页）。另一次，凯恩斯甚至还创造了这么一句“妙语”，说他认为在危机中“把装着十英镑的空啤酒瓶埋进停了工的矿山上，再让企业主们派人把它们挖出来”（转引自：Höhe 1996，第165及下页）也比什么都不干强。建造金字塔，开洞挖穴——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达资本主义这个非理性的自身即目的的制度了，其中“劳动”作为被抽象化的活动形式也以自身为目的。自此，其使用价值颇令人怀疑的高速公路、运河、大型堤坝等形形色色的“金字塔项目”就开始变本加厉地使自然景观面目全非了。前苏联的国有资本主义也恣意地给世界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废墟”；这些“为死人们修建的石冢”和为后世留下的纪念碑都记载下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混乱。

“赤字支出”造成国家通货膨胀妊娠期的棘手问题仍旧存在。凯恩斯建议通过新的金融手段和控制方法开具一张保守治疗处方，来消除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恐惧。就像虽然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毒药，如果总是使用极小的剂量，而后慢慢升高用量让人体渐渐适应，人体就能长时间地不断吸收一样，那么货币量以赤字方式的增加也不必通过毫无节制地印刷纸币，而可以借助于国债谨



慎地抽取积蓄和有控制地提前花费未来收入的方法来实现，以保证国家的货币制造量始终处于“警戒线以下”（出处同上，第256页）。凯恩斯反对“所有的货币增长方式都意味着通货膨胀”（出处同上，第257页）这种估计。他认为，这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

“如果有效需求的继续增长不能引起生产的继续增长，而仅仅是促使工资单位的增长与有效需求的增长成正比，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种恰好可以称为真正通货膨胀的状态了。在达到这一点之前，通货膨胀的影响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出处同上，第256页）

凯恩斯的这个观点，即不管客观性质如何，随便建立起货币量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实际生产之间任何方式的一致性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了，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世界大战带来的完全是工业武器、炮弹等的死亡消费，也就不应该引起通货膨胀了。“金字塔项目”的消费，假如它还能被称之为消费的话，就如同军备消费一样，只能很少部分地返回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循环当中去。而通过开具保守治疗处方的方法反倒会有助于把“赤字消费”控制在“警戒线”以下。不过从原则上讲，这种方法也不可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只能作为“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拖延时间罢了。后来，它也的确证实了它的这种作用。

不管凯恩斯愿不愿意，“凯恩斯主义”的第一轮大回合导致了新的军备竞争，是希特勒的高速扩军和公开备战为它拉开了序幕。由于民间还十分缺乏广泛的福特主义基础，而且这种基础又无法自动建起，于是战争又一次成为万物的鼻祖。正如加尔布雷思就已经正确地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向福特主义的突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特勒就是这段开始翻开它谋杀“诡计”黑暗篇章历史的执行人。这位发狂的“元首”肆无忌惮地撕毁了所有协约，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潜在热望袭击了前苏联又同时挑衅了西方，这至少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违心地同前苏联的国有资本主义结盟。这样恰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空前地坠落到一种全球的荒蛮状态中去。

这并不是必然的。颇值得怀疑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谋杀是否能够单独导致这种局面的产生呢？据说，丘吉尔（Churchill）在纳粹德国崩溃之后声称，西方“屠宰了一头不该屠宰的猪”。恩斯特·诺尔特曾多次公开扬言，国有资本主义“追补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随之而来的竞争以及“冷战”状态已经为降低纳粹主义的危害性和为其秘密开脱罪责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的自我认证永远只会是七拼八凑地杜撰历史，原因是资本主义的主体没有能力正视自己的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真正的突破在毁灭能力上远远超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 20 世纪的空前浩劫。希特勒所预言的“全面机械化”事实上只能以他所梦想的军事形式实现。而工业战争在当时通过加快科技革新速度达到的福特主义水平上再一次“大放异彩”：比如雷达技术、喷气式飞机以及作为宇航技术初级阶段的火箭，特别是核能和原子弹，可谓生产力发展中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工业尖端技术的恐怖形式。“美妙机器”的这些新胜利使 5500 人丧命，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变成了废墟。

但奇怪的是：这又一次付出的巨大“现代化代价”，虽然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超出了资本主义至今的所有恐怖形式，但它却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空前浩劫那样再次引起巨大的震惊，并在思想上引发共鸣。福特主义世界就这样在知识和文化当中幽灵般地浴血重生了。就好像在心灵坠落了的人力

资源如机器人般冷酷无情地穿过火墙，冲进了即将到来的、前景昏暗的消费天堂而步入其人类精神已荡然无存的、麻木不仁的商业氛围之中。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当时的一句诗意味深长：

在世界觉醒之时，语言长眠了。

## 极权的世界市场民主政权体系

---

直到 1950 年都还无人会料到，世界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之后，资本主义会像一只从灰烬中飞出的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对这个过程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推动力”（按照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的措辞）功不可没，这样，曾被 20 世纪 20 年代爆发的投机热潮一度装扮起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经济繁荣才能够真正出现。对大多数人而言，世界机器看上去好像突然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运行状态，确实创造出了像是“黄金时代”的东西。在走在最前沿的德国，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奇迹”这一咒语；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它仿佛已经表明自己是一种不寻常的、对此统治制度来说原本是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必然是短暂的。

所有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中经历了这种战后繁荣。而且这也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了一个乐观的前景。就像“奇迹”所本应拥有的本领一样，整个世界的精神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短暂的历史阶段，为的是尽可能彻底地忘记延续了 200 到 300 年充满灾难的现代化历史以及它造成的牺牲者和苦难，并且传播这样的廉价信仰：资本主义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也就是说它现在才终于起到了它真正“提高富裕程度”的现实作用。只

是对这个制度的形式还必须以民主的方式稍作加工，这就是“经济奇迹”留下的令人欣慰的基本信念。不过，这也真是个奇迹：吞噬童工和茹毛饮血的资本的世界机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和平的自动煮咖啡机；没有任何严重的新冲突，没有社会变革，也没有任何人必须从这个苛求制度中解放出来。

### 簇新的废墟

甚至从内部观察，也只能相对地看待在历史长河中只持续了如此短暂瞬间的真正经济奇迹。因为首先，这种消费财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便不去看它在很多方面毁灭性的性质。而且，这种消费热潮的影响只有在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灾难相比较的时候才显得令人信服。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能理解，当普通人终于不再受折磨、不再被枪杀、不再被毒气致死的时候，当民众不再持续地处于穷苦境地，当人们终于不再被一次次抛入绝对的贫困之中，当所有人终于至少“允许”吃饱肚皮的时候，被驯化了的人力资源就已经兴奋得要热泪盈眶了。但是，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还看不出这种令人激动的迹象，因为至少在被炸成了灰烬的德国和遭到希特勒纳粹铁蹄践踏而变为一片废墟的东欧诸国，开始几年的生活水平一直还停留在原先以土豆为生和忍饥挨饿的标准之上，这种情况在声名狼藉的1946~1947年的“饥荒冬季”里更为恶劣。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曾在其1953年出版的小说《早年的面包》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压抑的感受：

“饥饿让我对价格有了概念；对刚烤出来的新鲜面包的渴望让我脑子里一片糊涂，夜晚我常常数小时地在城市里徘徊，满脑子想得都是面包。我的眼睛灼热，我的双腿虚弱，

我感到，某种饿狼式的东西在我的身体里蠢蠢欲动。面包。我对面包简直上了瘾，就像一些人对吗啡上瘾一样。我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恐惧……直到今天，那些日子的那种饿狼似的恐惧还会时时侵袭我，让我一看到面包房橱窗里摆着新鲜面包就禁不住要买。”（转引自：Becher，1990，第96及下页）

紧接着出现的著名的“吃喝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繁荣的第一种现象，也只有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可以理解。一个家庭主妇这样回忆说：“那时候真的已经有火腿和奶酪和沙拉了……也有……带炒蛋和其他好东西的油煎土豆了。我们就像到了极乐世界里一样。”（转引自：Wildt，1996，第48页）而且，从一些家庭的流水账和个人的讲述中可以看出，1953年才是这方面的真正转折点：

“1953年，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只烤鹅，它足有10磅重，花费了我们20马克，我们很自豪地把这只肥肥的烤鹅带回家，渡过了一个美妙的圣诞节。那简直不是一顿饭，而是一次真正的宴会。当时人们还会为饱食一顿而感到高兴呢。”（转引自：Wildt，1996，第49页）

但是这种吃喝风本身却一直都存在着某种饿狼般的和屈辱的实质。最基本需求的满足和享受都被满心欢喜地当成现实当中的“极乐世界”，这即便在中古时代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会像饿晕了的动物终于看到了盛得满满的食盆那样扑将过去。

经济奇迹的第二个相对性的根据是：在这段繁荣时期，甚至是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都没能完全消除贫困的沉积现象；即便是在美国这个在战争结束时创出了全球社会总产值几乎一半的世界以及西方的第一个新型领先国家，也没有彻底消灭贫困。

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新形成的贫民区在这种情形下只消失了一部分；与此同时，在南方，尤其是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贫困区还在不断扩大，而且，全国的黑人居民基本上就从未脱离过贫困状态。某些英国和法国的边缘地区和农村以及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也是这样。

即便是在发生了经济奇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直到70年代中期还一直存在着为数并不算少的贫困人口。70年代初，于尔根·罗特（Jürgen Roth）的研究报告“联邦共和国的贫困问题”问世。这篇报告用官方数字作为证据，谈到了被普遍排除在经济奇迹之外的那些居民：他们主要是来自于乡村里所谓“结构上居弱势”的地区的人，比如退休人员，特别是丧偶独居的女退休人员（“老年贫困”）、罪犯、孤儿院的孤儿以及社会微观领域中处于非正常情况的受害人。当时在这个奇迹国家里，无家可归者就达50万人之多。总的说来，这里所说的是数量并不小的生活在黑暗之中的社会少数成员，他们在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天堂里的感受并不被作为衡量当时状况的标准：“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约有20%的居民没有能够分享社会福利以及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他们是贫穷的”（Roth, 1971, 第67页）。

单是这些就足以使人汗颜了。但是，还有战后繁荣第三个必要的相对性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福特主义大规模消费的实际经验大多局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广泛成功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工业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国家从来都只具备部分福特主义特征。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1918年以来，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开始的反殖民化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风起云涌地继续下去；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反对最后的殖民主义国家而不得已地进行的流血独立战争（首先是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运动），但大多数还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和平方式“获得独立”。

总的来说，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冒险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失败，其结局是惨痛的——掌握（大都或多或少具有国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年轻民族国家”发展中政权的后殖民主义精英们提上议事日程的无外乎模仿工业资本主义西方并开始尝试追补现代化。其中包含的“发展”概念部分地遵循了前苏联的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20世纪首次追补现代化的浪潮，也有一部分遵循了西方福特主义的战后繁荣。对于现在作为自行负责的世界市场参与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前景不过就是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委婉地表达出来的希望，即希望在走向繁荣的商品生产世界体系的条件之下能与世界接轨。前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曾经在西方经济危机时期还凭借它的高增长率（当然是以较低的起始值为基础）辉煌过一段时间，现在它虽然能够发展起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广泛推行福特主义“劳动国家”的模式，但是它仍旧又一次落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了。

总的来说，世界繁荣的时代不仅是在多方面有局限，它在根本上也带有模棱两可和不真实的因素。最终向在更高水平上按照福特主义使大规模生产、大众收入和大众消费相互关联的状态的成功过渡，仍旧被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其种种荒谬的形式及盲目的自身动力所左右，因而只是一个暂时的成功和充满着全方位竞争的病态现象，所以并不成其为一种积极的、内部平和的世界关系。而扩大到世纪性争端的西方私有资本主义和东方国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使这个时期成为冷战的年代，这种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扭曲了人的感知。这种被历史的内在对立掩盖的世界商品生产体系的共同基准框架，也正是共同的消极和具有破坏性的存在方式。这个世界越是硝烟滚滚和不由自主地去消费，它也就越虚假。

但是早已没有什么概念可以用来称谓这种虚假了，而且现在更没有了。此中的不对头之处只在诗歌语言的直觉中出现，并向



缺乏理解力的人们挑衅。年轻的抒情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把这种无法称谓的虚假称作“无色之物，无味之物，柔韧之物”，从而（在诗集《国语》中）不是让消费本身，而是让它令人恐惧的社会形式和在闪光的表面之下涌动着的不可名状的威胁现形：

我在这里遗失了什么，  
在这片  
父辈们天真烂漫地，  
把我带到了这里的土地上？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却未得丝毫慰藉，  
灵魂已经飘向远方，  
躯体留在舒适的贫穷困苦之中，  
在友好、满足的坟墓里。

我在此地拥有什么？又能在此地追寻什么，  
在这个屠宰场，这个安乐国里，  
这里只是在上升，但却不在前进，  
这里哪怕是厌倦也要忍受饥饿之苦，  
在美味食品店里，贫穷从奶油堆里，  
有气无力地用几乎窒息了的声音也在低呼着：  
上升！  
这里远离贫穷的富人们的利润率使得富有的穷人们  
由于兴奋而砸碎了他们影院里的椅子，  
这里就这样一步步地上升着，  
这里收支平衡表令人欢欣鼓舞，所有积极的事物都歌唱  
着和呼喊：业余时间已乖乖让步，油门加大，冲！  
仅此还不够，

……

这里我们受命建造房屋，  
在雅利安民族的这堆废铜烂铁上，  
在这聒噪的停车场上，  
这里废墟中又冒出了废墟，  
偏偏簇新的废墟、可储备积蓄的、分期付款的废墟。  
可随时提取的、可撤消退回的废墟……

“簇新的废墟”，没有什么词语能更适合于描述这种与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机械休戚相关的、从属依附的和缺少人文精神的财富的性质了。在全球少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中，多数人暂时拥有的消费天堂事实上是一片历史的废墟：是社会解放、人的自主和自由确立的目标的废墟，这些都在以昂贵的代价换取的其中却总是伴随着社会贫困腐臭的过剩物资之中窒息而死。成功的福特主义的动员无外乎只意味着，苛求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最终形成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当然前提是存在这种可能性。

因为假如不是它造就了那些自现代化开始时就指派给女性的活动领域（从“家务”到“捐赠”）——它的“背面”的话，那么要在占绝对地位的意义上真正地形成对社会的极权统治，这个由“抽象劳动”和竞争构成的制度自然是没有如此生命力的，尤其是按照完全直接的社会和心理方式看。福特主义的动员并不是简单地吸收了这些与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运行机制相脱离、但却仍受它调度的领域，而更多是让它们转型。这一极权化的趋势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真正推进使资本主义更加充分地利用为此所必需的人力资源有关。在开始时和从表面上来看，这意味着把就业状况的结构重新推向那种完全工业的生存方式，正如福特主义所要求的那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发展状态相比，全面工业化现在才在各处都达到了“英国

式”的规模：

1968年基础产业中的就业人员（百分比）

国家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英国	3.5	45.2	51.3
法国	15.6	38.6	45.8
美国	5.1	35.4	59.4
德国（西部）	9.9	47.1	43.0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史统计，1995。

与1910年前后的时期相比，首先是农业就业人数急剧下降，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广泛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化”。名义上，只有德国的工业本身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甚至还出现了轻度的回落，而与此同时，所谓的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在各国都爆炸性地膨胀了起来。只是人们在起初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会觉得它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性质不符。但事实上，表面看起来并未发生变化的服务业概念背后隐藏着根本性的转变。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女佣、家仆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随从所进行的服务工作，这些人都是旧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产物。与此相反，这里指的是福特主义“劳动国家”中众多新型行业领域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工业的基础设施领域里的从业人员：从多种多样私人机动车辆交通的组织到新型媒体（电台和电视台），直至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官僚机构。

相对而言，也就是农业就业人数急剧地下降和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就业人数同样是急剧地升高，后者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击。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另一种重要转变。因为商品生产体系内部的这三种基础产业的比例关系还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就业比例的绝对数量。在古典萨伊法则的意义上，福特主义繁荣时代工业

生产的急剧发展远远超出了流水线生产和“劳动科学”的合理化效应。总之，资本主义就业人员数字的绝对增长十分迅速，在直接的工业生产部门中也如此。

全社会的“就业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上）相应地大幅度增长，这另一方面意味着没有资本主义职业的人越来越不依赖于工业劳动职位。或者换句话说，全体公民都在更高程度上听凭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摆布。社会学家布尔卡特·卢茨（Burkart Lutz）曾就此谈到过全社会再生产中基本结构的推移问题。按照这种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都还一直具有“双轨”经济结构的特点，甚至还存在着“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的行业部门为一方和一直仍保留着浓厚传统色彩的行业部门为另一方而构成的错综复杂关系”（Lutz, 1989, 第21页）。他以此所描述的无非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在威廉皇帝的帝国还是在其他处于前福特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里都存在的事实，即资本主义虽然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充满活力，但说到底它仍旧只不过是总体再生产中的一个部分（并且因此也只是实际生活和经验的一部分）：

“现代行业部门……的特点主要是大企业—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经济方式、作为主要就业形式的雇佣劳动以及面对大型（占大多数的，但当然不只是国际的）市场的主要取向。甚至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里，与这种现代行业部门相对的是一直占着主导要地位的重要传统行业部门，即小型的家庭企业，其劳动力主要是家庭成员，这类企业在实体经济结构和取向中总是占很大比重。”（Lutz, 出处同上，第21页）

这样，（大约一直到1950年）一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而是大型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与资本主义“抽象劳动”

的范畴并不占统治地位的地区性“家庭市场”相互交错；另一方面，一般家庭在诸多方面一直还保持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特色。我本人还记得，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家还通常不买成品服装；在市场上买来的大多是布料，母亲和祖母在家里把这些布料加工成衣服。很多食品也是这样。我的这些经历是具有普遍性的。今天还被某些个别的人作为“业余爱好”开展的行当，当初乃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主要的经济组成部分；而且这不是战后贫困时期的例外现象，而是很大程度上一种较古老的生产方式的保留，这种较古老的生产方式从未完全消失过，并且总是同上升的资本主义行业部门产生互动作用。

同19世纪相比，现在这类“传统产业”虽然也已经部分瓦解了，而且在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它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危机缓冲器”的作用了。但是让它几乎完全消失却似乎难以想象。然而，通过福特主义工业资本及其“劳动国家”广泛进行的所有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却正是战后福特主义的“功劳”。现在方兴未艾的譬如汽车以及消遣电器和家电用品等新型消费品（被称为“棕色”和“白色”商品）是随着自给自足生产的家庭经济基本成分与需求经济的地区性家庭生产的逐渐消亡而产生的。这种“传统行业部门”当然具有性别等级和较大的劳动强度。但取代它的却并不是自主地设定工业的目标，而是由尽可能地把大众统归并进“美妙机器”的机制并使他们向福特主义强行贯彻的劳动纪律臣服。

现在，这种史无前例的过程的确转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独裁统治下的“劳动大会战”不仅仅在技术上而且也在组织上为它提供了前提条件。只有用一种“实质上升高的国家管理和经济的渗透度”（Lutz，出处同上，第192页），就像伯纳姆的“管理者政体”理论已经假设过的一样，才可能在战后

把第二次工业革命作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再生产形式继续推行下去。换言之：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暗地里开始付诸实践的凯恩斯主义结论现在必须超然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被普遍化。这一次，不应该继续简化战争经济结构，也不应该只是三心二意地继续推行这种结构，而是应该超越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在数字上的增长，把这种结构转变成“民用经济的”调节形式，并且继而将它扩展成一个持久的体系：

“同样，国家和半官方机构在有效控制经济过程、收入流量和经济主体行为方面的能力不断增长。在退化了的战争经济计划有主管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处都不断被迅速精简的同时，战后时期国家进行干预的强劲潜力却继续被保持了下来。”（Lutz，出处同上，第192页）

在第一个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巨人和“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美国，战争经济的特征甚至在纯军事意义上都被保持了下来；因此在那里，评论家们20世纪60年代还在谈论着“持久的战争经济”。如果我们注意到，由凯恩斯竭力从理论上普遍化了的国家经济调控机制的根源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经济当中，那么我们就能够放心大胆地把这个专业术语转用于整个战后时代了。这样，“持久的战争经济”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成为已实际展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首先是间接作为普遍的、国家诱导调控形式的“凯恩斯机器”；其次是直接作为在西方所向无敌的美国军事潜力，在20世纪前50年世界市场崩溃并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停滞局面之后，这种军事潜力构成了世界市场再度膨胀的背景。在“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的屋檐之下，回落到自给自足地步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在国际联合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同样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胜利的主要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在过去

的战争间歇时期还未形成。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应该忘记，所有这一切都还无法构成推行福特主义的可能性本身，而只是涉及了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早在几十年以前，这种可能性的核心结构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像布尔卡特·卢茨那样，只是简单地断言工业资本主义行业部门吸收了“传统行业部门”的精华，仅仅把建立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体系看做是根本的转折以及采纳“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状况更多地只是早就设置铺垫好的资本新型积累结构的突破。

如果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50年到1973年之间就把900万新劳动力吸纳到资本主义的利用过程里来（用资本主义的措辞来表达就是，创造了900万个额外的“工作职位”），那么这种巨大的膨胀主要应该归功于资本本身的内在潜力。没有资本的这种积累潜力，凯恩斯主义的调控就只会徒劳无功，甚至还会夭折在萌芽状态。但这种调控虽然能驱动以前停滞下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升腾，却不能取而代之。即只有由福特和泰勒发明的企业经济合理化方法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突破，不过它也必须以两倍、三倍和四倍的力度压榨人力资源才能够创造出由资本积累的增长、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大众对工业产品消费的提高所构成的资本主义艺术精品。

生命能量的超常奉献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消费两者之间长期酝酿而成的一致性具有诡诈的性质，这种诡诈的特性不仅无法用概念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且人们麻木的感觉所能反映的也只是对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机制的绝对服从。人们对最终能够广泛得逞的极度苛求事实上是熟视无睹。所以，直到今天，甚至在像布尔卡特·卢茨这样的批判者口中，福特主义繁荣时期也是被充分肯定的，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大众富裕”，并被毫无疑问地看成是“真正考虑到了工薪阶层基本利益”的、积极的事实（出

同上，第 192 页)。所以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揭示苛求的内容和资本主义（再说也是短暂的）臆想中的“黄金时代”之真实的负面特征。

## 极权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包含的苛求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并形成了两个中心概念：“灵活性”和“极权”。极权的概念源于哲学和逻辑学；在这两门学科中，它表示的是一种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整体性、完备性和完整性。19 世纪，以探讨一切事物的完整性和完备性为宗旨的“哲学体系”里，特别是在黑格尔的理论里，这个概念的应用反映了一种“全面包括”的傲慢态度，它将整个世界概括在自己的抽象概念之下，并把在其中无法立足的事物都宣判为无意义的。这种反映的方式可以被理解成哲学对资本主义要求的解释，这个要求就是：让人类和自然都绝对服从于“美妙机器”的统治，即理想化地把所有物质的微粒，每一种想法和感受都看做一种严丝合缝的完整性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把它们全部转变成利用过程中的物质材料。现代的极权性概念只有在资本已拥有成为完整的全球体系这种强烈内在欲望的背景下才能够想象。

早在 17、18 世纪，人们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原本属于意识形态的核心见解，它把一种完全新型的、偏执狂式和以自身为目的的苛求体系标榜成一种“自然的”、不可逆转的、自古就有和无法超越的体系。这种核心见解包含着偏执狂式的资本主义的“极权愿望”。至少我们既能够在“美妙机器”已成为客观事实的历史运动中，也能够在其理论和实践的先驱者的主观言论中找到这种潜在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十分明显的是，从外部看，这种极权性的愿望形式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构成了“极权”或者“极权



主义”的新概念——此概念与“强行统一”、“一体化”、“规范化”以及“典型化”平行出现，这决非偶然。

当我们又从辞典（贝特尔斯曼袖珍辞典，1975）里找到了下述定义“极权的，即包含一切，控制一切，不能容忍不同观点或者生活方式的存在；反义词：自由的”时，就不禁要哑然失笑了。这简短的词条中涵盖了很多自斯密、康德、边沁等以来或许是最狂妄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卑劣行径。因为就像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罪行脱离了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且表面地被归咎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独裁时期的思想混乱一样，资本主义极权化的实现过程也把罪恶推给了那时的思想混乱。“美妙机器”与生俱有的内在极权要求也就片面地被视作已不复存在的那些独裁统治的专有特征。

这样来看，极权主义就是战后时代的世界市场民主政体中一种被克服了的状态，但它仍旧是一个“危险”——决不是由这种社会结构本身所致，而是存在着由死灰复燃的意识形态和居心不良的政治意图对这种社会结构造成的外在威胁。在冷战时期，这一部分“实际存在的”威胁被认为是来有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欧阵营。如同一位民主德国的宪法哲学家在文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在商品生产世界体系的基础上具有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性的内部冲突应该“被理解成自由的民主与极权的专政之间的根本冲突”（Lieber, 1993, 第 881 页）。按照里贝尔（Lieber）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极权主义、极权专政还是极权统治，都主要是由两个“典型的结构特点”决定的：

“第一，具有权威的某个人或某些少数人推行并控制的所谓大众运动提出了被统治者根本无法控制的专一性政治统治要求。它通过建立中央官僚主义统治机器——一种只看效果的‘完善管理’——掌握着真正实现这种统治要求的手

段。第二，以这种方式由中央控制和统治的政治权力体系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地进入了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比如家庭，体育，休假，邻里，企业，协会）。它按照政治上的统治和规划架构强行使这些生活领域保持一致，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几乎没有不受到这种政治权力影响的社会行为空间。”（Lieber，出处同上，第 883 页）

引人注目的是，指明资本主义社会化两极之分的这个“极权主义理论”只着眼于国家政治这一方面，而经济的那一方面还完全没有被顾及。根据这个理论，只可能存在极权的国家，却似乎不会有极权的市场、极权的经济和极权的生产方式——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在根本上只有国家和政治属于社会领域，在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里，经济是属于“自然界”的，因此它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社会理论范畴。因此就可以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斯大林的还是纳粹的专政或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基于商品生产体系而产生，并且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史的一部分。假如说这些也都属于资本主义的纪律化和思想驯化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些专政就不仅应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中间阶段，而且还应该被看做是扎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四处蔓延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民主似乎就不是克服极权主义统治的对立面，而是它的集大成者。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一下极权主义的各种元素及其历史的话，则不由地会萌生出这种对官方社会理论科学来说断然格格不入和无法接受的想法。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反对派创造出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曾经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只是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国家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来看待，而丝毫没有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者乔瓦尼·阿门多拉（Giovanni Amendola）在 1923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中把法西斯主义的行径（当时鉴于地方行政）称作一种“sistema totalitario”（“极权体系”）（转引自：Petersen, 1998），不过这种批评仍然只局限于政治上的独家代理要求。在这个意义上，阿门多拉 1925 年就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称为是“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极权主义反动”（Petersen 出处同上）。

不过，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这些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最初的观点并不是想要把共产主义（国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作为极权社会四处蔓延过程的不同变体或者不同时期的中间阶段来理解。更有意思的是，法西斯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阿尔弗雷多·米苏里（Akíredo Misuri）（也于 1923 年 5 月）在一次反对墨索里尼的发言中提出了一种见解：他说，法西斯极权主义正在“把意大利从花园改造成兵营”（Petersen, 出处同上）。这里，他很直观地表达了这种不仅适用于专政制度下政治领域中的隐喻，而且也完完全全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整个社会经济过程，诚然不仅仅适用于意大利；从“抽象劳动”的密集形式一直到在福特主义“目的形式”中的标准化的建筑风格，它都一概适用。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可以这样来翻译或者破解，即它是历史上临近成熟和完善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极权主义之特殊的“蛹变形式”，这种极权主义更加普遍并且更加深刻。它原来的、深层次的元素在政治独裁的有限形式中无法找到，它只能部分地存在于现时的“全面商业化”、“全面竞争”和“全面劳动”等经济形式当中，部分地在这种极权资本主义存在形式实体的、物质的、一直延伸到微观层面上的日常社会的沉积中去寻找。在这个扩展的意义上，市场经济的战后民主政体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极权社会，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和以这种形式，资本主义极权要求的福特主体客观实体化才能够成熟地成为广泛有效的体制。

在这种意义上来诠释政治极权主义的种种反映，并把它同世界市场民主政体后来的历史联系起来可能也就更容易些。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纳粹主义者，都把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正面地据为己用，而且并不认为其中包含着任何诋毁的含义；他们其实早就把“全面”这个修饰语当成他们最喜欢的字眼了。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是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开路犬。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最后发了疯的德意志帝国前元帅鲁登道夫，这位在德国未能成势的克伦威尔，在1935年出版了他的宣传手册《全面战争》。虽然鲁登道夫被诊断患有精神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本宣传手册里却揭露出资本主义内在合理性的值得注意的特点。当蛊惑民心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讲话中煽动起一帮民众咆哮地对那个恶毒的问题“你们要不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说“要！”时，他以此成功地激发了鲁登道夫已经在他文章当中目的明确地提到的精神病的能量。而既然鲁登道夫已经点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极权主义的产生，那么要把鲁登道夫的“全面战争”转化为一个战后历史的“全面市场”，只需要在思想上略微前进一步：

“全面战争不仅是交战各方式装力量的事，它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交战的各国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和灵魂，这种战争问世了……自此之后，全面战争随着飞机的改进和增加，向居民投掷各种各样的炸弹以及传单和其他宣传材料，通过无线电设备的改进和增加，向敌方进行宣传等等，这些方面都得到了深化发展。”（Ludendorff, 1935, 第5页）

鲁登道夫的推理中弥漫着关于“犹太和罗马”等世界阴谋的种族神话的神秘主义色彩，如果把这种神秘主义色彩抹去的话，那么这个两年之后终于摆脱了他生存痛苦的疯子所作的现代化先

知预见也就清晰无此了：在商业化的民主政体中，“各种各样的炸弹以及传单和其他宣传材料”变成了火力密集的、而且一刻不停的广告和媒体灌输，令人眼花缭乱和震耳欲聋地充斥着整个公共空间，并以此带有恐怖主义的特征，因为无人能够摆脱这种无休无止的厚颜无耻的骚扰。这里的“向敌方宣传”（事实上在争夺顾客、工作职位、功名、威望和“生活空间”等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大大超出了“全面战争”的军事开端。

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在战后民主政体里从全面的国家转化成全面的市场，乃至如今被这部利用机器铁面无情地包罗万象的生活的全面商业化，这个转化是有很多层面的。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福特主义世界在其实现过程当中一直都伴有反面乌托邦文学出现，这种文学的用意是描述即将成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其中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是叶夫根尼·扎米亚京（Jewgeni Samjatin, 1884~1937）的长篇小说《我们》（于1920年撰写，英文版于1925年发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美妙的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194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1984年》。他们当然都受到了当时时代的局限，只看到了国家政治范围内极权主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让人第一眼看上去，觉得似乎非常符合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无论是在扎米亚京的还是奥威尔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超人“领袖形象”，人们不难辨认出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化身（扎米亚京是在这两个现实人物出现之前，奥威尔是在其出现之后创造出他们的“领袖形象”的）；在其中一部作品中，这个“领袖形象”被称为“造福者”，领导着一个全球的“统一国家”，而另一部作品中，他则被称为“老大哥”，他代表的同样也是一个全面监督的国家。艾尔德斯·赫胥黎在他1949年完成的《美妙的新世界》的前言里，也着重宣传了历史性的“全能国家发展趋势”。

在这种意义上，假装糊涂地把这种反面乌托邦看做是极对权的国家统治的评论，认为它跟战后民主政体完全没有关系，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的。但1949年赫胥黎曾经说过，“世界上的所有政府都将或多或少地具有极权的特点”（Huxley, 1989/1949, 第15页）是可能的，就是民主政府也不例外，“甚至在工业运用原子能之前的历史时期也有可能，那些政府在运用原子能期间或者运用之后会变得更加极权化的趋势似乎是必然的”（出处同上）。如果说，赫胥黎在这里（也就像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一样）也撇开“美妙机器”的经济形式，而把这种“不可避免的”极权特征归因于“技术理性”的纯客观强制，那么他就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国家政治极权主义概念的定义，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他做出以下的进一步描述时，他甚至已充分预感到了市场经济民主极权体系即将完成的前景：

“当然没有理由去谈论，为什么新的极权主义将同老的极权主义雷同。使用棍棒政策和处决命令、人为地制造饥荒、进行大规模拘捕、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仅是不人道的（但今天没有什么人再去关心这些手段了），而且事实证明，它们也是低效的——而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低效就是违背崇高精神的罪恶。一个真正能做出成就的极权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全能的政治家和管理者军队统治着一群强制劳动者，但却又无须真正强制这些劳动者做任何事情，因为后者热爱这种被奴役的境况。”（出处同上）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边沁理论的核心，即那群热爱自己被奴役的境况并且自觉自愿当奴仆的公民，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赫胥黎的“无须真正强制这些劳动者做任何事情”的“强制劳动者”的想象正是精确地描绘了边沁的纲领得以实施后的情形。这

样看来，边沁还是比赫胥黎略高一筹，因为他是把这个纲领作为一个民主纲领制定出来的；即意义恰恰不是在于一个（仅仅是辅助式的）“全能国家”，而是在于一个全能的、“造福”的市场机器。战后繁荣时代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民主政体并不是以国家的权威，而是通过市场的权威圆满地完成了极权主义，恰恰因为市场权威能体现极权概念中“有所成就”的特点。我们今天生存于其间的民主政体是纯粹的边沁式民主政体；它只在一点上同其他国家遗留下来的恐龙式极权政体有所不同，也就是，它是改由经济发出命令的、更高级别的极权主义。因为福特主义的机械形态和“技术理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以自身为目的的经济已经客观物质化和充分极权化的体现，所以，这种国家极权的形式就不再像德国和俄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间阶段那样了。就像呼唤过“神圣的福特”的赫胥黎一样，扎米亚京（Samjatin）也有着同样的思想，但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他只是把未来的恐惧暗示为“泰勒主义”（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是永远都不会有所作为的）：

“毫无疑问，泰勒是老一辈当中最伟大的天才。但是他在思想上不够坚定，没有把找到的方法推广到整个生活中去，推广到人们的每一个步伐，人们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他没有能够把他的体系从1到24在整体上统一起来……你们这些从小就是受泰勒体系的思想熏陶长大的人们不就像是钟摆一样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吗？……你们曾经看到过，一个泵缸在工作时面部呈现的那种走了神的、麻木却狂热的微笑了吗？你们曾经听到过，那些起重机在夜晚和休息时间里还不安地翻动和发出叹息声吗？……你们是完美的，你们和机器没有什么两样，通向百分之百幸运的大门正向你们敞开着……”（Samjatin, 1991/1920, 第37页，第186及下页）

扎米亚京也和赫胥黎一样，只是停留在技术形式上，或者干脆就是停留在泰勒主义机器周围，丝毫没有去反映资本主义“目的形式”的经济特征。而且他们二人也与奥威尔一样也在所描述的极权国家中把它的人民降格成为它的客体，把他们当成南瓜或者家畜之类的东西来喂养——或者把他们像机器设备一样安装起来（不久后，在科幻小说里就以“电子人”的形象出现一种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的混合物，一种带有机器零件的人——这些，未来主义者早在梦幻中已经想到了）。制造完全被操控的人的这种幻想一直停留在国家通过官僚机构、心理药物或者生物手术对个人进行的外部控制上。在文学作品里，扎米亚京则创造出了这样的场面，即在“大型手术”里，国家公民被用外科手术的方法切除了大脑中的幻想力。而赫胥黎又想象出这样的一幕，有一种生物学的“博卡诺夫斯基程序方法”，国家养育院用此方法能从胚胎开始成批生产一种功能人，最后“拔去试管瓶塞”，以便能够在“新帕夫洛夫标准工作室”里对他们进行继续加工。

从外部进行这种操控的主体是国家，虽然这个主体以及它的动机尚不清楚：弗郎茨·卡夫卡著名的小说中用于比拟无主体灾难的文学隐喻又一次在反面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出现——这也可以看做是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主体幻想的一声黑色回响。这种批评无法预见到，在形形色色国有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独裁政权的蛹变期之后，随之而来的、以福特主义形态出现的“自由市场”的更高发展阶段会比极权国家更加极权。因为极权国家也就是尽其外部镇压和外部职能的责任，并且给人力资源一点点社会空间或者起码的意识保留；极权国家在现实中永远都不可能像在文学作品中那么全面完善，在现实中它可能会出现很多缺陷，因为每一个官僚机构都是迟钝的，就其本质来说是愚蠢之极的。

只要个人在表面上同意被任意摆布并且与对自己进行监督的



官方机构合作，那么这种自我压制就仍然只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顺应潮流的肤浅行为；而即使在这种意义上，极权国家进行的实际操控的漏洞也比文学里的魔怪国度中多得多。虽然国家警察采取外部压制的血腥行为时常令人难以想象，但这种极权国家的中央机构却在任何地方都不过是人们的笑料和讽刺对象而已，而且这些特点最终在东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发展壮大成全面的福特主义的民主市场和货币形式的行动不再只局限于外部，而是来自接受过全套边沁式教育的人们本身的内心；这种行动也进入了意识中的更深层次和主观性的核心部分，却没有因此把个人从官僚主义的“龙形海怪”的股掌中释放出来。如果说自我压制和自我嘲弄真正能够圆满完成的话（这种机制将永远都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终点），那这也就是在1945年之后的“自由”世界市场民主之中才发生。20世纪末，一个真理才不争地大白于天下，即现代主义中固有的极权主义完全潜伏在商品生产体系的拜物教形式本身之内，而并不单单隐匿在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独裁政权表面上的专横跋扈里。因为当资产阶级民主篡夺了解放运动的位置并且用其妄想填充了历史的终极目标时，这个基本的事实不仅已在长时期的民主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淡化隐没；只要至少在几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里，福特主义短暂的繁荣能够使自我压制变得轻松和舒适，这个事实也有可能边沁式民主完全实现之后藏匿起来。人们愿意去相信，悲观的预言终于被积极地克服了，而它只是被消极地超越了。

或许还真得承认反面乌托邦的预言在很多方面都成了现实，但正因为如此，却无法再认清这一证明的现实性了，因为人们已经现实地生活在黑色乌托邦中之中。就此而言，要批评的只是这些反面乌托邦错误地理解了这种实现形式，把以极权国家形态出现的历史搬运工和这个制度的主人混淆起来，而后者正是资本无主体的世界机器本身。这样就不难理解，“造福者”事实上也就

表明是智慧的机器，“老大哥”在这个意义上则是对极权的匿名市场的成功隐喻。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中反馈到自身的货币资本是一个独立运转、有着幽灵般生命力的无生之物——它简直就是世界的上帝；对世界机器这个较早的隐喻在今天的制度理论中被伪科学地客观化了，它也完全可以作为近于人格化的权力出现，就像在更早的宗教里（超验的）神仙世界中也极为普遍的情况那样。

“老大哥在注视你”——这还是那套边沁的纲领了，现在起有了个几乎是日臻完善和成熟的形象了：“老大哥”就像尘世间的“亚当·凯德蒙（Adam Kadmon）”一样，是一个由数百万和数十亿的人组成的巨人和极权资本主义社会在自己身上的投影，它由福特主义的媒体、市场营销和民意调查的上百万只眼睛组合而成。同时，对人力资源的外部监视甚至不只是由国家的官僚机构来执行，而且也由福特主义的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商业媒体等机构去实施，与不成熟的国家专政形式相比，这种外部监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64年，美国批判现实的政论家万斯·派卡德（Vance Packard）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他揭示了一直在潜滋暗长的控制机制以及它对国民的全面监视，这种监控甚至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记述的是1964年。我们看到，妈妈正在一家百货公司的试衣间里试一件新衣服。一架藏在由三部分组成的试衣镜背后的电视摄像机拍下了试衣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样作的目的是监视妈妈是否会偷偷地把什么东西藏到自己的包里去。我们又看见，这时，爸爸和一些同事围坐在办公室的一张会议桌前，谈论着他所在部门的工作情况。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同事是一家侦探所派来的，这家侦探所在美洲所有的国家都有办事处。这个人是被爸爸为之工作的那家公司秘密聘

用的。他的任务是长期监视这家企业的高级职员的行为和工作。第二个有调查任务的人此时则不知从什么地方和爸爸的银行通着电话，询问着爸爸银行存款的数量和尚未清偿的贷款……儿子约翰，大学已毕业，现在正坐在一把比较特殊的椅子上，胸前环绕着一根充了气的橡胶管，手上绑着一个电极。约翰正向一家电子集团公司求职作他们的销售代理。为此他必须要接受这样已经算是较为普遍的测谎试验，让公司检测他是否正派诚实，是否具有男子气概以及是否有什么危害性的习惯。与此同时，另一个调查员则正与约翰原来的教授们进行着交谈，为的是了解约翰小时候在班级讨论当中表达过的政治观点。女儿玛丽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孩，她还在上学。这会儿，她正坐在自己高中二年级的位子上痛苦地做着一份有250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她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符合事实的回答，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父母经常互相吵架吗？——你的父母曾经和你谈过有关性的问题吗？——你对自己的月经感到忧虑吗？如果玛丽的父母碰巧知道了这次问卷调查的话，人们也不会告诉他们玛丽回答的细节以及其回答所得到的评价……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存在什么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私生活的不确定力量吗？假如真的存在这种不确定力量的话，那么它会为威胁现代人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创造前提条件吗？如果我们力求研究不久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对他人的监视、审查和控制以及对他人个人信息的获取，那么刚才的那些问题我们就应该仔细考虑。我们所遇到的所有这些新型的社会控制方式，看上去貌似理智的措施，其实不然。它们当中的某些从其性质来看甚至荒唐透顶……”（Packard, 1964, 第7及下页）

派卡德在这里不仅看到，在神圣的、最出色的市场经济民主

当中存在着极权主义，他也特别指出奥威尔《1984年》一书中所描写的情况正渐渐成为现实。不过，他毕竟只是一个从经验出发的批评家，他的评判无外乎是把福特主义化身的自由主义和本身已经奥威尔化了的自由主义理想进行一番对比，再向“私人权力”声讨几声。他没有觉察到，那种“不确定的力量”〔这种说法并非偶然地让人想起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的诗里提到的那种无以名状的“无色之物，无味之物”〕恰恰是从臆想中的“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建构条件当中产生出来的。对此，派卡德永远都不会想到要提出质疑。令人厌倦的规律性表明，策划者和牺牲者、拥护者和批判者虽然一直都在描写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密的边沁式操纵和控制机制的矩阵，却从没有再达到过这种明确而且阴险的原始自由主义的意识，即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真实本性以及资本主义自由和全面控制之间的同一性的意识。

虽然派卡德也列举了一系列具体事例，来说明官僚机构或者商业机构对私人领域进行的诸如打探、纠缠、骚扰等居心叵测和厚颜无耻的侵犯，从商业部门为了在信箱里投入广告而对个人数据的窃取，到（当时在美国已经很普遍的）未经预约就进行的电话推销，但他却对全面的买方-卖方-社会的性质绝口不提。此外，福特主义全盘资本主义的极权本质又不可能单纯表现在调查和控制机制的增强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甚至已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社会成员之间强行实施的相互监视和控制上；最终，它还体现在单个“劳动力”通过其福特主义的超我而进行的自我监视和自我控制中：我，你，我们做出成绩的能力都足够吗，足够优秀，足够合格吗？我顺应趋势的发展吗？我顺应时代的进步吗？我有竞争力吗？在这一方面，福特主义民主的“思想警察”也比粗野而纯粹的国家极权主义实施方式中的秘密警察的行动更加狡猾和更加没有出路。

那种“奥威尔式语言”也是如此，这种“新式话语”从根本上说自从200多年以来就是自由主义的语言了。在这种有着双重根基的分裂性语言里，几乎所有形容词都与这种语言的名字相吻合。以那位“老大哥”的名义说出的一句话是：自由即奴役，那么我们只需把这个关键句子的主宾位置颠倒一下就可以得到正宗自由主义的一条准则：**奴役即自由**，即无条件并且欢天喜地地让自己服从于市场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这符合自黑格尔起就在哲学中得到承认的一句极权主义的话：“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洞悉”。这让人又联想起“老大哥”的国家里另外两句党派竞选的标语：**战争意味着和平**——对此，没有什么人比自命为世界警察、化名为“民主国家联盟”的北约了解得更清楚了；还有一句是：**无知就是力量**——有谁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条准则呢，是民主的大众消费者，是缜密细致地制造着毁灭世界的产品的生产者还是目光只盯着企业经济的管理者们呢？他们获得生活和成功能力的前提是对制度和社会的熟视无睹。即使只是从思想上对一个封闭社会的疯狂体系构成的世界提出质疑，也意味着“脱离”了自己的社会，成为了自己社会当中的陌生人，或者就像小说《1984年》里所写的那样：“思想犯罪的结果并非是死亡：思想犯罪本身就是招致死亡”（Orwell, 1995/1949, 第28页），即人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与原始福特主义独裁政体相比，奥威尔对“老大哥”的制度以及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双重思维”的看法，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更适用于极权的福特主义民主的市场经济：

“除了不间断地战胜自己的记忆力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必要的。人们将此称为实际控制；新式话语则把它称作双重思维……当人们讲述着煞费苦心地编造出的谎言时，既清楚又不清楚地意识到听者方对此是否完全相信；在明白两种观点相互排斥时同时维护它们；在知晓两种意见相互矛

盾时同时相信它们；理直气壮地用逻辑来反逻辑……暂时忘记那些要求人们忘记的事情，为的是在人们以后需要它们的时候，再次回忆起它们，并在此之后又在瞬息之间把它们忘光；而至关重要是用某种处理方法去反对它本身。这其实是绝顶的吹毛求疵：有意识地假借无意识，尔后再有意地不去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的催眠行为。总之，想要去理解双重思维这个字眼，前提就是必须要使用双重的思维方式。”（Orwell，出处同上，第34及下页）

这种双重思维作为一种社会丧失意识的消极辩证法（又与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异曲同工，提供了一副对谋求解放的思想和行为持否定态度的黑色幽默画）虽然在20世纪的独裁国家里被以极权国家的形式熟练掌握，但在那种形式中，它极易被攻破，而且也像顺应时势主义那样在意识形态上流于浅薄。当然，就像在诸如所有宗教和政治派别中那样，差不多在所有以压制性的强行社会化为基础的集体性顺应时势主义中，新型的精神驯化过程已经开始。人们可以从某个派别退出，也可以从极权国家退出而至少进入“内心流亡”，也就是说，就像上一堂体育课那样去顺应极权主义，自己的内心与此同时却无须对此有更多的理解。然而，人们却无法从极权市场中抽身，“内心流亡”在这里只在十分抽象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这正是因为人们本身的主体性已经被迫受到了市场程序、货币形式、产品消费、竞争以及资本主义媒体的条件制约。

除此之外，人们也无法像摆脱来自外部的苛求一样摆脱自己本身。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极权市场要求进行双重思维：强制既十足地让人感受到强制的滋味，但同时也作为意愿形式出现，因为否则人们将“一无所获”。思想意识又反馈到无处不在的市场机制，一刻不停地算计着自己抽象的效益，同时又以自我吹嘘

的方式自欺欺人：劳动的痛苦是自我实现，竞争的恐惧是自我巩固，成功的狂热是自我经验，互相的依赖是自我负责，而完全的献身则成了自我解放，一言以蔽之：奴役就是自由。或者，换用兰波（Rimbaud）的话来讲，“我就是他人”。早在近百年前，兰波就已经预见到，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福特主义型人内心的自我意识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了。

所谓“自由”指的就是，了解“老大哥”或者“造福者”以及极权市场可能想要我做什么，“自由”就是事先猜测出它们的意愿，并预先无条件地、乖巧地按照这种愿望去做，从而持久地在劳动市场的合适的桎梏下匍匐爬行。任何由“思想犯罪”引发的“错误行为”都会立即招来极权市场的惩治；偏执狂式的“脑中之音”比官僚监视系统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更加可怕。对于那些恰恰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协商决定如何使用共同的、高度社会化的资源的社会成员而言，自由是他们自由地、自决地确立自己目标的对立面。只有在福特主义的形态中，这种无形中已失去主体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匿名威力才能成为全面的世界体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经济机制和技术机制才得到充分的保障。

如果说“传统行业”残存的剩余部分也被福特主义商品世界吸收了的话，那么这不再只是被称作中性的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转移。这个商品世界是尽数明码标价的：所有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从书本到牙刷，从酒杯到苹果，从光盘到圆珠笔都被贴上了令人厌恶的小小标价牌，这些标价牌总是很难撕下来；有时必须用刀才刮得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总会留下一小块难看的斑痕，物件的表面经常会因此而被损坏，再或者就是贴胶会牢牢粘在手指上。这数以百万计诸如此类的小物品上留下了极权市场的客观化的印记，而人们却丝毫意识不到这种名符其实的荒谬现象。

孩子和老人们是否正无助地站在自动售车票机的面前，看着

上面怪异的复杂标价不知所措？消费者是否也正对着他们的器具绞尽脑汁地猜测着使用说明书上规定的功能？“雇员们”是否正在超大的流水线上组装着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意义完全不能由他们决定：全世界已造就出来的福特主义型的人处处都在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成为了客观“环境”的资本主义信号系统：他们在信号要求停步的时候停步，在它要求运动的时候运动，按媒体预先策划的导向感受同情和愤怒，在早已准备好、只等着他们去“标画”的选项当中做出“个人的决定”。

这种资本主义的“真实性控制”看上去完美无瑕。再也不能让人想起旧时专制主义的极权国家独裁政体的官僚审查在决定着完美的福特主义大众媒体的内容了，而是媒体机构已程序化的自我审查。这绝不仅仅是在披露和评论爆炸性的和揭底性的事件时著名的“头脑里的剪刀”，也就是要有意识地顾及到诸如市场经济的顺应时势主义、民主国家至上无上的利益、客户和委托人的利益，几乎可以任意左右其感受的人力资源受平民主义引诱的情绪等等。更多的是这种预先结构化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商业的取向，且早已按媒体的技术形式在实行，而这种技术形式在资本主义所及之处都在无意识中发挥着作用。

这里所说的媒体并不是指为了自由交换信息或公开讨论共同事务而组织的全社会范围的交流，而同样是在这方面指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结构上的隔离，这种隔离不具备交流作用，只是在无意识地发生：在各个渠道中，总是那位“老大哥”在发话。而且这些渠道越是商业化，这位“老大哥”就越是喋喋不休。如果说在国家-政治性媒体里（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还能找到在意识形态上按照国家最高利益和期望值的界限事先过滤筛选过的一种辩论和文化的畸形形式（即使在这里，审查也不被明显觉察，它好像是在自发地、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着），那么，商业化媒体反正就只是面向其收益率和“收视率”。



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结果是，内容减少到只有那些能够引发公众神经紧张、情绪激动的节目（轰动事件）。因为公众被福特主义的劳动敲骨吸髓，在自己机械的和官僚的单调存在形式中早已变得麻木不仁，以至于只有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情造成的极端刺激和异常感受才能够让他们心动或者震惊。即使在这方面，已具完全成熟的极权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个自我反馈的运行体系：人们在客观环境的强制压力下被降格为按照所规定的自身即目的前提行事的、百无聊赖的功能机器人之后，还被允许在这种精神匮乏的层次上实现他们可能的“消费愿望”，而使他们的麻木不仁的那些条件被反馈为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 全面动员

没有相应规模的动员就不可能有全盘资本主义。福特主义工业革命的这第二个关键问题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方才在社会的广大范围内得到了解决。而从这个视角来看，极权国家的独裁统治只是这种动员的一个特殊的推行形式，它无法否认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战争的军事起源。在这种条件下，军事“动员”不仅仅是，或者说是完全不同于步兵和骑兵在疆场厮杀的那些非机动化战争时代的动员，那时候的战争虽然也已经使用了各种大炮，却没有要求有层次分明的工业后勤系统以及号召社会支援的动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环境之下，战争不仅仅要求动员各类储备兵员和物资，社会的各层次和各领域也必须更快速地运转，以便能够承受速度加快和密度加大的资本积累。20世纪20年代，在福特主义的第一次启动搁浅之后，不论是在民主国家里，还是特别是在极权国家的专政制度下，更大规模的“动员”首先都在宣传的和政治的层面上发起。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1906~1975）在她于1951年出版的名

为《全面统治的元素和起源》一书里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普遍的极权主义运动和其领袖声誉的具体素质而言，其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他们遗忘的速度，速度之快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还有他们的更换，更换之轻率也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这种不稳定性肯定同……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运动癖好……有关，极权主义运动只有当自己及其周围的一切都处在运动之中的时候，它方才能够维持自己……如果真有所谓的极权主义性质或者极权主义心态的话，那么这种不寻常的变更能力和不连续性毫无疑问就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Arendt, 1991/1951, 第495及下页）

显然，汉娜·阿伦特在这里也只是看到了国家政治这个方面。她眼中漏过的是没有尽头的大规模游行、火炬游行队伍、宗教示威、列队阅兵以及大型体育馆里的“生气勃勃的画面”，而极权国家的独裁政体正是以此来导演大众动员的把戏。鲁登道夫，这个全面战争的疯狂战略家，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谈到过“灵魂深处的动员”（Ludendorff, 1935, 第26页）。但恰恰他的这种说法本应当让人们感到诧异。因为“灵魂深处的动员”这个概念现实的意义超出了其创造者狭隘的初衷；对它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种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面，换句话说它根本就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它甚至还不难让人联想到后来为资本主义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广告活动这个“隐蔽的诱惑者”（Vance Packard）。

20世纪上半叶由独裁政体或者过渡形式的民主政体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的全无个性的民众只是在表面上同战后民主国家中作为“消费者”陶醉在重商狂热之中的个人相对立。而那些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的民众更可以被理解为正在接受训练的独立的消费个体。这是没有个性的民众和同样没有个性的抽象个体的关系，

就像特奥多尔·W. 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尔 (Max Horkheimer, 1895~1973) 1944 年在他们的作品《启蒙的辩证法》当中写到的那样：“每个人都只是可以代替别人之人：是可用作替代的‘样品’。而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人，也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是纯粹的虚无。”(Adorno/Horkheimer, 1997~1944, 第 168 页)。这种在世界大战和大众政治运动里形成的虚无状况在个体化的战后商业人的“灵魂深处的动员”中不仅延续下去，而且也才得以完善：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动员历史上两种不同状态的机制，其结果都会产生一种“伪个性”（出处同上，第 177 页）。这种从这样的历史里产生出来的市场经济民主的资本主义个体本身就在否认自己：

“当它同普遍性之间的绝对一致性毫无问题时，还是能够容忍的……个性本身降低至具有普遍性的能力，这种普遍性给偶然性如此毫无遗漏地标上印记，以使偶然性都能以同一类型被保留下去……只有使个人根本不是个人，而只不过是普遍性发展趋势中的一个个交通枢纽，才有可能把它们完整地收回到普遍性中去……”（出处同上，第 177 及下页）

战后“自由”民主的个人无外乎是被政治军事机器用同一个模子冲压出来的“样品”，它之所以被放出笼，只是为了让按商业轨道运行的世界机器支配使用。这种给 20 世纪的下半叶打上了烙印的新的个性崇拜只是采取其他的手段，通过“欺骗式地将老一套的个性强加于人”（出处同上，第 179 页）延续着没有个性和自动机器般的大众的命运；靠广告、时尚和经济景气保持住活力的消费者个体并不少于游行队伍中的民众，但听命于他人的方式不同于他们：“对他们而言，个性不过意味着吸引人的雪白牙齿，腋下汗液和情绪感觉的自由”（出处同上，第 191 页）。就

像以前有过标准化的民众那样，现在从这些民众当中产生出来的标准化个人即是资本主义动员的对象。他们被制度发出的命令持久地置于“运动之中”，而这种制度不允许他们再有自己的见解。

汉娜·阿伦特在把她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极权主义政治运动上时，完全忽略了她关于极权主义本质的表述多么精确地反映了日益极权化的市场和西方民主本身的特征和世界关系。“遗忘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这个特征放到哪儿会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景气来说更贴切呢？这种景气状况不再是人类的发展，而只是无关紧要的内容穿越货币的幽灵般自我运动的通道。而“更换之轻率”——除了商品的全方位物体性外，还有什么以此来称谓更准确呢？可全方位更换的人所具有的已降低为物体的个性便相当于这些商品。什么能比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更强的“运动癖好”呢？资本主义作为滚雪球式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只有当自己及其周围的一切都处在运动之中，才能维持自己”。“不寻常的转变能力”在哪里能够像在民主的世界市场经济中这样成为如此高尚的美德呢？恰恰是在今天，还有政治煽动者向我们鼓吹，要不断地“适应”盲目、毁灭性和永久性的“结构转变”。而且又有什么最终能够比丧失个性的全方位市场更能代表极端的“无持续性”呢？这个市场以一种永恒的经济圆寂的方式完成了它一成不变自我反馈运动。

1947年，瑞士裔的美国籍建筑师和理论家西格弗里德·吉丁(Siegfried Giedion)本人是福特主义世界的推动者，他心中曾突发一种消极的认识，这个认识涉及的绝不是欧洲的国家极权主义，而是在福特主义最为发达的美国的“机械化统治”问题：

“公众舆论单从商业成就的观点来判断某项发明和某种产品的优劣。而且，人们还这样为这种观点开脱辩白，他们说：‘我们不回顾，而是向前看’。其实这样一来，过去和将

来的时间就都被否定了。有效的只是现在的时刻。未来的时代不会理解这种扼杀历史的毁灭行为。”（Giedion, 1987/1948, 第14页）

以政治的（也就是于国家来说是积极的）形式进行的大众动员在19世纪末创造了社会民主党，而到了20世纪前半叶，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阶段，它成为资本主义普遍的运动法则，那时的资本主义也除了以大众民主的形态外就无法再继续存下去了。就这种“动员”而言，国家政治的极权主义只是这种更为普遍的发展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从福特主义的高度上来讲，资本主义经济滚雪球式体系只有在动员全部后备力量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运行。“对历史的扼杀”（这种说法是在后来时隔较长的后现代观点当中被正面明确提出的）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大批量生产极权和动员的统一性。对于这种“运动法则”的真正含义和它继续引导什么样的发展路线，汉娜·阿伦特又一次以令人吃惊的明晰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这次她道出的又比她领悟的要多：

“在所有极权主义运动都要求对世界进行统治的背后，一直都暗藏着这样的愿望，即发明一类人种，让它以积极的行动去体现多种法则，否则人们对这些规律性就只是忍耐、抵制，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承受……这种运动法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有利于一种运动过程顺利进行的同时，成为一种排除‘有害者’或者过剩者的法则，最终从这一运动中就会如同从灰烬中飞出凤凰一般产生出一个新人种……僭主政治按照古典理论让一种公墓般的死寂弥漫在整个国家的上空……这样的死寂并未使极权统治的国家得到一丝安宁。虽然它的民众都被剥夺了自由、自发地做出行为或只进行活动

的可能性；但在不间断的运动过程中，他们成了穿越他们自身的、远远超出人类的自然过程或者历史过程的代表者……极权统治的本质……是恐怖暴行，但这种暴政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反映的也不仅是某个人的权力欲望的规则（就像在僭主政治中那样），而是与人类以外的过程及其自然或者历史法则始终保持一致……这个意义上的暴政就等同于无法超越的‘法则’。这种暴政的稳定据说是在为运动着的历史和自然的解放服务。这样，同极权主义运动的追随者讨论自由问题就势必会毫无结果，他们不仅对人类的自由，即人类的行动自由丝毫不感兴趣，而且他们还把自然和历史过程的解放都看做是危险的。至于遵循着可观察到的规律运行的历史和自然的所谓自由，事实上对人们来说也就只成为一种必要性的假象。”（Arendt，出处同上，第706页，第708及以下数页）

一个德高望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对政治极权主义义愤填膺地做出了毫不留情的自我评判，而她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这看起来实在有点好笑。因为她在这里当作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规律”核心大加痛斥的，正是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理论的精髓，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伪自然规律性实际的客观化。而且恰恰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从一开始就把苛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宣布为“自然规律”，并且总是径自要求在人们的身上实施“自然和历史的这些法则”。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启蒙运动哲学的精英人物们，如18世纪以来的曼德维尔、斯密、边沁、马尔萨斯等人都提出了“一个在有利于运动过程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排除有害者和过剩者的法则”，并把它同残忍的驯化改造、剥削压榨甚至是铲草除根的妄想结合在一起。

汉娜·阿伦特跟所有其他极权主义理论家一样，不仅被同时

代的直接感受弄得神魂颠倒，而且也只把目光投向政治领域和民主宪法而被其搞得眼花缭乱，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极权要求却始终都没有成为她论述的主题——这正是因为，那种从事实和从长远来看无处不在和具主导性的“运动法则”似乎确实回归了“自然”。至少汉娜·阿伦特也没有留下相反的意见。就这样，她忽略了自己原本应该认识的内容，因为不是国家极权主义特殊的历史表现形式，而是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机制在它所统治的社会范围内“剥夺了”民众的“所有自由、自发地做出行为和进行活动的可能性”——在它所统治的社会范围当中，所有活动都被通过抽象的盈利性和迫使人们服从所谓劳动市场的辖制这样一些经济命令作为公理确定了下来。通过拜物教式的资本经济，自身被异化的个人“在不间断的运动过程中成了远远超出人类的过程的代表者”，即一种盲目的增长动力形成的结构断裂过程，这种增长动力穿越了人类本身并被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当成了一种客观的“自然和历史的过程”。

所有自由、自主地确立目标从一开始就都遭到虚假的经济客观化的这种过分要求的否定。不过直到 20 世纪中叶，这种体系都还没有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全面形成。汉娜·阿伦特所看到的对民众进行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政治动员作为一种超出人类的伪自然的客观事物来说，只是向福特主义的全盘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命令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极权统治的本质是暴政”，事实上，政治上的暴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证明自己只不过是战后民主史中以福特主义形式得以施展身手的“经济暴政”所采用的手段。

同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和其他极权主义者共同谈论人类自由问题的确是“毫无结果”，因为他们给行动自由戴上非理性的经济强制“必要性”的镣铐，他们认为这种强制乃是“自然和历史过程的解放”。自由主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无意之中在知识界宣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

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死刑的，且以此揭露出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总动员的母体。如果说，她的言论也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追补现代化的东方和南方发展中的独裁国家之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汉娜·阿伦特所谴责的那些方面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从自由主义继承而来的禀性。汉娜·阿伦特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理论应该更有条理地并且恰好反过来理解，即它是对伪自然规律性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毕竟指出了这种伪自然规律性是拜物教欺世盗名的手段，万不能作为“规律性”去遵循）。这种“不能被超越”的经济暴政法则并非应受肯定的第二天性，而是这样的一种盲目和无意识的社会化的丑闻，它必然引发谋求解放的暴动。

又是政治极权主义思想家们自己在公开强调这类“运动法则”以及与它相关的福特主义背影下的“动员”的真正性质。在这样的情况下，恩斯特·荣格尔关于“全面动员”的短评便声名大作。这篇文章为纳粹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词目，并在全面战争的意义上一直都被从纯军事方面来理解，尽管他的想法甚至经鲁登道夫有意识得多。荣格尔将仅是“局部的动员”归于“君主政体的本质”，“当它被迫使精神、金钱和‘人民’这些抽象形式，简言之就是成长起来的民主的力量加入到军备当中去的时候，它就会以与此同样的比例超越自己的限度”（Jünger, 1941/1934, 第130页）。荣格尔很清楚，这里所说的是一个超出军事领域的过程，这样一种认识把恰恰以敌对的自由民主主义形态出现的、通过动员来积极推行的极权主义看做优越和圆满的形式：

“在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拥有民主宪法的国家，可以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动员，而这在军国主义国家普鲁士是不可能的。谁能怀疑，没有‘倒塌的宫殿，玄武岩，骑士、强盗以及鬼怪故事的’的美国是这场战争公认的胜利者呢？这场



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而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进行全面动员。”（出处同上，第138及下页）

荣格尔已经直接建立起了军事语言和经济语言之间的联系。因为他曾经指出，在为战场进行的全面动员中，“一种同样已很机械化的消耗起到了消费者的作用”（出处同上，第135页）。这样，全面动员作为推行福特主义大规模劳动的社会机器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经济的“运动规律性”达到了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的水平：

“……去观察一下我们这样生活的本身，它的奔放、它不留情面的纪律，还有它那冒着浓烟和火光闪闪的工业区、它那交通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它那发动机、飞机和它那人口密集的城市，这就足以让我们又惊又喜地发现，我们的生活中简直没有一粒不在工作的原子，就连我们自己也深深地卷入这个迅速运动的过程之中了。全面动员完全是以自我完善的方式在实现，在战争与和平的环境中，它体现了一种神秘和具有强制性的要求，大众和机器时代的这种生活迫使我们去服从这个要求。”（出处同上，第134及下页）

荣格尔自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物神形式的经济命令的原本意义上使用这个名称，他以自己特有的受虐狂心理接受了它，却带着他一贯的“神秘”语气说，这绝对不涉及任何“工业技术的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生产力（自然知识和人类潜能）之中，而是涉及非理性的要求，即要求“没有一个原子”“不在劳动”，那么也就是涉及了价值利用的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机制。

这种自身即目的按其本身的构想塑造了技术以及从此被通过技术改变和重建的世界。“以鲜血作为动力能源”的全面动员（出处同上，第135页）曾把工业战争作为开路先锋，但它作为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在战后民主国家的福特主义和平环境中必须要再加快速度。这样看来，在使用过程的强制下为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进行全面动员的繁荣时期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对内的“冷战”，这种内部“冷战”同国有资本主义和私有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外部“冷战”是并行的。

全面动员的国家极权主义形式绝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而是预先就具备了战后民主国家市场经济运动的很多特点。如果说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各项纲领掀起了一种由各类表演、大众集会和火炬游行组成的宣传浪潮的话（Sautter，出处同上，第382页），那么纳粹德国则花费了多得多的资金和力气去动员大众参加他们的“劳动会战”。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强迫必须通过“调动积极性的艺术”来补充。这就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鼓励勤奋”的工业教育运动曾经补充了边沁主义暴政一样。而现在的水平固然是高得多，规模大得多，方法也巧妙得多。如同在前苏联和至少一段时间内也在实行了罗斯福新政的美国一样，纳粹为“劳动会战”所进行的宣传至少也部分地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兴旺腾达气氛”，这种气氛会让人会不禁想起1914年8月病态的精神快感。这一向福特主义“劳动国家”的全社会官僚制度行进的变革恰恰是以非官僚主义的姿态、呼吁自行负责的自觉行动和“青年人反叛行为”的魅力编排导演的。几十年后，一个纳粹的行政人员还不无骄傲地回忆说：

“人们当时在寻找一种特定的人物类型：年轻、机灵、投入、有智慧、有责任感，但又不同凡响、不官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也是青年人对老年人发动的一场革命。

机关、部委和协会在决定人选、结构重组以及再次调任的时候，人们公开或暗示都遵循着这样一种思想：‘老家伙们必须滚蛋’……”（Kehrl, 1973, 第33及下页）

这听上去已经很像是在政治的“兴旺腾达”编排导演中和企业经济管理彻底变革的运动中，有人在为更加努力的适应、劳动热情的保持、有所作为的追求以及竞争观念的培养等进行的民主说教。不间断的广告轰炸用各种活动形式为不断扩大并越发荒唐的商品消费展开全面动员，鼓励业绩和竞争的宣传与此相互呼应，为的是使人力资源能为业绩和竞争做出更多的奉献。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种持久的彻底变革一针见血地称作“创造性的毁灭”。在永无休止地接踵而来的新型产品和新型生产程序、新型竞争格局以及社会政治的调整当中，现行的劳动内容和方式方法总是不断地被废弃，以便能始终让人们服从经济命令，从而“忙碌不休”。

这种包罗万象和持久不断的运动狂热的暴政让人联想到宗教和政治派别的内心精神生活：其目标越是非理性和怪异，就越是加紧对成员的强力动员，不断发动新的蒙蔽运动的欲望也就越强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来不及去思考，这样可使所有的能量都转移到已经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主义上去。而这种行动主义又已经不再有任何自主和自觉的意向。因而，资本主义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成一派的巨型反面乌托邦，它通过福特主义的动员转变成了全面的世界体系。

全面的工业动员第一次在社会结构中成功地使妇女在资本主义就业人员中占据的比率长期保持住了高水平。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从1960年起，使用妇女的雇佣劳动明显增多，而这在东部阵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更为明显。当时的女性就业率几乎又达到了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女性就业状况。由于当时工业

就业人员的总人数较少，后来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就业总人数的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就大幅度下降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职业女性的人数实际达到了1930年的两倍，所有其他工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1963~1967) 劳动力总数中妇女所占的百分比

美国	联邦德国	民主德国	法国	英国	前苏联
34.1	36.9	46.0	34.9	34.4	48.0

资料来源：Sullerot, 1971, 第115页。

这种过程虽然原则上到处都一样，但是，各个国家迥异的统计方式却掩盖了部分事实，因此一些国家的女性就业率看上去反倒好像回落了。其中的问题是，只有当女性在“传统行业”中从事的职业活动是为地区性市场进行的生产活动时，方才能够进入统计数字。妇女在家庭当中即便进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也不被当成是职业或就业活动，而与之相反，女性在进行商品生产的农业、手工业以及零售业的（如“埃玛阿姨商店”）家庭企业中的生产活动却被完全当作资本主义统计的一项内容；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统计中被称作“协助性家庭成员”。直到20世纪20年代，收入极低的女佣工作在女性就业统计当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关系的性别结构里，福特主义在工业领域里进行的动员把大量职业活动从“传统行业”重新组合到推行极权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在女性生产活动首先在家庭农业当中同这种形式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同时（现在，“女佣”职业几乎完全消失），福特主义工业行业和基础建设则把众多的女性“劳动力”吸收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雇佣大军里来。这种变化一直都被当作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正确程度实际上只有一半。

虽然很多女性由于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而在经济上不再依赖她们的丈夫，因为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作为“协助性家庭成员”的她们所做出的劳动完全不计报酬，而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们则至少是在形式上能够单独决定家庭收入的使用问题。但就像是战争经济时期兵工厂的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情况那样，妇女们个人对她们丈夫的依赖性只是被对福特主义的劳动逼迫、工厂纪律和办公室纪律的依赖性取代了。用“抽象劳动”的苛求取代充满狭隘偏见的家庭经济关系，这（直到今天都）无异于是两种不幸的交替，根本就称不上什么解放。另外，性别等级制度在福特主义动员起来的劳动关系中又得到了继续：即便做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劳动报酬也一直都比男性的少，而且女性也很难挤进领导层（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两种不幸的交替，因为资本主义管理和民主政治一样需要的主要是消极的、丧失人性的人员素质）。直到今天，这方面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欧洲在工业领域工作的女性的工资统计就证实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初期）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比例

法国	瑞典	荷兰	联邦德国	西班牙	英国
81	89	75	74	72	69

资料来源：Wikander, 1998, 第 191 页。

不过，女性在她们成为福特主义动员对象的同时，还大都继续牢牢地拴在家务劳动上。因为虽然妇女在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家庭结构的性别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几百年发展中深深根植于大众社会心理的性别认同感专为“女性”确定了一系列特征，这样的性别认同感再生出了区别所有一如既往地不能并入利用过程之中的活动和行为

的“分离”（Roswitha Scholz）方式，这些行动和行为被定性为专门由女性分管的领域。既然福特主义强行把男性和女性同等程度地抛入家务劳动之外的“抽象劳动”体系中，原本就应该可以重新调整已分离领域的布局。但是，如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小家庭的坚固结构却导致了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久后被称为普遍可见的“妇女双重负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业动员必须要把一个个划分出来的小型家庭也包括在其范围之内。对“白色商品”（电冰箱、煤气灶、电子炉、微波电器、洗衣机、洗碗机和吸尘器等）的福特主义大众消费大部分都属于这个范畴，这样才能通过慢慢提高购买力来挖掘潜力：

“1955年所有家庭中有10%拥有一台电冰箱……当1953年美国76.3%的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的时候，联邦德国只有3.5%的家庭拥有一台……1962年，联邦德国大约34%的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视机，52%的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25%的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65%的家庭拥有一台吸尘器……到了1973年，洗衣机就已经成了所有家庭的必备品了……这种技术化和合理化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减轻家庭妇女的劳动，而是充分利用技术可能性和销售机会。家电的普及，比如在厨房里推广使用电子炉和煤气灶，也和电力供应以及煤气供应的扩大和发展密切相关。”（Köppen, 1994, 第130及下页，第230页）

这种表面上的生活资料实际只是工业化家庭经济活动的生产资料，而绝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消费品。不过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地施展出绝招：让女性们既是“家庭妇女”，同时也是职业女性。所以事实上，这并非是在减轻被定义为“女性”的活

动，而实际上一方面使女性成为了福特主义全面动员的对象之一，另一方面又与此同时把原来“已分离出”的社会领域继续指定由妇女分管，甚至把这些领域间接地划入了工业积累的范畴中去。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方式的动员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悖论：家务劳动的工业化使工业生产更容易榨取她们的劳动力；反之，为了有能力购买实为家庭经济生产资料的“白色商品”，女性们又不得不去从事工业雇佣劳动！身处这种困境的女性们所承受的负担比以前只重而不轻——这一荒谬的局面从一开始就是工业资本主义“进步”的标志，而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已实现的时期，它又把性别的职能分工也包括了进去。

完善的战后福特主义得到真正的推动自然是由于汽车最后成功地成为大众化商品，这一过程，原本就充满了它特有的“男性”梦幻，而且的确是把军事“运动理论”的因素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形式。没有全面的“汽车化”就没有福特主义动员（Williams 1992）。连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样板产品也是在战后民主国家中才以真正的世界社会大规模源源驶下流水线的。

如同在其他方面，极权国家的专政制度在此也证明自己是开路先锋。纳粹分子酷爱汽车，特别是在“元首”已在制定纲领时明确了机动化武装大众的意义之后。让德意志优越种族幸福地拥有一种“为所有人制造的大众汽车”是希特勒本人的主意，乃是效仿了亨利·福特设计出“T型”汽车的想法。著名的大众甲壳虫式汽车就是带有超现代化设计思想的典型的纳粹项目，它第一次彻底挤掉了直到当时都占着主导地位的车身像“邮政马车”的轿车车型；它主要是由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设计的，波尔舍是希特勒1934年为实现德国人的汽车化任命的“帝国设计师”。德国“人人的汽车”同与此相关的高

速公路这一耗资巨大的工程都被宣传成一种民族的需要。1935年，第一批甲壳虫型汽车启程上路，1938年德国就开始建设试验性工业城市沃尔夫斯堡，并计划在那里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厂：

“主要的装配车间应该有一公里长，分两班工作的10000名和7000名工人每年应生产出50多万辆汽车。为此甚至有必要新建一座城市，以便能在方圆3公里之内安置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庭。”（Burnham, 1991, 第12页）

这种大众汽车的价格比福特的公众汽车还要低1/3。“德国劳工阵线”的领袖罗伯特·莱（Robert Ley）开发了一种分期付款的储备制度，以便能激起德国人的热情去使福特主义运动人的梦想成真：

“在1939年1月1日生效的这种模式要求未来的购买者，每个星期必须至少购买5个帝国马克的储备票，然后把它们贴在一个储备簿上……大约33.7万个债权人在这份计划书上了字。在战争年代里，这项计划积累起了2亿8000万帝国马克。但荒唐的是，这项计划并没有成为为军事目的积累资本的良好计策，因为每一个芬尼……都被存入了柏林的工人银行——结果到了战争结束时，这家银行被俄国人吞并了。于是，存款者永远也得不到什么汽车了；到了1961年，他们才得到大众汽车公司的赔偿建议，或偿还100马克的现金或者按600马克折入一辆新的大众汽车价格中（这是在经过了为期12年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几乎一半的人选择了后者。”（Burnham, 1991, 第13页）



纳粹对汽车的钟爱说明了汽车本身的许多问题；汽车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中性的时代现象或者一段中性的发展历史。所有福特主义社会和战后民主国家中的法西斯主义成分在全面汽车化中几乎都留下了它的踪影。极权主义的“运动癖好”如同汉娜·阿伦特在政治层面上对它所做出的描述那样，以这种铁皮的外形客观化为一种技术—物质体系和强迫性的、统治一切的日常生活动行。为了能使这种客观化变得强大无比和不可逆转，必须制造出超越临界点数量的汽车，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崭新的汽车化资本主义世界。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从未达到这个临界点数量。1932年德国只生产了4万多辆汽车。为此，1934年，希特勒在柏林汽车展上咆哮道，每5个德国人才拥有一辆汽车，这简直是个耻辱。到了1938年，德国的汽车产量才达到了22.2万辆。自1939年秋天就开始计划的在沃尔夫斯堡成批生产甲壳虫系列的项目一直都没有实施；1940年起生产的作为越野吉普车的军用大众汽车能装载“三个士兵和一挺机关枪”（Burwitz u.a., 1992, 第28页），取代了乘坐“三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的家庭用汽车。直到战后，民主国家才造出了数量足以达到和超过那个临界点的滚滚汽车洪流：

联邦德国小轿车总量（以百万计）

1958	1968	1978	1985	1992
3.1	11.7	21.2	25.5	36.1

资料来源：Bode u.a., 1986, 第39页；Burwitz u.a., 1992, 第11页。

与此同时，在所有工业国家以及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小轿车的密度同样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巨大的汽车生产规模也从生产的数量上得到了相应的证实：

1938年和1979年的小轿车年生产量（以百万计）

	美国	德国	东欧集团	日本	全世界总计
1938年	2.0	0.28	0.04	0.008	3.04
1979年	8.49	3.93	2.25	6.29	31.54

资料来源：Eckermann, 1989, 第169及以下数页。

90年代初，全世界有4亿多辆汽车在路上行驶；到了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应该会增长到7亿辆。1990年，单是德国的汽车工业生产总量就超过了500万辆。几乎每两个德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拥有一辆汽车。假如希特勒知道了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他一定会大大为之振奋的。因为无论是国家极权的还是民主的——不仅资本的经济极权主义在汽车制造的成就中庆祝着自己的胜利，就连军事化的日常生活也如此。日常生活中的“上下班交通”、“周末交通”和度假旺季时的旅游车长河把对军队的机动化调动方式转化为民用社会准军事化的商业调动方式。

交通堵塞证明了全面汽车化的荒谬性。它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类似于战争的“经历”：如果人们以前对交通堵塞的反应是诸如气闷、恐慌、头痛和冒汗，那么按照BAT业余休闲研究所在1995年所作的一次调查来看，首先是在颇有教养的年轻一代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堵车的兴趣”，这正符合一句格言：“事情发生了，而我正身历其境。”20世纪初以来，得以享受“一点混乱”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特点只在世界大战这个反面形式中体现在被驯化和强行一致化的资本主义人力资源身上；而在战后民主国家里，这种欲念被投入到“交通大战”中去。1995年，政论家卢路德格尔·卢特克豪斯（Ludger Lutkehaus）把德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横行霸道的汽车驾驶者的这种“内心经历”称作“行驶在暴风雨中”。有关方面的专家恩斯特·荣格尔早在

60年前就以其敏锐的感觉描述了世界大战的工业化技术装备战和福特主义日常生活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性此后自1950年起构成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大城市中包围着我们的那些声音大多是忧伤和危险的；它们的音调几乎都是十分尖厉刺耳的。工作开始时汽笛的声音简直就是魔鬼在吼叫。从交通工具的长河中一刻不停地传出呼啸似的、口哨似的、尖厉刺耳的或者暗中警告的信号……但是我们的世界中不只是那些特别吵闹的，即便是极其轻微的声响也都一概如此。即使是在对我们十分重要的蜂鸣器发出的嗡嗡声里，也显露出一种近似于昆虫鸣叫的危害性。如果我们夜晚走进一个房间，那里的这种声音已经响了很久，间或被一清脆悦耳的铃声打断，这时我们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一点。”（Jünger, 1934, 第66及下页）

战后的民主国家，并不只是产生了世界大战的军事动员和全面开展民用汽车生产两者之间单纯的类似性和可比性。没有公开宣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全世界的公路上呼啸起来了。按照粗略估计，20世纪大约有1700万人被汽车夺取生命；实际数字可能比这还要高很多，因为有关统计数据大多只包含那些在公路上立即丧生的受害人，而事故之后在医院里去世的人却没有被录入事故统计中。此外，再加上受伤人员以及终生残废者，那么那个数字会更大。如同以前大型军事战役那样，现在的这场第三次个人交通世界大战也源源不断地产生了很多伤残者。很多过去健康的人现在或者没有腿或者偏瘫地坐在轮椅上，这就是“汽车驾驶人员”触目惊心的未来——机械轮子成为了残废的福特主义电子人残废躯体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例都沉积为“无可反驳”的正常规律。在普遍展开的经济竞争和汽车制造对种种

方面构成的侵略性两者交错穿插的局面中，极权民主国家与生俱有的资本主义“法西斯”特征客观化为普遍的社会环境。1944年，特奥多尔·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有先见之明地发表了汽车使极权主义暴政变换手法得以延续的看法：

“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类新型人的身体，一直到他们最隐蔽的神经系统都正在不断地遭遇着周围环境各种事物怎样的侵蚀毁坏，那么人们就不能够正确看待他们……哪个汽车驾驶员没有在他发动机力量的诱惑下去驱车消灭大街上的衣冠禽兽，那些行人、孩子和骑自行车人？在操作者按这些机器的要求所做的动作中潜伏着暴力、攻击、断续而不休止的法西斯式虐待。”（Adorno, 1983/1951, 第42及下页）

献给以完美的民主—汽车形态的“美妙机器”的人类祭品比所有远古时期的血祭仪式中的所有被害者的总和还要多，死得还要悲惨；但尽管如此，对阿兹特克人在举行血祭仪式时从活人胸膛里掏出心来作供品感到震惊的同一种意识，却接受了街道和高速公路上每天发生的大规模和同样血腥的屠杀仪式。面对受害人同样或更大程度上（因为没有为仪式进行预先选择，因此事先也就一无所知）无法量度的恐惧、震惊，官方意识保持着沉默，这种恐惧仅由个人去承受了，而因此它也就变得更加恐怖。恩斯特·荣格尔这个代表着在全面汽车化中重又确立了自己社会定位的“劳动者”这一普遍形象的思想家，这场非军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还对这种福特主义的冷漠的道德本性惊讶不已：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就杀人犯的脑袋还要用互相对立的世界观争论不休的时代，对技术，特别是对交通技术造成的无数受害者完全不加理睬呢？这绝不是历来如此

的做法，第一部铁路法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那部法典明确表明要努力使铁路能够为它造成的所有伤害，哪怕是一些只要铁路存在就不可避免的伤害承担责任。而现在，另外一种观点却占据了统治地位，即‘行人’不仅必须要适应交通，而且还要为违反交通规则负责。这种交通规则本身就标志着潜移默化之中毫无阻力地把改头换面的合法性强加给了人们的物质革命……对此事实熟视无睹的是完全有能耐去把人们数百年来在寺院里遭受的苦痛视为一种古怪的迷惘的同一种理解力。交通的受害者年复一年地出现；他们的数量超过了一场血腥战争带来的损伤。我们面对它们，却产生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因为技术发展所要求的受害者与我们所处的空间，即劳动空间相称，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Jünger, 1934, 第198及下页）

事过不到20年，荣格尔对全面汽车化所带来的受害者之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感到震惊了。现在，坚定地追随战后民主福特主义思想的他，已经几乎可以熟练地在道德意义上区分主观责任和盲目客观化了：

“每天我们都能从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试图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在我们的地球上已经发生的、数字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然而，必须始终清楚的一点是，一个毒害自己妻子的人和另一个因为自己开车漫不经心、甚至喝醉了、而妻子正坐在自己身边、从而对妻子的死负有责任的人，这两者之间始终是存在着区别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同这两者中间的哪个人还‘可以相处’……”（Jünger, 1953, 第92页）

这里的“劳动空间”意即：资本的抽象积累逻辑，它不可避免地借助支配一切的经济命令使对人的长期杀害和残害变为合情合理的现象，在福特主义全盘资本主义的高度上，这种命令就仿佛等同于汽车这种核心产品通常的“优先行驶权”，有了这种优先行驶权，汽车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压过人们的躯体，而且也可以践踏汽车化个人的法律权益和心灵。汽车驾驶者攻击心态中的杀手本能（“自由公民的自由行驶”——民主自由用这个概念来表达再贴切也不过了）与极度玩世不恭的裁决一脉相承，而这种裁决对“符合汽车特点”深明大义。这样的基本事实随便在哪一份报纸上都能读得到：

“昨天至少有 20 辆汽车压过了一个 12 岁女孩的身体，这个女孩原本是想为她在交通事故里受了伤而奄奄一息的父亲寻找帮助的。最后终于有一个汽车驾驶者叫来了警察。警官们看到，女孩尸体的碎块足足被拖了 50 米长……已经有过多的报道介绍过对这种美国式‘为社会接受的谋杀形式’温和的惩罚方式了，这些惩罚方式温和得令人感到惊讶。按照这种标准，一个威斯康星州的男子用车撞死了一个孩子，他只交纳了为数 284 美元的罚金就了事了……而一名杀死一个 15 岁男孩的杀人犯却被判处了 2 年有期徒刑并交纳了 200 美元的罚金，并被剥夺了 16 个月的驾驶许可……”（转引自：Williams, 1992, 第 96 及下页）

像出自这家英国报社的这类文字，我们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特别是在德国，潜滋暗长（现在也公开了）的纳粹心态可以在这种“驾驶行为”中畅行无阻。直到今天为止，联邦德国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乡间公路和高速公路上普遍没有时速限制的国家之一。对这样一种超乎寻常的无所顾忌，

不光汽车族们而且各大政治党派也既同心协力又争风吃醋地给予呵护。此外，全面汽车化的间接结果——废气和大气污染——也对人体产生着不良影响，而这却被厚颜无耻地说成是“不得不忍受的必要性”。这种态度的典型是法兰克福行政法院的一宗判决。一个患有过敏、神经性皮炎、痉挛性支气管炎多种病症的5岁男孩的父母状告城市政府和州政府，因为尽管大气中的臭氧已经超过了临界值，两级政府却无意对交通进行限制。但法庭表现得很追随社会潮流和“符合汽车特点”，以必须优先保证“交通畅行”为理由断然驳回了控告：

“只有当男孩作为人的尊严受到损害，他方才可以有权提出‘保护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由于过高的臭氧值所承受的痛苦无法由畅行的交通给他带来的益处加以弥补的时候……他才能提出‘保护的要求’。而倘若某个公民……被要求在几天之内不在露天活动，却算不上是违背了人类的尊严……” [法兰克福评论 (Frankfurter Rundschau), 1995.7.15]

普遍适用于经济利用命令的一切，同样两倍和三倍地适用于由此产生的汽车制造的命令：所有的社会机构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资本的自身即目的的机制狼狈为奸，已经对基本的生活利益置若罔闻。从各方面看，恰恰孩子们是“交通大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从上述事实中可见一斑。尽管贴近地面的有害物质造成的危害最大，但那个什么声名狼藉的临界值却不是以“孩子的身高”测定的。此期间的统计表明，很多儿童都患有严重的过敏或者呼吸道疾病；这从以下现象也可看出，人口密集地区的皮肤科和耳鼻喉科的医生通常专门为儿童设立一个候诊室。对神祇偶像必须是供奉祭品的。而汽车资本主义的种种机构尽管可以放心，

金钱资本这个俗世间神灵在大众意识的向往和道德价值观中也具有汽车的形象了：

“按照盖洛普（Gallup）国际民意调查所 1983 年在 16 个国家就道德标准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来看，人类能够犯下的最严重的罪恶不是种族屠杀，不是弑母，不是抢劫、掠夺或者强奸，而是没有得到汽车主人的许可就私自去开一辆别人的汽车。这是惟一个在 16 个国家取得了共识的道德价值。”（转引自：Williams, 1992, 第 91 页）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人类的生命在法律上同“自由驾驶”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并且蜕变成杀手的汽车驾驶者肆无忌惮的行为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主观造成的行为不轨，而是客观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特殊的福特主义汽车形式。从远距离来观察就能够清楚地看出，任何社会和道德价值甚至在“健全的人类理智”中也都是畸形地沿袭下来，这种沿袭只是那种堕落逻辑的延续，正如曼德维尔曾经在他的《蜜蜂寓言》里颂扬的：这种顺应资本的行为和心态与普通谋杀和殴打致死不同的是，尽管它们将导致人类乃至世界的毁灭，最终却仍具有积极意义或者至少是“无法避免”的。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极权化的生产社会中，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切“自由意愿”带来的风险和副作用无需由人来承担责任，而是被归咎于“自然”。就像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困境况间接地杀害了儿童不会被看做是谋杀，而是被视为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技术事故一样，成了汽车的资本直接夺走儿童的生命也照此办理。

按福特主义造成的汽车化客观现实及其后果并不局限在车辆及其驾驶者直接的存在形式上，而是遍布整个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就是在社会、经济、美学和城市建设方面，这样一种动员也



表明了它的无所不在。城市和自然风景被汽车道路肢解，社会和美学空间简直被汽车化的暴政吞噬了。在此背景下产生“自然风景的消耗”这个词并非偶然。没有地方能幸免这种消耗；没有人能躲避开川流不息的交通。聚居空间和居住条件环境也被迫服从和适应制造汽车的需要，正如新近以联邦德国为例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此重建阶段，‘现代’城市规划者和交通规划者都以美国为榜样要求建造城市高速公路、城市内环线公路和多层停车楼。这样，宽阔的街道就能够保障城市具有发挥功能的能力，并且在这个布满高楼大厦、宽阔的间隔距离、疏松的城市结构的时代，这些也象征着一种城市建设的新型标准。以这样的方式去促进机动化个人交通发展的典范是汉诺威和卡塞尔……20世纪50、60年代，在城市中为汽车提供足够空间并让驾驶汽车变得舒适的政策得到持续贯彻。扩建公路、重新布设城市交通枢纽以及‘偷占’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空间’的举动都是严格按技术和汽车需要制定的交通规划的结果……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汽车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有轨电车的车道停止使用了，地铁得以新建或者扩建；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必须让路，树木被砍伐了；为了能让更多的汽车在街道上行驶，人们竭尽全力。”（Burwitz / Koch / Krämer - Badoni, 1992, 第29页）

汽车化悄悄在人们背后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施加着深刻的影响。整个情况，“自发似的”被带到了使汽车由被崇拜的对象摇身变成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状况。汽车资本主义不仅使它的鼓噪声响彻全世界，而且还向大气喷吐着废气云雾；它也在整个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施展着它“无声的强制力”，这不可避免地使

汽车洪流翻起越来越高的浪潮：

“自从更多的人拥有汽车以来，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聚居结构。在汽车时代出现之前，城市结构一直都是以建筑的高密集度和对居住、工作和购物的功能高混合度为特征的。在大批公民拥有汽车之后，这种聚居形式慢慢消失了。适合汽车特点的城市边缘聚居区和郊区应运而生。在对它们的规划过程中，人们不必特地考虑建筑密度、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以及工作地点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居民都拥有汽车。不过，这种居住结构的改变带来了新的负担。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的确必须要使用汽车了。对于居住在城市边缘和郊区的人来说，他们上班、购物和使用休闲设施必须走的路线比市内居民明显要远得多，公共交通工具能提供的便利也要差得多，而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条件又缺乏吸引力。这种设施上的缺憾必须通过更多地使用汽车来弥补……一个郊区居民为‘置办日用品的旅行’开车行驶的路程是市中心设施齐全的老城区居民的三倍半……20世纪30年代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为适应汽车而进行的城市改造被称作公路建设者的暴殄天物之举就不无道理了。”（Burwitz/Koch/Krämer - Badoni, 1992, 第31及下页）

在发生了福特主义变革的社会中，连在私生活领域里都能看到汽车独裁的痕迹。时至今日，这种独裁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像所有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一样，它在社会意识中也作为一种伪自然条件站稳了脚跟；在战后历史的最初阶段，汽车独特、迥异的违背美学形象挡住了人们所有的视线，它的无所不在成了不争的事实。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福特主义合理化一样，战后时期横贯各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全面汽车化这一发展势头也被

看做是所谓“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的一个完全积极的客观事实，由此只会产生的结果是人类行为的标准化。

也只是在那些更多地表现出无助和保守的推理的、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控告中（极似 20 世纪 20 年代面对新型合理化的情景），“最后的步行者”（Muthesius, 1960）向一个彻头彻尾汽车化的世界的强权要求自己的权益。如今最终“摆脱”了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与训练有素的大众意识观点一致，敢于成为第一个而且是极度狂热的“汽车驾驶者党”；没有什么地方会比联邦德国更加乐此不疲的了。属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市长，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 - 约亨·福格尔（Hans - Jochen Vogel）曾经大力为“适应汽车的城市”作过宣传。自此，为把自然风光变成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而把世界置于沥青水泥之下就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心愿。社会民主党完全能够在各个层次上成为公路建设者的暴殄天物之党。就在全面汽车化的半个世纪过去之后，现任的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施罗德（Schröder）还津津乐道地坦言，他自己就是一个“汽车人”。

资本主义以投资性大众消费品的汽车、世界“适应汽车的”转变和公众化的驾车者意识组成的时尚形式不仅布下边沁式行为痕迹的天罗地网，而且还把它编织得更为紧密；对人进行的资本主义动员也最终以这种方式成为工人运动的基础，这种工人运动在战后历史中清除了最后残存的一点谋求解放的思想，于是也就只能在一个“装备良好的残疾人”（Paul Virilio, 1992, 第 51 页）的世界里“飞驰的静止状态”中（Virilio, 出处同上）僵化了。恰好是对汽车化违反常情的钟爱使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和纳粹主义之间一直不承认的内在一致性上一目了然。就像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恩斯特·荣格尔的回应，“速度哲学家”维里奥（Virilio）在回顾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指出，这种一致性不仅也存在于民主的美国，而且民间和军事动员力度的相互作用也在

这个最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发挥出最大的穿透力：

“虽然运载和速度的革命席卷了世界，但火箭人的体质却按照其文化渊源而各不相同；这样，例如在美利坚合众国，为能四通八达而建立的后勤系统具有民主的特点，举办‘大型消费节’的目标在于……保持住全民族的人力资源驱车行驶的热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驾驶着汽车，研究着机械学、能量传递原理的交通法则，也习惯了发动机的耐久力，这样，他们就无意中提高了美国的军事潜能……”（Virilio, 1978, 第14及下页）

建筑师出身的维威里奥丝毫不理解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拜物教，他的论证和很多批评家一样，只是停留在工业技术的表象层面上；不过，他在对“毫无内容的”动员和以自身为目的的速度的描述中，却点明了自我反馈的货币资本的空空如也：

“在速度之巨力的桎梏之下，我们无法去任何地方，我们为有利于空空如也的速度而完成了有生者的使命便感到心满意足……”（Virilio, 1992, 第135页）

这种被强调的“空空如也”，这种“没有轨道的轨道”，“没有时间的时间”（出处同上）——还有什么比此更恰当地来比喻“美妙机器”的抽象、无意义和无人性的运转时间及其企业经济的作用空间呢？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完全与有自我意识的人确定自己目标的做法背道而驰，在它的福特主义动员里最终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无生命的事物会神使鬼差般地起死回生，而人却被物化了：

“如今的旅馆房间把汽车车厢和高速公路旁餐饮客房建筑混合起来，比任何一种其他的房屋建筑风格都更生动地表现出人类居住环境的发展……这不再是什么房间，而只是9个平方米或甚至只有6个平方米的‘匣子’……有时候甚至，就像在鲁瓦西机场附近的连锁饭店 COCOON 的房间一样，它们竟然连窗户都没有了，各个小房间只通过内部中央空调网络来通风。这显然是把停车场系统当成了榜样，因为对旅行者的人身‘保存’已经同对旅行者所携带的行李的保存没有区别了……”（Virilio 1992，第139页）

这是一种虽然已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完成的，但却不合逻辑地非人的或者超人的自身即目的机制的机械化“进步”，它把人类作为纯粹的客体动员起来，几乎把他们当作火箭一样发射到了一条轨道上，让他们以一种在社会上的麻木状态进入高速度，或者像维威里奥所说的那样，把他们“变成卫星”。被毫无目标地动员起来的人们作为资本的大规模生产者和大众消费者过的这种无生气的生活十分忧郁和单调。这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为“发电站”的演唱组合创作的一首歌曲里就可以听得出，虽然当时的创作者绝对无意要批判什么：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飞驰飞驰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飞驰飞驰

我们面前是一个广阔的山谷，  
太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行车道是一条灰色的带子，  
白色条纹，绿色镶边。

现在我们打开收音机，  
喇叭里就传来：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飞驰飞驰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飞驰飞驰……

### 极权的业余时间资本主义

一个很普遍的想法是，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基于迅猛增长的生产力将获得越来越多的“业余时间”和“乐趣”，这或许是在极权主义的动员中对社会意识最具特点的蒙蔽了。就像整个福特主义繁荣一样，表面上与之俱来的“劳动时间缩短”本身无论是从内在还是从纯数量上都只是相对而言。

因为第一，“经济奇迹”的这个方面也局限于至今还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领先地位的那几个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缩短的劳动时间有很大一部分得以用世界市场上的赢利来弥补，因此这只是繁荣时期一种赢利者的选择权，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可能性。对于追补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除了一日、一年以及终生过长的劳动时间是确定不移的，最多能被压得比在早期资本主义地狱里劳动时间的最高值稍低一些。

第二，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内部，这方面也是有差异的；因为在推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森国家中，在“左派”政府的领导下，劳动时间缩短的幅度不像西欧大陆国家那么大。更不用说日本这个亚洲地区的新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大赢家了，（首先是在供货企业里）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在该国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

第三，劳动时间缩短当然是与繁荣时期紧密相连的；随着增长速度的减缓，企业经济合理性必然会反对继续缩短劳资协定和法律规定当中确定的劳动时间，有时还甚至会使发展趋势掉转方向。资本主义“休闲社会”的种种虚幻设想即便在数量上从一开始就是对一种特殊的、时间限制的情况的粗略预测。

第四，最后在衡量和期待赋予“业余时间”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的时候，人们仍没有考虑到，泰勒和福特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期所作的计算究竟为何物：也就是通过加强劳动密集度来超额补偿适度缩短的劳动时间。“劳动科学”和流水作业这些方法在福特主义繁荣时代不仅第一次在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应用，而且它们也日臻周密成熟了。以这种方法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榨取是强劲推动战后时期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相比之下，缩短劳动时间只起到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种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居心叵测的公式来概括：福特模式的劳动时间越短，人力资源就被压榨得越彻底。不断扩大的业余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用来引诱被驯化的“劳动力”进入极度密集的“抽象劳动”中去的香蕉。

且不论这种缩短的劳动时间在量上的相对性，揭示这种表面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毁灭性本质的，是它自身在质上的特点。单单是“自由时间”这个表达方式本身就来源于18世纪的疯人院，指的是工厂和办公室里对人力资源进行驯化之外的剩余时间。但是福特主义动员却恰恰还要对这些剩余时间下手令其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像承受着双重压力的家庭妇女和母亲们，在资本的直接作用空间干完工作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又要用另外的工具——福特主义的家务生产资料继续劳动一样，资本主义的驯化措施此外还借助于福特主义的交通工具、媒体和玩具在业余时间消费中继续发挥作用。如果说直到20世纪中叶，“业余时间”还是一个或多或少并未确定的、处于资本及其干涉之外的领域的

话，那么现在，极权化和动员已经侵袭了这个领域。于是，汉娜·阿伦特就极权统治下的国民所说的一番话，即他们被剥夺了“一切自觉自愿的行动或者活动的可能性”，现在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直接作用空间之外的剩余空间了。社会主义和工会的工人运动已经不知不觉地按照驯化的精神把“抽象劳动”的形式转移进了“业余时间”之内；并在其下属的二级文化组织里已经训练出了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只需要加以商业化了。而汽车化和由此而带起的周末和假日旅游就是在“业余时间”领域扩展极权化资本主义的理想切入点。

连纳粹都有意识地建立了一个下属“德国劳工阵线”的业余活动组织，名为“快乐带来力量”（Kdf）。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也以种种国家极权主义的形式启动了商业的战后民主，并建立了50年代以来才开始全方位展开的一种新型业余时间资本主义的结构，而当时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结构已经达到了全盛时期。纳粹虽然无法再完成计划中的德国全民机动化，但是业余活动组织“快乐带来力量”却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完全可以和工人文化运动的有关活动相衔接。业余活动组织“快乐带来力量”组织的去往马德拉群岛和挪威的航海旅行就已经具备了后来的欧洲大众旅游业的性质。而且还有不少原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也通过业余活动组织“快乐带来力量”接受了纳粹的腐蚀方式。在流亡的社会民主党收集纳粹德国局势的材料后编写的“德国报告集”里，有一篇报告讲述了一次业余活动组织“快乐带来力量”组织的旅行，“劳工阵线”的领导人莱（Ley）也参加了这次旅行：

“他们为这次去马德拉群岛的航海旅行曾经作过一次大型广告宣传，对此我无须特别提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旅行给一位老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你们知道吗，



我必须得承认，整个旅行当中都充满了同志之间的友情，很可惜，我们以前就缺乏这种情谊。境况好的人甚至给需要帮助的人捐钱，以便后者不会感到受到了怠慢。人们在船上没有区别，所有人都是同心同德。我们必须说，这里的确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平等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所一直向往的啊。某待人特别友好。每天他都在一个小房间里跟人谈心……’……必须……承认，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确实以这种方法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转引自：Abelshausen/Faust/Petzina, 1985, 第 375 及下页）

在这个报告集的另一篇报告中还提及了大众旅游业渐显的端倪，不仅描绘出了在这个早期阶段资本主义业余消费中社会解放的讽刺漫画，同时也揭示了保守派精英对这些现象提出文化批评的实质：

“许多家境殷实的人对业余活动组织‘快乐带来力量’都十分恼火。旅行原本是他们特有的享受。假如旅行一下子降格为一种大众经历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意味着是伟大的经历了。他们避免去业余活动组织‘欢乐带来力量’旅行过的地区。他们私下传论着那些参加旅行的人们行为粗俗的故事，说这些人会像蝗虫一样降临到某个旅游景点，对该地骚扰一番，还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夜晚发出恐怖的吆喝声……”（转引自：Abelshausen u.a., 第 379 页）

与过去一样，这些精英人士批评“大众化”的目的也并不在于，通过对资本的人力资源进行福特主义全面动员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也被迫采取自嘲和对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机制俯首听命的态度；恰恰相反，资产阶级文化保守主义只是

抱怨，“高收入者”在他们以资产阶级方式享受世界风光的时候不得不要受到福特主义商品世界中庸俗化的大众消费的干扰。乘车的（现在是航空）大众旅游的破坏性质单凭经验和从直观来看似乎是被贬低成思想粗俗愚钝的“乌合之众”的主体的行为，而构成大众文化精英批评者们无声背景的资本主义环境条件在他们肤浅的推论中也始终无声无息。但资本主义的大众缺乏教养的令人作呕现象的却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改造结果。

在福特主义的战后民主国家，这些现象才终于真正获得了大众化的性质，它从汽车作为业余活动交通工具开始，又在大众旅游当中得到了延续。对旅行和充满享受地体验世界的美梦成了噩梦，了却心愿成了无情的讽刺画。因为在动员以这种方式扩张到“业余时间”之中的同时，业余时间也就成了企业经济作用空间幽魂般的延伸。以工厂方式组织“业余时间”就像“快乐带来力量”首创的那样，把无意义的劳动节奏天衣无缝地转变成了业余节奏。每天“下班之后”、每个周末和每年少得可怜的年度休假只是把人们从资本的一个作用空间推向了资本的另一个作用空间。由于人们在抽象劳动空间之外的私生活、兴趣和习惯被转化为对各种类型机器的（越来越个体化的）操作，所以，最终在资本主义驯化范围之外也就不存在任何社会领域了。于是，人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性质的感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已退化了（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消失）。这种生活形式不允许存在任何其他行为方式和享受方式，因为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空间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目的形式”进行了转变。当时已经过起了悠闲生活的恩斯特·荣格尔在他战后繁荣期开始时的作品《沙钟笔记》里用另外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用其他方式继续的劳动”：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那些穷苦人，如今他们正在设法休

养生息，这种休养他们也的确十分需要。那么我们就希望他们事先考虑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彼此关系密切，即工作和钟表。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休假了，因为这种假期只是劳动的继续。如果他们在周六中午驾驶汽车或者开着摩托车去往某个尽可能远的目的地，在那里纵情地享受上一番，到了周日晚上再驱车返回，给城市上空增添一阵嘈杂，那么只能说他们把自己一周的工作以一种更劳民伤财的形式继续了下去。他们无法逃离自动机器的魔力范围。他们无法摆脱钟表的节奏约束。按这种方式他们就总是呆在一个由轮子和转动的带子这两个形体所决定的空间里：这个轮子不停顿地旋转，那个标有数码的滚动带也无休止地运行着。这个轮子可以是钟表的齿轮或者交通工具和娱乐器械的轮子，而滚动带可以是街道、电影、走不到尽头的表盘。特别到了夜晚，在灰白的街道上飞驰的时候，这种魔力会变得很强烈。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专供享用的，而是一种巨大的循环运动的一个部分和片段。这种运动是设计出并且得意地享受着这种运动的那类人向外折射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是地地道道的工作。体育运动也同样拥有劳动性质，而且是它令游戏的自由运动受制于钟表和记录的魔力。因此它也不可能让人体养生息，而只是使劳动继续。这也表现在，体育运动一方面同成套测量方法，另一方面和金钱交易紧密相连……在诸多的动员形式当中，那些不容易被发现或者甚至欢迎的形式特别有效。我们设施的舒适特点如同一层薄薄的上光剂……”（Jünger 1954，第194及下页）

在这样一种致使“无一原子”能被容忍“不劳动”的社会制度里，大概也无法期待出现其他情况吧。在这里，荣格尔对福特主义世界各个发展阶段的定义和诊断有些混乱：首先，钢铁雷暴

现代派的英雄化文学中的“劳动者形象”还是在战争间隔时期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滚动带也将极权业余资本主义包括进来的无休止的运动便构成了那些所谓“得意地享受”类型的人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允许的条件下，这种“得意享受”只不过是鲁莽的疾驰者和愚蠢的旅行者可怜的感受罢了。其次，荣格尔也在相隔不过数行字的上文中只把那种无休止运动的“得意享受者”称为在“业余时间”里也自愿接受资本自身即目的的运动的动员，从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可怜人”。荣格尔自己对这种过程所做的分析否定了“劳动者”普遍的英雄形象。但是，霍克海默尔（Horkheimer）和阿多诺在10年以前就曾经更加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的观察力已经通过发达的美国的业余时间资本主义状况提高了敏锐程度：

“到了后期资本主义阶段，娱乐就是劳动的延续。那些寻找娱乐的人们都是想要暂时摆脱机械化的劳动过程，以在此后能够重新胜任它。但与此同时，这种机械化却有着控制那些休闲者和他们幸福感的威力，它在根本上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这就使休闲者除了得到劳动过程本身留下的感觉外，将无法得到任何其他的经历……只有让自己在休闲时去适应这种劳动过程才是惟一可以躲避它的途径……生产出来的产品预计到了人们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应，它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的物理性质关系——只要碰到需要思考的时候，它就不灵了——而是通过信号……娱乐是一种磨炼。娱乐工业不断地向人们发出指令……从日常生活中逃逸，这种有望通过整个文化工业各个分支实现的景况就像是美国幽默画报上劫持女儿的漫画一样滑稽：黑暗中手扶梯子的人正是那位女儿的父亲。文化工业又把同样的日常生活作为天堂提

供给了人们……这样的娱乐只会让人们更加心灰意冷，他们原本是想在娱乐当中把它忘记的……叮咚作响的不是小丑的铃铛帽子，而是资本主义理性的钥匙串，正是资本主义理性蓄意把乐趣与逃避的目的连接在一起……这样，娱乐的含义就无一不是：不必再作此考虑，忘记一切还可能出现的痛苦。娱乐的基础是昏眩。事实上这无异于逃避，但是却又不像所宣称的那样，是为躲避恶劣的现实，而只是为了逃避那些人类仅存的最后一点反抗思想……工业对于人类的兴趣只是纯粹把他们当成它的顾客和雇员，它事实上把整个人类及其各个成员都置入了这个令人筋疲力尽的公式……”（Adorno/Horkheimer, 1997/1944, 第158~169页，各处）

资本主义的大众意识将重心从劳动向业余时间，从商品生产向商品消费的转移，只是跟随着业余时间和消费向投资领域和一种资本主义“二级生产活动”的转化而已。不再面向劳动，而是面向业余娱乐的战后福特主义型人如今的生活进入了一个世界，在这里如果他不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资本的利用过程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不仅仅从严明纪律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必然听任“美妙机器”的碾磨。这样，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长期被分割为训练有素的工作机器和“业余时间”里的人性剩余部分，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可分解的人如今能够重新复元并足以让此前的一切文化批评都恼羞成怒，但只是作为一种延长为业余时间资本主义的极权生产方式普遍需要的功能人。

广泛形成的大众意识就这样渐渐接近了边沁主义的理想状态——一种资本主义达到“真正控制”的状态，其中甚至也包括了“梦境的控制”：它不只是通过让意愿和期望与发动机和休闲物品的商品消费相匹配，也不仅仅是用像汽车那样造成反美学

普遍环境的广告宣传来向人们进行精神灌输，而是建立一种包罗万象、媒介质的“情感控制”。当然，按资本主义标准形成的消费技术手段也对业余时间资本主义中的大众意识施加了影响。同样，广告宣传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上的无所不在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不主要是通过它们的直接目的，即刺激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而是作为一种意识的普遍形成过程。这种意识接纳了“整个广告宣传”的形式、“意义”和特有的美感，从而能够用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

意识教化的这些层面所具有的含义要大大多于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本应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那种陈词滥调，思想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这个普遍的事实并未说明，个人正多么深刻、多么广泛地被社会命令所左右。构成意识顺应社会教化的这种品性的并非是思考和感觉的特定对象，而是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让个人服从社会意识内容所具有的普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福特主义动员和业余时间资本主义所构成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的目标直指思想意识的更深层次，并以此超过了资本主义以往所有的行动。不仅对外表示的意愿和渴望的格式化，而且感情的格式化，即对潜意识的熏染也再清楚不过地揭出了资本主义的极权根底——而且只要这个伎俩立于不败之地，就能成功地掩盖这种极权主义。

这种做法的先决条件是用于意识教化的媒体工业。早在战争间隔时间，福特主义就已经以纯技术的方式把它们作为汽车的后续产品创造了出来；占首要位置的当然是有声电影、无线广播和电视。这些当时的新型媒体与汽车经历相同：它们在社会的广大范围内为大众消费而进行动员只是在战后时期才起步。于是，福特主义劳动国家实行的不再只是汽车独裁，而且也有媒体民主了。大众意识的民主化和促进“政治合伙”的官方意识形成鲜明对比，恰恰与政治遗散的现象携手同来，它却把动员移置到商业

领域，这与民主化潜意识 and 情感表达两者的强行一致化毫无差异。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个人情感收支预算的资本主义格式化，即一种对情绪的福特主义标准化。

这里的核心问题在 1944 年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就称作“文化工业”或者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业余时间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在媒体器材粗俗的物质品性中获得生机。“电视机”这个传输图像和声音的盒子只不过是技术性的载体——但承载的并不主要是意识以及情感的内容，更多的是它们的形式更换。适用于广告宣传的原则，基本上也适用于大众消费的意识产品和情感产品，虽然后者并没有直接的广告宣传性质。但它可收买的普遍特性吞食和淡化着所有内容，也就吸收了广告的所有意识和情感对象。同时，是福特主义生产条件也对这些意识产品先验地进行资本主义格式化：

“文化工业的组装特点，即它制造产品时采用的统一指挥的合成生产方式，从工厂生产的角度看，不仅仅在电影摄制室，而且完全也可能在廉价传记、报告文学和流行歌曲这些拼凑出来的劣质作品里早就具备了广告性质：因其具体要素是可分解、可代替的，各种意义关联也被从技术上异化，所以它所致力达到的目标存在于作品之外……”（Adorno/Horkheimer, 1997/1944, 第 187 页）

处于作品内容之外的目标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是对成为自身内容的货币永无止境的利用，就像其他工业系列产品一样，从这永无止境的货币利用中也同样形成了对意识的合理化生产。气氛、情感、意识形态、人际关系和“内心思绪”被简化为由结构成分和模块组成的基本材料库，可以将它们任意组合。意识模式就像汽车一样被生产出来，情感像是“T 型”车一样被

标准化。被资本主义占据的和标准化了的情感世界和社会气氛也以此受到利用过程的景气状况的影响：

“流行歌曲的传播……是瞬间的。美式英语里‘fad’这个词被用来表达那些流行的——即通过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势引发的——时尚，这一表达形式曾指称的现象早在极权的广告经理们贯彻实行那些文化的总方针之前就出现了。”（Horkheimer/Adorno，出处同上，第189页）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在60年代初批评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说它过于轻描淡写，因为它只局限于“所谓文化生活”的一个过窄的截面上。他还把这种现象的意义扩展成了“意识工业”（Enzensberger，1964）这个更广泛概念（几乎有点像是恩斯特·荣格勒的风格），他随之要求多少用些心计对这个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发展做出反应：

“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由此可见：每一种要求废除意识工业的批评都是于事无补和毫无意义的，其结果无异于干脆使工业化倒退、衰亡的自杀性建议……在致力于意识多样化的同时，（意识工业）也增强了它自身矛盾多方面的复杂性……每一种没有意识到这种双重性的批评……都是无用或者危险的……关键并不在于要让意识工业休克，而是要参与到它们的危险游戏里去……”（Enzensberger，1964，第12及以下数页）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如果只严格地与狭义的文化领域有关，那么它的覆盖面就肯定过窄，但至少阿多德和霍克海默尔没有持此见解。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涉及面更加广泛的文化概念，也包括



了日常生活和与它相关的业余时间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工业”概念不仅是“大众文化”概念的代名词，也与“意识工业”概念同义。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意识和大众意识、“真实性控制”、“梦境控制”和“情感控制”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通过生产资本主义和业余活动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通过间接和直接对意识格式化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不是单纯通过相关工业特有的意识模式和情感产品达到这样的效果。

正如意识工业迄今为止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遍的干涉行动不会被知识分子们的个人游击活动姿态破坏。而倒退的文化悲观主义和违心的参与终归是错误的抉择。因为问题就出在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本身，这种形式在福特主义的历史性突破中把“美妙机器”的极权要求作为业余时间资本主义扩张到了超出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以外的剩余时间中去，甚至扩张到了情感活动中。所以，也不能孤立地批判和反抗这些极端的现象。资本主义已膨胀成普遍的世界体系的态势曾经验证了一句口号，现在它也非常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要么竭尽全力，要么干脆别做。

偷偷地给文化和意识工业强加上可作批判对象的内容并不能够给反抗提供机会。而事实是，资本主义尽管经历了福特主义的极端膨胀，却依然没有能够圆满地达到极权，时至今日，大众意识中还留有空隙。一方面被分离出去的那些被定义为“女性”的再生产领域没有能够被福特主义工业和服务业完全吸收，另一方面大众意识和文化工业的格式化也并未完全相吻合。但人们缺乏理论意识和社会运动力量来为这些空隙装上批判的杠杆，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工会和左派知识分子都同样不仅出身于这种已经发狂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理智，而且也一直都共同塑造了极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新形态。汽车化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意义，就如同福特主义意识工业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就像在早

期发展阶段中一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崛起的阶段中，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左派社会批判界无论是否自愿，都属于资本主义极权化过程的开路先锋。

## 极权的民主

最难以识透的是1945年以来在福特主义发展中形成并成为主导的意识，当然难就难在已神圣化的民主本身的极权性质。汉娜·阿伦特和其他极权主义理论家所采取的那种把目光凝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的做法遵循的标准是，始终只允许在政治领域之内对比民主形式和极权国家形式，同时，这两者的区别并没有被当作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不同中间阶段，而是相互对立的“模式”来看待。按照这种观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选举自由似乎是独裁主义截然的对立面，也是“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保障。

这种憧憬并不新鲜。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梦想过，按照“一位公民，一张选票”的原则（妇女的选举权是到了20世纪才产生的）通过民主程序使——当然是被片面理解的——资本主义“落选”。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对手们原封不动地相信了他们，于是争取选举权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成为了政治领域中社会争斗的主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机器的本质却被掩盖了。但当世界大战偏偏在巨大的人类屠宰场里滋养了民主的时候，很快就证明了，民主政治到头来只不过是发展为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而已。其先驱们还从未用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一贯口是心非，现在以大众民主的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公开的政治决策无条件服从经济命令，自由讨论也别无他法地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机遇和风险”的思考——“双重思维”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在自由西方的民主国家中更巧妙地完成

极权主义的融入。

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极权主义的先锋们也谙熟此理。与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保守派政体不同的是，他们所具备的民主品格仅仅表现在，他们完全有意识地把“大多数劳动人民”也视为政治动员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假如裂变为原子个体的民众不作为“更高目标”的材料以似是而非的“自行负责”方式投身到对自己熔炼的话，那么起初在全面战争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就难以持久。鲁登道夫也从这一角度解释了现在被赋予大众民主意义的“人民”概念。这个概念不仅仅被纳粹、国家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和东欧后来的“人民民主国家”滥用了，而且过去和现在都还一直被“自由的”西方民主国家滥用着。鲁登道夫明确地表示，“大众和国家的民主化”正是极权主义提出的要求：

“在我头盔的雄鹰上还刻着这样一句话：‘愿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这句话也包含有这层意思：上帝并不保佑人民，因此这句话是有欠缺的。今天，在全面战争中，‘人民’这个字眼以及人民本身都变得举足轻重……在全面战争中，最终作战的不是国家，而是‘人民’……全面战争的重点在于人民。全面战争的领导也要指望人民。全面政治必须为之提供人民的力量和获得人民的支持。”（出处同上，第28页）

这里又一次从全面战争直接的军事背景中透出边沁主义的一种认识，即在民主国家比在任何其他国家形式里都能更顺利、更廉价地在资本利用过程中支配人力资源。原因很简单，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的两极，即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民主国家中，它能够以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一方面人

们提出了这样的抽象要求：社会要自觉地去了解那些共同的事务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民主”）；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同时公开承认是一个独立体系的自动调节机制，这个体系的功能法则已经沉积为一种伪自然事实（“市场经济”的别名就是资本主义）。

事实上，社会生活归根到底绝不是通过社会成员的民主讨论和有意识地共同决策来控制的。因为自由言论的发表、政治见解的形成和自由选举的进行这些民主程序绝不是匿名市场的“社会物理学”发生作用前，而是在其后启动的。那些民主机构的所有决策并不意味着拥有明智地使用共同资源的自主支配权，而总是预先就已由经济体系的自动运行机制确定下来，而对这样的自动运行机制本身却恰恰是不能民主商讨的，因为它被归入不可摆脱的“自然”。这样就使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最疯狂的、最荒谬的动员也被先验地看做是天经地义。

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分立的“三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背后——每本民主社会政治教科书都效仿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1689～1755）来这样称呼它们——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无声无息的“第四权力”：极权市场体系的结构权，也就是资本利用的调节和实施的作用范围；资本的利用如今已在“抽象劳动”的企业经济作用空间内实施，并超然广义的买与卖只是间接地具有社会性。自卢梭开始，嘲弄了所有民主程序的经济神祇在政治理论中用抽象的“公共福利”这个头衔粉墨登场。由于所谓的社会只被荒谬地看做是政治性的，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本身又归属仿佛超出社会以外的“自然”，所以民主地确立的“人民主权”也就理所应当不可能触及资本利用及其市场机制的“第四权力”了。

这种荒诞的社会总体状况不仅促成了一种客观化的结构和盲目的事物规律性的产生，而且也形成了社会成员与此相关的主体形式。国家对市场和政治对经济的客观、具体的依赖关系便按这

种主体形式再造而成。在作为政治民主主体的社会成员开始行动之前，甚至在他们开始思考之前，他们就已经被限定为匿名市场上的“劳动力”和竞争主体了；在这种成为公理的限定之外，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也都是不成立的。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边沁主义的陷阱。只要在定义上得到民主言论承认的社会公理不失效，那么就无法逃脱出这个陷阱。

民主程序的诡诈本质之所以难于认清，关键原因在于，人们作为一种独立的、自身即目的的体制的“劳动力”的社会地位早已经进入他们的思想深处，并且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其他任一更加理智的社会定位形式了。而且客观化的体制过程绝不是以只还能被观察和被监督到的单维和直线的方式运行的，因此这种公理地位也就更被巩固了。而正好相反的是，这种体制自动地在其自身的范畴中持续派生出种种其他选择、不同的可能性以及运行形式，而后再用民主政治对它们进行加工。不过，这些供选择的途径都只允许在资本主义严密封闭的框架之内采用。进行民主洽商的也就是一些从一开始就事先设定的表面文章，也正是那些盲目的社会物理学“自然过程”产生出的那些其他选择可能。民主决策过程原则上是按照“多项选择”程序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诸多列出的、数量限定的选项中只给一个选项“划记号”。荒唐的是，人们面临的经常是在瘟疫和霍乱之间进行的自由选择。而在所有被预设的可能性范围以外的一个选项，也就是一种摒弃整个格局的抉择，它也必然会对这种程序本身置疑，那么它在结构上就绝无立足之地。

既然 19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为民主政治的自我调控做出了表率，那么极权国家对民众的动员、鲁登道夫的“全面政治”以及这个大众民主的融入就真正启动了。战后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结构调整，即从“全面政治”转向“全面市场”，也在政治的意义上稳定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阶段：民众不必再直

接接受政治动员，以在游行和有组织的大型集会上练习民主程序了，他们只需作为被动的投票牲畜老老实实地坐在政治剧院的观众席上就足够了。于是，对普通公民而言，民主程序就此被简化成了一种从属的多项选择程序，即隔上那么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政治党派的名单上“划记号”。这样一来，战后时期的各个党派彼此越来越相似，以至于令人分辨不出他们在各自的纲领和行动方式方面有什么差别，而这正是拥有霸权的美国的两党制早已经达到状况。

但福特民主的极权主义性质不仅间接表现在经济命令事先规定好的极权独裁里，这种极权独裁只允许社会成员在盲目的体制规律性的不同弊端和（或者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不同执政者之间进行“选择”。广义的行政权，即对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官僚主义管理——自从它在专制制度下产生以来，就一直以各种国家形式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战后历史的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中也达到了鼎盛。如伯纳姆这样的社会学家们预言的那个“被管理的世界”到现在才完全名符其实了，因为拥有完全机械化、全套后勤基础设施和福利国家保障的福特主义全盘资本主义需要广泛的、空前严密的国家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战争经济结构以民主方式的延续和持久发展与新展开的市场竞争在更多的具体方面越来越和谐，调节和监控机构因此而逐渐畸形膨胀起来，而各种政治观点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只能触及其皮毛和枝节了——有句话十分贴切：“政府往来更迭，极权管理的暴虐却依旧”。

事实上，今天的民主国家和世界市场康采恩的官僚机构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类型的管理密度和干预可能，甚至20世纪上半叶的极权国家专政统治也望尘莫及。认为事实正与此相反的观点只是一种错觉。如果说极权国家的要求显得比战后社会的民主要求更加严厉的话，那么这也只是因为官僚机构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束缚的笨拙企图造成日益激烈的冲突，因而愈来愈引人注意的

缘故。随着极权主义的要求从国家转向市场，促使监控和管理机构更加准确并几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配合市场竞争机制，而市场竞争机制同时还在不断增强，其活动领域也不断扩展。

这样，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里，自1950年以来，极权的边沁式结构体完全符合其创始人的初衷，达到了它到那时为止最为完善和最为广泛的形式。边沁模式的社会总监狱中各种机制的协同运行从未像在发达的、全面法制化的民主制度中进行得如此完美过。就连最简单的日常关系的法律调控——它在民主国家中最终掩盖了原本的暴虐王道——也恰恰先入为主地把人定义成社会的自动利用体系中的“劳动力”和内部主体。

这样一来，一方面，人力资源不再是单单按照意向和要求行事，而是实际上处处受到资本主义定型的建筑风格和信号系统、受到企业经济合理性客观化的并有技术伪装的结构和受到按资本主义移植的法律主体属性的左右，而同时，国家机器则能够随时随地在悄然无声的状态中实施人员管理。另一方面，经济主体在业绩暴政下的自我监督和民主国家公民的自我调控现在与资本主义的环境条件如此地一拍即合，从而可以使民主决策过程走过场的程序顺利地极权的社会经济苛求的封闭空间里转向压制性的虚假选择上。就像嘲弄人一样，通过所有社会渠道都在向已自动化了的民主型人发出令人厌烦的说教：现在你终于在政治上和个性上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

然而从一开始起，民主程序中就存在着一种不稳定性，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刻骨铭心的强制条件。在“自由和民主”光滑的表面下，社会中潜在的恐惧和仇恨继续萌动，这种恐惧和仇恨就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因竞争状态和“抽象劳动”的精神荒芜而生。由于民主不过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机制的一种深入人心和形成法律的独裁统治，所以，只要“美妙机器”一停止运行或者出现运行故障，这个民主就随时都可能冲破自己的外

衣，转回公开的暴政状态。

不过，即便是在相对繁荣的大好时光，任何反对这种民主的行动，只要哪怕是无意间造成了要跨过民主铁笼界线的威胁，也会立即遭到无情的镇压。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西方世界（更不用说周边那些友好的独裁国家了）就有过无数次动用警察镇压其实还并没什么影响的少数左派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镇压行动，事实上，这同越来越走下坡路的东方国家极权主义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互补性镇压如出一辙。由此看来，战后民主国家使十八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毫无遗漏地继续了下去，只不过因为出现的短期繁荣，而不必再那样煞费苦心。

但现在——伴随着道路上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总数更多的遇难者、受伤者和监禁者，数目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从美国和英国的所谓“种族动乱”一直到联邦德国的老客（身穿黑色皮衣骑着摩托车成群结队地呼啸过市的青少年——译者注）骚乱，被驯化的民众隐藏在内心的种族仇恨在整个西方世界也不断地爆发。和平外表下燃烧的种族主义火焰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不可救药的反犹太主义综合征也是这样。特别是在德国，原本最有必要追根寻源地进行彻底的历史清算，但却不了了之。民主的德国只是在表面上和肤浅的道义上与对犹太人的谋杀拉开距离。“种族的”血统意识形态时至今日都还根植于德国的国家公民权利之中。反犹太主义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毛孔之中。（1943年出生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拉尔夫·施内尔（Ralf Schnell）把这种带有德国特点的场面记载了下来，除此之外，其他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对此作了大量描述：

“反犹太主义？记忆中的画面迅速地在脑海里闪现，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青年人的活动场面，在无法理解的往日



那疮痍满目的背景下塑造起的文化形象：——那位被截去了小腿，右眼是玻璃眼球的历史老师在五十年代奥尔登堡高级中学的十年级课堂上……‘讲授着’国家社会主义，他在讲到第三帝国驱逐犹太人之时插言道：‘犹太人——他们也是一个累赘！’停顿、寂静、恐惧，迅速略过书桌和长凳的束束目光……——小市民家庭午餐桌上的家庭谈话，话题经常围绕着这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通常的辩护姿态会振振有词：那以前又该怎么做才好呢？毕竟：高速公路！600万？从没有过！忽然，有人顺便提起了那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叔叔是怎样‘进了集中营’——‘但这就没办法了’……——一个相识的老妇人受到了一个高年级学生养的刚毛犬的惊吓，半厌恶半小丑般绝望地喊出：‘你看上去简直就像个犹太人！’——一位母亲告诫她毕业了的孩子说，不要再读那个犹太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那么多的作品了。而当儿子——虽然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作这些解释——尽量让妈妈明白，那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他只是个共产主义者时，妈妈虽然半信半疑，却平静了许多。”（Schnell, 1998, 第7及下页）

在共和国上上下下众多人的记忆里都不难找到这样的情景。我在童年时代曾经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没有显得“像犹太人那样慌里慌张”。而别人对此所做出的回答，更是让我如坠云雾之中：“人们就是这么说了。”1966年，就在大学生运动爆发的前夜，我当时还住在祖父母的家里。我接待了一对来自于敌对的原民主德国的年轻学者夫妇。那时的一幕简直让我终身难忘。我那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祖母却把我叫到走廊里，低低地对我叫：“罗伯特啊，罗伯特，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我们的晦气啊！”我那信仰上帝的外祖母哪里知道，她竟然是“引用”了尊敬

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一句话，就在1999年的今天，我们城市的一条街道还是以这位历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

德意志民族正用它狗一样的舌头舔着一个家庭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当选的总是社会民主党。即便到了今天，同一城市里的社会民主党总部还被无辜地称作“卡尔·布勒格尔之家”。或者，拜罗伊特的艺术节还持之以恒地是德高望重者们的活动，就好像什么都从未发生过一样。即使在原东德，国家社会主义也只在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肤浅意义上被清除过，而“种族的”反犹太综合征也如同在原联邦德国一样曝光不足——“国家人民军”的普鲁士正步可以以“民族遗产”的名义雄赳赳地走下去。总之，现代化历史中的妖魔从未被驱逐过，因为它就属于以形形色色变体出现的资本主义，并因此也属于民主这个血腥的门神。繁荣时期只是那些妖魔的冬眠期，我们仿佛还能听得到，它们正在喘气呢。

### 短暂的经济奇迹鼎盛时期

根据事后的观察，我们现在几乎无法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际繁荣的历史时期有多么短暂。不过，当年的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此时提出的口号“全民福利”虽然没有成为普遍的事实，但作为前景在一种受消费资本主义浸染的意义上，至少在主要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身上已经兑现。众所周知，“经济奇迹”是在50年代后半叶才出现的，而到了70年代中期就戛然而止了。在新型工业广泛地吞并了“传统行业”之后，福特主义的动力就耗尽了，而当膨胀势头刚一过去，合理化就开始在大规模生产中逐渐减少人员使用量。白色和棕色产品的市场饱和阻碍了经济增长，只有机车制造的扩张还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总的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形成大

量新的购买者阶层了；在很多工业分支当中，需求主要是备品配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范式明显在衰落。联邦德国增长率的变缓为此论断提供了依据：

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百分比）

	1951	1955	1960	1965	1967	1970	1975	1980
联邦德国	9.4	11.8	8.8	5.3	-0.2	5.0	-1.3	1.0

资料来源：德累斯顿银行，统计附录，1999。

如果从总体上观察一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回落的局面：

每年实际平均增长率（百分比）

	1960-1973	1973-1979
美国	3.9	2.5
英国	3.1	1.5
法国	5.4	2.8
日本	9.6	3.6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史统计，1995。

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势总的说来虽然相同，但是它们的原动力却体现出时间差别。在美国，福特主义的推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达到了它的顶峰，1940到1944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每年达到了15%——此前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样的高增长率；而后，50年代中的一段时间内，联邦德国达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日本则是到了60年代才使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两位数。

在不断升高起点的基础上要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率十分困难，

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产品总量必须出于两个原因超比例提高：一方面，生产水平的绝对值要求产品数量相应地达到一种更高绝对值——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生产1万台电冰箱，对它而言，继续增加产量就比对于一年产量1000万台电冰箱的国家容易得多；另一方面，这还不单纯关系到物质产品的产量，而且也涉及其中包含的经济价值，生产率越高，产品的经济价值就越低（这可以从独立于供求关系的价格水平的降低上表现出来）。只有物质产量的绝对增长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增长很有可能意味着创造的价值在降低；所需要的增长应该是：虽然每件产品价值降低，但仍旧会带来价值创造的绝对增加。但如果在价格降低的同时仍旧不能构成新的顾客阶层，从而使市场无法扩大的话，那么增长就会逐渐衰竭。如果我们把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分别作为整体比较一下，那么人们对福特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倒退就理解得更加透彻了：

“首先，1958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突出的特点是经济膨胀，这样的膨胀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短短17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增长了130%。平均年增长率是6%——这种增长速度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并非对个别国家）绝对是历史性的杰出成就……但在1975年到1987年之间一共只增长了约25%，年平均增长率还不足2%。如果作一下历史性的回顾，它也是低于‘正常’值的，也就是说这种增长率相当于早期较长的危机阶段，特别是1929年到1937年之间的发展。当然，总体水平是无与伦比的高。”（Goldberg, 1988, 第11及下页）

伴随着这种从历史高于平均增长率向历史低于平均增长率的

回落出现的是投资相对减少的现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萧条是持久的，而且原因并非出自景气状况，而是结构性原因所致。联邦德国的相应数据完全可以说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问题：

	1950~ 1960	1960~ 1970	1970~ 1980	1980~ 1986
固定资产净投资每年变化率（百分比）	11.3	-0.3	0.7	-2.8
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百分比）	16.9	16.9	12.8	8.8

资料来源：Goldberg, 1988 / 联邦统计局。

然而，增长回落的局面却又因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而雪上加霜，这决定着凯恩斯主义的命运。凯恩斯原来设想只限在危机情况中把有利于额外的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费用的“赤字财政”当成“推动助力”使用，而在繁荣时期，则借助于货币政策谨慎地通过利率升降水平来控制投资。但事实却恰好与此相反。虽然包括联邦德国的保守派自由主义政府在内的战后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正式承认凯恩斯，但是它们却毫无节制地推行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国家在繁荣时期还增加投资。在60年代，经济学家哈罗德·拉什（Harold Rasch）就在一篇批评性调查报告中评价了“经济奇迹的融资”：

“谈到‘德国的经济奇迹’，我们通常会想到私营经济所取得的成绩，是它们使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而事实上，国家当局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不断加强……按照德国联邦银行在1964年8月所作的汇总，1963年公共投资上升到了近300亿马克。与其他公共支出以及总的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总投资相比，它的增幅都更大。”（Rasch, 1966, 第52及以下数页）

换句话说，“经济奇迹”原本就不是自己独自形成的一种繁荣，至少达不到这种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规模。事实上，在它达到最高点之前，国家就通过“金字塔项目”对它产生了刺激：首先自然是为使世界“适应汽车”而大兴土木。如果不是借助于超比例的国家投资行为的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增长成分就根本无法在内源性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独自支撑这么久：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相对比例降低的同时，国家在投资中所占比例升高了。但是，尽管处于繁荣时期，国家的这种额外支出还是远远不能通过当时的税收得到补偿；它们已经大大超出了“赤字财政”：

“‘资产流动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来自于举债……如果国有法人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的话，那么国家方面购买力的提高就被债券认购人那里相应资金的约束所抵消。但是，如果国家的支出是靠或多或少的短期贷款来筹措的，就像在国库——还不仅仅是暂时性的——亏空时那样，那么局势就危险了。这样调动起来的需求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的效应……在持续多年的过度增长后形势岌岌可危，令人忧虑……特别要看到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另一方面是价格水平，虽然在过去15年中都呈持续增长的气势，但也使得德国马克不断贬值。这种两者并行的情况肯定不是偶然的。在当今的经济中，每一种增长都是靠信贷来融资的。如果随之产生积蓄，则货币价值就会保持不变，反之就会贬值。德国马克的贬值清楚地表明，对国民生产总值提出的货币要求经常过高……”（Rasch，出处同上，第57页，第107页，第162页，第176页）

自此之后，保守自由派人士们的口中总是不断地吐出这种结

论，例如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就曾在 19 世纪说过：“社会不可能超越它的景况生存”。但是这种预兆不祥的“景况”正是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非理性景况；而无法“超越”这种景况生存所指的无非是，它很快就会遭遇到危机的限制。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动用它现有的实际人力和物力资源，那么从纯物质的角度来看，它自然根本无法超越它的景况生存。但只要这种景况的决定性特征自我反馈的货币积累运动，那么社会就必须在历史发展的台阶上不断地超越它现有的货币景况，以便起码部分地保持住其膨胀的生产力。

这种表现出资本主义基本自我矛盾的疯狂状态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重新抬头。如果当时政府坚持遵循了保守派先辈英明的金融政策的话，那么经济繁荣期一定很早就结束了。然而，通过继续实行“赤字财政”的手段，政府把繁荣期又延续了 10 年。但是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便又开始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周期。当时国家不合常规的货币制造还没有达到凯恩斯所说的“临界值”；通货膨胀也就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它却因“潜滋暗长”或者——时隔多年之后来看——“非同小可”地再度引起了关注：

“这种衰退现象绝不是仅仅局限在外国货币上。世界上的几种重要的主导货币当中，就在 1971 年年初的今天，就已经没有一种还拥有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1/3 的购买力了。英镑属于世界贸易中最重要货币之一，现在的购买力还不及它在 1939 年的 20%。法国现在的货币购买力仅为战前法郎的 1%—2%。虽然瑞士法郎的稳定堪称经典，但其价值在 1950—1970 年间的 20 年中，按照生活费用支出指数来看，也贬值了 38%。和战前的 1939 年相比，这个典范货币在 1970 年只剩下它原有购买力的将近 30%。美元的贬值

比例与瑞士法郎几乎丝毫不差，这个西方世界经济主导货币的购买力在1970年降低到1939年的31%……德国马克在1970年仅剩下1950年购买力的一半了，此后在1970年几乎8%的通货膨胀率，按照国民总值来衡量，其下跌曲线的陡度也不会更小。”（Slotosch, 1971, 第19及下页）

增长率的降低和通货膨胀的升高平行并存是一种新情况。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滞胀”的现象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新质的结构性危机已经渐显端倪，但当时它的轮廓还尚不清晰。在这种“滞胀”形势中，失业问题再次突出。福特主义的“充分就业”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开始，景气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由合理化决定的）的混合局面只是慢慢延展，而到了70年代中期，失业人数爆炸性地猛增。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一的联邦德国的典型情况中可见一斑：

联邦德国的失业人数（以百万计）

1960年	1967年	1975年	1981年	1985年
0.27	0.46	1.07	1.27	2.30

资料来源：德累斯顿银行，统计辑录，1999。

这当然不只是德国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席卷整个世界商品生产体系的“就业危机”一直在不断恶化。国有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不合常规和肆意的货币制造和行政干预暂时性地避开这种危机，从而维持住“充分就业”的假象并以此（在一个始终很低的水平上）纯粹在险面上争取好看一些；当然付出的是随后走向衰退的代价。在以美国为首的通过扩张世界市场关系统一发展起来的西方世界中，失业人数在总体上一一直在上涨：



核心国家（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  
失业人数（以百万计）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85年
6.6	6.8	14.3	20.7

资料来源：Goldberg, 1988, 第13页。

但是，社会上的公众意识对福特主义膨胀显而易见的结局所表现出来的漠然着实令人惊讶。人们对相关征兆虽然已经有所觉察，但却没有把它看做是一种新的制度危机的开端。公众意识一直还停留在以前的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宁愿把这些新出现的危机现象归咎给1973~1974年的“石油价格震荡”，石油输出国的卡特尔（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曾经以此让正在进行动员的世界大为震惊。所有西方杂志都发表了多多少少带有种族色彩的反阿拉伯国家的煽动性长篇大论。特别是美国明确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将用武力手段来使中东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储备得到保障。自此之后，西方的航空母舰不只一次地驶入中东地区。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业燃料由煤转为石油，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可以被看做是一次能源革命。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任何不利于这种古生物能源载体供应的可能性都反应非常敏感。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全面动员，必须要有廉价的汽油作为基础。另外，资本主义的世界警察也要显示一下它的厉害。美国对越南发动示范性侵略就是想藉此表明它要对全球进行军事控制的野心（在越南失败之后，它随即完成了另一个更成功的项目，即“除掉了”前苏联这个国有资本主义的对头。）

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价格震荡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经受严重萧条打击的根源，而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既然已经把这种崩溃称作“石油危机”，不过是人们牵强地想要把已开头的资本的内源危机美化成“外部引

发”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通货膨胀虽然通过用美元换算的石油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加剧，因为以此方式，美国因越战的巨额支出而尤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便乘机转嫁给了世界市场。但是，新的通货膨胀周期开始的根本原因却是“赤字财政”滥发的货币，这种货币制造方式是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来延续福特主义经济繁荣的手段。

短暂的经济奇迹鼎盛时期是“持久繁荣的好梦一场”（Burkart Lutz），但没有人愿意承认已从梦中醒来。撇开资本主义的市场人差得出奇的历史记性不说，部分的原因肯定也在于经济繁荣时期造成的机构性积重难返：大量这一时期实行的社会福利都以法律或者劳资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无法在繁荣期结束的时候自动取消。事实上正当为清偿“福利国家”的债务而进行的长期奋斗至少是在西欧大陆至今都还未告终时，民主国家社会科学的学究们却还洋洋得意地固守着其错误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满足了需求。所以，人们只需要通过“合法”的和在机构控制下的讨论分析就一定可以找到调整它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德国的御用批评家哈贝马斯教授尽管还在新的危机过程之中就乐此不疲地鼓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扩展：

“正统马克思主义难以清楚地解释国家干预主义、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的概念……即使制度问题首先是在潜伏着危机的经济增长运行模式基础之上产生的，经济的种种不平衡现象也可以通过国家填补市场功能空白来协调解决……旨在发展福利国家的政策有朝一日自然会面临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进退维谷的问题在于，福利国家不仅应该抵挡住以资本主义方式组建的就业体系的直接消极影响，而且也应该消除受资本积累控制的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却不可能触及

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结构和促进机制……只要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能够成功地消除国家干预主义、大众民主以及福利国家面临的结构困境，那么就能形成种种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按照过于狭窄地侧重于经济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这些结构肯定是悖论式的……在福利国家，让就业体系扮演的角色被规范化了……而听命于他人的劳动性质所产生的压力，即便不是通过劳动岗位的‘人道化’，也通过金钱补偿和法律保障至少在主观上变得可以承受了……这种规范化的就业者角色和增值的消费者角色之间的新型平衡是……福利国家在大众民主的合法条件下做出安排的结果……”（Habermas, 1981, 第 505 页, 第 511 及以下数页）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甚至哈贝马斯也不得不承认，“福利国家的发展走进了死胡同”（Habermas, 1990/1984, 第 123 页）；不过，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得出下述结论，即“社会福利国家工程”可以在“更高层次的反思水平上继续下去”（出处同上，第 124 页），而且要采取一种“离我们的社会政治课教科书中的那些规范设想并不太远”的形式（出处同上，第 125 页）。用“社会政治课教科书”的咒语对资本主义危机这只几乎被忘却的“狼”再次光临做出反应——左派民主主义的学究们这种典型的想法让人对正统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的危机反思实在不敢恭维。

## 世界毁灭和意识危机

在福特主义繁荣的转折时期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对“持久繁荣”的期望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与此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动员也明显带来了繁荣的一个后果——危机的一种新规模：自然的生活基础广泛遭受破坏。“抽象劳动”的逻辑和与此相连的企业

经济向外转嫁的成本（向整个社会，向未来，也同样向大自然）使得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事关本质的内容无动于衷，并且也以此违背了自然环境本身的逻辑。早在十九世纪，这种制度就已经臭气冲天了。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中，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曾经把英国工业城市的水域描述成“令人作呕的阴沟”。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统治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那么其破坏性潜力虽然已经显而易见，但还尚不会构成普遍的威胁并退到社会经济问题之后的位置。而随着福特主义的全面动员的进展，不仅社会再生产的“传统领域”消失了，而且大自然也完全听凭抽象的企业经济利用逻辑的摆布。

70年代初，许多科学家将“自然资源的极限性”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这些资源面临着被工业界滥用耗尽的危险。在“石油危机”中，当汽车在周日禁行时面对空荡荡的街道和高速公路的一片死寂，当没完没了的发动机噪音终于停歇的时候，已让人体会到这种危险的滋味。“罗马俱乐部”（Meadows, 1972）曾作了一次关于“增长极限”的研究，其同名研究报告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论。其中着重谈到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逻辑和自然原料之间的关系：

“每年的增长都遵循着一个模式，数学家们称这种模式为指数增长……指数增长是指一个数值在相等的时间段里都增长以前一个数字为底的某一百分比……虽然指数增长……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它却总是不断地给人们带来震惊，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有这么一个古老的波斯传说，讲得是一个宫廷侍从向他的国王献上了一块精美绝伦的棋盘，他只向国王请求这样的报酬：为棋盘的第一个格子，他只要一颗谷粒，而后面的每一个格子他都要前一个格子谷粒数的两倍。也就是说，第二格两颗谷粒，第三格四颗谷粒，第四

格八颗谷粒。这正符合增长率是 100% 的指数增长；在第 10 个格子上还只有 512 颗谷粒，而到了第 21 个格子，就已经超出了 100 万颗谷粒。而整个地球上所有的谷粒都达不到第 64 个格子要求的数目。指数增长是有迷惑性的，因为即便增长率比较小，在短短的时间内，它也能增长到一个天文数字……就像指数增长的土地需求很快就会达到可使用土地的极限一样，与此类似，呈指数增长的原材料使用量也会迅速地耗尽现有的储备……在我们讲清楚了指数增长会多么迅速地达到最大极限值之后，就几乎不会再吃惊，按照当今消费增长的趋势，100 年后，大多数今天十分重要的和不可再生的原料将会变得极其昂贵……”（Meadows, 1972, 第 18 及下页，第 51 及以下数页）

不过，在这些有声望的科学家们的这番批评中，企业经济合理性的破坏性质被最巧妙地间接表达出来，但不是作为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性质，而是作为“工业社会”令人惋惜的副作用。这样，自我回馈的货币之负面的社会抽象性质就又隐没在工业技术现象之后了。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和“罗马俱乐部”都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即增长困境的关键是否肯定在于世界人口的增长——这样，他们在顺应了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周期开始的前提下，又在表面上用批评的言辞再次重复了神父马尔萨斯的恐怖论据。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生态危机”（现在是这样称呼的）不断恶化。人们恍然大悟，今天的问题不仅在于长期对原料的消耗。盲目地吞剥未来果实的世界机器不仅以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消耗了过多的古生燃料和金属等，还大肆污染和破坏了自然生态基础，其规模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土地、大气层、水域和生态内部系统（热带雨林、阿尔卑斯山脉、北海、地中海、贝

加尔湖等等)。80年代，萨浮索（意大利）、博帕尔（印度）、切尔诺贝利（乌克兰）的典型工业大灾难的不祥之兆都显示了商品生产体系在福特主义中所达到的毁灭世界的的能力，而且表明，具有毁灭能力的绝不是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军事灾难，而是发展成为全面世界体系的、十分“正常”的“美妙机器”的日常运行。

不管是森林大面积的死亡还是臭氧层空洞，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不管是物种灭绝还是新型疾病：生态破坏禁而不止，一直持续到今天，甚至还加快了它的毁灭过程，原因显然在于全球规模的福特主义燃烧经济。不过几乎能令人欣慰的是，正在创造着资本价值的先生们在他们相当敏感的部位也受到了他们经济上自身即目的的放纵行为后果的报复。据一位法国性学家格扎维埃·博凯（Xavier Boquet）推断，单纯是由于开车的辛劳，巴黎的一半男性居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阳痿的困扰。而且还不仅此而已。最近调查结果表明，现在水域中存在某种化学物质的沉淀物，它主要是在塑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能够形成一种类似于女性荷尔蒙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在人体中还喜欢附着在与女性荷尔蒙相应的受体上。其结果是：这些物质能够跟自然女性荷尔蒙一样引起相同的生物化学过程。它会降低男性血液中荷尔蒙的水平，“细小的阴茎”便会由此而生。丹麦医生尼尔斯·斯卡克拜克（Niels Skakkebaek）发现，自1938年起，男子精液中的精子就已经迅速减少，而与此同时，睾丸癌的发病率却增长了两倍。在全面动员的燃烧消费里被社会化了的男人必须让自己适应这一切，并且某种意义上是在被福特主义“阉割”之后再去驾驭自己的威严力量。

官方社会之所以掀起关于“增长”极限和其破坏生态后果的争论，为的是能够用更好方法排斥这个问题。东西方性质相同的生态灾难当然不会被认为是由于商品生产体系共同和同样的“价值”抽象形式和这一体系非理性的强制导致的，而是一部分用

“文化批评”和肤浅的道德说教讲尽说绝，另一部分则转化为不负责任地鼓吹所谓“经济和生态的和解”的宣传。所有这些局部的认识都不了了之，因为“美妙机器”按照它的定规继续盲目地运行着。整个世界体系还没有产生义不容辞地采取拯救行动的紧迫感，因为很多不直接起作用的生态环境毁灭过程超越了个人的生命长度并可能作为某些地区性灾难延续很长时间，而那些地区性灾难只是让某一部分人受苦，他们只能自认“倒霉”了。由福特主义的众多机构扶持的伦理和精神训导工作在此间把生态危机加工成了资本主义的道德“整容手术”。

尽管存在着很多息事宁人的意识形态和错误的姑息思想体系，但第二次工业革命气数已尽的局面却不能完全被否定。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觉察到了大范围的“福特主义病症”。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恐惧驱使世界市场民主国家内部开始形成新的右翼极端主义，它首先以古老的政治形式要求进入议会。这样，自从联邦德国1967年的第一次战后萧条以来，危机的每一种新的推动力量都以一种鬼使神差的规律性地把新纳粹党派推进了州议会和乡镇议会。

另一方面，青年和大学生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了，它们反抗的是诸多方面的统治制度。在福特主义繁荣时期长期的国泰民安之后，按其达到高潮的年代命名的“1968年学生运动”从理论以及实践上都难成气候。资本主义现代历史中所有的社会解放设想都再次被努力地挖掘了出来并衡量其可用性。几十年以来，第一次（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又有人斗胆尝试实事求是地重述马克思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巴黎的五月”仿佛震动了这个制度的基础。1968年出版了一本收录了反叛文章的集子，其中，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用已经长时间没有听到过的言辞抨击了极权的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本性。杜奇克指出了生产力巨大发展与福特

主义劳动和效果密集度之间荒谬的矛盾性：

“（资产阶级的本性）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从而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远离物质贫乏地生活，遵循着这样一句格言去生活，即‘所有人都应该可以满足温饱和少做工作’（Horkheimer）。资本主义本性的矛盾恰恰在于，这些由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这些累积起来的财富……与它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因而也与它形同陌路……今天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历史理论，而是对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反感，它一方面鼓吹自由，另一方面又刁滑和残酷地压制个人和为其社会经济解放奋斗的人民的直接利益和需求……在斗争中又产生了新的激进要求，比如最终让生产力的极权……挣脱资本和民主枷锁并采取各种方法使之最终服从生产者有意识的控制的愿望。”（Dutschke, 1968, 第75页，第91页）

反叛的大学生们梦想着这样的世界——一个摆脱了“美妙机器”的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运转方式的社会——它将把每天的生产活动时间减少到比如每天两到三个小时。他们把大学当成一个策划颠覆、进行社会批判和自由自在做出自己选择的去处，这些都与为资本主义效忠的乏味的资产阶级功名心格格不入。沃尔夫冈·勒菲弗（Wolfgang Lefèvre），这场运动的另一位发言人，出自同样的角度提出了批判和阻止资本主义的科学工作的要求：

“简化成工具的科学和技术……构成了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威胁……破坏性生产行业的工业技术活力同时又不不断地引发着新型的破坏方式。这种破坏系统能够给人一种‘客观必要性’的假象，因为工业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利用在此破坏



过程中保持着和谐的关系。所有的目标都成为资本利用的手段，这样也就使工业技术的发展，即所有工具器械的发展成为了最终目标。消灭所有的目标便成了缩减为工具器械的科学追随的惟一目标……（Lefère, 1968, 第121页）

在历史上的这一瞬间，被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并更加被“追补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排斥的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商品形式和“抽象劳动”的核心思想显现出来。但就是这一次也没有把卡尔·马克思给请出来。大学生叛乱当然还是大多采用了陈旧的劳动马克思主义概念表达他们的意见，并且试图以某种方式与“工人运动”无法克服的行而上学扯上些关系。但同时他们也接受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的批判理论，这两个人已又朝前迈进了一步，而且他们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文章那时突然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内容和概念上的困难或许本来可以在自我验证的过程中被克服。如果说1968年的运动在社会解放意义上是彻底失败了的话，那么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有把对“抽象劳动”、商品物神和企业经济合理性的批判继续下去并坚持到底，以最终总结出对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体系的一个否定的、扬弃的概念。反之他们却走上了“政治”的歧路，从而像原来的工人运动那样迅速地成为了同一种民主幻想的牺牲品。

当鲁迪·杜奇克宣传着“穿过各个机构的长征”之时，它还完全是基于反叛的想法。然而从“民主政治”的意义来讲，这种长征只能是一种返回制度故里的一种跋涉。虽然哈贝马斯由于其明显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受到了学生运动的猛烈抨击，但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以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们却都懂得如何用自始至终不断重复的公式去开导这些反抗运动：

“在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一一种不可调和的关系；

有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一体化原则欲与它们一争高低……这两种命令首先在政治范围内交火……”（Habermas, 1981, 第507及下页）

这当然是19世纪中老掉了牙、用滥了的思想，早期的社会民主党本身就用这种思想而把自己禁锢在了资本主义世界之中。就是哈贝马斯也对他的边沁辨认不清——学生运动亦如此，否则的话，学生运动就能够辨明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一同性，就不会停留在“民主化”这个空洞的字眼上了，这种陈词滥调后来被很多人称作毫无意义的“民主的民主化”。在“1968年”的背景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段与边沁鬼使神差的交往。不过，边沁整套构想的性质却没有能够被识透，因为学生运动的“新左派”和工人运动旧左派在资产阶级思想上甚至对自己都有偏见。

法国哲学家和1968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安德烈·格卢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通过阅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zyns）的《古拉格群岛》发现，集中营的压制理性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中，并且还在他名为《女厨师和食人者》（Glucksmann, 1976/1974）的书中（正确地）指出，所有以国有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左派作为这种逻辑的同谋和帮凶应该对此负责。不过，他却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对列宁“女厨师”肯定可以“统治国家”那句名言，他并没有搞清楚此话的具体内涵以及与边沁的自由主义的不谋而合，便指责列宁其实想借助于教育独裁不真正让女厨师参与国家管理。他依据的例证是斯大林主义就最终（在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把“女厨师”排除在社会调整之外：

“列宁经常把他的女厨师说成是‘亚洲型的’，说她是愚昧无知的，并且允诺，在她能够领导国家并教育她的教育者

之前，要对她进行长期的教育……列宁的继承人也完全考虑到了列宁对教育的热衷……从柏拉图到斯大林，对领袖的绝对知识庶民一直都坚信不疑地任其摆布。因为女厨师不允许染指国事，所以国家不管是出自好心还是恶意都必须要把自己的手插进女厨师的事情中去……那个创造无反抗局面的伟大缔造者斯大林总以某种方式驻扎在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我们都像他一样对女厨师抱有怀疑……”（Glucksmann，出处同上，第164及下页）

格卢克斯曼（和其他1968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一样）仍旧很天真幼稚地把教育、民主和独裁概念理解成在错误的、表面化的对立中主客体之间可定义的矛盾关系：女厨师要么是民主政府的主体，要么仅是自命“领袖”的国家官僚主义统治的“非民主”客体。格卢克斯曼完全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没有以解放的方式消除这种表面上的对立，而是采用阴险的手段压制它。虽然格卢克斯曼最后在他的书中引用了教育学评论家勒内·舍雷尔（René Schérer）一本题为《驯服的孩子》（Schërre, 1975/1973）的反权威小册子中的一段话，甚至借此用讽刺的口吻简短地评论了边沁和他的全景圆形监狱，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对此作过什么研究。福柯（Foucault）的文章《监督和惩治》很详细地批评了全景圆形监狱。该文是在格卢克斯曼的“女厨师”出版一年后发表的，这个见解的问世为时过晚；特别是福柯自己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也没有建立起与资本主义就业范畴和“抽象劳动”逻辑之间的系统关系。虽然舍雷尔曾经批判了从卢梭到边沁直至当时某些教育流派以及资产阶级家庭驯兽式的教育方式，但他并未强调其中全景圆形监狱（只是顺便提起）的本质，因为他也同样被“自由民主主体”的资产阶级虚幻构想牵着鼻子走（首先是在当时常常成为反权威主题的儿童的性问题）。

在上上了“民主化”的圈套之后，1968年运动就毫无起色地粘附于实已无计可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它没有从内部去批判和冲出无主体的世界机器和它有破坏效应的合理性至少已略微预示出的逻辑，而是再度批评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在这种庸俗的民主主义迷雾里，对“抽象劳动”和企业经济合理性的绝对批判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民主化”政策打造出两个同样站不住脚的方案。其一是起死回生的“经济民主”这一古老社会主义思想。悬挂在工厂大门口的一块牌子上的一句话因勾勒出一幅讽刺画面而非常惹人喜爱：“共和国的民主领域到此为止”。荒谬的是，政治民主原则被认为应该扩展到经济制度中去，却没有认识到政治与经济两个不同范畴相互之间的资本主义同一性。新派经济民主主义人士设想要通过民主秩序、意愿形成的形式过程以及投票表决等使主体对生产拥有“支配权”，但又不想同各种社会形式、商品生产的拜物教范畴、“抽象劳动”和市场等决裂。而当这种与资本主义基本形式的决裂很快就重新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出于对无言的“天经地义”的确信而烟消云散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上的资产阶级主体的古老启蒙幻想——未被扬弃的资产阶级主体使格式化民主形式的商品经济开始发疯，它一直以抽象的竞争主体和效率主体的形式出现，这种主体只能在民主的多项选择程序中贯彻企业经济体制的法则。

其二是起源于卢梭的更为古老的“直接民主”思想，它在1968年涉足政治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复苏。在80年代另一运动的思潮中提出的“经济民主”在企业经济层面上重现（“没有上司的工作”），并自此被资本主义的企业管方案采纳，同样，“直接民主”或者“基础民主”的部分思想在很多国家的绿党政策（“轮换原则”等等）中又得到了体现。“直接民主”思想也完全没有击中以“抽象劳动”、商品和货币为形式构建而成的资本主义主体要害。基于这种思想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俄国和德国的各种委员会的各类设想也都失败了，它们致力在丝毫不去澄清预先设定的经济形式的情况下，盲目地追求一种极端的“政治”解放。当这些主体在臆想中“直接”地通过政治途径达成一致的时候，它们就在盲目地成为前提的经济形式中以一直“间接”地作为劳动力载体和竞争主体的角色彼此消极地联系在一起，并受它们只能听之任之的制度命令的控制。

保守的议会主义思想家们不无道理地谴责那些“直接民主”的捍卫者，因为那种设想中所包含的公民表决的特点容易被各种现代独裁者利用。需要通过“直接民主”的公民表决来确定的问题，已经由自身即目的的商品生产体系的盲目发展规律性和非理性矛盾事先确定好了措辞，政治党派或者公民作为整个政治集体只拿到由制度决定的可选方案，这与议会决策过程所起的过滤作用毫无二致。公民表决当然尤其适合那些蛊惑人心的目的或诱逼性的选择可能。

英国历史学家 J.L. 塔尔蒙 (J.L. Talmon)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立场出发) 为“直接的”公民表决决策形式这一思想甚至创造了“极权民主”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应当适用于现代民主的各种形式。塔尔蒙以法国大革命中弗郎索瓦·巴贝夫 (Francois Babeuf, 1762-1797) 的思想为例，把这种极权特征简化成了公民表决的行为方式：

“巴贝夫……对议会代表制并没有那么多的热爱或者信任……不管怎样他都想把选出的全体立法者置于人民的选举权和否决权最严格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来说，就是置于法国直接民主的严密监督之下……所有事务都得征得人民的同意……所有议员都可以随时通过选举被罢免……最终，全体立法人员只有提出法律议案的权利，却没有决定它们的权利……所有这些繁冗的措施按巴贝夫的声称都是必要的，这

样才着实确保……没有其他事物高于人民的意愿。但是，这种公民选举的直接民主……乃是专政或者隐藏着的专政的雏形……”（Talmon, 1961, 第 185 及以下数页）

公民选举的决策过程不是由在法律上定义出来的主体，而是由已经过驯化而服从制度命令的人来执行，他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地“自由”决定自己的事务、资源的投入使用、措施的合理性等，因而上述观点从这点来看是对的。全面抽象、形式上的“法制化”只是在极权的商品生产体系中才成为必要，而这本身就是个难题——并不是由立法机关或是由“人民直接”来实现法制化的问题。面对一大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荒谬的决策问题和事先由此体系规定好的虚假选择可能，被市场先验地驱使和逼迫的人们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专业操作者、阴谋家和蛊惑者等的工具。但“直接民主”只是比“代表民主”的议会制形式更清楚地表现了民主整体结构的矛盾罢了。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交接之时几乎于那可怕的历史性一秒钟触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隐秘，但是像它的工人运动先辈一样，它又一次遭受了边沁诡计的愚弄。这种脆弱的“民主化”方案定下的大局是，“穿过各个机构的长征”必将同社会民主党一样走进资本主义政府或者坐上部长的宝座，并且最终亲手去实施自己曾反对过的强制手段。

## 第三次工业革命史

---

到了 20 世纪过去了 2/3 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显示出：它能够将人类驯化到何种精确程度，它又以何种规模成功地使它的物神形式的面具变成了物质世界的面貌并甚至进一步变成自然界的诸多组成部分，而且它能够驱使成批的人自我否认到何等的地步。但这种巨大的成就从未使人们普遍的失意完全变成沉默，这种失意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上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假如说进步的信念在 19 世纪就已幻灭（即使资本主义的职业乐观主义者和平息危机的主持人自此之后不断地召唤这个幽灵）并且最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体就已经退位，为的是给向一个被确认为难以驾驭的社会进程作自我奉献的施虐和受虐礼俗让路，那么，那些本身已屈尊地降为纯粹物质资源的人们在战后福特主义时期最起码还可以在商品消费的烟雾缭绕中使自己心醉神迷。当经济奇迹达到极限的速度超过了人们想象的时候，一切理论与政治阵营已处于高度自我蒙蔽状态，于是，社会意识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反应只能是试图对此排斥和粉饰。

自从 60 年代晚期以来，福特主义的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失意虽然在西方各中心国家也提前预示了喘息时机的终结，但是它

因为没能进一步演变成一种新的彻底批判而销声匿迹。近 300 年现代化历史的梦魇压抑着人们的头脑；自从 1968 年以来的新社会运动没有一次成功地进入触及现代拜物教的核心部分，倒是至少像以前的工人运动一样与资本主义并存相安。在后半世纪形成的极权的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全球社会开始盲目地并无声无息地走上没落之路，便不足为怪。

反面乌托邦文学中表达出的告诫和警示也无济于事。如果说这类文学先前对福特主义的“劳动国家”制度只是理解得不够，也就是说它尽管有种种想法最终仍集中在政治的极权主义因素上，那么它带有预见性的内涵随着战后繁荣的终结也已最终枯竭。隐藏在未来迷雾里的 20 世纪末的危机必然被这种历史悲观主义从根本上忽略。因为在反面乌托邦文学里通过幻想延伸出的福特主义景象中，人通过严加控制的生产力达到负载饱和，在消费方面成为白痴，一种拥有官僚主义精密机制的资本主义会造成的一切灾祸都在预料之中，但是有一点则被忽略了：消费萎缩、大众重新陷入贫困和社会普遍存在饥饿的现象。

“没有经济的安全保障”，著名的自由派人士赫胥黎（Huxley）在他 1949 年新版的《美妙的新世界》的前言里这样写道，“对奴役的钟情是不可能产生的。简单地说，我估计，拥有无限权利的行政机构及其管理者将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个长久经济保障的问题。”（Huxley, 1989/1932, 第 16 页）但正因为如此，反面乌托邦文学所描绘的此类情景还不够黑暗：它们只能断定国家给人洗脑筋和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对人进行生理上的控制，而没有认识到这部世界机器的本质和内在局限。它们也同样很少意识到个人自身的资本主义竞争主观性的核心作用，它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会导致社会极度的动荡疯狂和地区性的暴力行为，而不是让一个同形的单位群体无声无息地、顺顺当当地自行运转。这种同形性正是那些抽象个体进行全面竞争时的相同



性；而匿名市场上的那些奴隶们所怀有的、隐藏在同形性之内的自我仇恨在危机中势必向外部折射，转向“其他人”。

那些福特主义的反面乌托邦文学及其先驱者们之所以持有这样历史性的短见在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他们把这种“抽象劳动”的制度盲目地作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规律的”、具有运行能力和再生产能力的机制并将其确定为前提条件。行使操纵职能的国家机器所发布的指令，一直就以商品生产的世界机器的活动形式为基准，此中至少有一点看起来是永恒不变的：耗费大批劳动力的社会必要性。一种被机械化弄得残缺不全的生活所包含的一切种种令人惊恐的事物都源自一个先决条件：人沦落成为只会机械地“劳动”的机器人。即使是强调“面包和游戏”的商品消费负面因素的赫胥黎也描写了在功能上经过加工的“工人”，从胎儿开始就在功能方面被标准化并最后被“放出试管”：

“一模一样的人们，被分成一个个统一的小组。用勃卡诺夫斯基方法培植出的一个惟一卵细胞为一个小工厂提供职工。96个完全相同的兄弟姐妹们操作96台完全相同的机器……这是上百万胚胎。批量生产最终也出现在生物学中……未来的热带工人将从一米一五开始被注射疫苗……这些胚胎还有气管鳃。我们给鱼增加免疫未来人类疾病感染的免疫力……第10个架子上，一批批未来的化学工人将适应铅、氢氧化钠、焦油和氟的化学作用。输送第一批250名处在胚胎阶段的火箭工程师在第3个架子上通过了1100米……现在……我想让你们看有关优等知识分子标准化的一些有趣细节。第5个架子上有大批可输送之材……知识分子的标准化在他们成为3个月的胎儿并失去他们的尾巴时，才能成功地开始。”（Huxley, 1989/1932, 第22页，第30及下页）

在《星球大战》一书的作者 H.G. 威尔斯 (H.G. Wells) 另外一部已经在 1895 年出版的著名反面乌托邦作品里，这种对抽象“劳动”盲目的推理甚至被推向了极端。他的小说《时间机器》和马西人进攻的故事同样广泛流行。为了将胜利的资本主义从社会批评的观察角度一直延伸展示到它完全衰退的最后阶段，该书使用了时间旅行这一构想（那时当然构想的是作为通向未来的单行道）。而他的时间旅客在 802, 701 年那遥远的未来所见到的仍然是一个一如既往地分成“不劳动”的游手好闲者和“劳动者”的社会。在地球表面上生活着的“埃洛依人”像幼稚无知和“无所事事”的孩子，安逸度日和玩耍嬉闹，他们是以前资本家的后代。相反，在地表下的一座座工厂之城居住着“莫洛克人”则是以前雇佣工人的后代，因为在 19 世纪末已有这样“一种趋势，将我们文明中不太崇敬祖先的设施迁移至地表之下” (Wells, 1980/1895, 第 78 页)。经过这样一个漫长时期之后，两个阶级都陷入崩溃状态，同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发生了颠倒：

“地上世界的人虽然以前也许是受到优待的贵族阶层，而莫洛克人是他们毫无权利的奴隶，但这早已属于过去了。人类的演化产生的这两类人慢慢滑入或者已经到达了一种全新的相互关系中。埃洛依人像以前加洛林王族的人，已经退化成了一种完全无用之人，不过他们还是地球的主人，但只是还受到容忍；因为莫洛克人已有无数代人住在地下，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光线。我猜想，他们为埃洛依人生产服装和满足他们其余日常需要的做法也许遵循着一个古老的服务礼俗。这一切他们做得那么自如，如同一匹站立的马正在用马蹄刨地……但是旧秩序的有些部分已显然在向它的反面转化。复仇女神总是伴随着养尊处优的种族。在人

类世界时代以前，在几千代人以前，人把他的弟弟从安逸和阳光中驱逐出去；现在这个弟弟回来了——但是变了！埃洛依人已经开始重新学习旧有的和忘记的东西：他们又学会了畏惧。我突然忆起我在地下世界看到的肉躯……埃洛依人只不过是养肥的家畜，被蚂蚁般的莫洛克人饲养和屠宰——甚至可能是有规律地喂养……”（Wells，出处同上，第92及其下数页）

这个对今后历史中复仇性同类相食的奇思妙想并不能掩盖的是，这个不光明的未来是出于延长“劳动”的考虑构想出来的，而且这一未来的评价标准总是以一种抽象的“收益”为立足点。这种机械地以自身为目的而“消耗神经、肌肉和脑力”的制度不但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衰退了。这些持批评态度的文学家们显然忘记了一点，即什么是资本主义在逻辑上势必产生的真正问题并构成了它最后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或者他们也像赫胥黎一样，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持乐观态度，尽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已表明了相反的事实。奇怪的是，在那些反面乌托邦中根本不存在经济危机这个现象，而只是出现了那种空想的全能性极权的“劳动国家”。

### 自动化的幻想

不论是反面乌托邦空想者，还是经济学理论家和管理“策划者”都了解劳动力渐渐会被工业技术替代的发展趋势。全自动化的梦想甚至也早已在头脑中形成。后来事隔多年之后，恰好这个主意没有绝对被认为是消极的。1908年，瓦尔特·拉特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一个理想的工厂应该像一座巨钟的机件一样自动运行，只需一个工人当监督者。能源工业和化学正在接近这种状况。这个作为监督者的工人只需要投入脑力劳动，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雇主……十分关注的是，这个人能够很好地自己养活自己，有思考的闲情逸致，很知足，情绪好。”（Rathenau, 1925/1980, 第304页）

拉特瑙所精心描写的和谐的田园生活只涉及“雇主”及其惟一个剩下的工人——而有个问题却奇怪地没有出现，即如果这种状况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这些“心情好”、“很知足”的工人们总共也只是极少数，而大部分人则被作为资本主义“过剩的”残余淘汰出社会的再生产，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亨利·福特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起轰动的时候，有一点无人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通过流水线和泰勒主义的“劳动科学”实行了合理化，但人类劳动力不可能大规模地从生产过程中消失。尽管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大规模失业完全（并经常以鼓动性的谴责）和新的过程技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把资本主义的危机看做是基本的“劳动社会的危机”和以此为基础的“抽象劳动”的危机，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处于这个时代的人的想像力。

仅按逻辑推理，人们本也会很容易想到：如果福特主义工业中的人必须转变成一个机器人，那么到他真的被机器人代替也真就只需很少几个发展步骤了。奇怪的是反面乌托邦的创作者既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没有从中看到社会的迫切性，而是把他们的历史悲观主义转向其他的问题。少数理论家在展望更遥远的未来时认识到福特主义只是自动化的最初阶段，而自动化到那时为止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乐观主义似乎更让人感到奇怪。

凯恩斯正是属于这些历史乐观主义者之一，他相信潜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总要替代福特

主义。在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他就诙谐幽默地阐述了“为我们子孙们创造的经济可能性”，尽管他运用的论据刚开始听起来很有批评味道：

“我们患上了一种新的疾病，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但是在今后几年中他们将会经常听到这个病名，这就是工业技术性失业。它的意思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省劳动的方法比我们能够为劳动找到新的使用方式的速度要快而形成的失业。但这只是因为缺乏适应能力而形成的一种暂时的状况。从长远来看，这一切意味着人类正准备着完成他们的经济任务。我在此预言，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00年以后会是今天的4至8倍那么高。即使按我们今天得知的情况来看，这也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就是认为有可能进步得更快的看法也不见得是过分的……根据不会出现大型战争和人口不会剧烈增长的推测，我得出一个结论，经济问题的解决在百年之后至少是可以指望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会发现经济任务不是人类永久的任务。您会问，这为什么如此激动人心？它如此激动人心，是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的话——经济任务，也就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奋斗，直到今天一直是人类首要的和最紧迫的任务，甚至不仅是人类的任务，而且是整个有生之物王国的使命——从生命伊始以他最低最初级的形式。我们——连同我们的一切动机和本能——从具有天性明确地发展到了去实现能够完成我们的经济任务的目的。如果经济任务完成了，那么人类就失去了他传统的目的之一。这会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人们坚信生命的真正价值，那么至少为一件好事开辟了可能成功的前景。然而我还是带着惶恐的心情想到了普通人的习惯和本能的改变。而这些习惯和本能自古

以来已经世代相沿，而在短短几十年之后他却要抛弃它们。用今天普遍流行的语言来说：难道我们必须等待一个全面的‘神经崩溃’吗？……自从人被创造出来，他第一次面临他真正的永久任务，即怎样使用从令人压抑的经济忧患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怎样填充他那些科学和复利为他赢得的空闲，以使他能够明智、舒服、自在地生活……然而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毫无畏惧地观赏这个悠闲和充裕的时代。因为太久的时间以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发奋努力而不是享受。对没有一种特殊天赋的普通人来说从业是一个令人却步的任务……3小时换班制或15小时工作周可以把这个任务往后推迟很长一段时间。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天工作3小时已经足以使我们的丑恶本性得到满足……我们将有能力宣布放弃许多虚假道义的原则，200多年来它们像梦魇一样迫害我们；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把一些令人厌恶的人类劣根性提升到了最高尚的美德的地位……”（Keynes, 1956/1930, 第267及下页）

这的确令人吃惊：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看到的与可能出现的自动化以及“工业技术性失业”相关的惟一问题是一个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问题——问题是，将被预言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解放出来”的人们是否能够有意义地处理由资本主义发展所赐予的无忧无虑的闲暇。同样的论证我们于28年后在美国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生命的运动》中又一次见到，只是阐述得更加具有锐利的批评锋芒：

“……过去10年中有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事件是决定性的，即还处于开始阶段的自动化的传播普及。我们在很难想象时就已经知道，工厂在几年之后会空无一人，并且与

大自然直接紧密相连的古老的人类群体将摆脱工作的重负和必要性的枷锁。这里涉及的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一个轻松的、从辛苦和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神仙般的生活的向往就像流传下来的历史一般古老……这看起来似乎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只是全人类世代都梦想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但这是个有欺骗性的假象。新时代在十七世纪开始从理论上颂扬劳动，并且在本世纪初结束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劳动社会的过程。这个古老梦想的实现就像童话中愿望的实现一样，遇到了一种梦寐以求的恩赐成为惩罚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应该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社会，而这个社会还几乎从未听说过有更高尚和更有意义的活动而使这种解放成为为此值得一做的事情……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脱离劳动的劳动社会的前景，劳动是这个社会惟一精通的活动。还有什么比这后果更严重的呢？”（Arendt, 1989/1958, 第11及下页）

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显然对他们自己的制度知之甚少。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用先验论并且脱离历史地看待这个制度的问题，即运用超时代的经济本体论基本概念观察问题，这一点阻碍了凯恩斯把他分析的问题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来看待，而导致他把这些问题看做是超时代的社会形式的“种种可能情况”。汉娜·阿伦特总算还知道也就在17世纪才开始大肆颂扬劳动，而凯恩斯却全然按照自由主义的传统将名声不佳的“经济任务”——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苛求制度——又一次改写成一种普遍的“自然条件”，以至于连“生活的最低形式”按照维持自己生存的资本主义标准也得疲于奔命。（实际上所有动物都得叫懒虫，因为它们“维持自己生存”的方式不是以一种不停息地以自身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凯恩斯轻率地重复着通过市场经济持续不断地提高富裕程度的古老的自由主义谎言，对这个谎言大多数的人们直到今天还毫无察觉。在他看来，未来的“劳动”成为多余只是那种早已通过所谓的“科学和复利”达到的生活水平提高状况的延续。他的做法让人觉得，未来“劳动”的废弃从经济角度看似乎仅是现存社会制度内部一个小小的调整适应问题，虽然“经济任务”的终结实际上只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覆灭。凯恩斯真的相信这种制度会甘心情愿放开它的人力资源而安息吗？

如果这种“抽象劳动”制度本身就是荒谬的，那么已深入人心的劳动纪律作为一个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问题肯定是不容被忽视的。如果人们不再把“从业”理解成为一种为了“美妙机器”以自身为目标的运行方式而异化了的的活动，那么这个任务现在也并不那么可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业”人员只是麻木不仁地看着窗外，直到他最终倒地死去方才得以从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虽然这常常酷似一生遭受企业经济的驯化与煎熬并在达到规定年龄界限后留下的只是一副身心憔悴的残躯。但尽管经过各种驯化也只有极少数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如此麻木不仁，以至他们飞快地“劳动”的原因只是因为除此之外根本不知给自己做何安排。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匿名市场桎梏奴役的主要原因一直是那“生产关系无声的强迫”（Marx）。这种强迫驱使被剥夺了自主手段和社会关系的人们听任一种可恶的活动方式的摆布，因为他们否则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并不是“抽象劳动”本身，而是由此产生的“赚钱”和竞争的普遍交往形式。所以在“劳动”成为过时的情况下，人们文化的非独立性只构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持久的和结构性的“过剩者”被从“赚钱”和竞争的体系里清除出去，而这种体系并没有停止作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凯恩斯，而且阿伦特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企业经济的合



理性从根本上就没有能力通过自动化相应地减少“抽象劳动”（凯恩斯建议一周工作减至15小时，而这也纯粹出于治疗方法的原因而已！）。这个了不起的疏忽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这个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蒙蔽的现代劳动强制不是从世界机器自身即目的的抽象形式，而是从物质富裕程度提高的“自然”的必要性中推导出来的。因而这种物质财富的高度自动化的流动也就肯定会同样“自然”地不断使工作时间缩短直到几乎消失殆尽。

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因为企业经济的成本核算机器人最喜欢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就像拉特瑙说过的）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时它抛弃着“过剩者”并原则上一块面包也不再给予他们。这是资本主义自动化进程中惟一符合逻辑的可能发展形式：大规模失业在这里从不会意味着大批人在充满情趣地享受闲暇，而是大规模的贫困，或最后的结果甚至是大批人死亡。恰恰企业经济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固有的这个逻辑几乎肯定会为进一步自动化开辟道路并使至今为止的工业增长的平衡机制失效。汉娜·阿伦特把现代劳动社会告别“劳动”称作深重的灾难是正确的——但是她的说法只有被理解为不仅是对一个文化的，而首先是对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危机做出的预言才是正确的；这绝不是一个暂时的危机，而是一个真正历史性的制度的崩溃，因为正在告终的“劳动”，只不过是资本的拜物教实质本身而已。

但是公众和那些已经完全渗透进为资产阶级社会机器服务机制的精髓之中并从中获取它们生存权利的公众机构在当时（并直到今天）绝对不能允许存在这样的想法，广大雇佣工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已经顺应商品生产体系的主体形式和交往形式。当然也有零星的声音在警告自动化的后果将可能是新的前所未闻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一场灾殃，尽管“劳动”、货币和资本内部的形式关联（和原则上的一致性）对发表此类见解者来说仍是陌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论据首先是道德禀性。这里首先要提到诺伯

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他可以说是控制论创立者中最杰出的一位。在他于二战刚结束不久之后首次出版的一本著名的关于新科学的著作中，他预见到了极端严重的后果，并表现出很悲观的态度，因为在自动化潜力的方面他比凯恩斯和阿伦特知道的情况更多，他对此谈到：

“正如我们缺乏像在二战中开发雷达工业技术那样巨大的努力和意志，自动化工厂和无人操作的流水线也就与我们相距那么遥远……占有机器也许对人类是件好事，它们把人类从较低级和不愉快的必要工作任务中解放出来，或者这也可能不是好事，我对此尚不知晓。把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用市场的概念来评价，即用他们挣的金钱来评价可能不是明智之举……我也许能够阐述一下当今形势的背景：我的看法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场‘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的革命，是通过机器的竞争而使人类的臂膀贬值……现代工业革命必须以类似的方式导致人类的大脑贬值，至少在他们比较简单和更按惯例做出决定时是这样。当然，正如熟练的木匠、熟练的机械工、熟练的裁缝一定程度上在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幸存了下来一样，有经验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管理公务员能够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幸存下来。然而，如果人们设想一下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的情形的话，那么具有中等水平文化知识或知识更少的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对他人意味着值钱的东西可以出售了。答案当然是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建立在人的价值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买卖基础上的社会。为了到达这种社会，我们需要许多规划和斗争，如果顺利的话，这些规划和斗争将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如果不顺利呢——谁又知道该是如何？……我们能尽的最大努力是，尝试使广大的公众能够理解当今工作的方向和形势。我在

1947年落笔，而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渺茫的希望……”（Wiener, 1992/1948, 第59及以下数页）

对维纳来说，他把已经历历在目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还未露峥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混淆起来了，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仅仅是第二次的结果。当然这些工业革命是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有中间阶段和过渡时期，因为竞争不断迫使在工业技术上进行革新。但是按照长期发展的广阔角度来观察，确实可以推断出在一个完全特定的工业技术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应特殊的社会经济阶段各种的关联模式。

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造成传统手工业者破产的煤和蒸汽动力为特点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建立在内燃机、流水线和企业经济的“劳动科学”基础之上，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时代分裂成两个时期，即工业化的世界战争时期和福特主义的战后繁荣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建立在电子学和“信息科学”的技术基础上，为的是进入大规模失业和由此产生的制度危机的一个在“质”上的新阶段。维纳曾经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了技术上会出现的一种可能性，即生产的进一步电子-信息化发展不再能与占统治地位、以“劳动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协调一致，他对这种可能性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态度的理由是再充分也不过了。但是他仍未能清楚地区别开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以他的提示在当时没有产生效果——这也不足为奇，1947年时福特主义的全面实施阶段即将来临。

1965年在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德国金属产业工会（IGM），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工会之一，召开了一次主题为“自动化——风险和机遇”的会议，会上发言已汇编成厚厚两卷文献。虽然人们已在谈论电子计算机和新的合理化潜势，但还是用一种就业已经大规模地“饱和”的福特主义的推理依据眼光来

看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未来。最终乐观主义占了上风，这正如从永恒的资本主义的推理依据出发对“风险和机遇”做出的论断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论断中，“风险”总是只作为有效的美好机遇在发挥作用，这样便可先验地为资本主义事物的运行进行辩护。当时金属产业工会的主席奥托·布伦纳（Otto Brenner, 1907~1972）从容不迫地表示：

“在联邦德国，尽管自动化和科技化已实现多年，但多年来我们仍一直能做到充分就业……工会无论如何不属于那类期望见到自动化和技术进步的其他形式造成无法避免的大规模失业局面的组织……工会把技术进步看做是为了让所有人达到更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一个高科技的未来也向工会提出了新的任务。工会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由于自己以前卓有成效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政策，已为保证充分就业做了重要的前期准备工作。至今没有成功的是，使通过技术进步节省下来的工人希望得到一个同等价值的工作位置的要求得到满足……”（Brenner, 1965, 第16页, 第22页, 第26及以下数页）

很明显，又像在20世纪20年代福特主义的合理化大辩论时一样，工会对未来前景的展望绝无二心地紧跟着还不明晰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革命化，并用美化的词语解释它和热切希望通过积极的参与来共同把握一个合理化和自动化的新时代。在会议上，国际机构的代表们表达的意见更加乐观，简直可以说是极为亢奋，如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AO）的领导成员热夫·瑞恩斯（Jef Rens）说：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持续不断

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众多商品来满足人们的愿望和需求将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思考：我们打算怎样运用这个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如同已预见的那样，随着业余时间的延长，出现了建设性地使用业余时间的广泛可能性。恰恰是工会能够在这种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工会由工人自己组成和掌握，具有提出和实施一系列能够给劳动者开辟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的纲领所需要种种理想的前提条件。工会运动能够最好地确定，哪些业余活动使其会员感兴趣，并制定出相应的实施方案。这肯定是今天的工会运动仍然面临的一个伟大任务。”（Rens, 1965, 第49及下页）

这种荒谬的乐观主义把未来的工会理解成一种给即将到来的业余时间社会赋予意义的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副秘书长米夏埃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完全支持这种观点：

“也许现代技术的可能性比起它的危险性来得到的重视更少。迄今为止生产率的进步却使那些使用了新技术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持续得到提高。没有任何理由预测，实现自动化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Harris, 1965, 第54页）

在毫不顾及所有经济条件关联的情况下，上述看法竭力从已处于没落状态中的福特主义繁荣的角度来看待即将来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因此把它视为这种繁荣的延续。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同样抱有这种期望。在这点上，法国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 1907—1990）是最著名的职业乐观主义者之一，他对下个世纪福特主义繁荣的中心地区会有限地缩短工作时间做出预测：

“人们今天普遍认为，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普通人在不久的将来只要从事每周30小时的职业工作即可满足自己的需求……由于10年来在西方国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取得的进步，这样的前景看起来无论如何是有充分根据的……在……不确定准确的时刻的情况下人们便可以估计到，一周工作30小时同一年工作40周完全能协调地实施，这等于一年工作1200个小时……因为人类平均寿命在今后接近80岁……我们的后代从100小时中只需为生产劳动付出6个小时，这样的生产劳动曾在数千年间几乎吞没了我们千百万祖先全部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当今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人类如何从受时间束缚的状态转向一个拥有时间的过程……”（Fourastié，没有出版年代/1965，第7及以下数页）

富拉斯蒂埃称他乐观主义的未来设想为“4万个小时”（一个人未来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不再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他同他的经济界和哲学界的同行们一样，全然不顾资本主义的逻辑，目的是直接把“技术进步”和“劳动时间”联系在一起计算——此外也为了歪曲人类社会的历史，即他提出一种猜测，前现代的人类“在数千年间”几乎一生都在“劳动”中度过，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只有资本主义才发展了这种荒谬的趋势：为了惟一的目标，即尽可能把整个一生的时间转化成“劳动”，而提高生产力。如果说凯恩斯和汉娜·阿伦特至少还讨论了一种超出“劳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疑难问题的话，那么在富拉斯蒂埃那里只能找到一种坚信工业技术上将出现奇迹的天真幼稚想法，这在今天看来简直过于稀奇古怪：

“现在人们能将一个普通的人‘变得完美’，提高他的能力，减少或者甚至消除他的疲劳，影响他的遗传特征等。在动物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领域我们已有供人食用的牲畜，我们的祖先肯定会将此看成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我们有重500克的桃子，重一公斤的大苹果……1965年核电厂在汉福德投入使用，从它可以看出，巨大的核电站在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样子……”（Fourastié，出处同上，第13页）

如果人们记得在19世纪简化为对工业技术的推崇和技术至上论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信仰在工业化的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已经灾难性地熄灭了的话，那么这种亢奋状态犹如鬼魂再现。但1950年以后，短暂的福特主义的经济繁荣时期曾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意识中再次唤起了这种希望技术占统治地位的余感。富拉斯蒂埃连同他平庸的乐观主义丝毫没有脱离福特主义技术乌托邦的背景，在此期间这类乌托邦幻想在最浅薄庸俗的水平上四处传播。在工业技术上被认为是可行的“消除疲劳”方法兴许与同时代的一些畅销的技术杂志或科学幻想小说中的设想如出一辙：食物的摄取简化到吃药片的形式，高速公路跨越博登湖，或者使用微型核反应堆来驱动剃须刀。

### 通过合理化裁员

如同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场工业革命的实际进展是不均匀的，它的潜伏期可长可短。新型技术的兴起不直接引发相应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的“启动”。各种基础工艺本身需要一定的成熟期，而且需要与其他层面上的革新协调。汽车的发明大约是在19世纪80年代，却与1913年以来泰勒创建的“劳动科学”和福特发明的新生产方法结合起来才奠定了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经历了失败于世界经济危机中的首次起始之后，于更晚的时期，即大约在1950年左右，才在世界范围内又有新的突破。这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均匀的发展形式当然也为各种各样的和相互对立的解释提供了空间。直到最终这个时代变革的真正特性逐渐显露出来。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革新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破还没有发生的一个时期。这让人很容易根据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动看出这三次大的工业发展推动力量的性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动力来代替人的体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把操作机器设备的劳动力“合理化”或者近于变成机器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首要特征就只能是使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人类劳动力完全成为多余，通过受控制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对他们“进行合理化削减”。

从根本上说，两种革新对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一是一种新形式的“组织科学”，它不再是福特和泰勒主张的“劳动科学”，而是一种用于技术—经济系统设施的“控制科学”——也就是不依赖于人的“神经、肌肉和大脑的消耗”，是各种系统“运行过程”调节方式的抽象化。这在诺伯特·维纳于1948年出版的同名书中（根据古希腊语“控制者的艺术”）首先创造出来的控制论中的确能够找到。维纳以此命名了一门新产生的处于数学、技术和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研究“功能机制的规律性”——一门特别适合于资本主义功能主义的跨学科的科学分支。自被应用到社会学以后，这门科学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技术至上论，在工业技术上意味着自动化，在企业经济方面正是意味着通过合理化削减人类劳动力。第二是控制论，控制论这个概念体系，如同它自此之后进入到一般词汇中的意义一样，以一种特定的对自动化“调节”情有独钟的方式探讨通讯、信息、存储和回复或“反馈”之间种种关联。基于维纳创立概念的论著，对



这门很快就变得不可忽视的新科学做出概述的第一部著作这样描述了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它的内容：

“这本书的出版所起的作用如同一个结晶核在一种过于饱和的溶液里：仿佛一下子积聚起许多结晶，所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还在‘酝酿中’的一切突然获得了形态，汇集在一起——‘控制论’科学便诞生了！……曾经有过所谓的‘调节技术’，也就是技术调节装置的理论、设计和在工业方面的应用……在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只是似乎方向相反。很久以来已众所周知的是，生理过程的‘调节’在有机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一些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开始寻找能够说明有机体的状态和生物体内生理过程无比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方法并开始接受这些概念，首先是接受控制技术工作者的数学方法——在德国首屈一指的是慕尼黑的生理学家R.瓦格纳，他自1925年以来开始了这项研究。反之，技术人员通过这种生物学的交叉又能够学到许多可用于理论和他们的‘调节器’设计的東西。第二个领域是通讯技术，在这个领域里相应的问题已经着手处理……随着世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面临解决通讯距离越来越远的问题，对通讯技术工作人员来说就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人们如何用尽可能少的费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在任意远的距离内传送最多的消息？不可避免的‘干扰’起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减少这些干扰……这里出现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们涉及消息的措辞表达，也就是语言、文字、消息‘编码’和符号可识别性的问题……在这些调查研究中，人们发现一个新概念并把它表达得更精确，这个概念就是‘信息’。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在发展形成：信息理论本身是

探究信息技术、语言理论、符号逻辑、数学等之间的未知领域的一门科学，它又对控制技术和生物学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迫切需要一种统一，一种概括……”（Flechtner, 1984/1966, 第1页, 第6及下页）

资本主义曾用机器来比喻世界的内在关联，这一古老的比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已经显示出它的鲜明特点，在控制论的定义中它又作为“机器的普通形式科学”重新再现，并且额外强调，“这里所指的‘机器’包括生物、团体、国民经济等等”（Flechtner, 出处同上第9页）。诺伯特·维纳在1960年的一次会议上将“他的”科学定义为：“控制论是控制和信息的科学，无论涉及生物还是机器”（转引自：Flechtner, 出处同上, 第9页）。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正是这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科学”使人沦落成资本主义的机器，如同维纳自己所预见的那样，正是这个“控制科学”最终使资本主义失去控制。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确需要一种新型的机器来大规模推动控制论并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新型的机器是自动计算设备，即电子计算机，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控制论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想法以及它的简单实施形式已经很古老了。在中世纪的数学领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前期构思。莱布尼茨结合着自动计算设备的设计追寻着一个能使世界“普遍地格式化的”方案。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仍处在初级阶段，因为没有足够的“存储容量”，运算速度也过于缓慢。毕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械织布机的运转就已经用穿孔卡片控制了：“邦孔（Bonchon）大约在1725年使用一种穿孔纸来通过机器传输图案。1805年贾卡（Jacquard）把穿孔卡片按顺序前后排列，改进了穿孔卡片的控制——这是最早的数据处理”（Coy, 1985, 第47页）。1890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夕，德裔美籍工程

师赫尔曼·何勒里斯 (Hermann Hollerith, 1860—1929) 发明了卡片穿孔机。但是到了 20 世纪许多基本思想才大规模地提上资本主义工业技术—自然科学发展的日程上来。1936 年, 英国数学家 A. M. 图灵 (A. M. Turing) 设计了以他命名的机器的想象模型, 它系统地形成了“可计算性或可设计性概念” (Coy, 1985, 第 31 页)

“图灵机是……一种计算机的数学模型。通过适宜的程序能够进行任何计算, 就像一个人在纸上通过书写进行计算一样……到后来就清楚了, 这种数学机器模型和所有具有可计算性的著名形式计算方法是等同的……图灵意识到了这个基于数学原理的自动计算装置的可行性。战争期间, 他就在英国军队的密码破译部门的这样一台机器旁工作, 这项工作被称为 ‘Colossus’ 工程。在这项工程之后, 1947 年英国制造了第一台计算机。” (Coy, 出处同上, 第 30 及下页)

在同一年——1936 年, 德国工程师康拉德·楚泽 (Konrad Zuse) 制造了一台“数字式计算机”, 它“能够由程序控制解静力学计算方程式” (Coy, 出处同上, 第 63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计算弹道和破译敌方通讯密码, 同时也为了制造原子弹从而加速了自动电子计算机的开发;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上, 战争也再次成为一切资本主义事物之父。但是靠电子管驱动的计算机过于笨拙, 也太昂贵, 无法形成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新品种。1948 年, 与维纳创造控制论的同时, 一项决定性的技术突破告捷: 工程师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沃尔特·布拉顿 (Walter Brattain) 和威廉·肖克莱 (William Shockley) 在纽约城外的贝尔实验室里发明了晶体管——“信息时代的神经细胞”。1956 年他们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晶体管是一种由半导体材料

做成的电子放大元件，避免了电子管的发热性能，不仅从一开始就小得多，而且体积可以继续缩小。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多个晶体管的集成最终产生了微型芯片。微电子革命的所有基本要素由此都已经具备：

“晶体管和随后出现的微电子技术在革新理论上很有意义，因为它们作为……基础革新……构成了一种技术结构变革的核心因素，即机器的自动化控制，它带来的结果对生产技术来说是如此包罗万象，把它说成是一次‘工业革命’决非偶然……”（Halfmann, 1984, 第60页）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自动化大辩论不再仅仅是科学幻想，而是已经有了一个真实的技术背景，而当时福特主义的经济繁荣正在展开。晶体管一下子扩大了电子控制的应用范围。在1965年的金属产业工会的那次会议上，美国汽车产业工人工会主席沃尔特·P·鲁瑟（Walter P. Reuther）谈到了最早的一些新型自动化趋势：

“当我们的工会在10年前发表关于自动化作用的文章时，我们也举了几个引起轰动的例子，例如：能够自动重新调节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调换切割工具的自动车床，通过电子设备或穿孔带控制的、并且能够代替高素质工人的车床和钻床；还有带‘电子记忆’的机器，它能够精确地把握曲轴的操作，发现并记住可能发生的不平情况，然后使曲轴停下，并且自动排除这种不平度……从根本上说，所有工业部门的景象都是一样的……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望出现生产水平的提高。但是技术进步会使就业减缓增长速度，或甚至减少就业人员。”（Reuther, 1965, 第1078及以下数页）

但是发展总是有一个特定的潜伏期，可以说存在着两方面的竞赛：一方面是在福特主义市场的扩张和新的微电子合理化之间进行；另一方面是在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和微型化同与此相关的计算机和控制设备的降价之间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怀抱中成熟起来的：

“自动化以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学、钢铁工业、矿业、能源生产和食品生产中采用程控技术为开端。金属加工业的自动化由于各生产步骤的复杂性和相异性尤其困难得多，它是70年代中期在使用微处理器作为廉价的调节和控制原件以后才大规模开始的……”（Coy, 1985, 第64页）

只要对立的力量在社会再生产中向不同方向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就还无法明显地辨认出来，工会和像富拉斯蒂埃这样的理论家们的历史乐观主义看起来似乎实际上还没有被驳倒。虽然60年代末福特主义的市场扩张已经衰竭，自动化大辩论的势头却又一次减弱。所谓的“石油危机”先是把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是当大家清楚地看到，全世界范围内新出现的大规模失业不能再仅仅归咎于石油价格造成的震荡，问题就又回到了自动化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上来。现在比起60年代或20年以前当然就远不那么自在和乐观了。

工业技术性的，或者在此期间被称作“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伴随80年代初以来的微电子革命的兴起越发无情地平行增加着，它已经显示出一个使资本主义意识深感不安的特点：失业不再随着经济景气状况的周期上下波动，而是独立地持续增多，失业由此而变成了一种结构性失业。不但增长相对放慢了速度，而且周期作为对严重的和大规模失业的微调作用也降低了。它的“基座”到以后的20世纪末会变得更大。这个问题一跃而成为社

会的主要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长期危机，它凌驾于所有其他问题之上，或者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其他问题。

出自汉娜·阿伦特的“劳动社会的危机”这句格言现在不仅仅首次对广大的社会公众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带有一种威胁的语气。1983年金属产业工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调查报告，它的题目是：“他们需要机器——不需要我们人类！”，与1965年的乐观主义黄金时代相比听起来真是已经可怜多了。理论界的反思也相应地显得阴暗和冷酷了。1977年，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对“劳动的过时性”发表了以下见解：

“现在，当今的大部分劳动者还不属于自动化奴仆的范畴。但是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有人预言，在2000年大部分工人将是自动化工人，这当然不意味到那时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参与自动化的工作或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工作。因为有一条不可改变的反比例规律，它表明，随着自动化设备数量的增长，所需要的工人的数量也会下降。换言之：自动化将会不可避免地使上百万的失业者……成为‘副产品’……在日本已经有了‘无人工厂’。这样的工厂不久后也会在其他地方出现……同样也会有‘无人办公室’，因为今天的电脑……计算的速度之快相当于他的设计者大脑运算的上百万倍……人类难道不会沦为独一无二的庞大的流氓无产阶级吗？……因为现在面临的失业会让50年前的失业显得大为逊色。如果人们想一下，假如当时的失业正是纳粹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人们将失去勇气去想象现在面临的失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为了‘解决’与工作机会相比‘人太多了’的现实问题，（当时经济上荒谬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瓦斯炉完全不是不可能为此提供样板……”（Anders，

1987/1977, 第 94 及以下数页)

以上阐述从即将到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崩溃灾难中得出了最令人悲观的结论并因这种不祥的预感而充满恐惧, 这些结论显示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巨大转轨危机中妄图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大批“过剩”劳动力的自由主义幻想的痕迹。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批评家一样, 安德斯虽然有时和顺便也谈到资本主义, 却把这个孕育着灾难的问题最终突然地归罪于“技术”, 并且使问题的解决陷入绝境。他谈到“设备的极权主义”(出处同上, 第 109 页), 虽然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 但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通过这些“设备”生产力已经被套上一种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 这种形式的逻辑不再是“技术”本身, 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利用逻辑。安德斯自己的论证过程间接地说明了企业经济合理性的毁坏性质; 因为有种看法在 1977 年时不像在 1844 年或 1999 年时那样令人可信: “节省劳动的机器”本身——出于纯技术原因——会把大批的人们推向贫困。这决不可能是因工业技术本身, 而恰恰是由社会组织形式造成的, 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又致使技术的发展产生出这样荒谬的种种后果。

如果说安德斯至少还指名道姓地点到制度的残酷性, 虽然他忽视了社会经济学的相关条件, 那么, 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 5 年之后则在第 21 届德意志社会学家大会上以自由主义的坦白襟怀提出了一个新的推理, 把它作为一种经济推理方法解释了盎格鲁撒克逊古典风格的国民经济学中“劳动社会的危机”, 同时婉转地推荐了一个卑鄙的“解决办法”, 尽管这位当代自由主义的大思想家自己对此也不那么太相信:

“所有人都在谈论失业, 这是可以理解的。早在 70 年

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的失业率为3%，充其量达到4%……1982年的今天，经合组织平均失业率为10%……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曾论证过，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是不会有失业的；劳动的价格应该保持在一个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的高度上……只要实际工资的规模不改变，那么实际工资虽然为失业提供了解释，但却不适于消除失业现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实际工资是一个长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公民权利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添加上工作岗位的安全保障措施，并且首先是添加上保障工作岗位的措施的话，也就是涉及包含全部在内的实际收入时，情况尤其如此。所有这些发展使劳动变得昂贵。失业建立在劳动价格的基础之上……雇员们不断增创的成果因此是劳动社会的推动力量，这样的成果最终会导致废除劳动社会……人们经常说，不单单由经济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失业在于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不容否认的是，工作岗位被技术过程取而代之……仅此而言，技术进步相对于工人社会全貌不是一种‘自然规律’。技术消灭工作岗位的这种论点过于简单了。长期以来，技术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后果，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产力。实际工资不增加，技术发展只能长期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引进技术革新是因为它更便宜；这些革新不是本身就便宜，而是同人类劳动相比更廉价。准确地说，所谓的‘结构性’或‘技术性’失业是建立在技术比劳动力更具价格优势的基础上的失业。”（Dahrendorf, 1983, 第25及以下数页）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惯用的诡辩伎俩，他们总是毫无拘束地



高谈阔论。他们“遗憾地”指出，悲惨境遇的“根本”原因是实际工资“太”高了。自由主义统治意识几乎是在讥笑：如果没有“社会权利”“具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没有劳动保护的改善等等，那么由来已久的工人运动和福利国家就不会如此“成就巨大”（实际上只是成绩平平），那么也就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但该到来的还是到来了，劳动力变得“过于昂贵”——这下你们倒霉了！那些经济极端主义的口号“本应”喊得切合逻辑：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费用，结束“大杂烩”的社会保护权等等！自由主义用虚情假意的声音继续着他们的推理：这些当然毫不值得企盼，你们肯定不欢迎，我们中也没人欢迎，——但是很遗憾，你们也必须承担后果，不管后果如何！

这个虚假论证在双重意义上是荒谬的。即使纯粹从制度内部来看，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水平的急剧下降也提供不了任何出路。大量“贫苦劳动者”的再度出现，这正如自由主义意识实际上（沿袭着它一贯的传统）由衷地所期待的那样，如果丝毫没有社会防范措施的话，几乎肯定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已达到的积累水平基础上出于纯粹的客观经济原因走向毁灭。在新的危机来临时，达伦多夫似乎全然忘记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内部的辩论在自我反省方面取得的一切成果：从俾斯麦承认工人们奉献了“几滴社会之油”到福特主义认识到大众“投资性”消费——如汽车、家用电器——在制度上的必要性。

达伦多夫重复着一个典型的谬论，这与他在国民经济学中所表明微观经济学和前凯恩斯主义思想是相符的：对单个企业来说，在企业经济层面上“有利于”在竞争中（降低成本）保住地位的做法通过“无形的手”在社会总体再生产的宏观经济层面上也同样会以积极的方式带来盈余。急剧降低福特主义生产水平上

的实际工资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只能产生灾难性的效果，然后必然相应地对企业经济层面产生反作用，对这一症结达伦多夫采取了回避态度。达伦多夫突然间装聋作哑，似乎不知道，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以货币为形式的大众收入、大众的商品消费之间费尽艰辛才走上轨道的联系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来说已变得多么必要和关键。

反之，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以国民经济流通量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论证当然已经失效，因为货币体系的通货膨胀已经早已超出了“赤字财政”的设想。因此，像特别是以经院派左翼凯恩斯主义直到今天所代表的主张那样只是固守这个方案，则再也提不出解决办法了——凯恩斯主义已完全无计可施。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从现在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逻辑不可能再有吻合之处了。在新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要求大幅度降低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而为了不危及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却相反地建议继续提高大众收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内部的自身矛盾对于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已经达到一种毁灭性的新质。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像达伦多夫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都不愿意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因此，越来越被迫进入守势并正在瓦解的凯恩斯主义阵营继续为“赤字财政”辩护，尽管这个方案前景暗淡；而达伦多夫则又悄然回到那些陈旧的、一成不变的微观经济学的设想中去了，这种设想实际上已经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宣告失败，并且使凯恩斯主义得以问世。在正徐徐降临的新的制度危机中，资本主义智者们的前进方向显示出来了：逃跑——退回到自由主义的过去！

但是，即便达伦多夫真正做到回归极端的微观经济学立场，并且实际工资的降低确实能够因此而照样在宏观经济学的标准下收到效果的话，他的论证也仍还是很荒谬的。人们只需想一下，他对雇佣工人提出了多么怪诞的苛求：他们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合理化潜力进入一种“成本竞争”，同时也就进入到在他们自己的工资和新的控制技术价格之间进行的一种贬值竞赛之中。换言之：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保证“就业”的惟一可能性就是雇佣工人通过不断自愿地降低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来阻挡工业技术的进步。这当然不是一次性的措施，而是不断降低工资和持续发展工业技术的螺旋形趋势，因为合理化技术的提供者们的竞争利益要求持续不断地降低此类技术的价格。在这场罕见的、与技术进步抗衡的“竞争”中——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工资继续下降，直到降至零点，或者甚至是负增长。因为鉴于微电子设备的生产率持续和飞速的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超比例地下降。微电子生产资料成本的降低将与一个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率相辅相成，而人类劳动力的效能将受到绝对的限制，竞争因此只能在费用方面进行。

这个从多方面来看完全疯狂的和导致社会自杀的微观经济学结论显然是一种骨子里本来就疯狂的制度做出的最后结论。达伦多夫不是在梦中得出这个绝顶理智的结论的。这个结论当然不是要着意展开一场荒唐的、反对技术进步的竞争，而是旨在与这种进步协调一致地为所有人争取相对更多的闲暇，并让所有人都分享突飞猛进地提高的生产率带来的果实。而这个绝顶理智的结论在企业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于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思想家也就只能大发无稽之谈了，并以此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自身即目的的制度如此先进地和普遍地深入人心，以致连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也作为严肃的理论依据被接受采纳。达伦多夫甚至在他的报告结尾处几乎有点惊讶地描写这个十足的无稽之谈，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理化削减“劳动”而导致的结果：

“必须工作的人和不必工作的人之间的斗争取得了辉煌

战果：以前不必工作的人，现在成了还允许工作的人，而以前必须工作的人，已经不能再工作了。为争取工作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已经把阵线完全颠倒了。”（出处同上，第34页）

在达伦多夫这段话的上下文中把“工作”的窘境归咎于“过于成功的”雇佣劳动者。而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窘境。最多能归咎于雇佣劳动者的是，他们在历史上参与了强制性的“抽象劳动”，并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劳动概念。相反，达伦多夫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解释这种窘境，认为资本主义的种种生存条件是不容改变和不可取消的。如果“劳动社会”的标准连同一切与此相关的经济形式必须保留，而“劳动社会本身却开始倾覆”的话，（出处同上，第34页）那么当然就出现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达伦多夫只能用一种肯定语气和因此可以清晰地从中听出的压制腔调提出来：

“比如：组织劳动时没有严明纪律的话，那么人的生活将按照什么样的秩序去安排呢？或者如果人的生存不再建立在劳动成果的基础上，他们的生存基础又如何保障呢？……”（出处同上，第34页）

这是一个答案唾手可得的好问题：人力资源“纪律化”就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多余，人们也能够没有来自异化的机构和行为反常的资本主义“策划者”的外部强制下处理好他们的事情。从达伦多夫提出的问题中透出了陈旧的边沁主义逻辑，它本身就荒诞无稽。如果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来使用新的生产力，而且产品的分配完全不根据个人“工作成绩”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事会比用新的生产力来保证人类的“生存基础”更容易了。否则又会怎样呢？对于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之所以出现“不能解决的

问题”，只因为他们既不能也不愿去想超出那些已经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答案以外的回答。

京特·安德斯在几年前也同样觉察到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如同它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显现出来的那样；他谈到“今天，手段和目的相互调换了位置”（Anders, 1987/1977, 第99页）。这种错位原则上从一开始就符合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逻辑。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马克思批判拜物教的理论工具帮助的情况下，这种错位已清晰地呈现在这位没有成见的观察家面前。虽然他把这个问题错误地直接归咎于“技术”本身，但安德斯自发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理性地以自身为目的的，这在微电子合理化的条件下即使是盲人也当然能注意到：

“但是，以前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产品来满足需要，而今天的需求是工作岗位；创造就业将成为任务，工作本身将成为需要制造的产品……”（Anders, 出处同上，第99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是如此，被安德斯看做是原始的那种需求与生产过程之间的“简单”关系原本是前现代的。而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人为的稀缺以一种悖论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面世，只要资本主义的增长还有历史发展余地的话，这种人为稀缺作为需求和资源两者的关系就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欺骗性。恰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已让人领略到的风貌那样，“工作本身”作为“需要制造的产品”这个荒诞不经的事实也当然大白于天下了——然而就像安德斯还示意的那样，并没有引起任何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要求的彻底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响起要求“工作岗位”的可怕吼叫，这种吼叫今天仍不绝于耳，而且比15年或20年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震耳欲聋。

尽管资本主义的相关条件存在着不容再忽视的荒谬性，但在得到社会上各个阵营默认的情况下，克服它却始终是不能指望的；所以一贯的做法仍然只是多少有些规律地间隔一段时间里重复一遍对未来一个世纪的新繁荣并非真正乐观的预测；此类预测由于不祥地指出了“现代社会”无法透视的“复杂性”，难以道明它有朝一日会怎样，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圆滑得模棱两可。其基本思想完全在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最终会像前两次一样导致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上升。70年代和80年代严重的滑坡同与此相关的大规模失业一样只是那种转轨危机的暂时现象，这种现象以前也曾是结构性断裂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自从1983年以来，世界银行、日本国际贸易经济部、巴塞尔预测有限公司、慕尼黑经济研究学会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及欧洲和美国大量的管理权威们为90年代作了一个积极的“走势转折”的预测。

80年代中期，在德国出版了一本文集，题目十分典型地鼓舞人心：“我们面临金色的90年代吗？”(Jänicke, 1985)这个题目引起了对期待中的一个新的、持续高涨的“长期浪潮”的辩论。这个由熊彼特(Schumpeter)和尼古拉·孔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创建的“长期浪潮”的原理尽管同工业革命范围更广的设想不尽相同，因为这个原理只是涉及一个延长的经济景气理论；但是同时认为新的“基础工艺”和“长期繁荣”之间存在一种根本关联，就像它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经过一个造成大量牺牲品的痛苦潜伏期之后才开始应验一样（即使从未体现出一种普遍“提高富裕程度”的意义，而只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充）。这个“长期浪潮”的设想被转用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上的结果是，熊彼特提出的新企业界（主要是微电子企业）的“创造性破坏者”虽然先把在此期间已经老化的福特主义工业推向危机（“黑暗的80年代”），但之后随着新兴工业的崛起，它又成为了

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职位的动力源（“金色的90年代”）。根据这个模式人们仿佛解除了时代警报：

“大部分作者在这期间都一致认为，最后一次大规模机械化的长期浪潮随着1967年的经济衰退和1973年所谓的石油危机达到并超过了它的最高峰……旧的工业体系——比如汽车工业、生产大量电子技术产品的工业或者煤炭和钢铁工业——普遍进入了生存危机阶段……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渡过危机后又会出现‘上升’趋势。只要长期浪潮的普遍条件继续存在，这就是很平常的现象：一种工具理智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全力追逐权势和利润的人，科学、技术界和经济、政治界的先锋人物——还少不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潮流，这种发展到了一定时机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相互之间产生多方面的联系，同时渗透到旧的技术中去……电子工业体现着新兴工业的重点工程……繁荣昌盛的长期浪潮所需的动力以及支撑力均已存在……”（Huber, 1985, 第67及以下数页）

这里只是相当粗略地列举了长期经济繁荣的理论兜售的一些“要素”：从“工具理智”（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批评性理论当中这还是个受到批评的概念，在这里已经作为一个积极的条件出现）、追逐权势和利益的“先锋个性”（在曼德维尔的写作风格中几乎是作为楷模出现的品格）和“新技术”的相互作用中应该完完全全地产生出一个新的“积累模式”，这种关系在公理上全然被当作先决条件，从而不必再具体地陈述其原因。这样一来，这种未加分析处理的、仅仅切合于全球少数人实际的福特主义经济繁荣的经验便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永久的未来都有效的预测“模式”。对于这个“面向再次长期浪潮”（Huber, 出处同

上，第71页)的天真主张，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绿党的理论家们在80年代达成了一致共识。

在危机真正开始之前，这种从根本上解除警报的欲望——所有的阵营均是如此——总是附着着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提示：仍必须在必要的“框架条件”上下功夫。这样，兴趣便从对原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它的内部条件的分析转移到外部的框架，转移到“政治的形态塑造”和机构的前提条件。京特·安德斯在他的一篇短评中以暗示不祥之兆的口吻预言“工作的过时性”：“……我厌恶‘形态塑造’这个词，它应被列入黑名单，理当属于那些被鄙弃的词汇之列”（Anders，出处同上，第98页）。那些对“政治的形态塑造”信心十足的鼓吹者猜测说，与20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相似，在工业技术与和合理化的基础上虽然已经为一个新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内部前提，但是国家和机构的改变必须紧随而至。对危机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是沿袭了达伦多夫发出的命令，因为“框架条件”的问题很快就表明是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的问题，“适应”当然又一次意味着全社会无条件地屈从。

但是，自从80年代初达伦多夫做出申辩以来，虽然在全世界以及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确实持续降低了，但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却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开来，而增长率仍旧保持低水平或者在许多国家跌进深谷一蹶不振。在90年代末的今天，仍然丝毫看不见一个新的世纪性繁荣。可以断定，等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长期昌盛”就如同等待戈多（永远不会到来的人——译者注）一般。而随着微电子合理化的推进，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崩溃波及越来越多的领域，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职能已调整为不断进行管理危机，而且这极有可能成为长期的状态。

富拉斯蒂埃关于业余时间的乐观主义预言早已如石沉大海也



无人问津了，人们也都缄口不谈凯恩斯所设想的在生产力相应提高后的那种一周 15 小时工作时间的“疗法”了。虽然在 80 年代工会就尝试着把劳资协定中规定的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 40 小时（最低降至 35 小时），想以此从资本主义内部来解决“工作危机”。但是这个由健康人的理智做出来的设想却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像此前所能预见的情形一样，这个设想在使社会变成非理性的企业经济合理性中夭折。倘使在少数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即使在那些国家也只是在很少几个行业）能够真正通过谈判达成缩短工作时间的协议，但实际上在 90 年代期间这些缩短的工作时间已经搁浅并完全落空了：一部分是因为加班加点（甚至越来越频繁地不付工钱！），一部分是通过脱离受劳资协定约束的联合组织，一部分是由于公开的毁约。绝大多数国家和行业对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连名义上都没有缩短工作时间，而且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劳动紧张程度增大，甚至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出现大规模失业和不断加剧的贫困。在这期间，即使最发达国家的工会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的模式也销声匿迹了——无条件投降和自动放弃的征兆。“普遍缩短工作时间的时代结束了。”[Süddeutsche Zeitung（南德意志报），1997 年 7 月 2 日]——恰恰在一个自动化和大规模失业的时代。

社会公众和政府以及国家机器都同样拒绝从真正的、可以毁灭这个制度的程度上去清楚地认识“劳动社会的危机”。虽然已许久不再谈论新的世纪性长期经济繁荣了，但是取代这一热望的不是承认资本主义在微电子革命的条件下没有能力进行社会的再生产，而只是在同不断蔓延的危机打交道的过程中“照常营业”。于是，便形成了两个互补的行为方式。一方面，媒体、新闻和学术界的公众在讨论或只不过是策划绝对善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一直毫无结果；另一方面，那些行使统治权力的机构在用越来越强硬的社会福利限制条件来对付“过剩的”人力

资源。

为摆脱“就业的悲惨状况”而去琢磨与风车作战的方案几乎已成为所谓“怪癖思想家”的一种爱好，但不管怎样已成了有利可图的行当。从一份工作分做制到部分时间工作制直至地区性的“公益劳动”的“升值”，这一切都充满着错觉，这类错觉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因为它们天经地义的前提是，任一能够设想出的解决方法必须是与“市场经济”及其体系法则一致的。讨论中只触及皮毛，而并未涉及原因，因此这种表面上的争论抓住的也只是边缘问题和无法普遍的“就业”特殊形式。而社会的中心问题，即“抽象劳动”这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则完全被淡化了。这些不厌其烦地抛到市场上的“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变得如此明显地缺乏分析，如此的低劣和自相矛盾，即使是个孩子也能看透它们是多么站不住脚。只要尚还有些实质性内容可言，便无一不是对“框架条件”的各种修补，最后的结果都是降低工资和限制福利。这种离奇的讨论所发出的噪音掩盖了资本主义劳动管理的所有措施，它的最高目标长久以来就是尽可能无声无息地、顺顺当当地使大规模失业变得“看不见”：

“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在不久以前还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现在这些国家官方提供的失业人数在社会方面已经引起不安……真正的失业人数比起官方估计的数字大概要高得多。失业人数是一个棘手的政治话题，所以只有符合官方做出定义的数字才会在官方统计中被列出。比如说在德国，官方的这个定义被反复地修改，以至于在其他范畴背后，比如接受社会救济者背后，实际隐藏了大量的失业者。在一些发达工业国家，其中包括德国，只把那些寻找工作的人看成失业者，并且只在一定时间内支付失业金。在这样的前提下，不知有多少在经历反复失败之后就放弃继续努力和

满足于社会救济的寻找工作者……” (Kidron/Segal, 1996, 第 142 页)

从根本上说,出于政治方面原因,失业者的统计数字几乎到处都合乎规则地被歪曲了。一方面,大批的失业者没有再出现在统计数字里,因为他们的真实状况被粉饰与美化了:不仅通过改领社会救济金的办法,而且还通过国家的或国家支持的“就业协会”、“创造就业措施”(ABM),即所谓的转岗培训以及提前退休等措施。许多妇女,不仅是已婚妇女和有子女的母亲,而且还有“单身母亲”,被间接地强行“送回厨房”,这些常常完全被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就业者”统计数字中雇佣工人的数字看上去在不断增加,实际上他们只从事季节性的或非全日制的工作,甚至只是以小时计算方式受雇。

在美国,如果有人每周只有一或两个小时在超级市场为顾客往购物袋里装东西挣得几个美元,也算作一个“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和就业数字更加明显地被歪曲的情况是:在许多工业国家,实际工资的下降迫使越来越多的雇佣工人在他们的固定职业之外再打第二甚至第三份工,例如纽约在此期间有一种情况已司空见惯:一个机械工人在下班后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然后接着当几个小时的守门人和在周末作饭店服务员——仅仅为了几个小时,根本没有工资。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毁灭健康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的正常生活(医疗保险、住房、汽车)才能够维持。一种已经到了恬不知耻地步的做法是,把这种很久以来在欧洲已经盛行的情况描写成“就业奇迹”。所以,今天失业者的统计数字从根本上提供了一个歪曲和粉饰了真实情况的画面。但尽管如此,如果人们对 1980 年到 1985 年的第一次大规模失业浪潮直至九十年代末的进一步发展持续跟踪观察的话,可以透过官方统计数字的面纱至少了解到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爆炸性扩展:

失业人数（以百万计）

	1980	1985	1990	1995
联邦德国	0.889	2.04	1.883	3.210
法国	1.467	2.442	2.205	2.980
英国	1.513	3.179	1.556	2.454
美国	7.637	8.312	7.047	7.404
日本	1.140	1.560	1.350	2.098

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1998。

所有这些数字和它们的变化与其说反映了危机和相对的复苏之间的关系，不如说表明了官僚机构掩饰艺术的局限性：失业人数在每一次人为地降低后（尤其是1985年和1990年之间在那些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又被进一步的微电子合理化进程提升上去。失业者基数的长期增长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失业者在此期间按官方统计已经突破400万人的大关，据估计，实际上已经有700万人失业。在美国和英国，官方提供的失业人数不仅是成倍增加，而且是增加了二倍，甚至三倍。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C. 瑟洛（Lester C. Thurrow）作了一个完全与官方不同的统计：

“美国的失业就好像一座冰山——大部分潜伏于水下。略高于百分之五的失业率就相当于700多万失业者……但是除了官方统计的这700万失业人员之外，还有600万自称的失业者，如果问及他们的就业状况的话。但是官方不把他们看做失业者，因为他们不符合这个或那个前提条件——比如他们在前一周肯定积极努力地寻找过工作。另外还有450万小时工，但他们非常愿意能够整天工作……800万的美国工人只是从事临时性的工作。200万工人只是当雇主招呼他们

去的时候，他们才上班……这些成百万的人都不算失业者……此外还有600万介于25岁到60岁之间的男人从这些统计数字中消失了。根据人口普查他们确实存在，但是在工作岗位统计中他们却没有出现。他们不工作，却又不算失业，他们既不是学生也不是犯人。他们如何挣钱维持生计，（通过非法行为？）无人晓得……”（Thurow, 1996）

在英国，自从1979年以来失业者的统计方式修改了不下30次——结果往往是书面发表的失业者大军的数字减少了。（Lütge, 1997）按照现在欧洲国家的统计标准（本身已带有人为控制因素），在日本就业者的10%~15%实际上是失业者。欧盟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西班牙的情况（长年失业率平均为20%~25%）也说明了这样的统计是如何地产生误导，西班牙如今（1999年）宣告出现“就业奇迹”，因为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失业率分别下降到18%，甚至下降到10.8%。广受赞扬的荷兰的“就业奇迹”也是令人悲哀的：

“那些尝找到所谓隐性失业踪迹的劳动力市场调研人员得出了几乎令人吃惊的结果。最近麦金西（McKinsey）企业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引起了讨论。这次涉及的是对荷兰的失实报道。荷兰的失业率据官方所称，在解决失业问题取得巨大进展后失业人数达到6.3%。根据麦金西企业咨询公司公布的情况，那里有20%的人在寻找工作。该公司的调研人员将那些没正式寻找工作、但是愿意工作和能够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此外，一大批被认为没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也被计算在内。”（Lütge, 1997）

事实是，到处的正式工业工作岗位越来越减少了，如同阳光

下的雪。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字统计，仅在联邦德国，“生产性行业”中雇佣工人的数字在1991年和1997年之间减少了约300万，此为整个80年代中这个核心领域里的工作岗位大大减少后的情况。假如把手工业除外，那么，原来工业领域的岗位急剧减少的程度就肯定更加突出。根据达伦多夫提供的数字，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失业率在80年代初均上升到10%，在90年代末（即排除所有的人为因素和统计数字向其他范畴的“转移”）已真正翻了一翻，上升到了20%，而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增至10%~15%之间。

联邦德国失业人员绝对数字急剧地增加也应该归咎于对已经崩溃的原民主德国的吞并，在原东德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失业率已达30%，甚至更高。一般情况下这被作为外部的特殊因素来看待，认为是出自国有社会主义的累赘遗产。且不论按照对原联邦德国单独进行的统计失业率也同样势不可挡地增加了，这种自我辩解的理由从另一个原因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国有资本主义的政体没有显示出自己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制度，它并不是超越“抽象劳动”的另一类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的边缘“追补现代化”的一个变体——原民主德国的情况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流产。因为它（这是对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应）是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分割的领土，由于反对历史潮流而屈服于一个边缘国家的政权。如果人们知道，这只是涉及同一个商品生产世界体系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的“物态”，那么国家资本主义的崩溃则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身危机的历史，并非是外部因素，即“外来的”累赘遗产。可为此引以为证的是，对先进的西方竞争性资本主义变体实行的“开放”在东部使危机激化了，而不是减轻了。

原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之所以可以说是体现出一种特殊性，只是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个民族经济的牺牲品以这种方

式朝着同迄今为止的全球危机相反的方向从边缘直接融入一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经济领地。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过程，联邦德国作为德国历史的遗产公正地受到边缘国家更为严重的危机的感染。因为民主德国的灭亡是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80年代初以来不仅整个以“苏维埃经济”为核心的后起的工业化体系堕入深渊，而且在亚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非洲原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比起西方的“世界市场的主人们”来则更严重地受到微电子合理化造成的后果的危害（经历了短暂繁荣的东南亚国家随后也难脱此劫难）。

这就逐渐表明，几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边缘的国家，这意味着人类的绝大多数，不再能够承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资本费用——或者只是不惜代价，随之便掉进无望摆脱的外债陷阱。微电子革命在这里所产生的不是一种直接的作用，而是间接的并通过市场调节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业层面上出现的情况在边缘国家则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国民经济被用微电子装备起来的竞争的冲击所摧毁。

这样，结构性大规模失业一方面是一种直接技术性的、由于采用微电子技术而“通过合理化裁员”引起的失业现象——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这些国家有时候能将这个问题部分地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出口”。正因为如此，新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又通过世界市场的中介作用形成——即通过那些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微电子设备的工业的破产。这种情况是边缘国家的规律，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尽管持续地降价，它们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始终很昂贵，而且相对会越来越贵，因为它们自己的、不是用新的生产率标准制造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比来自核心国的、用微电子技术生产出来的进口产品的价格跌幅更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就进入一个经济的恶性循环，这些国家只能通过对劳动力敲骨吸髓的剥削来对付这个恶性循环：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危机在各核心国继续发展，但是本来很贫穷的资本主义边缘国家危机发展速度相对更快，这就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崩溃。

在这些国家，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也相对更为严重，它的统计数字比起西方来说说服力更小，因为另有一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暂时不为人所知或没有明显作用的因素。所以这种“次就业者”现象，也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零星地按小时或天数工作挣点小钱的实际上的失业者，这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比在美国要普遍得多，对那里大多数人来说，这早已是很正常的情况。出现在失业者的统计数字里的人是已经属于享有特权的少数阶层。像巴西这样的国家，1997年的失业率仅为5.71%，墨西哥在1998年仅为3.6%，这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在这些国家以及其他根本没有失业人数统计的国家，大部分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属于“被排除者”和“外来人”。

“许多贫困国家没有统计数字，即使有，也只涉及较小的经济领域、城市或者仅是首都。”（Kidron/Segal, 1997, 第142页）

在许多独立的组织提供的很少受官方人为因素控制的数字和估计中，失业率之高完全可以被看做是整个制度的全面崩溃；在阿富汗90%，在莫桑比克50%，在南非45%，在今天的南斯拉夫40%~50%，在约旦50%，在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35%等等。〔（资料来源：Kidron/Segel, 1997；Fischer Weltalmanach（菲舍尔世界历书），1999）中国1997年失业率按官方数字是4%，按独立组织的估计，真实的失业率是30%。90年代中期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AO）的一份调查报告断定：



“在自 30 年代发生经济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延续中，到 1994 年初全世界有 8 亿 2000 万人失业，占整个就业人口的 30%。” [转引自：Handelsblatt（商报），1994.3.7]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始终很谨慎的估计，这里面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因而 30% 的失业率反映出全世界的情况。1999 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至少有 10 亿人口失业。（《商业报》1999 年 3 月 15 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字，仅在东南亚 1997～1998 年间的危机中先后减少了 2400 万个工作岗位。此外，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尤其在前东欧国家，在中国、古巴、前南斯拉夫等国还出现了“工业”的现象。这一般是指在以前“追补工业化”时尚未正式展开的国有工业。这些工业名义上还“雇佣”着数百万人，而实际在经济上这些人是“休假中的亡故者”。这些工业只部分投产，如果不是以实物付给“雇佣者”报酬就是零散地发放一些工资或者根本不再发薪：

“俄罗斯私人团体以及国家机构不断减弱的支付能力已经导致了工资和退休金的欠发以及对供应商欠下的高达 260 亿马克的债务。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迫以实物形式代替给工作者和退休者发放工资——餐具厂家给工人发锅，糖果厂发几公斤巧克力，出版社发一大堆书。库尔斯克的企业如今给退休者发粮食和活蹦乱跳的小猪作为养老金。一些企业的职工经常在远离工厂所在地的街上出售这些代替工资的实物来换取现金。伏尔加格勒一家名叫阿明纳（Armina）的企业至今成果甚微，他们 3 年以来每月平均发 8 个挂衣架来代替职工的月工资（约值 42 马克）。这种不特别畅销的制品还被当作生育或死亡的物质补贴……” [Der Spiegel（明镜周刊），8/1997]

当然这只能是到工厂完全停产的过渡现象。不可再否认的是，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已经生活在资本主义之外，因而也就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而且也就只是艰苦度日。数十亿人落到只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自然经济的悲惨境地，并且受到资本主义管理下的现代生产力的广泛排挤。

从总体情况来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将近20年里引发了自从1929年以来最大的世界危机。认为已被最终克服了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货币经济已同“抽象劳动”一道在许多边缘国家崩溃瓦解。与此同时，微电子的自动化和合理化潜力还远没有被充分利用。70年代末开始，人类劳动力被“通过合理化裁减”排挤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种情形在今后几十年中还会继续下去。这个过程是分段进行的，并且总只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下压或技术的接口问题暂时中断。一方面，自动化随着每次新一代的微型芯片和软件开发而逐步推进，并在90年代后半叶又一次加快了速度：

“自动化在过去几年中对生产型企业重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装配车间越来越多地使用成本低的台式机器人，它们能自动完成较简单的工作……部件价格的下降也促进了自动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在过去几年里，工业机器人便宜了将近百分之四十，而且与先前的机器人模型相比，控制技术、遥感技术和操作界面的功能更加完善。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机器人技术日益渗透到那些至今几乎还在袖手旁观自动化进程的领域，比如家具制造业或建筑业，甚至医药技术。……”（Neugebauer, 1999）

另一方面，借助于微电子技术和新的软件程序，组织工作的

合理化也得到了加强。从生产计划到市场营销的各项活动和所有企业的层面并没有实现本身的大规模自动化，而是由于新型的电子一体化组织形式而完全成为多余。而继续推进自动化和合理化进程的结果当然是：间接通过世界市场的中介作用，边缘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还将进一步坍方。各个国民经济的毁灭都没有放慢速度，而是加快了速度，并且后果更加严重。

虽然资本主义的官方机构当然总是极力否认，但是一个新的制度危机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这一危机必将会使从工业化起步以来到今天为止的所有经济转型灾难相形见绌。即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质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最后挣扎。尽管各方信誓旦旦，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随着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之后出现的补偿平衡走势却没有如期到来。

虽然这次新兴微电子基础工艺及其产品的逐渐降价也已成定局。大容量的计算机在几十年前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和国家机构才添置得起，而今天的孩子们在圣诞节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游戏机作为礼物。个人电脑在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相对昂贵的生产资料，但如今早已经成为了大众消费品。但是，一个类似福特主义的积累和“就业”的效果却未达到。理由是微电子技术使更多的“抽象劳动”变得多余，在程度上超过它们产品的降价和随之而来的市场的扩大。这首先是因为，微电子合理化的能力比福特主义流水线生产能力大得多，并且能够被普遍地投入使用：它们已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先行一步。

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新增入大众消费的产品招架不住“合理化裁员”的潜在能量。这个棘手的工业滚雪球式体系不可逆转地停了下来。第一次工业革命曾首先摧毁了那些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使他们大批地“失业”，目的是将他们逐渐在最低的生活水准上融入到工厂体系里。第二次工业革命

最初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一次在工业资本自身的基础之上导致了一次巨大的突破，为的是在战后历史时期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实现全盘资本主义。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解雇了它的孩子们。这一以自我反馈的方式将人类能量转变成货币的世界体系最终表现了自己的荒谬。这种生产方式深刻的的不合理性显然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合理性被宣告为舍此无他，同时将永远决定人类的命运。

### 国家的退位

从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所形成的“劳动社会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同一时代里用权力达到的“市场经济的世界共识”只能表明资本主义机构和它的意识形态代表人物越来越缺乏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这种危害公众社会的无视现实的盲目性只有一部分原因是出自战后历史的特殊格局。

凯恩斯主义学说作为对两次战争间隔期间经济大萧条做出的反应，在经济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在与东欧集团的制度冲突中，在社会福利方面做出种种让步看起来是明智之举。此外，至少一部分资本主义的领导精英们形成了一种多多少少与凯恩斯主义有联系的认识：耐用消费品的“投资性大众消费”既然已经成为这种制度的一个支柱，那么也应由国家给予支持。福特主义的经济繁荣通过这种方式甚至能够超越它的内部障碍而延长下去。但是当货币体系重新开始急剧通货膨胀而且凯恩斯主义因此也宣告失败的局面明显到不容回避之时，人们做了些什么？人们后退了，并称之为进步。

因为除了由重农主义者斯密、李嘉图和萨伊开创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之外，资本主义思想作为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的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总结也就只创造出了凯恩斯的学说（此外还有“追

补现代化”的整套国有资本主义版本的边缘分支)，并且为此而使出了全部招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因为这种制度总是只能试图变换使用市场和国家这两个压制性的异化权力来解决自身的矛盾；所以它的各个机构在两种可能性都招数已尽的情况下也就气数已尽了。

所以对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的认识本应同样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的历史性失败的供认不讳。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和领导精英们对此从来不会公开承认。因此结果只有一个：按达伦多夫在第21届德意志社会学家会议上指明的方向回到纯自由主义的老路上去，违背一切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倒行逆施；所以虽然是路，但却把这种绝路当作通途。

达伦多夫所表露的这种对迄今资本主义历史近于病态的健忘症，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成为世界现象。在凯旋的队伍里，资产阶级社会抬出从坟墓里挖出的18世纪至19世纪初经济自由主义早已腐朽的白骨，以用此科学苦难的遗骸来向世人宣布伟大的市场经济的未来和一个气冲霄汉的乐观主义新气概——当然这是一个咬紧牙关硬挺着的乐观主义。“抽象劳动”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危机的开始和那个意识形态的转折同时发生，这一转折在此期间被称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或“新古典主义反革命”。另外一种说法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化”，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过时的学说只有作为对人类思考能力的原教旨主义侮辱才能够卷土重来。

极端强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首先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得以实施，这绝非偶然，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那里起源，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上升的这个世纪也比在其他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活跃和更为明显。原美国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总统期间（1982～1990）和英国保守党人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执政期间（1979～1990），

新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几乎上升为国教，这样就能够从世界资本的这些领导国家迅速传播到全球。

当然，应从政治上和机构上接替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在理论上和战略上有一定的背景。因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尽管看上去已经衰竭没落，但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战后经济时期和福特主义经济繁荣时期还保留了一批顽固不化的信徒，并可以说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阴影中继续发展。新自由主义的鼻祖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他也许是迄今为止所有自由主义理论学家中最坚定和最教条的一位。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为极端强调市场的反革命作好了准备，而且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真正成为调控模式之前。与所有无视现实的盲目教条主义者一样（他们越是偏执地坚持自己的教条，表面上就越加起劲地抽象反对那些教条主义），哈耶克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展现在他面前的世界是倒过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在上百年的长期过程中不断加强的国家经济调控机构并不是对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不可避免的反应，而是正好相反，大的危机、崩溃和取消社会福利都应归罪于人类偏离了原来自由主义的“纯正学说”，是由“过多的福利”造成的：

“由于……那些因物质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看起来似乎合情理的、无止境的要求，人们在世纪之交越来越背离了自由主义基本思想的信念……人们只是对新的要求感兴趣，坚持旧的原则似乎对迅速满足这些要求形成了障碍。有种观点不断传播开来，即不要期待一个新的进步在政府原先曾取得过新进步的旧有发展方针下实现，而是必须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造。这种观点谈论的不再是对现存机器的补充或改进，而是认为必须将它扔进废铁堆，再用另外一个来代替

它……随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的倒退，对那些依赖于它而存在的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了……根据那些今天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如何能够从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力量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已无关紧要。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已提出了一个任务：放弃那些效果不可预料的力量，脱离个人的和匿名的市场机制应该让位于集体‘有意识地’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引导到明确确定的目标上……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这同一种社会主义，不仅以前被人们认为对自由主义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而且还以完全公开反对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主义而起步，恰恰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承认……为了使论据具有说服力，对自由一词的意义作此轻微的改动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政治自由的那些伟大信徒来说，这个词意味着从专制中解放出来，从他人的独裁中解放出来……相反，即将出现的新自由应该是摆脱苦难的自由，从我们大家只能被迫选择有限的生活用品的窘境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一个人获得的会比那一个人多很多……”（Hayek, 1945, 第39页，第44及以下数页）

这样的一个自由概念，也就是从社会的困苦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统派自由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的。哈耶克显然是在诋毁这一基本的理智要求，即社会应该“有意识地”（他故意轻蔑地给这个词加上引号）自我调节，而不是通过无意识的、匿名的市场机制来调节。在他至今纯粹无比的形式里——比自由主义的古典派巨匠们更纯粹——自由主义的非理性的根底暴露无遗：把企盼一个有清醒意识的公众社会的要求看做违背了一个对社会有害的、盲目运转的社会机器圣灵的行为，这部社会机器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释成自然的规律。

但哈耶克也许是第一个没有用费解的措辞，而是完全开诚布

公地并几乎是用幼稚的强调方式来表达这种非理性的基本思想的人：当然只是为了使这种本身就很荒谬的、向一种有清醒意识的社会存在的宣战得以用一个理由来加以合法化，即他把对资源的“有意识的引导”仅仅理解为通过一个权威“机构”来实施“龙形海怪”的国家计划。他以此可以把对全部现代思想的理解都作为依据，也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就这样，哈耶克用单调乏味的自由主义辩证法论证着“平等”（化名为“福利保障”）和“自由”（化名为“经济个人主义”或“自由竞争”）两者之间离奇的矛盾，目的是最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在两者中选择臆想中的“自由”这一极。

哈耶克没有发觉，他这里只是论述了自由主义本身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只不过是作为腐朽的遗产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内部，并显示出一个封闭的商品生产制度中那种分裂的非理性的结构。这种非理性的结构导致用于生活的共同再生产的社会资源的投入使用不是由社会的成员有意识地决定和组织的，而是他们自己的再生产自相矛盾地作为所谓经济的不可控伪自然规律关联阻碍了他们。众所周知的结果便是，真正的社会关系分裂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匿名市场的相关范围内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是国家人员管理的机器，这个机器调控着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再生产形式的前提、损失和副作用，然后再依据由这一盲目的制度过程已预设好的种种选择可能性进行民主协商。

在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毫无自由的痕迹，也就是不存在对自己事务的自决权。国家从它的本质来说，在民主选举中仍然是个庞大的“龙形海怪”——一个相对于个人的外部机器，它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来调控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是”国家，而是它的管理对象。但另一方面，这部国家机器从政治最高指挥部门直到地方行政机关中的各层人士都不是人员管理的主体，他们



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同样只是执行任务的公务员和（国家—法律的）“劳动力”。这部机器本身虽然是由人创造出来并被人操纵使用，却组成了一个超过任何意愿和每个自由决策可能性的卡夫卡式结构，因为这部机器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以非理性地独立的经济为目标的。

由于社会主义者只能够在从自由主义那里接受的过来的“龙形海怪”形式中去思考“社会意识”，必然会把社会意识形成的纲领变成一种通过国家权威和官僚主义来驯化人力资源的行径。哈耶克白费太多力气就断定了国有资本主义这种悖论的两个版本，它们分别体现为追补现代化政权的“强”版本和西方凯恩斯主义调控的“弱”版本；前者作为“社会的强制性组织”，后者称作“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于1945年出版的书的名字）。

分裂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另一面，即匿名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导致奴役。抱有经济“自由”意愿的个人已经先验地对那些盲目的“市场规则”负有强制性义务，并且首先被定义为单纯的“劳动力”。他们荒谬的“自由”在于给自己的生命套上劳动力市场的枷锁，他们不过是在“美妙机器”逼迫下的强制劳动者，他们不准询问整个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最不允许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幸福。京特·安德斯在30多年以后，在新的严重危机即将来临之前，将这种企业经济奴役的基本事实描绘得淋漓尽致：

“（雇佣工人）不自由不仅是因为他毫无占有‘他的’生产资料或产品的可能性，而且还因为他不能综观自己已经与之融为一体之生产关联的全局，对最终产品及其性质也同样了解得很少——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仍是‘超越感官直觉的’；他对‘他的’产品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质量同样知之甚少；对这些产品的得益者、使用者或牺牲者所掌握的情况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这一切——因此也包括他自己的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他背后进行的。35年前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工厂，我和我其他的同事们就有过这样的体会。当时我们‘在我们面前’所见到的朝我们过来并立即又离我们而去的惟一东西是我们必须加工的产品部件——我们也不再希望知道更多或看到更多，我们已经被剥夺了好奇心；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缺乏任何兴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更多或看到更多呢，这样我们又会从中获得些什么呢？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应该去工作，而不问情由。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向工头或任何其他他人打听我们工作的情由，那么这个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会被视为怪人打发走。‘那不关你的事’，而几年以后，在麦卡锡时期，他也许会被当作‘对国家安全有害的危险分子’……”（Anders, 1987/1977, 第91及下页）

人们在清醒的状态下牺牲每天、每周、每年和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奉献出自己的能量而做事，但却丝毫不能行使过问它们内容的和社会情况的自决权。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奴役吗？如果说那个抽象“自由的”资本主义人从国家-民主方面来看仅仅是一个全方位的人员管理的对象的话，那么从市场和企业经济方面来看只不过是一个在大规模竞争的“全面战争”中的一支准军事化组织的部队里服从命令和俯首帖耳的劳动士兵，他必须按照一套使他降格为附庸的执行机关的规章制度行事。他必须为强加于他的不知所终的目标捐躯，所以这个“自由的”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奴仆，表面上看他可以自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选择他的“主人”。而这些“主人”既在企业经济也在政治-民主的层面上本身也都只是“美妙机器”的奴仆，只不过是那妖怪般的自身即目的机制的“领头劳动力”，这种目标本身也使他们的行动不独立和不自由。

自由惟一的意义应该在于，为了自己的生活而进行再生产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仅自由地进行这种生产活动，而且共同商讨和决定其内容和行动方式。这个只是在那些有关委员会的思想中短暂出现的标准由于缺乏对“抽象劳动”和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交往方式的批判而夭折，它作为根本上的另一种社会化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由正好会成为在劳动力市场强制下普遍的自由奴役的反面，它从原则上来说在社会再生产的所有层面和环节上都可能成为现实——从家政到跨洲生产网。这当然需要机构的中介调节，但这样的中介调节却不违背那个标准。

这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根本不成问题，今天会比以往困难更少，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不仅在工业而且在其他领域齐头并进。所有参加的社会成员在商议和决定共同资源的投入使用时不需要他们之外的“有关当局”，不需要官僚，不需要世界政府，也根本不需要“无所不知的中心”（任何一种“龙形海怪”国家计划—意识形态的虚构）；而恰恰在应用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网络技术中，那个“中心”会无时无处不在。

我们应该还记得戈特—奥特利里恩菲尔德所说的“顺从的垂直形式”和“邪恶的水平形式”。不仅国家对人的管理，而且企业经济的组织最终也都总是纵向的；商品生产制度的机构就其本质来说起源于早期现代军事专制对社会的再组织。因为这个垂直的统治结构被定死在“美妙机器”以自身为目的的运转方式之中，所以不管是政治民主或者“平等”的、表面上不分等级的管理都无法对此改变分毫；这些无非是边沁使垂直的统治和镇压结构扎根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那一套方法。社会的解放以“邪恶的水平形式”为前提，（“邪恶”当然是从资本之占统治地位的、非理性的目的形式的立场来看），也就是所有参与者的直接交流，并且是在他们的行动目的被确定之前，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目的。为此惟一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大

的、不必直接服从生产的需要的社会时间储蓄。这样可在生产力发展比较低的阶段用限制生产来换取一个直接的、“水平的”社会化。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一个没有垂直统治结构的社会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交流如果比较频繁的话，即使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肯定没有人会饿死；而且对自然认识的发展和技術等的发展——与自康德以来的资产阶级的推测正相反——也绝对不会停止，而是或许会放慢，但不会造成如此的灾难。我们不能把它断定为“客观的必要性”，而只能看做是经验性的事实，即至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是以独立的社会拜物教形式并且因此也是在种种垂直的统治结构中进行的。这些结构以非理性的和大规模破坏的方式垄断了不断扩增的社会时间储蓄。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走向资本主义的极限，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走向至今为止的历史的极限，因为它如此迅速地扩增了社会的时间储蓄，以至于不再能积极地少数人以物神的统治形式来垄断，而只能是消极地以全球“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社会灾难的形式显露出来。这种灾难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客观上（技术和物质上）有足够的时间可供社会支配，因此建立一个没有社会统治者的、“水平的”大同社会是可能的，在这个社会里，物品的生产只需很少的时间，所有的社会成员持续地参与关于资源合理调配的交流和决策过程，当然此外还能够拥有大量时间去实现个人的自由选择。但这种可能性同时也是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时间储蓄只能积极地用于建立一个“水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摆脱国家和市场，不再被套牢在这个非理性的两极化的矛盾结构中，而是用“单极的”形式即通过直接交流来取代政治和经济。

那种要求“工作岗位”的震耳欲聋的呼喊盖过了理智的声音，但它表明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认

识社会自由。所以在国家经济滑坡的时候，意识倾向的钟摆就必然重新荡回到粗暴的自由主义和怪诞的经济“自由”这个概念里去了，这绝对不足为奇。哈耶克在向凯恩斯主义的过渡中早已为以上的摆向做了准备，并且事前就宣告，回归自由主义只有通过将它“极端化”才可能实现。正是因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幻想早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加以否定，它们只有通过一个极端的激化才能重新有活力。

从根本上说，哈耶克重蹈了以前国有社会主义的覆辙。只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如果说国有社会主义者试图化解资本主义不可救药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进而让作为总企业主的国家吞噬市场，那么，哈耶克如今却相反地想让国家被市场吞没，这一绝招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自由主义设想。1979年2月6日，哈耶克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开始之时，在弗莱堡大学礼堂里作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报告。透过那温文尔雅的学术语言，使人听出了自由主义原始语言中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反对社会福利的调门：

“社会福利不表示任何确定的理想，而是在今天更多地用于夺走自由社会规则的内容，我们的富裕理应归功于这个自由社会……我必须承认，即使您会对此吃惊，那就是我对社会福利持不赞成的看法，因为我无法得知，那意味着什么。”（Hayek, 1979, 第16页）

哈耶克不仅仅是想在福利国家真正建成之前削弱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调控国家。他宣称国家应该全面退位并放弃连自由主义的大师们都从未产生过疑问的、或者在此期间已经被自由主义勉强接受的职能。同时还要求重新取消国家的货币制度和用一种货币发行者的“自由竞争”来代替国家的货币。但是，哈耶克

即使在凯恩斯主义时代也绝不孤立。他本人是维也纳大学老牌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捕食者”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 Mises, 1981~1973）的一个学生，从1927年到1931年接替米泽斯担任成为那里的经济发展趋势研究所的所长，从那以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1931~1950），接着在芝加哥大学（1950~1962），从1962年起在布莱斯区的弗赖堡大学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无一不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这一经济学流派后来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哈耶克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生都完全继承了他的思想，并且用越来越尖锐的话语发表见解；芝加哥学派的领头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企业家不去为他们公司的股东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而是承担另外一种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很少会再有这种能够如此彻底地埋葬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基础的发展趋势了。”（Friedman, 1971/1962, 第176页）

可以看出这个极端化走得有多远的证明是，就连现代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正宗自由主义奠基者亚当·斯密也未能逃脱被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者默里·罗思巴特（Murray Rothbard）指控为异端邪说。《金融时报》里一篇对此大为吃惊的评论文章断言道：

“亚当·斯密使经济理论的发展倒退了一个世纪，他给马克思主义骇人听闻的行为铺平了道路。这些重量级的批评可以在默里·罗思巴特分为两卷的著作中找到……1995年去世的罗思巴特是少数献身于以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和费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传统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根据罗思巴特的估计，亚当·斯密完全

没理由享有他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的声誉。罗思巴特认为，斯密不仅赞成公共建筑和国家教育，而且还主张对银行业的调控、累进所得税、严厉的反高利贷法和众多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斯密的观点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倒退……”（Prowse, 1997）

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疯狂的青年派”同样以粗鲁的话语发表言论；在芝加哥，这种家丑一直没有外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的题词中嘱托他的儿子大卫（David），必须把“自由的火炬举到下一轮”；他的儿子完成了这个嘱托，11年后发表了一部作品，作品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题目《自由的机制》。这个十足边沁主义的“自由机器”的思想得出的最后结论是：

“如果有人责备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想回到老牌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中去，那么这会是一个诬蔑，因为他当然要将守夜人的官府私有化。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政府所做的一切事，可以分为两大范畴——一类是人们今天就能够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任务，另一类是我们希望明天能够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任务’……弗里德曼认为，例如通过私人破案就比通过国家效率要高。一起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必须将他应得的赔偿金或抚恤金出售给一个私人企业主，然后这个业主向罪犯索回——不管是死还是活。这难道不让人想起美国野蛮的西部地区缉拿悬赏人犯的私家侦探了吗？为什么不呢，弗里德曼说。‘这个制度运转得很好’。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极端的，但是他不是孤家寡人，极端资本主义在美国很吃香……”（Piper, 1997）

这里描绘出的一个恐怖社会的轮廓是反面乌托邦作品的作者们在世纪的前半叶连做梦都没想到的情景。不再是万能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在维持全面的统治，而是在一个孤立的社会里由在市场上有支付能力者的强大个人利益来掌管一个同样可怕的恐怖政体。代替万能的国家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是私人的保安人员、“黑长官”、打手、保镖和敢死队。但是这个截然相反的反面乌托邦不是在发出警告，而是非常严肃地提供了一张积极的社会蓝图，如同它应该做到的那样。

诚然，不是美国特定的情况滋生了极端化的新自由主义，即使这一思想财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最迅速地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哈耶克的飞黄腾达就已表明，这一思想源远流长。新自由主义的德国变体和瑞士变体以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 1891~1950）和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 1899~1966）为代表，它构成了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经济政策的理论背景，并和哈耶克以及他的学生们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奥伊肯和勒普克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结论同样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学说，他们发现了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自由竞争从机构上没有充分的保障，垄断的形成阻碍了它造福于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要求，为了合理地使竞争机制得到保证（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变体因此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国家必须创造秩序在政治上的框架条件，此外只允许国家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有限的干预，这无论如何都已不是广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投资社会主义”和“赤字财政”。这个秩序自由主义的变体比极端的奥地利-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更温和些”；但是哈耶克运用了一个出色的技巧，来从理论政治上和战略上阐述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立场。1947年，于沃韦附近的朝圣山（瑞士），在哈耶克的指导下成立了直到今天都有广泛影响的朝圣山学社，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智囊团，



同时是一个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三 K 党，其目的是长期施加资本主义经济极端主义的影响，在 50 周年庆祝会上一篇善意的报告无意之中将此披露了出来：

“（从）1947 年 4 月 1 日到 4 月 10 日……在沃韦地区的朝圣山，39 位科学家、企业家和记者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邀请会聚一堂，讨论一个自由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威胁。10 天后在闭幕时……与会者决定成立以会议地点命名的学社，实现了哈耶克的夙愿……这个当时还是圈子内部的和主要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社到现在间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地区 500 多名自由主义者的哲人之家……朝圣山学社（MPS）每隔两年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举行所谓的一次全会，中间还举行地区性会议。这些活动是讨论会，是对内部的，不是对公众的。这些‘封闭式的讨论’容易使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学社……因为……不允许媒体正式采访，身为会员的少数几名记者虽然可以报道讨论的实质内容，但是不能太深入到细节部分……” [Neue Zürcher Zeitung（新苏黎世报），1997.5.3]

朝圣山学社在幕后推行的是狂热的科学政治自由主义，他的成员占据了学术界的关键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短暂的凯恩斯-福特主义经济繁荣的后期就已经载入新经济极端主义的成就史册，哈耶克于 1974 年和（老）弗里德曼于 1976 年被授予诺贝尔奖。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阴谋”的味道；但就像往常出现这一类情况一样，主观愿望被过高地估计。在一个分裂的、建立在非理性的拜物形式上，而不是建立在交流的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不仅有垂直的统治，而且还有朋党、帮派和集团，贿赂和黑手党，非正式的圈子和各种

形式的三 K 党；但只有当“客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的景气迎合他们时，才会在科学和社会政治的领域中也出现这样的拉帮结派。

这在经济学界中和在资本主义领导精英那里绝不纯粹是理论上的景气状况，使新自由主义在走过一段漫长干渴路程后又重新得到水源。即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的话，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曾经在理论上的“大获全胜”充其量是有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幸的。因为对世界经济危机来说这个“普遍理论”来得太晚。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实践如同纳粹经济一样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基础上，但是这个政策是在自发和务实的情况下产生的，无论如何不是“运用”了凯恩斯的干预理论。在战后时期，只有那些学术上还没站住脚的年轻一代经济学界人士大部分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信徒，而老一代都相反，他们大都拥有了教授职位，继续代表着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

虽然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实践在经济繁荣和由此产生的要求以及与东方集团之间制度竞争的压力下不管愿意不愿意看起来总是更像凯恩斯主义，但是无论如何不是处处都在实行凯恩斯主义，而在很多地方更大程度上是被胡乱修改了的自由主义成为官方学说；在联邦德国，明显是奥伊肯和勒普克的“秩序自由主义”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方案提供了理论背景。这在理论上和社会政治上都导致这样一种荒谬：在经济政策上带有古典自由主义或者甚至新自由主义正统背景政府在行动上越来越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但却并不是像凯恩斯原先所指明的那样是为了克服危机，而是为了促进和延长经济繁荣：一部分用于与国家高额投资有关的、为广泛实现全盘资本主义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一部分用于促进大众消费而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

当 20 世纪 40 年代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最终变老并占据了那

些领导位置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伟大时代似乎就要来临了，但是它也已经结束了；因为随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极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同时也登上了历史的宝座。这段奇怪的历史表明，凯恩斯主义原来一直完全与危机无关，是一个不受经济行业、政治阶层和资本主义领导精英宠爱的非亲生骨肉——虽然它包括了惟一可能的纲领：尽管资本主义自相矛盾也去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并使这种生产方式全面占领整个社会（只要存在这种可能）。

这种“忘恩负义”证明了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的推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偏激的基本态度，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等人早已将此和盘托出：那种嗜权力成性者完全不合逻辑的信仰，即资本能够无限制地借助于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而不断积累，在原则上就必须让这些人力资源保持“穷苦劳动者”和逆来顺受的状态。这正是微观经济学的，即纯粹企业经济的和伪个人主义的观察方法，这也正是达伦多夫不无道理地表达的看法，并且可以说是资本的“自然天性”。因为实际上这是惟一可能的观察角度，而宏观经济的或全社会的观察角度仅仅是一个虚拟出的和理论上的立足点，它要求“经济行动者们”形成一种对他们来说原本很陌生的反省特点，这个特点会与他们行为产生矛盾。

这个立足点之所以是伪个人主义的，是因为它严格地说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管理者个人的立足点，而正是这同一种经济“个性”在面对劳动市场时对依附于它生存的人来说就意味着荒谬的和自我毁灭的结局。但即使对管理来说，这种听其“自然”的个人主义—企业经济的观点也走入了那条宏观经济—全部社会的死胡同，它的影响又重新返回企业经济的层面上。这个经济的“它”始终想把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商品聚集地，同时把广大民众的生活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出于这种阴暗心理而顽固地与一切理性的认识为敌，要想说服它放弃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企

图，如同尝试把一个食肉猛兽训练成一个素食动物一样渺茫。

由此可见，使极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理论背景原本就早已存在；它只需要使凯恩斯主义学说在实践上也注定失败的经济社会环境，为的是放出这只猛兽。这种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经过穿越所有国家机构的艰难攀登之后终于到达顶峰——为的是必须马上再下山。因为正如在同一时间内，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的政府最终都或多或少公开地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而有关的主张也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于是，一个新的危机便开始了，它不仅结束了福特主义的繁荣，而且还会宣布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崩溃。

在美国，来自传统的社会自由民主党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1960~1968年就用“伟大社会”的纲领引进或加强了凯恩斯主义有关社会福利政策和国家调控的一些思想，它直到保守的共和党人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R·福特（Gerald R. Ford）任总统期间也没有被取消。但首先是民主党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执政期间（1976~1980）开始尝试制定新的社会福利纲领。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执政时的英国工党政府在1945~1951年也贯彻了凯恩斯主义的纲领和甚至国有化，当然这些措施在保守党的温斯顿·丘吉尔和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到1964年的执政期间又部分地被取消了。从此以后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一直在福利问题上激烈地争论不休，最后到1974~1979年间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执政时具有明显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工党政府当权。联邦德国在康拉德·阿登纳和路德维希·艾哈德长期主持下的保守政府于1966年首次被一个“大联合政府”取代，直到后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建立起带有明显凯恩斯主义倾

向的社会自由主义政府（1969~1982）。

在通货膨胀危机的影响下，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那些最大的工业国家几乎与卡特、卡拉汉、施密特政府同时失利。里根、撒切尔和科尔的“转折”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单纯的政府的更迭和一个政策的转变；这意味着突然转回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这是与保守党和自由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朝圣山学社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长期以来和时胜时败地推进的结果：

“从德国经济和货币同盟（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弗赖堡学派，然后是重新拾起朝圣山学社队伍中许多人的思想主张的里根年代和撒切尔主义，直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温和革命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一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Neue Zürcher Zeitung（新苏黎世报），1997.5.3]

首先是里根和撒切尔有了重大突破，对此资本主义精英们下意识的反社会福利情绪和通货膨胀危机混合成引爆的导火索：“犹如世界末日预言中描述的一个庞然大物，从美国阳光地带的园囿突然冲出了里根主义……”（Davis, 1986, 第13页）。这个激进的转向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之所以具有诱惑力，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大规模通货膨胀，而且还有让任何书本知识都束手无策的急剧上升的大规模失业。对于这些现象凯恩斯主义已无法再加以解释，更不用说提供克服办法了。因为凯恩斯所考虑的“赤字财政”的“定量”微观通货膨胀应该自动地保证充分就业。

在这方面传播甚广的是以英国经济学家 A.W. 菲利普斯（A.W.Philips）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根据这条曲线，通货膨胀和劳动失业基本上应该处于一种交互关系：通货膨胀率越

高，失业率就越低；反之亦然。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个5%的通货膨胀率比5%的失业率更好的纲领。现在表明，“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立不住脚的理想，因为不仅通货膨胀面临失控的危险，而且这个假想中与此紧密相关的就业自动机制也不再起作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似乎是辉煌胜利者了，他早就声称，与凯恩斯主义机制（系统的低息政策、“赤字财政”）相关的通货膨胀久而久之既不能受到控制，也不能阻止失业。国家的惟一任务必须在经济政治方面，通过相对的高息政策和严格的财政纪律为各种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而保证作为框架条件的货币稳定（因此把这个学说命名为货币主义）。弗里德曼反复强调，这样的关联是一种更简单的关联：

“如果人们能够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数量，也就是产出，与货币数量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那么物价原则上呈稳定状态……当货币数量比整个产出增长速度快得多的时候，就出现通货膨胀。每产出单位的货币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定理像这个定理一样无可辩驳。产出由于可供支配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由于知识水平和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而受到限制。在最好的情况下产出也只能缓慢增长……”（Friedman, 1992, 第199页）

的确很简单：通货膨胀的万恶之源是货币数量比商品数量增长得快，所以治理方案即是，货币的数量必须严格地适应实际的商品数量。这当然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何为“实际的商品数量”？据弗里德曼声称，这就是用可支配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的知识与能力可生产出的数量。按照新自由主义喋喋不休的说教，这在社会政治上意味着：“被分配的只能是那些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自由主义假装得比它本身更加幼稚。同样

幼稚的是弗拉斯蒂关于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的说法。就像受企业经济合理性支配的劳动时间不是生产力的“自然”潜力的大小一样，这个“自然”潜力同样也不是商品的产出。

商品生产的数量和根据需要的分配无论如何也没有与现存的“自然”潜力、物质资源和知识的可能性相对应。取而代之的是产出只服从惟一的金钱标准，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的利用过程来决定的。用弗里德曼自己很动听的话来说叫做：企业家惟一的社会责任在于，为他们公司的股东尽可能获取最多的利润。“实际”在这种意义上无论如何不是物质资源和科学技术资源与商品数量相符，而是商品的生产数量遵从所谓的赢利标准。赢利的水平再由整个资本主义（今天是全球的）的利润平均值来确定。这意味着，如果获得的利润在赢利水平以下的话，甚至生产出的商品即使有利润也会“不赢利”。这样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荒谬的情况，一种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高度“不赢利”的生产会消灭经济“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虽然有功能适当的物质商品是用现有的物质资料生产出来的。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总是在它“自然”的技术能力以下进行生产。即使社会急需的某些生产资料在技术可能的范围内，但这些商品既不被生产，或生产出来了也不被充分地利用。

这正是为什么在危机中大批的生产资料被停产，而同时民不聊生的原因所在。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凯恩斯担心，这个荒谬的“丑闻”可能激起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不是为了结束这件荒谬的事，而是为了拯救这个制度，他想通过“赤字财政”的计谋在一定程度上来巧妙处理“自然”的生产力所面临的危险的资本主义局限性：应反（企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的逻辑而行事，采取国债和低息政策使货币数量刚好与商品的可能产出的真正的（物质—“自然的”）量相匹配，并且以此保证充足的消费和就

业。

如果用这样“计谋”确实已经超过了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知识的界限的话，那么当然额外地制造货币也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论证大出其丑；实际上它只是说明，凯恩斯主义的花招使实际存在的生产可能性在利用中“违反禁令地”越出了资本主义的界限。产生这个充满危机的结果的原因看起来不是生产资料在工业技术上将被过度地使用，而是（如同弗里德曼自己所言）在于被“贬值”的货币，因为它促使物质生产资料必须遵从资本主义的不理智本性而停止运行。这个“菲利普斯曲线”如此看来只是一个暂时有效的指示器，它指示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货币的数量和生产力的“自然”潜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一致到什么程度，同时不冒使货币体系彻底毁坏的风险。

这个机制之所以被废弃，是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远远超过以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开始使企业经济的赢利和生产力的“自然”潜力之间的不协调关系灾难性地两极分化了。当生产的技术能力通过微电子合理化飞跃性地提高时，失业率也使购买力以同样的幅度下降。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人为地”增大货币注入量来克服物质的潜力和资源所受到的资本主义的限制，这个办法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也行不通——一个标志就是实际的生产能力正以何等的高速度开始脱离资本主义的赢利标准。

这从中期眼光来看最终意味着，规模空前的资本主义仅仅还能在通货膨胀带来的毁坏和通货紧缩造成的崩溃之间进行“选择”了。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代表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个矛盾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所以在他们的斗争中，尽管货币主义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最终还是没有胜利者，而只是在才智上和实践上同遭破产。

弗里德曼过于简单的设想的结果是通货紧缩的危机替代了通



货膨胀的危机。他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绝不是现有的生产资料、物质资源和科技力能是“自然”的，而仅仅是货币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对他来说这是惟一可以想象的、社会“可以”用来调动它的物质辅助手段的形式：

“金融主管当局只能够通过通货膨胀将市场利率降至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之下，他们只能够在自然利率以外通过通货紧缩来降低市场利率……这种分析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了其旁证……高就业水平表明劳动需求过剩，这样就抬高了实际工资率。低就业水平标志着劳动供给过剩，这样就降低了实际工资率。换句话说，这种‘自然的低就业水平’是从……平衡制度得出的结果……与利率的情况一样‘市场水平’只能够通过通货膨胀保持在‘自然水平’以下，并同样也像利率那样只能通过加快通货膨胀的过程来调节。”（Friedman, 1976/1969, 第144及以下数页）

一种“自然的”利率和一个“自然的”货币量必然导致一种“自然的”和必须忍受的失业率。弗里德曼用这个论证把国家从必须保障“充分就业”和大众消费这个令人厌烦而实际上已不能完成的任务中解脱了出来。

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自以为已经用与凯恩斯主义截然相反的途径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凯恩斯主义愿意错误地容忍这种“自然的”通货膨胀和认为可以把握住它一样，货币主义者正相反而且也同样错误地对待相应程度的“自然的”失业状况。这种幻想所基于的想法是，货币主义者同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只不过是相反结论——也把问题缩小到货币的层面上，并认为一个永恒的“自然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用货币政策的卫生学代替凯恩斯主义的水力学”（Starbatty, 1999）。这两种情况都全然忽视

了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势不可挡和无法逆转的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它使货币体系和生产中科学技术的潜力日渐明显地分离，直到最后这种潜力同金钱的物神形式和通过“劳动市场”的个人再生产完全不协调。货币主义的教条像凯恩斯主义一样丢尽面子的结局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去触及这个现代商品生产体系的默认公理对于经济学家的行会和资本主义的精英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所有的思想都囿于这个体系的范畴，以至于一个“高于”这个社会的形式和前提的元反省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倘若这样的元反省加上相关的社会实践会使在300年中建立起来的整个所谓的经济科学大厦发生内爆，并对连同政治阶级在内的领导精英们的社会存在必要性提出原则性置疑。因此，为了排除全球性新的严重危机人们愿意信任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因为能够高兴地想像出，又可以对被降为物质的人类严加管束了。

所以在贯彻货币主义信条的形势下，凯恩斯主义的调控和福利国家有系统的撤退和退位成为20世纪最后时期的社会主要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联邦德国出现的巨大“转折”使这种社会政治对其他或多或少地受到鼓舞而效仿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楷模，而这个方案则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强加给已经在危机的旋涡里全面坍塌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东欧集团在80年代末的崩溃使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共识”又一次蓬勃高涨，以至于居然会把危机炫耀地说成是国家经济迷途的结果。

在“取消调控”和“私有化”的口号下，在100多年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经济结构被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破坏狂热拆毁，而且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的确走上迷途的资本主义扩大了它所有的保险机制和废除了它的框架条件，这个过程断断续续进行着，就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危机一样。不仅那些国家企业

私有化了，它们曾使得“龙形海怪”在国有资本主义国家和在第三世界以及部分地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要在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了监督和保护其工业（或者被看做是战略的一部分）而自己作为企业主出现过。而且也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使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部领域置于企业经济的赢利核算之下，虽然整个社会框架条件的本质因此而被蔑视。而阿道夫·瓦格纳早就认识到，这些框架条件不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周期来维护。

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些福利国家的和文化的领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拆毁撞锤的目标。一切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都应该从地面上消失。成批的科学研究所、医院、幼儿园、剧院、游泳池、博物馆、学校和社会福利设施应该关闭，或者为此支出的费用应该被削减到只还能在严格限制下继续经营。中央集权国家到处都让地方在财政上大出血和承担国债危机的后果。当然，如果恰恰让国家对最重要的社会福利和文化领域负责任的话，这总是意味着让山羊看园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除了国家以外没有其他的机构能够至少最低限度地保证文明的水平和减轻企业经济合理性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被要求和已执行的国家的全面撤退已经带有从一开始就隐伏在资本主义之中的、完全毁灭文明的可能性的第一个标志。即使在像联邦德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这种文明的衰落也已经很明显地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奇特的细节中去：

“金钱不会发臭，学生们在拉丁语课上一直这样学的。提图斯（古罗马皇帝——译者注）始料未及的却是，如今后代们在休息时间里学到了：没有金钱会发臭。联邦环保局室内空气卫生委员会（原文如此！）现在就这样抱怨德国学校糟糕的卫生状况。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卫生区’受害尤其深，因为学校的清洁卫生措施被‘减少到不再能被接受的程

度’。因为资金短缺，许多乡镇在学校的清洁卫生方面采取节省措施……” [Die Zeit (时代周报), 27/1999]

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实现的“苗条国家”在方方面面都臭气熏天。这就是“货币政策卫生学”不可避免的物质结果。满脑装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领导精英们虽然就这么容忍了这一广泛毁灭文明的做法，因为他们只关心这个制度的继续生存而不管这种结果是多么荒唐。但正是在挽救制度的意义上，这些“货币政策卫生学”、“苗条国家”、取消调控和私有化的教条都不过是雄伟壮观的海市蜃楼而已。虽然一轮轮私有化的收益将货币暂时冲进空空如也的国库里（贱价变卖公众“家当”的收入），但当然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产生的效应不久之后也化为乌有了。这个国家“节省下的”金钱和“就业者”并没有以一种更有效益的形式进入“私有的”、企业经济的领域。基础设施被私有化的领域被减少到只剩“赢利的”核心部分并停止了履行它们在全社会范围的职能，许多福利文化领域干脆完全消失了。

但是，凯恩斯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不仅国家的投资费用，而且在这些领域工作者的国家职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同时也是商品市场的需求并使实际生产再生成。如果像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那样，这些涉及的都是一个通过不可靠的国家货币政策和货币制造模拟出来的需求的话，那么它们急速的削减不只涉及国家财政、官员工资和社会福利补贴，而且同样也涉及市场容量、销售额和企业利润。换言之：如同“凯恩斯主义的水力学”处处失灵并被切断了水源，危机真正的巨大威胁也同样处处在显灵并在扼杀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凯恩斯主义正是第一个并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而新自由主义的拆毁撞锤出乎意料地不仅将“福利独裁”，而且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夷为平地。削减社会福利的间接费用、停产、私有化的“削减闹剧”长期以来

已经超额补偿了节约的开支，危机的费用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因此，15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费用削减措施也未能扭转阿道夫·瓦格纳所说的“国家份额增加规律”的百年总趋势，对三个不同传统的资本主义核心国进行的长期比较为此提供了证明：

国家支出占国民经济份额的百分比：

年度	1870	1960	1994
德国	10	32	50
瑞士	6	31	69
美国	4	27	3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周刊。

非常明显，由于不同的传统和发展历史，国家份额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虽然不同，但是都增长得很快。由此，它绝不是主观政策的结果，而必然是由一个客观的结构性变革所致。隐伏在其内的特殊危机的能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爆发，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治疗法只能使它更加恶化。如果国家退位的话，那么市场也必须退位。只有当资本主义同国家一起消亡时，国家才能在解放的意义上“寿终正寝”。

但是，这个脱缰的资本主义将仍无力进行社会再生产，于是又回到它早期工业化“起飞”时的长期紧急状态。“祖国”摘下它的面具，国家在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化繁为简到镇压的暴力核心手段。从1973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紧急状态在智利的军事独裁中进行了演习，这绝非徒劳之举。在今天，玛格丽特·撒切尔还宣称，她是“越过尸体挺直地走着”，和一个魔鬼般的皮诺切特（Pinotchet）友好地勾结在一起，他曾指挥从直升飞机上推下多位左派反对党人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的第一次“改革”也绝非白费力气地把用于社会福利的1350亿美元重新转移到了军备预算中。不断激化的危急状况使自由主义准备动用武力的潜在倾向在内部也变得日益明显。甚至对边沁主义民主的信任也开始减少，在朝圣山学社的庆祝会上就能听到这样的论调：

“虽然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们从一开始就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坚信不疑，但是民主的守门两面神……从未脱离过他们。如今……人们的认识和担忧增长了，感觉到民主虽然表示人的自由形象，但是它包含着一切有利于国家的泛滥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机制……总之，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50年中，尽管有民主，威胁自由的发展也出现了——也许一部分原因恰恰在于民主……”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1997.5.3.]

这已经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危机中民主自内部有可能重新变成反对“过剩者”的公开的国家恐怖行动。原因并不在于民主程序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矛盾，而是因为在濒临崩溃的危机中甚至对边沁的机制也不再信赖。假如别无他计可施，假如人力资源会产生愚蠢的想法，那么这个程序必须简化一点，隐藏在民主深处的独裁核心便突现出来。

某些国家的暴力核心自动解除，但即便如此，货币经济仍以黑手党和贫困的形式继续存在，这正如那个叫大卫·弗里德曼的极端主义自由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哪里出现上述情形，哪里就会盛行野蛮风气。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从拉丁美洲和非洲经过阿富汗和中亚直到巴尔干，“追补现代化”的崩溃与紧跟上来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限

制同台登场，使社会惶惑不安，而且使早期资本主义的暴政都相形失色。

### 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次征伐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自相矛盾也变得无可救药了。它用以补救的原动力也消耗殆尽，甚至凯恩斯主义这个心脏起搏器对这种过时的拜物制度也注定失灵。一个想用持续高压强迫整个人类屈从于价值利用法则和套上劳动力市场枷锁的极权社会形式的信条，现在也只能具有一场对事实发起的征伐的性质。

这种回归极端的微观经济学立场的做法如同一种鸵鸟政策：那种艰难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畴内部所达到的宏观经济学的思考水平应该被清除，这样才能将社会完全分解成独立的个人单独核算，并用这种方法使人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然后资本主义就不再有关客观的自相矛盾和社会问题了，因为所有人似乎都只是遵循其本人自行负责的意愿：“失业被解释成在一种个人的优化核算框架内自由选定的业余时间”（Shütte, 1995）——不管怎样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理论”（1962）是这样说的。有的人居然今天还能因此而被补发了诺贝尔奖（卢卡斯在 1995 年获得）。自由的个人核算不是被宏观经济的（社会政治）措施所影响和左右，而是使后者由于它与市场一致的“理性期望”而失效，像普遍赞颂的那样，他以这个事实上“很简单的认识”对“经济政治思想进行了革命”（Schütte, 1995）。

从这种“理性期望理论”如此粗暴的推理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的征伐打算采取哪条途径。萨伊的“供给经济学”（通过减税刺激生产和投资的供应经济学政策）应该最终被转到劳动力市场上。谁想贱价出卖他的劳动力，就应当像那些出卖

西红柿、圆盘式反坦克地雷或避孕套那些人一样，最殷勤地“根据市场理性地”行动——也就是按照匿名市场上的“供求规律”来行事。达伦多夫提出的，依靠工资为生者应该作为“供给方”同技术进步进行竞争的那个荒谬建议也是沿袭了这一路线。

这证明，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危机，自由主义的极端化最终究竟表现在何处：即坚持不懈地将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地对待，以此试图强行消除危机。这种尝试曾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过，然而最终惨遭失败。从那以来，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让步”，工人运动、工会和社会主义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存在（或者干脆根本就是所有党派中的“社会政治”观点）间接地、非正式地并可以说是难为情地使人看到，这最终在逻辑上和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像无生之物一样论个儿（按照抽象“劳动时间”的间隔）出售自己。

但事实上通过社会再生产才形成了商品生产体系（也就是说，生活中的东西都转变成商品），在这个社会再生产意义上的劳动市场的畸形使资本主义原本的暴力特点连同它非理性的自身即目的的性质一览无遗。单是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这一点就暴露了一个普遍受制度奴役的现象，但它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如果劳动力（连同身体和社会存在）确实彻底地听命于供给和需求的“规律”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销售不出去的商品可以被储存在仓库里，除了储存费用外无需其他的费用；但是卖不出去的劳动力不能够被“库存”起来，拥有它的人不能不继续在社会上存在和消费。他们不能被“存放”（比如放进一种营养液或冷冻起来）或者装在盒子里摆在货架上等待有人来购买，而是他们必须继续生活。而这种继续生活却依赖于“劳动力”的出售收益——如果这个悖论以足够大的规模在社会上收效的话，那么它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彻底瓦解。销售不出去西红柿能够被扔进垃圾堆，落伍的硬件在储存很长时间以后可以当废铁



处理；但是销售不出去并且在知识、能力方面变得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力垃圾必须为了国家而被处死或自愿地自尽（京特·安德斯已经暗示过这个逻辑），如果他确实确实是“市场商品”的话。

把劳动力市场在意识形态上表达成一个完全普通的和“自然的”商品市场，这对自由主义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商品本身肯定会轻而易举地让资本主义的“自由”露出马脚。福利国家的形成默认了一般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贬低，而且如果不出现妨碍供给和需求“规律”的“违背市场的”因素的话，劳动力市场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存在。不仅20世纪的福利国家是出于这种默认才形成，而且工会也因此逐渐被咬牙切齿地承认为19世纪的官方合伙人。代表集体利益这一点从原则上否认了劳动力市场具有商品市场的性质，因为实际上以此就承认了劳动力的出售者根本不能遵循个人的核算方式。因为出售者的这种特殊的商品种类必须为了自己而将皮肉送上市场，他们处在这种制度奴役的结构上的依赖关系之中，以至于市场规律的自由作用发挥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崩溃。

既有通过工会和雇主协会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的社会集体化，也有福利国家辅助措施的必要性，才使宏观经济的观点变成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的因素。在多方面地削弱社会福利的惩罚中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是个人的供给市场，这一全社会的共识当然也进一步带来了另一个内部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使人类的“劳动力”变成商品；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而致使这种商品特征又必须部分地被取消。由此出现了工人运动和工会一种结构上的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的生存建立在雇佣劳动上并同时也就是以基本接受市场规律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部分地消除了劳动力商品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他们又以自身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市场规律。

过去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资本主义的绝对界限，那

么还可以给这个矛盾提供一种改革的运行方式。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危机中，这个矛盾已经达到无法让人忍受的地步。继续强迫社会的再生产以“劳动市场”的形式进行已越来越无可能性，最后只剩下一种抉择：要么结束劳动力的商品性质（最终在根本上结束商品生产制度）；要么反过来把劳动力不受限制地作为个人供给者的商品来对待并以此将危机个体化。这是这个制度的代表们还留有的最后一条路，尽管他们以此方式把社会的全面崩溃当作“风险”来承受。

就是从这方面来看，微观经济学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极端化也是资本主义已走向绝路的一个标志。新自由主义为了将劳动力市场转变成个人的供给市场而组织的征伐不仅对福利国家，而且也对工会的存在从根本上提出质疑，不管是否公开这样宣称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作为抵制现实的思想家于1962年正处在福特主义经济繁荣期的时候，就已指出了工会“有损于市场”的作用，“由于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提高由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Friedman, 1971/1962, 第163页），据供给政治学的信条所称，工会的这种做法正在把雇佣劳动者本身推向贫困深渊：

“由于工会的干预，在某个职业领域或工业部门工资的提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岗位减少的可能性——恰如价格升高会减少销路。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没有工作并寻找工作，而这又降低了在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因为工会一般是在那部分无论如何都保持高收入的工人中占有最稳固的位置，所以工会活动的结果是，收入高的工人收入更高，收入低的人负担更重。工会不但由于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平衡而损害了全体工人的整体利益，而且加剧了由于最受亏待的工人得到的可能性更小的工人们收入分配不利局面。”（Friedman, 出处同上，第164页）

弗里德曼的论证所言中的正是工会的尴尬境地。尽管在资本主义中总是通过艰苦的工资斗争而且只是在有些时候才能够达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勉强公道的生活水平，但从成本角度来看，对企业经济核算而言，更合算的是用机器来代替活人的劳动。在弗里德曼不停地谈论着被达伦多夫的阴险建议也作为依据的这种基本的尴尬境地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都只是一直在对工人运动和公众提出斥责；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如此荒谬的种种可能性时，工人运动和工会始终参与了这种生产方式。

如果单从制度内部来看，150年工会历史的基本经验（直到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这也是一个普遍被承认的事实）是，只有工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和行动能够将普遍的工资水平（也包括收入更低的和没有参加组织的一部分雇佣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到超出最低生活水平。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压力总是在他们谈判成功的余波中也为没有组织起来的和低收入工人带来了利益和余地，反之工会的弱点和失败反之也一直会使专门针对“那些最受亏待的工人们”的企业管理行为更加无所顾忌。

弗里德曼提倡的经济上的“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根据“劳动力的供给者”的结构性依赖地位正是隐含着那种个人供给市场的劳动工资无所顾忌的“贬值”。这只能是在最低社会福利水平上的“平衡”了。仅此“违反市场规律”的工会干涉就已把一个“历史-道德的因素”带进了雇佣劳动的范畴里，这是马克思赋予这种事实的名称。这里指的是，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经济“价值”不能单纯客观地来确定。因为与无生命的商品不同的是，劳动力的价值是通过它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不是一目了然和一成不变的。

这个复杂的劳动力商品因为同活生生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必须通过这些人的生活而每天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但哪

这些东西有必要算作“成本”呢？只要能够使他们得到维持不饿肚子的食品和每天能重新爬起来而不会因虚弱而突然昏倒呢？还是让他们顿顿享用要求营养丰富和味道鲜美的饭菜呢？只是让他们“在一个贫民窟、一座桥、一个下水道盖子下栖身也算‘有个住所’”呢？还是让他们住进一种至少远看与住宅相似的东西呢？这个道德-文化的“最低水平”明显的是不能单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来调节的。

这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问题上，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阶梯上需要一种“违反市场规律”的干预（不管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调控，还是为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工会斗争）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生产力的发展和非理性的限制之间通过市场规律愈加严重的失调状况。因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这种失调状况最终脱轨失控了，所以根据“制度逻辑”，由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趋势占了上风，他们竭力排除工会这个“违反市场规律”的因素，目的是通过劳动市场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去按主观臆想重新充分实现“就业”。弗里德曼理论上的设想，由里根和撒切尔付诸于实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多少有些气势汹汹地步他们的后尘）。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从来都直言不讳：

“与我的一些部长同僚们不同的是，我总是坚信，在始终不变的前提下失业率与工会的权力有着直接关系。工会不应为不太佳的成绩而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以至于英国的产品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工会通过这种方式毁掉了它许多会员的工作岗位。”（Thatcher, 1993, 第 395 页）

这种将真正的关系黑白颠倒的看法想实行的只可能是一个方案：螺旋式地降低工资，正如达伦多夫善意规劝雇佣劳动者的那

样；如果“劳动力的供给者”不愿意去适应水平越来越低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平衡状态”的话，在不得已时进行行政干预。这无非意味着，干净彻底地删除那个劳动工资里的“历史-道德因素”，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紧急状态下不顾社会福利方面的后果而强行贯彻个人供给原则。于是，撒切尔在保守党中掌了权，因为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与迄今的历史共识公开决裂：

“我们是……双脚踏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这里‘低工资’——不管人们对此如何定义——这个问题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必须通过政府来解决。”（Thatcher, 1995, 第 267 页）

这一反对工会和反对“历史-道德”工资水平的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最重要的工业国家和世界范围内随着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开始，工资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下降了。联邦德国的工资率（工资在所谓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 1998 年达到了自 199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美国，实际工资（即排除通货膨胀率后的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在 90 年代跌到了 70 年代的水平之下。尽管如此，由微电子的发展造成的真正失业率却势不可挡地上升着；而通过国民经济内部购买力的持续降低，这种趋势甚至更加恶化了。

“就业”继续滑坡，而它的结构随着每一次新的危机和工资进一步降低的冲击越来越向着艰难的、无保证的低工资状况的方向发展，在每一次这样的冲击中，持微观经济极端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领导精英们总是只有一个同样的答案：进一步“抑制工资增长”，进一步普及低工资，直到不惜一切代价达到劳动力市场的“平衡状态”——而这一平衡状态却不再以饥饿水平为准。新自由主义征伐的结果是，为了“维护制度”，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以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存为代价。对此，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也就是经济极端主义的“灰色红衣主教”毫不隐讳：

“……一个充满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权利与要求的福利国家难道不（存在）威胁到这个制度的基础的危险吗？”（Lambsdorf, 1997）

人们不得不再想起，这个论断包藏了何等的肆无忌惮：虽然实际的物质-技术生产能力通过微电子生产力飞速上升，但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由于受到低工资和“自然的失业率”的两路夹击却下降了，原因只不过是为了不危及产生出这种荒诞逻辑的制度。就像在19世纪上半叶一样，资本主义的领导精英们又逐渐摆出那种极端的反社会福利的姿态，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保住做为惟一理想前提的制度理性而让整个人类的生存让位。然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达到的高度上，这个无理要求再也无法以任何形式兑现了。如现在的一种悖论是，要从制度内部进行抵御只有让这个制度本身让位才行。对此工会已无能为力。它的活动范围向来只能以历史上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使用的扩张为基准，这样的扩张通过周期性的运动赋予劳动力市场一种“需求”增长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在接受这个制度基础的同时，工会的团结精神和行动能力只有在这种格局下才能发挥出来。在一种长期和持续增长的结构性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新格局下，这种关系却正好颠倒了：通过周期的循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是“供给”将长期占主导地位。在劳动力供给者结构上原本就占弱势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过量供给不可避免地使工会这个因素成为多余。

新自由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领导精英们为了个体“劳动力”供给市场而开展的来势凶猛运动在最后的这场资本主义危机中用

尽了那个制度逻辑的力量，这个制度逻辑也正是工会本身原则上和从它诞生以来的立足之地。结论似乎应该是为解除痛苦而议而庄严自杀，即工会组织自觉自愿地自动解散，因为它们的局面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这种结论诚然不能得出，但是已不再有顽抗的余力，只能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受到资本所有恶狗的驱赶。为了得到哪怕微不足道的奖赏或仅是维持其组织的生存，工会必须跳出自己的阴影，并卸下它所有的历史包袱。

与此同时，工会会员的意识和领导人的意识互相制约。工会领导人长期以来组成了资本主义领导精英的一个分支，德国工会的上层人物就坐在最大康采恩的监事会里。在所有层次上他们都与管理层和所有的政界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有些国家（首先在美国）甚至还参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尽忠效力，在每次危机高潮时他们都无条件地投降。一直到90年代，一部分领导特权阶层在“现代化者”这个声名狼藉的声名下试图赋予自己一个“有独到见地者”的特殊形象，他们在炮制一个幻想，即工会能够再一次作为调节力量积极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如同它过去已经做到的那样，只不过是作为附庸并且成绩平平。到了20世纪末就越来越清楚了，在这个具有新质的危机中，即使在局势急剧激化之时也不必再禁止各工会机构了。对这些“现代化者”来说只有一种选择，在拟订劳资协定和所有削减社会福利标准的过程中，作为一支辅助队伍为了以后其他途径的升迁发迹而在公共福利方面建立功勋并使劳动力市场转变成个人的供给市场，以往那种不承担义务的、娓娓动听的充满道德说教的社会福利修辞学如今又被搬将出来。

就会员方面而言，他们的所谓思想基础与反抗相距甚远。经过许多代人之后已修养成性的“抽象劳动”观念和在心灵深处已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范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意识堡垒，在工会传统的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框架内是绝对无法突破它的，虽然在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制度内部的、共同的利益代表机制再奏效了（罢工、劳资协定、对政治制度的压力）。

工会不是为危机而设立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构危机中它的潜力正在消失，对它来说所能“安排”的只能是自己的后事。在世界各地，共同的劳资协定都支离破碎，企业主协会也呈现出解散的现象，工会会员们成群结队地纷纷脱离工会。普遍的离心离德和社会关系的恶化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危机自动个体化的温床。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征伐此外还得到了学院派社会学界的支持，他们把社会福利的侵蚀过程描写成中性的、结构性的“分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资本主义荒芜化的趋势命名为一种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风险社会”，独立的个人必须以此为出发点独自应对一切：

“这里出现的……这种罕见的全面个体化的社会福利类型绝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死后复生，但它也不是如今终于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所折服的无产阶级从个人主义角度来使自己对所处的阶级地位视而不见的错误认识，这是……使人生注定要选择自由的催化剂，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一个个人必须在他持续受歧视的这种惩罚过程中学习把自己看做是行为中心，看做是面对人生中机遇和强制的计划署……要求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积极的行为模式，它把这个我作为中心，给这个我提供和开辟行动的机会，并以这种方式允许这个我监控自己人生中正在出现的成事操业强制和抉择可能性。这意味着，在知识分子道貌岸然的虚表之下为了个人生存而发展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把我和社会的关系颠倒了，并以安排个人的一生为目的而切合实际地思考和行动。”（Beck, 1990, 第58及下页）



“成事操业强制”和“抉择可能性”这类晦涩的语言，可谓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专门用语，从报刊杂文到社会学研讨课，从管理“哲学”到工会“现代化者”的“独到见地”，都已经成为时髦语，为新自由主义的征伐击鼓助威。任何对资本主义种种有关客观化的虚妄之说提出批判的想法都被诅咒成“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而剩下的只是作为原子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赤裸裸的个性，这样的原子实际上不再能沿袭以往资产阶级个人的幻想——成为行动的主体。这个抽象的供给个体只是挖空心思寻找已经变成他第二天性的疯狂条件中的“机遇和风险”，为了最终被别人把自己像牛一样送进社会福利的屠宰场。贝克全然没有察觉到他那个成为资本主义计划署的、可怜巴巴的独立个体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复制了弗里德曼极端的微观经济学和一个叫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期望理论”。他也几乎没有察觉到，他很认真地已经把被废弃的福特主义调控形式当作成“充满机遇的个体化”的一种继续有效的前提：

“在福利国家的架构内，个人主义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个历史性的新的经济基础，确切地说：是在一个有劳资协定与社会福利起着缓解作用的、有组织的劳动市场上，它也对教育水平和灵活性提出了要求。”（Beck，出处同上，第58页）

对于如此的无知，人们只能感到惊讶。贝克提出的“个体化”观点的真正前提恰恰是“福利国家”也像“按照劳资协定所组织”的劳动力市场那样加速灭亡，也就是在国家辅助下实现在供给经济中恶性发展的就业状况。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和它在近几十年里的发展的明显无知以及缺乏对危机理论基础的认知将贝克误导到一个在现象学上具有局限性的观察角度，这种角

度只注意表面现象，而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坚硬核心（此外，还只目光短浅地局限于联邦德国的情况，福特主义的“滞销”在这里暂时还没有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融解得那么多）。

同相信“现代化”会在这些不可扬弃的资本主义范畴里永远持续的许多思想家一样，贝克也利用以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作为反面陪衬，为了相对廉价地赎回这种制度已尖锐化的自相矛盾，并误以为“超越”了它。“阶级斗争”看起来如此像一种与时代不相符的“极端主义”，这种极端主义当今在个性化的后现代主义机遇世界里变得空洞无物。当像贝克这样干练的社会批评家自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到达了“第二个现代主义”的春天的时候，实际他们只不过又回转到了古老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模式，也就是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供给—极端主义一脉相承。

与整个学术界和人们普遍的意识雷同，贝克头脑里装着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已扭曲的历史观，它不是把历史上的工人运动当作以前社会叛乱遭到惨重失败的结果来理解，而是作为一种“极端”的世界观的独立崛起，并逐渐在成熟。我们应该还记得那个潜在的事实吧，最早那种社会叛乱本来的、被掩盖的爆发起因在于人们在“绝望的时代”不愿意被变成一种独立的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而以后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已经驯服顺从的、甘当家养宠物的意想意识的内部运动形式。从这点来看，阶级斗争只能是这个“美妙机器”的社会性自我运动形式。因此，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不容更改的范围之内。

不管怎样，内部社会冲突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定义毕竟是已成为客观事实的制度矛盾的一个反映。虽然工人运动已被调教得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之内，但至少他们还必须间接地议论

这种制度的自相矛盾。但是因为这种议论又反馈到资本本身的逻辑上，他们只能旅鼠般的尾随着这个制度的发展过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通过在企业经济功能区域内不断加强“自愿的自律”，通过将七情六欲都调教到资本主义商品消费形式上，此外还通过解除思想武装（从一个已淡化的、仅仅从表面上被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一个肤浅的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他们就是如此不断在适应这部利用机器。这个独立的和以多种形式实施的边沁主义纲领使资本主义标准的教化过程一直推进到个人心理之中。但是尽管如此，即使在福特主义的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阴影仍然存在。还有一部分意识的残余仍然存在，即认为有一种陌生的强大力量起作用（即使它已经长期地在自己内部安营扎寨），也还存在由机构代表的对立面（以企业主协会和工会的形式）必须解决对立——即使这些只能看做是制度内部的活动。

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新危机濒于绝境的特点，它无法解决一种完全是制度固有的对立，因而注定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就是为何不可能回到任何一种在“阶级斗争”名目下的内部利益运动更尖锐的形式的原因；而这个“阶级斗争”本身从一开始就不过是资本主义驯化了的利益的运动形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或者至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危机的条件下任何劳资协定都已无法继续成立，在整个行业或者整个社会的范围里不再能通过斗争而获得社会福利的额外奖赏，所有以前社会福利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管多么有限，也只会被削减，但尽管如此，比起商品生产制度来似乎还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形式能让人接受或者哪怕只是想象——那么，那种集体的、机构化的“利益立场”就必然地会消失。

社会经济的和按资本主义标准化了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按照“能躲则躲”的格言处于一种急速的逃避运动中——从全社

会到各个行业，从各行业到单个企业，从单个企业到单个部门，从部门到单个人。由此可见，社会经济“个体化”并没有克服以前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与战后社会“社会伙伴式”的厮杀仪式形成对立，而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制度内部利益之争的以往表现形式的合乎逻辑的最终阶段，这一阶段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而消亡。现在进行的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现代化早期时托马斯·霍布斯的意识形态梦魇完全全变成了现代化“最后世界”中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为了“劳动力”的个体供给市场而进行的征伐再也遇不到举足轻重的对手了，而只是面对正处于解体的、由机构作代表的利益形式；乌利希·贝克荒谬地将此过程称作“扩大了的个人行动范围”。竞争的个体化最终导致了雇佣工人们个人利益的惊人变化，正如1997年“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共和国未来问题委员会”（负责成员：乌利希·贝克）在调查报告《德国的就业和失业》中半幼稚半厚颜无耻地将此作为一个“企业主社会”的积极理想状况而加以宣传的那样：

“虽然在这个社会里，在可展望的未来，大多数从业人员依赖于就业，通过就业他们挣得他们生计的主要部分。但如果他们不应该在经济和社会变化中成为失败者的话，那么以雇员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必定也会逐渐消失。对他们亦然：未来的理想是个体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和生存筹划的雇主。必须唤起这种意识，个人首创精神和自我负责的精神，即企业主精神在社会中必须进一步发展。”（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1997, 第35页）

如果人们思量一下这个“理想”的后果的话，就会不寒而栗。因为这里明显是边沁工程可以设想的最后一步升级，对此连

福特主义都没敢想过：完全彻底地把资本主义转移到个人的内心，从而这个社会具有毁灭性的强制形式不再会被当作阴暗面来看待，而是直接地与人的自然存在融为一体。曾在贝克把独立的我设想为自己“计划署”时所暗示的一切，在这里上升为一个“全面人力资本”的恶梦幻景。

抗议和抵制愈演愈烈的和越发荒唐的行为苛求变得连想都不能想，因为之前起码还能部分地发生在外部的冲突现在只是在各自为政的个人心灵内部进行。这个大名鼎鼎的“未来委员会”非常严肃地以一种学术口吻要求说：普遍的解除团结可能导致各位个人连同自己都不再保持团结一致，而是作为“有依赖性的就业者”也对自己实施“企业主的”强制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企业经济”的措施。

这里要求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个人自动的弱肉强食，一种自我牺牲，以此方式“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如同所预见的那样——转变成一种盲目的自动侵略。这个变得凶猛异常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它”不愿意看到这部“美妙机器”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个庞大怪物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继续行动；这种逻辑上无可能性的境地变成一种非理性主义肆无忌惮的升级，随着这种趋势，功能主义精英们毫不掩饰地重又使用一种宗教式的神秘化语言，似乎他们最终想承认，资本主义是邪恶地世俗化了的宗教和自我施魔的妖法巫术。1994年在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协会的一次年会上，一位名叫沃尔夫冈·赖茨勒（Wolfgang Reitzle）博士的大祭司，当时还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工厂的董事会成员，他在一次布道时说：

“传统意义上的雇员是告诉他什么，‘他就得做什么’；在理想情况下，他成为企业家业绩的创造者，他在行动上具有创造性，对自己负责，有责任感……目标是明确的：企业

中的人必须融合成一个创造价值的共同体并在思想上把它变成自觉行为的准则……”（Reitzle, 1994, 第216及以下页）

把吞噬抽象人类能源的这个陈腐不堪而且同时又类似妄想狂地偏执的企业经济制度改头换面地解释成一个“价值创造共同体”中无数个狂热的小宗派，这反映了京特·安德斯所说的那样绝妙的颠倒：也就是以前不可忍受的“抽象劳动”对行为的苛求转变成一种社会特权。“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的“传统意义上的雇员”，尽管边沁主义已通过各种方式设法占据人的精神世界，他至少可以在他灵魂中的一隅之地同资本主义的无理要求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泯灭了自我的“工作岗位占有者”却相反，他们面对失业者的汪洋大海感到不断受到威胁，从而愿意接受已神学化了的竞争。正如已经让媒体的直觉所领悟出的那样，这种将以自杀而告终的相互厮杀就是走上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示范。只要这种状况还没有普及开来，就得把资本主义危机作为自然灾害推销给思想不清醒的个人，它要求无私地削减福利。“未来委员会”有言道：

“每一种行为方式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副作用，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点必须明白无误地向人们解释清楚……如同国际间的比较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劳动价格按照市场状况下降的话，就业状况在几年内能明显地改善。这种价格下降比如可以通过将未来的工资增长限制在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以下来实现。当然，就业的积极效果只能慢慢地体现出来。就业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的地方，人们一部分的实际收入而且甚至名义收入均明显降低了……直接报酬的直接降低只被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予以考虑……诚然，面对资本和知识

越来越经常地只能这样来保持劳动这个要素竞争力了……”  
(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1997, 第1页, 第17及以下数页)

这真的几乎不可理喻：面对目光短浅的企业经济核算方式难以调动的巨大技术-物质“过剩能力”，人们面前却展现出一个“必要的”贫困前景。毁灭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财富容量变得越大，让需求屈服于资本主义“自然条件”并以此压低需求的要求就越强烈。这些“现代化者”用寥寥数语要求采用直接的国家强制做法，以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低工资的境遇中：

“在德国，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强行要求有工作能力的国家补助金领取者接受现有的工作，尽管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和对国民经济是有意义的。在将来一定要坚持贯彻合理要求。”(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1997, 第29页)

所有一切都是“合理要求”：以前的技术工人应该成为无专门知识要求的低工资打临工者，在文明消逝的过程中流落街头的交响乐团团员应该刷洗豪华饭店的厕所，失业的社会工作者应该往自动售货机里填充商品或出售小香肠。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这一切当然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合理要求”（仅仅这个词就酥软得放在舌头上就融化，这是民主自由的化身）的摧残虽然能折磨人们，但是既不能阻挡由于微电子发展对人类劳动力“合理化裁减”的雪崩趋势，也不能制止资本主义“创造价值”的衰退停滞。这些低劣的廉价工作也并没有所需要的那么多，远不足以再一次使历史发展的车轮倒转。领导精英们对于人数不断增加的失业者——“过剩的食客”的愤怒与日俱增，这些失业者受到各种手段的折磨，而这种不断增加的强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加

速了危机进程。

新自由主义对危机资本主义的受屈辱者和受害者的征伐不仅采取越来越恶毒的形式，而且它长期以来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公开主张自由主义的和保守的政府了。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也聚集在征伐的旗帜之下，它在世界危机的压力下重新投入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怀抱。在使凯恩斯主义信条代替了被驯化了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蜕化之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条通道中几乎都蜕掉了凯恩斯主义的外皮。现在，不管什么倾向的所有政治党派都以某种方式变成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微观经济立场，连用于媒体的修辞学都相差无几。情急之中，现代非理性强制制度的共同核心暴露无遗。不管是出自谁之口：“现代化”这个词变成了阴郁的威胁，“改革”成了反对社会福利的强制性措施的同义词。

因此在9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所发生的政府更迭也不意味着什么。如同克林顿（Clinton）总统一如既往地执行他的保守主义前任的大力削减福利的政策一样，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继续贯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济极端主义的路线，“红绿联盟”仍旧采取自由主义保守派科尔政权的系统削减社会福利的方针。通常是那些曾经参加1968年运动的资本主义批评家们如今有此殊荣，身着阿玛尼（Amani）品牌西服自信地把人们的生活置于“保留支付能力”条件之下。自然规律就是自然规律。党派成员要么顺从，要么就被剔除出去。英国工党在贯彻布莱尔路线中几乎失去了30%的成员都无动于衷。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次蜕化，在社会自由主义周报《时代》中的一篇有典型性的评论这样说道：

“只有了解社会民主党对社会公正性的渴望的人才知道，它今天是如何地痛苦不堪……面对着勾勒出从停滞工资到中



止退休金直至施罗德/布莱尔果断地指明的通向自我维护竞技场道路这种种情况中的牺牲者的目录册，社会民主党人只能感到心寒……争论本该早就结束了。但是，像其他的人民党派一样，社会民主党极力回避在不断恶化的财政条件下来给社会福利的未来下定义……涉及穷人和富人、病人和健康人、年轻人和老人以及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之间未来的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它的解决方法不允许有任何清规戒律。这方面论述颇丰的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者坚持着这种必要的做法……如果世道迅速超过一个完好的社会福利世界的观的话，那这个世界观又会有什么用呢？”（Buhl, 1999）

牺牲者本身真正的痛苦不在论争之列，然而用经济管理和危机管理的术语来表述的话，这就叫做“不可避免的严酷性”。尤其社会救济已受到了社会暴政战略家的监视。因为福利国家的补助金收入最低范畴在所有确定了这一范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是建立在完全或部分由自己支付（如养老金或失业金保险）而得到的权益基础之上，而是表现为“龙形悔怪”对失业者和过剩者纯粹的“恩赐行为”。所以这类人员的数量越大，行政部门就越加利用职权对他们进行克扣和刁难，并进一步降低由福利救济额度所确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标准。

对哈耶克来说，为“无法就业的穷人”必须采取“一种预防措施”就已是一种令人厌烦和违心接受的必要性，对于这种预防措施人们只是要考虑，“用什么形式使它最低程度地阻碍市场的运行”（Hayek, 1976/1952, 第147页）。如今无一星期没有体面的女士和尊贵的先生在要求将“立即用现金支付”的“社会救济降到更低的水平”，比如像德国批发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富克斯（Michael Fuchs）就这样说过 [Wirtschaftswoche (经济周刊), 16/1997]。原德国卫生部长泽霍费尔（Seehofer）

甚至要求节约为社会救济接受者准备的内衣：

“在图片报上重新刊登的卫生部长的主意引起了一番轰动，他提出，衣服只作为对‘生活必需品的补充’来提供，并根据‘低收入群体的衣物更换率’来测定资助高低。根据设想，要求购买旧衣服也成为合理要求。”（Eltzschig, 1997）

犹如在以前曼德维尔或德·萨德先生的资本主义春天，甚至连最可怜的国家救济金看起来都好似奢侈和浪费。撒切尔夫人措辞生硬地对接受救济者严加责难而且因此到处都有人效仿：

“依赖性文化的绝对荒谬之处……在于，它用巨大的物质刺激促使人们过一种懒惰、堕落和绝望的生活。我们应该为勇敢的人们付出的艰辛付酬金嘉奖。但是政府应该帮助克服或减少他们面临的各种诱惑。”（Thatcher, 1995, 第648页）

这种对事实的荒诞歪曲和与微观经济极端主义的一唱一和，同早期资本主义的暴政思想家们的假定分毫不差：大规模的失业和大批人被迫接受社会救济的队伍的现象关系到的不是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问题”。为了避免原则上被视为“不爱劳动”而坐享社会福利的人受享乐主义的“诱惑”，由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线的“过高水平”应该服从与工资同样正在下降的最底层雇用劳动者“拉开距离的规定”。这种贫困化竞争的目标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把人们推进饿着肚子工作的境地中去。在美国和英国，尤其是单身母亲成了这种谴责的众矢之的，在联邦德国也越来越是如此：

“最晚也是自罗纳德·里根执政以来，一种魔景就潜移默化幽灵般地出现在美国公民的集体意识中，保守派政治家、社论撰稿人和电视访谈者对此大加抱怨：多子女母亲和开着凯迪拉克牌轿车通行无阻地到银行笑着翻阅救济金支票的‘福利女王’的魔景。里根始终认为‘福利女王’是寄生虫，这个想法在80年代，使整个美国社会都在暗中记恨接受社会救济的人（并且反对下层民众）。”（Widmann, 1995）

除了重新普遍要求交纳学费以对大学进行一种“社会福利大清洗”[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前瞻思想家彼得·格洛茨（Peter Glotz）为德国提出的要求]之外，坚决取消对单身母亲的社会救济也包括在精明强干的托尼·布莱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中。“好色之徒”比尔·克林顿也同样敢于采取这种壮举，他颁布法律来普遍结束了社会救济：

“克林顿的法律责成联邦各州履行义务，他们必须到2002年时按确切规定的阶段让大部分领取救济者——主要是单身母亲——能够去工作，否则他们面临罚款。‘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奏效’，这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的看法。吸毒者同样也必须工作，与孩子已经过了12周的……母亲一样待遇。”[Der Spiegel（明镜周刊），48/1997]

自从克林顿的“改革”以来，社会救济金在两年后原则上被取消了。今后在一生中不管经济形势和个人情况如何，最多享有5年社会救济金——否则人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努力找工作”，甚至在最受屈辱的工作条件下，或者干脆饿死。只要社会救济还继续存在，它将以不断增长的规模出租给私人企业，然

后这些企业根据私有经济的利润原则来管理贫困，也就是类似于以前边沁主义所宣传的那种英国监狱和贫民院的私有化形式。在得克萨斯州，这种生意由一个“隶属于世界最大的军火康采恩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子公司”在经营 [Die Zeit (时报), 20/1997]。在德国社会自由主义人士的推论中，这一类方案作为美国的“改革工厂”被冠以“团结的未来”的美名。(Die Zeit, 15/1999) 而成绩当然是巨大的。为了歌颂强制性廉价劳动的幸福，一些被精心挑选的和为这场改革方案的出台而训练的典范很愿意被公开展示，例如米歇尔·克劳福德 (Michelle Crawford)，一位有 4 个孩子的 39 岁的母亲，就是《经济周刊》津津乐道地报导的对象：

“在领取了 10 年社会救济后，她现在在一家位于密尔沃基城外的塑料工厂工作，每小时工资为 8.2 美元，克劳福德在电视摄像机前这样讲道。她对激动的观众表达自己的心情：‘我对早晨起床去上班感到高兴。’” [Wirtschaftswoche (经济周刊), 20/1999]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克莱·肖 (Clay Shaw) 无比自豪地断言，美国用这种“改革”，将又一次“为全世界定调子” [Wirtschaftswoche (经济周刊), 33/1996]。实际上在联邦德国，失业者和社会救济接受者也越来越受到官僚主义的刁难，要本人去无休止地寻找支付低工资的奴隶主，并且还要对此“提出证明”。在英国，布莱尔政权加剧了产生自撒切尔时代的无度苛求。如今失业者必须定期地和社会救济管理局申诉和解释，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工作！这种证明的责任颠倒了——不再是“劳动管理”机构必须给人们提供工作，而是失业者要出示自己热烈追求低报酬的卑贱工作的证明。除了单身母亲之外，主要是

年轻人被贫困管理部门提审，他们绝不应该由于缺乏对他们来说可接受的资本主义“就业”机会而承受社会救济的贫困水平并以此沉溺于无法控制的兴趣（例如音乐娱乐），而是要让他们的生命无论如何都要送进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之中，并且“学习”把不可接受的事物作为可接受的事物来加以忍受。

这一类的纲领自称为“要劳动的福利”或者简称为“劳动福利”，最近在联邦德国也开始实行“帮助寻找工作”的措施。严格地说，“新工党”想向失业者传播“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上任时强烈要求进行一次“全民族的征伐”，来重新唤醒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精神。英国的媒体已经在谈论“工党的囚犯纵队”。但是由于在供给市场上对大批失业者来说任何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强制性廉价工作，人们早已对国家公开安排的强制劳动工作不再感到害怕。

新自由主义暴戾恣睢的尝试，即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不可阻止也一如既往想把社会无情地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此期间使不断产生的“组合方案”一个接一个地流产了。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清除整个社会保险制度，（即尽可能地取消已享有的权益），最终以一种“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形式而重新定义的最低生活水平来代替它。这个“基本收入”无论如何应该低而又低，这样它才不至于“败坏劳动道德”——也就是远远低于现在的社会福利。“罗马俱乐部”聚集的一群高谈伦理阔论的德高望重者对此也很中意。在最近的有关报导中，作者奥里奥·贾里尼（Orio Giarini）和帕特里克·利德克（Patrick Liedtke）推荐了此类有组织的贫困化方案的一种特殊的变体：

“在那个世界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无论如何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就业。谁在自由的经济中一无所获，就必须在公益活动中挣得国家对他的支持——即使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强硬的制度：谁健康，但不工作，就分文不得。作者们知道，不强迫则行不通。‘但是我们在这里别无选择’。为了用国家提供的最低收入保证自己的生存，贫困者必须每周用一半时间从事公益活动……即使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微薄者也可以从事教育、卫生健康和社会福利领域内面向公众利益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报酬，以达到生存最低界限。第一劳动力市场……继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十分接近费里尼和利德克的新自由主义者梦想。在他们的模式里劳资协定规定的工作时间没有任何位置，工作条件应该尽可能地灵活，国家只应保证竞争的正常进行。”（Heuser/Martens, 1998）

看吧，这就是哥伦布的鸡蛋：无须劳资协定和不受保护的廉价工作，加上国家发给的勉强糊口的工资，再加上无报酬的地区性强制劳动；所有这一切都以个人自我负责的组合方式在“冒风险的自由”范围之中（Ulrich Beck）。虽然这个方案和其他方案一样，从整个社会来看是如此地毫无根据，因为它从宏观经济上看任何时候都不会带来起色。但是一个急剧减少的并已普遍实行的社会救济与具有“公益性质”的强制劳动相结合的做法使一些“现代化者”兴高采烈。有些地方长期以来早已做出过有关的尝试。比如纽约市就让将近4万个社会救济接受者去清扫街道或去看守公墓来挣出那份钱。斯图加特的贫困管理部门想出一个主意，让几个吃闲饭的人穿上黄色的工装裤，让这些“黄色的天使”到街上给人们指路或者清扫狗屎。莱比锡则又用“杂役”来取悦失业者，如让他们在垃圾站里干活。在联邦德国的250个“社会福利项目”中，从事强制劳动的年青工人为了不丢失德意

志民族的“准时和可靠这样的劳动美德”在拆卸废铁，这是索林根此类项目的女负责人提供的情况。

但是国家和地方的强制劳动像市场经济的廉价工作的义务一样运转不灵：地方上的工商业联合会猛烈进行抨击，因为各城市都用无偿的强制劳动来代替正式委托给手工业和服务性企业的工作，通过这种强制劳动方式又产生了新的失业者和社会救济接受者。此外，地方上根本无力提供足够的“强制劳动岗位”，且不说官僚机构的花费。就连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对此表示怀疑：

“但美国的经验表明，‘劳动福利’不仅是昂贵的，而且会由于官僚主义的阻碍而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普遍地减少国家开支，尤其是社会福利开支。”（Thatcher, 1995, 第 648 及下页）

换言之：减少或干脆取消社会救济，让人们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样才能使“自然规律”不长时间地受到干扰。只要“龙形海怪”的施舍恩赐还没有完全被取消，对“社会救济接受者”的围猎就只剩下“滥用社会福利”这块场地未涉足了。这是新自由主义征伐中的又一个卑鄙无耻的斗争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没有享受权利或从这种权利中被剔除出来的并且主要是“隐瞒”其他来源收入的人的“福利金诈骗”行为，因为国家只是用蔑视的眼光分配着国家少得可怜的施舍，贫困管理部门把每一笔额外的收入或财产都马上从社会救济金中扣除。单身母亲从父母那里得到几个马克的赠予，以及失业的年轻人顺便多打几个小时的“黑工”，或者是长期的失业者也许因继承了几千马克的遗产，都被列入此类情况之中。

如果真是这样又怎样！这里所揭露的“滥用”只不过是取走了社会财富中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这些社会财富正是通过资

本主义疯狂的法律从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继承权的人那里扣留下来的。即使是非法地踏遍半个德国的社会救济管理局并在奔波之后又愚蠢地增加了一块劳力士手表的申请避难者，也只不过拿到了这笔财富的一部分，他作为人根据生产力的水平以一种更理智的形式应当有权利从这笔财富中得到成百倍和成千倍的回报。民主的官僚主义者、劳动思想家和重利盘剥者们的基督教新教的恶言将财富的潜力控制到资本主义的有限范畴之内，为的是对那些对这种制度保留了自己剩余的理智和真正兴趣的人神气活现地进行道德说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巴伐利亚-萨克森的“未来委员会”尤其令人作呕地说道：

“最终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地杜绝非法领取……福利金的行为。这个斗争要想卓有成效，只有一方面使合法的工作容易找到，而且首先降低它的费用，另一方面——与此密切相关的——每一种福利金的滥用都要受到社会的唾弃。在对福利金滥用情况视而不见或非法就业杜而不绝的大气候下，国家的干预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共同体里只能取得局部成效。”（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1997, 第30页）

为了保证普遍的贫困水平和提高从事痛苦不堪的工作的压力，毫不掩饰地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窥伺和揭发告密的这种做法只有纳粹能够干得出来。这里再清楚不过地抖露出，“崇尚自由的国家共同体”正是纳粹时代居民区监守人制度的直接延续。这种对社会福利的暗中侦察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称为“工作”。至少在巴伐利亚人们发现了“滥用福利调查者”的职业，一个招聘广告这样说道：

“巴特特尔茨-沃尔夫拉茨豪森县在近期内招聘外勤男



女工作人员作为滥用福利救济调查者。他们的任务是，审查福利金领取的合法性和揭发福利金滥用事件。这项工作按照免除社会保险的收入为 610 马克的就业条件签订合同，首先期限为一年。希望有谈判的技巧、稳重自信的风度、良好的名声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的人前来应聘……” [转引自：Abendzeitung（晚报），1997.4.8]

这种怪异反常的做法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用悲辛的廉价工作的形式本身来对领取福利救济者进行侦察窥探。在英国这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那里如今有 3000 名“社会福利侦探”在缉捕“社会救济的骗取者”。“这些侦缉者还有工作成绩方面的压力：一个有 5 个侦探的小组必须每月有约 14000 马克的业绩” [Abendzeitung，（晚报），出处同上]。鉴于这种情况和缺少任何反对行动（我们今天似乎处于一个在福利上对自己行动缺乏负责能力的时代），为了重新找回失业者的自尊，犯罪成了最后的出路。如果公众不会再普遍采取抵制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暴政制度立场的话，未被重视的个人反抗的时刻就来到了。

在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不能再给人们提供任何东西的时代，强盗和歹徒的人数就剧增。手持武器，雄赳赳地在与民主奥威尔国家的警察的战斗中而死，不是比一生必须等待得到配给的内裤、拾狗粪或者必须以其他某种方式被变成“高收入者”的白痴要好得多吗？

决定选择与合法性公开的决裂并以此发挥个人能量去争取具有更高价值的事物，这肯定在一般情况下是人类更倔强、更高的天性，因为这当然并不单纯是那些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才有这样的脾性。犯罪不是批判意识造成的后果，而是竞争采用其他途径的继续。在灾患接踵而至的资本主义后期，初次踏入普遍存在竞争的社会的青年人几乎不准备或做不到像从前的有些匪帮那样

在掠夺和突袭中体谅关照穷人。随着种种结构方面出现的恶化，暴力行为正在向更大范围扩散，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从一个同龄人脚上抢去一双名牌体操鞋（一种在此期间已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典型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在百货公司或超级市场经常发生的偷窃行为只是一种小偷小摸，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偷吃现象，以此越来越多的人并主要是年轻人想分享被剥夺的商品消费，而媒体又同时铺天盖地地把物质消费作为人生的目的不断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

一段时间以来，公众舆论对随着结构性大规模失业不可避免地带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做出的反应是是虚伪的理解和对教育的看法：这么糟糕的道德堕落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家庭教育的失误或者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原因肯定不于在美好的市场经济。事到如今，新自由主义的征伐在这方面也打出了赤裸裸的镇压大旗。能够指望得到剩余的理解、社会救济机构工作者的照顾和分配到一个业余活动场所的人在德国只有那些把残疾者从轮椅上推倒并诅咒他们是“成本因素”的新纳粹分子；“我们的年轻人”确实只是做得有点儿过分了，必须让他们平静下来。反之，由于神圣的私有财产受到的严重侵犯，新自由主义征伐的宣战呐喊响彻了全世界“毫不宽容！”。

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共和党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他的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号召无情地打击哪怕最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不仅意味着“宁多勿少地拘捕，整个社区只要出现任何可疑之处，就出动大批警察进行搜索”（Baier, 1998），而且柯尔特自动手枪的使用也很宽松。成排手无寸铁的、只是形迹可疑的人（当然主要在贫民区）被子弹射穿；这种行动似乎逐渐在别的地方也被效仿。1999年初，纽约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忍无可忍的警察专制和野蛮的行径。安全专家们甚至警告旅游者，在和美国警

察打交道时不要不经心地做出一些“可疑的动作”。根据《时代周刊》的评价，纽约从此之后可被看做是“警察工作的圣地”：来自世界各国的警官、地方政界要人、青年人救济机构工作人员和犯罪问题研究者形成了一股不可控制的潮流，成群结队地到这个“毫不宽容”的麦加进行朝拜，为了学习人们是怎样“做这件事”。

在过去几年里，80%的美国城市对年轻人实行了宵禁；这一在许多国家得到提倡的“针对儿童的战争法规”在波兰也成为现实：在那里的拉多姆城，低于18岁的年轻人晚上23点到早晨6点之间不再允许上街。连荷兰也采取了强硬路线者的立场：

“(在)弗里斯兰省的首府，警察不懂得宽恕为何物。这里从年初以来，克拉斯·邦克(Klaas Bunk)检察官就实行‘毫不宽容的原则’，每一个轻微的违法行为都将立即受到惩罚……不仅在……限制社会福利费用方面，吕伐登市市长哈约·阿波特克尔(Hayo Apotheker)说，‘围垦模式’应该成为欧洲的榜样……社会气候在荷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份名为‘De Volkskrant’的日报这样写道，现在人们达成了普遍共识：如果小小的违法得到宽容的话，那么人们的生活将被葬送。”[Der Spiegel(明镜周刊)，19/1998]

为了羞辱犯罪者，行刑柱或耻辱柱此类中世纪的风俗在美国又重新盛行开来。在商店行窃的年青小偷必须在他作案的商店前面罚站，并且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一个小偷，我在这个商店偷了东西。”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定期举办公开的羞辱活动，标题是“耻辱的时刻”；堪萨斯城有一个地方电视台甚至从传播曾被判过刑的人的照片和犯罪行为中获益(Diederichs, 1999)。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作案者被当作成年人判刑，连16岁的

人都被处死。在美国建立一部自己青少年刑法的想法今天已经过时了。为了控制“儿童犯罪率”和更容易将罪犯送进“监狱”，在欧洲要求降低判刑年龄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如1997年在德国联邦议会中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就这样呼吁）。其他地方这类监狱的状况从得克萨斯有一篇关于青少年监狱的报道中可以得知：

“在大寝室里除了30张双层铁床，没有其他什么摆设，里面闪烁着刺眼的氖管灯光。清晨五点半带着噪音的喇叭里传来小号吹奏的刺耳起床号声。时过不到一秒，30个光着头，只穿着短裤的年轻小伙子迅速从床上跳起来，急急忙忙地寻找着自己的衣服……两个监工趾高气扬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他们又名曰‘教官’，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声发出命令……劳动教养所由于同在军事上进行基本训练的军营具有相似性，人们习惯称它为‘新兵训练营’，这在美国越来越多了……中尉教官……在一个训练场上驱赶着……犯人们越过障碍物。他让他们走步、跑步和在地面上匍匐前进……如果有人和另外一组的人说话，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犯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严厉禁止的。谁触犯了规定，必须在酷热的训练场上将一堆大石头从院子的这个角落搬到另一端……谁如果找不到自己柜子的钥匙，就必须受罚而将他柜子里的东西放在一个背包里背上一周，无论走到哪，他都要背到哪里。”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1996.6.22]

此外，满载“问题儿童”的汽车不断驶来，人们强迫他们观看这种管教方法以引为鉴戒。这明显是18世纪末期边沁主义的老办法，资本主义尽管试过所有的心灵训育过程，却仍然回到这条老路上来了——这是整个驯化计划即将彻底失败的标志。资本

主义中令人发指的矛盾只能够用暴力、刁难和用一种变得越来越愚蠢的道德说教来平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原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宣传过一套“人类义务的目录”，提倡对成长中的几代人反复灌输。还在撒切尔时代，英国国家教学计划委员会就发表了一份“共同价值观念的声明”，学校里的学生必须能够背诵。“铁娘子”很坦率地道明了与此同时哪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在我几个辩论报告中（我都曾）赞成增补一项新的附加条款，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很愿意看到它被收进当时的刑法里去，这项新条款计划对年轻的暴徒施行体罚。”（Thatcher, 1995, 第144页）

托尼·布莱尔甚至发现公众对他公开承认打自己孩子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对付成为废物的无用之人的孩子当然只能用更强硬得多的手段。在法国，长期以来山地步兵和伞兵已为巷战而接受训练，为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调动军队在本国的郊区阻止暴乱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45/1995]。如果对违法的青少年人因为最小的犯罪行为就已用最残忍的手段加以镇压，那么对成年人当然更是如此。这里从各种各样的刁难凌辱直到公开的恐怖行为也是样样齐全。在全欧洲，“秩序政治家”们都正在将穷人、乞丐和失业青年等等从市区驱赶出去，省得那些高收入者在悠游闲逛时看到由这些人造成的脏乱市容和受到他们的骚扰。有关此类内容的报道和19世纪初的报道可以说分毫不差。

有关的规定逐年地严格起来。坐落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几个德国城市于1999年初颁布了一项规定，对在“露宿公众场所”和在街上喝酒精饮料定罪。常见的情形是，乞丐被刁难或被装进警车，随后遗弃在远离城市的某一空旷地带。关于警察对待移民、轻罪犯或只是“可疑”的穷人的最严酷的施暴行为

的报道在所有资本主义核心国家都数不胜数。大赦国际联盟不得不对美国监狱里无数不人道的做法提出控告。如女囚犯必须当着男看守的面淋浴并且被触摸，被看管人员强奸也屡见不鲜。就连怀孕者也被虐待：“有些妇女在生孩子时被捆绑住，有些人在大出血时被捆绑在床上长达几小时”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法兰克福汇报), 1999年3月24日]。在亚拉巴马州，“不愿意工作”的囚犯在烈日下被用手拷锁在柱子上，并且甚至长时间不让解手，直到他们声明愿意工作为止。关于如何执行判决的情况，也在一篇报道了“美国最严厉的行政司法长官”的文章中透露出来：

“在亚利桑那州的荒漠地区，在垃圾堆和首府菲尼克斯的动物尸体火葬场之间，在过去4年里，出现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帐篷城市。被判刑的罪犯由于在玛励科帕郡过度拥挤的监狱里找不到落脚地，于是被安置在陈旧的军队帐篷里。夏天的时候，这里气温达到50度；在雨天，犯人们试着用牙膏来修补帐篷的窟窿……亚利桑那州荒漠上的‘帐篷城’是乔·阿尔帕约 (Joe Arpaio) 的发明，他洋洋得意地自诩为美国最严厉的行政司法长官……他竭尽全力使囚犯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万分。比如，让男女囚犯带着沉重的脚镣在菲尼克斯市中心或沿着公路清扫垃圾或拔除野草。他们吃不上一顿还热乎的午餐，而只能得到无法再出售的中间夹有发霉变绿熏肠的廉价三明治。阿尔帕约引以为豪的是，他通过这种方法把一顿午餐的费用从2美元降到了30美分。举行葬礼的开支也能节省。死去的囚犯将不再由专业的殡仪馆，而是被其他犯人埋葬……所有犯人必须统一穿粉红色的内裤……这一行动在菲尼克斯城得到如此广泛的反响，以至于行政司法长官周末时在购物中心以10美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粉红色

的内裤（外加亲笔签名）。这些收益对由他创建的由 3000 名精兵强将组成的国民军带来实惠。这个军队的成员包括医生、律师，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政府官员……” [Neue Zürcher Zeitung（新苏黎世报），26.9.1997]

这就是西方的自由，这就是十足的自由主义。为了实现这种状态和原则，非常值得用地毯式轰炸向譬如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权这样的独裁专制者去传授实行人权的方法。在整个西方世界，“把贫困定为犯罪”和“国家惩罚措施的加强”（Wacquant, 1997）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个纪律国家在这期间正在系统地编织一个密密的格状结构，它将代替正在解体之中的慈善国家原来的社会福利网……第一个方法本来只有受害者能体会得到，即把现有的社会福利工作转变成对新的‘危险阶级’的监督和控制在工具……第二个在政治上对穷人采取的‘镇压限制’的方法是大量和有系统地恢复监狱的机构……在六十年代的倒退以后美国的犯人数目爆炸似地猛增……”（Wacquant, 1997）

早在 1996 年，美国就已经有 160 多万人被关在条件不太人道的监狱里，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关押人数增加了一倍。今天的数字可能会突破 200 万大关，此外这也有助于失业者的统计数字的改善。《经济周刊》（1997 年第 52 期）惊讶地发现，在世界上民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整个社会的“囚犯比率”超过了斯大林统治下前苏联的古拉格时代的“囚犯比率”。媒体嘲讽地评论说，在这种作案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大约到 21 世纪中叶，全部美国公民都得关进监狱。建造更多更大的监狱建筑群已在计划之中，仅在得克萨斯州到 2000 年预计为此投入 20 亿美金。英

国在90年代中期也为建造监狱将几十亿英镑列入了财政预算，为了“创造”10000个新的单人牢房。同样在欧洲，包括在德国，用于监狱和镇压手段的费用也急剧上升——社会福利方面的贴补正以反比例在减少。

微电子技术当然也装备了各种各样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与福特主义时代相比再次对这些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和精化。国家机器也像大公司一样使用电子控制的“人事信息系统”，为的是创造完美的“玻璃人”并以此最终实现自边沁以来所有驯化人类的梦想。负责人员管理、镇压和监督的私有资本主义机构和国家机构的“数据校正”也一年一年不断强化。对此绝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策略，因为这些监控机构的数字化融合过程主要是受制度及其危机过程自身活力的渗透作用的推动。这样的监控甚至在空间上覆盖面极宽，对此倒还不需要高分辨率的卫星观察系统（至今更多是用于军事上），而是在城市里用不断更新换代的和更完善的电子监控摄像机对居民跟踪追击，这样的监控摄像机甚至能够自动地对可疑人物根据事先储存的照片进行辨认。英国在这方面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在对赫尔大学的一次调查中，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克莱夫·诺里斯（Clive Norris）得出以下的结论，现有的自动识别技术可以使政府有能力监控每一个公民……没有人知道，在大楼和公共广场安装了多少台闭路电视摄像机……对老大哥式专制国家的畏惧已经开始出现苗头，它显然已属于家庭的一部分……在纽卡斯尔，政府当局为当地拥有世界一流的监视技术而感到骄傲，警察局在发生街头骚乱后立即将闭路电视的画面向媒体公布。《纽卡斯尔晚报》登出了100个捣乱分子的照片，并且使它的读者们成为警察的朋友和帮手：他们应该辨认和告发照片上的人。”[Der Spiegel（明镜周刊），9/1998]



资本主义锅炉的压力在不停地上升，而毫无节制的领导精英们却幸灾乐祸地去除了所有的阀门。市场经济—民主和“民众社会”的常态的外表即使在西方中心国家也会炸成碎片，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可扭转的局面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征伐同它野蛮的危机管理体制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通过让人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企业主”而达到的资本主义思想驯化的最后阶段难以同民主的奴隶主国家公开的暴政管理和监狱体制协调一致，同样，微电子的边沁主义监控机构同重新启用的中世纪耻辱柱，或者大批人在合理化过程中被裁减掉的“过剩现象”与荒谬地重新唤醒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道德也不匹配。通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应对 21 世纪的危机，民主从它内部产生出一个新的古拉格劳改营和一个新的“绝望时代”。

### 新的大众贫困

80 和 90 年代的危机波澜连同国家在社会责任面前的退缩和新自由主义征伐两者所造成的影响共同导致了自 19 世纪以来大众贫困化最为汹涌的浪潮，如今人们对此已深信不疑（这也几乎是不争的事实）。福特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从前世界上的殖民地所抱有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愿望如今都像一阵烟雾消散殆尽。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完全被毁坏，甚至那几个成功地追补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也在劫难逃。眼看着珍馐美味即将到口却被从已经铺陈停当的全工业化消费水平的饭桌边赶走而产生的极度失望在诸如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处处留下了外伤的痕迹。

解体的前苏联和整个东欧的经历更为可怕，这里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一种国有资本主义形式的完全工业化体制，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处于一种较低的消费水平。在短短的几

年内，这些国家所有生活领域里已达到的消费水平却全面降低了。在此期间，西方国家本身的整个地区和逐年增多的民众群体也渐渐远离以前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也同样体验到了大众贫困化给他们带来的切肤之痛。奥里奥·贾里尼（Orio Giarini）和帕特里克·M. 利特克（Patrick M. Liedtke）新近写给“罗马俱乐部”一份报告，他们用寥寥数语扼要地陈述了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持续加剧的全球大众贫困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巨大财富的存在的相同看法：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然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贫困和愚昧无知却仍然无处不在，在某些状况下甚至正在不断加剧……令人遗憾的是，还有 14 亿人——这几乎占全球人口的 1/4——连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仍极其匮乏，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Giarini/Liedtke, 1997, 第 25 页, 第 192 页）

按照人类全部理性的标准，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连同盲目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认为已经“战胜”了国有资本主义之后，却在“资源的合理分配”（生产资料投入使用的调控和商品的流通）中彻底失灵。当然那些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以及那些未来方案设计师们恰恰对此事实是不会也不愿承认的，因为他们已经将此制度尊奉为大自然的金科玉律，并因此而总是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鼓噪它那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约束力。因此，面对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大众贫困这一“自然事实”他们就再也想不出比更多的廉价工作和强制劳动这一美妙组合更好的济世良方了。

即使是国际资本主义机构中最大的贫困制造者之一的世界银

行也在对自己通过其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规划纲要”而参与制造的严重大众贫困化现象而哀叹，如同是在悲悯一群瘟疫患者或龙卷风暴的受难者一样。世界银行1999年的报告中同时确认，世界上每天不得不以低于一美元的生活费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在1987至1993年期间又增加了1亿人，从而达到了13亿人。据估计迄今已有15亿人，跨入新千年后不久将达到20亿人。仅在印度，贫困者的数目从1989至1999这10年间就从3亿人上升到3亿4000万人。

世界银行负责“减轻贫困”的董事迈克尔·沃尔顿（Michael Walton）也无奈地坦言道：“总的看来，90年代末全球的景象令人沮丧”[转引自：Handelsblatt（商报），1999年7月6日]。如果这就是20年来一直倡导的“多一些市场经济”的政策所带来的明确结果，并且世界银行对此结果也如此沮丧，以至于它再次建议增强“市场经济”的比重，那么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那些领导精英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状态。90年代全球大众贫困急速加剧的明显症候是，由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困化进程在工业化国家要比在那些反正已是满目疮痍凄惨景象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要快。在任何还要继续削减费用的地方，都能看到大部分民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正在明显下降。

这种现象首先是在东欧的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但随后也蔓延至西欧核心国家本身。根据欧盟提供的数字，1996年欧洲就有至少1亿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绝不仅仅包括那些完全的失业者。由于只是把目前“就业状况”推向低工资的方向，——此类把戏美国早已操练过——所以，一个很可爱的概念“职业贫困”便进入了我们的语言。这就意味着，甚至全职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也维持不住贫困线以上的生活——这种状况至少在15或20年前的欧洲（不管是西欧还是东欧）是难以想象的。

在那些“职业贫困者”中除了失业者和社会救济接受者外，还有许多悲惨地生存着的“隐形的贫困者”，也就是那些不愿意使用他们获取社会救济权益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所谓民主的贫困救助机构性施虐狂般的侮辱——仅在联邦德国就有大约 280 万人。即使在最富裕的西方国家也聚集了潮涌而来的一贫如洗的上百万大众。属于最底层的——这也并非偶然——大多是极为贫穷者，他们或是完全丧失或是只具备有限“劳动力”的人们，诸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囚犯等。在联邦德国，不管是从普遍情况还是从儿童和单亲家庭的特殊情况来看（远远超出比例），90 年代上半叶的贫困率上升在以下统计数字中可以得到证实：

1990 年和 1995 年收入低微者百分比

群体	西德		东德	
	1990	1995	1990	1995
总人数	10.5	13.0	3.4	11.5
15 岁以下儿童	16.7	21.8	5.1	19.7
单亲家庭	36.2	42.4	16	35.5

资料来源：Palentien u. a., 1990/联邦统计局。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贫困率的上升是飞速的；第二，贫困率在前东德要低得多；第三，比成年人多得多的儿童（大约 20%）已加入贫困者的行列；第四，单亲家庭的贫困比例几乎还要高出一倍，这只能意味着，众多被民主的贫困救助机构缠磨着的单身母亲面对她们的孩子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状况而一筹莫展，她们自己在这情形之下也已变得穷困潦倒。这个属于社会福利费用比较高的最富裕的国家中尚且存在这种不光彩的趋势可以让人反推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众贫困肯定已在何

等程度上转变成但丁笔下的地狱了。

这些抽象数字背后的境况则不可言说，让人几乎无法理解，所以也为民主的公众社会所不容。尽管这一切在某时或某地会有人提及或公开承认，但是从来没有去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制度（“民主和市场经济”），因此在大众传媒中，只是在报道体育比赛、自然灾害或是政界闹剧时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诸如在面对第三世界里童工不是减少而是迅速增加的现象时，人们的反应几乎都是不以为然地连肩头都不耸一下。90年代的新情况是，使用童工这种社会犯罪现象也在西方猖獗起来，尽管西方各国官方对此是明令禁止的。

根据德国儿童保护协会的统计，在联邦德国就有70万个15岁以下的儿童从事非法劳动。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由于买不起日用消费品而自愿工作的。迫于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在小酒馆、商店、农庄、园艺场以及市场上越来越多地在家庭范围内使用童工。而从事非法劳动的大多是社会救济接受者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们。杜伊斯堡青年福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随着某些社会阶层的贫困化趋势，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儿童的劳动力为代价。”（Clausen, 1998）就是在百般喜爱儿童的意大利也有近50万巴比尼斯儿童在诸如米兰或热那亚这样的工业中心被迫成为童工。在西方世界内部，美国在这方面创下的残酷性纪录也是当仁不让，大量有关事实的报道为此提供了佐证：

“安杰儿·奥利韦拉斯（Angel Oliveras）迈着笨重的脚步摇摇晃晃地穿过种植园。胡椒灌木丛的高度刚好这个4岁孩子的下巴。安杰儿并不是在前往幼儿园途中迷了路——他在工作。这个小大人正在和他的妈妈一起为了不足以糊口的收入采摘辣椒荚。这并非是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在美

国……此类劳动产品都被运往坎贝尔汤类制造厂、西尔斯百货商店康采恩、H.J. 海因茨食品公司和好莱坞电影明星保罗·纽曼私人所有的纽曼公司……据官方统计，在美国每五年就有一名儿童死于过重的劳动。每年大约有 20 万低龄人在劳动时致伤……14 岁的亚历克西斯·海梅斯 (Alexis Jaimes) 就是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被机器压死的。15 岁的约书亚·亨德森 (Joshua Henderson) 在科罗拉多的一个汽车清洗机旁做工时被电击而死。当伊利亚娜·席弗恩特思 (Iliana Sifuentes) 在一个苗圃里用一把大砍刀修剪圣诞树时，砍伤了自己的手指。‘你要是想多挣点钱，就得抓紧时间去干活’，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说。她的伤口是在没有任何医生的情况下自己包扎的——这样的事情就像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从未在统计中被记录在案。” (Foster, 1997)

有着更为悲惨命运的是连艰辛地从事非法劳动都轮不上的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靠施舍、偷盗和卖淫苟且偷生的孩子们。儿童流落街头的现象同样也从第三世界蔓延到了第一世界。俄罗斯至少有 200 万儿童在街头流浪。美国和大不列颠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明显可见的新建贫民窟之外，另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城市景观就是街头上的流浪儿。在联邦德国，众所周知的柏林街头流浪儿童已经成为一种成群结队的现象。就在政府各部分纷纷迁入柏林之际，新德国的首都就庄严地向世人昭示了作为民主中心的柏林同时也是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童的栖息地。美国议会由于拥有足够确凿事实的资料，数年来一直向联合国施加压力，敦促联合国在削减开支和精简机构的行动中解散儿童救助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美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甚至能在 90 年代中会同生产力的超常速提高又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饥饿现象。这种不是由自然灾害

造成的，而是由社会本身决定的饥饿现象从未脱离过资本主义，只是在福特主义的繁荣景气时代被排挤到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自以为富裕的西方社会公民们沉溺于福特主义的大众消费，只是怀着半种族主义和半慈善的心肠注意到了世界市场南部地区广泛地存在着的饥饿现象。我还能记起那个站在教堂里在有人为“受穷挨饿的黑人”投入每一枚硬币时鞠躬的那个“点头哈腰的黑人”。

德国世界饥饿救助组织于1962年成立。时至今日，有为数众多的此类救助机构都在尽一切可能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只不过有一项工作始终没有着手：并没有对那个通过它荒谬的限制才造成饥饿现象出现的全球商品生产体系提出批判。因此，许多救助措施并无持久的效果并受到世界市场逻辑的无情冲击。世界营养大会于1996年不得不断定，全世界有8亿4000万人正在忍受饥饿。或许当时就已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目前由于新的贫困现象的加剧，在东欧、亚洲、拉丁美洲和西方国家本土有10亿多人食不果腹。退休者在他们那没有取暖设备的房子里冻得瑟瑟发抖，他们在艰难地熬过数个饥寒交迫的冬季之后——比如在保加利亚——就下降到一个人类社会的最底层：

“自二月份以来，一位女厨和两名助手在一个空荡荡的学校厨房里为800个挑选出来的被救济者准备粗陋的伙食。谁能得到300克热汤和一个面包，这要由数百万人口的索非亚市的社会福利站说了算。72岁的埃米尔·鲍里索夫（Emil Borisow）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那张可以让他获得救济的许可证，将其视若珍宝。一些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饥肠辘辘之人正在外面等待着，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残羹剩饭。一位原先在皮包制造厂工作的工人去年冬天为了购买黄豆来替代肉食充饥而不得不以一个马克将他的外套典当出去：‘我的妻子病了，她实在饿得不行了’……”（Loose, 1997）

在罗马尼亚，居民们如此这般的贫困正在不断加剧，以至于受饥饿折磨的人们冲进了动物园，为的是屠杀动物用来充饥。俄罗斯的状况则更为骇人听闻。1999年初，政府计划大赦，因为拥挤不堪的监狱已人满为患，无力供养那么多的犯人了：每个犯人每天大约只能得到价值5个芬尼的食品。仅1997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表明，在新的民主古拉格劳改营中有10000个男男女女正在充满痛苦地忍受饥饿的煎熬。从俄罗斯人员管理部门的其他领域内也向外界传出了令人恐怖的新闻：

“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几所精神病院由于资金短缺而让大约200名精神病患者出院回家。据俄罗斯电台报道，在一名被放归家中的精神病人由于没有食物可吃而用斧头杀死他的邻居之后，整座城市里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其中一所精神病院的副院长说，目前出院的病人大都只是情绪比较安定的患者。如果财政状况得不到好转的话，他们将不得不放回所有的病人。‘我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让他们饿死。’因为缺钱，精神病院里的患者只能以麦片粥和汤充饥。” [Nürnberg Nachrichten (纽伦堡消息报), 23.10.1997]

除了这类部门之外，整个俄罗斯的营养状况也并不乐观。尤其是在各个省里更为明显。昔日的二号超级大国在经过市场经济—民主改革之后，其社会经济状况已下降至一个非洲穷国的水平。友好城市和文化交流机构越来越多地听到从他们俄国朋友那里传来的绝望的求救声。一篇关于西伯利亚地区的报道叙述了那里的境况：

“冷冻的鱼犹如木柴一样被堆放在西伯利亚乌兰乌德的



商场大厅里……一步之遥的门后面也堆放着大量待售的肉类和蔬菜……根据如此丰富的食品库存看来，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应该不存在饥饿问题。但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却把这一地区列为这年冬季被食品匮乏严重困扰的地区……布里亚特社会部部长斯捷潘·叶菲莫夫（Stepan Efimow）……却矢口否认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会因饥饿而丧命。‘我们的孩子们快要饿死了，’地方红十字会的薇拉·巴尔达诺娃（Vera Baldanowa）愤怒地反驳说，‘由于饥饿他们都快要昏倒了。他们挨饿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失去了工作。’有些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了——而去年的物价却迅速上涨……‘商店里和市场上应有尽有，’巴尔达诺娃解释道，‘商品选择余地非常大——但是却人们却买不起用以果腹的食物’……”（Landsberg, 1999）

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原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众贫困，边沁对此就早有定论——而今日自由民主世界第一强国对此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据农业部的官方统计，美国有几百万人营养不良，其中儿童尤甚：

“有 420 万美国人正在挨饿……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有 80 万户家庭经常一整天都揭不开锅。据慈善机构的统计，这仅是个远为保守的数字。依据‘第二次收获’组织统计，有 3000 万人处于‘食品供应无保障的状态’中，有 2600 万人每个月要靠公共福利伙食供应或食品捐助过活。”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17.9.1997]

但是这种公共福利伙食供应也不再能解决多少问题了。比如

在里根上台之后，由于军费开支增加使学校的伙食供应锐减，尽管这顿“公共大餐”对许多孩子来说是惟一一个获得丰富营养的渠道：

“到1981年9月为止的一个基本目标是，通过提供一顿校园午餐解决一个孩子1/3的营养需求。对许多青年学生来说，校园午餐是一天内最好的、有时是惟一的一顿饭。农业部的一系列调查表明，家境贫困的儿童从这顿午餐中可以吸收所需的1/3甚至1/2的营养。除此之外，他们不得不四处找寻好吃的东西。”（Lekachman, 1982, 第88及下页）

即使是在为全世界生产食品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果品和蔬菜种植园，“儿童保护基金组织”也确认这里存在学生们营养不良的事实。在许多联邦州内，来自社会底层的儿童过完假期返校时都变得枯瘦如柴。教师们报道了如下严重的饥饿状况：

“詹姆斯·施泰尔（James Steyer）是奥克兰的一名教师，那里是美国最穷的地区之一。他在最近这段时间里着重关注了一些明显吃不饱饭的学生的情形。他谈到一个12岁孩子的身高和一个6岁儿童相差无几。‘我有个学生，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在机场行李搬运房工作，从下午4点一直工作到半夜。我问他：拉斐尔（Rafael），你晚上回家后都干什么？他告诉我，他晚饭时喜欢吃土豆。我问他，土豆是怎么做的？他说：爸爸每天晚上都留给他一个土豆吃。我又问他，你怎么做这个土豆吃？他说：我根本不煮土豆，我生吃。’……”（Kölle, 1992）

这便是“生活富裕程度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在近300年的

危机、战争和贫困年代中难以避免的“土豆生活水平”，它再次让人领教这是什么滋味。世界上头号民主超级大国不仅成功地使自己的儿童们遭受饥饿之苦，而且还为了取悦那些童心不泯的军事科学家们将一个玩具汽车发射到有一亿公里以外的火星上，在那里摆弄几块石头碎片并且用一些专有名词为其命名。难道这不是在任意浪费资源！即使是在西欧和中欧的民主国家内，饥饿也早已卷土重来。在大不列颠，新的社会底层的儿童重新又患上了以前19世纪的那种营养缺乏症，而政府面对食品匮乏也像美国政府一样变得冷酷无情。玛格里特·撒切尔在这方面竭力赞成她的老朋友，那位冷血的经济自由主义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的一个做法。她在她的回忆录里非常自负地写道：“首先节省学校午餐并给学生提供牛奶。”（Thatcher, 1995年，第215页）皮诺切特派人在政府的宫殿里暗杀了当选总统的阿连德（Allende）之后在他那些虔诚的作品之一中也写了同样的话。英国贫困者的营养状况在布莱尔政府领导下非但没有好转而是更为恶化，在法国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挨饿者除了老年人之外就首先是那些单亲家庭成员：

“对莫妮克（Monique）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她是否买得起一张昂贵的电影票或推迟购买一张梦寐以求的激光唱盘。她每个月都精打细算，她不知道支付了电费之后是否还有足够的钱为她自己和3个孩子购买肉和奶酪。‘我认识一些家庭，他们的孩子只能用香蕉充饥，’33岁的莫妮克说。”（Gabriel, 1998）

在这点上，“莱茵河边的资本主义”国家联邦德国当然也毫不示弱，因为这关系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场高贵的竞赛中由谁来打破饥饿儿童的最高记录。1997年，德国儿童保护协会促

使久已取消的学校供餐重新实施。正当身着阿玛尼品牌西装的左派在新首都柏林庆祝他们的民主联合的时候，一大群贫困儿童却在向他们的同学乞讨一块课间面包。汉堡，这座联邦德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挨饿的居民也同样明显日益增多：

“在有些儿童商店里星期一要比平时供应更多的食品，因为孩子们周末在家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卡罗拉·托马斯（Carola Thomas），汉堡一所小学的女老师说，几年来他们一直在教室里放着一台冰箱，里面存放着班里的早餐食品……总有孩子会说，妈妈没有给我带吃的，妈妈没有钱或家里的冰箱是空的……现在，全班一起用早餐已经成为课程中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因为否则孩子们会由于饥饿而不能集中精力听课。’很显然，在许多家庭里午餐和晚餐都吃不上热的食品……在汉堡—鲁卢普由儿童保护者协会和教会慈善救济组织赞助经营的集装箱式商店内，如果星期一中午有烹制的热食品出售的话，就会吸引一大堆孩子前来购买午餐……能吃到刚出锅的新鲜食物对许多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享受……负责厨房的韦雷娜·贝尔曼（Verena Behrman）说：‘我们把食品刚一放上货架，立刻就被一扫而空。’她总是感到非常吃惊，‘有那么多的东西孩子们都不认识：花生、葡萄干、水果和蔬菜，有些孩子从来都没吃过这些东西。’”（Jurkovic, 1998）

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饥饿还没有像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那样直接因饥饿而导致死亡。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目前，慈善机构只能解决当地饥饿问题的极小部分。而那些民主机构都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阻挠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调查工作。在医疗保健中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在美国，并无任何法

定的医疗保险制度，居民中的一大部分完全没有医疗保险。即使是中等阶层的人得了重病之后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下等阶层的人也只能得到“最为亟须”的救助，此后他们便背负上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即使在有法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里，这一“成本因素”在市场经济的范畴中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剪刀差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医疗费用在上升，另一方面，投保人的收入却在下降。随着全面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进程不断深入，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就像那句格言中所说的那样把高收入者列为首要对象：“富裕、年轻和健康是头等大事”[Die Welt (世界报), 23.3.1996]。而法定的医疗保险公司相反到处都成为“穷人的保险”。在市场经济世界的其他国家里要比西方国家中这一趋势胜过一筹，只是因为在大部分东方和南方国家内（古巴除外）医疗费用反正还是用现金支付的。谁没有钱，就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和病死街头。新产生的、持续加剧的大众贫困所造成的亿万贫困之众由于营养不良和普遍恶劣的生活条件极易生病，所得到的医疗却很差（或根本得不到任何医疗）：

“牙医只要看一眼一个儿童的牙齿就能知道他的社会出身：贫困家庭中的9岁儿童平均已有5颗蛀齿或者掉落五颗牙。龋牙和牙龈萎缩的分布会因社会阶层不同而有异……在德国每10个属于社会底层的54岁的人中就有一位牙齿已全部掉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层社会的每100个人中只有一位是满口无牙的……在整个联邦德国，不同年龄的群体中以及在几乎所有的病痛中都存在着极不均衡的健康状况……保持健康的机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Blech, 1997）

不仅健康状况，而且医疗状况也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差异，在联邦德国人们的牙齿状况同样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每年圣诞节，各大日报举办的活动都定期地利用具体的事例允许人们关注民主社会的日益堕落并藉此为急需救济者们募集捐款，而这也为这方面论据提供了“蕴藏量丰富”的证明：

“贫困者目前都在担心……他们是否还会拥有用于咀嚼的牙齿。许多低收入者感到无力支付牙医费用……玛吉特·B. (Margit B.) 回想起8年前因为全面的治疗而好多天里不得不只用一半的牙齿咀嚼食物时，至今仍然不寒而栗……现在，由于常年的癌症引起的牙病又需要治疗，而自己要支付的费用估计需要3430马克，这几乎等于她5个月的收入。玛吉特·B. 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位被停止享受病假补助金的人每月可获得712马克的失业救济金……”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纽伦堡消息报), 1998.12.16]

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家们至少在联邦德国都在极力矢口否认这样一种分成两个等级的医疗状况，其实这种状况早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且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形也毫无二致。尽管现有的医疗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但是这些资源对于那些被社会抛弃的贫穷大众来说却是越来越可望不可及，因为与生活的其他东西一样它们也必须以某种方式穿过资本主义经济的针孔才可享用。而正是由此可见，人的身体和生命都要完全服从“财政优先条件”。按金钱物神旨意行事的民主机构管理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不可阻挡地每况愈下。随着每一项新的“费用缩减”措施出台，都有越来越多的福利救济金和人员被“减免”。民主制度下新产生的贫困者所得到的救助越来越少，或者说只有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微不足道的救助。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却像兔子一样被用作改善

高收入者健康条件的试验品。乔治·毕希纳（Georg Büchner）在他的作品《沃伊采克》中所描写的十九世纪早期那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中穷人被用做实验对象的现象如今已司空见惯：

“这个新的职业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业知识，惟一的条件是：34岁的休·梅希亚（Hugh Mejia）在开始工作之前不许吃早餐。他这次的工作地点是旧金山综合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每天早晨8点钟，这个瘦弱的男子非常放松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将针刺入他的胳膊上的静脉中并在他的头部安装上许多电极。手术之前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一次出了点差错，当医生们将一根导管插入他的心脏时，他的心脏短时停止了跳动。‘这可能是致命的，’梅希亚当时想。不一会儿，麻醉针就起作用了……在他失去知觉期间，外科医生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切来划去。这种无疤痕手术只是一次医学试验……这位旧金山的单身汉的正式职业就是所谓的‘研究对象’：一只活人试验兔子。12年来，他一直以此为生：并无任何疾病却要吞吃药片，还要往试管里撒尿，做X光透视或被麻醉。他有时还不得不忍受一些相当怪异的……试验：一次，他赤身裸体地被医生们……用冰冷的布包起来……他们想搞清楚，人的体温骤降后究竟多快就会使他的牙都不会再冻得咯咯打颤。然后，研究人员又让他喝下大量的咖啡，目的是要确定他的免疫系统是否会并且何时会陷入崩溃……试验程序——像在所有拥有大量的自愿参加试验者的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总是千篇一律……在美国，像梅希亚这样……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医学试验的人有5万之多……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是‘临时工’：他们是失业者、退休者、退役军人或刑满释放的犯人……” [Der Spiegel（明镜周刊），4/1998]

这里指的“自愿”并不再是一种自由选择，并非是为他人做出的一种牺牲，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穷者间接地被劳动力市场逼迫将自己的肉体出卖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富有者。这种民主制度极为特殊的奴役形式还在不断发展，因为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中金钱的贫困正好被派上了用场，促使穷人成为有钱人合情合理的器官库，他们的内脏随时都可以被取出。被世界市场毁坏了的第三世界简直就成了供医学使用的人类屠宰场。所以在九十年代末，一种所谓的“肾脏旅游业”就曾四处蔓延：

“商业性的肾脏移植至今在印度尤其盛行……在此期间，巴基斯坦的医生们也参与了器官移植的勾当。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从菲律宾人身上获取他们所需的肾脏。在器官旅游业生意兴隆的时期，仅在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市的一条街上就有 200 家肾病诊所相互竞争。这一地区偏僻的村庄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肾脏殖民地’。有一种说法，在那里谁要是拥有一辆自行车，那么他的胁腹部位就会有一个 25 厘米长的伤疤……”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46/1996]

这也许是供给经济还可以想象的最后阶段。哪里只要有能成为市场商品的地方，即使是人的器官，即使是穷乡僻壤，面带笑容的金钱也会到那里寻找无奈的牺牲品。1999 年初，开罗的检察机关对一个“私人慈善组织”做了一次调查，据说它至少把 25 名孤儿转卖给了人体器官贩子从而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为了同样的目的，在巴西甚至有人在大街上捉儿童。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是，90 年代的人体器官贩子为了高额的利润正在那些国内战乱不断而民不聊生的地区暗自活动。只要市场可及之处，道路就延伸到那里。

人类社会的堕落看起来甚至会殃及到人的生物肌体本身。在



加尔各答、开罗、马尼拉和巴西的东北部地区生活的那些所谓的“垃圾人”的处境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悲惨的。那里生长着一种矮小的侏儒种群，或称为“鼠人”，一种身高至多 1.5 米的人工培育的俾格米人，他们年纪很轻时牙齿就已经掉光了，精神处于半痴呆状态——这是一种经过数代遗传的社会性伪生物。在这个人类社会的最上层便是那些收入丰厚的资本主义精英们，他们由衷地希望借助于一般凡人经济上承担不起的“生育遗传”技术使自己成为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特种生物。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李·西尔弗认为，通过资本主义方式进行“人种选择”是可能的，这最终甚至会导致分化出一个另类人种。

资本主义的医疗和保健制度中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比比皆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在对待精神病患者或残疾人，尤其是对待急需照料的老人的方式方法中体现出来。这些人都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独立地作为市场主体来行动，并且已经毫无用途了。仅敬老院和护养院这样的老人和病人之“家”的存在就已表明，在整部资本利用机器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越往前发展，它留给人们的时间也越少，以致连直系的家庭成员在作为已消耗殆尽的人力资源丧失了身体各方面功能的时候，也不能够得到亲人的照顾。再说这一全面竞争的制度长期以来早已使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亲密关系都疏远了，对许多在市场经济这个踏轮磨坊枯燥繁重的工作中的只身奋战者来说，亲生母亲消失在某个养老院的院墙后面，犹如一门远房亲戚在视野中逐渐隐去。

但却再没人想得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安排成另外的样子。惟一人道的做法本应是，使那些需要护理的人能够在他们亲人身边寿终正寝，而且社会应该为实施这个设想提供资金和时间储蓄，以使任何人不会由于做这样的护理而中断所有其他的兴趣和活动，并变得孤寂和贫困。老人、病人之家的“家”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是人员管理机构，它因此而得到的一个令人不寒

而栗的附加意义，却表明了 in 资本主义中一个意味着某种安全避风港的“家”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就是在走向非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整个社会在福利方面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高收入者可以将他们不想照料的家庭成员推给豪华养老院，而穷人们住的养老院由于不断增加的“费用压力”却具备了同集中营相似的特点。至于这种压力是由何而来，那是无所谓的事。由国家以及法定保险公司经营的养老院的资金已经统统被取消了，在普遍的“私有化”进程中，在“护理市场上”还活跃着一大批“慈善的企业家们”。在这些企业里，“护理”是为达到利润最大化这个目的，所以就完全按照企业经济的想法去经营，如同生产汽车零件一般。根据企业经济合理性而大力推行的“降低费用”措施便导致了与公共保险机构的“节省模式”同样的结果。

1997年，德国老人救助管理委员会警告说，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在进一步“削减费用”中，许多养老院必须进一步减少本来已经为数不多的（当然报酬也微薄得可怜的）工作人员，即减少30%。目前，在国家 and 私人养老院里丑闻已经接连不断，无人帮助的老人不得不数小时躺在自己的粪便里，在下午很早时间就被扔到床上捆住，吃的是劣质的食品等等。即使在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一切就绪”的地方，照料的质量也迫不得已地下降了，业余活动也被取消。“吃饱和干净”是基本准则，好像是在对待圈中的牲口。甚至把夫妻拆散护理也似乎成为可行方案，1999年初在纽伦堡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悲剧：

“一个87岁的男人按照比他小3岁的妻子的愿望将其杀死，自己也接着企图自杀但未遂，发生在圣彼得市区的一对夫妇悲剧性的结局震惊了很多人。首先引起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方需要照料，那么年迈的夫妻还能共同生活

吗？或者他们必须分离？经历了50年的婚姻之后，这一对夫妇显然不能接受分离，他们写给生活在瑞士的女儿的诀别信中解释了这一绝望之举……理论上今天丈夫和妻子肯定能在纽伦堡养老院找到一席之地，但是在那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房间……” [Nürnberg Nachrichten (纽伦堡消息报), 1999.3.8]

在老人护理方面人们可以尽情想象，如果在像联邦德国这样一个西方核心国家都噩梦般地如此可怕，那么在世界其他国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况。民主的政治家们只要一张口就谎话连篇，如果他们面临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把自己“塑造”出来的灾难性现实说成是陋习、偶然事件、滥用职权等等。在受这种“财政能力”制约的虚假自然规律的幌子下，他们在所有无利可图的社会领域无动于衷地继续采取削减措施，或者通过“私有化”使这些领域的命运直接受企业经济节省时间的逻辑和降低费用的政策的支配。

在资本主义持续推进的非人道主义化过程中，规模巨大的民主古拉格劳改营在20世纪末已轮廓分明。这个古拉格劳改营分成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看管和关押所，越来越多过剩的、犯罪的、或者没用的人消失在这里边，并且它本身膨胀成为一个巨大的成本因素：监狱、拘留所、劳改所、各种各样的老人和病人之“家”、穷人诊所、精神病院等等。第二个是中间最大的部门，由大批失业者以及被社会抛弃的人组成。他们被民主的贫困管理机构 and 危机管理机构以官僚主义的手段驱赶得“疲于奔命”并受尽刁难、羞辱，而且越来越被置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境地。在民主古拉格的三联组合体中，第三个部门的一部分成员是甚至统计中漏掉的无家可归者、街头流浪儿童、移民、申请避难者以及其他非法居留者，他们在社会的边缘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们根本

得不到持久连贯的管理，而只是警察并且有时甚至是军队（或在有些国家是私人敢死队）偶尔追踪的目标。

公众的生活、种种讨论、臆想中社会的“正常状态”、民众社会的公民观以及“市场经济和民主”在官方看来的理所当然都未曾重视不断蔓延扩大的古拉格劳改营和它的三个部门，而根本上只是关注“正规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这些正不断缩减的剩余部分。古拉格劳改营和它的三个部门被排斥，被掩饰，同时被严格地用强行手段加以控制。只要民主古拉格的现实进入视野，在官方的意识里它当然就不再是它本来的样子。正因为资本主义和它的市场经济被空前狂热地宣称为自然条件，所以马尔萨斯反而重新备受敬重。对此毫无出路的绝望境地做出解释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又是：“人太多了”——这个“论据”引出了所有的相关结论。官方的经济意识表达看法当然更加委婉一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经济的增长”[Handelsblatt (商报), 1999年4月8日]。马尔萨斯主义从未从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消失。在1968年，此时福特主义经济繁荣还没有完全结束，原先是昆虫学家的美国“人口学家”保罗·埃利希就已写道：

“癌症是细胞的无限增生，人口爆炸是人口的无限增加……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并且尝试除掉肿瘤，而不是治疗病症。这个手术显然要求做出一系列残酷无情的决定，并且会引起巨大痛苦。但是这种疾病已经发展到如此的地步，病人只有用这一彻底的治疗方法才有生存的机会。”(Ehrlich, 1971/1968, 第131及下页)

如果寡头政治国家的头目们把社会比做人的身体的话，那么自从梅嫩斯·阿格里帕 (Menenius Agrippa) (古罗马元老院

的元老——译者注)出现以来对此做法就需要谨慎对待。这里真正需要拯救的“有生之物”很显然就是资本主义——那些无用的大众就是这个病人的“癌细胞”。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根本上只是,使这个地球上的人数通过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来与它的再生产能力匹配——或许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人口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数量。“船已满员”早已成为在许多情况下的一种文雅的流行说法。在《经济图书馆》系列丛书中(提出的口号是:“失业,财政危机,贫富差别,环境破坏——谁想找到解决办法,必须了解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德国社会自由主义的周报《时代周报》善意地收入了对马尔萨斯的介绍: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马尔萨斯的论点仍有现实意义。为了从人口过剩的陷阱中找到一条出路,在这些国家中还在进行着拼死的努力……马尔萨斯关于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人口过剩只有站立的位置的不祥预言至今也没有从地平线上消失……即使是工业国家最终也没有逃出口口的陷阱,他们的富裕程度和社会稳定如今也将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浪潮间接地受到威胁。”(Nesshövr, 1999)

令人窒息的是,人们在这里用何等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仅只是重复着杀气腾腾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论据(“人口陷阱”),而且嘲讽着每个逻辑。如今的生产力也不难满足生活在今天的大量人口再生产的需要,这一点干脆就不再加以考虑了。在西方工业国家里,长期以来人口数量下降,一些保守的思想家们已经宣称那些民族会“灭绝”,但根据以上说法来自地球南部的“移民浪潮”会使马尔萨斯的论点也适用于西方的工业国家——这真是无耻透顶。即使是个孩子也能看出这一论证显而易见的谬误:把在资本

主义中心国家劳动力被从经济中“解放”出来的强劲过程、大批人陷入贫困的境遇和民主社会的危机管理部门的卑鄙无耻这些现状的原因都冷酷无情地归咎于来自边缘国家的贫困移民，然后反正也是用最残忍的警察国家的手段将他们遣返回去。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没有一个至少是发自知识分子的愤怒呼声给予回答，那么，这就标志着在关于“美好社会”的讨论中——在危机到来时已从来都是野蛮行为的中心地带——连逻辑思维所必需的最基础的规则都已经被弃置不用了。

在全球民主古拉格劳改营的黑暗地区，大批人早已经无声无息地开始死亡。当今的一种意识中，除了直接谋杀和由媒体鼓吹的、而且大家都熟知的边缘国家独裁者所犯下的罪行之外，久病不起这类现象均被看做事故或自然死亡，对这方面的一些偶有记载的零星事件也视而不见。例如有文记叙，在1997年1月末，西伯利亚的索斯诺波斯克地区一个患有慢性病的数学老师瓦莲京娜·帕夫洛娃（Valentina Pawlowa）去世了，因为她在工资停发7个月后再没有能力购买她所需要的药品，终年34岁。几乎没有人将此事件与“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残忍性联系在一起。药物是存在的，也许由于缺乏购买需求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当作垃圾清除掉。因为在西伯利亚地区这种事件还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它就像一个水泡一样还浮到资本主义新闻浪潮的水面上——而在巴西这样一类的事件根本不被记载下来。1998年，德国联邦医师公会主席卡斯滕·菲尔马（Karsten Vilmar）为了玩世不恭的议会游说团体的利益创造了“社会可接受的早逝”这个词，他却正好说到点子上。所谓的垂死病人，即所有最无用的食客，人们总是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去帮助他们早日离开人世：

“在荷兰，一年中有2700名重病人按照本人的愿望被夺去生命。在英国有一个电脑在计算，人为地延长垂死的人的

生命是否值得。在联邦德国，医生、律师、伦理学家正在争论，人们是否能够不给昏迷不醒的病人提供食物。” [Die Zeit (时代周报), 39/1996]

这种灭绝人性的讨论只能从表面上以“缩短痛苦时间”这种对人友善的论据来使自己合法化，它时常透露出从费用角度出发的考虑。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疼痛是可以消除的，比如说通过高浓度的鸦片制剂。荒谬的是它在医疗中被禁用不仅出于资金原因，而且还因为它使人“上瘾”。而对于垂死的病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还能够获得最后一次享受并同时从疼痛中解脱出来，但这反映出一种基督教新教的荒唐臆想，仿佛这些人还会为资本主义做出某些“成就”，而这些“成就”却会受到鸦片的威胁。再就是悲壮地自愿要求成本低廉的安乐死而谢世。更直接和一目了然的是在降低老人护理成本政策中体现出的灭绝人性的方针。甚至在联邦德国也已经开始“疯狂地取消必要的福利”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9/1999]，并造成死亡，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受欢迎的做法或许是“缺水而渴死”，因为无助的老人自己不再能够喝到足够的水。汉堡的一个调查表明，在联邦德国老人因为得不到关心而成批地死去，医疗保险公司则完全故意地拒绝给他们提供医疗资助：

“埃朋多夫大学医院法医学院的院长克劳斯·皮舍尔 (Klaus Püschel) 在调查报告中说，在这个汉萨同盟城市，11.2%的死亡者是由于卧床时间太长了而长了褥疮。每年有400个汉堡人死于所谓的褥疮——一种疼痛难忍的脓肿，是由于护理不当造成的……”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9/1999]

据推测，联邦德国共有 75 万“护理牺牲品”。为了削减预算，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公司拒绝承担轮椅和特殊床垫的费用，即使有的人会因此烂掉双腿也于他们无关紧要。余下的就是统计数字。根据 1997 年在英国发表的一篇名为“健康的悬殊”的报告，下层社会人的寿命逐渐在降低，男性穷人和男性富人的寿命已经相差 5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调查（1994）表明，东欧地区的死亡率自民主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开始以来已经“同战争期间的死亡率一样高”。在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下降到 58.3 岁，在 1989 年还是 64.2 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1997 年不得不公开宣布，每年有 700 万儿童在未满 5 天便死于营养缺乏症。难怪美国不喜欢这个组织并且尽力想甩掉它。当然，如果不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扣留了他们急需的救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儿童夭折。由于高效的货币经济的“资源分配”原则的功劳，数百万成为牺牲品的儿童从未得到哪怕是最简单的、而且轻而易举便可生产出来的药品。大家都对这个令人极度悲痛的事实成桶地流下鳄鱼的眼泪。而高收入者的夫人们就有了一个令人欢迎的理由来进行慈善的、但也是毫无结果的活动。不过却没有人说，这里发生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和用民主方式长年对儿童进行的大屠杀。

### 服务业社会的海市蜃楼

资本主义的领导精英们当然知道或预感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到达高峰的极限。如果不是不久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新一轮增长和就业上升的势头，就会发生 19 世纪初在一个低得多的发展阶段曾面临的情况：顽固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处在连续不断的内战和戒备森严的状态并由于恐怖和疯狂而四分五裂。



宽容为零的讨论是精英们不断增加的恐惧心理的标志：局势可能完全失控。因为清楚的是，仅靠军队的武力、新的监狱和劳改所不可能强压出额外的资本积累，所以，尽管关于经济希望何在的讨论在此期间已如此有气无力，但仍必须继续拖延下去。

在这期间，人们到处传说工业经济奇迹永远地消逝了，几乎没有人愿意谈论曾是工业增长的一个典范的“长期浪潮”理论。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的论点，经济学家和企业顾问今天也普遍达成了共识：将永远不会再有“充分就业”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它危机过程中仍然“可以被控制”的话，那么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就业”找到一个新的增长领域，这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业领域中不可抑制地持续恶化的就业状况得到一部分缓解。在这个困境中一个新的定理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主宰社会经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其他前途不允许出现）：提出“后工业的服务业社会”的说法。

成为“后工业的”当然不是全部的社会再生产，而是期待中（或是臆造出来的）新的、属于资本主义嫡亲的“就业”领域。当农业生产，且首当其冲是工业生产在高度合理化、自动化并因此而“人员稀少”地生产所有的物质产品时，从这第一和第二产业领域“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应该逐渐转移到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中从业。这种议论也已经是老生常谈，它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福特主义的“再度辉煌”阶段。富拉斯蒂埃不仅是即将来临的业余时间社会的先知，而且还是初见端倪的服务业社会的预言家。他在一个接一个的观点上表现出天真幼稚的乐观：

“工厂开始空无一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转移到第三产业，与此同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职业内部产生了深刻变化，职业素质也惊人地得到同步提高……从一般情况来看都

是向素质要求更高的职业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平均水平来看第三产业的职业比第二和第一产业的职业要求更多的专业知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职业领域的工作都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合乎科学’……”（Fourastié, 1965, 第 80 及以下数页）

富拉斯蒂埃认为，如果业余时间和职业素质同时普遍得到提高的话，人们当然也变得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他看到了一个从事“智力性和艺术性活动”（出处同上，第 94 及下页）的巨大社会领域正在出现，这又将使建设新的休闲工业和在此基础之上拓宽“就业”的领域成为可能。而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以他在 1973 年首次发表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调查而终于成为这次转型辩论的经典学者。他在一篇简短而平庸地与马克思观点论争的文章中断然排除了资本主义今后会出现大危机的可能性之后，只看到了一个相当美好的服务业未来：

“后工业社会……建立在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游戏。服务行业需要的体力或能量比信息要少。最重要的人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样的人基于所受过的全部教育具备越来越必需的能力。如果工业社会的生活水平按照产品的数量来加以衡量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生活质量将按照服务业和舒适性的程度来衡量——健康和教育，休养和艺术——这些对每一个人来说看起来是值得追求和可以实现的……旅行、娱乐和体育将蓬勃发展，因为随着视野的扩大人们也显示出新的需求和爱好，然后一种新意识就凝聚而成。每个人对社会所预示出的未来美好生活抱有的期望把健康和教育这两个在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移到了备受重视的中心位置。随着消灭疾病、人寿的延长和进一步延长

寿命的不懈努力，保健事业会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领域。同时，随着进入到后工业阶段，对技术和专业能力的要求也在提高，一个综合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中向上发展的前提。这会使我们经历一个新的、主要由教师组成的知识界的崛起。对更多服务行业的要求、一个尊重人类的环境和一个更完善的保健服务业和教育事业——这些都是市场尚不能充分满足的要求——最终会导致扩建公共设施，首先是在必须满足这些需求的各联邦州和乡镇。后工业社会也因此而是‘地区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乡镇组成了最基层的社会单位更为恰当……”（Bell, 1985/1973, 第134及以下数页）。

这一切在1999年读起来就好像是纯粹的嘲弄。富拉斯蒂埃和贝尔眼中所看到的当然是福特主义繁荣时期的结构，他们把这些结构直接推演到未来——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驯化出来的学术思想所犯的一个典型失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如果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的话，承担“第三产业化”进程的福特主义的工业基础设施本来是能够越来越朝着文化企业、健康服务的方向不断扩展的。自动化过程和通过合理化裁减工业劳动力的过程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阶段本来在此后可以带来一个有着业余大学和受教育场所、社会福利工作者和教师、医生和为广大享清福的解聘人员提供“舒适性”的各种机构的世界。

贝尔的观察是错误的，因为他和富拉斯蒂埃一样只是从社会学角度肤浅地来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化，并且把构成基础的经济关系盲目地作为前提，而不是着眼于它的危机潜能来批判地分析这种经济关系。他所认为的服务业社会逐渐代替工业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工业繁荣暂时产生的副作用。如福特主义的工业繁荣不复存在，这种副作用也会消失。那个看似呈不

可阻挡的上升趋势的休闲、教育和保健世界没有启动自己新的、并超越工业繁荣的资本积累，而是只要工业繁荣还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就在经济上依赖它。这在很多方面都得以验证。

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推进的“第三产业化”实际上集中在健康、教育和福利事业上，但正是在这些领域内广泛存在的是国家或半国家的机构。对贝尔来说，“市场的不足之处”和连续不断推行“赤字财政”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仍是如此地理所当然，以至于在他看来，第三产业的未来是由扩大范围的和各种各样的“公众设施”构成的，它将为超越福特主张的消费个人主义而建设一个“地区性社会”提供实际保障。在“财政能力”（Bell，出处同上，第158页）这个问题上，他曾用不长的文章篇幅论述了“转变的界限”，思想贫乏而且肤浅。他甚至还进一步把已经掀起的、几年之内就会将凯恩斯主义置于死地的通货膨胀浪潮“归咎于约翰逊总统的骗局”（出处同上，第160页）；几乎像后来的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一样，他相信能够用这样的评价来了结制度问题：这类问题发展成“阶级问题”是“几乎不可能的”（出处同上，第169页）。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相矛盾依然被全面冷处理，“美妙机器”为所有包括在其之内的社会范畴提供的共同参照体系仍旧完全被淡化。在贝尔采用的“后工业”概念中显示出了各类社会科学的学究们奇特地相互隔绝的分工状态：当社会学家们在对经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分析社会结构时，他们对社会结构的经济制约条件始终一窍不通，而经济学家们则以数学模型计算的方法让危机消失——直到危机的现实使这两种错误的乐观主义彻底落空。

随着凯恩斯主义调控方案的告终，一个“地区性”服务业社会的美梦也结束了。福特模式的消费个人主义根本没有退隐到教育经济和保健经济的“公益行业”后面，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到另一个极端，发展成为在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自我毁灭

性供给竞争；而随着“国家财政危机”越发严重的趋势，凯恩斯主义的公益服务行业反而被逐步系统地削减了。由于削减的结果越来越取决于私人支付能力的大小，健康和领域从未有能力接纳正在瓦解的工业部门裁减下来的“就业人员”。但荒谬的是，贝尔采用的服务业社会的“经典”概念本已脱离其深层次上的凯恩斯主义背景，却在后凯恩斯主义对社会经济前景的讨论中被极力地保留了下来。现在，承担真正的“后工业”社会资本积累义务的行业突然变成了另外的一些商业性服务部门。但是，正是在诸如贸易和银行这样商业性服务业的中心领域也像工业领域那样开始实行微电子合理化，而其余剩下的国家与地方部门也没有幸免于降低成本政策所做出的选择，就像最近一些以联邦德国为例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

“根据专家们的看法，在下一个十年当中联邦德国的服务行业将丧失 670 万工作岗位。维尔茨堡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经过数月的研究工作之后看到这样‘恐怖的一幕’。经济信息学教授赖讷·托默（Rainer Thome）在德新社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后，我们自己也大吃一惊。’托默教研室的科研工作人员鲍里斯·克劳斯（Boris Kraus）得出的这些研究结果最初是在一次专业研讨课上提出的。克劳斯说：‘普遍抱有的希望，即服务行业将解决当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是错误的。’他认为下一个十年就业前景‘暗淡’的原因在于现代信息处理必然造成的后果。到目前为止，由于许多服务性工作改用电脑进行而削减的工作岗位还很少，但由于成本压力，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市场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托默和克劳斯在他们的调查中考察了服务行业中将近 2200 万中 3/4 的工作岗位。在商业中，被调查的 340 万工作岗位中的一半将被自动

收款机、电子支付可能性和网上购物所代替。公共管理机构中通过办公室自动化将节省260万个工作岗位。按克劳斯的看法，影响最大的是银行业，80%的银行业务是不用咨询的重复过程，这些业务完全可以自动化，这在将来将使77.2万个岗位中的61%不复存在。克劳斯说：“受威胁的是那些处理一般事务的普通工作人员的岗位，他们的工作只是把信息收集汇总在一起。”科学家们自己也承认至今尚未找到解决办法……” [Deutsche Presse - Agentur (德新社), 1997.6.11]

实际上，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仅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已经裁减了20%的员工，而这还远未结束。在此期间这个发展动态还涉及金融和保险业的其他领域。德国大众银行和莱福爱森银行联邦联合会指出，到2008年时目前17000家分行中的7000家将关闭。[Handelsblatt (商报), 1999年5月27日] 而且在“在无人售货的商店里购物”已经渡过了它的试验阶段：

“在日本，零售业目前已在几个行业试验了完全自动化的商店，在这样的商店里没有工作人员……商店分成四个部门，一个部门展示商品，第二个部门订货，第三个部门结账，第四个部门发货……另外一个类似的项目不久前在录像带出租行业也开始进行。这种系统的工作方式就像银行使用的自动取款机一样……关键部分……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它同个叉式装卸机一样工作……”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法兰克福汇报), 1997.3.19]

这也同样适合于第三产业的其他领域亦如此，如旅游业、餐

饮业、影视业等等，另一方面也适合于所谓的“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服务业，如税务顾问和审计人员、企业顾问、建筑师、技术规划人员、机动车和飞机出租者、运输公司和后勤人员、电子数据处理服务人员、广告公司、“垃圾废料加工处理经济”部门等等。一方面，在这些领域里也存在微电子技术替代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潜力：“原则上大部分面向人的服务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再生产和合理化”（Bender/Graßl, 1997）。另外一方面，服务行业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及全社会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的降低也随之萎缩。所以，世界经济危机已表明，大规模蔓延的贫困化怎样摧毁了餐饮业和酿酒业，原因是需求在急剧下降。饭店业主们总不能自己相互斟酒吧。旅游业也涉及“第二产业的商品生产”，它一直依赖于工业领域的大众购买力。而这一领域尽管大规模失业的幅度不断增加却还没有垮台，其原因只是因为许多人宁愿放弃其他的东西，或者不再用固定的收入来支付他们的下次度假，而是动用他们的积蓄。但这种消费仅靠动用储蓄并不能长久维持。不仅在需求方面，而且也在合理化方面，旅游业中（最后的繁荣领域之一）出现的裂痕也已经清晰可见：

“寻找优惠报价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过去几年中，旅游部门虽然大部分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危害，但是已经发生了变化。旅行社经理英格里德·齐格勒（Ingrid Ziegler）说‘人们现在在度假上也开始节省。’在旅游业，未来的就业机会也将越来越糟糕。比如说哈帕格-劳埃德公司现在几乎不收培训的学员——虽然最出类拔萃者还能设法搞到一个职位……技术发展在过去几年中彻底改变了开办企业和旅行社将近5.5万名职工的工作……今天，互联网用户可以在网上自己预订火车票和飞机票。5年后，人们将在家里的电脑上不仅可以购买所有的车票，而且可以购买许多全程旅游项

目……这种发展的后果对于企业来说还不可预见。”  
(Hoffmeyer, 1997)

可称直接依赖工业领域的当然是那些与“企业联系紧密的服务业”，它们在过去几年的扩张中大部分根本没有扩充新的就业领域，而实际上是原来企业内部一些部门的分流（“Outsourcing”），如车队、数据处理部门等等。同时，就是这种变动也产生了合理化效应，这种现象甚至还被有些人自豪地加以强调，致使这类同企业关系密切的服务性企业的扩张从一开始就与全社会工作岗位的削减有更多的联系，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劳动社会成功的“后工业”转轨相关。

总之，可以明确地说，第三产业不可能开辟一个“后工业”的资本积累新纪元，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收容所。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期，服务业中几乎所有领域同样会像工业领域本身那样通过合理化减少“就业”。微电子革命的间接后果在服务性行业中比在工业企业中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因为这里不仅个别的企业被竞争击垮，而且整个行业作为次要的商品生产部门（或者作为依赖于国家的行业）由于工业领域中的大规模失业也被切断了需求。危机的连锁反应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完全在服务性行业中显示出来，但即使如此，在这方面也为期不远了。

像富拉斯蒂埃和贝尔这样一些理论学家的重大思想错误究竟出在哪里呢？他们把所谓从“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的变革与工业化本身的巨大变革相对比，试图以此解释社会结构的历史发展。他们提出的论据是，如同以前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阶段性过渡那样，一个类似的、向服务性社会的全面过渡将要来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物质再生产的整个领域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人类的劳动变得多余，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许多在工



业生产过程中不再被需要的人可以在医疗卫生部门和教育领域从事工作，或者在旅游、艺术展览、体育活动等等计划组织部门中工作，那么这种走向将的确非常有意义。但是，企业经济的逻辑在这方面也一样使一个健康人理智的设想落空。

错误地希望资本主义的“就业”机会能够从工业领域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想法与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获得无限增加的业余时间的想法是以同一个谬论为基础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的”、技术—物质的潜能都被考虑进去，却没有顾及（作为当然前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业社会”这些概念显然完全缺乏经济角度的考虑。它们只是指明了再生产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各种主要和具体的形式。如果我们仅仅得知，人类应该首先从事的是农业生产，然后是工业生产，现在轮到的是服务性行业，那么这些对真正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则完全是空洞的言辞。

这个错误的“自然主义”完全忽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历史性的过渡是在再生产普遍形式中并同时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产生的一个根本性的裂变：它涉及的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转轨，而是现代的“美妙机器”本身的产生过程。大部分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到那时为止只处于边缘地位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所取代，普遍的地方经济被大范围的匿名市场所取代，替代小农经济的自我管理和封建统治的基本因素的是现代国家。如果认为向服务业社会的转轨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并且完全没有类似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那种根本的裂变，那实在是很幼稚可笑的想法。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意义上的服务业资本主义社会将不会出现。

然而，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却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在此期间做出了一个绝望的和厚颜无耻的最后选择：如果通过举办业余活动和教育培训的企业、从事健康服务和艺术活动的公

司等等还不能使“就业”情况普遍好转的话，那么，那些个体化了的“拥有他们自己劳动力的企业主”应该百万倍地对这个不幸的服务业世界还能提供的东西感到满足：他们作为高收入者的奴仆将不得不为几个铜板和一顿热饭而受雇。对那个荒谬争论做出的一个恶作剧般的讽刺是，丹尼尔·贝尔原来的历史性论据完全被颠倒了。贝尔为了更好地说明他的“后工业社会”方案的意义，把它的假定特征与那些早期形成的特征相对比，并且总结出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以下特征：

“在低生产率和高人口数字的基础上，有许多人处在就业不足的境况之中，他们一般都试图在农业中寻找工作位置和从事家庭服务方面的工作。所以服务性职业，尤其是以私人形式从事家庭服务的职业占的比例很高。因为这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为了维持生存，因此雇用佣人很廉价，而且求职的人也多……例如在英国，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仆人一直是社会上数量遥遥领先的职业群体。即使像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波（Becky Sharp）和罗登·克劳莱上尉（Captain Rawdon Crawley）那样的穷光蛋也使用仆人……”（Bell，出处同上，第133页）

贝尔于26年前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争论居然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以至于它在十分严肃地鼓吹返回到18和19世纪的社会状况中去。有关为了学外语而在异国的一个家庭里当小保姆的许多报道提供了在联邦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当佣人的初步印象：

“立陶宛人达奴塔（Danuta）被用一份私人起草的学外语小保姆的合同送到了这个国家。她应该照料两个孩子原

来是两条狗。达奴塔在一年时间里的任务是遛狗……晚上或周末她不许外出，因为……主人夫妇用餐时把……达奴塔当作佣人和厨师……俄罗斯人伊拉（Ira）住在奥芬巴赫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必须在孩子房间里给孩子换尿布的五斗橱和衣柜之间睡觉，私人空间是没有的……立陶宛人盖德劳（Gedra）在法兰克福附近克罗恩堡的一个家庭工作。因为主妇发现这个年青姑娘吃得太多，于是她吃饭被限量。一个邻居发现这个女孩越来越瘦，就设法给她些食品……三个来自东欧的女孩，玛莎（Mascha）、维卡（Vika）和阿拉（Ala）先后在莱茵-美因地区的一个家庭工作，她们都说，在她们房间里脱衣时经常听到咔嚓声。经过证实，这个声响出自男主人安装的遥控照相机……” [Süddeutsche Zeitung (南德意志报), 1999.11.5]

人们可以想象，如果资本主义的“劳动管理”有朝一日成功地剥夺“过剩者”的一切社会权利，并将他们置于一个领取微薄收入的奴仆的境地，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些旧时的资产阶级权势者还在怀疑和观望，是否一定会出现一种愤怒的反应。但是他们在意识中越来越明显地觉察到后现代的新动态：

“比如说不久前在纽约：天气糟糕，鞋子肮脏，一个擦鞋工随时准备给人擦鞋。他态度友好，使脏鞋迅速变成了穿鞋人可以展示自己的招牌，并且没有因为自己公然在大街上躬背弯腰而表现出丝毫的尴尬，被疑虑折磨着的倒是顾客。这应该吗？偏偏让一个有色人种的成员来擦鞋？服务还包含着它的对立面：让人服务。这也需要学习……家庭妇女们也明显感到很为难。她们没有经过与职工打交道的艺术训练，她们认为，必须通过和她们的清洁女工一起喝咖啡来证明，

自己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优越感。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不承认有穷人和富人，有愚者和智者，有被歧视者和享受特权者？……”（Sommerhoff, 1997）

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承认，这么愚昧无知理应挨打？这就是想象中的世界面貌：一个高收入者的特权阶层，在戒备森严、重重防守的豪华住宅区被保护了起来；到处是全副武装、毫不宽容的警察在巡逻；“过剩的”人一部分被送进监狱或劳改营，一部分作为顺从的奴仆为他人服务。民主的最后阶段看来就是这副模样，这一切只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的生产力纳入它的形式。

但是，正因为这样，整个有关服务行业的讨论连同它恶性的衰退形式都被证明完全是幻想。再说，高收入的暴发户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以至于能够把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和被淘汰者变成为他们服务的“职工”。相反，那些一心想当奴隶主的人自己也不过是经济上“在休假的死人”，原则上他们也得多主动适应马上轮到自己亲手擦鞋和使用抹布的时光。在美国已经做出示范的现象如今在欧洲也迅速传播开来——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下降：

“所有至今同社会边缘阶层的代表们有联系的人都觉察到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人以前是中产阶级的成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接到了警报。如今受害的中产阶级——乐意工作的职员，勤奋敬业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收入丰厚的专业工人——几十年来构成了德国战后社会的支柱……社会学家注意到在中产阶级中由于社会地位下降而不断增加的恐慌。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说，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贫困的风险’今天已经大举迈进中等收入阶层……”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40/1997]

## 博彩资本主义：货币即将失业

面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形势和能赢利的“就业”领域在持续减少的局面当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积累到底还能靠什么来源支撑下去？因为失业者队伍越大和人类贫困化的范围越广，资本看上去似乎走势就越好。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虚假的正常状态，它正处在社会衰落过程中，却给人以资本主义依然强大的假象，而这种强势早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光彩夺目的表面现象一部分可以从所有社会反抗运动的消失中得到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或者在国有资本主义/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运动以各种模式终止之后和一个对制度进行彻底批判的思想还未出现之前的这段“间冰期”中，史无前例的矛盾和现状在社会上仍旧保持着“沉默”。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只剩下一个“经济走势正确”的荒谬的虚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全都是市场经济的优等生们在吟诵他们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他们让那俗不可耐的经理们公开各显其能一争高下，像千篇一律的花边新闻一样，广为传播和津津有味阅读着一个个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

当大众的贫困化不断扩大并针对被淘汰者的暴政不断加剧时，我们同时也等待着一个无所不在而又无聊乏味的新的“德国经济繁荣年代”的出现。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正确的；当然完全不像官方所宣称的那样，是富有见地的“首次创建自己企业的人”带来“创造工作岗位”的奇效。除了为对社会毫无想法的电脑摆弄者们带有一定后现代格调的活动（软件、互联网设计等）或许开辟了一些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无足轻重的微小领地之外，这方面所涉及的完全是一系列稀奇古怪的行当。德国《经济周刊》在“熊彼特”栏目中所列举的对在中国举办的露天音乐会进行远程管理到为有钱人筹办豪华婚礼

的这些新创业者是对人们所期望的服务业资本主义的真实讽刺。但是，这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德国经济繁荣年代”，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危机资本主义暂时从表面上粉饰太平，——也就是以一个新版“大骗局”的模样出现。

如同在巨大的“经济繁荣的崩溃”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黑色星期五”之前的时期一样，自从80年代初以来，为了掩盖真正的资本积累（企业经济合算地使用劳动力资源）的内部障碍而首先提出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了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无形积累”阶段。如果说金融市场与1929年以前的实际经济资本积累脱钩的规模和作用范围都远远地超过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类似的过程，那么新的后现代的“博彩资本主义”则越出了所有界线，并在量和质上都达到了全新的规模。这样的说法才是符合逻辑的，因为金融资本主义创造的“虚构资本”的规模大小（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的是崩溃）像倒影一样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状况达到的资本化程度形成正比。

德国经济繁荣年代的投机泡沫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资金的流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在很多方面相对地受到限制。20世纪20年代投机的兴旺局面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完全坍塌了，而这种投机盛况实属已经以资本主义的高度社会化作为前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潜伏期。因此，虽然由世界市场编织而成的实际经济网络甚至萎缩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虚构”看起来倒似乎成了暂时尚未到来的福特主义繁荣的替代品，它比60年前具有更大的规模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世纪末期的“博彩资本主义”最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构化”不仅发生在一个包罗万象并在经济上普遍同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而且它还必须模拟经过福特主义的推波助澜已成倍扩大的资本的进一步积累。

这种新的性质首先从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特点中体现出来。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新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第一次波及到全部的边缘国家，它绝不像 1929 年以后那样只是金融资本主义崩溃的后果（1873 年之后在严格限制的尺度内），而是事先就已经形成，并与以融资为名目的“虚构化”的积累这种虚假繁荣平行发展。换句话说：生产的潜力和“市场规律”之间的剪刀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方面，资本主义形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了大规模的全球性贫困化；另一方面，生产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得到了提高。其结果是实际经济相应地形成了巨大的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破产浪潮此起彼伏；追加的实际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比起已经积累的货币资本数量陡然下降，因为根据资本主义的标准反正已经制造了过多的生产能力。为了使整个世界体系不至于崩溃，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构化”与前两次的投机泡沫相比必须调动运作一个不可比拟的更大数量的“虚构资本”——与生产率通过微电子技术得到更快速提高的幅度相仿。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和大规模贫困，表明“虚构资本”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规模在膨胀，为的是能够模拟持续向前发展的积累过程。

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起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资本”和“劳动”至今隐匿的内在一致性。从制度内部的角度和简约化的社会学观察方法来看，进入视野的总是那些社会范畴之外的利益冲突，而不是利用过程的形式和主体在经济上的同一性。只要（受过驯化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在制度继续发展的前提下具有跨越历史的特点，并且在意识形态上把抽象的“劳动”确定为人类“自然的”和超历史的条件，这也许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劳动”可以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并从此能够独自继续运行；这就是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追补现代化的国有资本主义制度当时的基本幻想。现在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到达历

史的边界之时，同时也是制度内部的利益斗争已经瘫痪之时，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模拟过程让人看到的好像突然都是相反的情景，似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地继续积累，实际上这几乎是一个更渺茫的幻想。

随着大批“过剩”者的产生，货币也即将“失业”并因此而“非实质化”。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20世纪的战争经济和战后时期的“经济奇迹”（至少在它的延续和强化过程中）已是如此，它们当时只有通过不断扩大的信贷筹资才有可能产生——也就是通过一个不断向前推移地“提前进入未来”的资金融通方式，提前使用未来“价值创造”的产出和未来的收入。从这里反映出资本主义本身那个双重的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升级的、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即首先是必须自身即目的地以货币形式不断地积累抽象的“劳动数额”，而同时使“劳动”逐步变为过剩；其次是随着不断增强的社会化程度，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出越来越高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属于“非生产性的”业务开支或“间接费用”，从发展趋势来看，它们有超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危险并无法从日常收入中得到补充。

构成矛盾的这两方面因素表明，生产力和社会化程度都越来越少地拘泥于货币的形式；这两者因此在当时就必然从某一发展程度开始作为货币的危机显示出来。只要滚雪球式的工业体系还没有衰竭，通货紧缩造成工业发展的“滞后”和结构断层就使第一种自相矛盾暴露了出来，而第二种自相矛盾首先以战争经济和国家经济中通货膨胀危机的特点表现出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两种情况下使激化矛盾的动力停止下来，现在人类劳动力的替代方式终于蓬勃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工业产品的确只要采用医学中顺势疗法的相仿剂量来体现“劳动”，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上它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产品在资本主义概念中不“算作”是消费品的数量，而被看



做是抽象“劳动”数额的代表（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些“劳动”数额必须持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利用过程以自身为目的的体现。生产中依旧像从前那样使用大批的劳动力也无济于事，即使数量上远远超过 1873 年和 1929 年。因为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劳动和金钱数量的积累，必须始终从已经达到的水平出发继续进行，而现在这个过程却不能再重复这样的方式了，因为微电子革命不断把更多的抽象“劳动”通过合理化裁减掉，而大规模的生产却吸收不了那么多裁减下来的数量。产品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像以往一样制造大量的，甚至（在物质层面上）数量增长的产品于事无补，因为，由于每一种产品的价值通过合理化和自动化降低的幅度超过了销路好的产品的生产规模能够扩大的幅度，所以产品生产数量的提高不能实现真正的资本积累。要想确实还能够体现真正价值量的增长，如今生产就必须以一种人力无法达到的巨大规模来提高；且不谈（作为这同一过程另一端的）需求和购买力都不可能再以同样的规模被调动起来。

同时，基础设施的总体增长得如此神速，以至于它即使在一个确实业已扩大了、但就其本身来看已成为泡影的实际价值创造过程中也不再体现为派生出来的价值数值，也就是可实实在在地“融通来的资金”。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的继续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已不再仅仅是暂时地作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构形态出现，而是完全只有作为金融的模拟过程才有可能。福特主义的经济繁荣之所以能超出它本来的极限而得以延续，首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赤字财政”是由这种模拟来支撑的。当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方案在新的通货膨胀危机中失败时，这些坐骑在 80 年代初“继续在云霄中驰骋”的行程中就不得不更换了——金融的模拟现在不再能以国家作为中介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接受贷款预先占有未来“劳动”和未来收入的私人形式处于越发显著的地位。在这个过渡阶段的交接时期，拉尔夫·达伦多

夫在一篇文章中用一种对“仿佛型经济”实为无可奈何的推理发泄了他的不快：

“勤奋、节俭、放弃消费、纪律——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人们熟悉的词语……人们不能花费不拥有的财物。不勤奋就没有收获。是谁说出了这些流传于世的至理名言？况且，当时还是个战后时期经济奇迹的世界，甚至在技术—经济意义上也是如此，生产率总是比实际工资增长得快。经济增长了，因为人们为此投入的劳动和资本总是比他们为此得到的工资和利润领先几步。那是相当大的步伐，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高度的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这也许是衰败的开始，因为在60年代消费的欲望赶上了生产的可能性。分期付款是最早到处可见的先兆……围绕着这一新的消费方式产生了许多机构，不仅有分期付款银行，而且所有银行和储蓄所也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新情况……向未来开具的一张张汇票已经变成一个联营业务：如果人们不能为建筑储蓄契约提供担保的话，那么就签订一份人寿保险合同，这份保险又可以从它的方面分保等等。这种对个人来说很合适的做法，对企业和官方来说也花费不多……在近20年中我们的眼前发生了一个相当巨大的变化：我们突然从积蓄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借贷资本主义。长时间以来工作和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即产品和劳务的过剩——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今天的动力是消费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也就是一种享受的过剩。并不是积蓄，而是借贷使经济在运转……难道坚持艰苦工作和勤俭节约依我们之见不是和货币的黄金储备都一样成了错误的吗？……事实上对现代社会增长的原始价值时而有人发出的提醒的确含有一些陈词滥调，也就是有点不得当……难道这些提醒者没有看到，在放贷停止的时刻不仅社

会福利资助结束了，而且整个经济过程也会崩溃？‘经济繁荣’在借贷资本主义中只能意味着更大的款额被借出，更多的物品被预付购买。这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它作为经济形式建立在种种价值的基础上，而今天对这些价值的使用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结局……对借贷资本主义是否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存在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由消费推动的经济是一种仿佛型经济：它不断创造着价值，这些价值的现实性布满了问号……在富裕和破产之间只一步之遥……这种仿佛型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是与未来赌博……只是不能等待，否则一切运行机制都会静止下来。未来即是人们为昨天和前天的享受付出代价的时刻……缺少设计未来的动机，因为未来为人们有可能带来的舒服享受都已经成为过去。未来只不过是负担而已……”（Dahrendorf, 1984）

这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绝不再拥有未来了。达伦多夫当然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人们注意到，在信誓旦旦地反对方兴未艾的、并不可靠的“借贷资本主义”和他所戏称的“仿佛型经济”的时候他如何最喜欢重提实际积累的那些陈旧的基督教新教的价值标准。一年以前，他自己就已信口说出了那个在技术进步和劳动工资之间存在贬值竞争的奇怪论调，它在这里听起来又好像在忧伤地回忆起出现经济奇迹时代，那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实际工资快得多”。不过，这正好不是资本主义的“可靠性”的标准。因为自从达伦多夫于1984年做出推理以来的15年中，劳动生产率借助微电子技术飞速地提高，而在同一时间里，实际工资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幅度陡然下降。根据达伦多夫的论断理当会由此相应地产生出实际投资的兴旺景象，紧接而来的势必是“充分就业”和新的经济奇迹。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也正

因为微电子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最终脱离了市场，萨伊提出的那个古老的“供给”机制不再起作用。

由于结构性大规模失业的压力，“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工资部分迅速下降，这虽然带来了越来越高的利润，但是没有相应地为追加实物资本和“劳动岗位”增添更多的实际再投资，尽管这种幻想（官方恪守的“供给经济学”信条）被所有担负治国重任的党派的政治家们不顾连续失败还一再鹦鹉学舌般地人云亦云，并且被用来为通过供给经济“自下而上”的再分配措施来矫惯资本主义企业的做法作辩护。在日益激烈地争夺逐渐下降的实际购买力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和银行却由于全球的“能量过剩”而在实际经济中获得能赢利的投资可能性越来越少。

如果利润得益于实际工资的下降涌现出来，而且国家此外还私下让康采恩大饱私囊，那么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这是“滚烫的钱”，无论如何不允许就这么闲置着，而是必须根据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的运转方式被继续利用。虽然恰恰在这样一个社会福利两极分化的时代，奢侈消费和大规模贫困平行发展，但高收入者和上层人士也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保时捷跑车、劳力士手表、游艇和其他昂贵的、毫无意义地炫耀自己的东西，以吸收实际不再可投资获利的货币资本。那么把钱用于何处呢？那么现在先要贷出去：贷给国家，贷给企业和私人消费者。如今的这种程度在1873年和1929年的准备阶段都不可能达到，首先是因为当时货币体系的运行速度远比现在缓慢得多，那时还没有电子记账系统和像今天这样的国内和国际联网的金融机构。其次就是那时所有的“经济主体”在接受贷款时都要犹豫和谨慎得多。20世纪的战争经济、凯恩斯主义学说和1950年以后的福特主义的繁荣排除了这方面的障碍。资本积累随着不断加快的速度以一种持续增长的国家、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向前飞驰。

只要这种贷款还能够被宽松地“使用”，因为福特主义的繁荣确实在大范围内真正地调动了劳动力，那么这一切还具有它资本主义的正确性，尽管资本主义滚雪球式体系的格局中以这种方式增添了金融资本主义这一范畴：也就是通过不断借助于未来的经济景气来刺激当前的经济景气。达伦多夫的“借贷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习尚。但随着福特主义繁荣的结束，这方面的剪刀差也就更大了：一方面这种信贷系统被越来越少地“用来”真正调动当今的劳动力，因此实际积累开始衰落；另一方面，信贷系统与此同时越来越膨胀，其原因是大量寻找投资机会的资金受阻塞而滞留，这些资金找不到还能够赢利的再投资机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危机的第一个阶段中（从70年代后50年到大约80年代中期），“借贷资本主义”在质上出现新的发展：预先使用未来创造的价值已经提前把人们分成赢家和输家。换句话说：通过接受贷款而延续的不再是普遍的繁荣，而是危机中的输家为了能够继续参加活跃的“经济生活”而不断高筑债台。

当世界上大批作为赢家的企业用超常的流动速度将资本注入到信贷中时，总是也同样有大批企业作为输家负债累累，但同时依然编制着越来越铤而走险的资产负债表。消费者贷款的出现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提前享受福特主义的繁荣而引起的恶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资本主义核心国（也在部分边缘国家）成为普遍现象，而且还极度膨胀——刚好在一个结构性大规模失业日益严重的时代里。在通货膨胀的影响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革命”的推动下，国家只是不再为国内经济制造货币，于是便开始了那个无止境地裁减福利费用和执行“紧缩计划”的时代。然而在世界市场上成为输家的国家就像成为输家的企业和实际工资下降的雇佣工人一样，通过急剧增加的外债来维持生计。坐在巨额无法用于投资的“滚烫的”流动资金上的国际银行和信贷系统几乎是把贷款强加给那些边缘国家。

这便导致 80 年代普遍出现了“债务危机”，而且直到今天尚未停止。企业由于负债累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密度接连地倒闭或者必须（尤其是大企业）通过债权银行或国家（暂时）的应急和援助计划来挽救——从美国的整个储蓄银行系统到法国的里昂信贷银行，从法兰克福的金属公司到韩国的大宇企业集团。全世界于过去 15 年中积累了几乎无法想象的一大批不良企业贷款；这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必须以越来越快的频次和通过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机构的流动资金作为补贴才能使这颗炸弹推迟爆炸，却不能真正把它清除掉。

消费者贷款的情况亦是如此，美国在这方面称得上世界冠军，它的消费贷款数额于 90 年代可以同累计的国家债务总额拉平。这类贷款中的很大部分就像企业贷款一样成为呆账，并且只能艰难地被账簿拖着走。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类似局面，德国也在劫难逃。如果一方面实际收入下降，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只能从事无保障的低工资和临时性工作，而另一方面至今已习以为常的消费水平则通过连续贷款来保持，这在原则上理所当然是行不通的。即使对继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来说，在一段时间貌似情况正常的潜伏期之后也可以掉进债务陷阱再也无望爬出来。在毫不留情地扣押工资抵债的情况下，收费电视、移动手机、旅游、新汽车等等用投机的方式继续保持的消费正在迎来名符其实的忍饥挨饿时代，因为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留做生活之用了。今天在西方国家，成群的年轻人到处流浪，他们在刚“开始职业生涯”不久就欠下几年或几十年的债务。在越来越有可能坠入失业大军队队伍里的情况下，用消费贷款搭起的纸牌房子弱不禁风，最终大多要坍塌。1998 年，仅仅在联邦德国就有 126 万人由于私人债台过度高筑而受到强制执行的处罚。

基本上同样的机制把边缘国家推入了外债的陷阱。他们像有消费瘾的年轻人一样，为树碑立传的项目和金字塔式的工程，

为军事消费和喂肥腐败的精英幕僚们等花费了贷款之后，同样困坐在债务的陷阱之中。80年代初，墨西哥第一次丧失支付能力，第二次是在1994年末。在这两次情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性的债权人组织都通过庞大的“一揽子援救计划”动用数百亿巨款相助。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此期间甚至是当时还被赞誉的东南亚“四小龙”也成为需要在债务危机中加以照顾的弱国。俄罗斯则完全依赖定期得到的点滴救济金勉强度日。成为输家的边缘国家的外债定时炸弹的定时器正在嘀嗒作响，债务已经高达几万亿美元的最高记录。但对此也像企业和私人消费者负债那样没有列出精确的和公开的名单，看得见的总只是冰山的尖顶。这三种形式的债务归总在一起，估计在此期间已远远超过全球社会生产总值。

无论采取债务转换、转账还是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采用耍花招的办法，普遍的债务危机本来都早就会以过度扩展的国际金融系统的崩溃而终结。在通过债台高筑的方式来提前使用未来创造的价值之后，接踵而来的相对而言便只是一个实际创造价值的涓涓细流。但是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范围的债务危机基座上，真正的投机热潮也已经开始出现在证券市场上。与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相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如同数字不断增大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一样，被费力地遮盖起来的债务危机不是投机的热潮跌落的结果，而早在“崩溃”之前就是一种伴随投机热潮出现的现象——这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货币的“虚构”在质的方面形成新规模的又一标志。全球在所有层面上的债务危机能够先被“隐匿起来”并总是不断地转换名目，其原因是各个时期最大的投机泡沫把债务转移到了证券市场上。这是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危机的第二个阶段。

以前所有的投机泡沫用虚构的和现实经济再也无法追赶上的

价值增长描绘出了一幅迷人的景色，这些泡沫都大约在3~5年之间就破灭了。1873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泡沫破灭了，1929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泡沫也破灭了。大约自1982或1984年直到今天（视国家和股票指数而定），也就是经过15至17年以上的长时间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泡沫却在不断膨胀，看起来好像在1987年没造成任何后果的临时性股票行情暴跌中纹丝不动，并在此以后照样继续发展，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感到困惑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谈论所谓的“新经济”，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新经济时代便不再有效。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思想库的女负责人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直截了当地说：“工业革命面对这个挑战是小事一桩。”[Der Spiegel（明镜周刊），12/1999]

实际上采取的途径是金融市场的脱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以此办法通过一个在内部形成假象的过程来掩盖工业滚雪球式体系这种实际经济的崩溃。一个在1971年8月15日发生并几乎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使虚构货币资本与实际积累史无前例地脱钩成为可能：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不再以每盎司纯金35美元的价格兑换外国货币发行银行的美元储备。由于美元的黄金可兑换性，世界货币体系同一个客观的、“能兑现”的价值实体的最后一道联系才得以落实。当战争经济和战争期间发生的世界危机中金本位制结束之后，只有美元的黄金兑换义务作为表明美国的优势地位的象征被保留下来，然而由于不断频繁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的优势地位在经过整整1/4个世纪之后被削弱了：为了抢在可预见的美元崩溃性贬值之前采取行动，越来越多的货币发行银行将自己的债权兑换成黄金，以至于诺克斯堡黄金库的储备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融化了。1973年，在尼克松采取紧急措施之后两年过去了，固定兑换率的体系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我们不仅要和一个兑换率自由浮动的、不稳定的体系打交道，而且全球金融体系最后的内部保障也连同美元的黄金可兑换



性一起被取消了。

因此，整整10年之后，股票行情能够开始离奇地上扬，其虚构的价值量必须通过（从此连间接地“兑现”都不再有可能的）金钱表示出来。那个摆脱了一切躯壳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灵魂在把它幽灵般的、超凡脱俗的躯体扩展到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地步。“新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预言家诚然轻率地笃信这种价值上升所具有的虚构和模拟的特点，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能够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已告终结”。好似事先有约一样，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上台，通货膨胀率在短短几年内急剧下降，而这一切被作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显出优越性的证明。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13.5%（1980）下降到1.9%（1986年），在联邦德国从6.3%（1981）下降到0.1%（1986），在英国从18%（1980）下降到3.4%（1986）。所有其他工业国家和部分边缘国家也是如此。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内的水平上，只在一些经济出现崩溃局面的地区有时候通货膨胀很严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产生以前那样的超级通货膨胀的压力了。

“火山熄灭了！”“野兽被驯服了！”“斗争是值得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经济新闻界用诸如此类鼓舞人心的和充满胜利喜悦的口号来庆祝“通货膨胀的死亡”（Sauga, 1997）。这种为胜利而发出的呼喊不乏幼稚，因为它以令人难堪的态度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置若罔闻：那种由国家滥发货币的做法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转移到金融市场上和股票资本虚构的价值上升的泡沫中——而且是如此地精确，就好像人们按动了—一个电动开关。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进军和通货膨胀的结束在时间上与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股票市场的上扬同时发生。但如果国家滥发货币受到通货膨胀惩罚是因为通货膨胀直接表现为同样也不合常规的需求的话，那么股票市场上虚构的“资产通货膨胀”（“asset inflation”）的结果就是通货紧缩的恐慌，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崩

盘”和由此而造成的货币资本虚构的巨大数额突然贬值。

令人欢欣鼓舞的通货膨胀的终结和更加令人兴高采烈的股票市场的“千年大厦”正好证明了在全世界被付诸实践的弗里德曼学说只是将通货膨胀的危机形式转变成了通货紧缩的危机形式。因为美元的黄金可兑换性的安全阀此前早就被除去了，新自由主义也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废除调控”已经消除了最后的障碍，这种泡沫可以膨胀到大得无法想象的地步，并且能无限长期地存在。那么这种泡沫一旦破灭的话，发出的爆裂声将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而它总有一天会破裂。这个脱钩的金融资本的泡沫于15年后在怎样一个以天文数字计算的规模中活动，在外汇交易所可见一斑：

“（在）过去粗暴地取消了调控的10年里，金融交易额突飞猛进地上升。1995年4月，每天有15720亿美元在外汇交易所成交……鉴于（1996）一年51130亿美元的世界交易总额和根据各银行平均9万亿美元左右的国外债权和债务（1996年年终），人们可以不费力地粗略计算出交易所每天能够实际成交的交易额。交易所每年营业250天，每天的‘实际’交易额达560亿美元，约占外汇兑换额的4%。其余的96%显然是被用于短期的投机交易……”（Altvater, 1998）

在股票市场方面，当今全球博彩资本主义的中心——大名鼎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平均指数能够告诉大家，虚构资本的创造活动已经超出企业经济“劳动实体”的实际状况已经有好几光年了。自1900年道琼斯指数诞生以来，它花费了60多年的时间，才于1966年在福特主义繁荣的高度上短期地逼近1000点的关口。然后又用了16年，才在1982年——与新自由

主义的投机交易时代同时准点迈步——突破了这一关口。此后的情况就可以从虚构的价值创造活动荒诞无稽的规模中得知了：1995年的道琼斯指数为4000点，1996年达到6000点，1997年2月上升到7000点，1997年8月就增至到8000点，1998年提高到9000点，然后在1999年年中直涨到11000点。这种“突飞猛进地上升”的类似趋势几乎遍及整个世界，虽然各处的数量级不等。

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在福特主义达到的发展水平、在已积累的资本和紧接而来的微电子技术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爆炸的高度上，已难以让价值得到实际增长，而且如今已完全无望了；但股票市场仅花费了17年时间，就实现了“未来期望”的资本化，其数量级超过了证券交易所在20世纪82年的时间里资本化总额的十几倍！尽管企盼未来能出现一个新的工业资本主义“长期浪潮”的真心期望多年以来已被放置一边，尽管企盼未来出现一个服务业的繁荣景象的期望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痛苦，而且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居心叵测和从经济角度来说站不住脚的，但是一个无人过问其实际基础的、完全空洞无物的“未来期望”却以越来越荒诞无稽的规模被“资本化”了。几乎不可想象的是：证券交易的资本化不仅把整个21世纪已经变成了当今虚构的财富，而且也捷足先登地取益于不可预见的未来，而这一以如此水平实际创造价值的未来永远不会来到。“未来已经过去了”，而且其规模之大连拉尔夫·达伦多夫于1984年在他大胆妄想的噩梦中都无法想象。这个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负担”，因为就是翻倍成许多个世界的人类也无法“通过劳动抵偿”这样的一个“负担”。这个未来等于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一个再也无法生存的空间——前提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和范畴必须继续有效。

然而，这个完全被吸干抽空的未来中的模拟货币财富正在支

撑着已经变成无底洞的当代资本主义，似乎已阻止了债务危机；这个模拟的货币财富在一个急剧衰退的资本主义“正常状态”下维持着国家、企业和私人消费者，并制造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能够继续以货币形式被动员起来的虚幻构想。通过投机的泡沫不合常规地大肆造钱虽然以不可思议的巨额远远超过了按照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由国家造钱的规模，但之所以没有由此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造出的钱只是间接地作为需求在起作用，而且大部分仍然停留在金融体系中。

与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的凯恩斯主义调控主张不同的是，这些通过投机创造的金钱起到的不是相对平衡的作用，而是推动着社会极端分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向贫困，甚至忍饥挨饿的时候，当民主的古拉格劳改营迅速普及的时候，在投机财富涉足的诸多社会领域里一种异乎寻常的奢侈消费现象突然盛行开来，它把穷人当成奴仆来对待，并且只通过它的废料残品把他们再造出来。但因为这种财富不再是实体性的，所以它不能再同以前的金钱所显示的傲慢相比。不仅以前创造资本卓有成效的中产阶级被耗尽财力，而且博彩资本主义的**社会上层人士**本身的经济基础也不牢固。面临棘手局面的“新中产阶级”所处的社会交点地位正好体现出这种向模拟的过渡：

“中产阶级是否继续起到工作制造机的作用值得怀疑。因为用劳累换回的报酬越来越少。联邦中产阶级经济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迪特尔·黑特（Dieter Härthe）对此解释说：‘资本市场的收益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利润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对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来说，出售他们的企业并将货币投资到有价证券上更值得。尤其对继承遗产的一代人来说，这将成为另一种有利可图的选择可能性。到2003年将有30多万个家族企业连同他们的400万雇员面临一个

所有者的改换。这种后果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在以后几年里首先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 [Wirtschaftswoche (经济周刊), 7/1998]

为免除税收和废除调控来增强企业活力提供论据的实际上是博彩资本主义的规模，它早就对“经济繁荣年代”所有的创业精神和积极行为发出嘲笑。社会分化此刻已蔓延到所有社会群体。谁错过了参与虚构财富的创造，谁就是输家；谁能够尾随股票的繁荣，谁就是臆想中的赢家。同1929年以前的经济繁荣时代相比，除了机构投资者、基金会和私人大投机家之外，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极为普通的人们，从女秘书直到钳工或出租车司机，都能够通过模拟的股票升值来创造自己的“第二收入”。在这种社会大气候下，这种“持股人价值”的方案已经上升为普遍的“哲学”。虚构的股票升值将成为经济的顶峰，完全不取决于任何实际经济的策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个“重新评估价值”的过程中，金融市场不再作为实际经济中商品生产的表示方式出现，而是实际经济的商品生产正好相反地作为股票市场上运作情况的次要表示方式。被动的“持股人”作为真正的主角得到人们的青睐，而真正的商品生产只是作为不重要的配角。这种荒谬的情形通过媒体的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每天都有职员辞掉他们的工作，然后通过互联网投身于证券交易，这是一个臆想中有利可图的赚取面包的方法。已有700万美国人在他们的写字台上从事网上在线交易，点击一下鼠标一眨眼功夫可以免费调动数十万美元。如果说以前在每一次交易前还站着专业的经纪人，他们会提醒投资者不要过于轻举妄动。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亲自运筹操作。股票交易已经像保龄球、苹果电脑或可口可乐一样成为

一种时尚文化——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个巨大的媒体机器在推波助澜，各家电视台昼夜不停地报道世界金融市场的消息，每天印刷数百万份的日报和金融杂志向投机者大军提供信息。甚至在健美中心的显示器屏幕上也跳动着最新的股市动态数据。在繁华的大都市街道上许多人在皮带上挂着微型接收器：它们显示着股票行情，在突然上涨或下跌时就响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此刻作为所谓的当日交易者从事着股票投机生意。他们将钱投进股市，接着一秒钟、一分钟或几小时以后重新把钱抽出来，为了从微小的股票行情浮动中赚钱。至于公司生产什么或者公司是否赢利，他们并不感兴趣，关键是‘契机’，即短时间内行情上下波动的情况。整个气氛被不知其真面目的在线权威煽动起来，他们在网上聊天室传播他们的主意并且调动一群网上交易狂徒进行运作，其中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指望股票行情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他们给自己取诸如东京公园这样的名字或者他们还上学——比如15岁的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他在网上拥有自己的股票网页，并且在课间给他的不断迅速增加的网迷伙伴出主意。” [Der Spiegel（明镜周刊），12/1999]

股票投机已经成为时尚文化，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以何种规模陷入一种盲目的不理智状态，没有比这显示得更清楚的了。而这种盲目的不理智，不仅局限于博彩资本主义居领先地位的那些国家的精神状态，即不仅局限于整个西方中心地区，而且它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的另一端——在乌兰巴托，蒙古的交易所经营着一种萧条经济中超现实的私有化股票，在乌克兰和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那些不可靠的有价证券经常在同样不可靠的暗室——银行成功地安营扎寨，

而隔壁相邻的人们却在挨饿。而且东欧国家官方的证券公司也以过山车式的疯狂上下的股市行情为不知虚实的基金会和靠不住的私有化证券去吸引“风险资本”。这种“风险”早已不再与可能的工业化成就、新产品和商品市场有关，而是仅仅涉及空空如也的投机过程。甚至在饥饿和内战的非洲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交易所。在一篇关于赞比亚有价证券市场的报道中对“自由的调节机制在诱惑”的赞比亚这样描写道：

“通往赞比亚交易所——卢萨卡证券交易所（LuSE）不引人注意的大门位于一个领带商店和缝纫用品的商店之间，这便是它的标志。过了一道门和一个楼之后，来访者走进一个有几张写字台、一台复印机和几台电脑的房间里。谁如果问交易厅在哪里，人们会奇怪地看着他，那个来访者实际已经就站在它中间。不要看房子空间有限，断不可以傲慢的态度低估它，1996年卢萨卡证券交易所营业额扩大了近10倍。自从年初以来市场资本化增加了一倍多。”  
[Handelsblatt（商报），1997.8.11]

通过资本主义的赌场而得到拯救的喜讯在全世界比基督教学说传播得都快，尽管各地的实际经济仍然那样一蹶不振。对在赌博运气所抱有的希望已经上升为普遍的时代精神。谁有足够的钱去证券交易所，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赌博类有奖游戏来满足自己，甚至社会下层的人们也受到影响：人们不仅在圣保罗可以看到清洁女工和打短工的人在公共汽车站如何把他们费尽辛苦挣来的可怜兮兮的钱在“赌博游戏机”中输掉。金融资本主义的模拟也再一次被模拟：学生整班整班地参加了由经济媒体或银行和储蓄银行主办的“交易所游戏”。使用网络的孤独交易者成为30岁人的“冒险”典范：如同有关的中介公司所作的广告词所说的那

样，“除了我和证券行情，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此外，“电子银行”这个已经遍布全球的网络以及与此相连的机构、有关的媒体闹剧和交易所发烧友的大众文化产生出了“就业”领域，它从根本上说起初就支撑着对服务业资本主义的幻想；这与一个奴仆和强迫劳动者世界的幻想相映成辉。普遍的个体化和联合的解体也是由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浏览的人越来越多才得以实现的：原来意义上的联合关系到的是共同的利益、社会的局势以及与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相关的种种情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投机性模拟遍及整个世界的时代里不再存在能确定的社会方位了，而是一方面只存在着“入”和“出”这种普遍潜在的威胁和恐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个人同一个长期持续的彩票经济扣人心弦的过程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于滑进这个非真实世界里的社会属性无人问津。这种虚无和现实的颠倒局面以一种荒唐方式构成“每个人是自己幸福的缔造者”的现实，建立起一个虚拟的赌德民主。分裂为独立个体的“劳动力的业主”实际上是“自己债券息票的赌博者”，而且只是出于这个幻想，意识形态的苛求才在“进入”或“满心想进入”投机炒作时充分起作用。即使那些于社会无益的“索取一切”的赢家的卑鄙类型也不再意味着一种在实际经济中的实施能力，而是体现出一种蛮横的虚拟主义和真实性的完全丧失。一名叫阿尔伯特·邓拉普先生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在美国是“持者股先生—价值”的象征性人物：

“这位经理好像处于战火之中，从他的薄嘴唇间发出一道道命令，这就是美国臭名昭著的整顿者。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无情地解雇员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粗暴地强行合并企业，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狂妄地与管理层对簿公堂：‘这个公司要么需要我，要么需要像凯沃尔基安博士’这样一个



在美国声名狼藉的安乐死医生，他惯于向他的职员这样大喊……59岁的邓拉普（Dunlap）使市长怒吼了，他还激怒了工会会员，使家庭陷入绝望——但是至今无人能够阻止这位蛮横的经理。他就像股票资本的一位十字军骑士一样纵横驰骋。他喜欢牧羊犬，憎恨那些不从他们的公司榨取正当红利的经理们……美国经济界的领导人当时把这种野蛮疗法称为‘邓拉普疗法’，以此为围绕股票崇拜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导火索……邓拉普疗法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而仅仅是进行重新分配，批评家们这样提醒道。而且，邓拉普的企业几乎不会有一家能作为独立的企业存活下来，它们被收购，被分拆或者另作他用——当然大多数情况是照顾了股东的利益……但这个粗暴的人甚至自以为是一个慈善家，是一种完全新型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认为股东最终不仅仅是富翁们，而是将他们的退休金投资到股票或基金上的成百万美国人……‘我不相信社会责任’，邓拉普说。据他妹妹说，他差点儿和他的家庭彻底脱离关系，他连父母亲的葬礼都没有出席：‘一个公司不是一种社会福利的试验，关键在于赢利。谁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将他赶出去。’他总是取消他的公司为博物馆、剧院或慈善事业的捐款。他取消了基金会，禁止经理们在任职期间献身于社会活动……”〔Der Spiegel（明镜周刊），12/1997〕

鉴于这样一个精美的样板，大多数剩下来的“社会批评家”想起的只是失去控制的危机资本主义能够让他们产生的念头：也就是浅薄的道德说教。极“左”和极右派人士、工会会员和在电视里布道的神父、前联邦总理和媒体政治家、“异端思想家”和保守的星期日演讲者都在成桶地灌输“伦理学”，他们无非是想回归到一个可靠的和“规矩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去。在奇妙的

“市场经济”和它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名义之下周期性地增长的投机热久而久之又让人听到一些声音，使人回忆起1873年和1929年爆发的反犹太主义行动，而提出的建议措施（比如说对投机利润征税）则证明是可笑地不痛不痒。这类做法完全排除了博彩资本主义无节制投机的时代是一个内在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生产制度连同它“劳动市场”的基本苛求最终自我验证是那么荒唐。

这种排斥做法的功绩从另一方面被完全无度地腾空而起的金融市场上的瘾君子们展示出来。像纽约基金的德裔经理海科·蒂梅（Heiko Thieme）这样一位冷静沉着者和交易所盛大社交聚会主持人对下个世纪中货币神奇的增长已经做出一个预测：在上天赐福的2097年，道琼斯指数将达到75万点，德国达克斯指数上升为40万点！整个经济媒体都为之雀跃欢呼道：有乌托邦式的金钱机器创造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财富，未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比如说，工业国家里由于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退休金同其他一些福利待遇一样面临无法支付的危险，以后就不必再艰难地依靠按“世代的契约”从工资中扣除的退休保险投保费，而是可尽管放心大胆地用无穷无尽的证券交易收益来支付这笔费用——当然这只对那些将个人的养老保险金投到股票上的人有利。这个荒诞的推理早已说动了行政管理机构，他们也暗地里参加了这个推算自己财富的全球性游戏。这件事情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已毫不含糊地展示了这一幕：

“带有派生性质的投机在此期间成为一种‘法院不等受害者申请而依职权主动审讯的罪行’。欧洲国家许多财政部长使用这种派生方法，以便转嫁债务和推迟债务的还本付息……这种做法减轻了今天的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以后则可能大幅度地加重它。加利福尼亚地区柑橘县的一个财政部门负

责人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首先这位克赖顿 (Criton) 先生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也因此很受公民欢迎。1994 年 12 月 6 日，在此期间由于投机所受的损失高达 20 亿美元，导致了该地区的破产。” (Altvater, 1998)

柑橘县是位于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州豪华住宅区，“神秘的怪物”——里根主义在这里产生。这种破产具有象征性质，它用显微镜的方式预演了“失业的”博彩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破产。这种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境况现在已经如此恶劣：在“崩盘”后，最大的投机泡沫肯定会随之破裂，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化为一片冒着烟的经济废墟。这是它惟一还有能力进行的“自我批评”。

### 民族经济的终结

以投机装扮出精神焕发模样的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末已进入一个的全面土崩瓦解的迅猛过程，这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不仅社会性关联被分裂化解为史无前例的原子状个体，不仅全世界在一次次经济大崩溃中经历了一次文明的衰落，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基本范畴的民族也摇摇欲坠。如果民族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被发明的话，那么在这段历史结束时，它将从内部爆炸开裂——危机资本主义已失控的经济，这部高速运转得发烫的和即将面临爆炸的“美妙机器”也就此而言破坏了自己的基准体系。

当然，人们不必为缅怀这样的民族而哭泣。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竞争、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性压制和打击排挤的沾满鲜血的结构体。虚伪的“我们”这种被歪曲的形式曾为使社会运动迷失方向和屈服顺从而效劳，目的是用非理智的忠实来束缚“美

妙机器”的牺牲品。但是，如同国家的退位那样，民族的瓦解在危机资本主义盲目的“自然发展过程”中没有带来社会的自由，而是导致了社会解体的恐慌。取代了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的“我们”的不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是企业经济这个经济暴政统治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

民族无论如何不会就这么平平静静地瓦解，正因为它绝不是让位于一个更发达的结构，而是使社会在毫无结构中败落。民族不会被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保持社会形态的世界大社会以积极的方式方法来超越，而几乎可以断定它会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出现的大动荡中崩裂，就像大坝决堤，或好比一次山崩或地震。所以90年代的关键术语，即所谓的“全球化”，虽然描写了现象层面上的一个实际过程，却是一个错误概念，因为它在一般情况下指的单单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实际上民族面临的根本危机毁坏了现代化的框架。因为资本主义没有民族的纽带是不能生存的，但正是这种纽带现在被那只“无形的手”本身给解除了。那些拥护者们只能够把这种发展认为是资产阶级迈入一个臆想中“永无止境的世界”的新进步，于是，他们纷纷做出这样幼稚的评价：

“从前人们一度学习‘国民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学习的对象是通过货币、税收或国家政策孤立起来的经济体系，还要研究并掌握这种经济体系对外界变化做出的反应。‘民族经济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国民经济学家’如今变成了‘世界经济学家’……全球主义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不甘心自己禁锢于民族的范围，他们像水上的油污一样迅速蔓延。它们使民族工业和货币失去根基，并且不断通过新的经济表现形式来排挤它们。德国企业和它们在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变成全球行动者，

他们互相合并，并且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同一性，这些也就都在所难免了……如果戴姆勒和宝马和大众汽车和德意志银行以及几乎所有的德国大企业在德国境外寻找投资立足点，如果反过来外国公司在德国加强了他们的基地，如果国家货币被更高级的货币体系取而代之，那么这个经济的世界主义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理论模式可以预见的和所期待的结果，独有这样的模式才保障了人类的进步……” (Mundorf, 1999)

同样是这种只局限于现象的论证在这点上是以辩解为目的，而对全球化做出肤浅质疑的“警告者”和批评家们又以相反的征兆做出相同的论证。他们同样不愿意正视根本性的危机，而只是通过“市场”的兆头来预卜“资本主义未来” (Thoroa, 1996) 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两种情况都由于缺少危机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而没有抓住全球化的本质。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卓有成效的理论模式”实际上导致了“经济的世界主义”——但仅仅只是出自经济方面本身而已，或者确切地说：经济的某一个特定部分，但是这一部分体现出了整体的崩溃形式。这里所发生的变化，不是一种整个世纪发展趋势的延续，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涉及国际贸易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大，同样也不是只涉及各个民族经济之间资本输出量的增加，而是确实关系到民族经济本身的解体。换言之：作为现代结构体的“民族”的经济中心将被危机资本主义冲垮。而全球化一方面也像国家职能的衰退或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虚拟化一样（并与此并行地）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通过合理化裁员”措施的直接产物；另外一方面，国家职能的衰退、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这三个过程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经济也就因此只能成为全球化后的金融市场

上踊跃的投机活动的附属品。

是什么使至今为止的国民经济辖区有区别于世界市场呢？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或民族经济的形式是由一个个过滤器连接起来的系统构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构成了一种政治-经济的“臭氧层”，这个“臭氧层”以两种方式不仅对内，而且也对外保护着本国：对内把国内经济中的竞争和企业经济合理性这两方面的“穿透性辐射”能够通过过滤减弱到制度所能承受的强度；对外是通过过滤衰减未经过调控的或者就其性质来看无法调控的世界市场的“穿透性辐射”。这些过滤器当然首先是指各国的税收——法制——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的货币和大量其他的调控机制，这些机制就像国家的基础设施系统一样全都由国家来保障。全球化只不过是结构性大规模失业过程和国家调控机制衰退过程的又一必然结果，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引发了全球化。

在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符合规律的升级过程。合理化和自动化导致结构性大规模失业具有一种新质，并因此而导致了购买力的降低和国家收入的减少。国家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而这个举措进一步降低了购买力。企业对国内市场这种枯竭趋势做出的反应总是“向前逃跑”到世界市场上去。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当然也就形成了一场毁灭性的相互竞争，伴随这场竞争出现的是全球性的资本集中。为了让资本留在本国的“所在地”，国家对此的反应是又一次令人恐慌地减弱调控力度，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促使各康采恩让各个国家之间互相展开竞争而从中渔利，并且在降低成本的竞争中采取全球多样化的战略。超越国界与洲界的这种企业经济元素的“分解”同时在技术上通过这场使生产过程得以自动化并将人类劳动力“通过合理化裁减”的微电子革命成为可能，而且向前推进。80年代末，当时大众汽车的老板卡尔·H. 哈恩（Carl H. Hahn）切中要害地评价了这一发

展状况：

“即使对生产的部分工序来说，在不同的所在地进行生产也是可能的。这样就可以使一系列当地国家特有的优势——比如低工资、合作的工会、微弱的调控力度或还有减免税收——和本公司特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商品的生产过程总是变得越来越可以分解，这才使生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可能。而现代的通讯技术大大降低了跨国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费用，这一点形成了大大有利于生产国际化发展的局面。现在，世界上那些最大的工业企业在外国开展的生产约占全部世界贸易的1/3。”（Hahn, 1989）

八年之后的1997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统计，已有2/3的世界贸易额产生于这种类型的交易。同一个企业可以将它的企业经济分布到全球：它的总公司所在地可能在法兰克福，金融业务操作却通过伦敦，企业经营的结算可能由一个在印度的廉价的电子数据处理公司来完成，半成品通过实际很低的“高工资”在匈牙利生产，而研究（由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条件少）在美国进行，利润却在“税收天堂”爱尔兰结算等等。其中可能有些部分通过跨国公司本身的子公司，还有一部分在所谓的“外部采办”的过程中委托给有关“服务行业”的独立供应商。在微电子技术时代之前，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畅通无阻”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充分利用成本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种方式表明，世界市场的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份额实际上不再是相互有联系的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而是直接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企业聚合体，不再是以“国际的”方式行动，其结构也不再

是“多国的”，而是具有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跨国”规模。至今一直被嵌入一个民族经济调控范围内的企业经济突破了这一框架，直接在世界市场的无调控之境我行我素，也就是超越于民族经济之外（跨越国界的）。

这个过程无非是微观经济极端化的结果：宏观经济的视角不仅仅在国民经济领地内的地位被废黜，而且它自己也废黜了这个领地本身。民族经济过滤机制的毁坏也更增加了结构性失业的人数，并且造成了大批企业的消亡，而跨国公司这些庞然大物却在没有经过过滤的世界市场上聚集会战，在这个世界市场上已经放开手脚的企业经济合理性也就畅行无阻。企业经济被“解脱出来”，真正的经济空间如今位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机构之外或“超越”了它们，它们的生命活力也就开始消失。与世界市场以前的发展，即与自从19世纪以来总是以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领地作为前提的发展相比，全球化的新质却正在于此。

在工业企业经济全球化的层面之上形成了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个层面，正是这个层面上的全球化在发号施令。因为缺少带来追加赢利的劳动实体的资本积累虚拟化使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流量和金融流量的关系颠倒了：全球的金融流量不再是相应的商品和服务流量的货币表示形式，而恰恰相反，实际商品流量（并因此也包括人类的物质再生产）就只是各行其是的投机货币资本“鬼怪式积累”的表示形式，甚至可以说只是它的一个残次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机制以最精纯的形式再显神通，但也是以非现实的形式。只要在西方中心国家还没有出现“崩盘”，这种非现实的形式看来就会一直主宰现实的生活。

投机资本模拟的鬼怪式积累不仅根据其鬼怪式需求来调控商品流量，而且它也合乎逻辑地成为全球化的中心，因为它能在比实际商品生产更进一步的意义上直接全球化。也就是说，商品和生产设备仍然是宏观世界里难以搬移的粗笨实物，因此不能够



真正“无立足之地”，而是必须在现实的地方停留或者通过这些地方被移动，而电子货币的金融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就好比物理中的亚原子微粒，不可能准确地确定它们的方位。非现实的巨额货币借助于通信技术以光速在“实时”运动，以充分利用世界上24小时金融营业日的微观优势。人们再也不会谈论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投资”了。而实际经济对跨国“金融工业的复合体”的无法摆脱的依赖性也在这样的情形中充分体现出来，这些跨国经营实体根据自己想象的画面创造了一个跨国的工业企业经济。

当然，旧有的民族经济的机构，而且尤其是民族国家不会全然从画面上消失，但是它们也会像工会和企业雇主协会一样被削弱。各个民族经济的资金单位——“货币”在世界大部分国家或者已经完全消失或者降低为无足轻重的“贫苦人用的钱”，成为失业者的亚通货，与此同时，只要连接全球经济的真正纽带还继续存在，人们就可像长久以来那样通过几种世界流通货币（美元、马克、日元等）来进行贸易。在欧元这种货币政策的日本神风敢死队式的自杀性试验中，人们制订了一种跨国的人造货币，它跨越了具有截然不同的生产率水平，法律制度等完全不同的国民经济辖区，但这也只不过是民族经济的一种解体现象。这种出于欧洲大陆上全球行动者的利益而采取的“向前逃跑”货币政策是以其余“亚全球的”经济及其地区性的结构和就业情况为代价的，而欧陆的全球行动者通过欧盟内部不同货币使用区域的取消为自己在世界范围里的弹性战略节省交易费用。但不仅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而且也在其他任何方面，原本在定义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里的政策对越来越横冲直撞的跨国微观经济行为方式只能做出有气无力的和顺从迁就的反应：

“企业管理者们对本国被选举出的政府越来越蔑视。一种全新的态度占了上风。自命为世界市场上‘全球行动者

们’的那些人高傲地俯视着越来越无招数和无权势的国家政府首脑们。经济的全球化使大型企业越来越不依赖于国内市场 and 国内的统治者，企业管理者们经常只把政治看成服务性经营活动……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认为，民族国家必须像‘小旅馆的老板’一样吸引流动资本。哈佛大学的女教授罗萨贝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这样写道，对企业家来说世界将成为‘一条惟一的大型购物市场街’……所有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很伤脑筋。即便是巴伐利亚州州长，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也经常公开抨击企业管理者们的双重道德标准，‘他们愿意在德国打高尔夫球，在国外投资’。一些企业管理者们公开地炫示他们新的权利意识。联邦议院的财政预算专家们4月底在一次柏林考查旅行中会见了戴姆勒-奔驰公司总裁——于尔根·施伦普（Jürgen Schrempp），他的肆无忌惮令他们瞠目。在进晚餐时他夸口道：直到千年交替之际他的企业在德国将不缴纳一芬尼的收益税，‘从我们这里你们一无所获。’国会议员们十分尴尬地盯着自己的盘子……即使当企业家主动邀请部长们时，也不保证会很好地对待他们。环保部长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上个月真心诚意地参加了批发和对外贸易协会组织的电视专家论坛——，后来她注意到自己已坐在被告席上。协会主席米夏埃尔·富克斯（Michael Fuchs）没有谈论与世界贸易有关的生态条款，而是指责女部长是企业选择所在地的绊脚石：她尽可卸下绿色环保幌子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伪装，赶快彻底忘记为废物处理经济所作的计划。‘我们从未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经济界当众扇耳光，’一个同行抱怨道，‘人们毕竟不应该污辱来宾’。这种粗鲁的方式还需要适应……” [Der Spiegel（明镜周刊），26/1996]

发生在 90 年代中期的这一幕至今还让人有一些不快，甚至能够让人看出对资本跨国独立化抱有的一种“民主的愤慨”。但是这种激动情绪既无用，也不恰当，因为民主在原则上从来都不是按照经济这“第四个权力”意旨行事的一种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把它所在国家公民的主体形式确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主体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奴隶。危机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经济只是使这个事实公开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且甚至大大地约束了民主的多种选择程序，以至它将变得毫无意义。“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和无聊之极，因为政治出自急于巴结正与民族经济“脱离关系”的跨国企业经济之心，就连在由制度预先规定的形式中也不知如何提出其他选择方案了。

政治在所谓的对外政策方面也掀不起什么高潮了，社会注意力的焦点穿过喧闹的媒体已转移到金融市场和它的行动者那里。所要想转变位于民族国家框架之上的政治的功能和势力范围并只是考虑建立全球性主管机构作为跨国企业经济的对称物的一切尝试都惨遭失败了。表面上代表全体民族成员国的联合国的作用没有增大，反而缩小了。在过去几年里，在社会批判方面已经完全退缩的左派绿党中参加过 1968 年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所谓的“世界对内政策”或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的“民主化”，这样的言论真可谓是出尽了洋相。“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态变更”这个本来就云山雾罩的改革项目在“红绿”联盟执政之后不是在一个议会任期内，甚至也不是在几个月内，而是在几个星期后就烟消云散了——从原子能到废物处理，直至环境保护的立法意向。在跨国企业经济的逼迫下，国家和地区纷纷展开“所在地”竞争，在由此而生的普遍的社会倾销，税收倾销和生态倾销中，这种自我毁灭的竞赛逐月升级加剧。

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一个“世界对内政策”都将以一个“世

界国家”作为前提，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乌托邦幻想，因为国家就其本质而言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只有在多数的形式中才能生存。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就如同一个“全社会的企业经济”一样自相矛盾。相互竞争的主管机构签订的双边和多边的协定从来都不能产生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框架，也就是不能产生一个全社会的（现在的说法：世界社会的）中央主管机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就无法协调配合，随后便分道扬镳，企业经济和政治（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同样是这种关系。政治应该代表整体，与跨国企业经济的势力范围相比，已经降低为一个竞争的部分主体；企业经济本应代表单个企业的部分利益，而现在却在更高的层次上代表着（从资本主义角度只不过是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来理解的）“整体利益”。这种荒诞离奇的颠倒尤为清楚地表明，我们面对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具有再生产能力的结构，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存在可能性的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结构上的极性对立被打破的局面。

而这个本身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资产阶级主体原则上是由“资产者”（经济公民）和“市民”（国家公民）的对立形式结构而成，它最终已再也不能够将吉基尔（Jekyll）博士和海德（Hyde）先生这样的善恶双重性格统一成为一个哪怕还差不多有些生活能力的“完整人”。这个完全抽象的个人将变得“没有社会能力”，跨国的“资产者”不能再与民族国家的“市民”调谐。资本主义理性的“个性分裂”通过一种新质而突显出来，对此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是不可能有任何解救办法的。

越来越脱离其公民权利的跨国企业经济的主体不再代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进步”。“现代化”的最后形式同时也是现代精神的自我解除和自我毁灭，如今现代化在许多方面就已经是非人道主义化，即现代化的文明水平甚至还远远落后于远古社会，全

全球化也因此不是再次被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作为任何一种“进步遗产”强烈要求和吸收采纳的东西，它是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哲学束缚的旧时马克思主义结构体系的正式更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是过着超过它的生命界限的一种虚假生活。它的情形类似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故事里的“沃尔德马”。他作为垂死者被施以催眠术，以这种方式长久地持续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直到他从催眠状态中被唤起那一刻，瞬间里就化成一堆腐烂的肉。那些担当起跨国企业经济行动者使命的人并不是兴高采烈、精神焕发的“世界主义者”，而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非现实的、没有固定社会方位性质的幽灵，这种性质与电子虚拟的货币资本没有固定经济方位的特点相符：

“全球活动者这个新阶级的成员中也包括许多学术界中经常坐飞机来来往往的富有者和一部分顶级运动员、媒体专家和娱乐界的艺术家，他们基本上是处在马克·奥热 (Marc Auge) 所称的全球通信系统的虚无方位之中：飞机、星级饭店、贵宾区、免税超级市场和高速列车。这位民族学家说到的是那些中转空间，对长途旅行、自动分流设施和信用卡了如指掌的人在那里服从着默默的交通指示。正如一个方位都以同一性、关系和历史作为特征一样，那么一个无处不在和无处可去的、既不能按关系又不能照历史加以描述的空处就因而被定义为虚无方位……从结构上来看，带有微型酒吧、收费电视和有插图的经理杂志的一个世界旅行家公寓与一个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建立起来的难民营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情况都涉及一个临时居留地，它使我们孤独，但又与其他人无异。只是一部分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另一部分人则日子难熬。” (Bude, 1995)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世界文化”。因为文化——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本身作为相互之间的渗透，作为有建树的融合和作为新表达方式的创造，也总是和地点、关系和历史联系在一起。

同样，全球化的企业经济脱离社会后享有的空间也不是没有边界的，跨国企业经济那些方位虚无的中转空间被真正社会的、文化的和甚至是地理上的世界严格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它们被封锁，就像风景被高速公路、光缆线、燃气管道或高速火车轨道所分割一样。如同贫困的流浪汉在避难者收容所和难民营被严格限制并且断绝与其他居民的往来那样，那些全球化企业经济的豪华流浪者也是生活在类似难民营的、与外界隔离的、几乎完全严密封闭的空间里。

在与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的再生产息息相关的垂死和自我解体的世界、文明化广遭破坏的崩溃地区和全球化的企业经济空间的虚无方位之间还存在着有“闸门”的地方，但就是在这些地方那种新形式的界限比起以前所有的政治边界都更森严。比如对于应该如何理解“世界主义的开诚布公”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注释者和“时尚研究者”玛蒂亚斯·豪克斯（Matthias Horx）在他的《未来宣言》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写此书是为了发出“从悲叹文化中觉醒”的信号：

“我们的平等概念的涵盖范围是什么？我们民族舒适安逸的幸福生活？或者一个各种商品、思想和交通潮流密布充斥的，存在着贫困，但也不乏活力、创造力和成功意志的星球？在某一时刻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在一个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达到‘本土化’……的平等模式与一个更矛盾，但也‘更诚实’，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的模式之间做出选择……谁接受了全球性，谁就不得不承认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加剧

了。如果我们把国门打开，允许穷人进来，那么他们可能犯罪或者陷入贫困，或者超过我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能加入到一个同时意味着安全的丧失、丢掉原来占有权的危险和已有定规的破坏性乌托邦里去吗？……一定程度上处于‘动态力’中的不平等就像在空气不太新鲜的房间里来了一阵穿堂风，或者像一股清泉注入一潭死水……”（Horx, 1999, 第241及以下数页）

问题是，何种形式的新界定令人更反感：反动的“大多数沉默者”的富裕大国沙文主义和以阴郁的排外情绪驱逐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呢，还是成为全球化赢家的那些“新中产阶级”的经济暴政意识形态。来自已被全球市场经济摧毁的崩溃地区的穷人们应该严格地分批分期地“放入”，目的只是为了强迫社会把“加剧了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把“贫困”当成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来接受，并且使人们去为自己的生存作为竞争对手互相拼斗，这里所宣传的完全是古罗马角斗士决斗的所谓“机会平等”。

这是德国的或者欧洲大陆的集体种族主义同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种族主义之间早先的差别，如今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又还魂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前提和结果都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据资本主义标准“人口过多”，必须为其生存进行人种选择，这一选择不断在重新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警戒线。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都扩大了它们的过滤机制，但是减少调控措施后的跨国企业经济的压力却不停地增大。民主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们在限制和反对福利措施方面的“别无其他选择”的局面，这些言论只能表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并且被凌驾于资产阶级机构之上的权利所驱使。从表面上和按照单纯的社会学（而不是制度批判理论的）范畴中那些已成为习俗的行为方式来观察的话，这种情况看起来好

似国家和政治已经降级成为“资本的堂馆”[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26/1996]。但这并不意味着证实了那个老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即民族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业务主管委员会”。“资产阶级”已不再是这种有相关性和社会性的阶级主体。“资产阶级”作为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主体, 作为“经济人”和“自己劳动力的企业主”, 已经摆脱了狭义的资本所有者的概念, 悄悄地变成了包括雇佣工人在内的全部社会成员。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 人们还总把国家当作“精神上的总资本家”(Marx)来理解, 不过不是把它理解为社会学所定义的全部资本所有者, 而是理解为所有形式上的经济主体和商品生产体系在形式上的综合主管机构。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丧失的正是这种制度的功能, 它也就不再是“精神上的总资本家”了。

当然这种发展也可以在社会学的层面上来描述: 领导精英们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所有层面上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规模再次发生分裂。因为跨国企业经济的精英们既不能发展形成一个与传统的、以民族经济为中心的管理残余部分共同的经济利益(用以往的阶级社会学语言来说: “民族资产阶级”), 也不能与民族国家的“政治阶级”发展形成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这个“战略”要点不仅从政治上转移到了跨国的金融市场上, 并且在这个层面上不再形成综合机构, 而是直接同企业经济的微观经济学核算合并到一起, 这种核算本身现在已经超越原来的“综合”主管机构之外在发挥着作用。民族国家作为对内调控的行政机关也同样停止运转了, 不再是“精神上的总资本家”, 对外也不再是一个战略主体。明确的“对内”和“对外”的定义已不复存在了, 因为这些关系的基准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也是老牌国家帝国主义的终结,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时代就已经黯然失色了; 同样, 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特征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期从政治上转移到



经济上，争夺民族国家控制的“势力范围”的斗争已经退到次要位置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在西方二等强国的支持下，以普遍的资本主义原则和（当时就已存在的）“自由”世界市场的名义承担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使“瓜分世界”的民族国家的斗争完全成为时代的错误。作为战略上联结利益的主管机构的“精神上的总资本家”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被取消，而且帝国主义战略的相关领域在这个跨国企业经济主宰的世界上业已不复存在。在“虚无方位”无疆界范围内，不管以何种形式的领土统治都是毫无意义的。微观经济领导下的战略利益仅还在于，尽可能地无处不在和同时无处真正“存在”，它所到之处，有领土的世界从战略对象降低为单纯的表演场所。

作为跨国企业经济的服务企业，那些民族国家自然只是有条件地或者只是暂时地胜任这个角色。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这两极分化瓦解着，在层次和规模上都危机重重，难以再统一起来，所以把民族国家作为“新的贸易国家”（Rosecrance, 1987）或“民族的竞争国家”（Hirsch 1995）这样一些新的和持续减弱的角色的设想是无法见效的。这些概念像从前一样始终出自一个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转变或者向“永久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阶段的转型过程，而事实上早已事关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绝对的危机，标志着“现代化”的最终结束。因此，跨国企业经济既没有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没有在结构意义上形成一个代表资本主义历史的下一个纪元和以一种新的方式位于国家之上的新的经济权力主管机构。全球化更多的是危机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活动无疆界无定所的跨国领导精英“策划者”自己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国家危机管理机构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致力于在国家的“所在地”竞争中将基础设施和其他的框架条件完全限制于满足全球化的资本呈点状的、“岛屿似的”布局要求上，而在国家

领土上那些与外界失去关联的、经济上荒芜的部分地区从自来水厂到警察局都开始进入一个破败过程。民族的区域分化成与外界有关联的区域和被遗弃的贱民地区，因而新旧之间的发展差在加大。同样“联合的民主‘龙形海怪’”（联合国）的努力也有目共睹，它在“世界警察”美国的领导下用共同的军事行动到处在那些崩溃地区阻止爆发的内战。这里涉及的不再是旧式的领土“势力范围”，而是一种“安全帝国主义”；目标不是占领，而是“稳定”，为的是让跨国企业经济的循环不受干扰。

但是民族国家越来越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和要求。它们应为之服务的全球化资本与日俱增地从它们手中夺走为此所必需的资金，而与此同时引发危机的病灶却急剧增多。随着每一次新的货币崩溃，金融经济的末日也就更近了一步，这个末日当然最终也会降临到资本的方位虚无的跨国区域中。全球工业企业经济及其分散的生产岛屿不是在一个有承受能力的新水平上运转，而是其活动空间随着每一次全球化的推进自行缩小。在企业经济“向前逃跑”到跨国区域的过程中形成的资本的空前集中，预示着在没有调控机制的世界市场上一番经济上同类相食的拼杀。臆想中的世界新主人追逐着正不断降低的全球购买力和赢利可能性，他们只能相互吞食并以这种方式消灭着那个实际经济的“过剩生产能力”，而这个过剩生产能力相当于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正常状态”的最后剩余部分。

### 众魔苏醒了

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的盲目飞行的终点，最后只能粉身碎骨。但是，人类不再能在“美妙机器”的形式下及其断断续续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运动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了，这一点越加确凿不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危机所涉及的，不再是能够作为另一种社会可能性而被动员起来的任何一个具有解放性质的规划。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普遍地也只被认为是滑稽可笑的过时事物，因为它在社会意识中（从“普通人”到社会科学文献）它就等同于进了博物馆的、黯然过时的、实际上一直停留在制度的内部的工人运动范例。理论上的反省即从资本主义公众舆论中逐渐消失；它明显地被一个自成一体的媒介效应文化所代替，这个文化只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而已：“理论”也成了与其他生意一样的行当。

然而，玩世不恭的后现代文化主义还把贫困重新定义为化装服饰，把社会地位的降低重新定义为一场游戏，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下尚有其他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仿佛”经济似乎已经导致了一种“仿佛”文化的出现，看起来好像对一切事物都不严肃，同时以高速运转的民主方式传播毕德麦耶尔倾向的小市侩思想，这样，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危机的事实就更为严峻，并且越来越无法排解。顽固不化地采取一切办法坚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交往形式的社会意识已经全然不是在暗地里蹑手蹑脚地寻找一个新的范式了——资产阶级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众魔苏醒了，它们迈着大步回到正在竞争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单子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中。一个新的极端的社会生物化正在给自己开辟道路，19世纪的人类动物王国以一种只是表面上现代化了的形象又回来了。

新自由主义的凯旋队伍途经后现代主义小品文章的文化主义游戏方式之后，使新的社会现象自然化，首先在经济意识形态中以民主方式登上了大雅之堂。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然的经济秩序”的信念，认为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和为不断重复源于18世纪的经济利己主义的“人之天性”而颁布的各种各样的诺贝尔奖都给公开或隐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养料，它从“医学经济”的思考到社会的优胜劣汰的伪自然主义的解释长期

以来也就能够免受知识界的责难和异议。如果说人们今天可以从容不迫地在左派自由主义报纸上又正面地探讨马尔萨斯理论的话，那就表明了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种新的“达尔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

经济因素和社会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达尔文化的烟雾中，早就出现了一种涉及面宽得多的思想反弹。在科学活动中和在新闻事业方面，所有那些愿意把人首先理解为社会性的和有思想的生物，并从社会自身的历史结构来理解它的潮流、学派和理论出发点，连同用马克思主义鼓舞人心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批判的反省思考都一起倒退了，或者已经消失了。社会现象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化只是新一轮生物化道路上的一个插曲。那种自成一体的和毫无结果的、削减文化的讨论所起的作用只是压抑彻底的经济批判，现在在这场讨论之后自然科学流行起来了，确切地说：是社会和意识的伪自然科学化。

年事已高的前左派著名学者发现了使历史都黯然失色的所谓“人类学的恒量”。研究心理对疾病影响的身心医学极不受欢迎，精神分析法被驳得体无完肤。按新的自然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说法，不是潜意识而是生物化学和我们身体中神经元的过程在驱使我们。与其说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还不如说社会更像一个“身体”。即使是个人，也首先保护自己的皮肤并注意到自己肌肉构成的躯体；后现代主义对体格的狂热崇拜可以追溯到赤裸的身体，博彩资本主义的那些每日销售人员试图在健身中心努力赶上大照片中阿尔诺·布雷克尔〔(Arno-Breker)，德国纳粹时代的雕塑家——译者注〕人体形象。经过修正的一种纳粹生物美学即将形成，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中流行的那一奥秘分支正好符合这一美学，例如看见鬼神出没，远东的神秘教和1933年以前印度日耳曼的祭礼：每一种世界阴谋的科幻小说都是畅销书，并且成为公交车售票员，失业人员和牙医助手在床上的睡前读物。

遗传工程，即一种有真正干涉威力的新型育种和优选科学的尖端技术已经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漩涡里意识形态化。首先，人们通过看起来很古怪的联系越来越坚定了这种推测，即每一个社会的和个人的现象都是有其“遗传学的”或“神经生物学的”前提的。美国神经病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声称，“如同大象天生长着长鼻子”，语言是“人类的天赋”而且肯定其中存在一个“语法基因”。圣地亚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认为，甚至人的自由意愿都“只不过是神经元组成的。”柏林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以为找到了一种能引起所谓的忧郁并由家猫传染的病毒。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迪安·哈默（Dean Hammer）重新把同性性欲归因于性别染色体 X 最后阶段的遗传基因 Xq28。

由科学假说、实验中的发现和评价解释所混合而成的不确凿的证据看起来好像不会再影响任何人，因为自然科学显然完全卷进了资本主义的界定的和处理危机的纲领的执行过程中。自然科学臆想中“纯粹客观的”课题很容易被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惧和仇恨的思想潮流所影响，更何况自然科学在其与资本主义同生同长的历史中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除了时而在道德方面肤浅的次要考虑之外，从来没有准备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反省，而且也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在新的世界危机出现的时候，众魔也又出现了。社会中退化现象的“遗传学化”把更多的人士深深地卷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美国社会科学家理查德·埃尔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作品《钟形曲线》中建立了“竞争、遗传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联，以伪生物学的方式在定义上把美国的黑人从“认知精英”中排除出去。

“智商”的构成是旧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讨论之间的

连接部分。一次颇具意识形态成分的“遗传学”争论表明，鉴于在全球危机资本主义下“不能从事工作的”穷人们构成的“危险阶级”又一次在不断扩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优生学家和测频专家是如何披着“遗传学的物种选择学说”外衣再次出现了，其目的是为了在20世纪末重新给“天生的犯罪者”、“下层人”和“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做出定义。可以预见到，有朝一日“犯罪基因”或“贫困基因”会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用遗传学来确定社会命运的发明对要降低社会福利费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说正是及时雨。不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应该退位，而是那些遭社会遗弃的人越来越被重新看做“生存包袱”。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暗下所达成的共识已经被各种新纳粹集团公开地对无家可归者和残疾人加以实施。

社会的生物学化和自然规律化开始再次淹没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并且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物种选择助威，同时这种杀气腾腾的趋势也重新转变成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化”的一种右倾保守的、法西斯式的假批判。“种族”民族和“人种”在一种病态的重复强迫中作为幻想中的相反画面坐到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未能兑现的彻底的经济学批判的位置上。

这个意义上的“德意志”也成为法国“新右翼”的信条，它的先驱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自从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为纳粹四处奔波，装扮成臆想出的“无辜”的样子，误以为不用为奥斯威辛集中营而受良心谴责。德伯努瓦并不发泄任何情绪，他一味地沉湎于“印度日耳曼精神”的幻觉中，对他来说，“人种”是一个有利的事实，“其特征”是“一些基因的平均频率，这个频率确定某一类居民的身体、病理学和心理学特征和天性”（de Benoist, 1983, 第53页）。他根据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观点把人解释成“具有发达大脑的食肉动物”（出处同上，第362页），从生物学角度看，人所具

备的竞争标准是：

“我们最早的祖先是食肉动物，其食肉动物的本质是我们继承的最确定的本质。人类不是起源于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起源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类人猿。这是一种食肉动物。”（de Benoist，出处同上，第362页）

自由主义提出的所谓批判只是以更尖锐的形式重复了自从霍布斯以来自由主义作为公理的前提，它把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竞争与意识形态重叠起来，而且宣传为在“人种”、“人民”和“民族”之间达尔文主义“与其他方法竞争的继续”。德伯努瓦绝没有因为使这一带有种族主义神话色彩的自由主义复活而被人们“痛打出大厅”，而是被当作资产阶级中的极“左”的名人倍加关注，并且被以宽容的姿态邀请参加学术会议。还魂了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这里讲着法语。但是他长久以来“自然”又讲着德语。在对现代精神提出非理性—浪漫主义的、种族生物学的虚假批判的故乡，在“马克思主义告终”以后，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的反应顺理成章地是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恶魔从它的栖身营地站了起来，这里自赫尔德和费希特（Fichte）以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族”发明晋升到超历史的血缘本质并被用来对抗充满铜臭的、可耻的西方民主。

现在后果苦涩，那就是尽管有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左派人士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看透这个恶魔般的自由主义衍生物，没有对它批判到底。首先，社会主义本身对社会现象达尔文主义化和血缘意识形态直到被圣像化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成分的贡献仍被淡化，就像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根源本身没有被批判性地加以揭露一样。即便在这方面，1968年的“新”左派也没有超过工人运动的老左派。虽然他们也轻描淡写地谈论

了商品生产体系的现代拜物教、抽象“劳动”和企业经济合理性的破坏性和非理性的实质和科学的功能主义包装等等，但仍不能断然采取行动，那么他们就注定会不单是在经济形式的层面上被禁锢在资本主义范畴的“铁罩里”。

因为左派对资本主义提出的批判力度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它的基础，抽象“劳动”和“民族”也就纹丝未受触动。在这样的一个范畴里埋伏着人类犯下的罪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不仅“德意志民族”，而且“民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也必须从根本上被摒弃，这些对于左派来说已不被列入讨论的主题。“民族”反倒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构成的神话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又偷偷溜进了左派人士的辩论席，并且还居然成为与“民主化”并列的一个褒义词。这样，1848年以来经过这条曲径再次改头换面的老牌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得以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又充足了电，完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结构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一脉相承。1989年以后就只剩下“德意志民族”了，类似于整个东欧自从国有社会主义崩溃以后就剩下民族主义的残余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的“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当（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刚开始的危机平行出现）恩斯特·诺尔特以反共产主义的民主合法名义提出了他给国家社会主义恢复名誉的阴谋主张时，似乎所提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想还像从前一样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的话，那么在左派解体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一种在几年前还认为是不可能的方式实现了突破。尤为显著的特点是，这种过渡是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社会气候下进行的。民主德国的崩溃和它的领土与联邦德国合并在当时被作为“德国统一”来庆祝，而这已经是商品生产体系（被否认的）世界性危机的特征；于是，“德国统一”、社会经济的危机和各种种族主义的反应形式融合成一个“触动大众”的综合整体：在20世纪末



的德国，在血缘共同体的名义下又有人被驱赶、烧焦或被打死。甚至在那些温和的批评性评论中也有节制地提到，这些极右团体的“过分为行”获得了“保持沉默的大多数人”和社会的“中产阶级”默默无闻的、不公开承认的欢迎和支持。尤其在东德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纳粹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这是当时走阅兵步伐的民主德国令人心寒的残余。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性危机越被掩饰、否认并在意识形态上遭到歪曲，从来没有彻底消失的反犹太主义综合征也就越来越大量地侵入到社会意识之中。现代主义的众魔中最恶毒的妖魔将对世界和危机做出的非理性解释推向顶峰——而它在博彩资本主义的环境下早已在全球的金融崩溃之前就徘徊游荡着。自从19世纪初期的嗨嗨动乱以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反犹太主义的仇恨和大屠杀已经第四次伴随危机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抽走而爆发。同跨国货币资本结构平行发展的是反犹太主义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全球化；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甚至日本也在拼命地驱使人们反对犹太人团体；就连路易斯·法拉康（Louis Farrakhan）这位美国富有影响力的“黑色穆斯林”领导人在讲道时也发表充满仇恨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在德国也有目共睹：尽管演出了许多幕虚假的感伤剧，人们却很少从奥斯威辛吸取教训。

虽然“时代的标志”不会让人在理解上产生误区，已经放下社会批判武器的左派却鬼使神差般地接纳了资本主义危机意识形态的这些幽灵。一方面，“民主化”的讨论合乎逻辑地产生了那个身着阿玛尼品牌服装的左派，这些左派人士今天共同管理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承担着社会压制的责任。可当他们在各方面缩短社会福利救济接收者和失业者的寿命时，这些参与执政的前左派在政界媒体讨论中却虚伪地口是心非。他们的话只能表明，政治言论怎样开始变得不符合事实：“民主的人民共同体”应该同“民主-市场经济的欧洲”和哈贝马斯提出的德意志“宪法爱国

主义”联手，据说这样可以祛除众魔，而这诸多恶魔却正出自这个民主自身内部而做祟并显示出民主的不真实性。但在这个“宪法爱国主义”里，同样的“民族”仍始终作为正面的范畴存在着，它构成了所有非理性的危机解释和种族主义排外运动的中心基本概念。那些身着阿玛尼品牌西服的左派以此也像用它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的新自由主义自然化方法一样为社会思想意识的达尔文主义化做出了贡献。这在联邦德国再没有比在围绕改革国家公民权利的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红绿”联盟政府本来就已半心半意的计划反正也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编入法律中的德意志血缘和出身的共同体，而只是想作改动；在保守党为血缘权利大力和成功地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后，这份计划做出了一个丑陋的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联邦德国民主的种族基础。

另一方面，参加1968年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左派人士通过积极地关注“民族”问题而已经变成了一场新的种族统治和排外运动的讨论中的先锋。“德意志民族”被当作心爱的至宝，人们想用它来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时学生运动的一位前发言人贝尔恩德·拉贝尔（Bernd Rabehl）同霍斯特·马勒尔（Horst Mahler）一样，自称是后起的种族-民族预言家，这位霍斯特·马勒尔是“红军派”（RAF）的先驱和律师。在一场“右派的文化革命中”新右派和前左派的行动步调一致。

在这种气候下，“新中产阶级”的“宪法爱国主义”阿玛尼-左派奉行了拜金主义的准则，而转向种族主张的民族左派同新纳粹一道使对金钱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式的虚假批判死灰复燃，这样的批判最后导致谋杀。联邦德国越来越多的知名作家加入到这个民族-种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去。在文学家博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ß）以一场题为“渐强的山羊颂歌”的论战为从种族角度提出“资本主义批判”的反动动机和神话做出辩护以后，被德意志民族吹捧的小说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也奋力相助, 他在授予他“德意志图书业和平奖”时的发言颇具代表性: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负担, 过去的耻辱, 它没有一天不让我们受到责备……没有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否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事实, 没有一个头脑还有理智和承担责任能力的人还在吹毛求疵、喋喋不休地谈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忍; 如果我每天在媒体中因为这样的过去而遭谴责, 我发现, 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对这种连续不断地展示我们耻辱的做法的逆反心理。对于我们耻辱的这种无休无止的展示我并没有心存感激, 而是反而开始移开视线。我想明白, 为什么这段往事在这 10 年里展示得如此变本加厉。每当我发现自己内心有逆反心理时, 我都尝试去细听对我们耻辱的谴责; 而当我相信能够发现, 这种做法的动机常常不再是纪念, 不再是不应该忘记过去, 而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把我们的耻辱作为工具, 那我几乎感到高兴……有人认为, 我们克服德国的分裂造成的后果所采取的方式不好, 并且说, 这样使一个新的奥斯威辛成为可能。以往当分裂还在持续的时候, 权威的知识分子就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给分裂进行辩护……1977 年我必须在离这里不远的贝尔根-恩克海姆做一次演讲, 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 承认了以下的真实想法: ‘我认为难以忍受的是, 让德国历史——尽管它在过去时间里的结局很糟糕——以一个灾难性结果而告终’……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感到现在又一次要为自己的大胆直言而发抖: 奥斯威辛不适宜成为例行的威胁, 那随时搬出的威慑手段或者道德棍棒或者规定课目……”(Walser, 1998, 第 17 及以下数页)

瓦尔泽的这段演说不由自主地说明了, 一种德意志的“民族

认同感”今天只能导致人们“对不断地回忆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产生厌烦情绪。”乔装打扮的反犹太主义者固定的说辞是：“奥斯威辛是一种罪行，但是……”，这个“但是”隐藏着一个深渊——这差不多就是为重新犯罪的凶手事先开脱罪责和公开承认还有比奥斯威辛更重要的东西，即“德意志民族”。瓦尔泽感到自己“为大胆而发抖”，而他所说的事情事实上长久以来是“沉默的大多数人”形成的共识，并且现在从啤酒桌旁公开的议论中进入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公开讨论中。他由于潜心独自通过文学途径去发现民族的感情，没有注意到，（或者他不愿意注意到）他已认证了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危机传播的社会意识的某种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这场瓦尔泽争论如何加速了通过诺尔特争论而引起的这次雪崩。欧洲犹太学研究机构摩西·门德尔松中心的领导人尤利乌斯·舍普斯（Julius Schoeps）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瓦尔泽的影响和紧接着引起的争论：

“在德国有 15% 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此外还有 30% 隐蔽的反犹太主义者。如果他们像现在正发生的情况那样，总是忘乎所以地失去控制，那么每周我们就有 17 起亵渎犹太人坟墓的事件。在德国一般情况下一周有一起。” [Die Zeit (时代周报), 51/1998]

这个估计并不是夸张，在 1998 年圣诞节，我在大家庭的圣诞树下就经历了对这种现象的反应，这里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纳粹。但是在较晚的时候有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可以说反对一切的话，只是不能说反对犹太人的话”。这个妖怪不再是在偶然的一刹那从理智的睡梦中惊醒，由于有了诺尔特、瓦尔泽等人它在全德国又到处重新又开双腿坐在桌旁，并一直深入到各层中产阶级、工会成员和官员等阶层，首先进入到国

家的权利机关。几年前像瓦尔泽在 1998 年秋天所作的讲演在“祖尔坎普出版文化”的环境中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排除了在文学界反正也从来都是有气无力的经济批判以后，左派民主人士勉强地把与新民族主义人士和新种族主义人士展开的讨论只局限在文学语言和哲学的“最高层面”上。

每每总有一些新增的内容。连民主的明星和时尚哲学家彼得·斯洛特狄杰克 (Peter Sloterdijk) 也正处于从批评社会的反省转向社会现象的再自然化的过渡之中；他在 1999 年夏末以无辜的姿态对“人类公园的规则”发表意见，这是一场新生化学主义关于遗传学的“人体工程学”讨论的序曲。斯洛特狄杰克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 1989 年以前就和商品生产体系及其“劳动力市场”和自我毁灭的社会经济矛盾握手言和（如果说他曾对此感到过有问题）；在《经济周刊》中他甚至还作为哲学顾问为跨国管理装腔作势地出谋划策。于是，这位博古通今的哲学家不再在历史的背景下和通过探讨统治地位的秩序的论争来观察世界的问题；他让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并且把对问题的认识推移到缺乏历史观点的本体人类学上去。对此最终的绝佳途径是绕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后现代主义弯路。

对斯洛特狄杰克来说，我们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世界危机毫不相干，而是面临一个从“人类的自然本性”产生出的周期性危机；自霍布斯教父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想法又出现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斯洛特狄杰克谈论人类的“家养化”的话，那么他并不是将此用作一种社会退化和资本主义纪律的思想驯化的隐喻，而的确是字面上残忍的生物学意义；如同在已发表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里关系到的是“驯养”的事情 (Sloterdijk, 1999)。这样一种思想的结果不可能是社会拜物教状况的社会解放问题，不可能是摆脱资本主义纪律驯化和动员组织“邪恶的水平形式”

的纲领，而是恰恰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保护和塑造人的问题”（出处同上），是个什么“还使人驯服的问题”（出处同上）。看起来历史是这样，即便不是“各种各样的驯养者和各种各样的驯养方案之间的争吵”，却也表达了一个“没有主体的生物文化的漂移”（出处同上）。

“驯养人类”是正面的意思，这一点最晚在某一时刻也是会清楚的，那就是当斯洛特狄杰克把西方世界学校里的暴力浪潮完全不是当作资本主义竞争的野蛮形式来看待，而是当作一种预兆不祥的“失去自制力”状态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失控状态只能在物种特点的遗传基因改性发展前景中通过“精确的特征规划”（出处同上）有望能够获得“驯化的成果”（出处同上）。这曾是100多年来在每一次危机中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高收入者和人员管理者的市侩世界发出的最后一句话：将社会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同时生物化。

按斯洛特狄杰克的观点来看，这里谋求的不是从资本物神的“美妙机器”中摆脱出来的社会解放，而是“驯养者之间……的巨人之争”（出处同上），这种争斗让人马上想起施本格勒（Spengler）对于他的“钢铁般坚硬的纯种人”使用的同一种词汇。那就不再有什么养育了：“饲养人成为一个动物园政治的任务”，“人类保护艺术”应运而生，并以一个“专家王国”“在驯养方面的王牌知识”为基础，对“一个为了整体必须被驯养的精英进行特征规划”（出处同上）。这些只言片语根本不需要相互有任何联系就能准确被理解，即使斯洛特狄杰克好像只是介绍了尼采和柏拉图（Platon）的思想（无论怎样没作任何批评）。在这里发出一个独特的声音，它无需长期地等待就会有来自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巨大反响。斯洛特狄杰克还给这种畸形怪物标上“自愿”的记号，这个做法昭示了关于“人类保护和人类驯养”的讨论与边沁的自由主义和原始民主主义思想的亲缘关系，这

些畸形怪物本来会使他的珍品陈列馆更加充实。在用生物学的、遗传学方法（代替教育学的和惩罚性的填鸭式训练）来确定“行为熟练”时最可靠的行为方式是“自我控制”，而不是“解放”。

斯洛特狄杰克鼓吹得越起劲，就越清楚地表明，据他自己所称的这幅“哲学的夜景画”是怎样在某种程度上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灾难的内部讨论中渗透到他内心的。这种显而易见与“优生学”和“种族卫生学”不离左右的状况——这一点只是顺便和并不令人信服地被作者驳回，因为他的论证反正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世界大战时期危机格局的背景，这种危机格局现在以几倍的力度重现着——而且在一个生物技术的干涉威力更加强天无日的阶段。斯洛特狄杰克不再愿意表述社会的解放，并且许愿成为一个叫德伯奴瓦（de Benoist）的人精神上的兄弟，结果却降落到“超人”的“生物政治”上；他只是以此证明，如果谁不愿意沿着马克思的路线继续思考，谁就必须沿着边沁、德·萨德、马尔萨斯、达尔文和尼采的路线（按他们的分类方法把人类分成委以“统治使命”的精英、“人力资源”和“过剩者”）继续思考。

但是正因为这种思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经济限制没有概念，它也不理解，放弃谋求解放的社会政治而进行“生物政治”的基因操纵，即使它没有作为灾难结束（如同能够预见的一样），在统治技术上也必然是一场空。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不断熔化着“劳动的实质”并且不断地证实着价值利用的荒谬，根本不管人们现在是否自愿受奴役，或者完全愿意在“生物政治-基因技术”确定下来的这种形式里继续存在。后一种情况的结果将不是顺利地运转，而是被“驯养的”人与内战地区被遗弃的村落中牛的处境一样，因为没有挤奶牛会悲惨地死去。

即使从内部来看，“人类驯养”这个令人恶心的想法也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中的自相矛盾并不能够在

生物学上“被驯化出局”，无论是从主人方面还是从奴仆方面来看都如此。但是对一个通过遗传技术可再生产的“超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批判地反省和自我反省的能力无论如何不是一种生物功能，而是对社会过程做出分析处理的结果。通过基因操纵也许能达到的最高能力是能够跳到5米高，能够比今天任何一个人计算得快（但永远不会像一台电脑那样快），或者像某些鼠类一样对市场经济的有毒垃圾有抵抗力。把这些都放到自己身上的想法从反省的方面来看就已经要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为前提。这是一种何等“超人的”精英啊！斯洛特狄杰克用他的“生物政治”推理证明，他已经告别了反省的理智，转向在社会环境中肆行的自然科学的社会兽行上来。这是在社会危机竞争中为非人道主义化提供弹药，而不是铺筑通向任何一种未来的道路。

民主主义的哈贝马斯——知识界鉴于这种生物学的“查拉图士特拉”（尼采名著书名中使用的词——译者注）强烈的责任感鸣响了警报，可全然无效。所有这些兽行倘若不是来自他们喜爱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本身的怀抱又是从何而来呢？必要的应该是对只不过体现了盲目的资本主义金钱机器的自我压制形式的民主进行彻底的、谋求解放的批判，而且即便是民主主义的哈贝马斯知识界在原则上也从来没有对“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带来的奇耻大辱表过态；他们甚至都还不理解，为什么此中竟还存在着奇耻大辱。首先他们不愿意承认在逻辑上已确定的、不可逆转地急速逼近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自我毁灭局面，在这个局面中通过“劳动力市场”继续进行社会再生产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地“成为家养宠物”的知识界反对新的生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警报又有什么价值呢？丝毫没有。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回响，这种回响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知识阶层感到刺耳。1848年保罗教堂——民主冷清乏味的庆典向来否认正是在此地出现了走向纳粹主义的轨迹，“1848年



思想”是“1914年思想”的预备阶段，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民族主义结伴而行。于是左翼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今天再一次得到报应，因为他们从未果断地对现代商品生产体系做出根本性的批判。他们难道不应该去想一想，他们如今在“祖尔坎普出版文化”中不是已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与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生物学家互相呼应的书籍了吗？

为了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撞锤（包括由“红绿”联盟及其“合理要求”的英雄们组成的家养政党在内），为了反对新的种族民族主义和生物学主义，哈贝马斯只能高举经济奇迹时期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教科书，而他和同伴们却同时想把“联合的民主龙形海怪”的世界警察维和行动变成保证“人权”的一种新的“世界内政”（恰恰是借助于地毯式轰炸）。这一切都令人绝望地想起在冷战期间官方的居民保护机构建议的办法：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把公文包放置在脑袋上面。“民主政治”本身及其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花言巧语所包含的恰恰是在阿多诺看来都还是“祸患”和“蒙蔽”的内容，这样的“民主政治”正在劳动力市场——奴役到达终极点时转变成“生物政治”和“物种政治”的非人道幻象。斯洛特狄杰克大可讽刺嘲弄：“批判性理论已死亡”[Die Zeit（时报），37/1999]。这场违背人道主义的诺尔特-施特劳斯-瓦尔泽-斯洛特狄杰克的讨论产生于正在瓦解之中的现代派吵吵嚷嚷的内部自相矛盾中，并且无论如何为他们这边争取到了民主派人士的收视率，那些维护国家政权的、宣扬民主思想的、包罗种种历史和社会伪善的日耳曼族最古老的文字对于这场缺乏人道主义的讨论根本不是解毒药。

当然，这种格局绝不仅仅在德国出现，虽然其根源在德国。在世界各地，尤其在经济崩溃地区被民主说教所否定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继续生存的状况都转变成了一种民族的、“人种的”伪生物学的灭绝竞争。这种思想作为跨国企业经济的背面，在世界上

所有地区的各种种族妄想范畴内都极其活跃。但尽管如此，历史并不是以镜象倒影的方式重复出现。从错误地低估已构成威胁的野蛮行为的性质这一现状也可以看出民主的匮乏。19世纪前半叶的政治极权主义在战后的民主国家中并没有被作为经济极权主义的原型来理解，正因为如此现在似乎有直接重蹈覆辙的危险。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民主国家正在瓦解的经济极权主义分裂成虚假民主的碎片。

正是因为已走向衰败没落之路，资本主义社会的四分五裂趋势才不可阻挡。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也要经过恢复活力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模式的过滤。如果说最早的资产阶级对社会状况的自然化和生物学化在18世纪与19世之交就受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卫生学”的设想是在一个世纪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调控国家和现代化独裁政权的崛起而一起进入全盛期，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生物主义化、人种化和其余的竞争极端化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则成为采用其他手段的企业经济的继续。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已不再是用独裁或用民主的方式去创立一个社会单位、一种商品生产的普遍性。而甚至种族民族主义在跨国的危机社会里都悖论似的证实是一种邪教。独裁不再是普遍的奥威尔式整体结构，而是本身以单独的形式出现，因为它现在只能执行社会解体过程，而不是为一个社会的造形制作强制性的紧身衣。

由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关于“世界末日”的讨论在法国最为热烈，由此产生的种种结论辐射到欧洲。执掌国家政权的民主派的顺应时势主义和种族-生物学主义的幽灵讨论在德国占据着争议的论坛，而在法国，人们已更强烈察觉到政治领域中出现了近似乎于企业经济的衰落形式的新质。法国政治学家让-马里·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便顺理成章地谈论起“民主的终结”来，他尤为偏爱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衰亡之后出现一个遵

循“亚洲”的原则运行的新“帝国”的幻想。新帝国的结构应该忠实于控制论—系统论模型而“没有中心”，同时却以各自独立的结构保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交往形式：

“一个现代企业中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是极为孤立的，以至于他们之间不能团结一致，他们失去根基，以至于按社会阶级的观念下找不到他们归属何在的答案……一个群体中令人心旷神怡的温暖，既平等又简朴，这是一个自然的诱惑。如果有人认为民族是越来越抽象的设想，如果有人被排除在企业的一体性之外，如果有人被企业孤立而不被带进一个团体，那么这个群体对这个人来说可能就像一个自然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人又重新找到了他的认同感。这个现代人——没有国土的限制，是个‘游牧人’，然而被一种功能所束缚，被夺走了能够赋予他的工作一种意义的所在地，一个社会中能无穷尽地被再造的网点并且总是很孤独——此外还不得不在他的寻根过程中去找到他的特殊性。他需要这种特殊性，为的是能够与其他同样是‘特殊的人’一起共同分享一种共同的归属感。”（Guéhenno, 1994, 第70及以下数页）

即使这样的“民族设想”看起来是抽象的，它也能够以“群体”或说得好听点帮派的方式聚积起来，它们为此只不过需要一幅敌人的画像。资产阶级旧时关于灭绝问题的讨论出于跨国的领导精英们的立场针对的是由潜在的和明显的“过剩者”组成“危险阶级”的那些民众——而在这些民众本身之中，这种讨论也自行散布着对由某一个非理性的“我们”与要被灭绝的“他人”相对立的“微观社会”的定义。在全球化的企业经济条件下，这样的概念不再具有社会普及化的能力，充其量能成为像美国的里根、奥地利的海德尔（Haider）、意大利的贝鲁斯康尼

(Berlusconi) 或另一边英国的布莱尔 (Blair) 和德国的施罗德 (Schröder) 一类蛊惑人心的“媒体政治家”为自己捞取选票的手段。这样的一些有几分虚假的人物不是大众运动真正的“领袖”。而是在媒体的天下，经过了危机过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这样或那样的帮派团体，拥有许多“小领袖”，他们不再承担社会项目，不再有“王国”，不再有帝国要求。

将“他人”驱逐和灭绝的行为在“分子的”层面上同跨国企业经济的分化改组并行发生。这种达尔文主义化的分子形式能够假定出许多面孔。敌人画像和灭绝对象有着旧的和新的名字：犹太人、外国人、残疾人、有色人种、“对社会有害的人”、废人、劣等人……但是谁属于这类人，要由各帮各派来决定。这些人也可能是附近地区和另一个街区的邻居或其他互相争斗的帮派的成员。而且这些帮派的观念也必须广义地去理解。它们可能是青年帮和马路帮，普通的强盗帮，黑社会团伙，“民族”民兵组织和各类秘密帮派，但也有家庭氏族（主要在这个史前结构能公开在社会上继续存在的世界地区，比如说在近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宗教的异端派别。

那个生物主义的和种族问题的讨论与折中主义的、宗教主义的设想和一种乌七八糟的神秘教掺杂在一起。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并非新鲜事情，人们只要想一想埃里希·鲁登道夫那位“德国的克伦威尔”头脑里罕见的大杂烩就可以了。新鲜的是，这个乱糟糟的不同信仰和观点的调和混杂在全球化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社会形式上无法再调和成整体。新希特勒们仍是帮派、民兵组织或邪教的头目，并以分子的规模实行他们各自的恐怖统治。而在一些市区或地区，种族帮派或民兵组织正在驱逐追杀“其他民族的成员”，这些排斥和谋杀纲领经常同时导致宗教上的教派之争或者给它雪上加霜（如在科索沃、在高加索等地）。

长期以来，这些“分子内战”（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的现象已经蔓延到各工业核心国。不管是在原东德种族帮派营建武器库，在伦敦种族秘密联盟对有色人种进行爆炸袭击，还是在美国、瑞士等地唆使自杀和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引起轰动，年轻的黑巫师和希特勒的崇拜者进行“学校屠杀”等等：所有此类发展趋势都属同一类型。臭名昭著的自杀邪教表现了个体疯狂肇事、乱杀无辜者的帮派版本，宣扬世界末日的异端教派是这一版本带有攻击性的变体，它以完全没有目标的恐怖袭击超过了人种一种族主义的行为（当然这些教派也经常是有背景的）。即使是这些社会疯狂行为的头目也来自于社会的“中产阶级”。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因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而名噪一时：

“一些最有前途的和最有智慧的日本年轻人都属于这个邪教……有一件事情非常离奇：上郎文宏（Fumihiro Joyu），该邪教 32 岁的发言人，在此期间受到全日本青少年的青睐，一夜之前上升为第一号新闻名星。全日本的女孩和年轻妇女都爱上了这位外表英俊、能言善辩的、全国一所顶尖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工科毕业生……40 岁的邪教头目麻原彰晃（Shoko Asahara）因和地铁释放毒气有牵连，同邪教的 100 多名高层成员一起被逮捕。麻原……是一个榻榻米垫制作人家 7 个孩子中的第 6 个。他那些还很轻的助手都是日本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有东京大学、奎夫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当政府发现，日本军队的 30 名士兵也是邪教成员时，政府确实很震惊，也很尴尬……”（Naisbitt, 1995, 第 69 及以下数页）

这些形形色色的恶魔帮派既不是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淘汰者组成的，也不单单是一种从“圈内人”针对“圈外人”而展开的灭绝问题讨论中产生出现象，而是已经变得高度不稳定的社

会群体、性格和动机混合交织在一起。在民主国家根据“财政保留条件”退出的那些地方，处处都出现由恐怖行为占领的“灰色领土”，它以种种“分子”的形式补充并继续民主的国家统治。法国高级经理和政论家阿兰·明茨（Alain Minc）在这些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形式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中世纪”：

“自从黑格尔以来我们就相信，国家是一切社会组织自然的最终目的。谬误！现在正在出现国家像潮水一样违背其意愿地隐退的现象，并且放弃处理诸多很不寻常的现实情况……难道回到中世纪还有一条比穿过越来越多的位于任何法律权威之外的地区更短的道路吗？……突然间一切都颠倒了：大片的地区回归到一个自然状态；在最进步的民主国家中无视法律又在蔓延开来；黑社会看起来不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远古现象，而是成为一种日渐扩大的社会形式；在城市里有一些市区也不再处于国家权威管辖之下，而是陷入一种令人担忧的无国家状态……新的荷枪实弹的帮派团伙，新的抢劫者，新的‘未探明地区’：一个新的中世纪所需要的配料应有尽有……但是我们的机构尚未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变化：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占据了一个少数民族的位置，即使在西方，他们也会失去社会中越来越大的部分……”（Minc, 1994, 第71及以下数页）

这一类的反省在一个阴郁的表面上滑动推移。当然“中世纪”只是一个隐喻，并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我们用一个空洞的历史阶段概念描述为“中世纪”是一个农业文明，这里不对它的缺陷进行讨论，而米克和其他人描绘出的则是资本主义在它的快速“发展”的末期以怎样必要的方式释放出来的一个非文明化过程。如同所预料的那样，“毫不宽容”并不能满足这个社会，

而是成为加速它解体的因素。“安全机构”从内部开始坠落和腐败；它们与那些帮派团伙的差别越来越小。除了陷入贪污腐化并且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低工资的国家机关以外，跨国公司形成了自己的暴政文化。在中转区和跨国企业经济的“漂浮的岛屿”上出现了“非领土化的”国中之国，就像被牺牲掉的崩溃地区的“灰色地带”。

在思想普遍达尔文主义化和社会关系冷落恶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和民主”瓦解成单独的“争取生存”的竞争结构。不管是拥有私人军队和秘密警察的跨国公司，不管是雇佣兵和在生意中的冲锋队，还是“民族的”民兵组织、世界末日邪教或新纳粹集团：非文明化的版图已逐步形成，而媒体界却继续在装神弄鬼，夸夸其谈的民主讨论一天天地变得愚昧无知和空洞无物。正如资本主义机器的“第四权力”曾就一直位于民主之前那样，由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这部机器出现了不能修复的故障，它被置于帮派团伙的“第五权力”之后。谋求解放的起义并未出现，但是每个人开始武装自己。

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最终方法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句话并也是最后一句话。对此“世界末日”只是个相对的说法，因为在宗教和神话对世界崩溃的想象中总是包含着对一个更为年轻的世界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经济暴政制度的传道士们尽管面对着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引起的无法克服的世界危机，却也还没有预见到世界的末日。野蛮的仇怨竞争的那种“生物政治的”时代精神以施本格勒的形态获得重生；由新自由主义促成的世界末日或许会在人类社会“分子”形式的地区性毁灭中到来。资本主义这个被客观化为整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没落邪教所奉行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之后不应该再有另外一个世界来临。

## 跋

---

在资本主义“自我负责”的强制下被剥夺了对自己生活所拥有的全部自主权并且本身其实也就什么都不是的人们当看到自己的存在方式被证明是濒临绝境时，便不免要问是否有一个“处方”。他们的这般反应只证明了，他们仍然想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范畴里去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因为一个“处方”就已经设下前提：想要追求的自主权必须按照由一个外部的主管当局事先制定的范式来实行，因而这样的自主权也就否定了自己本身。应该提出的实际上不是以一种社会的积木式系统（这必然是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的社会工艺）为依据的“处方”，而应是解放的标准。“邪恶的水平形式”并不是以循序渐进地实施事先构思的纲领为开端，而是以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无耻的苛求的社会反叛为起点。

必须聚集汇合的是彻底的理论批判和反叛，而不是使人懦弱的“伦理”说教和要求对人实行“公正的”民主管理的呼吁。“社会公正性”的概念属于传媒政治家们哗众取宠的词汇，因而被用于如何用民主方式进行危机管理的讨论中。这一概念宣告的绝不是把财富的生产从荒谬的资本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宣称的正是在这种伪自然规律性强制下按照基督教新教方式“公正地”发放救济配给物品。所以在1999年7月，由基督教新教的



“劳动世界的教会服务站”为代表发起了一次倡议“为了大家而放弃!”的活动,并公布了所谓的“杜伊斯堡呼吁书”,它十分严肃地要求“对最高收入者也实行工资零增长”——“把雇员纳入放弃养老金的退休者行列的计划”必须“加上所有其他人团结一致的行动作为补充”[Nürnberger Nachrichten(纽伦堡消息)1999年7月30日]。仅以一个纯粹消极的“团结一致”来应对资本主义遭受的社会性自然灾害纯粹是愚蠢的念头,仿佛用普遍的“放弃”就能平息一个神灵的怒气一般。且全不去理论这种“放弃”在经济上的毫无意义(照此做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资金将不会从消费返回实际投资,而是转为投机泡沫),此类倡议表明,继所谓“批判的死亡”之后,喋喋不休地念叨而令人厌烦的伦理只能变成胡闹,而形不成对明火执仗的野蛮行径的反抗阵线。

然而,就是从货币“再分配”的积极意义上来说也不再会有所收获;凯恩斯主义在客观上已是强弩之末,全然无法通过道德的呼吁重整旗鼓;再分配伦理同放弃伦理一样地毫无意义。在九十年代的登台表演中就已越来越愚昧的整个伦理闹剧便是把无条件屈从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所以社会行为的伦理典范也摆脱不开作为无所不在的自身即目的运行方式的媒介而充斥社会空间的金钱的崇拜形式。但就算所有的亿万富翁都必须把他们的一部分钱财分给这个世界的穷人的话,上十亿忍饥挨饿的人中的每一员可能连一把米都得不到。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这种形式本身。

必须完成的任务感人至深地朴实无华。首先,要使用已实际和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生产资料 and 人的能力这些资源,来保证所有的人都过上一个美好和欢愉的生活,消灭贫困和饥饿。毋庸指出,若不是社会的组织形式从制度上妨碍了这一基本要求,这一切早就能轻易地实现了。其次,凡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调动起来

的资源应该停止灾难性地误流入毫无意义的金字塔工程和破坏性生产中去。不言而喻，这种既有目共睹又造成公害的误流也无非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第三，最终更加关系到根本利益的问题在于，把通过微电子生产力而大大增多的社会时间储蓄等量地转换为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闲暇，而不是一方面制造“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却又加剧工作的紧张程度。

如此显而易见并且本来无需提及的一切却在社会意识中被排斥得无一席之地，似乎对此曾颁布过有魔力的禁令似的，这就像一个不合情理的童话中的情节，在此之中，荒诞不经之事成为常情，理所当然之物反倒令人费解。哪怕只是稍许有意义地使用公共资源就会与资本主义的形式格格不入，这是明显之极的事实，尽管如此，被提交讨论的都只是那些只还以资本主义形式为前提的“方案”和行动方式。

这里既不存在一个物质上的问题，也不牵涉到一个技术或组织上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意识问题。为了能够文明地生存下去，人类必须摆脱自由主义及其边沁思想体系的洗脑，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进入思想深处的盲目的金钱机器的强制和苛求清除出去，旨在能够绝无偏见地处理现有资源和它们在社会中理智的应用之间的关系。这将意味着，不再想把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范畴和标准以任何其他的组合形式搭配编排，而是断然废除取消。抽象“劳动”、企业经济的合理性、增长的逼迫和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营，在货币资本及其“利用”的自身即目的运行方式的指导思想下通过“劳动市场”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这个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制度体系只能被终止。这就需要在全世界的社会经济中有一场“捣毁机器运动”来对抗事实上十分丑恶的资本世界机器，以在资本世界机器最终爆炸并把尚存的人类文明残余与其一道拖向毁灭之前使它停止转动并彻底报废。

这个任务如同一个迷信的“野蛮人”（而真正的“野蛮人”

是被资本主义奴化了的现代人)面临的任務,只有当他突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毫无意义的禁区时,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这个禁区即是由抽象“劳动”(为匿名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货币形式的收入和符合“购买力”的商品消费所构成的奉若神明的三部曲。“货币之谜”的戈尔迪结(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译者注)是无法解开的,只能用利剑劈断。当然,至今还未见有任何这样去突破禁区的迹象。就像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人们常常宁可挨饿,也不向专横跋扈的金钱机器屈服那样,这部机器的驯服的人力资源在今天似乎也宁愿挨饿,而不愿摆脱灌输在他们脑子里的崇拜金钱的主观态度。然而,对作为资本而以自身为目的的货币的批判,也即对社会性偏执狂这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假象的批判仍然幽灵般地出没在危机之中。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罗马俱乐部”的两位经济学家——奥瑞欧·加里尼和帕特里克·M·李德克为何写下了一段针对一个根本看不见的敌对者的奇怪的话,来为他们的强制劳动和低工资方案作辩护:

“梦想返回到上一个世纪的旧时乌托邦或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的新型乌托邦中去都是无稽之谈。货币是文明的诸多杰作之一,因为货币的出现才使真正的进步成为可能。当然,人的本性决定了货币……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但同样应该清楚的是,从前曾有过的那些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的旧时乌托邦实际上是无意识地尽力逃避当今的现实和机遇,它们只是反映出对新的改善可能性做出的反抗。不管编造出什么样的神话,一个石器时代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尤其是在一种人与人之间极为密切地相互依赖的景况下;倘若果真如此,极有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眼下的经济体系大部分建立在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对此我们并不想作任何改变——,至关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自获得一定数额的

货币，以保证生活之必需……”（Giarini/Liedtke, 1998, 第191及下页）

如果在一场影子交锋中向批判货币崇拜的幽灵迎面抛去的论据如此之无力，那么这个幽灵就必然会引起极度恐慌。直到现代化开始时，对于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之间进行的多余产品或者（在远程贸易中）诸如丝绸、金属等特殊物品的交换来说，货币一直是完全次要的媒介物，而日常的再生产绝大部分都是在完全没有货币和市场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进行的。17世纪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中的绝大多数发明和文明成就的产生与货币形式全然无关。经济学家们只愿意以货币形式来表达“真正的进步”只不过是表明他们的拜物教的一个标志，照此说来，耕作、畜牧、轮子、文字、绘画和无数其他的成就似乎肯定是“非真正的”进步了。但货币之所以变成了日常的社会关系形式绝不是因为任何人类的进步，而只是通过早期现代的军事独裁统治政体用以把人变成满足他们金钱欲望的工具而强行和血腥地建立的“劳动力市场”。

无数匿名市场构成了一部非理性的社会机器，作为这部机器“自由的”制度奴隶，社会成员们必须服从自成一体的货币资本的流通规则，直到在社会生活中自暴自弃的程度，这种状况今天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恰恰没有“独立的生产者”像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所极力捏造的那样，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货币这个媒介物“交换”其产品的。相反，这是一系列高度社会化的成套机制，其中人已不再是相互隔绝地以家庭经济的方式，而是在直接的社会协作中进行其再生产。而正是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再生产受控于一种形式或一种媒介物，这种媒介物原本只在真正独立的家庭经济之间的关系中才具有表示关联和中介的意义！

也就是说，各种直接的社会成套机制中“极为密切的相互依赖性”恰恰与这种货币形式格格不入，它在此情况下就像同一幢

楼房里的居民们只可以用卫星电话相互交流一样不合情理。在如此高度的社会化情况下，货币形式也就不成其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形式，而相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听凭一个飞速运行着的、没有交流和无法与之对话的事物的摆布。想把对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的批判说成是“石器时代社会”的“神话”是何等厚颜无耻的歪曲！这些经济学家们以此又一次证明了，他们之所以想把“无需货币”的幽灵独与极度的蒙昧相提并论，是因为摆脱资本主义的自身即目的状态超出了他们充斥着拜物教的理解力。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吧能想象得到的所有批判拜物教的代表人物都先人为主地当作“无意识地”“躲避”现代化“机遇”（直言道来即是强迫劳动和低工资）的精神不正常者来对待。因为“我们眼下的经济制度”以“使用货币为基础”，所以不应该对此有丝毫改变；因其如此，便该如此，这样的同义反复空洞论据表明了维护资本主义论证的技穷处境。

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即便由于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而货币或许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之间用以交换的媒介物，它也至少是一种“业绩尺度”，这种看法同样是从来就站不住脚的。从早先的占领者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大笔财产无一不是以凶狠残忍和暴殄天物的“业绩”积聚而成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的“业绩”也无非是一方面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又自我压抑的同义词，而且一贯与没有交流的、极度不合理的行为方式息息相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这个不合理的业绩概念本身就证明是荒谬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个人意义上的业绩概念，因为真正的生产潜力早就存在于科学化和社会成套机制之中了。博彩资本主义的膨胀使把货币形式当作“业绩尺度”的作法显得越发可笑。

经济学家们面对批判货币的幽灵的惊恐不安也体现在他们牵强附会地提到所谓“过去的世纪里”曾有过的“旧时乌托邦”。事实上，对货币形式持之以恒的批判迄今为止除了“深奥”的、

被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排斥的马克思理论的观点之外从未出现过。且不去看那些反对“不义之财”的道德说教长篇大论，无论是乌托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从未对货币物神本身进行过批判，而只是在货币的替代品上，或如何通过国家—“龙形海怪”的作用使这种不可消除的社会形式达到适度的做法上下功夫。然而对货币物神的彻底批判绝非在其体现形式上肤浅地“取消货币”，而是要取消为这种形式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也就要取消由抽象“劳动”、“劳动力市场”、企业经济合理性和匿名商品市场所构成的制度，而涵盖它们全部的、自身即目的的媒介物就是货币。

真正的问题在数百年的驯化之后现在才暴露无遗，加里尼/李德克无意中用“返回新的乌托邦”这个罕见的措辞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事实上这是一种“返回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地将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反对抽象“劳动”恐怖制度的社会反叛运动都失败了。当然不可能返回这些社会格局中去，并且不可能再以这些反叛运动的状态为出发点。但在一个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新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早已无法以独立的家庭企业形式来组织的生产力纳入社会成员之间自觉交流的形式中去，而不是受控于一个盲目和匿名的机制。

单是这个理智想法的幽灵就已被加里尼/李德克说成是“通往灾难之路”。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资本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和普遍的货币经济构成的制度已经走进了灾难。“看不见的手”盲目地四处挥动着，摧毁了一切文明的最低水准，正是由于人的能力所及被提到高之又高的地步！当务之急不是实现那个空想的和“非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而是相反，必须要中止已成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反面乌托邦在其社会经济中的残害无辜，旨在通过有意识的社会交流脱离货币不合情理的教条并切实第一次务实地（既不是依据一个丧失意义的、把需求置于不顾的拜物规

则) 探讨资源和生产力的合理使用。

经济学家们已经在公理上摈弃了这个最基本的理智想法；他们的“反面现实主义”也就能以“美妙机器”的范畴体系为基准，对他们来说，这部美妙机器与社会性在根本上就是一回事。与此息息相通的当然还有他们邪教式的传教士知识构成的“人文资本”。一旦人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机器中解放出来，那么近 300 年来的全部经济学文献连同它的社会基准体系会一下子变得几乎“分文不值”。这个以书面文献确定下来的思想体系就会成为历史文物，犹如古埃及的亡灵书或者马雅人的祭祀仪式。丝毫不能指望经济学家们会对经济学进行必要的批判而使其免遭此劫。

就资源的使用进行持久不断的社会性探讨的想法已经指出了一种有可能取代“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机构框架：那就是各种“委员会”，即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再生产的所有层面上进行商议的大会，简而言之就是聚集在一起，亲自过问各种事务，无需长期受资本主义人员管理的折磨和在并无灾荒的情况下接受可笑的灾荒救济配给物品——只有在这里才能启动“邪恶的水平形式”。历史上自巴黎公社以来的那些“委员会”总是瞬间即逝，导致这类尝试失败的原因是，它们仍然困于抽象“劳动”、货币形式、市场中介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范畴，也就无法提出自己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拜物形式的观点。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委员会”的确更能取代货币形式和匿名市场。微电子技术同时为此提供了建立全方位通讯网络的可能性，有了这个通讯网络便能轻易地推翻“垂直形式”人员管理的所有统治中心。

为了让“邪恶的水平形式”能够起步，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清谈文化”，这正是使福特和列宁感到不寒而栗的那种永无休止的“胡说八道”，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美妙的社会机器。这恰好意味着：谈论和斟酌一切，而不是屈从于一部盲目的和破坏性的抽象业绩机器，并成为它的一个小轮子去转动。能用来清谈的时间

会绰绰有余，这甚至不仅仅是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的原因，而且也因为在这样的前景中只是为维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毁灭性和无意义的生产将会永远终止（从货币管理到令人神经崩溃的“广告”媒体的喧闹）。

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在刚开始的 21 世纪能够在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社会中形成一个思想和组织的聚焦点，它敢于提出一种彻底的批判，并使之形成一个清晰的轮廓。有可能去这样做的仍然只是最广义的左派。但就真正的任务而言，自 80 年代以来的方向却是与此背道而驰。原本就局限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左派从国有社会主义的结局中得出完全不恰当的结论：理论上解除武装和广泛放弃社会批判，为了去争当赢利逻辑的优等生。身着阿玛尼品牌西装的执政左派的才智和道德堕落在此期间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他们已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社会萧条和境况恶化在整体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绝大部分的左派在各处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潜伏阶段。回转并面对 90 年代灾难性经验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左派必须清楚，他们绝没有“过于激进”，而相反是一直不够激进。当务之急不是更加努力去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相反是与这种规律决裂。左派必须批判自己的历史，揭示自己与资产阶级世界间先天的紧密关系并摆脱这种关系。只有当这些左派在资本主义历史最后终结时获得冲出“市场经济和民主”铁笼的勇气时，过去百年中在制度内部的斗争才不会是徒劳一场；而在过去的这些斗争中，左派总是不过暂时地从资本主义那里争得了从未足够的、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馈赠和对最恶劣苛求的限制。

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当然这就非得要逆着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纹理对它进行梳理并最终把它作为对各种商品生产体系的现代拜物教的彻底批判来领会。社会解放的思想必须停止使自己一再受自由主义诱



惑而上当受骗和在市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两极之间往来奔波。市场和国家是同一奖牌的两面，而在国有社会主义崩溃之后便把市场认定为“舍此无它”，似乎国有资本主义是对竞争系统的惟一可能的批判，这是一个整脚的借口。真正的其他途径是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委员会制度的“邪恶的水平形式”自行管理社会；而这样一个自行管理不仅是国家的，而也就同时是市场的对立面。

当然，也只有不再为“现代化”的虚假进步概念所迷惑的观点才可能这样去重新表达彻底的批判，而这个虚假的进步概念如今已彻底暴露出其是社会退化、贫困和分裂的代名词的真容。左派们固守着从来都一直只是意味着盲目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现代化”，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像巴比伦监禁那样禁锢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之中。自从以往的社会反叛运动的“反现代”言行被自由主义的恐怖统治政权血腥扼杀以来，社会解放思想就再也未能建立起其阵地来对抗把屈从于现代制度奴役行为兜售成自由的化身的启蒙运动哲学阴险的“新言语”和“双重信念”。取代了谋求解放和社会反叛的反现代运动的是那种反动和“右翼”的反现代运动，它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本身的一种衍生物。这种右翼的对现代的假批判使资本主义得以释放出异常的能量；它从来就只是昭显资产阶级合理性自身的非理性主义，目的是为了“现代化”的屠杀而把现代的阴暗面当枪来用。

把一个本应由左翼来主导的、良好的和有启蒙思想的现代与一个向往某种虚幻的“中世纪”的、消极和似乎是反启蒙思想的反现代错误地加以对照，这无疑是个圈套。就是从这点来看，涉及的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本身的两极。如今在跨入21世纪之际时需要一个新的“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它不再让自己受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对立面利用和愚弄，而是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度上向整个现代化历史宣战。这种思想必须无所畏惧，因为一个新兴的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与反动的伪反现代运动之间肯定

是泾渭分明，并永远不会与那些德伯努瓦之辈同流合污。

右翼的反现代运动总是非理性的和生物学主义的，它们将自由主义的社会自然主义延伸到达尔文主义的种族和民族神话中。而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则与此相反，它只能与各种使社会因素自然化的主张做出决裂；社会被它理解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层面，只能在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范畴中加以解释。右翼的反现代运动总是反对团结一致，排斥异己和大谈灭绝的主意，它只是用其他手段延续竞争的方式。反之，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同样也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体系全面决裂，它超越一切隔阂把团结一致提到中心地位。此外，右翼的反现代运动总需树立精英和权威，其组织形式是“领导者原则”，从而是资本主义意义上“顺从的垂直形式”的极端形式。而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在这方面同样是背道而驰，它启用“邪恶的水平形式”，坚持反精英、反权威和社会反叛精神。

所有的对立归根到底是都与所谓的“民族”这个资本主义的发明和实际范畴有关：右翼的伪反现代运动之所以是构成现代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因为它总是把“民族”选作他们的核心基准域，并给这个概念添上浓厚的神话色彩，尽管这一点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以媒体策划的形式或者另一方面以凶残的帮派意识形态的形式才做得到。相反，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要真正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只能义无反顾与“民族”的范畴和坚持不懈地宣布放弃任何对民族的忠诚，以使自己从一开始就以跨越民族的关系形式组织起来。与“国籍”的决裂是左派能否成功地冲破“铁笼”的难解之题，因为最晚自1848年以来，囿于“民族认同感”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作法就如同坚牢的脚镣，把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拴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体系中。

至于超越市场和国家的新一类彻底的资本主义批判如何作为谋求解放的反现代运动而能够成为社会性的大众运动，提出这个

问题几乎是多余的。因为这是一个只能取决于行动的问题。其前提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创新，它应向对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形式的批判迈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位于这些形式“之中”发表见解。另一方面，需要正规的起义，需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危机管理方式及其引向穷途末路的民主式强制劳动和低工资奴役的叛逆行动。“决不要低工资！”的口号可能最终转变为“推翻工资制度！”，并超越惨淡经营、难以维持的民主政治，形成一场社会反向运动的基本元素。在即将到来的年代里的社会动荡中最快捷的途径也许是通过一场大众运动来占领生产企业、管理机构和公共设施，这场大众运动直接获取社会的势能和在自己的管理下进行全部再生产，也就是罢免和废除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垂直形式的”各种机构。也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形成一种对立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个对立社会开辟出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悖的、不给市场和国家提供立足之地的特定社会空间。

当然，目前最有可能的是，这个未来乐章真的也无从奏起了，因为一个新的社会解放运动所必需的“意识飞跃”不会再发生。但资本主义仍然无法继续生存，因为它内在的局限同样盲目地被客观化了，就像那部“美妙机器”自戕的运行机制一样。如果这个彻底的反向运动不出现，那么结果便是不可阻止的世界性文明退化败落，就像现在已到处可见的那样。即便如此，少数人总还至少可以拥有一种拒绝文化。既然经济的恐怖统治制度的毁灭和自我毁灭进程已经不可阻止，那就依然要遵循批判理论的座右铭：不因自身的力不从心而使甘受愚弄。以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只能意味着，拒绝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分担任何责任，只是“照章办事”而已，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阻挠资本主义的运转。哪怕只有很少的人在资本主义崩溃过程中能够在精神上与之不断保持着距离：成为自己国家的流亡者也总还是强于随声附和民主政治的空洞说教。即使再别无他物有自由可言，思想总是自由的。

## 参考文献

- Abel, Wilhelm (1981): Stufen der Ernährung. Eine historische Skizze, Göttingen
- Abelhauser, Werner/Faust, Anselm/Petzina, Dietmar (Hrsg.), (1985):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914 – 1945.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München
- Abendroth, Wolfgang (1965):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Main
- Abendroth, Wolfgang (1985):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Band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33, Heilbronn
- Abosch, Heinz (1986): Jean Jaures. Die vergebliche Hoffnung, München-Zürich
- Adler, Georg (1897): Die imperialistische Sozialpolitik. D'Israeli, Napoleon III., Bismarck, Tübingen
- Adorno, Theodor W./Horkheimer, Max (1997, zuerst 1944):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Darmstadt
- Adorno, Theodor W. (1983, zuerst 1951):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Main
- Aldcroft, Derek H. (1978): Die Zwanziger Jahre. Geschichte der Weltwirtschaft Band 3, München
- Altwater, Elmar (1998): Wer reitet den Tiger der Weltfinanzen, in: Freitag 4/1998
- Anders, Günther (1987, zuerst 1977):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2,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ünchen
- Arendt, Hannah (1989, zuerst 1958): 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 München
- Arendt, Hannah (1991, zuerst 1951):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itärer Herrschaft, München/Zürich
- Baier, Lothar (1998): Toleranz gegen Null, in: Freitag 13/1998
- Baumunk, Bodo-Michael/Rieß, Jürgen (Hrsg.), (1994): Darwin und Darwinismus. Eine Ausstellung zur Kultur- und Naturgeschichte, Berlin
- Bayertz, Kurt s. Weingart, Peter

- Bebel, August (1946, zuerst 1910): *Aus meinem Leben*, 3 Bde., Berlin
- Becher, Ursula A. (1990):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Lebensstils. Essen-Wohnen-Freizeit-Reisen*, München
- Beck, Ulrich (1990): *Freiheit oder Liebe. Vom Ohne-, Mit- und Gegeneinander der Geschlechter innerhalb und außerhalb der Familie*, in: Beck, Ulrich/Beck-Gernsheim, Elisabeth,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Frankfurt/Main
- Bell, Daniel (1985, zuerst 1973): *Die nach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Frankfurt/Main
- Bender, Christiane/Graßl, Hans (1997): *Dienstleistungen und ihre technische Reproduzierbarkeit. Die »McDonaldisierung« erfaßt immer mehr Bereiche der Ökonomie*,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4.10.1997
- Benoist, Alain de (1983): *Aus rechter Sicht*, Tübingen-Buenos Aires-Montevideo
- Bentham, Jeremy (1981, zuerst 1843): *Zur Philosophie der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 in: Gall, Lothar/Koch, Rainer (Hrsg.): *Der europäische Liberalismus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 Bentham, Jeremy (1995, zuerst 1791): *The Inspection-House*, London
- Bergmann, Anna (1992): *Die verhütete Sexualität. Die Anfänge der modernen Geburtenkontrolle*, Hamburg
- Bernstein, Eduard (1969, zuerst 1899):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Reinbek bei Hamburg
- Berthold, Werner (1960): *»...Grosshungern und Gehorchen«*. Zur Entstehung und politischen Funktion der Geschichtsideologie des west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tersucht am Beispiel von Gerhard Ritter und Friedrich Meinecke, Berlin
- Bieber, Hans-Joachim (1981): *Gewerkschaften in Krieg und Revolution. Arbeiterbewegung, Industrie, Staat und Militär in Deutschland 1914 - 1920*, 2 Bde., Hamburg
- Blaich, Fritz (1985): *Der Schwarze Freitag. Inflation und Weltwirtschaftskrise*, München
- Blech, Jörg (1997): *Arme sterben früher. Der Körper antwortet mit Krankheiten auf soziale Not*, in: *Die Zeit*, 17.10.1997
- Bode, Peter M./Hamberger, Sylvia/Zängl, Wolfgang (1986): *Alptraum Auto. Eine hundertjährige Erfindung und ihre Folgen*, München

Braudel, Fernand (1990, zuerst 1979): Sozialgeschichte des 15. – 18. Jahrhunderts, Bd. 2, Der Alltag, München

Braverman, Harry (1977): 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t/New York

Brenner, Otto (1965): Automation und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Automation. Risiko und Chance, Bd. I, Beiträge zur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agung der 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über Rationalisierung, Automatisierung und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Frankfurt/Main

Bude, Heinz (1995): Die Herrschaft der globalen Spiel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12.1995

Buhl, Dieter (1999): Die SPD stellt sich. Soziale Gerechtigkeit – aber wie?, in: Die Zeit 32/1999

Burckhardt, Jacob (1978, zuerst 1905):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Stuttgart

Burgard, Roswitha/Karsten, Gaby (1981): Die Märchenonkel der Frauenfrage: Friedrich Engels und August Bebel, Berlin

Burnham, James (1948, zuerst 1941): Das Regime der Manager, Stuttgart

Burnham, Colin (1991): Der Käfer. Legende, Leistung und Geschichte, Hamburg

Burwitz, Hiltrud/Koch, Henning/Krämer-Badoni, Thomas (1992): Leben ohne Auto. Neue Perspektiven für eine menschliche Stadt, Reinbek bei Hamburg

Capra, Frank (1992, zuerst 1971): Autobiographie, Zürich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1934, zuerst 1899): 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d. I, München

Clausen, Sven O. (1998): Null Freizeit. Auch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Kinder, weil sie Geld verdienen müssen, in: Die Zeit 20/1998

Claussen, Detlev (1994): Was heißt Rassismus?, Darmstadt

Comte, Auguste (1933, zuerst 1881): Über den Geist des Positivismus, Stuttgart

Coy, Wolfgang (1985): Industrieroboter. Zur Archäologie der zweiten Schöpfung, Berlin

Dahrendorf, Ralf (1983): Wen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die Arbeit ausgeht, in: Matthes, Joachim (Hrsg.),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21. Deutscher Soziologentag, Opladen

Dahrendorf, Ralf (1984): Hasardspiel mit der Zukunft. Zwischen Wohlstand und Bankrott – die Ökonomie des Als-ob; in: Die Zeit 3/1984

Dahrendorf, Ralf (1992): 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 Essay zur Politik der Freiheit, Stuttgart

Daniel, Ute (1996): Der Krieg der Frauen 1914 – 1918. Zur Innenansicht des Ersten Weltkriegs in Deutschland, in: Hirschfeld, Gerhard/Krumreich, Gerd/Renz, Irina (Hrsg.), »Keiner fühlt sich hier mehr als Mensch...«. 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 Frankfurt/Main

Darwin, Charles (1995, zuerst 1859):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 durch natürliche Zuchtwahl, Stuttgart

Darwin, Charles (1986, zuerst 1871): Die Abstammung des Menschen und die geschlechtliche Zuchtwahl, Wiesbaden

Davis, Mike (1986): Phoenix im Sturzflug.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Berlin

Decker, Will (1933): Der deutsche Weg. Ein Leitfaden zur staatspolitischen Erziehung der deutschen Jugend im Arbeitsdienst, Leipzig

Deist, Wilhelm (1976): Flottenpolitik und Flottenpropaganda. Das Nachrichtenbureau des Reichsmarineamtes 1897 – 1914, Stuttgart

Deneke, Bernward (Hrsg.), (1987): Geschichte Bayerns im Industriezeitalter in Texten und Bildern, Stuttgart

Desmond, Adrian/Moore, James (1995): Darwin, München-Leipzig

Deuerlein, Ernst (1970): Die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iederichs, Friedemann (1999): Zur Strafe: Schäm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Stunde der Schande ist beliebtes Spektakel, in: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8.6.1999

Diehl, Karl/Mombert, Paul (Hrsg.), (1984): Sozialpolitik. Ausgewählte Lesestücke zum Studiu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Dreßen, Wolfgang (1982): Die pädagogische Maschine. Zur Geschichte des industrialisierten Bewußtseins in Preußen/Deutschland,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Dutschke, Rudi (1968): Die Widersprüche des Spätkapitalismus, die antiautoritären Student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Dritten Welt, in: Bergmann, Uwe/Dutschke, Rudi/Lefèvre, Wolf-

gang/Rabehl, Bernd,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Reinbek bei Hamburg

Eckermann, Erik (1989): *Vom Dampfwagen zum Auto. Motorisierung des Verkehrs*, Reinbek bei Hamburg

Ehmer, Josef (1984): *Der Betrieb – ein latentes Konfliktfeld. Inhalte und Formen der Arbeitskämpfe*, in: Sauer, Walter (Hrsg.), *Der dressierte Arbeite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swelt*, München

Ehrlich, Paul (1971, zuerst 1968): *Die Bevölkerungsbombe*, München

Eiler, Klaus (Hrsg.), (1984): *Hessen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Text- und Bild-dokumente aus hessischen Archiven*, Frankfurt/Main

Eltzschig, Johannes (1997): *Sparen bei der Unterhose. Die »Wäschewechselhäufigkeit der unteren Einkommensgruppen« treibt Minister Seehofer um*, in: *Junge Welt*, 4.4.1997

Engelmann, Bernd (1980): *Geleitwort*, in: Kroneberg, Lutz/Schloesser, Rolf (Hrsg.), *Weber-Revolution 1844. Der schlesische Weberaufstand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Publizistik und Literatur*, Köln

Engels, Friedrich (1976, zuerst 1845):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in: *Marx Engels Werke (MEW)*, Bd. 2, Berlin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964): *Bewußtseins-Industrie*, in: ders., *Einzelheiten I*, Frankfurt/Main

Fabianke, Günter (1955): *Zur historischen Rolle des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en Friedrich Lis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Deutschland*, Berlin

Faust, Anselm s. Abelhauser, Werner

Ferro, Marc (1988, zuerst 1969): *Der Grosse Krieg 1914 – 1918*, Frankfurt/Main

Fischer, Wolfram (1992): *Die Industrialisierung und ihre Probleme*, in: Borst, Otto (Hrsg.), *Auf-ruhr und Entsaugung. Vormärz 1815 – 1848 i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Stuttgart

Flechtner, Hans-Joachim (1984, zuerst 1966): *Grundbegriffe der Kybernetik.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Ford, Henry (1922): *Der internationale Jude*, Leipzig

Ford, Henry (o.J./1923): *Mein Leben und Werk*, Leipzig



- Ford, Henry (1930): Und trotzdem vorwärts!, Leipzig
- Forschepepe, Fritz (1938): Friedrich List, in: ders. (Hrsg.), Friedrich List, Um deutsche Wirklichkeit, Seine Schriften in Auswahl, Stuttgart
- Foster, David (1997): Alle fünf Tage stirbt ein arbeitendes Kind. Trotz gesetzlichen Verbotes arbeit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ogar Vierjährige, Associated Press (AP)
- Foucault, Michel (1977),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Frankfurt/Main
- Fourastié Jean (o.J., zuerst 1965): Die 40000 Stunden. Aufgaben und Chancen der sozialen Evolution, Frankfurt/Main, Wien, Zürich
- Friedman, Milton (1971, zuerst 1962): Kapitalismus und Freiheit, Stuttgart
- Friedman, Milton (1976, zuerst 1969): Die optimale Geldmenge und andere Essays, München
- Friedman, Milton (1992): Geld regiert die Welt, Düsseldorf
- Fries, Helmut (1994): Deutsche Schriftsteller im Ersten Weltkrieg, in: Michalka, Wolfgang (Hrsg.), Der Erste Weltkrieg. Wirkung, Wahrnehmung, Analyse; München
- Fukuyama, Francis (1992):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Wo stehen wir?, München
- Gabriel, Susanne (1998): Das Geld reicht hinten und vorne nicht aus. Die französischen Arbeitslosen bekommen lediglich eine knapp bemessene Unterstützung, Associated Press (AP)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89, zuerst 1954): Der große Crash 1929. Ursachen, Verlauf, Folgen, München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95):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in Augenzeuge berichtet, Hamburg
- Giarini, Orio/Liedtke, Patrick M. (1998): Wie wir arbeiten werden/Der neue Bericht an den Club of Rome, München
- Gide, André (1964, zuerst 1911): Corydon. Vier sokratische Dialoge, Frankfurt/Main
- Giedion, Siegfried (1987, zuerst 1948): Die Herrschaft der Mechanisierung. Ein Beitrag zur anonymen Geschichte, Frankfurt/Main
- Geinitz, Christian (1996): Aufbruchstimmung erfaßte das ganze Bürgertum. 300 Unternehmen der »Gründerjahre« haben überleb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7.1996

Glucksmann, André (1976, zuerst 1974): Köchin und Menschenfresser.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Staat, Marxismus und Konzentrationslager, Berli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982, zuerst 1821):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Frankfurt/Main

Goldberg, Jörg (1988): Von Krise zu Krise. Die Wir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im Umbruch, Köln

Gottl-Ottlilienfeld, Friedrich von (1926): Fordismus, o.O.

Gould, Stephen (1990): Die Entdeckung der Tiefenzeit. Zeitpfeil oder Zeitzyklus in der Geschichte unserer Erde, München-Wien

Gramsci, Antonio (1967, zuerst 1926-37): Philosophie der Praxis. Eine Auswahl, Frankfurt/Main

Graßl, Hans s. Bender, Christiane

Grebing, Helga (1979):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Ein Überblick, München

Guéhenno, Jean-Marie (1994): 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und Zürich

Habermas, Jürgen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Zur Kritik der funktionalistischen Vernunft, Frankfurt/Main

Habermas, Jürgen (1990, zuerst 1984): Die Krise des Wohlfahrtsstaates und die Erschöpfung utopischer Energien, in: ders., Die Moderne –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Leipzig

Habermas, Jürgen (1987): 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in: »Historikerstreite«.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Zürich

Haecckel, Ernst (1960, zuerst 1899): Die Welträtsel.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 Berlin

Hahn, Carl H. (1989): Heute ist das Gütesiegel des »Made in Germany« noch weltweit gefragt, und dabei sollte es auch bleiben; in: Handelsblatt, 4.7.1989

Halfmann, Jost (1984): Die Entstehung der Mikroelektronik. Zur Produktion technischen Fortschritts, Frankfurt/Main, New York

Hamberger, Sylvia s. Bode, Peter M.

Harris, Michael (1965):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die Tätigkeit der Organisatio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OECD), in: Automation. Risiko und Chance, Bd. I, Beiträge zur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agung der 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über Rationalisierung, Automatisierung und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Frankfurt/Main

Havel, Václav (1992): Sommermeditationen, Reinbek bei Hamburg

Hayek, Friedrich A. von (1945): Der Weg zur Knechtschaft, Erlenbach-Zürich

Hayek, Friedrich A. von (1976, zuerst 1952): Individualismus und wirtschaftliche Ordnung, Salzburg

Hayek, Friedrich A. von (1979): Wissenschaft und Sozialismus, Tübingen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92, zuerst 1837):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n: Werke Bd. 12, Frankfurt/Main

Heinen, Jacqueline s. Maheim, Annik

Heuser, Jean/Martens, Erika (1998): Zwischen Zwang und Spaß. Gibt es staatliche Unterstützung künftig nur noch gegen Arbeit?, in: Die Zeit 10/1998

Heydecker, Joe H. (1997): Der Große Krieg 1914 – 1918. Von Sarajewo bis Versailles, Berlin

Hinrichs, Peter/Peter, Lothar (1976): Industrieller Friede? Arbeitswissenschaft, Rationalisierung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öln

Hippel, Wolfgang von (1992):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Borst, Otto (Hrsg.), Aufbruch und Entsagung. Vormärz 1815 – 1848 i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Stuttgart

Hirsch, Joachim (1995):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Staat, Demokratie und Politik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Berlin

Hitler, Adolf (1942, zuerst 1925): Mein Kampf, München

Hobbes, Thomas (1965, zuerst 1651): Leviathan oder Wesen, Form und Gewalt des kirch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Staates, Reinbek bei Hamburg

Höhne, Heinz (1996): »Gebt mir vier Jahre Zeit«. Hitler und die Anfänge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Main

Hoffmeyer, Miriam (1997): Kein süßes Nichtstun. Computer ersetzen Arbeitskräfte in Reisebüro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4.9.1997

Hofmann, Werner (Hrsg.), (1971): Sozialökonomische Studententexte, Bd. 3, Theorie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Berlin

Holt, Alix s. Maheim, Annik

Homann, Hermann (Hrsg.), (1973): Meuterei auf der »Bounty«, berichtet von Captain William Bligh, Stuttgart

Hopkins, Terence/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Grundzüge der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Weltsystems. Entwurf für ein Forschungsvorhaben, in: Senghaas, Dieter (Hrsg.), Kapitalistische Weltökonomie. Kontroversen über ihren Ursprung und ihre Entwicklung, Frankfurt/Main

Horkheimer, Max s. Adorno, Theodor W.

Horx, Matthias (1999): Das Zukunfts-Manifest. Aufbruch aus der Jammerkultur, Düsseldorf/München

Huber, Joseph (1985): Modell und Theorie der langen Wellen. Kleine Forschungsgeschichte mit gemischten Ausblicken, in: Jänicke, Martin (Hrsg.): Vor uns die goldenen neunziger Jahre? Langzeitprognosen auf dem Prüfstand, München/Zürich

Hughes, Thomas P. (1991): Die Erfindung Amerikas. Der technologische Aufstieg der USA seit 1870, München

Hurrelmann, Klaus s. Palentien, Christian

Huxley, Aldous (1989, zuerst 1932): Schöne Neue Welt. Ein Roman der Zukunft, Frankfurt/Main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1978): Vorwort zur deutschen Ausgabe, in: Marx Engels Werke (MEW), Bd. 1, Berlin

Israel, Ulrich/Gebauer, Jürgen (1991): Panzerschiffe um 1900, Berlin

Jacoby, Henry (1969): Die Bürokratisierung der Welt. Ein Beitrag zur Problemgeschichte

Jaeger, Hans (1974): Big Business und New Deal, Stuttgart

Jänicke, Martin (1985): Langfristige Wachstumsperspektiven der westlichen Industrieländer, in: ders. (Hrsg.), Vor uns die goldenen neunziger Jahre? Langzeitprognosen auf dem Prüfstand, München/Zürich

Johann, Ernst (Hrsg.), (1966): Reden des Kaisers. Ansprachen, Predigten und Trinksprüche Wilhelms II., München

- Jünger, Ernst (1925): *Der Kampf als inneres Erlebnis*, Berlin
- Jünger, Ernst (1941, zuerst 1934 a): *Lob der Vokale*, in: ders., *Blätter und Steine*, Hamburg
- Jünger, Ernst (1941, zuerst 1934 b): *Die totale Mobilmachung*, in: ders., *Blätter und Steine*, Hamburg
- Jünger, Ernst (1941, zuerst 1934 c): *Über den Schmerz*, in: ders., *Blätter und Steine*, Hamburg
- Jünger, Ernst (1953): *Der Gordische Knoten*, Frankfurt/Main
- Jünger, Ernst (1954): *Das Sanduhrbuch*, Frankfurt/Main
- Jünger, Ernst (1978): *Sturm*, in: *Sämtliche Werke*, Band 15, Stuttgart
- Jünger, Ernst (1981, zuerst 1932):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Stuttgart
- Jünger, Ernst (1987, zuerst 1929): *Das abenteuerliche Herz. Erste Fassung. Aufzeichnungen bei Tag und Nacht*, Stuttgart
- Jünger, Ernst (1990, zuerst 1920): *In Stahlgewittern*, Stuttgart
- Jurcovic, Ute (1998): *Hunger im Überfluß. In Deutschland hungern immer mehr Kinder*, in: *Die Woche*, 13.2.1998
- Kaltenbrunner, Robert (1999): *Stadt und Wohnung als »Maschine«. Rationalisierung des Bauens erneut als Zauberformel*,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8.2.1999
- Kaminski, Andrzej J. (1990): *Konzentrationslager 1896 bis heute. Geschichte, Funktion, Typologie*, München
- Kant, Immanuel (1993, zuerst 1775): *Von den verschiedenen Rassen der Menschen*, in: *Werkausgabe* Bd. XI, Frankfurt/Main
- Kant, Immanuel (1993, zuerst 1784):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Werkausgabe* Bd. XI, Frankfurt/Main
- Kant, Immanuel (1988, zuerst 1764):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in: *Werkausgabe* Bd. II, Frankfurt/Main
- Kant, Immanuel (1985, zuerst 1783):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Stuttgart
- Karsten, Gaby s. Burgard, Roswitha

Katona, George (1965): *Der Massenkonsum. Eine Psychologie der neuen Käuferschichten*, Wien-Düsseldorf

Kautsky, Karl (1910): *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Stuttgart

Kautsky, Karl (1922, zuerst 1892):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Stuttgart-Berlin

Kautsky, Karl (1927):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d. I*, Berlin

Kehrl, Hans (1973): *Krisenmanager im Dritten Reich. 6 Jahre Frieden-6 Jahre Krieg*, Düsseldorf

Keynes, John Maynard (1956, zuerst 1930): *Die Zukunft,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Männer und Probleme. 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Tübingen

Keynes, John Maynard (1994, zuerst 1936): *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äftigung, 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 Berlin

Kidron, Michael/Segal, Ronald (1996): *Der Fischer Atlas zur Lage der Welt. Globale Trends auf einen Blick*, Frankfurt/Main

Klee, Ernst (1995): *Mörderische Vordenker. Der Psychiater Alfred Hoche und der Jurist Karl Binding forderten 1920 als erste die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in: *Die Woche*, 17.2.1995

Klocke, Andreas s. Palentien, Christian

Klönne, Arno (1981):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Ziele-Wirkungen*, Düsseldorf-Köln

Knickerbocker, H.R. (1931): *Der rote Handel lockt*, Berlin

Koch, Hannsjoachim W. (1973): *Der Sozialdarwinismus. Seine Genese und sein Einfluß auf das imperialistische Denken*, München

Koch, Henning s. Burwitz, Hiltrud

Kocka, Jürgen s. Ritter, Gerhard A.

Kölle, Ingrid (1992): *Millionen Kinder in USA haben nicht genug zu essen*, in: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16.7.1992

Köppen, Ruth (1994): *Armut und Sexismus*, Berlin

- 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der Freistaaten Bayern und Sachsen (1997): *Erwerbstätigkeit und Arbeitslosigkeit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Ursachen und Maßnahmen. Teil III, Maßnahmen zur Verbesserung der Beschäftigungslage*, Bonn
- Kojève, Alexandre (1947):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
- Krämer-Badoni, Thomas s. Burwitz, Hiltrud
- Kroll, Jürgen s. Weingart, Peter
- Kroneberg, Lutz/Schloesser, Rolf (Hrsg.), (1980): *Weber-Revolution 1844. Der schlesische Weberaufstand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Publizistik und Literatur*, Köln
- Krumreich, Gerd (1996): *Kriegsgeschichte im Wandel*, in: Hirschfeld, Gerhard/Krumreich, Gerd/Renz, Irina (Hrsg.), *„Keiner fühlt sich hier mehr als Mensch...“ 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 Frankfurt/Main
- Kubin, Alfred (1994, zuerst 1909): *Die andere Seite*, Reinbek bei Hamburg
- Lambsdorff, Otto Graf (1997): *Die menschliche Ordnung. Über die Mißverständnisse der Kirchen mit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Wirtschaftswoche* 26/1997
- Lamszus, Wilhelm (1928, zuerst 1912): *Das Menschenschlachthaus. Visionen vom Krieg*, Leipzig
- Landsberg, M. (1999): *Unsere Kinder sind hier am Verhungern*, in: *Sonntagsblitz Nürnberg*, 28.2.1999
- Langbehn, Julius (1922, zuerst 1888): *Rembrandt als Erzieher. Von einem Deutschen*, Leipzig
- Langewiesche, Dieter (1992): *Wege zur Revolution*, in: Borst, Otto (Hrsg.), *Aufbruch und Entzug. Vormärz 1815 – 1848 i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Stuttgart
- Lefèvre, Wolfgang (1968): *Reichtum und Knappheit. Studienreform als Zerstörung gesellschaftlichen Reichtums*, in: Bergmann, Uwe/Dutschke, Rudi/Lefèvre, Wolfgang/Rabehl, Bernd,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Reinbek bei Hamburg
- Lekachman, Robert (1982): *Die Reichen reicher machen. Reaganomics oder Wie Ronald Reagan den Sozialstaat abbaut*, Reinbek bei Hamburg
- Lenin, Wladimir I. (1961, zuerst 1917): *Wie soll man den Wettbewerb organisieren?*, in: *Lenin Werke* Bd. 26, Berlin

Lenin, Wladimir I. (1978, zuerst 1918):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in: Lenin Werke Bd. 27, Berlin

Levinsohn, Richard (1932): Die Welt aus den Fugen. Amerika in der Krise, Dresden

Lichter, Jörg (1998): Die große Deflation. Deutsche Gründerkrise von 1873 bis 1879, in: Handelsblatt, 8.12.1998

Lieber, Hans-Joachim (1993): Zur Theorie totalitärer Herrschaft, in: ders. (Hrsg.), Politische Theori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Bonn

Liedtke, Patrick M. s. Giarini, Orio

Lissagaray, Prosper (1894): Geschichte der Kommune von 1871, Stuttgart

List, Friedrich (1922, zuerst 1841):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Jena

List, Friedrich (1928, zuerst 1844): Beziehungen der Landwirtschaft zu Industrie und Handel, in: Werke Bd.V, Berlin

List, Friedrich (1928, zuerst 1842):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n: Werke Bd.V, Berlin

List, Friedrich (1928, zuerst 1841): Die Gegner des Twistzolls, in: Werke Bd.V, Berlin

List, Friedrich (1928, zuerst 1843):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Industrie, in: Werke Bd.V, Berlin

Loose, Hans-Werner (1997): Am Sonntag gibt es nur noch altes Brot. Bulgarien steht vor einem neuen Hunger-Winter, in: Die Welt, 10.12.1997

Loth, Wilfried (1996): Das Kaiserreich. Obrigkeitsstaat und politische Mobilisierung, München

Luckow, Marion (1998): Nachwort, in: Sade, Marquis de, Justine oder Vom Mißgeschick der Tugend, Berlin

Ludendorff, Erich (1935): Der totale Krieg, München

Ludwig, Karl-Heinz (1981): Strukturmerkmal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ufrüstung bis 1933, in: Forstmeier, Friedrich/Volkman, Hans-Erich (Hrsg.), Wirtschaft und Rüstung am Vorab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Düsseldorf

Lütge, Gunhild (1997): Die Wunder der Statistik. Ein Vergleich der nationalen Arbeitslosenquoten führt in die Irre, in: Die Zeit 47/1997



Lutz, Burkart (1989): *Der kurze Traum immerwährender Prosperität. Eine Neuinterpretation der industriell-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m Europa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Main, New York

Mahaim, Annik/Holt, Alix/Heinen, Jacqueline (1984): *Frauen und Arbeiterbewegung. Deutschland vor 1914 – Russische Revolution – Spanischer Bürgerkrieg*, Frankfurt/Main

Malthus, Thomas Robert (1924/25, zuerst 1826): *Eine Abhandlung über das Bevölkerungsgesetz*, 2 Bde., Jena

Mandeville, Bernard (1988, zuerst 1723): *Die Bienenfabel oder Private Laster als gesellschaftliche Vorteile*, Leipzig und Weimar

Manegold, Karl-Heinz s. Treue, Wilhelm

Mann, Thomas (o.J.): *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 Stuttgart

Marten, Heinz-Georg (1983): *Sozialbiologismus. Biologische Grundpositionen der 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 Frankfurt/Main, New York

Martens, Erika s. Heuser, Jean

Marx, Karl (1965, zuerst 1890):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1, nach der vierten, von Friedrich Engels herausgegebenen Auflage (Hamburg 1890), Berlin

Marx, Karl (1965, zuerst 1894):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3, Berlin

Marx, Karl (1968, zuerst 1844): *Texte zu Methode und Praxis II. Pariser Manuskripte 1844*, Reinbek bei Hamburg

Marx, Karl (1977, zuerst 1848): *Lohn, Preis und Profit*, Berlin

Marx, Karl (1978, zuerst 1844): *Zur Judenfrage*, in: *Marx Engels Werke (MEW)* Bd. 1, Berlin

Mattick, Paul (1969, zuerst 1936): *Arbeitslosigkeit und Arbeitslosenbewegung in den USA 1929-1935*, Frankfurt/Main

Mayr, Franz Xaver (1931): *Rationalisierung der Maschine Mensch. Die radikale Lösung der Arbeitslosenfrage*, Wien-Leipzig

Meadows, Dennis (1972): *Die Grenzen des Wachstums. Bericht des Club of Rome zur Lage der Menschheit*, Stuttgart

Mennicken, Peter (1924): *Anti-Ford oder von der Würde des Menschen*, o.O.

Miller, Jacques-Alain (1996): Jeremy Bentham's panoptische Maschinerie, in: Miller, Jacques-Alain/Bozovic, Miran/Salecl, Renata: Utilitarismus, Wien

Minc, Alain (1994): Das neue Mittelalter, Hamburg

Minchinton, W. (1983): Die Veränderungen der Nachfragestruktur von 1500 – 1700, in: Carlo M. Cipolla/K. Brochardt (Hrsg.),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d. 2, Sechzehntes und siebzehntes Jahrhundert, Stuttgart-New York

Mommsen, Wolfgang J. (1979): Der europäische Imperialismus. Aufsätze und Abhandlungen, Göttingen

Mommsen, Hans (1991):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usgewählte Aufsätze, Reinbek bei Hamburg

Mommsen, Theodor (1988, zuerst 1880): Auch ein Wort über unser Judentum, in: Boehlich, Walter (Hrsg.), 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 Frankfurt/Main

Moore, James s. Desmond, Adrian

Mosse, George L. (1976): Die Nationalisierung der Massen. Von den Befreiungskriegen bis zum Dritten Reich,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Mundorf, Hans (1999): Das Zeitalter der »Nationalökonomien« ist endgültig vorbei, in: Handelsblatt, 12.1.1999

Mühlhausen, Walter (1994): Die Sozialdemokratie am Scheideweg – Burgfrieden, Parteikrise und Spaltung im Ersten Weltkrieg, in: Michalka, Wolfgang (Hrsg.), Der Erste Weltkrieg. Wirkung, Wahrnehmung, Analyse; München-Zürich

Münz, Ludwig (1934): Einführung, in: ders. (Hrsg.), Das Gesetz zur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 vom 20. Januar 1934, Berlin

Muthesius, Ehrenfried (1960): Der letzte Fußgänger oder Die Verwandlung unserer Welt, München

Naisbitt, John (1995): Megatrends Asien, Wien

Naumann, Friedrich (1949, zuerst 1900): Demokratie und Kaisertum, Berlin

Naumann, Friedrich (1964, zuerst 1906): Neu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s., Werke, Dritter Band, Köln und Opladen

Nesshöver, Christoph (1999): Nur noch Stehplätze. Thomas Robert Malthus. Das Bevölkerungsgesetz, in: Die Zeit 21/1999

Neugebauer, Jens (1999): Roboter sind billiger geworden und bieten deutlich mehr. Die Zukunft der Montagetechnik findet auch in kleinsten Dimensionen statt, in: Handelsblatt, 14.4.1999

Nolte, Ernst (1987 a): Zwischen Geschichtslegende und Revisionismus? Das Dritte Reich im Blickwinkel des Jahres 1980, in: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Zürich

Nolte, Ernst (1987 b):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 in: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Zürich

Nolte, Ernst (1993): Streitpunkte. Heutige und künftige Kontroversen um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Frankfurt/Main

Opger, Günter (1982): Die Gründerjahre. Als der Kapitalismus jung und verwegen war, München

Ohlsen, Manfred (1982): Der Eisenbahnkönig Bethel Henry Strousberg. Eine preußische Gründerkarriere, Berlin

Opitz, Reinhard (Hrsg.), (1994): Europastrategien des deutschen Kapitals 1900 – 1945, Bonn

Orwell, George (1995, zuerst 1949): 1984, Frankfurt/Main, Berlin

Ostwald, Wilhelm (1912): Der energetische Imperativ, Leipzig

Ott, Hugo/Schäfer, Hermann (Hrsg.), (1984): Wirtschafts-Ploetz.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 zum Nachschlagen, Freiburg-Würzburg

Pache, (1979): Nachwort, in: Defoe, Daniel, Glück und Unglück der berühmten Moll Flanders, Stuttgart

Packard, Vance (1964): Die wehrlose Gesellschaft, München/Zürich

Palentien, Christian/Klocke, Andreas/Hurrelmann, Klaus (1999): Armut im Kindes- und Jugendalter, in: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18/1999

Pariser Kommune 1871 (1931): Berichte und Dokumente von Zeitgenossen, Berlin

Paulinyi, Akos (1983):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Die Entstehung des Fabriksystems in

Großbritannien, in: Schneider, Helmuth (Hrsg.), *Geschichte der Arbeit. Vom alten Ägypten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Pernerstorfer, Engelbert (1916): *Einführung*, in: Jaurès, Jean, *Vaterland und Proletariat*, Jena

Perrot, Michelle (1981): *Rebellische Weiber. Die Frau in der französischen Stadt des 19. Jahrhunderts*, in: Honegger, Claudia/Heintz, Bettina (Hrsg.), *Listen der Ohnmacht. Zur Sozialgeschichte weiblicher Widerstandsformen*, Frankfurt/Main

Petersen, Jens (1998): *Die Verwandlung des Gartens in eine Kaserne. Lösung eines Bannes: Der Begriff des Totalitarismus kehrt in sein Ursprungsland Italien zurüc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1.1998

Petzina, Dieter s. Abelhauser, Werner

Piper, Ernst (1995): *Von der Entfernung zur Vernichtung oder Wir standen in der Pflicht, gegenüber der SS, der Firma Topf und dem NS-Staat*, Einführung zu: Pressac, Jean Claude, *Die Krematorien von Auschwitz. Die Technik des Massenmords*, München-Zürich

Piper, Nikolaus (1997): *Die unheimliche Revolution. Bewundert, gehaßt, gefürchtet – wie die Doktrin vom Laissez-faire-Kapitalismus in die Wirtschaft zurückkehrte*, in: *Die Zeit* 37/1997

Poliakov, Léon (1983): *Geschichte des Antisemitismus, Bd. V, Die Aufklärung und ihre jüdenfeindliche Tendenz*, Frankfurt/Main

Poliakov, Léon (1988 a): *Geschichte des Antisemitismus, Bd. VII, Zwischen Assimilation und jüdischer Weltverschwörung*, Frankfurt/Main

Poliakov, Léon (1988 b): *Geschichte des Antisemitismus, Bd. VIII, Am Vorabend des Holocaust*, Frankfurt/Main

Postone, Moishe (1988):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Ein theoretischer Versuch*, in: Diner, Dan (Hrsg.), *Zivilisationsbruch. Denken nach Auschwitz*, Frankfurt/Main

Pressac, Jean-Claude (1995): *Die Krematorien von Auschwitz. Die Technik des Massenmords*, München-Zürich

Price, Roger (1992): *1848. Kleine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Prowse, Michael (1997): *Der Sturz des Adam Smith*, in: *Wirtschaftswoche* 6/1997

Rapoport, Louis (1992): *Hammer, Sichel, Davidstern. Judenverfolgung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 Rasch, Harold (1966): *Die Finanzierung des Wirtschaftswunders. Der Weg in die permanente Inflation*, Stuttgart-Degerloch
- Rathenau, Walter (1925, zuerst 1908): *Anmerkung vom Konsumanteil*, in: *Schriften*, Bd. 4, Berlin
- Rathenau, Walter (1929, zuerst 1915): *Deutschlands Rohstoffversorgung*, in: *Schriften*, Bd. 5, Berlin
- Recktenwald, Horst Claus (1993): *Würdigung*, in: Smith, Adam, *Der Wohlstand der Nationen. Eine Untersuchung seiner Natur und seiner Ursachen*, München
- Reisiger, Hans (o.J.): *Nachwort*, in: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Zürich
- Reitzle, Wolfgang (1994): *Die neue Rolle der Arbeitgeber*, in: *Arbeit der Zukunft – Zukunft der Arbeit*, Stuttgart
- Remarque, Erich Maria (1952, zuerst 1928): *Im Westen nichts Neues*, Berlin
- Rens, Jef (1965):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die Tätigkei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organisation (IAO)*, in: *Automation. Risiko und Chance*, Bd. I, Beiträge zur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agung der 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über Rationalisierung, Automatisierung und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Frankfurt/Main
- Reuther, Walter P. (1965): *Automation und die Politik der Gewerkschaften*, in: *Automation. Risiko und Chance*, Bd. II, Beiträge zur zweiten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agung der Industriegewerkschaft Metall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über Rationalisierung, Automatisierung und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Frankfurt/Main
- Rieß, Jürgen s. Baumunk, Bodo-Michael
- Ritter, Gerhard A./Kocka, Jürgen (Hrsg.), (1982):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870 – 1914. Dokumente und Skizzen*, München
- Rocker, Rudolf (1974, zuerst 1950): *Absolutistische Gedankengänge im Sozialismus*, Hamburg
- Röhl, John C.G. (1994): *Wilhelm II.: »Das Beste waere Gas!«*, in: *Die Zeit* 48/1994
- Roesler, Rudolf (1913): *Das Tylor-System – Eine Budgetierung der menschlichen Kraft*, in: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Die Grundsätze wissenschaftlicher Betriebsführung*, München-Berlin
- Rosecrance, Richard (1987): *Der neue Handelsstaat. Herausforderungen fü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Frankfurt/Main, New York

- Roth, Jürgen (1971): Armut in der Bundesrepublik, Darmstadt
- Rousseau, Jean-Jaques (1986, zuerst 1762): Emile oder Über die Erziehung, Stuttgart
- Rovan, Joseph (1980):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Main
- Rud, George (1977): Die Volksmassen in der Geschichte. England und Frankreich 1730 – 1848, Frankfurt/Main-NewYork
- Sade, Marquis de (1980, zuerst 1795): Die Philosophie im Boudoir, Herrsching
- Sade, Marquis de (1992, zuerst 1797): Die Geschichte der Justine oder Die Nachteile der Tugend (erweiterte Fassung), Bindlach
- Sade, Marquis de (1998, zuerst 1787): Justine oder Vom Mißgeschick der Tugend, Berlin
- Samjatin, Jewgeni (1991, geschrieben 1920): Wir, Leipzig/Weimar
- Sauga, Michael (1997): Gezähmte Bestie. Über den Tod der Inflation, in: Wirtschaftswoche 3/1997
- Sautter, Udo (1994): Geschicht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Stuttgart
- Schäfer, Hermann s. Ott, Hugo
- Scharrer, Manfred (1984): Anpassung bis zum bitteren Ende. Die freien Gewerkschaften 1933, in: ders. (Hrsg.), Kampflöse Kapitulation. Arbeiterbewegung 1933, Reinbek bei Hamburg
- Schärer, René (1975, zuerst 1973): Das dressierte Kind. Sexualität und Erziehung: Über die Einführung der Unschuld, Berlin
- Schloesser, Rolf s. Kroneberg, Lutz
- Schmidt-Bergmann, Hansgeorg (1993): Futurismus. Geschichte, Ästhetik, Dokumente, Reinbek bei Hamburg
- Schnell, Ralf (1998): Dichtung in finsternen Zeiten. Deutsche Literatur und Faschismus, Reinbek bei Hamburg
- Schönhoven, Klaus (1994): Die Kriegspolitik der Gewerkschaften, in: Michalka, Wolfgang (Hrsg.), Der Erste Weltkrieg Wirkung, Wahrnehmung, Analyse; München-Zürich
- Scholz, Roswitha (1992): Der Wert ist der Mann. Thesen zu Wertvergesellschaftung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 in: Krisis, 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Warengesellschaft 12, Bad Honnef

- Schütte, Christian (1995): Heroische Annahmen. Ökonomie-Preisträger Robert Lucas sprengte die Fundamente des alten Keynesianismus, in: Wirtschaftswoche 42/1995
- Schulin, Ernst (1994): Die Urkatastroph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in: Michalka, Wolfgang (Hrsg.), Der Erste Weltkrieg. Wirkung, Wahrnehmung, Analyse; München
- Schulz, Ursula (Hrsg.), (1976):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48 – 1919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München
- Schumpeter, Joseph A. (1980, zuerst 1942):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München
- Segal, Ronald s. Kidron, Michael
- Sering, Paul (1984, zuerst 1946): Der Faschismus als Revolte gegen Europa, in: Nolte, Ernst (Hrsg.), Theorien über den Faschismus, Königstein/Taunus
- Sieber, Eberhard (1992): Studentische Störungen und Entwürfe, in: Borst, Otto (Hrsg.), Aufbruch und Entsaugung. Vormärz 1815 – 1848 i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Stuttgart
- Silberner, Edmund (1962): Sozialisten zur Judenfrag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vom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14, Berlin
- Sloterdijk, Peter (1999): Regeln für den Menschenpark. Ein Antwortschreiben zum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in: Die Zeit 38/1999
- Slotosch, Walter (1971): Das Geld, mit dem wir leben müssen. Panorama der Weltinflation, München/Wien/Basel
- Smith, Adam (1977, zuerst 1759): Theorie der ethischen Gefühle, Hamburg
- Smith, Adam (1993, zuerst 1789): Der Wohlstand der Nationen. Eine Untersuchung seiner Natur und seiner Ursachen, München
- Sommerhoff, Barbara (1997): Dienen und Bedientenlassen will gelernt sein. Ohne Vorbilder kann Servicementalität nur durch wirtschaftlichen Druck entsteh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1997
- Spengler, Oswald (1972, zuerst 1918):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München
- Starbatty, Joachim (1999): Geldpolitische Hygiene statt keynesianischer Hydraulik. Hayeks Konjunkturtheorie wird im Lichte der jüngsten Finanzkrisen wieder aktuell, in: Handelsblatt, 16.3.1999

- Störig, Hans Joachim (1966): *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Zürich
- Strübel, Gustav (1996): «Ich habe sie richten lassen». Vor 70 Jahren: Offiziere morden, Richter versagen, die SPD zahlt den Preis, in: Sebastian Häffner, Stephan Hermlin, Kurt Tucholsky u.a., *Zwecklegenden. Die SPD und das Scheitern der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 Stürmer, Michael (Hrsg.), (1986): *Herbst des alten Handwerks. Meister, Gesellen und Obrigkeit i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Zürich
- Süß, Walter (1985): *Die Arbeiterklasse als Maschine. Ein industrie-soziologischer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aufkommenden Stalinismus*, Wiesbaden
- Sullerot, Evelyne (1971): *Die Frau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München
- Swift, Jonathan (1991, zuerst 1729): *Beschneiderer Vorschlag, wie man verhüten kann, daß die Kinder armer Leute in Irland ihren Eltern oder dem Lande zur Last fallen, und wie sie der Allgemeinheit nutzbar gemacht werden können*, in: *Ausgewählte Werke*, Bd. 2, Berlin und Weimar
- Swift, Jonathan (1991, zuerst 1727): *Gullivers Reisen*, in: *Ausgewählte Werke*, Bd. 3, Berlin und Weimar
- Talmon, J.L. (1961): *Die Ursprünge der totalitären Demokratie*, Köln und Opladen
-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1913): *Die Grundsätze wissenschaftlicher Betriebsführung*, München und Berlin
- Terkel, Studs (1972): *Der Grosse Krach. Die Geschichte der amerikanischen Depression*, Frankfurt/Main
- Thatcher, Margaret (1993): *Downing Street No. 10. Die Erinnerungen*, Düsseldorf
- Thatcher, Margaret (1995): *Die Erinnerungen 1925-1979*, Düsseldorf
- Thompson, Edward P. (1980): *Plebe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Aufsätze zur engl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 Thompson, Edward P. (1987, zuerst 1963):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2 Bde., Frankfurt/Main
- Thurow, Lester C. (1996 a):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Düsseldorf/München
- Thurow, Lester C. (1996 b): *Die Illusion vom Jobwunder. Viele Arbeitslose werden von Amts wegen gar nicht mehr registriert*, in: *Die Zeit* 44/1996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988/zuert 1879): Unsere Aussichten, in: Boehlich, Walter (Hrsg.), 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 Frankfurt/Main

Treue, Wilhelm/Manegold, Karl-Heinz (Hrsg.), (1966):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Göttingen-Frankfurt/Main-Zürich

Treue, Wilhelm (Hrsg.), (1967): Deutschland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Tschuppik, Karl (1931): Ludendorff. Die Tragödie des Fachmanns, Wien und Leipzig

Ulrich, Bernd/Ziemann, Benjamin (Hrsg.), (1994): Frontalltag im Ersten Weltkrieg. Wahn und Wirklichkeit. Quellen und Dokumente, Frankfurt/Main

Ulrich, Volker (1994): Kriegsaltag. Zur inneren Revolutionierung der wilhelminischen Gesellschaft, in: Michalka, Wolfgang (Hrsg.), Der Erste Weltkrieg. Wirkung, Wahrnehmung, Analyse; München-Zürich

Virilio, Paul (1992): Rasender Stillstand, München/Wien

Virilio, Paul (1978): Fahren, fahren, fahren..., Berlin

Vollmer, Antje (1996): Heißer Frieden. Über Gewalt, Macht und Zivilisation, München

Wacquant, Loïc J.D. (1997): Vom wohltätigen Staat zum strafenden Staat. Über den politischen Umgang mit Armut und Elend in den USA,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2.7.1997

Wagner, Adolph (1912): Die Strömungen i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Katheder- und Staatssozialismus, Berlin

Wagner, Adolph (1879):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Leipzig und Heidelberg

Wagner, Richard (1975, zuerst 1850): Das Judentum in der Musik, München

Wagner, Richard (1988, zuerst 1975): Das braune Buch. Tagebuchaufzeichnungen, München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6, zuerst 1974): Das moderne Weltsystem, Bd. I,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elt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Frankfurt/Main

Wallerstein, Immanuel s. Hopkins, Terence

Walser, Martin (1998): Erfahrungen beim Verfassen einer Sonntagsrede, Frankfurt/Main

Walter, Dirk (1999): Antisemitische Kriminalität und Gewalt.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onn

Weber, Max (1985, zuerst 192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ß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Tübingen

Wehler, Hans-Ulrich (1987):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Zweiter Band, 1815 – 1845/49, München

Wehler, Hans-Ulrich (1995):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Dritter Band, 1849 – 1914, München

Wehner, Magnus (1932): Langemarck. Ein Vermächtnis, München

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1988): Rasse, Blut und Gene.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ain

Wells, Herbert George (1974, zuerst 1898): Der Krieg der Welten, Zürich

Wells, Herbert George (1980, zuerst 1895): Die Zeitmaschine, Wien/Hamburg

Wick, Rainer K. (1994): Bauhaus Pädagogik, Köln

Widmann, Carlos (1995): Der Armen überdrüssig. Über die Demontage des amerikanischen Sozialstaats, in: Der Spiegel 46/1995

Wiener, Norbert (1992, zuerst 1948): Kybernetik. Regelung und Nachrichtenübermittlung im Lebewesen und in der Maschine, Düsseldorf

Wikander, Ulla (1998): Von der Magd zur Angestellten. Macht, Geschlecht und Arbeitsteilung 1789 – 1950, Frankfurt/Main

Wildt, Michael (1996): Vom kleinen Wohlstand. Eine Konsumgeschichte der fünfziger Jahre, Frankfurt/Main

Williams, Heathcote (1992): Automobilmachung, Frankfurt/Main

Wingler, Hans M. (1975): Das Bauhaus. Weimar Dessau Berlin und die Nachfolge in Chicago seit 1937, Bramsche

Wirtz, Rainer (1981): »Widersetzlichkeiten, Excesse, Crawalle, Tumulte und Skandale«. Soziale Bewegung und gewalthafter sozialer Protest in Baden 1815–1848, Frankfurt/Main-Berlin-Wien

- Wuketits, Franz M. (1987): *Charles Darwin: Die stille Revolution*, München-Zürich
- Wulf, Hans Albert (1987): *«Machenschaften sind wir keine»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Main-New York
- Xiang, Wolfgang & Bode, Peter M.
- Ziemann, Bejmann & Ulrich, Bernd

##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 《保守资本主义》

[英] 大卫·雷斯曼著

2002年10月出版

定价：19.00元

ISBN 7-80149-795-3/D

本书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的另一种见解。从此书中，我们不仅能知悉资本主义能做什么，更能发现资本主义不能做什么；能知悉市场能做什么，更能发现市场不能做什么。并由此知悉社会、习俗、传统、道德等理性的保守主义的因素，这些曾被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归入历史的过时的东西，对于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J.K. 吉布森-格雷汉姆 著

大32开 定价：28.00元

2001年10月出版

ISBN 7-80149-689-2/D

本书是有关资本主义霸权的论述，而且反对这些论述。它殊途同归，

是迄今为止人受到抑制的有关部门经济多样性论述的出现和发展展开了一片散漫的空间，希望对经济学发明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会有所贡献。

读者对象：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 《赌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大 32 开 定价：16.80 元

2000 年 6 月出版

ISBN 7 - 80149 - 283 - 8/D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1923~1998)，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瓦维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著有《赌场资本主义》、《英镑与英国政策》、《贸易顺差的国际政治》、《国家的退却》、《疯狂的金钱》等书

本书作者是世界上第一个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人。书中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变得像一个巨大的赌场，它使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其中。美国是这个赌场的导演和决策者——即便美国没有显赫的军事势力，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仍决定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本书重点探讨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弱点；形成今天的赌场的原因；美国的国内决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为了避免今后出现全球性金融、债务危机；如何冷却现在的赌场。

读者对象：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金融证券业人士，理论宣传工作者，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 《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威廉·哈拉尔 著

大 32 开 定价：28.00 元

2001 年 1 月出版

ISBN 7 - 80050 - 234 - 1/C

本书主要介绍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作者认为“旧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企业主说了算的“独裁主义”。“新资本主义”则以说服社会为目的，雇员、工会，甚至顾客和客户参与决策和管理。作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彼此补长取短，可使各自的经济顺利发展。

读者对象：经济工作者，国有企业厂长、经理

###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大 32 开 定价：17.00 元

1999 年 10 月出版

ISBN 7-80149-216-1/D

米歇尔·阿尔贝尔 (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

该书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的闻墙之争主要来源于富有魅力的“新美国资本主义”和较为完善的“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其中，前者讲究的是个成功、短期金融利润和金融媒体化，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讲英语的国家；后者追求的目标则与其相反，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

读者对象：政治、经济界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

###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英] 约翰·基恩 著

大 32 开 定价：18.80 元

1999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050 326-7/D

本书详细介绍了韦伯和哈贝马斯等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关于“晚期资本

主义”的论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本书是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影响的当代学术名著。

读者对象：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论宣传工作者，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 《帝国主义与依附》（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大32开 定价：28.00元

1999年2月出版

ISBN 7-80050-358-5/D

本书主要阐述了与“世界体系论”齐名的“依附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二战后帝国主义的新征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研究了不发达国家新的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以及这种形式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严重制约。这部著作在拉美和国际有较大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外学者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加深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 《历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著

大32开 定价：13.80元

1999年6月出版

ISBN 7-80149-141-6/C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教授及费尔南德·布劳代尔经济、历史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为当今世界四大社会思想家之一——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

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他还认为，应该把整个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描述出来，探讨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的表现形式。本书附英文原文。

读者对象：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者、爱好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